增订重编本

知堂書話

海南出版社

知堂序跋原序

我在选编《知堂书话》时写过一篇序文，说“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此类，因系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成一集，作为《书话》的续篇”，结果就是这本《知堂序跋》，共收文二百二十三篇，篇数等于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苦雨斋序跋文》四倍还多，周氏一生所写的序跋文，在这一册中，大约包罗无遗了。周作人是很看重序跋文和自己所写的序跋文的。他为俞平伯《燕支草》写的跋一开头就说：

> 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稍长，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中国的序跋也感到兴趣。……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好做，……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

这里讲的是为人作序，至于自己的著译呢，《看云集·自序》说道：

> 我向来总是自己作序的，我不曾请人家去做过，……因为我知道序是怎样地不好做，而且也总不能说的对或不错，即使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写一篇小小的小序。

序既这样地不好做，但又还是喜欢做，自然不能不讲究做序之法，他接着就说道：

> 做序之一法是从书名去生发，这就是赋得五言六韵法，……这个我想似乎不大合式。其次是来发挥书里边——或书外边的意思。书里边的意思已经在书里边了，我觉得不必再来重复他说，书外边的或者还有些意思罢。

这二百二十三篇序跋，所讲的便多是“书外边的意思”，用一句文言，也就是“言外之意”吧。说老实话，我喜欢的也就是这一点言外之意。舒芜先生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水平，没有人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最后这句话说得特别好，真可说是深得我心。周作人最反对“就题作文，各肖口吻”。他的序跋，实践了他自立的法度，从来不“赋得”，不“重复”。他不是“就题”，而是“借题”，是“借题发挥”，发挥自己对中国文化思想问题的见解。他在中国学海军，在外国学建筑，而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训论衡，狂言笑话，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此二百二十三篇所述者，岂止区区数百十种著译而已哉？舒君所云“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实在有点埋没得太久了，而这二百多篇序跋则正是打开尘封已久箱子的二百多枚钥匙。若无此二百二十二枚钥匙，所谓不该拒绝的遗产，恐怕亦只能如老残所感叹的“深锁螂嬛饱蠹鱼”了罢。

这二百二十三篇中，大约有五分之一是集外文，即是不曾收入从《自己的园地》到《知堂乙酉文编》这二十多本周氏自编文集中的文章，这一点做

得比《知堂书话》好。应该感谢新加坡郑子瑜、北京姜德明、香港黄俊东，尤其是上海的陈子善各位先生，如果没有他们慷慨提供各种希见的旧时报纸杂志、非卖品印刷物，以及周氏的未刊手稿，这一点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这二百二十三篇文字共分为五辑：第一辑是周氏为自己的著作（包括选编和辑录）所写的序跋；第二辑是为自己译作所写的序跋；第三辑是为别人著译所写的序跋；第四辑是零星题记，包括少年时的几篇记序，还有几则宣言启事；以上四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文字，建国以后所做的序跋，则不分著作译作，为己为人，统统编为第五辑。各辑内文章次第，主要按写作先后，有时亦以类相从，大抵以利于检阅为原则。

《知堂书话》出版以后，听到一种“反映”，即总编辑是不应该“亲自”编书的。可是，我一不做官，二不会对上打报告对下作报告，三又缺乏“朝游北海暮苍梧”去参加形形色色的学会、鉴定会、讨论会、座谈会、协作会等等没完没了的会的时间和兴趣，从十八岁学做编辑起，光阴荏苒，已经三十七年于兹矣，俗话说，“四十不斟老婆，五十不斟行当”，到老改行，乌乎其可？还是且编了这本《知堂序跋》再说罢。

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

知堂书话原序

我一直还算喜欢读书的，然读书于我亦大不易：一是不易有闲，二是不易到手，三是不易读懂。有时便只好找点书评书话来看看，舔眼救馋，掬水降火，不免为三百年前的陶庵所笑了。

使我感到不满足的是，这类文字虽不算少，真正值得读和经得读的却不算多。奉命来骂或者来捧某一种书的，为了交情或者交易来作宣传、做广告的，自以为掌握了文昌帝君的秤砣或砝码来大声宣布权衡结果的，我都不大想看。我所想看的，只是那些平平实实的文章，它们像朋友闲谈一样向我介绍，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叙述了哪些我们想要知道的或者感到兴趣的事物，传达了哪些对人生和社会、对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这样的文章，无论是客观地谈书，或是带点主观色彩谈他自己读书的体会，只要自具手眼，不人云亦云，都一样的为我所爱读。如果文章的内涵和笔墨，还足以表现出本文和原书作者的学养和性情，那就更为佳妙了。虽然鸠摩罗什大师早已说过，嚼饭哺人，反致哕吐，明白昭示这是一件多么不易讨好的事情，但在被哺的方面，若得像薛蛟或刘海哥那样，一口吞下别人（？）吐出的红珠，五百年道行便能归我所有，亦不可谓非人生难得之遭逢也。

在我所读过的书评书话中，周作人的作品我以为可算是达到了上乘的标准。今从其一生所著三十几部文集中，把以书为题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这部《知堂书话》，以饷与我有同嗜的读者。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但因是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做一集，作为书话的续编。所录各文，悉依原本，不加改削。惟明显的排印错误，则就力所能及，酌予改正。如《俞理初的诙谐》一文，《秉烛后谈》印本第四十七面第二行“ 悃幅无华 ”，“ 幅 ”当作“ 愊 ”；“ 癸巳存类 ”，“ 类 ”当作“ 稿 ”；第五行“ 缺少温柔敦或澹泊宁静之趣 ”，“ 敦 ”字下脱“ 厚 ”字；第九行“ 蔡子民先生 ”，“ 子 ”当作“ 子 ”；第十一行“ 习苦齐笔记有一侧云 ”，“ 齐 ”当作“ 斋 ”，“ 侧 ”当作“ 则。这些当然都已经改正了。最有意思的是第四十八面第九行，印本作：

说文，亡从入从 ㄴ非 ㄴ ㄱ 之 ㄴ ，为有亡，亦为亡失。

“ 非 ㄴ ㄱ 之 ㄴ ”五字，显然是作者对排字工人的交代， 怕工人把“ 从入从 ㄴ ”的“ ㄴ ”当成标点符号“ ㄴ ㄱ ”的“ ㄴ ”；殊不知竟被工人误认为正文，排到字里行间去了，而且连“ 从入从 ㄴ ”的“ ㄴ ”也排成了标点符号。岂明老人当日拿到新出版的书，恐怕也只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苦笑几声了罢。这句现在也改正为：

说文，亡从入从 ㄴ ，为有亡，亦为亡失。这才算是改正了一九四四年北京新民印书馆“ 手民 ”的错误。

至于周作人其人和他整个的学问文章，我是没有资格来谈的，因为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虽然他在晚年也跟我有过一些接触。张宗子《<一卷冰雪文>后序》末节云：

昔张公凤翼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诘之曰：“ 既云文选，何故有

诗？”张曰：“昭明太子所集，于仆何与？”曰：“昭明太子安在？”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张曰：“便不死亦难究。”曰：“何故？”张曰：“他读得书多。”

我所确确实实明白无误晓得的，也就只有这两点：第一，周作人“已死”；第二，“他读得书多”。至于别的方面，还是留待能够说和愿意说的人去说罢！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于长沙。

序文三篇

锺叔河

增订重编本序

《知堂书话》是我八五年编的一部书，于八六年四月出版，至今已过去十多年了。原来《书话》所收的文章，是从周氏三十几部文集中选出来的，按集编次，既未分类，也不编年，读来不免稍嫌零乱。如《厂甸》一篇原在《夜读抄》中，《厂甸之二》却在《苦茶随笔》中，两篇谈厂甸书市的文章没能放在一起。又如在《苦竹杂记》中有一篇《如梦录》，在《药堂语录》中又有一篇题目相同而内容互异的《如梦录》，按集编次就隔得更远了。同时，只从文集中选文，周氏的大量集外文和未刊稿中的此类文字，都无法收入，沧海遗珠，更是很大的遗憾。还有周氏所作的序跋文，也是别一体裁的书话，当时没有编在一起，而是别为一集，就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的《知堂序跋》，这也是我觉得不很妥当的。原有的《书话》和《序跋》，绝版都已过十年，读者和友人时有询及，我也舍不得它们就此消灭。于是征得周丰一先生同意和授权，决定增订重编一部新的《知堂书话》。

所谓新的书话，新就新在：

一、《书话》原来不收序跋，新《书话》则一体全收。二、《书话》原来只收文集内的文字，新《书话》则将集外文和未刊稿中的书话和序跋全部收入。

三、《书话》原来按集编次，新《书话》则按文章内容分为下列七辑：

1.谈书和读书
2.谈中国古书
3.谈旧小说等
4．谈中国新书
5．谈东洋的书
6.谈西洋的书
7.谈自己的书

四、《书话》所收的文章，原来都没有编年，新《书话》七辑则一律按发表（写作）时间先后编次（谈同一书的文章放在第一篇之后），这样更易看出知堂读书生活的轨迹。五、周氏的文章，引文常常很多，又不太喜欢分段，今天的青年朋友读起来，也许会感到不便。此次新编，较长引文用另外字体排出，正文太长的地方适当分段，可能比较合乎现代阅读的习惯。

《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原来各有一篇序，现在把它们附在这篇新序的后面。那两篇序文里说过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补充修改，当然也就不必再重复了。

这篇小序已经排好，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忽然收到北京图书馆发来的讣告，惊悉周丰一先生不幸辞世，匆匆不及作文，谨在此附志数语，表示我衷心的哀悼。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一日。

第一辑——谈书和读书

读 书 论①

中国近来新出书籍，读不胜读，亦读无可读也。见德人淑本好尔《读书论》，有足备省鉴者，采译其言，作是篇。

天下文章，是分二道，殊途并进，两不相知，一真而一幻也。真者，贤哲之士为文章学术而生者治之，其进以渐；统欧洲全区，百年之间，可仅得十书，顾皆天下至文，永久传世。幻者，庸众之人以文章学术而生者治之，其进也骤；张皇号召，声动一世，一岁之中，得书千馀，第不阅十稔，更问其书何在，昔日大名今复焉在，则去之已久，亡也忽焉。唯真与幻，一久一暂，正相对待，有如此也。

昔者希腊史家海罗陀多思记言，克塞耳绥思尝阅兵，其数不可计极，乃潸然泣下，念是千万人，不及百年，将更无一存也。今若披通行书目，见是中书籍，将十年而尽亡，言念及此，更焉得不流涕耶。

文字之域，芜杂不异人间。人若涉足尘世，当见顽愚群众，到处麇集，挠害万物，如夏日青蝇。唯恶书亦然，其在著作林中，若田有蔓草，夺良苗之膏泽而阻其长。是复垄断天下人之财货光阴精神知力，悉聚于己，使无暇以及他书。故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试观近世著作，十九皆是，推其原旨，第欲得钱耳。文人书估，朋比为奸，以欺世人。更有进者，佣书卖文之徒，不知醇美趣味与时代文明，俨为文苑领袖，教世人以趋时，使读最新之书，以为社交谈助。而已以是得阴售其志。如斯宾特勒、笠顿希和之属，著述浩瀚，有名一时，皆其类也。己则利矣，而读者迫于时尚，强使日诵庸书，不遑休息，斯大可哀悯者耳。著者既皆庸凡，复为金资而动，故其数亦至众。天下之人，以读其书故，于古今杰作，转致荒废，但知其名而已。

欲救其敝，不读一法最为切要，是在独立主见，不妄读书。无论政治宗教诗歌小说，毋以群众欣赏，名震一时，一年而数易板，遂取诵之。须知恶俗之书，为愚人而作者，恒得多数赞美也。但当诵习贤哲著作，其思想感情超越古今，悠久不朽者，斯乃足为教益耳。吾人读书，恒患多逢恶札，鲜见佳本。恶书者，精神之鸩毒，其害及于心思。人欲读佳书，当从不读恶书始。何者？盖人生实短，而时光精力，皆有所限也。

□1914 年 11 月刊《绍兴教育杂志》1 期，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北京的外国书价

听说庚子的时候有人拿着一本地图，就要被指为二毛子，有性命之忧，即使烧表时偶有幸免，也就够受惊吓了。到了现在不过二十多年，情形却大不同，不但是地图之类，便是有原板外国书的人也是很多，不可不说是一个极大进步：这个事实，只要看北京贩卖外国书的店铺逐年增加，就可以明白。我六年前初到北京，只知道灯市口台吉厂和琉璃厂有卖英文书的地方，但是现在至少已有十二处，此外不曾知道的大约还有。

但是书店的数目虽多，却有两个共通的缺点。其一是货色缺乏：大抵店里的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供给学生用的教科书，一是供给旅京商人看的通俗小说，此外想找一点学问艺术上的名著便很不容易。其二是价钱太贵：一先令的定价算作银洋七角，一圆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价较贱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更不必说了。虽然上海伊文思书店的定价并不比这里为廉，不能单独非难北京的商人，但在我们买书的人总是一件不平而且颇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这几家书店说来，东交民巷的万国图书公司比较的稍为公道，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传》卖价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说《巴托华拉》（Batohala）卖价三元七角，还不能算贵，虽然在那里卖的《现代丛书》和“叨息尼支（Taush-nitz）板”的书比别处要更贵一点。我曾经在台吉厂用两元七角买过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诃夫小说集，可以说是最高纪录，别的同价的书籍大抵算作两元一角以至五角罢了。各书店既然这样的算了，却又似乎觉得有点惭愧，往往将书面包皮上的价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这种办法固然近于欺骗，不很正当，但总比强硬主张的稍好，因为那种态度更令人不快了。我在灯市口西头的一家书店里见到一本塞利著的《儿童时代的研究》，问要多少钱，答说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见书上写着定价美金二元半，便问他为什么折算得这样的贵，他答得极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票上写着要卖多少钱，就要卖多少。”又有一回，在灯市口的别一家里，问摩尔敦著的《世界文学》卖价若干，我明明看见标着照伊文思定价加一的四无一角三分，他却当面把他用铅笔改作五元的整数。在这些时候我们要同他据理力争是无效的，只有两条路可行，倘若不是回过头来就走，便只好忍一口气（并多少损失）买了回来。那一本儿童研究的书因为实在看了喜欢，终于买了，但是一圆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来的未曾有过的高价了。我的一个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书店）去买东西（眼镜？），问他有没有稍廉的，公司里的伙计说“那边有哩”，便开门指挥他出去。在没有商业道德的中国，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么也未可知，现在不过举出来当作谈资罢了。

在现今想同新的学问艺术接触，不得不去看外国文书，但是因为在中国不容易买到，而且价钱又异常的贵，读书界很受一种障碍，这是自明的事实。要补救这个缺点，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们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贩卖各国的好书，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营利放在第二。这种事业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的效力实在要比五分钟的文化运动更大而且坚实，很值得去做。北京卖外国书的店铺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内，我全不明了，但是照他们的很贵的卖价看来，都不是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那是总可以断言了。我们虽然感谢他能够接济一点救急的口粮，但

是日常的供给，不能不望有别的来源，丰富而且公平的分配给我们精神的粮食。（十二年一月）

□1923 年 1 月 30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收入《谈虎集》

儿童的书

美国斯喀德（Scudder）在《学校里的儿童文学》一篇文里曾说，“大多数的儿童经过了小学时期，完全不曾和文学接触。他们学会念书，但没有东西读。他们不曾知道应该读什么书。”凡被强迫念那书贾所编的教科书的儿童，大都免不掉这个不幸，但外国究竟要比中国较好，因为他们还有给儿童的书，中国则一点没有，即使儿童要读也找不到。

据我自己的经验讲来，我幼时念的是“圣贤之书”，却也完全不曾和文学接触，正和念过一套书店的教科书的人一样。后来因为别的机缘，发见在那些念过的东西以外还有可看的书，实在是偶然的幸运。因为念那圣贤之书，到十四岁时才看得懂“白话浅文”，虽然也看《纲鉴易知录》当日课的一部分，但最喜欢的却是《镜花缘》。此外也当然爱看绣像书，只是绣的太是呆板了，所以由《三国志演义》的绘图转到《尔雅图》和《诗中画》一类那里去了。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机会好一点的，偶然从文字堆中——正如在秽土堆中检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怜的。这儿童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从经验上代答一句，便是故事与画本。

二十馀年后的今日，教育文艺比那时发达得多了，但这个要求曾否满足，有多少适宜的儿童的书了么？我们先看画本罢。美术界的一方面因为情形不熟，姑且不说绘画的成绩如何，只就儿童用的画本的范围而言，我可以说不会见到一本略好的书。不必说克路轩克（Cruikshank）或比利平（Bilibin）等人的作品，就是如竹久梦二的那些插画也难得遇见。中国现在的画，失了古人的神韵，又并没有新的技工。我见许多杂志及教科书上的图都不合情理，如阶石倾斜，或者母亲送四个小孩去上学，却是一样的大小。这样日常生活的景物还画不好，更不必说纯凭想象的童话绘了，——然这童话绘却正是儿童画本的中心，我至今还很喜欢看鲁滨孙等人的奇妙的插画，觉得比历史绘更为有趣。但在中国却一册也找不到。幸而中国没有买画本给小儿做生日或过节的风气，否则真是使人十分为难了。儿童所喜欢的大抵是线画，中国那种的写意画法不很适宜，所以即使往古美术里去找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偶然有些织女钏馢等画略有趣味，也稍缺少变化；如焦秉贞的《耕织图》却颇适用，把他翻印出来，可以供少年男女的翻阅。

儿童的歌谣故事书，在量上是很多了，但在质上未免还是疑问。我以前曾说过，“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中国现在的倾向自然多属于前派，因为诗人还不曾着手于这件事业。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一■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我们看那《伊索寓言》后面的格言，已经觉得多事，更何必去模仿他。其实艺术里未尝不可寓意，不过须得如做果汁冰酪一样，要把果子味混透在酪里，决不可只把一块果子皮放在上面就算了事。但是这种作品在儿童文学里，据我想来本来还不能算是最上乘，因为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有那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安徒生的《丑小鸭》，大家承认他是一篇佳作，但《小伊达的花》似乎更佳；这并不因为他讲花的跳舞会，灌输泛神的思想，实在只因他

那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了。我说无意思之意思，因为这无意思原自有他的作用，儿童空想正旺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至于其馀观察记忆，言语练习等好处即使不说也罢。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虽市场上摊着不少的卖给儿童的书本。

艺术是人人的需要，没有什么阶级性别等等差异。我们不能指定这是工人的，那是女子所专有的文艺，更不应说这是为某种人而作的；但我相信有一个例外，便是“为儿童的”。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而自己不能造作，不得不要求成人的供给。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现代野蛮民族里以及乡民及小儿社会里通行的歌谣故事，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还不能就成为“儿童的书”，须得加以编订才能适用。这是现在很切要的事业，也是值得努力的工作。凡是对儿童有爱与理解的人都可以着手去做，但在特别富于这种性质而且少有个人的野心之女子们，我觉得最为适宜。本于温柔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与艺术的修养，便能比男子更为胜任。我固然尊重人家的创作，但如见到一本为儿童的美的画本或故事书，我觉得不但尊重而且喜欢，至少也把他看得同创作一样的可贵。

□1923 年 6 月 21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周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关于儿童的书

我的一个男孩，从第一号起阅看《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不曾间断。我曾问他喜欢那一样，他说更喜欢《小朋友》，因为去年内《儿童世界》的倾向稍近于文学的，《小朋友》却稍近于儿童的。

到了今年这些书似乎都衰弱了，不过我以为小孩看了即使得不到好处，总还不至于有害。但是近来见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不住要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无论这种议论怎样时髦，怎样得庸众的欢迎，我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

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罗素在《教育自由主义》一文上，说得很是透彻；威尔士之改编世界历史，也是这个意思，想矫正自己中心的历史观念。日本文学家秋田雨雀曾说，日本学校的历史地理尤其是修身的教训都是颠倒的，所以他的一个女儿只在家里受教育，因为没有可进的正当的学校。画家木村君也说他幼年在学校所受的偏谬的思想，到二十岁后费了许多苦功才得把他洗净。其实，中国也何尝不如此，只是少有人出来明白的反对罢了。去年为什么事对外“示威运动”，许多小学生在大雨中拖泥带水的走，虽然不是自己的小孩，我看了不禁伤心，想到那些主任教员真可以当得“贼夫人之子”的评语。小孩长大时，因了自主的判断，要去冒险舍生，别人没有什么话说，但是这样的糟蹋，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了。我因此想起中古的儿童十字军来；在我的心里，这卫道的“儿童杀戮”实在与希律王治下的“婴儿杀戮”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所遇见的最不愉快的情景之一。三年前，我在《晨报》上看见傅孟真君欧洲通信《疯狂的法兰西》后，曾发表一篇杂感叫《国荣与国耻》，其第五节似乎在现今也还有意义，重录于下：

> 中国正在提倡国耻教育，我以小学生的父兄的资格，正式的表示反对。我们期望教育者授与学生智识的根本，启发他们活动的能力，至于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我们期望教育者能够替我们造就各个完成的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社会的好分子，不期望他为贩猪仔的人，将我们子弟贩去做那颇仑们的忠臣，葬到凯旋门下去！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乘小孩们脑力柔弱没有主意的时候，用各种手段牢笼他们，使变成他的喽罗，这实在是诈欺与诱拐，与老鸨之教练幼妓何异。……

总之我很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偏见注入于小学儿童，我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以前见北京的《儿童报》有过什么国耻号，我就觉得有点疑惑，现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国货号，我读了那篇宣言，真不解这些既非儿童的复非文学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给小朋友看的价值。在我不知道编辑的甘苦的人看来，可以讲给儿童听的故事真是无穷无尽，就是一千一夜也说不完，不过须用理知与想象串合起来，不是只凭空的说几句感情话便可成文罢了。鹿豹的颈子为什么这样长，可以讲一篇事物起原的童话，也可以讲一篇进化论的自然故事；火从那里来，可以讲神话上的燧人，也可以讲人类学上的火食起原。说到文化史里的材料，几乎与自然史同样的丰富，只等人去采用。我相信精魂信仰（Animism）与王帝起源等事尽可做成上好的故事，使儿童得到趣味与实益，比讲那些政治外交经济上的无用的话不知道

要好几十倍。这并不是武断的话，只要问小孩自己便好：我曾问小孩这些书好不好看，他说：“我不很要看，——因为题目看不懂，没趣味。譬如题目是‘熊和老鼠’或‘公鸡偷鸡蛋’，我就欢喜看。现在这些多不知说的是什么！”编者或者要归咎于父师之没有爱国的教练，也未尝不可，但我相信普通的小孩当然对于国货仇货没有什么趣味，却是喜欢管“公鸡偷鸡卵”等闲事的。要提倡那些大道理，我们本来也不好怎么反对，但须登在“国民世界”或“小爱国者”上面，不能说这是儿童的书了。

在儿童不被承认，更不被理解的中国，期望有什么为儿童的文学，原是很无把握的事情，失望倒是当然的。儿童的身体还没有安全的保障，那里说得到精神？不过我们总空想能够替小朋友们尽一点力，给他们应得的权利的一小部分。我希望有十个弄科学、哲学、文学、美术、人类学、儿童心理、精神分析诸学，理解而又爱儿童的人，合办一种为儿童的定期刊，那么儿童即使难得正当的学校，也还有适宜的花园可以逍遥。大抵做这样事，书铺和学会不如私人集合更有希望；这是我的推想，但相信也是实在的情形，因为少数人比较的能够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至于容易的被裹到群众运动的涡卷里去。我要说明一句，群众运动有时在实际上无论怎样重要，但于儿童的文学没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而且还是有害。

在理想的儿童的书未曾出世的期间，我的第二个希望是现在的儿童杂志一年里请少出几个政治外交经济的专号。

（一九二三年八月）

□1923 年 8 月 17 日刊《晨报副镌》，暑名作人

□收入《谈虎集》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床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作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里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论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纪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

（十四年四月）

□1925 年 4 月 5 日刊《京报副刊》，署名易今
□收入《谈虎集》

谈毛边书[1]

（一）

毛边书的理由，据我想来是很简单的，大约与上边所说的第一项相像，但是利益在于读者的方面。

第一，毛边可以使书不大容易脏，——脏总是要脏的，不过比光边的不大容易看得出。

第二，毛边可以使书的“天地头”稍宽阔、好看一点。不但线装书要天地头宽，就是洋装书也总是四周空广一点的好看；这最好自然是用大纸印刷，不过未免太费，所以只好利用毛边使它宽阔一点罢了。

此外在著者及书店有什么用意，我不知道，或者也有罢，或者没有。因为要使得自己的书好看些，用小刀裁一下，在爱书的人似乎也还不是一件十分讨厌的事。至于费工夫，那是没有什么办法，本来读书就是很费工夫的，只能请读者忍耐一下子。在信仰“时即金”——（Timeismoney）的美国，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中国似乎还不十分痛切地感到罢了。

（四月十日于北京）

（二）

有人要毛边，有人不要毛边，这是个人的嗜好问题，不是理论可以解决的，书店的唯一办法便是订成毛边与非毛边的两种，让主顾自由选择，但是似乎因了经验的教训，现在书店大抵多订非毛边的书发售，以致如原先那样想买毛边书的人也无处寻找，实在是很对不起的，虽然这是现代德谟克拉西的规则，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管多数的意见如何。

（八月十三日）

□1927 年 4—9 月刊《语丝》，署名岂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

[1] 这两节都是《语丝》周刊来稿的编者按语。

厂　甸

琉璃厂是我们很熟的一条街。那里有好些书店，纸店，卖印章墨合子的店，而且中间东首有信远斋、专卖蜜饯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汤十多年来还未喝过，但是杏脯蜜枣有时却买点来吃，到底不错。不过这路也实在远，至少有十里罢，因此我也不常到琉璃厂去，虽说是很熟，也只是一个月一回或三个月两回而已。然而厂甸又当别论。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最特殊者有长四五尺之糖胡卢及数十成群之风车，凡玩厂甸归之妇孺几乎人手一串。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厂甸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游人中各色人等都有，摆摊的也种种不同，适应他们的需要，儿歌中说得好：

新年来到，糖瓜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逸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说到厂甸，当然要想起旧历新年来。旧历新年之为世诟病也久矣，维新志士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鄙见以为可不必也。问这有多少害处？大抵答语是废时失业，花钱。其实最享乐旧新年的农工商，他们在中国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员学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谓终岁作苦，这时候闲散几天也不为过，还有那些小贩趁这热闹要大做一批生意，那么正是他们工作最力之时了。过年的消费据人家统计也有多少万，其中除神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觉得有点无谓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东西，一方面需要者愿意花这些钱换去快乐，一方面供给者出卖货物得点利润，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假如说这钱花得冤了，那么一年里人要吃一千多顿饭，算是每顿一毛共计大洋百元，结果只做了几大缸粪，岂不也是冤枉透了么？饭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但是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婆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就是为此。旧新年除与正朔不合外别无什么害处，为保存万民一点生趣起见，还是应当存留，不妨如从前那样称为春节，民间一切自由，公署与学校都该放假三天以至七天。——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过来谈厂甸买书的事情罢。

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记录了。二月十四日是旧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这三天又去，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像我这样“爬螺蛳船”的渔人无可下网。然而也获得几册小书，觉得聊堪自慰。

其一是《戴氏注论语》二十卷合订一册，大约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罢，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这两方印。这书摆在东路南头的一个摊上，我问一位小伙计要多少钱，他一查书后粘着的纸片上所写“美元”字样，答说五元。我嫌贵，他说他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定价要五元。我给了两元半，他让到四元半，当时就走散了。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玄同，请他去巡阅的时候留心一问，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

> 民国廿三年二月廿日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住游，遂购而奉赠启明。跋中廿日实是十九，盖廿日系我写信给玄同之日耳。

其二是《白华绛柎阁诗》十卷，二册一函。此书我已前有，今偶然看见，问其价亦不贵，遂以一元得之。《越缦堂诗话》的编者虽然曾说：“清季诗家以吾越李莼客先生为冠，《白华绛柎阁集》近百年来无与辈者”，我于旧诗是门外汉，对于作者自己“夸诩殆绝”的七古更不知道其好处，今买此集亦只是乡曲之见。诗中多言及故乡景物，殊有意思，如卷二《夏日行柯山里村》一首云：

> 溪桥才度庳篷船，村落阴阴不见天。
> 两岸屏山浓绿底，家家凉阁听鸣蝉。

很能写出山乡水村的风景，但是不到过的也看不出好来罢。

其三是两册丛书零种，都是关于陆氏《草木鸟鲁虫鱼疏》的，即焦循的《诗陆氏疏疏》《南菁丛刻》本，与赵佑的《毛诗陆疏校正》聚学轩本。我向来很喜欢陆氏的虫鱼疏，只是难得好本子，所有的就是毛晋的《陆疏广要》和罗振玉的新校正本，而罗本又是不大好看的仿宋排印的，很觉得美中不足。赵本据《郘亭书目》说它好，焦本列举引用书名，其次序又依《诗经》重排，也有他的特长，不过收在大部丛书中，无从抽取，这回都得到了，正是极不易遇的偶然。翻阅一过，至“流离之子”一条，赵氏案语中云：

> 窃以鸮枭自是一物，今俗所谓猫头鹰，……哺其子既长，母老不能取食以应子求，则挂身树上，子争啖之飞去，其头悬着枝，故字从木上鸟，而果首之象取之。

猫头鹰之被诬千馀年矣，近代学者也还承旧说，上文更是疏状详明有若目击，未免可笑。学者笺经非不勤苦，而于格物欠下工夫，往往以耳为目。赵书成于乾隆末，距今百五十年矣，或者亦不足怪，但不知现在何如，相信枭不食母与乌不反哺者现在可有多少人也。

（廿三年三月）

□1934 年 4 月刊《人间世》1 期，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厂甸之二[1]

新年逛厂甸，在小摊子上买到两三本破书。其一是《诗庐诗文钞》。胡诗庐君是我的同学前辈，辛丑年我进江南水师，管轮堂里有两个名人，即铅山胡朝梁与侯官翁曾固，我从翁君初次看到《新民丛报》，胡君处则看他所做的古诗。民国六年我来北京。胡君正在教育部，做江西派的诗，桐城派的文，对于这些我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不大相见。十年辛酉胡君去世，十一年王戌遗稿出板，有陈师曾小序，即是此册，今始得一读，相隔又已十二三年，而陈君的墓木也已过了拱把了罢。诗稿前面有诸名流题字，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严几道的第二首，因为署名下有一长方印章，朱文两行行三字，曰“天演宗哲学家”，此为不佞从前所未知者也。

旧书之二不知应该叫作什么名字。在书摊上标题曰《名山丛书》零种，但是原书只有卷末明张佳图著《江阴节义略》一卷书口有“名山丛书”字样，此外《谪星说诗》一卷、《谪星笔谈》三卷、《谪星词》一卷，均题阳湖钱振锽著，不称丛书。我买这本书的理由完全是为木活字所印，也还好玩。拿回来翻阅着，见其中仪字缺笔，《节义略》跋云癸亥九月，知系民国十二年印本，至于全书共有几种，是何书名，却终不明白。读《谪星词》第三首，《金缕曲·忆亡弟杏保》，忽然想起钱鹤岑的《望杏楼志痛编补》也是纪念其子杏保而作的，便拿来一查，果然在《求仙始末》中有云，“丙申冬十二月长男振锽于其友婿卜君寿章处得扶乩术，是月二十有一日因于望杏楼试之”，卷后诗文中亦有振锽诗七首词一首，唯金缕曲未收，或系后作也。去年春节在厂甸得《志痛编补》，得到不少资料写成《鬼的生长》一文，今年又得此册，偶然会合，亦大可喜，是则于木活字之外又觉得别有意思者也。

《谪星说诗》虽只六十馀则，却颇有新意，不大人云亦云的说，大抵敢于说话，不过有时也有欠圆处。如云：

> 沧浪谓东野诗读之使人不欢，余谓不欢何病，沧浪不云读《离骚》须涕洟满襟乎？易为于骚则尊之，于孟则抑之也。东坡称东野为寒，亦不足为诗病。坡夜读孟郊诗直是草草，如云细字如牛毛，只是憎其字细，何与其诗？
>
> 王李多以恶语詈谢茂秦，令人发怒。以双目嘲眇人，已不长者，以轩冕仇布衣，亦不似曾饮墨水者也。卢柟被陷，茂秦为之称冤于京师，得白乃已。王李诸人以茂秦小不称意便深仇之，弇州至詈其速死。论其品概，王李与茂秦交，且辱茂秦矣，宜青藤之不入其社也。

此外非难弇州的还有好几则，都说得有理，但如评贾岛一则虽意思甚佳，实际上恐不免有窒碍，文云：

> 诗当求真，阆仙推敲一事，须问其当时光景，是推便推，是敲便敲，奈何舍其真境而空摹一字，堕入做试帖行径。一句如此，其他诗不真可知，此贾诗所以不入上乘也。退之不能以此理告之，而谓敲字佳，误矣。

我说窒碍，因为诗人有时单凭意境，未必真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要讲真假很不容易，我怕贾上人在驴背上的也就是这一种境界罢。

《谪星笔谈》与《说诗》原差不多，不过一个多少与诗有点相关，一个未必相关而已，有许多处都是同样地有意思，最妙的也多是批评人的文章。

---

[1] 《人间世》题作《谈韩退之与桐城派》。

卷二云：

退之与时贵书，求进身，打抽丰，摆身分，卖才学，哄吓撞骗，无所不有，究竟是苏张游说习气变而出此者也。陶渊明穷至乞食，未尝有一句怨愤不平之语，未尝怪人不肯施济而使我至于此也。以其身分较之退之，真有霄壤之别。《释言》一首，患得患失之心活现纸上，谗之宰相便须作文一首，或谗之天子，要上万言书矣。

这一节话我十分同意，真可以说是能言人所难言。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我其实是很虚心地在读“古文”，我自信如读到好古文，如左国司马以及庄子韩非诸家，也能懂得。我又在读所谓唐宋八家和明清八家的古文，想看看这到底怎样，不过我的时间不够，还没有读出结果来。现在只谈韩文。这个我也并未能精读，虽然曾经将《韩昌黎文集》拿出来搁在案头，但是因为一则仍旧缺少时间，二则全读或恐注意反而分散，所以改变方针来从选本下手。我所用的是两个态度很不相同的选本，量是金圣叹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一是吴闿生的《古文范》。《才子必读书》的第十和十一卷都是选的韩文，共三十篇，《古文范》下编之一中所选韩文有十八篇，二家批选的手眼各不相同，但我读了这三十和十八篇文章都不觉得好，至多是那送董邵南或李愿序还可一读，却总是看旧戏似的印象。不但论品概退之不及陶公，便是文章也何尝有一篇可以与孟嘉传相比。朱子说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我想其文正亦如此，韩文则归纳赞美者的话也只是吴云伟岸奇纵，金云曲折荡漾，我却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正是策士之文也。近来袁中郎又大为世诟病，有人以为还应读古文。中郎诚未足为文章模范，本来也并没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胜于韩文。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

《笔谈》卷三谈到桐城派，对于中兴该派的曾涤生甚致不敬，文云：

桐城之名始于方刘，成于姚而张于曾。虽然，曾之为桐城也，不甚许方刘而独以姚为桐城之宗，敬其考而桃其祖先，无理之甚。其于当世人不问其愿否，尽牵之归桐城，吴南屏不服，则从而讥之。譬之儿童偶得泥傀儡，以为神也，牵其邻里兄弟而拜之，不肯拜则至于相骂，可笑人也。

谢章铤《赌棋山庄笔记》，《课馀偶录》卷二亦有一则，语更透彻，云：

近日言古文推桐城成为派别，若持论稍有出入，便若犯乎大不进，况敢倡言排之耶？余不能文，偶有所作，见者以为不似桐城，予唯唯不辨。窃谓文之未成体者冗剽芜杂，其气不清，桐城诚为对症之药，然桐城言近而境狭，其美亦殆尽矣，而迤逦陵迟，其势将合于时文。盖桐城派之初祖为归震川，震川则时文之高手也，其始取五子之菁华，运以欧曾之格律，入之于时文，时文岸然高异，及其为古文，仍此一副本领，易其字句音调，又适当王李赝古之时，而其文不争声色，浏然而清，足以移情，遂相推为正宗。非不正宗，然其根柢则在时文也。故自震川以来，若方望溪刘才甫姚惜抱梅伯言，皆工时文，皆有刻本传世，而吴仲伦《初月楼集》末亦附时文两三篇，若谓不能时文便不足为古文嫡家者，

噫，何其蔽也。

谢君为林琴南之师，而其言明达如此，甚可佩服。其实古文与八股之关系不但在桐城派为然，就是唐宋八大家传诵的古文亦无不然。韩退之诸人固然不曾考过八股时文，不过如作文偏重音调气势，则其音乐的趋向必然与八股接近，至少在后世所流传模仿的就是这一类。《谪星说诗》中云：

“同年王鹿鸣颇娴曲学。偶叩以律，鹿鸣曰，君不作八股乎，亦有律也。”此可知八股通于音乐。《古文范》录韩退之《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首句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选者注云：

“故老相传，姚姬传先生每诵此句，必数易其气而始成声，足见古人经营之苦矣。”此可知古文之通于音乐，即后人总以读八股法读之，虽然韩退之是否摇头摆腿而做的尚不可知。总之这用听旧戏法去赏鉴或写作文章的老毛病如不能断根去掉，对于八股宗的古文之迷恋不会改变，就是真正好古文的好处也不会了解的。我们现在作文总是先有什么意思要说，随后去找适当的字句用适当的次序写出来，这个办法似乎很简单，可是却不很容易，在古文中毒者便断乎来不成，此是偶成与赋得之异也。《谪星说诗》中云：

> 凡叙事说理写情状，不过如其事理情状而止，如镜照形，如其形而现，如调乐器，如其声而发，更不必多添一毫造作，能如是便沛然充满，无所不至。凡天下古今之事理情状，皆吾之文章诗词也，不必求奇巧精工，待其奇巧精工之自来。古唯苏家父子能见到此境，后则陆放翁。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可谓见之真矣。

此虽似老生常谈，但其可取亦正在此，盖常谈亦是人所不易言者也。与上引评贾岛语是同一意思，却圆到得多，推敲问题太具体了，似乎不好那么一句就断定。《笔谈》中有意思的还有几条，抄得太多也不大适宜，所以就此中止了。

廿四年一月十五日，在北平西北城之苦茶庵。

［附记］今日读唐晏（民国以前名震钧）的《涉江先生文钞》，其《砭韩》一文中有云：“此一派也，盛于唐，靡于宋，而流为近代场屋之时文，皆昌黎肇之也。”可与上文所引各语相发明。十七日记。

钱君著书后又搜得《名山续集》九卷，《语类》二卷，《名山小言》十卷，《名山丛书》七卷，亦均木活字印，但精语反不多见，不知何也。四月中蚌埠陆君为代请钱君写一扇面见寄，因得见其墨迹，陆君雅意至为可感。

五月廿四日又记。

□1935 年 2 月刊《人间世》21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读 禁 书

禁书目的刻板大约始于《咫进斋丛书》，其后有《国粹学报》的排印本，最近有杭州影印本与上海改编索引式本。这代表三个时期，各有作用：一是讲掌故，学术的；二是排满，政治的；三是查考，乃商业的了。

在现今第三时期中，我们想买几本旧书看的人于是大吃其亏，有好些明末清初的著作都因为是禁书的缘故价格飞涨，往往一册书平均要卖十元以上，无论心里怎么想要，也终于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果真是好书善本倒也罢了，事实却并不这样，只要是榜上有名的，在旧书目的顶上便标明禁书字样，价钱便特别地贵，如尹会一王锡侯的著述，实在都是无聊的东西，不值得去看，何况更花了大钱。话虽如此，好奇心到底都有的，说到禁书谁都想看一看，虽然那蓝胡子的故事可为鉴戒，但也可以知道禁的效力一半还是等于劝。假如不很贵，王锡侯的《字贯》我倒也想买一部，否则想借看一下，如是太贵而别人有这部书。至于看了不免多少要失望，则除好书善本外的禁书大抵都不免，我也是预先承认的。

近时上海禁书事件发生，大家谈起来都知道。可是《闲话皇帝》一文谁也没有见过，以前不注意，以后禁绝了。听说从前有《闲话扬州》一文激怒了扬州人，闹了一个小问题，那篇《闲话》我也还不曾见到。这篇《闲话》因为事情更大了，所以设法去借了一个抄本来，从头至尾用心读了一遍，觉得文章还写得漂亮，此外，还是大失望。这是我最近读禁书的一个经验。

不过天下事都有例外。我近日看到明末的一册文集，十足有可禁的程度，然而不是禁书。这书叫作《拜环堂文集》，会稽陶崇道著，即陶石篑石梁的侄子，我所有的只是残本第五六两卷，内容都是尺牍。从前我翻阅姚刻《禁书目》，仿佛觉得晚明文章除七子外皆在禁中，何况这陶路甫的文中有许多奴虏字样，其宜全毁明矣，然而重复检查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却终未发见他的名字，这真真是大运气吧。虽然他的文集至今也一样地湮没，但在发现的时候，头上可以不至于加上标识，定价也不至过高，我们或者还有得到的机会，那么这又可以算是我们读者的运气了。文集卷四《复杨修翎总督》云：

> 古人以犬羊比夷虏，良有深意。触我啮我则屠之，弭耳乞怜则抚而驯之。

又《与张雨苍都掌科》云：

> 此间从虏中逃归者言，虏张甚，日则分掠，暮则饱归。为大头目者二，故妓满帐中，醉后鼓吹为乐。此虽贼奴常态，然非大创势不即去，奈何。

看这两节就该禁了。此外这类文字尚多，直叙当时的情形，很足供今日的参考。最妙的如《答毛帅》（案即毛文龙）云：

> 当虏之初起也，彼密我疏，彼狡我拙，彼合我离，彼捷我钝，种种皆非敌手。及开铁一陷，不言守而言战，不言战而且言剿。正如衰败大户，仍先世馀休，久驾人上，邻居小民见室中虚实，故来挑搆，一不胜而怒目张牙，诧为怪事，必欲尽力惩治之，一举不胜，墙垣户牖尽为摧毁，然后紧闭门扇，面面相觑，各各相讥。此时从颓垣破壁中一人跃起，招摇僮仆，将还击邻居，于是群然色喜，望影纳拜，称为大勇，岂知终是一人之力。形容尽致，真可绝倒。不过我们再读一遍之后，觉得有点

不好单笑明朝人了，仿佛这里还有别的意义，是中国在某一时期的象征，而现今似乎又颇相像了。集中也有别的文章，如《复朱金岳尚书》云：

凡人作文字，无首无尾，始不知何以开，后不知何以阖，此村郎文字也。有首有尾，未曾下笔，便可告人或用某事作开，或用某事作阖，如观旧戏，锣鼓未响，关目先知，此学究文字也。苏文忠曰，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布，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夫所谓万斛也，文忠得而主之者也；不得不行不得不止者，文忠不得而主之者也。识此可以谈文，可以谈兵矣。

作者原意在谈兵，因为朱金岳本来就是兵家，但是这当作谈文看，也说得很有意思。谢章铤《赌棋山庄笔记》云：

窃谓文之未成体者冗剽芜杂，其气不清，桐城诚为对症之药。然桐城言近而境狭，其美亦殆尽矣，而迤逦陵迟，其势将合于时文。

这所说的正是村郎文字与学究文字，那与兵法合的乃是文学之文耳。陶路甫毕竟是石篑石梁的犹子，是懂得文章的，若其谈兵如何，则我是外行，亦不能知其如何也。（八月十六日）

□1935 年 9 月刊《独立评论》166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竹杂记》

入厕读书

郝懿行著《晒书堂笔录》卷四有《入厕读书》一条云：

> 旧传有妇人笃奉佛经，虽入厕时亦讽诵不辍，后得善果而竟卒于厕，传以为戒。虽出释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见污秽之区，非讽诵所宜也。《归田录》载钱思公言平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谢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余读而笑之，入厕脱裤，手又携卷，非惟太亵，亦苦甚忙，人即笃学，何至乃尔耶。至欧公谓希深言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此语却妙，妙在亲切不浮也。

郝君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异议，因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小时候听祖父说，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诀云，老爷吃饭快，小的拉矢快，跟班的话里含有一种讨便宜的意思，恐怕也是事实。一个人上厕的时间本来难以一定，但总未必很短，而且这与吃饭不同，无论时间怎么短总觉得这是白费的，想方法要来利用他一下。如吾乡老百姓上茅坑时多顺便喝一筒旱烟，或者有人在河沿石磴下淘米洗衣，或有人挑担走过，又可以高声谈话，说这米几个铜钱一升或是到什么地方去。读书，这无非是喝旱烟的意思罢了。

话虽如此，有些地方原来也只好喝旱烟，于读书是不大相宜的。上文所说浙江某处一带沿河的茅坑，是其一。从前在南京曾经寄寓在一个湖南朋友的书店里，这位朋友姓刘，我从赵伯先那边认识了他，那年有乡试，他在花牌楼附近开了一家书店，我患病住在学堂里很不舒服，他就叫我住到他那里去，替我煮药煮粥，招呼考相公卖书，暗地还要运动革命，他的精神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我睡在柜台里面书架子的背后，吃药喝粥都在那里，可是便所却在门外，要走出店门，走过一两家门面，一块空地的墙根的垃圾堆上。到那地方去我甚以为苦，这一半固然由于生病走不动，就是在康健时也总未必愿意去的，是其二。民国八年夏我到日本日向去访友，住在一个名叫木城的山村里，那里的便所虽然同普通一样上边有屋顶，周围有板壁门窗，但是他同住房离开有十来丈远，孤立田间，晚间要提了灯笼去，下雨还得撑伞，而那里雨又似乎特别多，我住了五天总有四天是下雨，是其三。末了是北京的那种茅厕，只有一个坑两垛砖头，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去年往定州访伏园，那里的茅厕是琉球式的，人在岸上猪在坑中，猪咕咕的叫，不习惯的人难免要害怕，那有工夫看什么书，是其四。《语林》云，石崇厕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这又是太阔气了，也不适宜。其实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只要有屋顶有墙有窗有门，晚上可以点灯，没有电灯就点白蜡烛亦可，离住房不妨有二三十步，虽然也要用雨伞，好在北方不大下雨。如有这样的厕所，那么上厕时随意带本书去读读我想倒还是呒啥的吧。

谷崎润一郎著《摄阳随笔》中有一篇《阴翳礼赞》，第二节说到日本建筑的厕所的好处。在京都奈良的寺院里，厕所都是旧式的，阴暗而扫除清洁，设在闻得到绿叶的气味青苔的气味的草木丛中，与住房隔离，有板廊相通。蹲在这阴暗光线之中，受着微明的纸障的反射，耽于瞑想，或望着窗外院中的景色，这种感觉真是说不出地好。他又说：

> 我重复地说，这里须得有某种程度的阴暗，彻底的清洁，连蚊子的呻吟声也听得清楚地寂静，都是必须的条件。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厕所里听萧萧地下着的雨声。特别在关东的厕所，靠着地板装有细长的扫出尘

土的小窗，所以那从屋檐或树叶上滴下来的雨点，洗了石灯笼的脚，润了贴脚石上的苔，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更能够近身地听到。实在这厕所是宜于虫声，宜于鸟声，亦复宜于月夜，要赏识四季随时的物情之最相适的地方，恐怕古来的俳人曾从此处得到过无数的题材吧。这样看来，那么说日本建筑之中最是造得风流的是厕所，也没有什么不可。

谷崎压根儿是个诗人，所以说得那么好，或者也就有点华饰，不过这也只是在文字上，意思却是不错的。日本在近古的战国时代前后，文化的保存与创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里，这使得风气一变，如由工笔的院画转为水墨的枯木竹石，建筑自然也是如此，而茶室为之代表，厕之风流化正其馀波也。

佛教徒似乎对于厕所向来很是讲究。偶读大小乘戒律，觉得印度先贤十分周密地注意于人生各方面，非常佩服，即以入厕一事而论，后汉译《大比丘三千威仪》下列举“至舍后者有二十五事”，宋译《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六自“云何下风”至“云何筹草”凡十三条，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二有第十八“便利之事”一章，都有详细的规定，有的是很严肃而幽默，读了忍不住五体投地。我们又看《水浒传》鲁智深做过菜头之后还可以升为净头，可见中国寺里在古时候也还是注意此事的。但是，至少在现今这总是不然了，民国十年我在西山养过半年病，住在碧云寺的十方堂里，各处走到，不见略略象样的厕所，只如在《山中杂信》五所说：

> 我的行踪近来已经推广到东边的水泉。这地方确是还好，我于每天清早没有游客的时候去徜徉一会，赏鉴那山水之美。只可惜不大干净，路上很多气味，——因为陈列着许多《本草》上的所谓人中黄。我想中国真是一个奇妙的国，在那里人们不容易得着营养料，也没有方法处置他们的排泄物。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寺院有普通厕所已经是大好了，想去找可以瞑想或读书的地方如何可得。出家人那么拆烂污，难怪白衣矣。

但是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时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可不必。书也无须分好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我有一个常例，便是不拿善本或难懂的书去，虽然看文法书也是寻常。据我的经验，看随笔一类最好，顶不行的是小说。至于朗诵，我们现在不读八大家文，自然可以无须了。（十月）

□1935 年 11 月刊《宇宙风》1 集 5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竹杂记》

印 书 纸

闻怡谷老人言，桐城黄君的《论衡校释》已出，前日往琉璃厂，因买得一部。王仲任为吾乡先贤，素所景仰，尝谓与明李卓吾清俞理初同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论衡》中九虚三增至今犹有万丈光焰，惜自昔乏善本，常令人感觉不易读耳。黄君此著有功于后学不少，鄙人亦大受惠赐，披读数章，豁然意解。但用纸稍差，质滑而分量重，且甚脆弱，其实以那么的高价发售，似亦不妨用竹纸印矣。

此种纸微黄而光滑，便于印锌版，出于日本，在彼地则不用于印书，只供广告传单之用，不知来中国后何以如此被尊重，称之曰米色纸，用以印精装本，此盖始于开明书店，旋即泛滥全国矣。中国为印书最早之国，至今而尽忘其经验，连一张纸的好坏亦已不能知道，真真奇事也。

□1939 年 1 月 5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书的经验

买到一册新刻的《汴宋竹枝词》，李于演著，卷头有蒋湘南的一篇李李村墓志铭，写得诙诡而又朴实，读了很是喜欢，查《七经楼文钞》里却是没有。我看着这篇文章，想起自己读书的经验，深感到这件事之不容易，摸着门固难，而指点向人亦几乎无用。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古文析义》，只算是学了识字，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西游记》与《水浒传》，《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可以说是两大类。至于文章的好坏，思想的是非，知道一点别择，那还在其后，也不知道怎样的能够得门径，恐怕其实有些是偶然碰着的吧。即如蒋子潇，我在看见《游艺录》以前，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父师的教训向来只说周程张朱，便是我爱杂览，不但道咸后的文章，即使今人著作里，也不曾告诉我蒋子潇的名字，我之因《游艺录》而爱好他，再去找《七经楼文》与《春晖阁诗》来读，想起来真是偶然。可是不料偶然又偶然，我在中国文人中又找出俞理初，袁中郎，李卓吾来，大抵是同样的机缘，虽然今人推重李卓老者不是没有，但是我所取者却非是破坏而在其建设，其可贵处是合理有情，奇辟横肆都只是外貌而已。我从这些人里取出来的也就是这一些些，正如有取于佛菩萨与禹稷之传说，以及保守此传说精神之释子与儒家。这话有点说得远了，总之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集合拢来，所谓粒粒皆辛苦的，在自己看来觉得很可珍惜，同时却又深知道对于别人无甚好处，而仍不免常要饶舌，岂真敝帚自珍，殆是旧性难改乎。

外国书读得很少，不敢随便说，但取舍也总有的。在这里我也未能领解正统的名著，只是任意挑了几个，别无名人指导，差不多也就是偶然碰着，与读中国书没有什么两样。我所找着的，在文学批判是丹麦勃阑兑思，乡土研究是日本柳田国男，文化人类学是英国弗来则，性的心理是蔼理斯。这都是世界的学术大家，对于那些专门学问我不敢伸一个指头下去，可是拿他们的著作来略为涉猎，未始没有益处，只要能吸收一点进来，使自己的见识增深或推广一分也好，回过去看人生能够多少明白一点，就很满足了。近年来时常听到一种时髦话，慨叹说中国太欧化了，我想这在服用娱乐方面或者还勉强说得，若是思想上哪里有欧化气味，所有的恐怕只是道士气秀才气以及官气而已。想要救治，却正用得着科学精神，这本来是希腊文明的产物，不过至近代而始光大，实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谓疾虚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我不知怎的觉得西哲如蔼理斯等的思想实在与李俞诸君还是一鼻孔出着气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靠直觉懂得了人情物理，前者则从学理通过了来，事实虽是差不多，但更是确实，盖智慧从知识上来者其根基自深固也。这些洋书并不怎么难于消化，只须有相当的常识与虚心，如中学办得适宜，这与外国文的学力都不难习得，此外如再有读书的兴趣，这件事便已至少有了八分光了。我自己读书一直是暗中摸索，虽然后来找到一点点东西，总是事倍功半，因此常想略有陈述，贡其一得，若野芹蜇口，恐亦未免，唯有惶恐耳。

近来因为渐已懂得文章的好坏，对于自己所写的决不敢自以为好，若是里边所说的话，那又是别一问题。我从民国六年以来写白话文，近五六年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不怪小朋友们的厌恶，我自己也戏称曰文抄公，不过说尽是那么说，写也总是写着，觉得这里边不无有些可取的东西。对于这种文章

不以为非的，想起来有两个人，其一是一位外国的朋友，其二是亡友烨斋。烨斋不是他的真名字，乃是我所戏题，可是写信时也曾用过，可以算是受过默许的。他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说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所以人家不理解，于别人不能有好处，虽然我十分承认，且以为当然，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如不写点下来，未免可惜。在这里我知道自己稍缺少谦虚，却也是无法。我不喜欢假话，自己不知道的都已除掉，略有所知的就不能不承认，如再谦让也即是说诳了。至于此外许多事情，我实在不大清楚，所以我总是竭诚谦虚的。

□1940 年 10 月 31 日作，刊 1944 年“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灯下读书论

以前所做的打油诗里边，有这样的两首是说读书的，今并录于后。其辞曰：

饮酒损神茶损气，读书应是最相宜，
圣贤已死言空在，手把遗编未忍披。
未必花钱逾黑饭，依然有味是青灯，
偶逢一册长恩阁，把卷沉吟过二更。

这是打油诗，本来严格的计较不得。我曾说以看书代吸纸烟，那原是事实，至于茶与酒也还是使用，并未真正戒除。书价现在已经很贵，但比起土膏来当然还便宜得不少。这里稍有问题的，只是青灯之味到底是怎么样。古人诗云，青灯有味似儿时。出典是在这里了，但青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同类的字句有红灯，不过那是说红纱灯之流，是用红东西糊的灯，点起火来整个是红色的，青灯则并不如此，普通的说法总是指那灯火的光。苏东坡曾云，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这样情景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大抵这灯当是读书灯，用清油注瓦盏中令满，灯芯作炷，点之光甚清寒，有青荧之意，宜于读书，消遣世虑。其次是说鬼，鬼来则灯光绿，亦甚相近也。若蜡烛的火便不相宜，又灯火亦不宜有蔽障，光须裸露，相传东坡夜读佛书，灯花落书上烧却一僧字，可知古来本亦如是也。至于用的是什么油，大概也很有关系，平常多用香油即菜子油，如用别的植物油则光色亦当有殊异，不过这些迂论现在也可以不必多谈了。总之这青灯的趣味在我们曾在菜油灯下看过书的人是颇能了解的，现今改用了电灯，自然便利得多了，可是这味道却全不相同，虽然也可以装上青蓝的磁罩，使灯光变成青色，结果总不是一样。所以青灯这字面在现代的词章里，无论是真诗或是谐诗，都要打个折扣，减去几分颜色，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好在我这里只是要说明灯右观书的趣味，那些小问题都没有什么关系，无妨暂且按下不表。圣贤的遗编自然以孔孟的书为代表，在这上边或者可以加上老庄吧。长恩阁是大兴傅节子的书斋名，他的藏书散出，我也收得了几本，这原是很平常的事，不值得怎么吹嘘，不过这里有一点特别理由。我有的一种是两小册抄本，题曰“ 明季杂志 ”。傅氏很留心明末史事，看《华延年室题跋》两卷中所记，多是这一类书，可以知道，今此册只是随手抄录，并未成书，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看了颇有所感。明季的事去今已三百年，并鸦片洪杨义和团诸事变观之，我辈即使不是能惧思之人，亦自不免沉吟，初虽把卷终亦掩卷，所谓过二更者乃是诗文装点语耳。那两首诗说的都是关于读书的事，虽然不是鼓吹读书乐，也总觉得消遣世虑大概以读书为最适宜，可是结果还是不大好，大有越读越懊恼之慨。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昔者印度贤人不惜种种布施，求得半偈，今我因此而成二偈，则所得不已多乎。至于意思或近于负的方面，既是从真实出来，亦自有理存乎其中，或当再作计较罢。

圣贤教训之无用无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英国陀生在讲希腊的古代宗教与现代民俗的书中曾这样的说过：

希腊国民看到许多哲学者的升降，但总是只抓住他们世袭的宗教。柏拉图与亚利士多德，什诺与伊壁鸠鲁的学说，在希腊人民上面，正如

没有这一回事一般。但是荷马与以前时代的多神教却是活着。

斯宾塞在寄给友人的信札里，也说到现代欧洲的情状：

> 宣传了家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

上边所说是关于希腊哲学家与基督教的，都是人家的事，若是讲到孔孟与老庄，以至佛教，其实也正是一样。在二十年以前写过一篇小文，对于教训之无用深致感慨，末后这样的解说道：

> 这实在都是真的。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牟尼，中国有过孔子老子，他们都被尊崇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的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在当不知怎么的更为寂寞，但是如今既有言行流传，足供有知识与趣味的人欣赏，那也就尽够好了。

这里所说本是聊以解嘲的话，现今又已过了二十春秋，经历增加了不少，却是终未能就此满足，固然也未必真是床头摸索好梦似的，希望这些思想都能实现，总之在浊世中展对遗教，不知怎的很替圣贤感觉得很寂寞似的，此或者亦未免是多事，在我自己却不无珍重之意。前致废名书中曾经说及，以有此种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恕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

《闭户读书论》是民国十七年冬所写的文章，写的很有点别扭，不过自己觉得喜欢，因为里边主要的意思是真实的，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这篇论是劝人读史的。要旨云：

> 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

这不知道算是什么史观，叫我自己说明，此中实只有暗黑的新宿命观，想得透彻时亦可得悟，在我却还只是怅惘，即使不真至于懊恼。我们说明季的事，总令人最先想起魏忠贤客氏，想起张献忠李自成，不过那也罢了，反正那些是太监是流寇而已。使人更不能忘记的是国子监生而请以魏忠贤配享孔庙的陆万龄，东林而为阉党又引清兵入闽的阮大铖，特别是记起《咏怀堂诗》与《百子山樵传奇》，更觉得这事的可怕。史书有如医案，历历记着证候与结果，我们看了未必找得出方剂，可以去病除根，但至少总可以自肃自戒，不要犯这种的病，再好一点或者可以从这里看出些卫生保健的方法来也说不定。我自己还说不出读史有何所得，消极的警戒，人不可化为狼，当然是其一，积极的方面也有一二，如政府不可使民不聊生，如士人不可结社，不可讲学，这后边都有过很大的不幸做实证，但是正面说来只是老生常谈，而且也就容易归入圣贤的说话一类里去，永远是空言而已。说到这里，两头的话又碰在一起，所以就算是完了，读史与读经子那么便可以一以贯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方法罢。

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如《四时读书乐》所广说，读书之乐乐陶陶，至今暗诵起几句来，也还觉得有意思。此外的一派是说读书有利益，

如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升官发财主义的代表，便是唐朝做《原道》的韩文公教训儿子，也说的这一派的话，在世间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所谈的对于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既无什么利益，也没有多大快乐，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知识，而知识也就是苦，至少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古希伯来的传道者说，“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所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苦与优伤何尝不是教养之一种，就是捕风也并不是没有意思的事。我曾这样的说：“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这样说来，我的读书论也还并不真是如诗的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消极。可是无论如何，寂寞总是难免的，惟有能耐寂寞者乃能率由此道耳。（民国甲申八月二日）

□1944 年 10 月刊《风雨谈》15 期，署名十堂
□收入《苦口甘口》

佛　经

在这个时候，假如劝青年来念佛经，不但人家要骂，就是说话的自己也觉得不大妥当。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是读佛经，并不是念佛诵经，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经固然是教中的圣典，同时也是一部书，我们把他当作书来看看，这也会于我们很有益的。旧约是犹太教基督教各派的圣书，我们无缘的人似乎可以不必看的了，可是也并不然。卷头《创世纪》里说上帝创造天地，有云：

> 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

这一节话如说他是事实，大概有科学常识的人未必承认，但是我们当作传说看时，这却很有意思，文章也写得不错。中国讲盘古的故事，仿佛是拿着斧凿在开矿，还有女蜗炼石补天的事，无论怎么听总只像童话，但因此也就令人舍不得，所以虽然缙绅先生难言之，却总是留传着，有人爱听，也有人不厌重复的说。佛经里的故事也正是如此，他比旧约更少宗教气味，比中国的讲得更好，更多文学趣味，我劝人可以读点佛经，就是为这个缘故。中国文人著作，据私见说来，唐以前的其文章思想都有本色，其气象多可喜，自宋以后便觉得不佳，虽然别有其他好处亦不能抹煞。总之我对于两晋六朝人的作品很有点儿喜欢，只是这一段落三百年间著作不算多，那么把佛经的一部分归到里边去，可以热闹不少，也是合理的事。我曾赞扬这些译文，多有文情俱胜者，鸠摩罗什为最著，那种骈散合用的文体当然是因新的需要而兴起的，但是恰好的利用旧文字能力去表出新意思，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成就。至于经中所有的思想，当然是佛教精神，一眼看去这是外来的宗教，和我们没甚关系，但是离开凡人所不易领解的甚深义谛，只看取大乘菩萨救世济人的弘愿景行，觉得其伟大处与儒家所说的尧禹稷的精神根本相同，读了令人感激，其力量似乎比经书还要大些。《六度集经》中云：

> 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有浊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

此处说理而能与美和合在一起，说得那么好，真是难得。又有把意思寄托在故事里的，虽是容易堕入劝戒的窠臼，却也是写得质朴而美，只觉得可喜，即或重复类似，亦不生厌，有如读唐以前的志怪，唐代的传奇文只有少数可以相比。这一类书本来不少，不过长篇或是全体用偈时也不大相宜，大抵以《百喻经》一类的譬喻经，《杂宝藏经》，《贤愚因缘经》，《六度集经》等最适于翻读，我也未能保证看了一定有什么益处，总之比读俞理初所谓愚儒的愚书要好得多。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说，在四十年前读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至今还时时想起，不曾忘记。从前杂览的时候，曾读柏拉图记梭格拉底之死，忒洛亚的女人们的悲剧，以及近代人的有些著作，经过类似的感动有好些回，可是这一次总是特别的深而且久，却又是平静的，不是兴奋而是近于安慰的一种影响。这是宗教文学的力量吧，虽然我是不懂宗教的。我记起《投身饲饿虎经》来的时候，往往连带想到《中山狼传》。这传不著撰人名氏，我在《程氏墨苑》中见到，题宋谢仿得，又见《八公游戏丛谈》中

题唐姚合，恐怕都是假托，只是文章却写得有意思。看了这篇文章不会得安慰，但也是很有用的，这与上边的经正是两面，我们连在一处想起来，有如服下一帖配搭好的药，虽苦而或利于病也。（二十九日）

□1945 年 1 月 13 日刊《新民声》，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读 旧 书

一

中国的书向来是专门供给读书人的，所以普通人民以至妇女小儿都不能得到他的什么好处，那么这于读书人，即是能够懂得他的人，当然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了吧。是的，也并不是。

一口说读书人，里边也很有些差别，即使在专制的古时代还出过些离经叛道的人，何况后世？读了书而仍把书还了的更是常有，他只是偷了一套拳头回来，却不跟着做徒弟，反而看穿了老师傅的把戏，不免要对他表示不敬了。为的分别起见，我们称这新的一派为知识阶级，对于旧的则称之为士大夫，自然现今的知识阶级里有些也还是士大夫，要完全的划分原不是可能的事，这里只说个大略罢了。

我说是的，因为士大夫是封建文化的主体，那些旧书都是由他们主稿，由他们审定，再由他们去赏鉴，自然是十分配胃口的了。但是在知识阶级之有点见识的看去，这便并不如此。有如用了现今上海服装的标准去看张园时代的时装，觉得可以通用的成分就很稀少，更因文字有宣传的作用，看去更觉得有点讨厌了。从前大家迷信《四库全书》，其实分量虽多，全是一堆红袍纱帽或马蹄袖蟒袍，说是遗产却毫无用处，况且有许多都经过清朝因忌讳而加以删改，也失了本来的面目了。

我们中年以上的人，在书房里以十年萤雪的工夫学会了些古文，如今翻阅旧书，往往看得昏头搭脑，一无所得，只觉可恼，正如出钱买了假古董，空费一日光阴，大呼倒媚不止。有谁肯为人民服务的学者，牺牲时间，把文化遗产加以整理区别，使得后人可以选择利用，功德无量，与造桥铺路的工作不相上下。

二

再说旧书有什么地方不好，那么看得觉得可恼，这须得略为具体的说明一下才行。笼统的一句话，自然可以说是封建道德，但事实上这倒并不着重在三纲主义上面，最讨厌的还是在别的地方，简单的说乃是卑鄙。古今的诗文都还装点面子，最是赤裸裸的明简的是在散文笔记上，在这里最可以看出著者的思想感情，是研究中国士大夫的很好的资料，若是随喜阅读，却是常要感觉不愉快的。

这里边所多的，第一是迷信。假使是民间的俗信，例如什么神什么鬼什么禁忌，那各有社会文化的背景，值得了解与探讨。士大夫的迷信则多是他卑鄙心理的表现，某人捐钱赈饥，固然做的是好事，结果还是中了举人，才算大家满意；某少妇平日为人很好，忽被雷击，推究原因为了鞋底里衬了字纸，满卷全是乌烟瘴气的祸福观念。

其次是势利。人的标准是科名与官职，书里说到某人必须带有称号，自监生以至状元，自典吏以至大学士，在笔记诗话中都要提出，便是没有功名的人也要称他一声布衣，表示现在虽然如此，将来可以有锦衣的希望的，仿佛铭旌上写待赠的样子。我们查西洋的文章，总不见有戈德相国或培根水部的名称，可见这是有科举的历史的中国所特有的习俗，是很值得注意的。

以上两种特色在中国旧书中全不能免，大概以宋为中心，古时尚好，自唐以考试取士，渐重科名，宋兴道学，二者结合，至明清而极，其卑鄙也简直达于顶点，民国以后仅存馀波，可以说是革命之功，至于革不能尽，亦或有之，但总之也就不多了吧。

□1949 年 12 月 14—16 日刊《亦报》，署名申寿

□收入《饭后随笔》

小 人 书

这一种书在北方习惯叫“小人书”，不晓得这里是什么名称，在路上却是时常看见，根本和北方是一样的。马路边上摆设一个摊，放着许多横长的小册子，八分图画，两分文字，租给人看，看的人偶然也有大人，但十九都是小孩，所以称做小人书确是名符其实的。我每次看见时总不免发生感慨，这如演说滥调所说的有两个感想：其一是小孩们这样喜欢看书，很是可喜；其二则是大人们的惭愧，我们不曾有什么好书做出来给他们看。神仙妖怪、英雄强盗、才子佳人的故事，古今来写了不少，自然，不能算好，可是现在没有更好的，他们饥不择食的吞吃，这也怪不得他们，同样的怪不得印造和出租的人们。问题是要有好的替代品，要叫穷人莫吃米糠榆树皮，必须供给棒子面小米才行，空讲卫生的道理是没有用。

说是没有替代品，那也是不合事实的，市面上的儿童书报出版得很不少了，不过那都是面包洋点心，普通人家是吃不起的，而且吃了也不充饥，乃是一个更大的缺点。花了几百几千的金圆买得一册故事漫画等，一翻就翻完了，现在这时候或者不能单怨书价之贵，而价贵却是事实，其内容之廉则又与其价成反比例，也是一样的事实。我直觉的感到，这些书与其说是为儿童所作，无宁说全是为编者出版者自己而作的，更是近于真理。这句话说得很有点傻，商业的出版本来都是如此，何必大惊小怪，自然也是言之成理。不过我总觉得骗小人手里的铜钱似乎不应该，虽然骗大人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们也在那里骗人的。

我看小人书摊上一本本的横长册子，材料虽是陈旧一点，内容总是充实的，结实一厚本，禁得起翻看，同时已赚了钱，总算还对得起主顾的。新的儿童书也要能够这样子，那就好了。可是现今是商业世界，大家讲赚钱愈讲愈精，后来居上，要想劝人赔本或是够本为儿童服务出版，那是道地的梦话，不但听的人要咧了嘴笑，就是自己如不在做梦也是说不出口的。给儿童供给书物，正与整个的儿童教养一样，我想原是国家的责任，应由国立机关大规模的来办，那么大赔其钱可以全不在乎，物美固然难说，而价廉可以做到，至少是货真，即内容总可更为充实了。不过这也是同样的一个梦，是很渺茫的。自然比较上二者也稍有差别，前者之梦有如一匹骆驼通过针眼，只有在戏法中乃能遇见者也。

□1949 年 4 月 2 日刊《自由论坛晚报》，署名十鹤
□未收入自编文集

小人书二[1]

在上海或是北京的马路上行走，常可以见到路旁有些小书摊，却不是卖的，只是借给人看，又不拿回家去，只在摊边翻看。

这在北京名为小人书，但也并不专门只给小孩们看，有好些成年人也在那里看着，而且还很滋滋有味的。这些书都是横长的账簿式的小册子，一页上有图有字，普通称为连环图画，其实还只是每页都有图而已，不大有什么连环的意义。

这种编法，从历史癖上说起来，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宋元的历史评话现今有五六种保存着，原来都是这样，可以说是字画并重。后来逐渐以文字为主，只是一回中有一两张插画，末了则是我们最常见的绣像，卷首画着一个个的人物，这是最后的一阶段了。

这里显然可见，先前的书是给识字不多的人看的，看了图再念说明，可以更懂得清楚，就是不念也能看出大意来，至于后来的主顾则是读书人与中产阶级，内容与形式很是不同了。明朝后半的板画的发达是很可惊异的，但是他全是知识阶级的专有品，不单是人民，就是儿童也得不到他的好处。直至清季才有点转变，先是石印的画报，随后有插画的教科书，这才通俗化起来了，可是吴友如的画风几十年还有影响，至今难得看到好的插画。

儿童书在中国的历史也不算短了，大概总有了四十年以上了吧，至今却不能争取儿童的光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爱读摊上的小人书。这里有什么缘故，我们儿童书的作者与画家似乎应该反省一下子，外行人没有别的好意见，但是向儿童去学习，那总是一个要点吧。

□1949 年 12 月 12 日刊《亦报》，署名申寿

□收入《饭后随笔》

[1] 题中的“二”字为本书编者所加。

画小人书

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遇见有些事情，晓得力量不够的时候，虽然有着这勇气，却总不敢动手去做。这样的事情，当时心里不免稍有留恋，但随后也就放下了。只是有一件事，屡次想起，至今还要觉得懊恼的，那便是不曾学画，不会画小人书里图像。

小人书的意义真是重大得很，特别在这时候，小孩们的需求也很大，只可惜没有足够的好书来供给他们。编是自己知道材力不及，没有经验，而且现在有齐公等人在那里，怎么掰得上旁去。倒是画的方面看了时常动念，若是能来画它几张岂不很好，结果自然是力不从心，想过只好放下，不过这放下了还要想起，与别的事情不同。历史画与风俗画都要预备知识，专来画些小人儿，不要像个缩小的大人，在江湖上经过许多风波，脸上没有多大表情的，却是幼小天真的小男女，眼睛里还没有映射出人世悲哀之光的半超自然的生物，那该是多么好玩呀。这种画虽是少，世间总还是有的，我真真悔不该没好好地学画，不然就是临也可以临几张出来，岂不是于人己都有益的事么。

□1951 年 3 月 15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垃 圾 书

德国有名的性学者勃洛赫在所著《我们时代的性生活》中，论海淫的书画一章里，讲到抑制的唯一方法云：

“这是在于发达真正的人民文化，增加受教育的机会，和减低书籍的价格。有如赖曼的那种事业，出版他的《德意志小丛书》，每本一角半，搜集精选的作品，不但是最好的小说，还有许多科学大家所写的通俗科学书和文人的随笔，单是这样一个事业，在禁止垃圾文学上要比所有进德联合会的努力更为有效。”

原书于一九〇七年出版，所以至少也已是四十年以前的话了，在现今却还是有意义。他所说的垃圾文学并不单指淫书，包括那些滑稽、犯罪各样黄色出版物，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串同低级电影，教唆强盗杀人和变态的性欲更为有害，解放未久的中国也一样的受着这害，抵制的方法正是极其重要的。普通禁止只是治标，单从“供”这一边着想，假如“求”那一边存在，禁亦无用，而且禁止可以成为一种广告，有如前清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应禁书目一样，至今还供搜书者的参考。最好的方法是供应别一批东西，来替代他，这从根本下手，那些垃圾书便再不能生存了。

这里有三部工作，勃洛赫已经说明了，我所觉得最有意思的却是在末一节，人民文化与普及教育固极重要，若是书价太高，也是等于叫饥民吃肉粥，还是无用的。这须得由政府来出手，像从前赈饥似的，尽量将价廉物美的书发下乡去，在现今人民政府的时代，这大概不是什么难事。

□1950 年 4 月 5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收入《饭后随笔》

开卷有益

古人云，开卷有益。在封建社会里思想一统的时代，这话是对的，反正大家都奉的是三纲学说，一个说少说话，一个说多磕头，总归都于处世有益的，看了可以多得教训。

现在社会彻底改变了，政治思想完全不同，科学知识也大有进步，一切须得从新学习，旧书只是一种研究资料，有常识的成人可以参考，也很有价值，若是青年随便翻看，容易上当，说不上能有什么益处了。现在只就知识方面来说，如关于生物一部分的，古来传说几乎无一不是错误，有如雀入大水为蛤、腐草化为萤、啄木鸟画符，种羊种蚶、鳗出鲤鱼背、龟与蛇交、鳖与苋菜同吃则腹中生小鳖等，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不会有的事。就是说象怕老鼠，似乎别无怪异之处，但无征不信，也与希腊人相信狮子怕公鸡叫一样，是属于空想的。生物的有些生活状态，极是真实，却十分奇怪，过于空想，现在何妨拿来替代。从前有人编《谈史志奇》，从二十一史中集录奇谈奇事，劝爱讲《三国》的人来读这书，更奇而确，这意思是很对的，虽然那运动不曾成功。

□1950 年 11 月 15 日刊《亦报》，署名小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租 书 看

近地没有小人书摊，小孩们常往街上文具店租连环图画看，一册百元，拿回家来加倍，另要三四千元的押金。这里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好书，齐公与该管机关虽在努力，出板的不多，在小人书摊上更少见，有的旧的出品如《泰山》《神箭》等简直要不得。不过这办法倒不可厚非，至少也有便宜之处。我们有时想一看某种古书或西文书，若是有地方可以租借，岂不很好，原价百分之五的租金还不能算贵，反正价值百十万的贵重书本来未必会得要借的。

因为向来没有这个办法，想看书的人只好出钱来买，不久要钱用时又复卖去，一转手间损失不少，只便宜了旧书店的掌柜的。很久以前我买过一部《点石斋画报》，一共有四套，每套八厚本，未了是《淞隐漫录》的原文合订本，搁了一个时候又卖掉了，想起来这全部似乎还未看过一遍。买价记得很贵，姑且算是一百元吧，百分之五的租费计算可以看二十天，可是我总保留有几个月，结果仍可以卖若干钱，这样看来又觉得比租了来看还要便宜了。

□1951 年 1 月 20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工具书与旧学者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曰《大乘的启蒙书》，那篇文章的意思，是想请求文史方面的学者们，来给初学编写些入门书和工具书，但是当时社会条件不具备，这种呼吁都是徒然。第一是，学者中间没有这种空气。前清以八股文取士，上去便是做官，有些做的不得意，或是做过高官的人，也会回过头弄学问，做出些成就来，例如戴震，高邮王氏父子，段玉裁，阮元等均是。民国改科举为学校，以学问取士，上去也是做官，可是回过头来弄学问的就很少了。况且这种编写入门书的工作，比起写一篇博士论文来。并不见得容易。因为写专门著述，只要所有专门知识的十分七八安排得好，便可成功，显得富丽堂皇了。写启蒙书类时，只要知识的二三分也就够了，可是你还得准备十足的知识在那里，选择布置，更须多费气力，人家见了却并不看重，既是事倍功半，而且无名少利，不是对于后辈真心关切的人，谁肯来干这些呆事呢。

我在过去三十年间，曾经先后对三个中国文字学的专门学者劝过驾，请他们继承了《文字蒙求》之后，写出一本新的著作来，他们都是谨谢不敏。工作艰难，确是原因之一，而出版商人没有眼光，不肯投资出编辑费，个人单干生怕吃力不讨好，耽误了生计，这也是重要原因。在解放以后，政府大力从事文化建设，最近号召向科学进军，我想在这一方面时机条件是具足了。学者方面的事，局外未能详知，但是大家知道为人民服务，学问界的风气也总是大有转变了。只要政府一号召，发动大量人力物力，去从事编著历来缺乏现今切需的这些工具书，这事业就可以顺利完成的。我的陈旧的希望到了现在重复提了出来，理由就是在此。

希望提出，事情本来就已完了，但是依照条陈的通例，似乎还该加上一点略为具体的办法才对。这种办法本来不容易定，我所想得到的只有一条，并不怎么重要，只是有一点，这较为迫切，因为是与时间有关系的。工具书里包括的种类很多，只就文史方面来说，史地也且除外，本国语文一边就希望有一部“牛津”式的历史语源的大字典，一部比《辞源》等更是丰富确实的百科辞典，此外再有一册通用的国语辞典。这可以说是最低的要求，虽然要完成（特别是那大字典）就非得要许多年，以十计数的年月不可。

举办这样的大事业，动员新锐力量当然是很重要，但我以为利用老年的旧学者的知识也是必要，而且还不可再缓，因为他们都已经老了。中国从前做学问，没有什么参考的方便，所要资料都须自己收集，必须拼出多少年的岁月去看书，这年月愈多，他所积蓄的知识也比例增加，那末学力也就愈高了。例如一个人看了四十年的书，他的学力便胜过只看了三十年的人，这诚然是光荣，可是翻过来也可以说，这乃是用了四十年的生命换了来的。他正是一只两脚书橱，很可佩服，但他的知识是与寿命相连的，死了便带走了，不能留给子孙或是徒弟。这种旧学者现在还不少，大概收集在各地文史馆内，恐怕大抵不免闲得无聊，如果请他们来帮助，供给搜集资料，无论说为人择事，或是为事择人，我想都是合宜的。编辑的事业可能需要筹备布置，不是一下子能够就绪的事，但总不可拖延得太久，因为“炳烛之光”是有时间的限度的。我知道的几位旧学者，不便失敬的提出姓名来，总之都是博闻强记的人，平常很是佩服，年纪大概已在七八十之间，他们有的退休，有的还担任着职务，但是他们的知识总之没有用处，总之是高搁了。此外这样的人当

然很多，为学问计，为本人计，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1957 年 3 月 23 日刊《文汇报》，署名长年
□未收入自编文集

青年必读书十部

（1）《诗经》
（2）《史记》
（3）《西游记）
（4）汉译《旧约》（文学部分）
（5）严译《社会通诠》
（6）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原与发达》
（7）凯本德《爱的成年》
（8）色耳凡德思《吉诃德先生》
（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
（10）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

第六至第十之英文名如下：

（6）Westermarck，TheOriginandDe-
velopmentofMoralIdeas2Vols
（7）Carpenter，LovesComing-ofage.
（8）Cervantes，DonQuixote.
（9）Swift，GulliversTravels.
（10）France，GardenofEpicurus.

〔附注〕六至十皆英文本，但别种外国文本自然也可以用。

□1925 年 2 月 14 日刊《京报副刊》，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

一，希本著《木匠的家伙箱》
（ThomasHibben：CarpentersToolChest，1933）

二，蔼理斯著《我的告白》
（HevelockEllis：MyConfessional，1934）

三，《从文自传》

□1935 年 1 月刊《人间世》19 期，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二十四年我的爱读书

一、永井荷风《冬天的蝇》。

二、谷崎润一郎《摄阳随笔》。

三、罗素《闲散礼赞》（InPraiseofIaleness）。

以上三种均系散文集，一九三五年出版。

□1936 年 1 月刊《宇宙风》8 期，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二十五年我的爱读书

一、H.C.Knapp-Fisher，TheWorldofNature.

二、M.Hirschfeld，MenandWomen.

三、B.Dawson，TheHistoryofMedicine.

佳处不及列举，这里只能说，生物，两性，以及医学史等书，读一点也很有趣味，有益处。

□1937 年 1 月刊《宇宙风》32 期，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第二辑——谈中国古书

林和靖先生诗集题记

宋林逋撰，国朝朱孔彰重刻本。卷首列《四库提要》、宋梅尧臣序、《宋史》本传、元叶森墓堂记题咏，附录《总目》诸人诗话。集四卷：一，五律；二、三，七律；四，五、七绝。总计三百八十九首。后附拾遗，系五古、五律、七律、七绝共十三首，逸句四联，诗馀三阕。末列朱孔彰跋。同治癸酉依抱经室卢氏本重刊于长洲。光绪壬寅上元后一日，以青蚨二百从江南官书局购得之，因识缘起如是。

十七日，浙江周作人书。

□未刊稿，1902 年 2 月 24 日作，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林和靖集

前日书贾携《林和靖集》来，喜而留之，余非能知妻梅子鹤之诗者，因少时曾有此刻本，故不能无恋恋。查旧日记第七册，光绪壬寅正月十六日，以钱二百文托孙朝升从江南官书局买长洲朱氏重刻《林和靖诗集》二册来，屈指计之已是三十七年前事，思之惘然。

本家举人椒生公时为管轮堂监督，讲道学，诵《感应篇》，放生，收字纸。孙朝升即专司收字纸之人，江北人，已年老矣，尝面谀公，老爷行善多，已可成地仙，胡尚未仙去耶，大为公所不喜。余与伯升叔则常请其往城南行脚时代买物事。公厉禁食牛，而孙朝升字纸担中每为我辈藏白切熟牛肉来，在号舍中喝白酒，以盐蘸牛肉食之，殆因系禁物之故，觉得似特别有味也。

□1940 年 4 月 8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於旅越三不朽图赞[①]

张宗子著《於越三不朽图赞》，刻成于其外孙陈祖谋之手，已极希有。

余所见只余氏慕村补刻本，后归朱氏，又为山阴陈昼卿先生所得，修补刊行。虽少逊前刻，然先烈仪容，故自宛然；后生小子，时一展对，足以激发志气。顾三十年来，已不审板片何在，前王子馀君以铜板镂印，亦迄未成书，殊可惜也。

昼卿先生为大父业师，儿时屡闻称道及之，后见其集中正续文牍，尤惓惓于故乡文献，别录《三不朽图目》、《诗巢祀位》等文，为《越中观感录》一卷，八杉斋徐氏刻行之，似肆中尚有售者也。

□1915 年 3 月刊《绍兴教育杂志》5 期，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①] 《读书杂录》之一。

三不朽图赞题记

张宗子著《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寒斋旧有一部，乃小云栖藏本，乾隆庚申陈氏原刻，乙卯余慕村重修。今年得此册于杭州，后有嘉庆庚辰朱松山跋，则板又经修补矣。余氏跋云，共得一百八像，唯细审之则有百单九人，位置先后亦不尽同，又如陶石篑，朱本列于“立言”文学，而余本乃为“立德”理学之末一人，不知宗老原本究竟如何，惜不能得陈仲谋初刊本一正之。光绪中陈昼卿复刻于湖北，文字亦多错乱，更不足据。民国初年《绍兴公报》社影印本，辑录平、李诸家校语，甚有价值，唯李元昉临摹图像，大有真容气味，殊不可耐。故以所见诸本言之，余朱二氏修补之本虽非本来面目，亦尚庶几近之耳，然则此书盖未可以后印而轻之也。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题记，以赠青山章君。

□1938 年 6 月 24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三不朽图赞

张宗子岱著《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不分卷，寒斋所得最早一册为乾隆乙卯慕村余氏印本，末有白文印曰“栋山读过”，盖是平景孙旧物。此外有一本似是后印，而内容次第与目录稍不同，“立德”忠谏之五徐龙川公像前别有一幅，后署族裔孙迪惠仿遗像重摹。

案徐迪惠字鹿苑，上虞人，嘉庆戊午举人，故此本应是庚辰板归朱氏后所印，唯末无朱松山跋，不知何也。朱端侯校勘语于徐龙川像上批云，此像不准，予有徐氏藏本，戴五岳冠，执笏，项有锁，下注族裔孙迪惠仿遗像重摹，此乃真像，若是则古剑老人所称沿门求像，其真确乎否，抑未能遍也。案所称徐氏盖即徐鹿苑之诸孙文若，住东郭门内徐立刚故室内，为会稽廪膳生，民国初尚存。古剑老人求像未能真与遍，此殆不能免，如姚长子本乡曲穷民，死于寇难，岂能有遗像可得哉。光绪戊子山阴陈氏重刊此书于湖北，改窜失真，殊不足取，唯图像尚可看耳。民国七年王子馀以铅字重印，文字一仍陶庵之旧，且收录平景孙李越缦二家校语，甚为有益，像用铜板，令李元昉缩小摹写，不脱真容气味，殊不可耐，王君亦是有识者，何以乃有此失也。十二年又印三板，校正误字外，并加入李越缦跋及朱端侯校勘语，唯铜板则愈益模胡矣。

宗子著作，此外寒斋所得有：《梦忆》八卷，乾隆甲寅又道光壬午巾箱本，均王见大所刻，粤雅堂重刊本，“砚云甲编”一卷本。《西湖梦寻》五卷，康熙丁酉本，光绪丁氏重刊本。《古今义烈传》八卷，天启年刊，惜有一卷抄配。《史阙》十五卷，道光甲申郑氏刊本。《瑯嬛文集》六卷，光绪丁丑王氏刊本。《瑯嬛诗集》不分卷二册，光绪辛丑虞山周氏抄本。《评东坡和陶诗》一册，汉阳朱氏抄本，署戊子冬，胤字缺笔，当是乾隆之三十三年，后附宗子补和二十四首，书眉亦有评语，或是王白岳等人手笔耶。

□1943 年 9 月刊《古今》30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会稽风俗赋[①]

王梅溪著《会稽三赋》，“风俗”一篇最为详赡。周世则作注，引证古籍，疏山川人物之本事，已至精核。史铸更为补注，则文章典实悉表而出之，尤便初学之诵习矣。明南逢吉所注，多采旧本，而更浅显；有上虞尹坛、山阴周炳曾两增注本，实无所异，疑南注本来如是也。湖海楼刻周、史注，会稽章氏刻南、尹注，皆颇佳；唯今陈板闻已毁，章板亦不知存否。《三赋》一书，唯于旧书肆中偶一遇之，已鲜新本可得；尺木堂刊本虽粗，今亦少见矣。陶篁村《广会稽风俗赋》，补阙续短，不愧虞仲翔之于朱对。唯本无单行，今《泊鸥山房集》又复不可多见，殊有淹没之惧。如得方闻之士为之疏证，刊印行世，于越中文献，当至有裨益也。

□1915 年 3 月刊《绍兴教育杂志》5 期，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①] 《读书杂录》之一。

题会稽三赋

《会稽三赋》为越中一重要文献，诚如陈春氏所云，吾郡人家置一编，只可惜寒斋所收不多，亦无珍本耳。此章石卿刊本，系乡人所刻，且字大疏朗可喜，较惜阴轩刻尤便于观览，惟原本有陶歇庵序，南姜泉后序，今乃悉不存，未审何故，岂或偶脱落耶。（四月二十七日记）

案《会稽三赋注》通行有两本。甲一卷本，宋周世则史铸注，有史序，萧山陈氏山阴杜氏均有重刊本。乙四卷本，明南逢吉尹坛注，有南跋，凌弘宪陶望龄序，天启中吴兴凌氏刊朱墨印本。此本因有歇庵眉批及总评，颇为周郑堂不满，惟此后好些刻本从此出，惜阴轩本即是而删凌序，章氏本则并去陶序，虽曰渐就雅正，而别无题记说明其来源与变革。刻书固是好事，而未免缺少诚实，近于市人所为，稍可惜耳。（三十二年秋分前日，雨中附记。）

□1938 年 7 月 2 日刊《北平晨报》
□收入《书房一角》

无 双 谱

幼时喜观绣像，有《剑侠图传》、《於越先贤像传》、《百美新咏》、《无双谱》诸书，日夕玩弄，初不甚解。二十年来，此等书已如麻沙古本，不可多觏矣。

《无双谱》初但知为金南陵作，后查《画征录》云：一时雕本，有《无双谱》，山阴金古良画，古良名史，以字行，人物名手也。始知其为越人。陶元藻《越画见闻》卷中云，金古良善画人物，有《无双谱》四十小幅，极其工致，好事者雕行之，足与嘉兴朱宾古《凌烟阁功臣图》颉颃争胜。每帧皆制乐府一首，亦琅琅可诵。余最爱其《垓下叹》、《河源槎》。毛奇龄序云：南陵与余同学诗，与徐仲山同学书，未为画而画精；是谱名无双，而实具三绝，有书有画又有诗也。案今本书殊不佳，岂非复原刻？所见一本，有陶式玉、徐咸清、宋俊、董良■序，王士禛、卢询题词，及古良自叙，而无奇龄文，不知何也？每图有“无双”二字朱印，歌辞后题“射堂”，下钤“墨禅”“默然”“默禅”“老髯”“老禅”“良然”“禅止”“船子”“古良”“南陵”诸记，又一印曰“金龚”，一曰“刘”，盖取本姓之谊。《赏奇轩四种》本，即依此翻刻而颇粗疏，不及原本矣。其画仿佛老莲，诗亦奇妙，阮亭简称为西涯之后一人而已。图后就其人行事，绘为图案，题词其上，颇多巧合。如焦先后作一括囊，董快堂极称道之。董无休有子名良骕，亦善绘事，不知即此人否也。

《剑侠图传》，《於越先贤像传》，皆任渭长绘，画至奇伟，惜儿时涂抹过半，墨痕狼藉。后别求得一本，及所画《高士传》《列仙酒牌》，唯皆系翻板，不免失真耳。渭长名熊，萧山人。《越缦堂日记》云，漫长画法直逼陈老莲，尝见其画《越中八十贤人像》及《列仙酒牌》，古艳横逸，衣冠器物，皆有证据，须发缕缕可指，真奇笔也。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渭翁画本最多，顾艮庵世丈藏有六大册，皆昔为姚梅伯孝廉所绘者，题词皆梅伯所著，惊心动魄，得未曾有，余在怡园展阅二次，其奇绝处真不可思议，有观止之叹。案渭长著作雕板行世者，大抵仅上述数种，此六大册不知所绘何物也。

偶于书摊见《百孝图》残本一本，题会稽俞葆真辑。后于都门得其全书，书凡四卷，各列二十五事，题五言一句，如《百美新咏》例。何云梯为之图，梓工未佳，画亦仅如世俗绣像，赋物写形，少有生气。其编辑亦凌杂无序，似因选句属对，多为牵就之故，唯引用故事，悉注出处，尚为切实。此书盖仿《二十四孝》，本以劝善为旨，非文章艺术之醇者，第以其系越人所作，为表而出之。葆真字兰浦，云梯不知其名，疑系粤人，序但言其居陈村而已。书以同治辛未刊于广东，其板似尚存也。

□1915 年 5 月刊《绍兴教育杂志》7 期，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为清室盗卖四库全书敬告国人

顷见上海三月二十六日《时事新报》及北京各报登载：“兹据日人方面消息，安居乾清宫之宣统，本年十六，已与蒙王之女郭佳氏订婚，本年秋间即须举行大礼。然因措办经费毫无所出，清室优待费又拖欠不发，遂拟将储存奉天之《四库全书》以一百二十万元之价出售。一以稍苏积困，次亦以为宣统结婚经费，曾特派某某向驻京各国使署询有无买主。最后闻得日本宫内省前因法国购得朝鲜《四库全书》之一部分。甚为珍重，颇羡之，久欲得中国之《四库全书》，以壮日本观瞻，某某乃与日本驻京公使署接洽，请其购买奉天之《四库全书》，日使署当即电本国，宫内省以各国均欲得此世界珍宝，今乃送上门来，大喜过望，大有无论如何必须到手之意，现正在秘密交涉之中云”。一节，令人不胜诧异之至！

查《四库全书》，本有七部：即文渊、文津、文溯、文澜、文源、文汇、文宗是也。今惟存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之书，然文澜所藏已非完善，惟文渊、文溯、文津三阁岿然独存。今文津已归京师图书馆，文渊尚在文渊阁中。文溯于民国三年政府曾派员将原书运京，由内务部派员点收，庋藏于保和殿中。今爱新觉罗溥义竟胆敢私行盗卖与外国人，不但毁弃宝书贻民国之耻辱，抑且盗窃公产干刑律之条文。同人等身属民国国民，为保存我国文献起见，断不容坐视不问。兹拟请北京大学速函教育部，请其将此事提出国务会议，派员彻底清查，务须将盗卖主名者，向法厅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并将原书全部移交适当机关，妥为保管。再查照优待条件，爱新觉罗溥仪本应迁出大内，移居颐和园中。至于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其中如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类，尤为可宝。——四库成书，文渊最早，惟文渊最精。其他文溯，文津、文澜三阁之书，不但字迹潦草，且卷数亦不甚可靠。——亟宜一律由我民国政府收回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如此办法，既足以供研究学术者之参考，亦可使帝制馀孽稍戢敛其觊觎侥幸之逆谋，准理酌情，实属两当，特将此意公布之于国人。凡我同志，其共图之。

中华民国十一年四月一日

沈兼士　沈士远　单不庵　马裕藻
朱希祖　马　衡　钱玄同　周作人

□1922 年 4 月 20 日刊《北京大学日刊》，署名周作人等
□未收入自编文集

吕坤的演小儿语

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吕新吾的这一卷《演小儿语》；虽然标语也在“蒙以养正”，但是知道利用儿童的歌词，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确是不可多得的，而且于现在的歌谣研究也不无用处，所以特地把他介绍一下。

原书一册，总称《小儿语》；内计吕得胜（近溪渔隐）的《小儿语》一卷，《女小儿语》一卷，吕坤（抱独居士）的《续小儿语》三卷，《演小儿语》一卷。前面的五卷书，都是自作的格言，仿佛《三字经》的一部分，也有以谚语为本而改作的，虽然足为国语的资料，于我们却没有什么用处。末一卷性质有点不同，据小引里说，系采取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的童谣加以修改，为训蒙之用者。在我们看来，把好好的歌谣改成箴言，觉得很是可惜，但是怪不得三百年以前的古人，而且亏得这本小书，使我们能够知道在明朝有怎样的儿歌，可以去留心搜集类似的例，我们实在还应感谢的。

书的前面有嘉靖戊午（1558）吕得胜的序，末有万历癸巳（1593）吕坤的书后，说明他们对于歌谣的意见。序云，

> 儿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谣以遂其乐，群相习，代相传，不知作者所自，如梁宋间《盘脚盘》，《东屋点灯西屋明》之类。学焉而于重子无补，余每笑之。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是俚语者固无害，胡为乎习哉？……书后云，
>
> 小儿皆有语，语皆成章，然无谓。先君谓无谓也，更之；又谓所更之未备也，命余续之；既成刻矣，余又借小儿原语而演之。语云，教之婴孩。是书也诚鄙俚，庶几乎婴孩一正传哉！……

他们看不起儿童的歌谣，只因为“固无害”而“无谓”，——没有用处，这实在是绊倒许多古今人的一个石头。童谣用在教育上只要无害便好，至于在学术研究上，那就是有害的也很重要了。序里说仿作小儿语，“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却颇有见地，与现在教育家反对儿童读“白话浅文”不同。至于书后自谦说，“言各有体，为诸生家言则患其不文，为儿曹家言则患其不俗。余为儿语而文，殊不近体；然刻意求为俗，弗能。”更说得真切。他的词句其实也颇明显，不过寄托太深罢了。

《演小儿语》共四十六首，虽说经过改作，但据我看去有几首似乎还是“小儿之旧语”，或者删改的地方很少。今举出数篇为例。

九

鹦哥乐，檐前挂，
为甚过潼关，
终日不说话。

二五

讨小狗，要好的。
我家狗大却生痴，
不咬贼，只咬鸡。

三八

孩儿哭，哭恁痛。
那个打你，我与对命，

宁可打我我不嗔，
你打我儿我怎禁。

四一

老王卖瓜，腊腊巴巴。
不怕担子重，
只要脊梁硬。

我说这些似是原来的儿歌，本来只是猜想；从文句上推测，又看他解释得太迂远了的时候，便觉得其中当含着不少的原有分子，因为如果大经改作，表示意思必定更要晓畅。大约著者想要讲那“理义身心之学”，而对于这些儿童诗之美却无意的起了欣赏，所以抄下原诗而加上附会的教训，也未可知。我读那篇书后，觉得这并非全是幻想。

我们现在把那四十六首《演小儿语》，转录在北大《歌谣周刊》上面，或者于研究歌谣的人不无用处，并希望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各处的人见了书中的歌，记起本地类似的各种歌谣，随时录寄。《演小儿语》虽经过改作，但是上半，至少是最初两句，都是原语，所以还可以看出原来是什么歌，如“风来了，雨来了”也在里面，只是下半改作过了。从这书里选择一点作儿童唱歌用，也是好的，只要拣取文词圆润自然的，不要用那头巾气太重的便好了。

（一九二三年四月）

□1923 年 4 月刊《歌谣周刊》12 号，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龙集》

日记与尺牍

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练，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觉得都有点做作，因此反动地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许多愉快。我不能写日记，更不善写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然而因此也愈觉得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可喜亦可贵了。

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全晋文）中录王羲之杂帖，有这两章：

> 吾顷无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啖，而犹有劳务，甚劣劣。
>
> 不审复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

我觉得这要比“奉橘三百颗”还有意思。日本诗人芭蕉（Basho）有这样一封向他的门人借钱的信，在寥寥数语中画出一个飘逸的俳人来。

> 欲往芳野行脚，希惠借银五钱。此系勒借，容当奉还。唯老夫之事，亦殊难说耳。——去来君。芭蕉。

日记又是一种考证的资料。近阅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上卷，乾隆二十年（1755）项下有这几句话：

> 绍兴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

同五十九年（1794）项下又云：

> 夏间米一斗钱三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盖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口。

这都是经济史的好材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精明的性分。日本俳人一茶（Lssa）的日记一部分流行于世，最新发现刊行的为《一茶旅日记》，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中有记事云：

> 二十七日阴，买锅。
>
> 二十九日雨，买酱。

十几个字里贫穷之状表现无遗。同年五月项下云：

> 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桥下。

此外还多同类的记事，年月从略：

> 九日晴，南风，妓女花井火刑。
>
> 二十四日晴。夜，庵前板桥被人窃去。
>
> 二十五日雨。所馀板桥被窃。

这些不成章节的文句却含着不少的暗示的力量，我们读了恍忽想见作者的人物及背景，其效力或过于所作的俳句。我喜欢一茶的文集《俺的春天》，但也爱他的日记，虽然除了吟咏以外只是一行半行的纪事，我却觉得他尽有文艺的趣味。

在外国文人的日记尺牍中有一两节关于中国人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抄录于下，博读者之一粲。倘若读者不笑而发怒，那是介绍者的不好，我愿意

赔不是，只请不要见怪原作者就好了。

夏目漱石日记，明治四十二年（1909）七月三日：

晨六时地震。夜有支那人来，站在栅门前说把这个开了。问是谁，来干什么。答说我你家里的事都听见。姑娘八位，使女三位，三块钱。完全像个疯子。说你走罢也仍不回去。说还不走要交给警察了，答说我是钦差，随出去了。是个荒谬的东西。

以上据《漱石全集》第十一卷译出。后面是从英译《契诃夫书简集》中抄译的一封信（契诃夫与妹书）：

一八九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木拉伏夫轮船上。

我的舱里流星纷飞，——这是有光的甲虫，好像是电气的火光。白昼里野羊游泳过黑龙江。这里的苍蝇很大。我和一个契丹人同舱，名叫宋路理，他屡次告诉我，在契丹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头落地”。昨夜他吸鸦片烟醉了，睡梦中只是讲话，使我不能睡觉。二十七日我在契丹爱珲城近地一走。我似乎渐渐的走进一个怪异的世界里去了。轮船播动，不好写字。

明天我将到伯力了。那契丹人现在起首吟他扇上所写的诗了。（十四年三月）

□1925 年 3 月刊《语丝》17 期，署名开明

□收入《雨天的书》

保 越 录

元至正中，朱元璋麾下大将胡大海率兵攻绍兴，吕珍守城抵御，次年围解，徐勉之纪其事为《保越录》一卷。所记明兵暴行，虽出自敌人之口，当非全无根据，胡大海与杨琏真伽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敌军发掘冢墓，自理宗慈献夫人以下至官庶坟墓无不发，金玉宝器，捆载而去。其尸或贯之以水银，面皆如生，被斩戮污辱者尤甚。

城外霖雨不止，水涝泛溢敌寨，溽暑郁蒸，疫疠大作。

敌军首将祈祷禹庙、南镇，不应，乃毁其像，仆窆石。

但是最有趣味的乃是这一条，记至正十九年（1359，是年英国文学之父 Chaucer 方二十岁）二月里一次战争的情形的：

庚午，敌军攻常禧门，……纵横驰突，诟詈施侮。总管焦德昭、倪昶等分部接战。公（吕珍）跃马向敌军，一骑来迎。公叱曰：“汝是谁？”曰：“我舍命王也。”语未毕，公挥攩杈已中其颐，遂擒以还。敌军披靡。

我们读《三国志演义》《说唐》《说岳》，常看见这种情形，岂知在明初还是如此，而且又是事实。

我们如说十四世纪，觉得这是中古时代，单枪匹马大战数十合是武士的常事，但说到元明便仿佛是不很远，要算是近代了，所以不免觉得有点希奇。其实这种情形在火器通行以前大约继续存在，我想在洪杨时代恐怕也还是如此罢。（个人斗殴时至今存着这个遗迹。）

□1925 年 11 月刊《语丝》52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谈谈谈诗经

古往今来，谈《诗经》的最旧的见解大约要算“毛传”，最新的自然是当今的胡适博士了。

近来偶见《艺林》第二十期，得读胡先生在武昌大学所讲的《谈谈〈诗经〉》的下半，觉得有些地方太新了，正同太旧了一样的有点不自然，这是很可惜的。我们且来谈它一谈看。

《野有死麕》胡先生说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自然是对的，但他以为吉士真是打死了鹿以献女子，却未免可笑。第一章的死麕既系写实，那么第二章也应是写实，为什么“白茅纯束，有女如玉”会连在一起去“描写女子的美”呢？我想这两章的上半只是想像林野，以及鹿与白茅，顺便借了白茅的洁与美说出女子来，这种说法在原始的诗上恐怕是平常的。我们要指实一点，也只能说这是猎人家的女儿，其实已经稍嫌穿凿，似乎不能说真有白茅包裹一只鹿，是男子亲自抗来送给他的情人的。若是送礼，照中国古代以及现代野蛮的风习，也是送给他将来的丈人的。然而这篇诗里“因家庭社会环境不良”而至于使“那个怀春的女子对吉士附耳轻轻细语”，叫他慢慢来嘘，则老头子之不答应已极了然，倘若男子抗了一只鹿来，那只好让他藏在绣房里独自啃了吃。喔，虽说是初民社会，这也未免不大雅观吧？

胡先生说，“《葛覃》诗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我猜想这里胡先生是在讲笑话，不然恐怕这与“初民社会”有点不合。这首诗至迟是孔仲尼先生在世时发生的，照年月计算，当在距今二千四百几十年以前，那时恐未必有象南通州土王张四状元这样的实业家，在山东纠集股本设立工厂，制造圆丝夏布。照胡先生用社会学说诗的方法，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是这样一种情状：妇女都关在家里，干家事之暇，织些布匹，以备自用或是卖钱。她们都是在家里的，所以更无所归。她们是终年劳碌的，所以没有什么放假。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二千年前的诗了。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

《嘒彼小星》一诗，胡先生说“是妓女星夜求欢的描写”，引《老残游记》里山东有窑子送铺盖上店为证。我把《小星》二章读过好几遍，终于觉不出这是送铺盖上店，虽然也不能说这是一定描写什么的。有许多东西为我所不能完全明了的，只好阙疑。

我想读诗也不定要篇篇咬实这是讲什么，譬如《古诗十九首》，我们读时何尝穿求，为何对于《诗经》特别不肯放松，这岂不是还中着传统之毒么？胡先生很明白的说，《国风》中多数可以说“是男女爱情中流出来的结晶”，这就很好了，其馀有些诗意不妨由读者自己去领会，只要有一本很精确的《诗经注释》出世，给他们做帮助。“不求甚解”四字，在读文学作品有时倒还很适用的，因为甚解多不免是穿凿呵。

一人的专制与多数的专制等是一专制。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我愿引英国民间故事中“狐先生”（Mr.Fox）榜门的一行文句，以警世人：

要大胆，要大胆，但是不可太大胆！

（“狐先生”见哈忒阑著《英国童话集》第二十五页，引一八二一年 Malone 编《莎士比亚集》卷七中所述当时故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1925 年 12 月作，1927 年刊“ 北新 ”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龙集》

陶庵梦忆序

平伯将重刊《陶庵梦忆》，叫我写一篇序，因为我从前是越人。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祖父因事系杭州府狱，我跟着宋姨太太住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看他一回，就在那里初次见到《梦忆》，是《砚云甲编》本，其中还有《长物志》及《槎上老舌》，也是我那时所喜欢的书。

张宗子的著作似乎很多，但《梦忆》以外，我只见过《於越三不朽图赞》，《琅嬛文集》，《西湖梦寻》三种，他所选的《一卷冰雪文》，曾在大路的旧书店中见过，因索价太昂未曾买得。我觉得《梦忆》最好，虽然文集里也有些好文章，如《梦忆》的纪泰山，几乎就是《岱志》的节本，其写人物的几篇，也与《五异人传》有许多相像。《三不朽》是他的遗民气的具体的表现，有些画像如姚长子等未免有点可疑，但别的大人物恐怕多有所本，我看王谑庵像觉得这是不可捏造的，因为它很有点儿个性。

《梦忆》大抵都是很有趣味的。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而且此身在情景之中，总是有点迷惘似的，没有玩味的馀暇。所以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讲乌托邦的是在做着满愿的昼梦，老年人记起少时的生活也觉得愉快，不，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这并不一定由于什么保守，实在是因为这些过去才经得起我们慢慢地抚摩赏玩，就是要加减一两笔也不要紧。遗民的感叹也即属于此类，不过它还要深切些，与白发宫人说天宝遗事还有点不同，或者好比是寡妇的追怀罢。

《梦忆》是这一流文字之佳者，而所追怀者又是明朝的事，更令我觉得有意思。我并不是因为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对于明朝有什么情分，老实说，只是不相信清朝人——有那一条辫发拖在背后会有什么风雅，正如缠足的女人我不相信会是美人。

《梦忆》所记的多是江南风物，绍兴事也居其一部分，而这又是与我所知道的是多么不同的一个绍兴。会稽虽然说是禹域，到底还是一个偏隅小郡，终不免是小家子相的。讲到名胜地方原也不少，如大禹的陵，平水，蔡中郎的柯亭，王右军的戒珠寺，兰亭等，此外就是平常的一山一河，也都还可随便游玩，得少佳趣，倘若你有适当的游法。但张宗子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说到这一层，我记起《梦忆》的一二则，对于绍兴实在不胜今昔之感。

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灭，那种走遍天下找寻《水浒传》脚色的气魄已没有人能够了解，更不必说去实行了。他们的确已不是明朝的败家子，却变成了乡下的土财主，这不知到底是祸是福！“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看了《梦忆》之后不禁想起仙人丁令威的这句诗来。

张宗子的文章是颇有趣味的，这也是使我喜欢《梦忆》的一个缘由。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

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

张宗子是大家子弟，《明遗民传》称其“衣冠揖让，绰有旧人风轨”，不是要讨人家欢喜的山人，他的洒脱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读去不会令人生厌。《梦忆》可以说是他文集的选本，除了那些故意用的怪文句，我觉得有几篇真写得不坏，倘若我自己能够写得出一两篇，那就十分满足了，但这是欲羡不来，学不来的。

平伯将重刊《陶庵梦忆》，这是我所很赞成的：这回却并不是因为我从前是越人的缘故，只因《梦忆》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罢了。

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于京兆宛平。

□1926 年 12 月刊《语丝》110 期，署名岂明
□收入《泽泻集》

王见大本梦忆

《陶庵梦忆》“砚云甲编”本一卷，王文诰本八卷，皆乾隆中刻，王本重刊入“粤雅堂丛书”中，时则咸丰己卯矣。近从杭州得王氏巾箱本，有王文诰道光壬午序，云甲寅雕板已失，爰重授之梓，惟原刻纯生氏案语已悉不存。昔读《复堂日记》，云《梦忆》以王见大本为最佳，初得甲寅本以为是矣，今始知乃是指此本，盖壬午序自署王文诰见大，甲寅本则只题叶有一印，白文曰见大二字而已。

余所得者为海宁邹存淦氏旧藏本，有印章六枚，第七八卷系邹君手抄，后在题跋，邹君又著有《修川小志》一卷，手稿未刊，余亦从杭州得之，中有浮签署男寿祺谨补，乃知其为邹适庐之先德。丁丑兵火延及两浙，故家图书多散失，偶从估人购得一二，间一披览，但有怅惘，惟邹君手泽于无意中乃获得数品，亦是有缘可喜慰也。

□1943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牛 山 诗

志明和尚作打油诗一卷，题曰《牛山四十屁》，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但是书却总未有见到，只在《履园丛话》卷二十一中看见所录的一首。近来翻检石成金的《传家宝》，在第四集中发见了一卷《放屁诗》，原来就是志明的原本，不过经了删订，只剩了四分之三，那《履园丛话》里的一首也被删去，找不着了。我细看这一卷诗，也并不怎么古怪，只是所谓寒山诗之流，说些乐天的话罢了。里边也有几首做得还有意思，但据我看来总都不及《履园丛话》的一首，——其词曰：

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
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我因此想到，石成金的选择实在不大可靠，恐怕他选了一番倒反把较好的十首都删削去了。（十六年三月）

□1927 年作，1928 年 2 月刊“ 北新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虎集》

读游仙窟

《游仙窟》从唐代流落在日本，过了一千多年才又回到中国来，据我所见的翻印本已经有两种了：其一是川岛标点本，由北新书局出版单行；其二是陈氏慎初堂校印本，为《古佚小说丛刊》初集的第一种。

《游仙窟》在日本有抄本刻本两种。抄本中以醍醐寺本为最古，系康永三年（1344）所写，大正十五年（1926）曾由古典保存会影印行于世，此外又有真福寺本，写于文和二年（1353），比康永本要迟十年了。刻本最古者为庆安五年（1652）一卷六十五页本，有注，至元禄三年（1690）翻刻，加入和文详释，析为五卷，名为《游仙窟抄》，今所常见者大抵皆此本或其翻本也。以上各本除真福寺本无印本流传外，我都见过，川岛所印即以元禄本为根据，（所用封面图案即是卷中插画之一），经我替他用醍醐寺本校过，不过其中错误还不能免。慎初堂本在卷末注云“戊辰四月海宁陈氏依日本刻本校印”，但未说明所依的是庆安本呢还是元禄本。据我看来，陈君所用的大约是元禄本，因为有几处在庆安本都不误，只有元禄本刻错或脱落了，慎初堂本也同样地错误，可以为证。

一页下一行	触事早微	卑
二页上六行	□久更深	夜
十页上九行	谁肯□相磨	重
十一下十三行	到底郎须休	即

慎初堂本还有许多字因为元禄本刻得不甚清楚，校者以意改写，反而致误，可以说是一大缺点，例如：

七页下六行	儿适换作	递
同	太能□	生
同七行	未敢试望	承
十四下十行	馀事不思望	承
十五下三行	一臂枕头	支（抄本）
同四行	鼻里痠痹	■

日记刻本承字多写如“㮾”字的右边那样子，现在校者在七页改为试字，在十四页又改作思字，有些地方（如四页下五行）又照样模刻而不改，不知有何标准。九页下二行，男女酬应词中“一生有杏”及“谁能忍■”，原系双关字句，校者却直改作有幸及忍耐，未免索然兴尽。至于十三页下十六行，“数个袍袴异种妖婬”，本是四言二句，慎初堂本改作：

数个袍袴异　□种妖婬□

令人有意外之感。八页下七行，叙饮食处有“肉则龙肝凤髓”一句，肉字照例写别字作宍，刻本有点像完字的模样，慎初堂直书曰：“完则龙肝凤髓”，亦未免疏忽。此外校对错误亦复不少，举其一二，如

二页下三行	水栖出于山头	木
八页上四行	谓性贪多	为
十五下三行	一喫一意快	啮
十六下十三行	联以当奴心	儿
十七上十六行	皆自送张郎	白

此外有些刻本的错字可以据抄本改正的，均已在川岛本照改，读者只须参照一下，即可明白。唯川岛本亦尚有不妥处，如：

三页下九行　相著未相识

——抄本作看，川岛本亦误作著。

四页上六行　孰成大礼

——抄本作就，川岛本改作既，无所依据，虽然在文义上可以讲得通，亦应云疑当作既才好。

五页下九行　金钗铜鐶

——抄本作钿，川岛本从之，但原注云女久反，可知系钮字之误，应照改。

同十六行　打杀无文

——抄本作打杀无文书，末字疑或系■字之误，但亦未能断定。

六页下三行 奉命不敢则从娘子不是赋古诗云

川岛本在“不敢”下着点，疑不甚妥。察抄刻本标记句读，似应读为“敢不从命，则从娘子，不是赋，（或有缺字）古诗云，”意思是说，“敢不从命。就请从娘子起头，这并不是做诗，只如古诗（？）云，断章取意，惟须得情。……”这虽然有点武断，但也并不是全无根据，正如陈君在《古佚小说丛刊》总目上所说，“此书以传抄日久之故，误字颇多”，有些还是和文的字法句法也混了进去，上边的“奉命不敢”，即其一。又四页下一行，“见宛河源道行军总管记室”，这宛字也是日本字，意思是委付，交给，不是张文成原文，不过无从替他去改正罢了。

《游仙窟》的文章有稍涉猥亵的地方，其实这也只是描写幽会的小说词曲所共通的，不算什么稀奇，倒是那些“素谜荤猜”的咏物诗等很有点儿特别。我们记起白行简的《交欢大乐赋》，觉得这类不大规矩的分子在当时文学上似乎颇有不小的势力。在中国，普通刊行的文章大都经过色厉内荏的士流之检定，所以这些痕迹在水平线上的作物上很少存留，但我们如把《大乐赋》放在这一边，又拿日本的《本朝文粹》内大江朝纲（894—957）的《男女婚姻赋》放在那一边，便可以想见这种形势。《本朝文粹》是十一世纪时日本的一部总集，是《文苑英华》似的一种正经书，朝纲还有一篇《为左丞相致吴越王书》也收在这里边。《万叶集》诗人肯引《游仙窟》的话，《文粹》里会收容“窥户无人”云云的文章，这可以说是日本人与其文章之有情味的一点。我相信这并不是什么诡辩的话。《交欢大乐赋》出在敦煌经卷之中，《游仙窟》抄本乃是“法印权大僧都宗算”所写，联想起铁山寺的和尚，我们不禁要发出微笑，但是于江户文明很有影响的五山文学的精神在这里何尝不略露端倪，这样看去我们也就不能轻轻地付之一笑了。

□1928 年 4 月刊《北新》2 卷 10 号，署名岂明
□收入《看云集》

近代散文抄序[1]

启无编选明清时代的小品文为一集，叫我写一篇序或跋，我答应了他，已将有半年了。我们预约在暑假中缴卷，那时我想，离暑假还远，再者到了暑假也还有七十天闲暇，不愁没有工夫，末了是反正不管序跋，随意乱说几句即得，不必问切不切题，因此便贸贸然地答应下来了。到了现在鼻加答儿好了之后，仔细一算已过了九月十九，听因百说启无已经回到天津，而平伯的跋也在《草》上登了出来，乃不禁大着其忙，急急地来构思作文。本来颇想从平伯的跋里去发见一点提示，可以拿来发挥一番，较为省力，可是读后只觉得有许多很好的话都被平伯说了去，很有点儿怨平伯之先说，也恨自己之为什么不先做序，不把这些话早截留了，实是可惜之至。不过，这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了头皮自己来想罢，然而机会还是不肯放弃，我在平伯的跋里找到了这一句话，“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做了根据，预备说几句，虽然这些当然是我个人负责。

我要说的话干脆就是，启无的这个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难得受人家的理解和报酬。为什么呢？因为小品文是文艺的少子，年纪顶幼小的老头儿子。文艺的发生次序大抵是先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借了希腊文学来做例，一方面是史诗和戏剧，抒情诗，格言诗，一方面是历史和小说，哲学，——小品文，这在希腊文学盛时实在还没有发达，虽然那些哲人（Sophistai）似乎有这一点气味，不过他们还是思想家，有如中国的诸子，只是勉强去仰攀一个渊源，直到基督纪元后希罗文学时代才可以说真是起头了，正如中国要在晋文里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来一样。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未来的事情，因为我到底不是问星处，不能知道，至于过去的史迹却还有点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在文学史上所记大都是后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遗留如歌谣等，也还能推想前期的文艺的百一。在美术上便比较地看得明白，绘画完全个人化了，雕塑也稍有变动，至于建筑，音乐，美术工艺如瓷器等，却都保存原始的迹象，还是民族的集团的而非个人的艺术，所寻求表示的也是传统的而非独创的美。在未脱离集团的精神之时代，硬想打破它的传统，又不能建立个性，其结果往往青黄不接，呈出丑态，固然不好，如以现今的瓷器之制作绘画与古时相较，即可明瞭，但如颠倒过来叫个人的艺术复归于集团的，也不是很对的事。对不对是别一件事，与有没有是不相干的，所以这两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并存，不，或者是对峙着。集团的美术之根据最初在于民族性的嗜好，随后变为师门的传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滞，其价值几乎只存在技术一点上了。文学则更为不幸，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于是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文学进了后期以后，这新旧势力还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

[1] 《骆驼草》题作《〈冰雪小品选〉序》。

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它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因为这个缘故，启无选集前代的小品文，给学子当作明灯，可以照见来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对于别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过在载道派看来这实在是左道旁门，殊堪痛恨，启无的这本文选其能免于覆瓿之厄乎，未可知也。但总之也没有什么关系。是为序。

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于北平煅药庐。

□1930 年 9 月刊《骆驼草》21 期，署名岂明

□收入《看云集》

近代散文抄新序

我给启无写《近代散文抄》的序还是在两年前，到了现在书才出板，再拿起原序来看，觉得这其间的时光仿佛有点辽远了，那里所说的话也不免有点迂远了，便想再来添写这篇新序，老老实实的说几句话。

启无编刊这部散文抄，有益于中国学术文艺上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其一，中国讲本国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向来不大看重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文章，偶尔提及，也总根据日本和清朝的那种官话加以轻蔑的批语，文章统系仿佛是七子之后便由归唐转交桐城派的样子，这个看法我想是颇有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这不但使他们对于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不能了解其意义，便是清初新旧文学废兴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瞭了。日本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上举出性灵一派与格调气韵诸说相并，但是不将这派的袁子才当作公安的末流，却去远寻杨诚斋来给他做义父，便是一例，中国誊录铃木之说者也就多照样的说下去了。启无这部书并非议论，只是勤劳的辑录明末清初的新文学派的文章，结果是具体的将公安竟陵两派的成绩——即其作品和文学意见结集在一处，对于那些讲中国文学的朋友供给一种材料，干事不无小补。古人的著作苟存于世间，其价值也自存在，不以无人顾问而消灭，公安竟陵非亲非眷，吾辈本无庸扰扰为古人争身后之名，只是有此文学史上的材料而听其湮没亦是可惜，如得有人为表而出之，乃亦大可喜耳。

其二，中国古文汗牛充栋，但披沙栋金，要挑剔多少真正好的文艺，却是极难的事。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学校里为什么有唐宋文而没有明清文——或称近代文，因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这个统系，一方面又是韩退之以来的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平心静气的一想，未成正宗的新思想新文章希望公家来提倡本来有点儿傻气，不必说过去的便是现今的新文学在官公私各学校里也还没有站得住脚呢。退一步想，只好索解于民间，请青年学子有点好奇心的自己来看看吧。可惜明人文集在此刻极不易得，而且说也奇怪，这些新文人的著作又多是清朝的禁书，留下来的差不多是秦火之馀，更是奇货可居，不是学生之力所能收留的了。在这里，启无的这部书的确是“实为德便”。在近来两三年内启无利用北平各图书馆和私家所藏明人文集，精密选择，录成两卷，各家菁华悉萃于此，不但便于阅读，而且使难得的古籍，久湮的妙文，有一部分通行于世，寒畯亦得有共赏的机会，其功德岂浅鲜哉。平常有人来问我近代文中有什么书可读，我照例写几部绝板禁书的名目给他，我知道这是画饼，但是此外实无办法，现在这部散文抄出板之后那我就有了办法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六日，于北京。

□1932 年作，1934 年刊“天马”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重刊霓裳续谱序

章衣萍君来信云拟重刊《霓裳续谱》，嘱写小序，已经有半年多了，我答应了，却老是写不出，这里自然可以有好些口实，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对于民歌的意见有点动摇，不，或者不如说是转变了。我从前对于民歌的价值是极端的信仰与尊重，现在虽然不曾轻视，但有点儿怀疑了，假如序文必须是拥护的或喝采的，那么我恐怕实在已经是失去做序的资格了。可是话虽如此，日前的成约却总难以取消，所以还只好来写，即使是在戏台里叫的是倒好也罢。

我最初知道《霓裳续谱》是听常维钧君说的，我所有的一部也是承他替我代买来的，仔细想起来似乎连书价也还没有还他，这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大家热心于采集歌谣，见了这种集子，心里非常快活，因为一则得到歌谣比较研究的资料，二则发见采集事业的伴侣，所以特别感着一种浪漫的珍重。不久郑振铎君的《白雪遗音选》也出来了，我们知道这类名著已有了两种，《霓裳》成于一七九五，《白雪》成于一八〇四，相差只有九年，《霓裳》序上说明所集的大都是北京像姑们所唱的小调，《白雪》因为选本很可惜地没有抄录原序，关于地方和性质等不能知悉，而且郑选本又声明有些猥亵的情歌不能收入，仿佛更觉得有点缺陷，及至汪静之君的《续选》出现，两集共选三百四十多首，已及全书之半，里边的精华差不多可以说是都在这里了。我把《白雪遗音选》正续编看了一遍，又将《霓裳续谱》找出来一翻之后，好像有魔鬼诱惑似地有一缕不虔敬的怀疑之黑云慢慢地在心里飘扬起来，慢慢地结成形体，成为英国好立得教授（W.R.Halliday）在所著《民俗研究》序上的一句话，“欧洲民间故事的研究，主要地，虽非全然地，是一个文学史上的研究。”别的且不管，总之在中国的民歌研究上，这句话即使不能奉为规律，也是极应注意的，特别是在对付文献上的材料的时候。这个疑心既然起来，我以前对于这些民谣所感觉的浪漫的美不免要走动了，然而她们的真与其真的美或者因此可以看见一点，那也是说不定的。

美国庚弥耳教授（F.B.Gummere）论英国叙事的民歌，力主集团的起源说，那种活灵活现的说法固然不很能佩服，但是以这种民歌为最古的诗，而且认为是纯粹民间的创作，我以前原是赞同的。回过头来看中国笔录的民歌集如上述二书，却感到有些不同，似乎纯粹的程度更差得多，证以好立得的话尤为显然。好立得对于英国叙事的民歌之价值且很怀疑，在论现代希腊的赞美歌的序文里说（Folklore’Studlies，Prefacex-xiii）：

> 我的结论是，说民俗中的遗迹是无年代地久远这种假说，十中之九是无根据的。我在《民俗学杂志》三十四卷曾经说过，此后有机会时还想详细申言，我相信欧洲民间故事的研究，主要地虽非全然地，是一个文学史上的研究。……却耳得教授的《英苏叙事民歌》的大著也指示出同一的方向。民间文学，民间歌谣与风习的大部分的确是由遗迹合成，但这大都是前代高级社会的文学与学问之遗迹而不是民众自己的创造。
>
> 我并不想和安诺德一同吃亏，他得到克耳（W.P.Ker）的非难，因为他诽谤叙事民歌的杰作，并且从民众诗神的最坏的作品里不公平地选出例子来证明他的批评。但同时我相信，我们如用了绝对的诗的标准来看，民间诗歌之美的价值总是被计算得过高，或者大抵由于感情作用的缘故。人家忘记了这件事，有些杰作乃是偶然而且希有的，这多么少而且

难，只要通读却耳得的一卷，即可使没有成见的人完全相信。现代希腊民歌之过被称赞亦不下于别国的叙事民歌。这里边确有一两篇很好的浪漫的诗，有些叙山寨生活的诗也有好的动人的情节，但是，像一切民间艺术一样，无论这是文学是锦绣或是什么，总括看来总禁不起仔细的审察。

据我所知道，民间的讲故事或说书都是很是因袭的技艺。这里边的新奇大抵在于陈旧的事件或陈旧的诗句之重排改造。这好像是用了儿童的积木玩具搭房屋。那些重排改造平常又并不是故意的，却是由于疏忽，所谓联想这非论理的心理作用常引起一件事情或一句成语，这照理本来都属别处的。……民间诗歌的即兴，在我所见到的说来，同样地全在于将因袭的陈言很巧妙地接合起来，这与真诗人的真创作来比较，正如我们早年照了《诗学梯阶》（GradusandParnassum）而诌出来的一样，相去很远。要证明通行的曲说，说一件大艺术品可以是一个群众或委员会的出产品，这是心理学地困难的事，至于真有价值的民间文艺品之集团的撰作说，干脆地说来，那在我看来简直是梦话罢了。

好立得的话或者在许多人要听了不喜欢，这个暂且不管，只是引用一部分来考察刚才所说的民歌集，我相信是很有好些用处的。《霓裳》《白雪》的诗我恐怕她的来源不在桑间濮上，而是花间草堂，不，或者且说《太平》《阳春》之间罢。《霓裳续谱》编者王楷堂的序里也曾说起，“余窃惟汉魏以来，由乐府变为歌行，由歌行变为词曲，欧苏辛柳而外，《花间》得其韵，实甫得其情，竹坞得其清华，草堂得其朴茂，逮近代之临川文长云亭天石笠翁悔庵诸公，缘情刻羽，皆足■其喜怒哀乐之怀，其词精警，其趣悠长，”这并不是书呆子妄发不相干的议论，来填凑序文，实在是他感觉到这个渊源，不过他还不能切实地知道，这些“优伶口技之馀”老实不客气地乃即是这赫赫世家的末流而已。我猜想集中诗歌的来源可以有两类。其一是文人的作品，其中又有真的好诗，不过当然极少，不知有无百分之一，以及巧妙地或不巧妙地将陈言重排而成的韵文。其二是优伶自己的作品，其中也可以分类如上文。至于是否含有确由集团创造，直表民众真心的作品在内，那是我所不能知道的事。本来文人与优伶也何尝不是民众呢，但他们到底还是个人，而且文人的思想为士大夫阶级所限，优伶不准应试，而其思想却也逃不出士大夫阶级的羁绊，到了文字方面尤甚，所以文人的与优伶的文学差不多就无分别，都成为某一种的因袭了。

我以前觉得中国自大元帅以至于庶人几乎人生观全是一致，很以为奇，随后看出这人生观全是士大夫阶级的，（恐与西洋的所谓布耳乔亚有殊，故恕不引用新名词，）而一样地通行于农工商，又极以为怪，现在这才明白了，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中国民众就一直沿用上一阶级的思想，并保留一点前一时期的遗迹。这个问题怕得拉开去，我现在只在民歌——前代集录的两部民歌上来看，很感到上面所述的情形之的确。可是，说到这里话又已脱了线，因为这又拉了民歌去说明社会情形，而我的本意只想就文学范围来谈谈罢了。据我现在的意见，这类民歌集，即举《霓裳续谱》为例，我们第一要紧是当作文学去研究或赏鉴，不要离开了文学史的根据而过分地估价，特别是凭了一时的感情作用。我把她认作小令套数的支流之通俗化，便是把她从诗歌的祖母这把高椅子上拉了下来，硬派作词曲的孙女儿，坐在小机子上，我晓得一定有人很不满意，或认为反动的议论亦未可知，不过我相信在她文辞

情意的因袭上很有明显的形迹可见，只要请精通词曲小令的人细加考校当可知其真相，我不过是一名苦力小工，把地面耙平一点，至于正式的建筑，我还得仁俟这方面的专家的明教。从前创造社的一位先生说过，中国近来的新文学运动等等都只是浪漫主义的发挥，歌谣研究亦是其一，大家当时大为民众民族等观念所陶醉，故对于这一面的东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扬，或因反抗旧说而反拨地发挥，一切估价就自然难免有些过当，不过这在过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说是当然的初步，到了现在却似乎应该更进一步，多少加重一点客观的态度，冷静地来探讨或赏玩这些事情了。

我在上边把《霓裳续谱》说了一大套，仿佛真是替衣萍在台房里倒喝彩似的，其实自然不是，我只说明这类民歌不真是民众的创作，她的次序不是在文学史之首而是其末，至于其固有的价值原不因此而有所减却，这是我所要声明的。《霓裳续谱》出版在《白雪遗音》之前，虽然现在还没有那么名贵，但也总是不甚易得了，衣萍这回加以整理，重刊行世，确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集子里颇有不少的好诗，可以和《白雪》比较，其次这些都是北京像姑娘们所唱的小曲，而其歌词又似多出文人手笔，其名字虽无可考，很令人想起旗亭画壁时的风俗，假如有人搜集这类材料，作文学史的研究，考察诗歌与倡优的关系，也是很有价值的工作，其重要或未必下于年号氏族等的研究欤。（十九年十月十四日，于北平）

□1930 年 10 月刊《骆驼草》24 期，署名岂明

□收入《看云集》

越 谚 跋

在小时候我于乡先生中有最佩服的两个人：一是乌程汪谢城，一是会稽的范啸风。汪先生以举人官会稽县学教谕，所著关于韵学历学诸书及词一卷均在《荔墙丛刻》中，《玉鉴堂诗》六卷近亦刻入《吴兴丛书》，但我所喜欢的乃是单行的一部《湖雅》，书凡九卷，后附《湖蚕述》四卷。范先生是个副榜，即《越谚》的编著者，诗文集均不存，先君曾经请他写过一副小对联，只记得下句：“悠然见南山”，末署“扁舟子范演”，不过这对子也早已落在穿窬君子的手里了。《湖雅》与《越谚》详记一地方的风物或言语，性质有点相近，但体例不大一样，前者略近《埤雅》《尔雅翼》，所谓亦雅诂之支流也，后者则全以俗语为主，随语记录，不避俚俗，假如引一句成语来说明，那么其一可以说是君子安雅，而其二乃是越人安越欤？

范先生家住城外皇甫庄，甲午以前我的舅父也住在那里，两家正是贴邻，我在那时常听人家讲他的逸事。他中副榜时心里正很懊恼，有一老妪来贺他道：“今年中了半边举人，明年再中半边，合起来便是一个，岂不很好。”但是下一科是否真又中了半边，这却有点记不清楚了。他编《越谚》时召集近地的小孩唱歌给他听，唱后便请他们吃夜糖。到了晚年，他常在灶下烧火，乞糕饼炒豆等为酬，有时因为火候不中程，为姑媳谯诃也不为意。尝以己意造一船，仿水车法，以轮进舟，试之本二橹可行，今须五六壮夫足踏方可，乃废去不用，少时曾登其舟，则已去轮机仍用篙橹矣。范先生盖甚有新思想，而困于时地，不能充分发展，世人亦莫之知，大都视为怪物，与徐文长仿佛，其有逸事流传亦相同。《越谚》刻于光绪壬年，及今五十年，印刷传布为数不少，未得列于著作之林，然而藏板至今尚可新印，无甚缺损者，其实也未始不是还从这里来的好处也。

从前记录越中方言者，据我所见有毛西河的《越语肯綮录》，茹三樵的《越言释》，田易堂的《乡谈》等，但是他们的方法都是《恒言录》《通俗编》的一路，如不是想替俗语去找出古雅的本字，至少也要在书本里发见先例，故所说即使很精确，原是部分而非整个，也只是文字学的材料，与方言土俗了无关系。《越谚》所取的方针便截然不同，他是以纪录俗语为目的，有一语即记录一语，纯是方言志的性质，他有字要寻出典，以致有些字很是古怪，也许是一种毛病，虽然这毛病不能算怎么大，因为那些字本来反正多是有音无字的。《越谚》中又收录着许多歇谣，完全照口头传说写下来的，这不但是歌谣研究的好资料，而且又是方言语法的好例，书中多载单辞只字，缺少表示语法实例的整句之缺点，也就可以勉强补上几分。此后如有还未忘记绍兴话的绍兴人，能够费点工夫把他添注上拼音，这便可以成为一部急就的《绍兴方言志》了。我们且不讲“唯桑与梓必恭敬止”那些旧话，只是饮水思源，从学问在或趣味上面想起来，觉得对于这位扁舟子老先生实在应得表示相当敬意耳。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旧会稽县人周作人识于北平苦雨斋。

□1932 年刊“来薰阁”刻印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越　谚

范寅啸风著《越谚》卷上《谣诼之谚第七》“九九消寒谣”云，头九二九，相唤勿出手。注云，越呼揖人为相唤，勿出手者冷也。案作揖古有唱喏之称，绍兴称相唤正是此意，如何唱法今虽不可知，唤则犹可解，盖昔时相见必互唤一声，家族中虽不揖亦如是也。陈训正《甬句方言脞记》云，对揖俗称相欢，谓通欢意也，可知宁波亦有此语，惟其解说疑未确，当以唤字为正。

又《骂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东瓜雕猪寨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亦更明显，设为二人应对之词云，冬瓜好雕猪寨么？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罢？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寨即是槽，家畜的食器，据《越言释》写作寨，若冬瓜本极普通，今作东爪，当是范君改写，以《五代史》为准欤。

□1944 年 5 月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蠕　范

偶然在旧书店里买了一部《蠕范》，京山李元著，元系乾隆时人，著有关于声韵的书，为世所知。此书凡八卷，分为物理物匹物生物化等十六章，徐志鼎序云，

大块一蠕境也。……顾同一蠕也，区而别之，不一蠕也，类而范之，归于一蠕也。

这可以说是一部生物概说。以十六项目包罗一切鸟兽虫鱼的生活状态，列举类似的事物为纲，注释各个事物为目，古来格物穷理的概要盖已具于是。有人序《百廿虫吟》云，诚以格物之功通于修齐治平，天下莫载之理即莫破所由推，这样说法未免太言重了，而且也很有点儿帖括的嫌疑，但是大旨我实在是同意的。“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 biology，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是民八所写小文《祖先崇拜》里的几句话，至今我却还是这样想。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正如西儒所说过，要想成为健全的人必须先成健全的动物，不幸人们数典忘祖，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鹿和羚羊遇见老虎，跑得快时保住性命，跑不脱便干脆的被吃了，老虎也老实的饱吃一顿而去，决没有什么膺惩以及破邪显正的费话。在交尾期固然要闹上一场，但他们决不借口无后为大而聚麀，更不会衔了一块肉骨头去买母狗的笑，至于鹿活草淫羊藿这种传说自然也并无其事。我们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又依恃智力造出许多玄妙的说明，拿了这样文明人的行为去和禽兽比较，那是多么可惭愧呀。人类变为家畜之后，退化当然是免不掉的，不过夸大狂的人类反以为这是生物的标准生活，实在是太不成话了。要提醒他们的迷梦，最好还是吩咐他们去请教蚂蚁，不，不论任何昆虫鸟兽，均可得到智慧。读一本《昆虫记》，胜过一堆圣经贤传远矣，我之称赞生物学为最有益的青年必读书盖以此也。

《蠕范》是中国十八世纪时的作品，中国博物学向来又原是文人的馀技，除了《诗经》《离骚》《尔雅》《本草》的注疏以外没有什么动植物的学问，所以这部书仍然跳不出这窠臼，一方面虽然可以称之曰生物概说，实在也可以叫作造化奇谈，因为里边满装着变化奇怪的传说和故事。二千多年前亚列士多德著《动物志》，凡经其实验者纪录都很精密，至今学者无异言，所未见者乃以传说为据，有极离奇者。我们著者则专取这些，有的含有哲理，有的富于诗趣，这都很有意思，所缺少的便只是科学的真实。这样说来。《蠕范》的系统还是出于《禽经》，不过更发挥光大罢了。卷六《物知》第十二的起头这一节话便很有趣，其文曰：

物知巫，鸜■善敕，蜾蠃善咒，水鸠善写，鹳善符，虎善卜，鹳善禁。

差不多太乙真人的那许多把戏都在这里了。关于啄木原注云，好■木食虫，以舌钩出食之，善为雷公禁法，曲爪画地为印，则穴塞自开，飞即以翼墁之。这所说大抵即根据《埤雅》，《本草纲目》引《博物志》亦如此说，仿佛记得《阅微草堂笔记》里也曾提及，有奴子某还实验过云，可以想见流传的久远了。我们在北平每年看见啄木鸟在庭树上或爬或笑，或丁丁的啄，并不见他画什么符印，而这种俗信还总隐伏在心里。记起小时候看《万宝全书》之类，颇想一试那些小巫术，但是每个药方除普通药材以外总有一味啄

木鸟的舌头或是熊油，只好罢休。啄木鸟舌头的好处何在？假如不全是处方者的故意刁难，那么我想这仍是由于他的知巫的缘故罢。

至于蜾蠃的故事，其由来远矣。《诗·小宛》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前汉时，《淮南子》中有贞虫之称。扬雄《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这可以算是最早的说明。后汉许慎《说文》云：天地之性，细腰纯雄无子。郑玄《毛诗笺》云：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吴陆玑《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得更为详明，云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为其子，里语曰，咒云象我象我。《酉阳杂俎》“广动植”有蠨蛸一项，虽不注重负子，而描写甚有意趣，文云：成式书斋多此虫，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时方知不独负桑虫也。以后注《诗经》《尔雅》者大抵固执负子说，不肯轻易变动，别方面《本草》学者到底有点不同，因为不全是文人，所以较为切实了。晋陶弘景在《本草注》里反对旧说道：

> 今一种蜂黑色腰甚细，衔泥于人屋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馀枚满中，仍塞口，以拟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虫。《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言细腰之物无雌，皆取青虫教祝，便变成己子，斯为谬矣。造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耶？岂圣人有缺，多皆类此？

《本草》学者除一二例外大都从陶说，宋车若水《脚气集》中云，“蜾蠃取螟岭，产子于其身上，借其膏血以为养，蜾蠃大，螟蛉枯，非变化也”，很说得简要，可以当作此派学说的结束。至于蒲卢的麻醉防腐剂注射手术的巧妙，到了法国法布耳出来始完全了解，所以《昆虫记》的几篇又差不多该算作这问题的新添注脚也。

但是陶隐居的说法在文人看去总觉得太杀风景，有些人即使不是为的卫道，也总愿意回到玄妙的路上去。清道光时钱步曾作《百廿虫吟》，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诗集，其蒲卢一诗后有两段附记，对于《诗疏》与《脚气集》两说，加以判断曰：

> 余曾细察之，蜾蠃好窠于书卷笔管中，其所取物或小青虫或小蜘蛛，先练泥作房，积四五虫，再以泥隔之，满而后止。虫被负者悉如醉如痴。能运动而不能行走，一旦启户而出。残泥零落，遗蜕在焉，似乎气感为确。至扬子云类我类我之说则大谬，盖蒲卢于营巢时以口匀泥，嘤嘤切切然，至负子时则默无声息矣。天地自然之化，不待祝辞也，且蒲卢乌能通人语耶，子云乌能通蒲卢语耶，古人粗疏臆断，一何可笑。

其又记云：

> 壬午秋试侨寓西湖李氏可庄，其地树木丛杂，虫豸最多。一日余在廊下醮面，瞥见一蒲卢较常所见者稍大，拖一臧螂贸贸而来，力稍倦，息片时复衔而走，臧螂亦如中酒的然，逡巡缘柱入孔穴间，乃知蒲卢所负不独蜘蛛青虫也。

钱氏观察颇是细密，所云被负的虫如醉如痴，能运动而不能行走，与李时珍引《解颐新语》云其虫不死不生相同，很能写出麻醉剂的效力，别人多未注意及此，却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气感之说，一定要叫自青虫以至臧螂都蜕化为雄蜂，岂不是好奇太过之故乎。同治中汪曰桢著《湖雅》九卷，记湖州物产，文理密察，其“记蠨蛸”乃取陶说，并批判诸说云：

案陶弘景云云，寇宗奭李时珍及《尔雅翼》并从陶说，是也。邵晋涵《尔雅正义》力辟陶说，王念孙《广雅疏证》既从陶说，又引苏颂谓如粟之子即祝虫所成，游移两可，皆非也。生子时尚未负虫，安得强指为虫所化乎？

汪氏对于好奇的文人又很加以嘲笑，在“记蚊”这一节下云：

道光辛卯，吾友海宁许心如丙鸿与余论近人《山海经图》之诞妄，时适多蚊，因戏仿《山海经》说之云，虫身而长喙，鸟翼而豹脚，且日，设依此为图，必身如大蛹，有长喙，背上有二鸟翼，腹下有四豹脚，成一非虫非禽非兽之形，谁复知为蚊者。余日，是也，但所仿犹嫌未备，请续之曰，昼伏夜飞，鸣声如雷，是食人。相与拊掌。笑言如昨，忽已四十馀年，偶然忆及，附识于此，博览者一笑，亦可为著述家好为诞妄之戒也。

我对于《蠕范》一书很有点好感，所以想写一篇小文讲他，但是写下去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变成指摘了。这是怎的呢？我当初读了造化奇谈觉得喜欢，同时又希望他可以当作生物概说，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也是没法的事。总之《蠕范》我想是还值得读的，虽然如作生物学读那须得另外去找，然而这在中国旧书里恐怕一时也找不出罢。

（二十二年十月）

□1933 年 10 月 14 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颜氏学记

读《颜氏学记》觉得很有兴趣，颜习斋的思想固然有许多是好的，想起颜李的地位实在是明末清初的康梁，这更令人发生感慨。习斋讲学反对程朱陆王，主张复古，“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行”，归结于三物，其思想发动的经过当然也颇复杂，但我想明末的文人误国，总是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他在《存学编》中批评宋儒说：

> 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苍生。上者但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

其结果则北来之时虽有多数的圣贤，而终于“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南渡之后又生了多数的圣贤，而复终于“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又《年谱》中记习斋语云：

> 文章之祸，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国家则害国家。陈文达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当日读之，亦不觉其词之惨而意之悲也。

戴子高述《颜李弟子录》中记汤阴明宗室朱敬所说，意尤明白：

> 明亡天下，以士不务实事而囿虚习，其祸则自成祖之定《四书五经大全》始。三百年来仅一阳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举俗学入人之蔽已深故也。

这里的背景显然与清末甲申以至甲午相同，不过那时没有西学，只有走复古的一条路，这原是革新之一法，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所做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这就是后来提倡声光化电船坚炮利的意思，虽然比较的平淡，又是根据经典，然而也就足以吓倒陋儒，冲破道学时文的乌烟瘴气了。大约在那时候这类的议论颇盛，如傅青主在《书成化弘治文后》一篇文章里也曾这样说：

>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

这个道理似乎连皇帝也明白了，康熙二年上谕八股文章与政事无涉，即行停止，但是科举还并不停，到了八年八股却又恢复，直到清末，与国祚先后同绝。民国以来康梁的主张似乎是实行了，实际却并不如此。戊戌前三十年戴子高赵撝叔遍索不得的颜李二家著述，现在有好几种板本了，四存学会也早成立了，而且我们现在读了《颜氏学记》也不禁心服，这是什么缘故呢？从一方面说，因为康梁所说太切近自己，所以找了远一点旧一点的来差可依傍，——其因乡土关系而提倡者又当别论。又从别一方面说，则西学新政又已化为道学时文，故颜李之说成为今日的对症服药，令人警醒，如不佞者盖即属于此项的第二种人也。

颜习斋尝说，“为治去四秽，其清明矣乎，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别的且不论，其痛恨时文我觉得总是对的。但在《性理书评》里他又说，“宋儒是圣学之时文也”，则更令我非常佩服。何以道学会是时文呢？他说明道，“盖讲学诸公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傅青主也尝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刁钻，为狗为鼠而已。”这是同一道理的别一说法。

朱子批评杨龟山晚年出处，初说做人苟且，后却比之柳下惠，习斋批得极妙：

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

末几句说得真可绝倒，是作文的秘诀，却也是士大夫的真相。习斋拈出时文来包括宋儒——及以后的一切思想文章，正是他的极大见识。至于时文的特色则无定见，说体面话二语足以尽之矣，亦即青主所谓奴是也。今人有言，土八股之外加以洋八股，又加以党八股，此亦可谓知言也。关于现今的八股文章兹且不谈，但请读者注意便知，试听每天所发表的文字谈话，有多少不是无定见，不是讲体面话者乎？学理工的谈教育政治与哲学，学文哲的谈军事，军人谈道德宗教与哲学，皆时文也，而时文并不限于儒生，更不限于文童矣，此殆中国八股时文化之大成也。

习斋以时文与僧道娼为四秽，我则以八股雅片缠足阉人为中国四病，厥疾不瘳，国命将亡，四者之中时文相同，此则吾与习斋志同道合处也。

《性理书评》中有一节关于尹和靖祭其师伊川文，习斋所批首数语，虽似平常却很有意义，其文曰：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国时难，惟馀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习斋的意思似乎只在慨感儒生之无用，但其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

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如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权，岂非悉由于此类右倾思想之作祟欤。内田等人明言，即全国化为焦土亦所不惜，但天下事成败难说，如其失败时将以何赔偿之？恐此辈所准备者亦一条老命耳。

此种东方道德在政治上如占势力，世界便将大受其害，不得安宁，假如世上有黄祸，吾欲以此当之。虽然，这只是说日本，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清初石天基所著《传家宝》中曾记一则笑话云：

有父病延医用药，医曰，病已无救，除非有孝心之子割股感格，或可回生。子曰，这个不难。医去，遂抽刀出，是时夏月，逢一人赤身熟睡门屋，因以刀割其股肉一块。睡者惊起喊痛，子摇手曰，莫喊莫喊，割股救父母，你难道不晓得是天地间最好的事么？

此话颇妙，习斋也生在那时候，想当同有此感，只是对于天下大约还有指望，所以正经地责备，但是到了后来，这只好当笑话讲讲，再下来自然就不大有人说了。

六月中阅《学记》始写此文，到七月底才了，现在再加笔削成此，却已过了国庆日久矣了。（二十二年十月）

□1933 年 10 月 25 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一岁货声

从友人处借来闲步庵所藏一册抄本，名曰《一岁货声》，有光绪丙午（一九〇六）年序，盖近人所编，记录一年中北京市上叫卖的各种词句与声音，共分十八节，首列除夕与元旦，次为二月至十二月，次为通年与不时，末为商贩工艺铺肆。序文自署“闲园鞠农偶志于延秋山馆”，其文亦颇有意思，今录于后：

> 虫鸣于秋，鸟鸣于春，发其天籁，不择好音，耳遇之而成声，非有所爱憎于人也。而闻鹊则喜，闻鸦则唾，各适其适，于物何有，是人之聪明日凿而自多其好恶者也。朝逐于名利之场，暮夺于声色之境，智昏气馁，而每好择好音自居，是其去天之愈远而不知也。嗟乎，雨怪风盲，惊心溅泪，诗亡而礼坏，亦何处寻些天籁耶？然而天籁亦未尝无也，而观夫以其所蕴，陡然而发，自成音节，不及其他，而犹能少存乎古意者，其一岁之货声乎。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朋来亦乐，雁过留声，以供夫后来君子。

凡例六则。其一云：“凡一岁货声注重门前，其铺肆设摊工艺赶集之类，皆附入以补不足。”其二云：“凡货声率分三类，其门前货物者统称货郎，其修作者为工艺，换物者为商贩，货郎之常见者与一人之特卖者声色又皆不同。”其四云：“凡同人所闻见者，仅自咸同年后，去故生新，风景不待十年而已变，至今则已数变矣。往事凄凉，他年寤寐，声犹在耳，留赠后人。”说明货声的时代及范围种类已甚明瞭，其纪录方法亦甚精细，其五则云：“凡货声之从口旁诸字者，用以叶其土音助语而已，其字下叠点者，是重其音，像其长声与馀韵耳。”如五月中卖桃的唱曰：

> 樱桃嘴的桃呕嗷噎啊……

即其一例，又如卖硬面饽饽者，书中记其唱声曰：

> 硬面唵，饽啊饽……

则与现今完全相同，在寒夜深更，常闻此种悲凉之声，令人抚然，有百感交集之概。卖花生者曰：

> 脆瓤儿的落花生啊，芝麻酱的一个味来，
> 抓半空儿的——多给。

这种呼声至今也时常听到，特别是单卖那所谓半空儿的……大约因为应允多给的缘故罢，永远为小儿女辈所爱好。昔有今无，固可叹慨，若今昔同然，亦未尝无今昔之感，正不必待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也。

自来纪风物者大都止于描写形状，差不多是谱录一类，不大有注意社会生活，讲到店头担上的情形者。《谖庵文饭小品》卷三《游满井记》中有这几句话：

> “卖饮食者邀诃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很有破天荒的神气，《帝京景物略》及《陶庵梦忆》亦尚未能注意及此。清光绪中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于六月中记冰胡儿曰：
>
> “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胡者核也。”又七月下记菱角鸡头曰：
>
> “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但其所记亦遂只此二事，若此书则专记货声，描模维肖，又多附以详

注，斯为难得耳。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盖挑担推车设摊赶集的一切品物半系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闲食玩艺一部分亦多是一般妇孺的照顾，阔人们的享用那都在大铺子里，在这里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读这本小书，常常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只可惜现在的北平民穷财尽，即使不变成边塞也已经不能保存这书中的盛况了。

我看了这些货声又想到一件事，这是歌唱与吆喝的问题。中国现在似乎已没有歌诗与唱曲的技术，山野间男女的唱和，妓女的小调，或者还是唱曲罢，但在读书人中间总可以说不会歌唱了，每逢无论什么聚会在馀兴里只听见有人高唱皮簧或是昆腔，决没有鼓起■咙来吟一段什么的了。现在的文人只会读诗词歌赋，会听或哼几句戏文，想去创出新格调的新诗，那是十分难能的难事。中国的诗仿佛总是不能不重韵律，可是这从哪里去找新的根苗，那些戏文老是那么叫唤，我从前生怕那戏子会回不过气来真是“气闭”而死，即使不然也总很不卫生的，假如新诗要那样的唱才好，亦难乎其为诗人矣哉。卖东西的在街上吆喝，要使得屋内的人知道，声音非很响亮不可，可是并不至于不自然，发声遣词都有特殊的地方，我们不能说这里有诗歌发生的可能，总之比戏文却要更与歌唱相近一点罢。卖晚香玉的道：

嗳……十朵，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来。

——一个大钱十五朵。

什么“来”的句调本来甚多，这是顶特别的一例。又七月中卖枣者唱曰：

枣儿来，糖的咯哒喽。

尝一个再买来哎，一个光板喽。

此颇有儿歌的意味，其形容枣子的甜曰糖的咯哒亦质朴而新颖。卷末铺肆一门中仅列粥铺所唱一则，词尤佳妙，可以称为掉尾大观也，其词曰：

喝粥咧，喝粥咧，十里香粥热的咧。

炸了一个焦咧，烹了一个脆咧，脆咧焦咧，

像个小粮船的咧，好大的个儿咧。

锅炒的果咧，油又香咧，面又白咧，

扔在锅来漂起来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

赛过烧鹅的咧，一个大的油炸的果咧。

水饭咧，豆儿多咧，子母原汤儿的绿豆的粥咧。

此书因系传抄本，故颇多错误，下半注解亦似稍略，且时代变迁虑其间更不少异同，倘得有熟悉北京社会今昔情形如于君闲人者为之订补，刊印行世，不特存录一方风物可以作志乘之一部分，抑亦间接有益于艺文，当不在刘同人之《景物略》下也。（二十三年一月）

□1934 年 1 月 17 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一岁货声之馀

去年冬天曾借闲步庵所藏抄本《一岁货声》手录一过，后来对西郊自然居士说及，居士说在英国买到或是见过一本叫作《伦敦呼声》的书，可惜我终于未得拜见，近日翻阅莽来则博士的文集，其中有《小普利尼时代的罗马生活》与《爱迪生时代的伦敦生活》两篇很觉得可喜，在《伦敦生活》篇中讲到伦敦呼声，虽然都即根据《旁观报》，说的很简略，却也足供参考，今译出于下：

> 在爱迪生时代伦敦街上不但是景象就是声音也与现今的情形很有些不同。半夜里，睡着的人常被更夫打门从梦中惊醒，迷迷胡胡的听他嗡嗡的报告时刻，听他退到街上响着的铃声。在白天里，据说没有东西比那伦敦的呼声更会使得外国人听了诧异，使得乡下绅士出惊的了。洛及卡佛来勋爵离开他那庄园的静默，乌司得郡绿的路径和原野的寂静，来到伦敦大道上的时候，他时常说他初上城的一星期里，头里老是去不掉那些街上的呼声，因此也睡不着觉。可是维尔汉尼昆却正相反，他觉得这比百灵的唱歌和夜莺的翻叫还好，他听这呼声比那篱畔林中的一切音乐还觉得喜欢。
>
> 伦敦呼声在那时候可以分作两种，即声乐与器乐。那器乐里包含着敲铜锅或熬盘，各人都可自由的去整个时辰的敲打，直闹得全街不宁，居民几乎神经错乱。阉猪的所吹的画角颇有点儿音乐味，不过这在市内难得听到，因为该音乐家所割治的动物并不是街上所常有的东西。但是声乐的各种呼声却更多种多样。卖牛奶的尖声叫得出奇，多感的人们听了会牙齿发酸。扫烟通的音调很是丰富，他的呼声有时升到最尖的高音，有时也降到最沉的低音去。同样的批评可以应用于卖碎煤的，更不必说那些收破玻璃和砖屑的了。箍桶的叫出末了的一字用一种空音，倒也并不是没有调和。假如听那悲哀庄严的调子，问大家有没有椅子要修，那时要不感到一种很愉快的幽郁是不可能的。一年中应该腌黄瓜和小黄瓜的时候，便有些歌调出来叫人听了非常的舒服，只是可惜呀，这正同夜莺的歌一样，在十二个月里止有两个月能够听到。这是真的，那些呼声大抵不很清楚，所以极不容易辨别，生客听了也猜不出唱歌的所卖是什么东西，因此时常看见乡村里来的孩子跑出去，要想问修风箱的买苹果，或问磨刀剪的买生姜饼。即使文句可以明瞭的听出，这也无从推知那叫喊者的职业。例如吆喝有工我来做，谁能知道这是割稻的呢？然而在女王安尼朝代，也同我们的时代一样，有许多人他全不理会街上呼声的谐调，他不要听阉猪的画角的低诉，像聋似的对于那割稻的声音，而且在他的野蛮的胸中听了修椅子的音乐的请求也并不发生什么反应。我们曾听说有这样一个人，他拿钱给一个用纸牌看婚姻的，叫他不要再到他这条街里来。但是结果怎样呢？所有用纸牌看婚姻的在明天早上都来他门口走过，希望同样的用钱买走哩。

原书小注引斯威夫德的《给斯德拉的日记》一七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节云：“这里有一个吵闹的狗子，每天早晨在这个时候来烦扰我，叫唤着白菜和甘蓝。现在他正来闹着了。我愿他顶大的一棵白菜塞住他的嗓子。”在这里，我们固然看出斯威夫德牧师照例的那种狠相，但也可以想见那卖白菜的朋友怎样出力，因为否则他或者当不至于这样的被咒骂了。

我不知道中国谁的日记或笔记里曾经说起过这些事情，平日读书太少实在说不出来，但如《越缦堂日记》《病榻梦痕录》等书里记得似乎都不曾有，大约他们对于这种市声不很留意，说不上有什么好恶罢。我只记得章太炎先生居东京的时候，每早听外边卖鲜豆鼓的呼声，对弟子们说，“这是卖什么的？natto，natt0，叫的那么凄凉？”我记不请这事是钱德潜君还是龚未生君所说的了，但章先生的批评实在不错，那卖“纳豆”的在清早冷风中在小巷里叫唤，等候吃早饭的人出来买她一两把，而一把草苞的纳豆也就只值一个半铜元罢了，所以这确是很寒苦的生意，而且做这生意的多是女人，往往背上背着一个小儿，假如真是言为心声，那么其愁苦之音也正是无怪的了。北京叫卖声中有卖硬面饽饽的约略可以相比，特别在寒夜深更，有时晚睡时买些来吃，味道并不坏，但是买来时冻得冰凉的，那“双喜字加糖”之类差不多要在火炉上烤了吃才好了。

（廿三年二月十日记）

□1934 年 2 月 10 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清 嘉 录

《清嘉录》十二卷，吴县顾禄著，记述吴中岁时土俗，颇极详备，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有重刊本，在《啸园丛书》中，现今甚易得。原书初刊于道光中，后在日本翻刻，啸园葛氏所刻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唯其流通之功不可没耳。

顾禄字总之，又字铁卿，所著书除《清嘉录》外，寒斋仅有《颐素堂丛书》八种，《颐素堂诗钞》六卷。丛书中第五种曰《御舟召见恭纪》为其高祖嗣立原著。第七种《山堂五箴》为其友韦光黼著。第四种《烟草录》与褚逢椿共著，馀皆顾氏自作。其一曰《雕虫集》，内小赋三十四篇。二曰《紫荆花院排律》，凡试帖诗四十首。三曰《骈香俪艳》，仿《编珠》之例，就花木一类，杂采典故，列为百五十偶。六曰《省闱日纪》，道光壬午（一八二二）秋与韦光黼应乡试纪行之作，七月朔至八月二十日，共历五十日。八曰《买田二十约》，述山居生活和理想，简而多致。以上五书均可以窥见作者的才情韵致，而《日纪》与《二十约》尤佳。如《二十约》之十九曰：

约、酒酣灯灺，间呼子墨，举平日乡曲所目经耳历者，笔之于简，以恣滑稽调笑，至如朝事升沉，世情叵测，居山不应与闻。

《日纪》在八月项下云：

十七日戊午，平明出万绿山庄，万枝髡柳，烟雨迷离，舟中遥望板屋土墙，幽邃可爱。舟人挽纤行急，误窜入罾网中，遂至勃谿。登岸相劝，几为乡人所窘，偿以百钱，始悻悻散。行百馀里，滩险日暮，不敢发，约去港口数里泊。江潮大来，荻芦如雪，肃肃与内相搏。推窗看月，是夕正望，宛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水势益长，澎湃有声，与君绣侣梅纵谈，闻金山蒲牢声，知漏下矣，覆絮衾而眠。

正可说大有《吴船》之嗣响也。

《颐素堂诗钞》六卷，共古今体诗三百二首，道光乙酉（一八二五）年刊本，刻甚精工。诗中大抵不提岁月，故于考见作者生活方面几乎无甚用处，唯第三卷诗三十七首皆咏苏州南京中间景物，与《省闱日纪》所叙正合，知其为道光壬午秋之作耳。《雕虫集》刊于嘉庆戊寅（一八一八），褚逢椿序云，顾君总之髫龄时所撰也。《颐素堂诗钞》出板于七年后，林衍源序云，总之之才为天所赋，尚在少年，而诗之多且工若是，是则可传也。约略因此可以知其年辈，其生卒出处则仍未知其详。至于诗，诸家序跋题词虽然很是称扬，但在我外行看去却并不怎么好，卷五中这一首诗似乎要算顶好了，题曰《过某氏园》：

我昔曾经此，春风绕砌香。
今来能几日，青草似人长。
风竹忽敲户，雨花时堕墙。
谁将盛罗绮，珍重惜韶光。

《清嘉录》十二卷这恐怕是顾氏最重大的业绩了罢。如顾承序中所说：“荟萃群书，自元日至于岁除，凡吴中掌故之可陈，风谣之可采者，莫不按节候而罗列之，名之曰《清嘉录》，洵吾吴未有之书也。”凡每卷记一月的事情，列项目共二百四十二，纪述之后继以征引，间加考证。如顾日新序中所说：“访诸父老，证以前闻，纠缪摘讹，秩然有体。庄子谓道在蝼蚁，道在尿溺。夫蝼蚁尿溺至微且浊矣，而不嫌每下而愈况，盖天地之至道贯于日

用人事，其传之于世者皆其可笔之于书者也。”称赞与辩解混合的说法在当时大约也不可少，其意思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未免说的旧式一点罢了。我们对于岁时土俗为什么很感到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就为的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大抵主意在于实用，但其对于季节的反应原是一样的。在中国诗歌以及绘画上这种情形似乎亦很显著，普通说文学滥调总是风花雪月，但是滥调则不可，（凡滥调均不可，）风花雪月别无什么毛病，何足怪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与看见泥土黑了想到可以下种，同是对于物候变迁的一种感觉，这里不好说雅俗之分，不过实者为实用所限，感触不广，华或虚者能引起一般的兴趣，所以仿佛更多诗意了。在这上面再加上地方的关系，更是复杂多趣，我们看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则别有亲近之感。《清嘉录》卷四记立夏日风俗，其“秤人”一条云：

> 家户以大秤权人轻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验夏中之肥瘠。蔡云《吴歈》云，风开绣阁飐罗衣，认是秋千戏却非，为挂量才上官秤，评量燕瘦与坏肥。

南方苦热，又气候潮湿，敌入夏人常眠食不服，称曰蛀夏，秤人之俗由是而起，若在北地则无是矣。又卷五记梅雨有“梅水”一条云：

> 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徐士鋐《吴中竹枝词》云，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薰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案长元吴志皆载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中，水味经年不变。又《昆新合志》云，人于初交霉时备缸瓮贮雨，以其甘滑胜山泉，嗜茶者所珍也。

正如卷首例言所说：“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这里记的原是吴俗，而在我读了简直觉得即是故乡的事情了。我们在北京住惯了的平常很喜欢这里的气候风土，不过有时想起江浙的情形来也别有风致，如大石板的街道，圆侗的高大石桥，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不要说大风会刮下来，就是一头猫走过也要格格的响的。这些都和雨有关系。南方多雨，但我们似乎不大以为苦。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用竹水溜引进大缸里，即是上好的茶水。在北京的屋瓦上是不行的，即使也有那样的雨。出门去带一副钉鞋雨伞，有时候带了几日也常有，或者不免淋得像落汤鸡，但这只是带水而不拖泥，石板路之好处就在此。不过自从维新志士拆桥挖石板造马路拉东洋车之后情形怕大不相同了，街上走走也得拖泥带水，目下唯一馀下的福气就只还可以吃口天落水了罢。从前在南京当学生时吃过五六年的池塘水，因此觉得有梅水可吃实在不是一件微小的福气呀。

〔附记〕案明谢在杭《五杂组》卷三云：“闽地近海，井泉水多咸，人家惟用雨水烹茶，盖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须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粪土也。”又卷十一云：“闽人苦山泉难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过之。然自淮而北则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绝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净，多秽泥涂塞故耳。”此两节均说明北方雨水不能用之故，可供参证。

〔附〕日本知言馆刻《清嘉录》序（朝川鼎）

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馀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钞》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首夏，而天保辛卯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盖冬帮船所致也。夫隔海内外而商舶往来一年仅不过夏冬两度，又且长崎之于江户相距四十日程而远，然而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今诵其诗，各体咸备，众妙悉臻，彬彬风雅，比兴不坠，如咏古诸什最多杰作，皆中晚唐人之诗，宜其行远而传世也。末又附《清嘉录》十二卷，盖纪吴中民间时令也。吴古扬州地，东际大海，西控震泽，山川衍沃，水陆所凑。唐宋以来号称繁华之区，亦江南一大都会也。如星野山川城郭土田人物食货灾祥艺文之类，县志邑乘或能详之，至其岁时琐事则略而不言，即一二言之，亦不致详细，盖恐其涉芜杂也，然土风民情于是可见，则其所关系亦自不小，岂可阙哉。古有采诗之政，以观民风，今无其政，又无其诗，在上之人何以周知天下风俗而移易之，然则纪其土风以备采择，亦古人贡诗之意也。顾君诗人也，其合而刻之意或在斯乎，故于土俗时趋推其来由，寻其沿习，慎而不漏，该而不侈，考证精确，纤悉无遗，然后土风可以观，民情可以知矣。是在上之人固所欲闻者也，若其广耳目而资学问，抑又馀波所及，而余辈受赐多矣。余私心窃谓填海为平地，缩地为一家，倘获亲接麈教，闻所未闻，不知当何如愉快也，怅矣心飞，无翼何致，徒付一浩叹耳。岂意君亦谬闻余虚名，壬辰五月扇头题诗及画托李少白以见寄示，且属题词于《清嘉录》，余才学谫劣，何能任之，然倾慕之久，又何可无一言题简端以结知缘。于是与二三子相谋，先将翻刻其书，更为叙行之，而余适婴大疾，濒死数矣，至今笔砚荒废，尘积者三四年，以故迁延度岁，不果其志，深以为恨。久居安原三平好学乐善，勇乎见义而为，一日慨然谓余曰，顾君之于先生可不谓相知乎，而吾亦妄承先生曲知久矣，若无知于知，何以相知之为，吾当为先生代刻之，庶几其不负相知哉。遂捐俸授梓，今兹丁酉七月校刻竣工，适又闻甲斐门人大森舜民亦将刻《颐素堂诗钞》，今与斯书合而行之，其传播之广且速亦如前日自西而东，海之内外无所不至，岂不愉快哉，然后乃知顾君必不以余为负相知，抑又二子之赐也。因序。

天保八年丁酉八月，江户后学朝川鼎撰。

案，《颐素堂诗钞》六卷，我所有的一部是道光乙酉刻本，据前序则云刻于庚寅，岂五年后重刊耶。原本《清嘉录》似亦附诗钞后，但未能得到，日本重刊本曾于民国前数年在东京买到过，后复失去，今年五月又在北平隆福寺街得一部，有旧雨重逢之喜，今抄录其序文于此，以供参考焉。（廿三年五月十五日记）

又案，顷于玻璃厂得原刻《清嘉录》四册，内容与翻本无异，唯题辞多二纸，有日本大洼天吉等三人诗九首。大洼诗序云：“予读顾总之先生《清嘉录》，艳羡吴趋之胜，梦寐神游，不能忘于怀也。比先生书近作七首赠朝川善庵以求序，并征我辈题词，因和原韵，并编次录中事，臆料妄想，率成七首，梦中呓语，敢步后尘，聊博齿粲而已。”善庵盖即朝川鼎，题诗见寄据前序在壬辰五月，然则此题辞补刻自当更在其后矣。但日本刻本反没有这

些诗，亦不知何故。（六月十一日再记）

□1934 年 3 月 10 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五老小简

《五老集》又名《五老小简》，不知系何人所编，我所有的一册是日本庆安三年（一六五〇）重刊本，正当清初顺治七年，原本或者是明人编选的罢。书凡二卷，共分五部，上卷之一为苏东坡，二为孙仲益，下卷之一为卢柳南，二为方秋崖，三为赵清旷，桂未谷跋《颜氏家藏尺牍》（今刻入《海山仙馆丛书》中）云，“古人尺牍不入本集，李汉编昌黎集，刘禹锡编河东集，俱无之。自欧苏黄吕，以及方秋崖卢柳南赵清旷，始有专本。”方卢赵的尺牍专本惜未得见，今此书中选有一部分，窥豹一斑，亦是可喜，虽然时有误字，读下去如飞尘入目，觉得少少不快。

前年夏天买得明陈仁锡编的《尺牍奇赏》十四卷，曾题其端云：“尺牍唯苏黄二公最佳，自然大雅。孙内简便不免有小家子气，馀更自邻而下矣。从王稚登吴从先下去，便自生出秋水轩一路，正是不足怪也。”这里，在孙与王吴之间，正好把卢方赵放进去，前后联成一气。我们从东坡说起，就《五老小简》中挑出一两篇为例，如与程正辅之一谢赐餐云：

> 轼启，漂泊海上，一笑之乐固不易得，况义兼亲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过厚，惭悚不已。经宿尊体佳胜，承即解舟，恨不克追饯。涉履甚厚重，早还为望。不宣。

又如与毛泽民谢惠茶云：

> 轼启，寄示奇茗，极精而丰，南来未始得也。亦时复有山僧逸民，可与共赏，此外但缄而去之尔。佩荷厚意，永以为好。

随手写来，并不做作，而文情俱胜，正到恰好处，此是坡公擅场。孙仲益偶能得其妙趣，但是多修饰，便是毛病。如其贺孟少傅殿京口云：

> 伏闻制除出殿京口，长城隐然与大江为襟带，而刘玄德孙仲谋之遗迹犹在也。缓带之馀，持一觞以酹江月，无愧于古人矣。

此简在《内简尺牍》及《五老集》均在卷首，便取以为例。又与前人谢惠茶云：

> 伏蒙眷记，存录故交，小团斋酿，遣骑驰贶，谨已下拜，便欲牵课小诗占谢，衰老废学，须小间作捻髭之态也。

前者典太多，近于虚文，后者捻髭之态大可不作，一作便有油滑气，虽然比起后人来还没有那么俗。现在再将卢方赵三公的小简抄出为例，各取其卷首的一篇，以免有故意挑剔之弊。卢柳南答人约观状元云：

> 圣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赐之官，为首选者既拜命，拥出丽正门，黄旗塞道，青衫被体，马蹄蹀躞，望灞头而去，观者云合，吁！亦荣矣。然子欲为观人者乎，欲为人所观者乎。若欲为人所观，则移其所以观人者观书。

方秋崖回惠海错云：

> 某以贫故食无鱼，以旱故羹无蔬，日煮涧泉，饭脱栗耳。海物惟错，半含苍潮，所谓眼中顿有两玉人也。

赵清旷贺人架楼云：

> 某兹审华楼经始，有烨其光，门下修五凤楼手段，规模自是宏阔，将见百尺告成，笑语在天上矣。这几篇尺牍看去部很漂亮，实在是不大高明，其毛病是，总说一句，尺牍又变成古文了。尺牍向来不列入文章之内，虽然“书”是在内，所以一个人的尺牍常比“书”要写得好，因为这是随意

抒写，不加造作，也没有畴范，一切都是自然流露。但是如上文所说，自欧苏以后尺牍有专本，也可以收入文集了，于是这也成为文章，写尺牍的人虽不把他与“书”混同，却也换了方法去写，结果成了一种新式古文，这就有点不行了。桐城派的人说做古文忌用尺牍语，却不知写尺牍也正忌做古文，因为二者正是针锋相对地不同。上边卢的一篇却是八大家手笔，或者可以说是王半山的一路罢？方赵则是六朝谢启之化骈为散者，颇适宜于枯窘及典制题，不过情趣索然，这正是副启又变做正启之故也。我们再举后来几家，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如《尺牍奇赏》中所选王百穀九日邀友人云：

空斋无一技菊，大为五柳先生揶揄。但咏满城风雨近重阳，便昏昏欲睡，足下幸过我一破寂寥。

又送笔云：

惟此毛锥子，锍锋淬砺，一扫千军，知子闯钟王之门，得江淹之梦，谨今听役左右。

又吴从先借木屐云：

雨中兀坐，跬步难移，敢借木履为半日之用，虽非赌墅之游，敢折东山之齿。

把这些与东坡去比，真觉得相去太远了。明季这群人中到底要算袁中郎最好，有东坡居士之风，归钱也有可取，不过是别一路，取其还实在罢了。

〔附记〕《茶香室四钞》卷十有《宋人小简》一则，引宋朱弁《曲洧旧闻》云：

旧说欧阳公虽作一二十字小简亦必属稿，然明白平易，若未尝经意者，东坡大抵相类，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士大夫翁然从之，亦一时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时，虽小简亦多用四六，而世所传宋景文《刀笔集》务为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世盖未之见。予在馆中时盛暑，傅崧卿给事以冰馈同舍，其简云，“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之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经》耶？一坐大笑。

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四云：

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绘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裒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此盖对王百穀等人而发，所说亦颇平允。

（廿三年三月）

□1934 年 3 月 28 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花　镜

小时候见过的书有些留下很深的印象，到后来还时常记起，有时千方百计的想找到一本来放在书架上，虽然未必是真是要用的书。或者这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像罢？但是这却不能引去作为文艺宣传的例，因为我在书房里念了多年的经书一点都没有影响，而这些闲书本来就别无教训，有的还只是图画而非文字，它所给我的大约单是对于某事物的一种兴趣罢了。假如把这也算作宣传，那么也没有什么不可，天地万物无不有所表示，即有所宣传也，不过这原是题外闲文，反正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在亲戚家里看见两本石印小板的《图考》，现在想起来该是积山书局印的，觉得很是喜欢，里边的图差不多一张张的都看得熟了。事隔多年之后遇见这书总就想要买，可是印刷难得好的，去年冬天才从东京买得一部可以算是原刻初印，前后已相去四十年了。这是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所刊，著者冈元凤，原是医师，于本草之学素有研究，图画雕刻亦甚工致，似较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为胜。《图说》刻于乾隆辛卯（一七七一），序中自称“凡钓叟村农，樵夫猎户，下至舆台皂隶，有所闻必加试验而后图写”，然其成绩殊不能相副，图不工而说亦陈旧，多存离奇的传说，此殆因经师之不及医师欤。同样的情形则有陈大章的《诗传名物集览》，康熙癸巳（一七一三）刊；与江村如圭的《诗经名物辨解》，书七卷，刊于享保十五年（一七三〇），即清雍正八年也，江村亦业医，所说也比《集览》更简要。《毛诗名物图说》日本文化五年（一八〇八）有翻刻本，丹波元简有序，亦医官也。

其次是陆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是一册写刻甚精的白纸印本，三十多年来随处留意却总没有找着这样的一本书。现在所有的就是这些普通本子，如明毛晋的《广要》，清赵佑的《校正》，焦循的《陆疏疏》，丁晏的《校正》，以及罗振玉的《新校正》。丁罗的征引较详备，但据我外行的私见看来却最喜欢焦氏的编法，各条校证列注书名，次序悉照《诗经》先后，似更有条理。罗本最后出，却似未参考赵焦诸本，用那德国花字似的仿宋聚珍板所印，也觉得看了眼睛不大舒服，其实这也何妨照那《眼学偶得》或《读碑小笺》的样子刻一下子，那就要好得多了。日本渊在宽有《陆疏图解》四卷附一卷，安永八年（一七七九）所刻，大抵根据《广要》毛氏说作为图像，每一叶四图，不及《名物图考》之精也。

末后所想说的是平常不见经传的书，即西湖花隐翁的《秘传花镜》。《花镜》六卷，有康熙戊辰（一六八八）序，陈淏子著，题叶又称陈扶摇，当系其字。其内容，卷一花历新裁，凡十二月，每月分占验事宜两项；卷二课花十八法，附花间日课，花园款设，花园自供三篇；卷三花木类考；卷四藤蔓类考；卷五花草类考；卷六禽兽鳞虫考附焉。讲起《花镜》自然令人想到湖上笠翁的《闲情偶寄》，其卷五种植部共五分七十则，文字思想均极清新，如竹柳诸篇都是很可喜的小品，其馀的读下去也总必有一二妙语散见篇中，可以解颐。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表现，少年读之可以医治作文之笨，正如竹之医俗，虽然过量的服了也要成油滑的病症。至于《花镜》，文章也并不坏，如自序就写得颇有风致，其态度意趣大约因为时地的关系罢，与李笠翁也颇相像，但是这是另

外一种书，勉强的举一个比喻，可以说是《齐民要术》之流罢？本来也可说是《本草纲目》之流，不过此乃讲园圃的，所以还以农家为近。他不像经学家的考名物，专坐在书斋里翻书，征引了一大堆到底仍旧不知道原物是什么。他把这些木本藤本草本的东西一一加以考察，疏状其形色，说明其喜恶宜忌，指点培植之法，我们读了未必足为写文字的帮助，但是会得种花木，他给我们以对于自然的爱好。我从十二三岁时见到《花镜》，到现在还很喜欢他，去年买了一部原刻本，虽然是极平常的书，我却很珍重他不下于现今所宝贵的明板禁书，因为这是我老朋友之一。我从这里认识了许多草木，都是极平常，在乡间极容易遇见，但是不登大雅之堂，在花园里便没有位置，在书史中也不被提及的。例如淡竹叶与紫花地丁，射干即胡蝶花，山躑躅即映山红，虎耳草即天荷叶，平地木即老勿大。这里想起昔时上祖坟的事，春天采映山红，冬天拔取老勿大，前几时检阅旧日记找出来的一节纪事可以抄在这里，时光绪己亥（一八九九）十月十六日也。

> 午至乌石墓所，拔老勿大约三四十株。此越中俗名也，即平地木，以其不长故名。高仅二三寸，叶如栗，子鲜红可爱，过冬不调，乌石极多，他处亦有之。性喜阴，不宜肥，种之墙阴背日处则明岁极茂，或天竹下亦佳，须不见日而有雨露处为妙。

这个记载显然受着《花镜》的影响，山头拔老勿大与田间拔“草紫”（即紫云英）原是上坟的常习，因为贪得总是人情，但拿了回来草紫的花玩过固然也就丢了，嫩叶也瀹食了，老勿大仍在盆里种得好好的，明年还要多结许多子，有五六个一串的，比在山时还要茂盛，而且琐琐的记述其习性，却是不佞所独，而与不读《花镜》的族人不相同者也。《花镜》卷三记平地木，寥寥数行，却亦有致：

> 平地木高不盈尺，叶似桂，深绿色，夏初开粉红细花，结实似南天竹子，至冬大红，子下缀可观。其托根多在陔兰之傍，虎茨之下，及岩壑幽深处。二三月分栽，乃点缀盆景必需之物也。

即以此文论，何遽不及《南方草木状》或《北户录》耶？

我初次见《花镜》是在一位族兄那里，后来承他以二百文卖给我，现在书已遗失，想起来是另一板本，与我所有者不同。他是一斋公的曾孙，杜煦序茹敦和《越言释》云：“周君一斋读而悦之，缩为巾箱本重梓单行，俾越人易于家置一编。”惜此本不可得，现在常见者也只有啸园重翻本罢了。章实斋《文史通义》板旧亦藏于其家，后由谭复堂斡旋移至杭州官书局，修补重印行世（见《复堂日记》），而李莼客日记中谓周某拟以章板刨去改刻时文，既于事实不合，且并缺乏常识矣。常闻有锯分石碑之传说，李君殆从这里想象出来的吧？

（廿三年三月）

□1934 年 4 月 2 日刊《华北日报》，暑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颜氏家训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这所说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原来只是史或子书，例如《世说新语》、《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颜氏家训》。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通行本二卷，我所有的有明颜嗣慎、吴惟明、郝之壁、程荣、黄嘉惠各刊本，清朱拭刊本，《四部丛刊》景印明冷宗元刊本，别有七卷本系从宋沈氏本出，今有知不足斋刊本，抱经堂注本，近年渭南严氏重刻本及石印本。注本最便读者，今有石印本尤易得。严氏将卢本补遗重校等散入各条注中，其意甚善，惜有误脱，不能比石印本更好也。

据《四库书目提要》说，《颜氏家训》在唐志宋志里都列在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这种升降在现在看来本无关系，而且实在这也不该列入儒家，因为他的思想比有些道学家要宽大得多，或者这就是所谓杂也未可知，但总之是不窄，就是人情味之所在，我觉得兼好法师之可喜者也就在此。卢召弓序云：

> 呜呼，无用之言，不急之辩，君子所弗贵。若夫六经尚矣，而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人有意于训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叠床架屋为哉。

对于《颜氏家训》的批评，此言可谓最简要得中。《提要》云：“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经训与否暂且不管，所谓世故人情也还说得对，因为这书的好处大半就在那里。直斋称为古今家训之祖，但试问有那个孙子及得他来，如明霍渭崖的《家训》简直是胡说一起，两相比较可知其优劣悬殊矣。

六朝大家知道是乱世，颜君由梁入北齐，再入北周，其所作《观我生赋》云，“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注谓已三为亡国之人，但是不二三年而又入隋，此盖已在作赋之后钦。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但是这也何足为病呢，别人的书所说无非也只是怎样苟全性命于治世而已，近来有识者高唱学问易主赶快投降，似乎也是这一路的意思罢。不过颜君是古时人，说的没有那么直截，还要蕴藉一点，也就消极得多了，这却是很大的不同。《教子》篇中末一则云：

>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日，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此事传诵已久，不但意思佳，文字亦至可喜。其自然大雅处或反比韩柳为胜。其次二则均在《风操》篇中，一云：

> 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摇舟诸，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

卢注云，“以不雨泣为密云，止可施于小说，若行文则不可用之，适成鄙俗

耳。”我想这亦未必尽然，据注引《语林》中谢公事，大约在六朝这是一句通行俗语，所以用人，虽稍觉古怪，似还不至鄙俗，盖全篇的空气均素雅也。又一云：

> 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

这两则都可以见颜君的识见，宽严得中，而文词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文中“章断注连”，卢本无注。查日本顺源在承平年中（九三一至七年）所编《倭名类聚抄》，调度部十四祭祀具七十下云注连，引云注连章断，注云师说注连之梨久倍奈波，章断之度大智。案之梨久倍奈波，日本古书写作端出之绳，《和汉三才图会》（原汉文）十九云，“神前及门户引张之，以辟不洁，其绳用稻藁，每八寸许而出本端，数七五三茎，左绚之，故名。”之度太智者意云断后，此语少见，今大抵训为注连同谊。此种草绳，古时或以圈围地域，遮止侵入，今在宗教仪式上尚保存其意义，悬于神社以防亵渎，新年施诸人家入口，则以辟邪鬼也。《家训》意谓送鬼出门，悬绳于外，阻其复返，大旨已可明白，至于章断注连字义如何解释，则尚未能确说耳。又《文章》篇中云：

>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独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意耳。
>
> 此是很古的诗话之一，可谓要言不烦，抑又何其“有情致”耶。后来作者卷册益多，言辞愈富，而妙悟更不易得，岂真今不如古，亦因人情物理难能会解，故不免常有所蔽也。

颜之推是信奉佛教的，其《养生》《归心》两篇即说此理，《四库书目提要》把这原因归之于当时风习，虽然原来意思亦是轻佛重儒，不过也还说得漂亮。朱轼重刊《家训》，加以评点，序文乃云：

> 始吾读颜侍郎家训，窃意侍郎复圣裔，于非礼勿视听言动之义庶有合，可为后世训矣，岂惟颜氏宝之已哉。及览《养生》《归心》等篇，又怪二氏树吾道敌，方攻之不暇，而附会之，侍郎实忝厥祖，欲以垂训可乎。

他自己所以“逐一评校，以涤瑕著微”，其志甚佳，可是实行不大容易。如原文云，“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便批云，“忽出悖语，可惜可惜，”不知好在何处，由我看去，岂非以百步笑五十步乎？且即就上述序文而言，文字意思都如此火气过重，拿去与《家训》中任何篇比较，优劣可知，只凭二氏树吾道敌这种意见，以笔削自任，正是人苦不自知也。我平常不喜欢以名教圣道压人的言论，如李慈铭的《越中先贤祠目》中序例八云：“王仲任为越士首出，《论衡》一书，千古谈助，而其立名有违名教，故不与”，这就是一例，不妨以俞理初所谓可憎一词加之。《国风》三卷十二期载有《醉馀随笔》一卷，系洪允祥先生遗著，其中一则云：

> 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

这却说得很有趣，李杜的比较我很赞同，虽然我个人不大喜欢豪放的诗文，对于太白少有亲近之感。柳较精博或者未必，但胜韩总是不错的，因为他不讲那些圣道，不卫道故不辟佛耳。洪先生是学佛的，故如此立言，虽有小偏，正如颜君一样亦是人情所难免，与右倾的道学家之咆哮故自不同。

《家训》末后《终制》一篇是古今难得的好文章，看彻生死，故其意思平实，而文词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陶渊明的《自祭文》与《拟挽歌辞》可与相比，或高旷过之。陶公无论矣，颜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难找得出了。篇中有云：

> 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尽忠信不辱其亲，所望于汝也。

朱笔于旁边大打其杠子，又批云，“语及内典，便入邪慝。”此处我们也用不着再批，只须把两者对比了看，自然便知。我买这朱批本差不多全为了那批语，因为这可以代表道学派的看法，至于要读《家训》还是以抱经堂本为最便利，石印亦佳，只可惜有些小字也描过，以致有误耳。（廿三年四月）

□1934 年 4 月 14 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甲行日注

《甲行日注》八卷，署名木拂纂，原刻在《荆驼逸史》内，民国二年刘承幹重刊，即《叶天寥年谱》下半部。天寥为明末江南名士，夫妇子女皆能文，三女小鸾早死最有名，全家著作合为《午梦堂集》十种，叶德辉有重刊本，又辑刻关于小鸾的文献为《疏香阁遗录》四卷，颇便读者。天寥自著《年谱》二卷，明亡以后隐于佛门，别为日记即《甲行日注》，起乙酉（一六四五）八月，迄戊子九月，凡三年馀。《午梦堂集》和《年谱》我都读过一遍，但最喜欢的还是这部日记，因为到了甲申他已是五十六岁，从前经过了好些恩爱的苦难，现在却又遇着真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他受了这番锻炼，除去不少的杂质与火气，所表现出来的情意自然更为纯粹了。虽然情形稍有不同，我觉得黄山谷的《宜州家乘》在这里似乎可以相比。《甲行日注》里所记的是明遗民的生活，所以第一显著的当然是黍离麦秀的感慨，而这里又特别加上种族问题，更觉得痛切了。如《日注》卷一记乙酉九月事云：

> 十七日乙丑，晴暖。宁初又来，云田园尚犹如故，室庐亦幸偷存，故乡风景则半似辽阳以东矣，但村人未吹芦管耳。

又卷六丁亥十二月云：

> 初九日乙亥，晴。晚间枯林戢响，斜月皎幽，东窗对影，一樽黯绝。颜子之乐自在箪瓢，予不堪忧者，家国殄瘁，岂能忘心。李陵所云，胡笳互动，边声四起，独坐听之，不觉泪下。

又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 三十日戊申，一盏黄昏，含愁卒岁，国破家亡，衣冠扫地，故国极目，楸陇无依。行年五十馀七，同刘彦和慧地之称，萧然僧舍，长明灯作守岁烛，亦可叹也。

民国癸丑五月刻本刘氏跋中乃云：“闻落叶而悲吟，听胡笳而不寐，拊心暗泣，举目皆非，地何愁而不埋，天胡为而此醉。回忆故园松竹，老屋琴书，未卜何日，重臻清境。人生罹亡国之惨者，类如是也。”

为天寥道人咏叹身世，本自不妨，但若“我田引水”，以同调自居，则大可笑，盖清朝“遗老”与明遗民其境况品格迥乎不同，决不可同日而语也。

日记中纪录当时乱离情状亦多可取。苏州不战而降，没有多大杀戮，但即其零星纷扰也含有重大意义，盖在这里可以看出民族的老病来。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 初二日庚辰，晴。过临平，零雨■飞，寒峰隐翠。遇虏运柴，舟人不解事，近之，我舟遂为所夺。非真虏也，即罗木营兵耳，放肆无忌。

又卷二丙戌二月云：

> 二十七日甲辰，细雨大风。时义兵飙起，皆闾左陇上耕佣，聚千人至我族索饷，不得则一炬焚之。……各予钱米乃止。时队伍未整，虏下索则又鸟鼠散，而平民罹之。

又四月云：

> 十六日壬辰，晴。义师去，忽安庄虏来，突入将书厨悉毁，简帙抛零满地，《午梦堂集》板碎以供■，愤余家贫而无物以逞恨也。人有识者，云半是山左诸公家丁所降，我德施而怨报矣。

《续年谱》记乙酉闰六月事云：“廿七日，山左宋玉仲玉叔王敬哉谢德修左萝石夫人挈家避难来投，家丁骁勇善弓马。……余为桑梓保障计，分宅居之，

族中亦相率授屋，各为居停。”前后相去，盖才十月也。

陈老莲出家号悔迟，丙戌年有《避难诗》一卷，现刻入《宝纶堂集》中，其《作饭行》序云：“山中日波波三顿，鬻图画之指腕为痛焉，儿子犹悲思一顿饭，悲声时出户庭，予闻之凄然，若为不闻也者。商絧思闻之，以米见饷，此毋望之福也，犹不与儿子共享毋望之福哉，乃作一顿饭，儿子便欢喜踊跃，歌声亦时出户庭。今小民苦官兵淫杀有日矣，犹不感半古之事功否。感赋。”诗末节云：

鲁国越官吏，江上逍遥师，
避敌甚畏虎，篦民若养狸。
时日易丧语，声闻于天知，
民情即天意，兵来皆安之。

差不多是同时候的事，可见江浙情形大略相似也。日记中尚有记当时士夫献媚事者，卷二丙戌十一月云：

二十八日庚午，晴。侄孙学山来言吾邑宴虏令之盛，笏豆肴核费至三十馀金，倍席赍从，伶人乐伎，华灯旨酒，俱不在内也。不知虞棕《食疏》中所载何物，耗金钱乃尔。国破民瘼之日，为此滥觞，贡媚腽肭。

又八月中记一事，则寄孤愤于谐趣也：

初二日乙亥，晴。佺往市墟。夜有穿窬，予曰，日来大盗聚党，白昼探丸，此犹昏夜胠发，何其行古之道欤？恨不如王彦方遗以布耳。

日记叙述隐居生活颇为详尽，今抄录数节，可以见其困穷与闲适之趣。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初七日乙酉，晴。夜金五云持酒一坛大蟹六只至。六人各食一蟹，馀已无他，亦自不俗也。

卷三丙戌十月云：

初六日戊寅，晴大风。……抵暮侍儿以烧栗十枚烘豆一握遗予下酒，寘几上去，而樵妪瓶油已罄，无可举灯，点火于枯竹片授予，予左手执竹片，右将倾壶，火忽灭，犹幸馀光未及暗尽，倚短窗下嚼四栗饮三瓯，暗中扪床而寝。

卷五丁亥三月云：

二十八日已巳，午晴。张婿迩求来，家止一臃肿仆，出外借米，厨无庋架，不能尽主人情，怅然送别。

小鸾字张氏，未嫁而卒，迩求仍执子婿礼甚恭，日记中曾称道之。又卷二丙戌二月云：

初十日丁巳，晴。初闻黄鹂声，犹忆离家日听雁声也。物换星移，动人感深矣。

卷三同年十月云：

二十八日庚子，阴风冷。茫茫烟景，催流短景。

文词华丽，意思亦不外流连景光，但出在遗民口中，我们也就觉得他别有一种感慨，不能与寻常等视。如卷六丁亥七月云：

十七日丙辰，晴风。夜中偶起，似可三更时分也。湫流薄岸，颓萝压波，白月挂天，苹风隐树。四顾无声，遥村吠犬，鱼棹泼刺，萤火乱飞，极夜景之幽趣矣。清言俪语，陆续而出，良由文人积习，无可如何，正如张宗子所说，虽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廿三年五月）

□1934 年 5 月 7 日刊《华北日报》，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江州笔谈

从小时候就在家里看见一部《巴山七种》，无事时随便翻看，三十年来不知道有几次了，及今才知其妙。书有同治乙丑（一八六六）序，木刻小本，纸墨均劣，计《皇朝冠服志》二卷，《治平要术》一卷，《衡言》四卷，《放言》二卷，《江州笔谈》二卷，《白岩文存》六卷，《诗存》五卷，共二十二卷，云有《治官记异》及《字通》二书已先刊行，则未之见。著者为栖清山人王侃，《文存》卷四有自撰墓志，知其字迟士，四川温江人，以贡授州判不就，撰文时为咸丰辛酉称行年六十有七，计当生于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也。墓志自称“ 山人喜事功，不解渊默，心存通脱，死生不以置怀，何有名利。其为人直口热肠，又性卞急，以故于时不合，然与人无町畦，人亦不忍相欺云。 ”又云“ 良恨前后执政庸庸，不能统天下大计，建言变法，以致世局日坏 ”，可见在那时也是一个有心人。但是我所觉得有意思者，还在他对于一般事物的常识与特识，这多散见于笔记中，即《衡言》《放言》与《江州笔谈》。据他在墓志里说：“ 随时自记其言，论古者可名《衡言》，谈时事者可名《放言》，一听后人分部统名《笔谈》 ”，其实内容大略相似，随处有他的明达的识见。

《江州笔谈》大约是在江津所记，因为较是杂记性质，所以拿来权作代表，其二言所谈及者便即附列在内。栖清山人论小儿读书很有意思，《笔谈》卷上云：

> 读书理会笺注，既已明其意义，得鱼忘筌可也，责以诵习，岂今日明了明日复忘之耶。余不令儿辈读章句集注，盖欲其多读他书，且恐头巾语汩没其性灵也，而见者皆以为怪事，是希夷所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毋于周孔注脚下盘旋者非也。

卷下又云：

> 教小儿，不欲通晓其言而唯责以背诵，虽能上口，其究何用。况开悟自能记忆，一言一事多年不忘，传语于人莫不了了，是岂再三诵习而后能者耶。

《衡言》卷一亦有一则可以参考，文云：

> 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寻绎其义，不过数语可了，有似故为艰深者。不知当时之民何以能解,岂一时文体所尚如是乎,抑果出于下吏之手乎？授小儿强读之，徒形其苦，未见其益。

山人又痛恶八股文字，《笔谈》卷上云：

> 唐宋金石文字间用左行，字大小斜正疏密不拘，署衔名长短参差有致，虽寥寥数语，出自巷曲细民，文理亦行古雅。今之碑板文既陋劣，语言名称尤甚不伦，良由独习进取之文，不暇寻古人门径。独惜土木之工壮丽称于一时，而文不足传后，千载下得不笑今世无人耶。

又云：

> 诗以言情，感于所遇，吐露襟怀，景物取诸当前，何假思索。若本无诗情而勉强为诗，东抹西涂，将无作有，即得警句亦不自胸中流出，况字句多疵，言语不伦耶。至以八股之法论诗，谓此联写题某处，此句写题某处。岂知古人诗成而后标出作诗之由，非拟定此题然后执笔为诗。梦梦如是，无怪人以作诗为难；亦犹人皆可为圣贤，自道学书连篇累牍，言心言性，使人视为苦事，不敢有志圣贤也。

又云：

文之最难者无如八股，故虽以之名家，其一生不过数艺可称合作，然置之场屋不必能取科名，取科名者亦不必皆佳，而皆归于无用，昌黎所谓虽工于世何补者，尚足以记载事物称颂功德也。今捐班有诗字画皆能而独不通八股者，以其能取科名，不敢轻视，倘或知其底里，恐不愿以彼易此也。

《放言》卷上云：

执笔行文所以达意，不但不能达意，而并无意可达，徒将古人陈言颠倒分合，虚笼旁衬，欲吐还吞，将近忽远，作种种丑态，争炫伎俩，而犹以为代圣贤立言，圣贤之言尚不明了而待此乎。又况登第之后日写官板楷书，得入翰林，亦第以诗赋了事，今世所谓读书人者止此。不解韬钤，不明治术，而又拘于宦场习套，庸庸自甘，安得贤豪接踵，将此辈束之高阁也。

又云：

农谈丰歉，工谈巧拙，商谈赢绌，宜也。士之为士，只宜谈八股乎？求进取不得不习八股，既已仕矣，犹不可废之乎？秦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今尚八股以愚黔首，愚则诚愚矣，其如人才不竞，不能以八股灭贼何？

其对于武人亦大不敬，《放言》卷上云：

服物采章以表贵贱，然异代则改，异域顿殊，一时一地之荣，何足为重。今饰功冒赏，冠多翘翘，蓝翎倍价而不可得，貂可续以狗尾，此则将何为续？当此之时，犹复奔竞营求，抑知无贼之地固可拗项自雄，一旦遇贼，惧为所识，又将拔之唯恐不及乎？

卷下又云：

军兴以来，州县官募勇，先挑围队自卫。此辈近官左右，习于趋跄应对，自矢报效，有似敢死。一旦遇贼，借事先逃，给口便言，官犹信其无贰，此与孙皓左右跳刀大呼决为陛下死战，得赐便走者何异。然皓犹出金宝为赐，不似今日但赏功牌遂欲人致死也。

语涉时事，遂不免稍激昂，却亦有排调之趣。但我更喜欢他别的几条，意思通达而明净，如《笔谈》卷上论薄葬云：

周主郭威遗命纸衣瓦棺以葬，至今要与厚葬者同归于尽。回人好洁，葬法有衾无衣，有椁无棺，血肉时化入土。余生无益于人，死亦不欲有害于人，安得负土而出之石，掘土数尺，凿空足容吾身，即石面大书刻曰栖清山人王侃之藏，死时襚以布衣，纳入其中，筑土种豆麦如故，但取古人藏其体魄勿使人畏恶之意，虽于礼俗未合，亦非无所师法也。

又《衡言》卷三云：

习俗移人，聪明才智之士苟无定见，鲜不随风而靡。长乐老历事四姓，亦以其时不尚气节，故反以为荣耳。使其生于南宋，道学中未必无此人也。

此外还有好些好意思，不过引用已多，大有文抄公的嫌疑，所以只好割爱了。

就上面所抄的看去，可以知道他思想的大略，这虽然不能说怎么新奇，却难得那样清楚，而且还在七八十年前，有地方实在还比现在的人更是明白。现在有谁像他那样的反对读经做八股呢？《巴山七种》随处多有，薄值可得，大家破工夫一读，其亦不无小补欤。（廿三年六月）

□1934 年 6 月 16 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五 杂 组

谢在杭的著作除《史■》外，我所见的都是日本翻刻本，如《五杂组》刻于宽文辛丑（一六六一），《文海披沙》在宽延庚午（一七五〇），《麈馀》在宽政戊午（一七九八），《小草斋诗话》则在天保辛卯（一八三一），距宽文时已有百七十年了。小草斋论诗大抵是反钟谭而崇徐李，我也看不出他的好处来。《麈馀》全是志异体，所记的无非什么逆妇变猪之类而已，我买来一读完全为的是谢在杭名字的缘故。《文海披沙》见于《四库存目》，焦竑序中云：“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属余为序”，可知当时曾有刊本，而世少流传，《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七所举亦根据写本，清季《申报》馆重印则即用日本刻为底本，其《续书目》中缕馨仙史提要云：“唯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然则鸡林贾人之购《长庆集》不得专美于前矣。”恐或有误。关于此书，《四库提要》及《读书记》大加轻诋，焦竑陈五昌二序又备极称扬，其实都要打个折扣。在许多笔记中这原是可读的一部，不过也并没有多少独自的特色，比起《五杂组》来就难免要落后尘了。

《五杂组》十六卷，前有李本宁序，却没有年月。原书卷九云：“物作人言，余于《文海披沙》中详载之。”今案《文海披沙》有万历辛亥（一六一一）序，则成书当在此后。卷五云，“大同中翰马呈德其内人孕八岁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发长尺许，今才三岁，即能诵诗书如流。”计其记此文时当在万历壬子，但卷三又云，“万历辛丑四月望日与崔徵仲孝廉登张秋之戊己山”，则又系隔岁事。大抵在此几年中陆续所记，而在万历末年所编成者欤。全书分五部，凡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物部事部各四卷。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乃是物部，物类繁多，易引人注意，随处随事可见格物工夫，博识新知固可贵重，即只平常纪叙，而观察清楚，文章简洁，亦复可诵。写自然事物的小文向来不多，其佳者更难得。英国怀德（GilbertWhite）之《自然史》可谓至矣，举世无匹。在中国昔日尝有段柯古的《酉阳杂俎》，其次则此《五杂组》。此二者与怀德书不能比较，但在无鸟之乡此亦蝙蝠耳。在杭与柯古均好谈异，传说和事实往往混淆，然而亦时好奇喜探索，便能有新意，又善于文字，皆其所长也。《五杂组》卷九记海滨异物云：

> 龙虾大者重二十馀斤，须三尺馀，可为杖。蚶大者如斗，可为香炉。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滨人习见，不足为异也。

又记南方虫蠹云：

> 岭南屋柱多为虫蠹，入夜则啮声刮刮，通夕搅人眠，书籍蟫蛀尤甚。故其地无百年之室，无五十年之书，而蛇虫虺蜴纵横与人杂处，著依稀蛮獠之习矣。

又记小虫二则云：

> 山东草间有小虫，大仅如沙砾，嚙人痒痛，觅之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闽中亦有之，俗名没子，盖乌有之意也，视山东名为佳矣。
>
> “浙中郡斋尝有小虫，似蛚蠨而小如针尾，好缘纸窗间，能以足敲纸作声，静听之如滴水然，迹之辄跃，此亦焦螟之类欤。案《元氏长庆集》虫豸诗之五为《蟆子》，序云，“蟆，蚊类也，其身黑而小，不碍纱縠，夜伏而昼飞，”盖即没子欤。今北平有白蛉亦相类，但白而不黑耳。又《续

博物志》云，“有小虫至微而响甚，寻之不可见，号窃虫。”日本亦有之，云似蚜虫，身短小，灰黄色，头部较大而颚尤强大，住于人家，以颚摩门窗，发声沙沙如点茶，故名点茶虫，又称洗赤豆虫，英国则称之为送终虫（Deathwatch），民间迷信如闻此虫声，主有人死亡云。读在杭小文乃极潇洒可喜，唯比之焦螟亦未免嗜奇之过，至论命名之有风致则殆无过于日本矣。

卷九记燕市食物云：

>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无所有，鸡鹅羊豕之外，得一鱼以为稀品矣。越二十年，鱼蟹反贱于江南，蛤蜊银鱼，蛏蚶黄甲，累累满市。此亦风气自南而北之证也。

卷十一记青州食物云：

> 青州虽为齐属，然其气候大类江南，山饶珍果，海富奇错。林薄之间，桃李楂梨，柿杏苹枣，红白相望，四时不绝。市上鱼蟹腥风逆鼻，而土人不知贵重也，有小蟹如彭越状，人家皆以喂猫鸭，大至蜣螂黄甲，亦但腌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居之，使山无遗利，水无遗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

又卷九论南人口食云：

> 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鸡虾蟆其实一类，闽有龙虱者飞水田中，与灶虫分毫无别，又有土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燕齐之人食蝎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门人家取草虫有子者炸黄色入馔，余诧之，归语从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蚰子，缙绅中尤雅嗜之。然余终不敢食也。则蛮方有食毛虫蜜唧者又何足怪。

清王侃在《江州笔谈》卷下亦有关于这事的一节话：

> 北人笑南人口馋，无论何虫随意命名即取啖之，以余所见，大约闽人尤甚。然天下有肉无毒者无不可食，虫豸之类蠕然而肥，得脱于人口者，必其种类太少，不足以供大嚼。不然，如九香虫（案即上文所云龙虱）者，水涸丛聚江石下，泄气令人掩鼻，入釜中以微火烘之，泄气既尽，遂觉香美，使人垂涎，舟人以一钱易数十枚呷酒，小儿亦喜食之，其他蜣螂蚱蜢之属亦皆香美。然则欲不为人所食，必小如蚊虻蚍蜉而后可。

二文皆平正可喜，谢云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王云天下有肉无毒者无不可食，语益精要，由此言之，口食异同亦殊不足论矣。我们所想知道的是何种虫豸何法制作是何味道，而此可食及诸不可食的虫豸其形状生活为何，亦所欲知，是即我们平人的一点知识欲，然而欲求得之盖大不易，求诸科学则太深，求之文学又常太浮也。此类文艺趣味的自然史或自然史趣味的文集本来就该有些了，现在既不可得，乃于三百年前求之，古人虽贤，岂能完全胜此重任哉。我们读《五杂组》，纵百稗而一米，固犹当欢喜赞叹，而况所得亦已不少乎。

（廿三年六月）

□1934 年 6 月 30 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文饭小品

民国初年我在绍兴城内做中学教师，忽发乡曲之见，想搜集一点越人著作，这且以山阴会稽为限。然而此事亦大难，书既难得，力亦有所未逮，结果是搜到的寥寥无几，更不必说什么名著善本了。有一天，在大路口的一家熟识的书摊里，用了两三角钱买到一本残书，这却很令我喜欢。书名《谑庵文饭小品》，山阴王思任著，这只是卷三一册，共九十四叶，有游记二十二篇。王思任是明末的名人，有气节有文章，而他的文章又据说是游记最好，所以这一册虽是残佚，却也可以算是精华。其中有《游西山诸名胜记》，《游满井记》，《游杭州诸胜记》，《先后游吾越诸胜记》，都是我所爱读的文章。如《游杭州诸胜记》第四则云：

> 西湖之妙，山光水影，明媚相涵，图画天开，镜花自照，四时皆宜也。然涌金门苦于官皂，钱塘门苦僧，苦客，清波门苦鬼。胜在岳坟，最胜在孤山与断桥。吾极不乐豪家徽贾，重楼架舫，优喧粉笑，势利传杯，留门趋入。所喜者野航两棹，坐恰两三，随处夷犹，侣同鸥鹭，或柳堤鱼酒，或僧屋饭蔬，可信可宿，不过一二金而轻移曲探，可尽两湖之致。

又《游慧锡两山记》云：

> 越人自北归，望见锡山，如见眷属。其飞青天半，久暍而得浆也，然地下之浆又慧泉首妙。居人皆蒋姓，市泉酒独佳，有妇折阅，意闲态远，予乐过之。买泥人，买纸鸡，买木虎，买兰陵面具，买小刀戟，以贻儿辈。至其酒，出净磁，许先尝论值。予丐冽者清者，渠言燥点择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沈丘壑曰，若使文君当垆，置相如何地也。

谑庵孙田锡于卷头注曰，“口齿清历，似有一酒胡在内，呼之或出耳。”《游西山诸名胜记》中述裂帛湖边一小景云：

> 有角巾遥步者，望之是巢必大。仲容目短，大然曰，是是，果巢必大也，则哄唤之。必大曰，王季重哉，何至此？入山见似人而喜也。至则共执其臂，索酒食，如兵番子得贼者。必大叫曰，无梏我，有有有。耳语其僮，速速。必大予社友，十六岁戊子乡荐，尊公先生有水田十顷，在瓮山，构居积谷，若眉坞，可扰。不二时，酒至，酒且薏，肉有金蹄，有脍，有小鱼鳞鳞，有馎饦，有南笋旧芥撇兰头，豉酱称是。就堤作灶，折枯作火，挥拳歌舞，瓶之罄矣。必大张其说曰，吾有内酝万瓶，可淹杀公等许许，三狂二秃何足难。邀往便往，刑一鸡，摘蔬求豕。庄妇村中俏也，亟治庖。又有棋局，一宵千古。

又《雁荡记》起首云：

> 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事事俱糖担中物，不然则盘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

以上几节文章颇可以代表谑庵的作风，其好处在于表现之鲜新与设想之奇辟，但有时亦有古怪难解之弊。他与徐渭、倪元璐、谭元春、刘侗，均不是一派，虽然也总是同一路，却很不相同，他所独有的特点大约可以说是谑罢。以诙谐手法写文章，到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值得我辈的赞叹，不过这是降龙伏虎的手段，我们也万万弄不来。古人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谑庵的文集上也该当题上这两句话去。

王季重的九种十一种后来在图书馆里也看到过，但是我总不能忘记《文饭小品》。今年春天在北平总算找到一部，据说是从山东来的，凡五卷，谑庵子鼎起跋称戊戌，盖刻于顺治十五年也。卷一为致词、尺牍、启、表、判、募疏、赞、铭、引、题词、跋、纪事、说、骚、赋。卷二为诗，内分乐府、风雅什、诗、诗馀、歌行，末附《悔谑》，计四十则，鸿宝《应本》中有一序，今未收。卷三、四为记与传。卷五则为序、行状、墓志铭、祭文，以《奕律》四十条附焉。据余增远序中云：

“向其所刻，星分棋布，未归一致，乃于读书佳山水间手自校雠，定为六十卷，命曰《文饭》，雕几未半，而玉楼召去，刻遂不成。”此五卷盖鼎起所选，其跋云：

> 蓄志成先君子《文饭》而制于力，勉以小品先之。而毁言至，曰，以子而选父，篡也；以愚而选智，诞也；以大而选小，舛也。似也，然《易》不云乎？八卦而小成，则大成者小成之引伸也。智者千虑，不废愚者之一得。父子之间，外人那得知，此吾家语也。吾第使天下先知有《文饭》，饥者易为食而已。知我罪我，于我何有哉。

宋长白于康熙乙酉著《柳亭诗话》，卷二十九有《倪王》一条云：

> 明末诗文之弊，以雕琢小巧为长，篠骖飙犊之类万口一声。吾乡先正如倪文正鸿宝、王文节季重皆名重一时，《代言》、《文饭》，有识者所共见矣。至其诗若倪之“曲有公无渡，药难王不留”，王之“买天应较尺，赊月不论钱”，歇后市语，信手拈来，直谓之游戏三昧可耳。歇后市语迥异篠骖之类，长白即先后自相矛盾，至其所谓《文饭》殆即《文饭小品》，盖《文饭》全集似终未刊行也。王鼎起以选本称为小品，恰合原语本义，可为知言，又其跋文亦殊佳，可传谑庵的衣钵矣。知父莫若子，他人欲扬抑谑庵者应知此理焉。

张岱著《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立言文学类中列王思任像之后幅文曰：

> 王遂东，思任，山阴人。少年狂放，以谑浪忤人。官不显达，三仕令尹，乃遭三黜。所携宦橐游囊，分之弟侄姊妹，外方人称之曰，王谑庵虽有钱癖，其所入者皆出于称觞谀墓，赚钱固好而用钱为尤好。赞曰：
>
> 拾芥功名，生花彩笔。以文为饭，以弈为律。
>
> 谑不避虐，钱不讳癖。传世小题，幼不可及。
>
> 宦橐游囊，分之弟侄。孝友文章，当今第一。

李慈铭批云：

> 遂东行事固无甚异，然其风流倜傥，自是可观，与马士英书气宇峰举，犹堪想见。若其诗文打油滑稽，朱氏谓其钟谭之外又一旁派，盖邪魔下乘，直无足取。此乃表其钱癖，而赞又盛称其文章，皆未当也。唯郡县志及《越殉义传》、邵廷采《思复堂集》、杜甲《传芳录》、温睿临《南疆佚史》诸书皆称遂东为不食而死，全氏祖望《鲒埼亭外集》独据倪无功言力辨其非死节，陶庵生与相接而此赞亦不言其死，可知全氏之言有征矣。

李氏论文论学多有客气，因此他不但不能知道王谑庵的价值，就是张宗子的意思也不能懂得了。宗子此赞又见《琅嬛文集》中（光绪刻本卷五），其“谑不避虐，钱不讳癖”二句盖其主脑，宗子之重谑庵者亦即在此。文集卷四有《王谑庵先生传》，末云：

“偶感微疴，遂绝饮食，僵卧时常掷身起，弩目握拳，涕洟鲠咽，临瞑

连呼高皇帝者三，闻者比之宗泽濒死三呼过河焉。”此与《文饭小品》唐九经序所云：

惟是总漕王清远公感先生恩无以为报，业启□□贝勒诸王（案纸有腐蚀处缺字，下同）将大用先生，先生闻是言愈踽踽无以自处，复作手书遗经曰，我非偷生者，欲保此肢体以还我父母尔，时下尚有□谷数斛，谷尽则逝，万无劳相逼为。迨至九□□初，而先生正寝之报至。呜呼，屈指其期，正当殷谷既没周粟方升之始，而先生□□□逝，迅不逾时，然则先生之死岂不皎皎与日月争光，而今日之凤林非即当年之首阳乎。

语正相合。盖谑庵初或思以黄冠终老，迨逼之太甚，乃绝食死。又邵廷采《明侍郎遂东王公传》引徐沁《采薇子像赞》云：

“公以诙谐放达，而自称为谑，又虑愤世嫉邪，而寻悔其虐。孰知嬉笑怒骂，聊寄托于文章；慷慨从容，终根柢于正学。”当时“生与相接”者之言悉如此，关于其死事可不必多疑，惟张宗子或尤取其谑虐钱癖二事，以为比死更可贵，故不入之立德而列于立言，未可知也。《王谑庵先生传》中叙其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从事，末乃云：

“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虐》，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倪鸿宝《应本》卷七有序文亦称《悔虐》，而《文饭小品》则云《悔谑》，其所记在今日读之有稍费解者，康熙时刻《山中一夕话》卷六曾采取之，可知其在当时颇为流行矣。传后论云：

“谑庵先生既贵，其弟兄子侄宗族姻娅，待以举火者数十馀家，取给宦囊，大费供亿，人目以贪，所由来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赚钱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钱极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无不称以孝友文章，盖此四字唯先生当之则有道碑铭庶无愧色，若欲移署他人，寻遍越州，有乎，无有也。”陶元藻《全浙诗话》卷三十五云：

“遂东有钱癖，见钱即喜形于色，是日为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强半皆谀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给姻族，或宴会朋友，可顷刻立尽，与晋人持筹烛下溺于阿堵者不同，故世无鄙之者。”陶篁村生于乾隆时，去谑庵已远矣，其所记如此，盖或本于故老流传，可与宗子所说互相印证。叶廷琯《鸥波渔话》云：

字画索润，古人所有。板桥笔榜小卷，盖自书书画润笔例也，见之友人处，其文云：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属书谢客，板桥郑燮。”

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口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乎。

板桥的话与篁村所说恰合，叶调生的评语正亦大可引用，为谑庵张目也。

李越缦引朱竹垞语，甚不满意于谑庵的诗文，唯查《静志居诗话》关于谑庵只是“季重滑稽太甚有伤大雅”这一句话，后附录施愚山的话云：

“季重颇负时名，自建旗鼓，其诗才情烂漫，无复持择，入鬼入魔，恶

道垒出，钟谭之外又一旁派也。”盖即为李氏所本。其实这些以正统自居者的批评原不甚足依据，而李氏自己的意见前后亦殊多矛盾，如上文既说其风流倜傥自是可观，在《越中先贤祠目》序例中又云风流文采照映寰宇，可是对于诗文却完全抹杀，亦不知其所谓风流文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李氏盛称其致马士英书，以为正义凛然，书亦见邵廷采所著传中，但似未完，今据张岱所著传引录于下：

阁下文采风流，吾所景羡。当国破众散之际，拥立新君，阁下辄骄气满腹，政本自由，兵权在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门户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致令乘舆迁播，社稷丘墟，观此茫茫，谁任其咎。职为阁下计，无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之士尚尔相原。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抢地，以召豪杰。乃今逍遥湖上，潦倒烟霞，效贾似道之故辙，人笑褚渊齿已冷矣。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职当先赴吾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此书出，触怒阁下，祸且不测，职愿引领以待鈇鑕。

此文价值重在对事对人，若以文论本亦寻常，非谑庵之至者，且文庄而仍“亦不废谑”，如王雨谦所评，然则李氏称之亦未免皮相耳。今又从《文饭小品》卷一抄录《怕考判》一篇，原文有序，云：

督学将至，姑熟棚厂具矣，有三秀才蕴药谋爇之，逻获验确，学使者发县，该谑庵判理具申：

“一炬未成，三生有幸。欲有谋而几就，不待教而可诛。万一延烧，罪将何赎；须臾乞缓，心实堪哀。闻考即已命终，火攻乃出下策。各还初服，恰遂惊魂。”

二文一庄一谐，未知读者何去何从，不佞将于此观风焉。唯为初学设想，或者不如先取致马阁老书，因其较少流弊，少误会，犹初学读文章之宁先《古文析义》而后《六朝文絜》也，但对于《怕考判》却亦非能了解不可，假如要想知道明末的这几路的新文学与其中之一人王谑庵的人及其文章。至于自信为正统的载道派中人乃可不必偏劳矣，此不特无须抑住怒气去看《怕考判》了，即致马士英书亦可以已，盖王谑庵与此载道家者流总是无缘也。

□1934 年 8 月刊《人间世》9 期，署名岂明
□收入《夜读抄》

煮药漫抄

永井荷风随笔集《冬天的蝇》中有一篇文章题曰《十九岁的秋天》，记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他十九岁时住上海的事，末题甲戌十月记，则已是五十七岁了。起首处云：

> 就近年新闻纸上所报道的看去，东亚的风云益急，日华同文的邦家也似乎无暇再订善邻之谊了。想起在十九岁的秋天我曾跟了父母去游上海的事情，真是恍有隔世之感。
>
> 在小时候，我记得父亲的书斋和客房的壁龛中挂着何如璋叶松石王漆园这些清朝人所写的字幅。盖父亲喜欢唐宋的诗文，很早就与华人订文墨之交也。
>
> 何如璋是清国的公使，从明治十年（一八七七）顷起，很久的驻扎在东京。
>
> 叶松石也是在那时候被招聘为外国语学校教授的最早的一个人，曾经一度归国，后再来游，病死于大阪。遗稿《煮药漫抄》的头上载有诗人小野湖山所作的略传。
>
> 每年到了院子里的梅花将要散落的时候，客房的壁龛里一定挂起何如璋挥毫的东坡的绝句，所以到了老耄的今日，我也还能暗诵左记的二十八字：
>
> 梨花浅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
> 惆怅东栏一树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
> 何如璋这人大约很见重于明治的儒者文人之间，在那时候，刊行的日本人的诗文集里，几乎没有不载何氏的题字或序以及评语的。

《煮药漫抄》我很有运气得到了两本，虽然板本原是一个，不过一是白纸一是黄纸印的罢了。此书刻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去今不远，或者传布不多，故颇少见。书凡两卷，著者叶炜号松石，嘉兴人。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受日本文部省之聘，至东京外国语学校为汉文教师，时为明治七年，还在中国派遣公使之前。光绪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夏重游日本，滞大阪十阅月，辛已暮春再客西京，忽患咯血，病中录诗话，名之曰《煮药漫抄》者，纪实也。小野湖山序之云：

> 余向闻其婴病，心窃悯之。顷者福原公亮寄示《煮药闲抄》一册云：是松石病中所录，以病不愈去，临去以属余者，海涛万里，其生死未可知，子其序之。余见书名怆然，读小引益悲，因思公亮之言则复不胜潸然也。

据此可知荷风所云病死于大阪的话不确，卷末松石识语时在乙酉（一八八五），前有朱百遂庚寅（一八九〇）序，松石正在江宁，“隐于下僚”也。松石以诗人东游，比黄公度还早三年，乃《漫抄》中了不说及日本风物，只有一二人名而已。湖山翁叙其再来时事云，“流寓平安浪华间，身外所赍，破砚残毫耳。”今阅诗话，不免惜其稍辜负此笔砚，未能如黄君之多拾取一点诗料回来也。

何如璋是中国派赴日本的第一任使臣，黄公度就是跟了他做随员去的。《日本杂事诗》后有石川英的跋，其一节云：

> 今上明治天皇十年（光绪三年），大清议报聘，凡汉学家皆企踵相望，而翰林院侍讲何公实膺大使任。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

户外屨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荷风所云见重于儒者文人之间大约也是事实。但是前后不过七八年，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中法之役，何如璋在福建与其事，冈千仞在《沪上日记》（《观光纪游》卷四）中纪之曰：

> 八月二十八日曾根俊虎来，日明日乘天城舰观福州战迹，因托木村信卿所嘱书柬寄何子峨。信卿坐为子峨制日本地图下狱，冤白日子峨已西归，故嘱余致意子峨。何意此战子峨管造船局，当战发狼狈奔窜，为物论之所外。人间祸福，何常之有，为之慨然。

又曰：

> 九月十八日闻曾根氏归自福州，往见问战事。曰，法将孤拔将六舰进战，次将利士卑将五舰在后策应，事出匆卒，万炮雷发。中兵不遑一发炮，死伤千百，二将奏全捷，徐徐率诸舰出海口。战后二旬，海面死尸无一检收者，洋人见之曰，殆无国政也。问何子峨，曰，造船局兵火荡然，见子峨于一舍，颜无人色。其弃局而遁，有官金三十万，为溃兵所攫去，其漫无纪律概类是。

文人本来只能做诗文，一出手去弄政事军务，鲜不一败涂地者。岳飞有言，天下太平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我觉得现在的病却是在于武人谈文，文人讲武。武人高唱读经固无异于用《孝经》退贼，文人喜纸上谈兵，而脑袋瓜儿里只有南渡一策，岂不更为何子峨所笑乎。（七月）

□1934 年 9 月刊“ 北新 ”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竹杂记》

百廿虫吟

《百廿虫吟》一卷，道光甲申（一八二四）年刊，平湖钱步曾著，末附诸人和作一卷，凡九十七首。本来咏物之作没有多大意思，其枯窘一点的题目，往往应用诗钟的做法，只见其工巧而已，此外一无可取。但是对于这一册我却别有一种爱好：难得这百二十章诗都是咏虫的，虽然把刺猬与虾蟆之流也都归入虫豸类里未免稍杂乱，总之是很不容易的了。其次是他不单是吟咏罢了，还有好些说明，简单地叙述昆虫的形状，而有些虫又是平常不见著录的，儿时在乡间戏弄大抵都见识过，然而《尔雅》不载，《本草》不收，有的简直几千年来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姓名。著者自序云：

“盈天地间皆物也，而其至纷赜至纤细者莫如昆虫。有有其名而罕觏其物者，有有其物而未得其名者，有古之名不合于今者，有今之名不符于古者，有同物而异名者，有同名而异物者，分门别类，考究为难。暇日无事，偶拈小题，得诗百馀首，补《尔雅笺疏》之未备，志《齐民要术》所难周，蠕动蜎飞，搜罗殆略尽矣。明识雕虫末技，无当体裁，或亦格物致知之一助云尔。”他的意见我觉得很不错，格物致知也说得恰好，不比普通道学家的浮词浪语。所可惜者只是记的太少，若是每种都有注，可以钞成一卷《释虫小记》，那就大有益于格物之学了。

我这所谓格物可以有好几种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其次是从这些记录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问题的参考。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是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违反生物的原则，却想多少加以节制，这便成了所谓文明。但是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放纵，利用理智来无理的掩饰，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例如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是也。我们观察生物的生活，拿来与人生比勘，有几分与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去了：这样的时常想想，实在是比讲道学还要切实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义的事。

生物的范围很广，无一不可资观察，但是我仿佛偏重虫豸者，这大抵由于个人的爱好，别无什么大的理由。鳞介沉在水底里，鸟在空中高飞，平常难得遇见，四脚的兽同我们一样的地上走着，我却有点嫌他们笨重，虽然也有鼬类长的像是一条棒，也有象和麒麟的鼻子、脖子那么出奇的长，然而压根儿就是那一副结构，到底也变化不到什么地方去。至于虫豸便十分复杂了，那些样子既然希奇古怪，还有摇身一变以至再变的事情，更有《西游记》的风味，很足以钓住我们非科学家的兴趣。再说儿时的经验里，因为虫豸的常见与好玩，相识最多也最长久，到后来仍旧有些情分。至于法勃耳（J.H.Fabre）的十卷《昆虫记》所给我们的影响，那或者也是一个颇大的原因，可是如今只好附加在这末后了。

野马似乎跑得太远一点了。《百廿虫吟》是专咏昆虫的，想叫他负上边所说的那种责任当然不大可能，但是注意到这些虫而且又有这许多，又略有所说明，这是很难得的。讲到诗，咏物照例是七律，照例以故典巧搭为事，如《蝇虎》颈联云：“百年傲骨教谁吊，终古谗人向此投”，是最好的一例，虽然有读者朱批云“激昂感慨”，却总不能令人感到蝇虎之为物，只是蝇与虎的二字的搬弄而已。其小注多可喜，有些昆虫还都未见记载，所以更觉得

有意思。如第二十九《算命先生》云：

算命先生亦蜘蛛之属，体圆如豆，足细而长，不能吐丝，好居丛草中及古墙脚下。儿童捕得之，戏摘其足置地上，伸缩逾时方已，谓之算命。俗因名为算命先生，遍查类书无有载是物者。

又第四十二《灰蚱蜢》云：

灰蚱蜢有两种。一种名舂箕，身有斑点，两股如玳瑁，红痕殷然，飞可数步。一种名石蟹，纯褐色，短小精悍，翼端有刺，善跳跃而不能飞，其生最早，踏青时已有之。

《本草纲目》虽有灰蚱蜢一项，但语焉不详，不及此远甚。所云名舂箕的一种，疑是尖头的，越中有尖头蚱蜢，绿色亦有灰色者，小儿执其后足下部，以一手撷其尖头，则颠顿作磬折状，歌云，“我给你梳头，你给我舂米”，俗称之曰舂（读若磉）米郎。第四十六云《棺材头蟋蟀》，无小注而只有诗，词云：

月额红铃几度猜，头衔猜不到棺材。
未蒙相国图经载，直讶将军舆榇来。
秋草依栖燐影乱，荒坟酬答鬼吟哀。
诸君力斗终何益，顾此形模百念灰。

此虫越中多有之，称棺材头蛐蛐，形如普通蟋蟀，头作梅花式，稍前倾，状丑名恶，见者憎且忌，随即打杀，亦不知其能斗否或鸣声如何也。小儿秋间多捕促织玩养，无不知棺材头蛐蛐者，而未见著录。方旭著《虫荟》，其昆虫一卷虽有二百十九种，范寅著《越谚》卷中虽录有牛蜻蛚（俗呼牛唧呤，即油胡卢），亦均未收此虫。又第四十九《赃蜋》注云南：

蟑蜋见吴府志，而蟑字无考。近阅《谭子雕虫》一书，载行夜俗呼赃蜋，市语谓臭秽之物为赃东西，故恶而名之。形类蚕蛾而瘦，腹背俱赤，光滑似油染，两翅能飞，亦不甚远，喜灯火光，辄夜行。其体甚臭，其屎尤臭。本生草中，八九月入人家，壁间灶下，聚至千百，凡器物着之俱不堪向迩。能入蜂匣中食蜂蜜罄尽，养蜂者尤忌之。又赃蜋花生阴湿地，长二尺馀，至秋乃花，花开于顶，似凉伞然，瓣末微卷，有长须间之，作深红色，月馀方萎。俗谓供此花能辟赃蜋，然试之亦不甚验。

关于赃蜋，《春在堂随笔》卷八有一条考证颇详，唯此记亦殊有致，末说到赃蜋花也有意思，此即石蒜，日本称之曰死人花、彼岸花、曼殊沙华，亦不知是何缘故也。第一百七《水马》云：

《本草》：水黾亦名水马，长寸许，群行水上，水涸即飞去。《五杂组》：水马逆流而跃，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儿童捕之辄四散奔迸，唯嗜蝇，以发系蝇饵之，则擒抱不脱。一名写字虫，因其急走水面，纵横如直画。《列子》云商蚷驰河，盖谓此也，今我乡呼为水蜘蛛者是。又一种枯瘠如柴杆，贸贸然游行水上。若有知若无知，不知何名。

第百十《虾鳖》云：

水鳖状略似地鳖，其色青，渐老则变为黑，四五月间登陆，坼背化为蝉。

虾鳖状如伊威，好寄居长须君颊辅间，臃肿如瘤，与水鳖截然二物，前人类书多误混为一。

又第百十一《水蛆》云：

《蟫史》载水蛆一名蚩虫，生积水中，屈伸反覆于水，长二三分，

大如针，夏月浮水面化为蚊。予尝观荷花缸中有红黑二种，尾着于泥，立其身摇曳不休，见人影则缩入泥穴，即水蛆也。俗呼水虱为水蛆，非是。

《虫荟》卷三昆虫类蜎下引《尔雅》云，蜎，蠉。《疏》云，井中小赤虫也，名蜎，一名蠉，一名蛣蠥，又名子孓。方旭案云：

其身细如缕，长二三分，灰黑色，亦有红色者，生污水中，其性喜浮水，见人则沉入水底。其行一曲一直，以腰为力，若人无臂状。水缸内亦有之，又名水蛆，老则化豹脚蚊。一种相似而头大尾尖者，名缸虎。

此所说较详细，但与上文《蟫史》相同，也只讲到子；孓而已，所云在荷花缸中立其身摇曳不休的小红虫终于未曾说及。此虫与子孓及打拳水蛆（即头大尾尖者）在荷缸中都很普通，而比较地尤为儿童所注意，我们如回想儿时事情便可明瞭，钱朋园能够把他记录出来，这是我所觉得很可喜的。其他说虾鳖以及那枯瘠如柴杆的水虫也都自有见识，只可惜太少罢了。其实这是很难怪的，不知道有多少年来中国读书人的聪明才力都分用在圣道与制艺这两件物事上面，玩物丧志垂为重戒，虽然经部的《诗》与《尔雅》，医家的《本草》，勉强保留一点动植物的考察，却不能渐成为专门，其平常人染指于此者自然更是寥寥了。钱君既不做笺疏，又不撰谱录，原只是做咏物诗耳，却加上这好些小记，而且多是别人所未曾说过的事情，那也就大可佩服了。古人评萨坡遗诗云，花朵虽少，俱是蔷薇。比拟或少有不伦，正无妨暂且借用耳。（二十三年七月）

□1934 年 9 月刊“ 北新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夜读抄》

洗斋病学草

民国以来我时常搜集一点同乡人的著作。这其实也并不能说是搜集，不过偶然遇见的时候把他买来，却也不是每见必买，价目太贵时大抵作罢。贵与不贵本来没有一定标准，我的标准是我自己擅定的，大约十元以内的书总还想设法收得，十元以上便是贵，十五元以上则是很贵了。贵的书我只买过两三部，一是陶元藻的《泊鸥山房集》，一是鲁曾煜的《秋塍文钞》，——鲁启人是汤绍南的老师，《秋塍三州诗钞》又已有了，所以也把《文钞》搜了来，可是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种情形，既不广收罗，又是颇吝啬，所搜的书清朝的别集一部分一总只有百五十部，其中还有三五部原是家藏旧有的。

看同乡人的文集，有什么意思呢？以诗文论。这恐怕不会有多大意思。吾乡近三百年不曾出什么闻人，除章实斋是学者外，——因为我所说的只是山阴会稽的小同乡，所以邵念鲁也没有算在里面，——只有胡天游王衍梅几个人略有名声，最近则李慈铭，但这些大都还是一种正宗里的合作，在我既然不懂得，也不感到兴趣，《越缦堂日记》或者要算是例外。近代的人用了传统的五七言和古文辞能够做出怎样的东西呢？载道，或者是的，不过这于我没有缘分。要能言志，能真实的抒写性情，乃是绝不容易的事。高明如陆放翁，诗稿有八十卷之多，而其最佳的代表作据我看来还只是沈园柳老不飞绵等几章，其他可知矣。还有纪事与写景呢？事与景之诗或者有做得工的，我于此却也并没有什么嗜好，大约还是这诗中的事与景，能够引起我翻阅这些诗文集的兴趣。因为“乡曲之见”，所以搜集同乡人的著作，在这著作里特别对于所记的事与景感到兴趣，这也正由于乡曲之见。纪事写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独于乡土著述中之事与景能随喜赏识者，盖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亲历，故感觉甚亲切也。其实这原来也并不限于真正生长的故乡，凡是住过较长久的地方大抵都有这种情形，如江宁与北京，读《帝京景物略》于其文章之外也觉得别有可喜，只是南京一略未得见，乃大可惜耳。

但是诗文集中带有乡土色彩的却是极少，我所看过的里边只有一种较可取，这乃是家中旧有的一部，是作者的儿子在光绪丙戌（1886）年送给先君的。书名《洗斋病学草》，凡二卷，光绪甲申刊，题踵息道人著，有自序，有道装小像，以离合体作赞，隐浙江山阴胡寿颐照八字。胡字梅仙，光绪丁卯举人，自序言性喜泰西诸书，读之得以知三才真形，万物实理。集卷上有《感事漫赋》四首，分咏天主堂同文馆机器局招商局，诗未佳而思想明通，又卷下《咏化学》二首，注云，“泰西初译是书，尽泄造化之秘，华人未能悉读，多不之信。”序又言年三十七以病废，废四年始学诗自遣，学六年以病剧辍，先君题识谓其艰于步履，盖是两足痿痹也。全集诗才二百十首，所咏却多特殊的事物，颇有意思。如卷上有《香奁新咏》序云：

> 古人咏香奁者多矣，余复何赘。唯有数事为时世装，登徒子皆酷爱焉，鄙意总以为不雅，援笔赋之。世有宋玉其人者，庶以余言为不谬尔。

其题凡四：

一、俏三寸。注云：“脑后挽小髻，长仅三寸，初起江苏上海，今已遍传吴越，服妖也。”二、玉搔头。注云：“古有是饰，今间以五色，有插至数十枚者，抑何可笑也。”

三、侧托。注云：“髻上横签，排列多齿，以金为之，或饰以玉石。”

四、齐眉。注云：“额前珠络，一名西施额。”

查范寅《越谚》卷中服饰类中只有齐眉一条，其注云：“此与网钗大同小异，彼双此单，彼分布两边，此独障额前，珠络齐眉而止，亦新制，起于咸丰年，奢华极矣。”俏三寸在小时候亦曾见过，仿佛如三河老妈子所梳，状似络纬肚者，不知范君何以一笔抹杀都不收入也。卷下又有《花爆八咏》。序云：

“新春儿童竞放花爆，未知始于何时，名目奇异，古书亦未经见，习俗相沿，颇有意义，爱为分咏八绝，聊以讽世云尔。”所咏八种为花筒、赛月明、金盆捞月、双飞胡蝶、滴滴金、九龙治水、穿线牡丹、过街流星。其讽世无甚足取。但记录这些花爆的名目却是有意义的事。有些都是当年玩过的东西，却不知道现在的乡间小儿们也还玩不。会考之后继以读经，恐怕现代的小朋友未必会有我们那时候的闲适罢？

又卷上有《越腊旧俗》诗共六首，凡三题：

一、跳泥人。注云：“一人戴草圈，袒背，自首以下悉涂泥，比户跳舞，名曰跳泥人，跳字越音讹条。”

二、跳黄牛。注云：“一人缚米囊作两角状蒙其首，一人牵其绳至市闾进吉语，呼其人作牛鸣以应，名曰跳黄牛。”

三、跳灶王。注云“一童盔兜装灶神，一妇人击小铜钲，媚以谀词，名曰跳灶王。三事皆乞丐为之。”案跳字越有二音，一读如挑去声，即跳跃义，一读如条，平声，谓两脚伸缩上下践地也，二义不同。此处跳字又引伸有扮演义，乡间演戏开场必先演八仙上寿曰请寿，次出魁星曰踢魁，次出财神曰跳财神，亦读条，《越谚》中写作足下火字。

《越谚》卷中技术类中只列跳灶王一条，注云：“仲冬，成群锣唱，挨脸，蒙倛，即古傩也。”所云仲冬盖误，平常总在年底才有。顾禄《清嘉录》卷十二云：

“跳灶王。跳俗呼如条音，王呼作巷平声。

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杖，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谓之跳灶王。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又是残冬急景催，街头财马店齐开，灶神人媚将人媚，毕竟钱从囊底来。

注引《坚瓠集》云，今吴中以腊月一日行摊，至二十四日止，丐者为之，谓之跳灶王。《武林旧事》虽亦云二十四日市井迎傩，跳灶王之名恐最早见于褚书也。又引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跳灶王，丐者至腊月下旬涂粉墨于面，跳踉街市，以索钱米，江浙风俗多相似，跳灶王一事其分布即颇广，《清嘉录》十二月分中虽别录有跳钟馗，而泥人黄牛则悉不载，且《越谚》亦并缺此二项，洗斋之记录尤可感谢了。

卷下又有《越谣》五首，注云，吾乡俗说多有古意，谱以韵语，使小儿歌之。题目凡五：

一、夜叉降海来。注云：“夏日暴雨，多以是语恐小儿。”案降字疑应作扛，夏天将下阵雨，天色低黑，辄云夜叉扛海来，却不记得用以恐吓小儿。

二、山里山。注云：“谚云，山里山，湾里湾，萝卜开花即牡丹。”

三、上湖春。注云：“小蚌别名，谑语也。”诗云：

渔舟斜渡绿杨津，一带人家傍水滨，

村女不知乡语谑，门前争买上湖春。

案蚌蛤多为猥亵俗语，在外国语中亦有之。上湖春，越语上字读上声。

四、水胡芦。注云：“野鸭别名，即凫之最小者。”

五、花秋。注云：“早稻别种。”诗云：

祈晴祈雨听鸣鸠，未卜丰收与歉收，

注定板租无荒旱，山家一半种花秋。

案佃户纳租按收成丰歉折算，每年无定，唯板祖则酌定数目，不论荒旱一律照纳也。

以上五者，一系成语，二为儿歌，《越谚》卷上录有全文。三至五均系名物，《越谚》未收。范啸风盖畸人，《越谚》亦是一部奇书。但其诗文却甚平凡，殊不可解。近来得见其未刊稿本，有《墨妙斋诗稿》六卷，乃极少可取者，唯卷五杂咏中有《抓破脸》四绝句，注云，“白桃花而有红点者，俗以此名之。”诗不佳而题颇有意思，但这却并不是越中事物，不特未曾听过此名，即此三字亦非越语也。

卷下又有四首七绝，题曰《间壁艳妇未起》，有序曰：“余友陶伯瑛孝廉方琯年未三十，攻苦得心疾，犹日课一文，数上公车，或惘惘出门，只身奔走数千里。今病益剧，忽喜吟诗，稿中有是题，同人无不大笑。孙彦清学博闻之醉骂曰，古人命题往往粗率类此，何足怪！设出老杜，诸君赞不绝口矣。余谓题虽俚着笔甚难，效颦一咏，纾情而已，大雅见哂弗顾焉。”方琯即方琦兄，见《复堂文续》亡友传中，其诗惜未得见，想当有佳句，若洗斋仿作则殊无可观，唯有此诗序我们得以知道此轶事并孙君之快语耳。我这样的读诗文集，有人或者要笑为买椟还珠，不免埋没作者的苦心。这大约是的，但是近来许多诗文集的确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可看，假如于此亦无足取，那简直是废书一册罢了。我也想不如看笔记，然而笔记大半数又是正统的，典章，科甲，诗话，忠孝节烈，神怪报应，讲来讲去只此几种，有时候翻了二十本书结果仍是一无所得。我不知道何以大家多不喜欢记录关于社会生活自然名物的事，总是念念不忘名教，虽短书小册亦复如是，正如种树卖柑之中亦必寄托治道，这岂非古文的流毒直渗进小说杂家里去了么。

□1934 年 10 月 20 日刊《大公报》，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重刊袁中郎集序

林语堂先生创议重刊《袁中郎全集》，刘大杰先生担任编订，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公安派在明季是一种新文学运动，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学潮流，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我们只须看后来古文家对于这派如何的深恶痛绝，历明清两朝至于民国现在还是咒骂不止，可以知道他们加于正统派文学的打击是如何的深而且大了。

但是他们的文字不但触怒了文人，而且还得罪了皇帝，三袁文集于是都被列入禁书，一概没收销毁了事，结果是想看的固然没得看，就是咒骂的人也无从得见，只好闭了眼睛学嘴学舌的胡乱说一番而已。我们举一个例，《直介堂丛刻》中有《荛楚斋随笔》，正续各十卷，庐江刘声木十枝撰，有己巳五月序，即民国十八年也，《随笔》卷三第十六则云：

> 明末诗文派别至公安竟陵可谓妖妄变幻极矣，亡国之音固宜如此，时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世多不知其名氏撰述，■记之于下，以昭后世之炯戒。公安三袁，一庶子宗道，即士瑜，撰《海蠡编》二卷。一吏部郎中中道，撰述无传。一吏部郎中宏道，独宏道撰述甚富，撰有《觞政》一卷，《瓶花斋杂录》一卷，《袁中郎集》四十卷，《明文隽》八卷。竟陵为钟惺谭友夏，俱天门人。

又《续笔》卷四第十一则云：

> 瑞安陈怀孟冲父（案此处原文如是）撰有《独见晓斋丛书》，其第一种为《辛白论文》一卷，共九篇，其篇目有云文性文情文才文学文识文德文时等目，只须见其目即知其深中明季山人之习，坠入竟陵公安一派，实为亡国之音。

此书作者是桐城派，其反对公安本不足异，唯高谈阔论而伯修之《白苏斋类集》与小修之《珂雪斋集选》似均未见，又于中郎集外别列《觞政》，可知其亦未曾见过此集也。其实珂雪斋虽是难得，白苏斋与梨云馆本中郎集在道光年均有翻刻，而或因被骂太久之故也竟流传不广，以致连骂者亦未能看见，真真一大奇事。这回把中郎集印了出来，使得大家可以看看，功德无量。无论意见如何，总之看了再说，即使要骂也有点儿根据。

中郎是明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袖，然而他的著作不见得样样都好，篇篇都好，翻过来说，拟古的旧派文人也不见得没有一篇可取，因为他们到底未必整天整夜的装腔作势，一不小心也会写下一小篇即兴的文章来，如专门模仿经典的扬子云做有《酒箴》，即是一例。中郎的诗，据我这诗的门外汉看来，只是有消极的价值，即在他的反对七子的假古董处，虽然标举白乐天苏东坡，即使不重模仿，与瓣香李杜也只百步之差，且那种五七言的玩意儿在那时候也已经做不出什么花样来了，中郎于此不能大有作为原是当然，他所能做的只是阻止更旧的，保持较新的而已。

在散文方面中郎的成绩要好得多，我想他的游记最有新意，传序次之，《瓶史》与《觞政》二篇大约是顶被人骂为山林恶习之作，我却以为这很有中郎特色，最足以看出他的性情风趣。尺牍虽多妙语，但视苏黄终有间，比孙仲益自然要强，不知怎的尺牍与题跋后来的人总写不过苏黄，只有李卓吾特别点，他信里那种斗争气分也是前人所无，后人虽有而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中郎反抗正统的“赋得”文学，自是功在人间，我们怀念他的功绩，再看看他的著作，成就如何，正如我们读左拉的小说，看他与自然主义的理

论离合如何，可以明瞭文学运动的理想与现实，可以知人论世，比单凭文学史而议论得失，或不看作品而信口雌黄，总要较为可靠乎。

中郎喜谈禅，又谈净土，著有《西方合论》一卷，这一部分为我所不大喜欢，东坡之喜谈修炼也正是同样的一种癖。伯修与小修，陶石篑石梁，李卓吾、屠长卿，也都谈佛教，这大约是明末文坛的普通现象。正统派照例是儒教徒，而非正统派便自然多逃儒归佛，佛教在那时虽不是新思想，却总是一个自由天地，容得他们托足，至于是否够说信仰，那我就不好代为回答了。反对这些新文学潮流的人骂他们妖妄变幻，或者即侧重此点，我看《茯楚斋随笔》中屡次说到明朝之亡由于李屠诸人之信佛教毁伦常，可以参证，不过李屠以及二陶三袁固然与佛有关，竟陵的钟谭似并不这样，然则此文所云又是疑问了。正统派骂公安竟陵为亡国之音，我疑心这句话自从甲申以后一直用到如今了罢，因为明朝亡了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究竟明朝亡于何人何事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更是死无对证，我想暂不讨论，但是什么是亡国之音，这件事似乎还可以来探讨一下。

有人说，亡国之音便是公安竟陵那样的文章。这样的干脆决断，仿佛事情就完了，更无话可说。然而不然。所谓亡国之音这是有出典的，而且还出在经书里。查《礼记·乐记》第十九云：“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孔颖达疏云，“亡国谓将欲灭亡之国，乐音悲哀而愁思，亡国之时民心哀思，故乐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后又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闻而写之，为晋平公鼓之，是之谓也。”在同一篇中，有两样说法，迥不相同，一说乐音哀思，一说靡靡之乐，令人无所适从。郑玄虽然也是大儒，所说又有韩非做根据，但是我们总还不如信托经文，采取哀思之说，而桑间濮上应即承上文而言，至于其音是否哀以思，是否与上文不矛盾，则书缺有间，姑且存疑。中郎的文章说是有悲哀愁思的地方原无不可，或者这就可以说亡国之音。《诗经·国风》云：

有兔■■，雉离于罗。
我生之初，尚无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尚寐无吪！

这种感情在明季的人心里大抵是很普通罢。有些闲适的表示实际上也是一种愤懑，即尚寐无吪的意思。外国的隐逸多是宗教的，在大漠或深山里积极地修他的胜业，中国的隐逸却是政治的，他们在山林或在城市一样的消极的度世。长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便说出本意来。不过这种情形我想还应用《乐记》里别一句话来包括才对，即是“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孔颖达解亡国为将欲灭亡之国，这也不对，亡国便干脆是亡了的国，明末那些文学或可称之曰乱世之音，顾亭林傅青主陈老莲等人才是亡国之音，如吴梅村临终的词亦是好例。

闲话休提，说乱世也好，说亡国也好，反正这都是说明某种现象的原因，《乐记》云，“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其情之所以动，则或由世乱政乖，或由国亡民困，故其声亦或怨怒或哀思，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会忽发或怨怒或哀思之音，更不是有人忽发怨怒之音而不乱之世就乱，或忽发哀思之音而不亡之国会亡也。中郎的文章如其是怨以怒的，那便是乱世之音，

因为他那时的明朝正是乱世；如其是哀以思的，那就可以算是亡国之音，因为明末正是亡国之际，“时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所可说的如此而已，有什么可以“昭后世之炯戒”的地方呢？使后世无复乱世，则自无复乱世之音，使后世无感亡国，则自无复亡国之音，正如有饭吃饱便不面黄肌瘦，而不生杨梅疮也就不会鼻子烂落也。然而正统派多以为国亡由于亡国之音，一个人之没有饭吃也正由于他的先面黄肌瘦，或生杨梅疮乃由于他的先没有鼻子。呜呼，熟读经典者乃不通《礼记》之文，一奇也。中郎死将三百年，事隔两朝，民国的文人乃尚欲声讨其亡国之罪，二奇也。关于此等问题，不佞殆只得今天天气哈哈哈矣。

说到这里，或者有人要问，足下莫非是公安派或竟陵派乎？莫非写亡国之音者乎？这个疑问也问得当然，但是我惭愧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语。

第一，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我的新旧教育都不完全，我所有的除国文和三四种外国文的粗浅知识以外，只有一点儿“生物的知识”，其程度只是丘浅治郎的《生物学讲话》，一点儿历史的知识，其程度只是《纲鉴易知录》而已，此外则从蔼理斯得来的一丝的性的心理，从弗来则得来的一毫的社会人类学，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别无用处，却尽够妨碍我做某一家的忠实的信徒。对于一切东西，凡是我所能懂的，无论何种主义理想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领取其若干部分，但难以全部接受，因为总有其一部分与我的私见相左。公安派也是如此，明季的乱世有许多情形与现代相似，这很使我们对于明季人有亲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动，自然更引起我们的同感，但关系也至此为止，三百年间迟迟的思想变迁，也就不会使我们再去企图复兴旧庙的香火了。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上的见识与魄力，想搜集湮没的三袁著作来看看，我与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

第二，我不是文学家，没有创作，也说不上什么音不音。假如要说，无论说话写字都算是音，不单是创作，原来《乐记》的所谓音也是指音乐，那么，我也无从抵赖。是的，我有时也说话也写字，更进一步说，即不说话不写字亦未始不可说是音，沉默本来也是一种态度，是或怨怒或哀思的表示。中国现在尚未亡国，但总是乱世罢；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如不归依天国，心不旁骛，或应会试作“赋得文治日光华”诗，手不停挥，便不免要思前想后，一言一动无不露出消极不祥之气味来，何则，时非治世，在理固不能有好音，此查照经传可得而断言者也。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若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由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发音者应无庸议。今之人之不能不面黄肌瘦者真是时也命也，不佞岂能独免哉，不佞非公安派而不能逃亡国之音之谥者亦是时也命也。吾于是深有感于东北四省之同胞，四省之人民岂愿亡国哉，亦并何尝预为亡国之音，然而一旦竟亡，亦是时也命也。我说时与命者，言此与人民之意志无关，与文学之音亦无关也。音之不祥由于亡国，而亡国则由于别事，至少决不由于音之祥不祥耳。人苟少少深思，正当互相叹惋，何必多哓哓也。

闲话说得太多了，而实于中郎无甚关系，似乎可以止住了。重刊《中郎集》鄙意以为最好用小修所编订本，而以别本校其异同，增加附录，似比另行编辑为适宜。标点古书是大难事，错误殆亦难免，此在重刊本体例上似有可商者，附识于此，以示得陇望蜀或求全责备之意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识于北平。

□1934 年 11 月 17 日刊《大公报》，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论语小记

近来拿出《论语》来读，这或者由于听见南方读经之喊声甚高的缘故，或者不是，都难说。我是读过四书五经的，至少《大》《中》《论》《孟》《易》《书》《诗》这几部都曾经背诵过，前后总有八年天天与圣经贤传为伍，现今来清算一下，到底于我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我恐怕要使得热诚的儒教徒听了失望，实在没有什么。现在只说《论语》。

我把《论语》白文重读一遍，所得的印象只是平淡无奇四字。这四个字好像是一个盾，有他的两面，一面凸的是切实，一面凹的是空虚。我觉得在《论语》里孔子压根儿只是个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虽然后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师，我总以为他不是耶稣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亚。《论语》二十篇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但是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假如从这边去看，那么正是空虚了。平淡无奇，我凭了这个觉得《论语》仍可一读，足供常识完具的青年之参考。至于以为圣书则可不必，太阳底下本无圣书，非我之单看不起《论语》也。

一部《论语》中有好些话都说得很好，我所喜欢的是这几节，其一是《为政》第二的一章：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二是《阳货》第十七的一章：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太炎先生《广论语骈枝》引《释文》，鲁读天为夫，“言夫者即斥四时行百物生为言，不设主宰，义似更远。”无论如何，这一章的意思我总觉得是很好的。又《公冶长》第五云。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我喜欢这一章，与其说是因为思想，还不如说因为它的境界好。师弟三人闲居述志，并不像后来文人的说大话，动不动就是揽辔澄清，现在却只是老老实实地说说自己的愿望，虽有大小广狭之不同，其志在博施济众则无异，而说得那么质素，又各有分寸，恰如其人，此正是妙文也。我以为此一章可以见孔门的真气象，至为难得，如《先进》末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那一章便不能及。此外有两章，我读了觉得颇有诗趣，其一《述而》第七云：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其二《子罕》第九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本来这种文章如《庄子》等别的书里，并不算希奇，但是在《论语》中却不可多得了。朱注已忘记，大家说他此段注得好，但其中仿佛说什么道体之本然，这个我就不懂，所以不敢恭维了。《微子》第十八中又有一章狠特别的文章云：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

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不晓得为什么缘故，我在小时候读《论语》读到这一章，很感到一种悲凉之气，仿佛是大观园末期，贾母死后，一班女人都风流云散了的样子。这回重读，仍旧有那么样的一种印象，我前后读《论语》相去将有四十年之谱，当初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大约就只这一点了罢。其次，那时我所感到兴趣的记隐逸的那几节，如《宪问》第十四云：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又《微子》第十八云：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之门，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在这几节里我觉得末了一节顶好玩，把子路写得很可笑。遇见丈人，便脱头脱脑地问他有没有看见我的老师，难怪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忽然十分恭敬起来，站了足足半天之后，跟了去寄宿一夜。第二天奉了老师的命再去看，丈人已经走了，大约是往田里去了吧，未必便搬家躲过，子路却在他的空屋里大发其牢骚，仿佛是戏台上的独白，更有点儿滑稽，令人想起夫子的“由也喭”这句话来。所说的话也夸张无实，大约是子路自己想的，不像孔子所教。下一章里孔子品评夷齐等一班人，“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发中权”，虽然后边说我则异于是，对于他们隐居放言的人别无责备的意思，子路却说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何等言重，几乎有孟子与人争辩时的口气了。孔子自己对他们却颇客气，与接舆周旋一节最可看，一个下堂欲与之言，一个趋避不得与之言，一个狂，一个中，都可佩服，而文章也写得恰好，长沮桀溺一章则其次也。

我对于这些隐者向来觉得喜欢，现在也仍是这样，他们所说的话大抵都不错。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最能说出自家的态度。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最能说出孔子的态度。说到底，二者还是一个源流，因为都知道不可，不过一个还要为，一个不想再为罢了。周朝以后一千年，只出过两个人，似乎可以代表这两派，即诸葛孔明与陶渊明，而人家

多把他们看错作一姓的忠臣，令人闷损。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要留住他。看上面各人的言动虽然冷热不同，全都是好意，毫没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孔子的应付也是如此，这是颇有意思的事。外国的隐逸是宗教的，这与中国的截不相同。他们独居沙漠中，绝食苦祷，或牛皮裹身，或革带鞭背，但其目的在于救济灵魂，得遂永生，故其热狂实在与在都市中指挥君民焚烧异端之大主教无以异也。二者相比，似积极与消极大有高下，我却并不一定这样想。对于自救灵魂我不敢赞一辞，若是不惜用强硬手段要去救人家的灵魂，那大可不必，反不如去荷蒉植杖之无害于人了。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这恐怕也是出于读经救国论者“意表之外”的罢？（二十三年十二月）

□1935 年 1 月刊《水星》月刊 1 卷 4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逸语与论语

前日买到北平图书馆的一册《善本书目乙编》，所列都是清代刻本之精善希少者，还有些稿本及批校本。在仿佛被放弃了的北平，几时有看图书馆善本的福气我简直就不知道，看看书目虽不能当屠门大嚼，也可以算是翻食单吧。全书目共百四十五叶，一半是方志与赋役书，但其他部分却可阅。我觉得有趣味的，寒斋所藏的居然也有两部在选中，一是曹廷栋的《逸语》十卷，一是陆廷灿的《南村随笔》六卷。我买这些书几乎全是偶然的，陆幔亭本来我就不知道，因为想找点清初的笔记看，于刘献廷、傅青主、王渔洋、宋牧仲、冯钝吟、尤西堂、王山史、刘在园、周栎园等外，又遇见这随笔，已经是雍正年刊本了。序中说他是王、宋的门生，又用《香祖笔记》《筠廊偶笔》来比他的书，我翻看一过，觉得这还比得不大错，与宋牧仲尤相近。虽然这种琐屑的记录我也有点喜欢，不过我尤喜欢有些自己的意见情趣的，如刘傅冯尤，所以陆君的笔记我不很看重，原来只是以备一格而已。

曹慈山有一部《老老恒言》，我颇爱读，本来七十曰老，现在还差得远哩，但是有许多地方的确写得好，所以很觉得喜欢。这部《逸语》因为也是曹慈山所辑注的，便买了来，价也不大便宜，幸喜是原板初印，那《恒言》的板却很蹩脚，是《槜李丛书》本而又是后印的，《逸语》三大本的外表的确是颇为可观，内容稍过于严肃，盖属于子部儒家，而这一类的书在我平日是不大看者也。

现在又取出《逸语》来一翻，这固然由于书目乙编的提示，一半也因为是“上丁”的缘故吧。曹君从周秦两汉以讫晋宋齐梁诸子百家的书中辑集所记孔子的话，编为十卷二十篇，略如《论语》，而其文则为诸经之所逸，因名曰《逸语》。我刚才说不喜读四库的子部儒家类的书，但是《论语》有时倒也看看，虽然有些玄妙的话，古奥或成疑问的文，都不能懂；其一部分总还可以了解而且也很赞成的。《逸语》集录孔子之言，不是儒教徒的文集，所以也可以作《论语》外篇读。我因为厌恶儒教徒，而将荀况孔鲋等一笔抹杀，也是不对，这个自己本来知道。平常讨厌所谓道学家者流，不免对于儒家类的《逸语》不大表示尊重，但又觉得《论语》还有可看，于是《逸语》就又被拉了出来，实在情形便是如此。老实说，我自己也是儒家，不过不是儒教徒，我又觉得自己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远在许多徒孙之上。对于释迦牟尼梭格拉底似乎也略知道，至于耶稣摩罕默德则不敢说懂，或者不如明瞭地说不懂为佳。

《逸语》卷十，第十九篇《轶事》引《吕氏春秋》云：

> 文王嗜菖蒲菹，孔子闻而服之，缩頞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

曹注云：此见圣人于饮食之微不务肥甘以悦口，亦取有益于身心，与不撤姜食其旨相同，且事必师古之意，于此亦可见耳。”这件事仿佛有点可笑，有如《乡党》中的好些事一样，我却觉得很有意思。菖蒲根我知道是苦的，小时候端午节用这加在雄黄酒里喝过，所以知道不是好吃的东西，但如盐腌或用别的料理法，我想或者要较好，不必三年才会胜之亦未可知。我们读古书仿佛也是这个情形，缩頞食之——这回却不至三年了，终于也胜之，辨别得他的香，也尝透了他的苦及其他的药性。孔子吃了大有好处，据《孝经纬》云，“菖蒲益聪”，所以后来能编订《易经》，了解作者之忧患，我们也因

---

① 《宇宙风》题作《〈逸语〉与〈论语〉并说到孔子的益友》。

此而能尚友圣人，懂得儒道法各家的本意，不佞于此事不曾有特别研究，在专门学者面前抬不起头来，唯如对于一般孔教徒则我辈自称是孔圣人的朋友殆可决无愧色也。

《逸语》卷一有引《荀子》所记的一节话云：

> 子曰，由，志之，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智，行至则仁，既仁且智，夫恶有不足矣哉。

这话虽然稍繁，却也说得很好。《论语·为政第二》云：

>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意思正自相像。孔子这样看重知行的诚实，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件事。《先进第十一》云：

>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第十三》云：

>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又《卫灵公第十五》记公问陈，孔子也答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这种态度我也觉得很好。虽然樊迟出去之后孔子数说他一顿，归结到“焉用稼”，在别处如《泰伯第八》也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可见他老先生难免有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的意思，觉得有些事不必去做，但这也总比胡说乱道好。我尝说过，要中国好不难，第一是文人不谈武，武人不谈文。盖《大学》难懂，武人不读正是言之要也，大刀难使，文人不耍便是行之至也，此即是智与仁也。《季氏第十六》又有一节云：

>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为之辞。

下文一大串政治哲学大为时贤所称赏，我这里只要这一句，因为与上面的话多少有点关系。孔子这里所骂的，比以不知为知以不能为能，情节还要重大了，因为这是文过饰非。因为我是儒家思想的，所以我平素很主张人禽之辨，而文过饰非乃是禽以下的勾当。古人说通天地人为儒，这个我实在不敢自承，但是如有一点生物学文化史和历史的常识，平常也勉强足以应用了。我读英国捺布菲修所著《自然之世界》与汉译汤姆生的《动物生活史》，觉得生物的情状约略可以知道，是即所谓禽也。人是一种生物，故其根本的生活实在与禽是一样的，所不同者，他于生活上略加了一点调节，这恐怕未必有百分之一的变动，对于禽却显出明瞭的不同来了，于是他便自称为人，说他有动物所无的文化。据我想，人之异于禽者就只为有理智吧，因为他知道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于是有两种对外的态度，消极的是恕，积极的是仁。假如人类有什么动物所无的文化，我想这个该是的，至于汽车飞机枪炮之流无论怎么精巧便利，实在还只是爪牙筋肉之用的延长发达，拿去夸示于动物，但能表出量的进展而非是质的差异。我曾说，乞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恐要妨害隔壁的人用功而不在寄宿舍拉胡琴，这虽是小事，却是有人类的特色的。《卫灵公第十五》云：

>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

《公冶长第五》云：

>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也。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孔子这种地方的确很有见解。但是人的文化也并不一定都是向上的，人会恶用他的理智去干禽兽所不为的事，如暗杀，买淫，文字思想狱，为文明或王道的侵略，这末了一件正该当孔子所深恶痛疾的，文过饰非自然并不限于对外的暴举，不过这是最重大的一项罢了。

孔子的话确有不少可以作我们东洋各国的当头棒喝者，只可惜虽然有千百人去对他跪拜，却没有人肯听他。真是了解孔子的人大约也不大有了，我辈自认是他的朋友，的确并不是荒唐。大家的主人虽是婢仆众多，知道主人的学问思想的还只有和他平等往来的知友，若是垂手直立，连声称是，但足以供犬马之劳而已。孔子云：

>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我们岂敢对圣人自居于多闻，曰直曰谅，其或庶几，当勉为孔子之益友而已。

［附记］文中所引《论语》系据《四部丛刊》影印日本南北朝正平刻本，文字与通行本稍有不同，非误记也。

（廿五年二月丁祭后三日记于北平）

□1936 年 4 月刊《宇宙风》15 期，署名知堂。王霞
□收入《风雨淡》

食味杂咏注

今年厂甸买不到什么书，要想买一本比较略为好的书总须得往书店去找，而旧书的价近来又愈涨愈贵，一块钱一本的货色就已经不大有了。好在有几家书店有点认识，暂时可以赊欠，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几本来看罢，有看了中意的便即盖上图章，算是自己的东西了。这里边我所顶喜欢的是一册《食味杂咏》，东墅老人嘉善谢墉撰，有门生阮元序，道光中小门生阮福刊。据石韫玉后序，乾隆辛丑主会试，士之不第者造为蜚语云，谢金圃抽身便讨，吴香亭到口即吞，坐此贬官，但此二语实出《寄园寄所寄》中，两公之姓相合，故氓鼆者移易其词以腾口说耳云。东墅老人自序云：

> 乾隆辛亥夏养疴杜门，因思家乡土物数种不可得，率以成吟，于是连续作诗，积五十八首，而以现在所食皆北产也，复即事得四十三首，共成一百一首，各系数言于题下。盖墉家世习耕读，少时每从老农老圃谈树艺，当名辨物，多以目验得之，又邻江海介五糊，水生陆产咸易致之，考其性味，别其土宜，不为丹铅家剿说所淆。中年以北游之后食味一变，而轺车驿路，爱好咨诹，京城顾役者无问男女皆田家也，圉人御者皆知稼穑，下至老妪亦可询之，以是辨南北之异宜，析山泽之殊质。又少多疾病，时学医聚药，参之经传，证以见闻，或有疑义辄为诠注。陶斯咏斯，绝无关于喜愠，游矣休矣，非假喻于和同。诗成，汇录之，方言里语，敢附博物哉，庶其以击壤之声，入采风之末云尔。

序文末尾写得不漂亮，也是受了传统的影响，但是序里所说的大约都是实情，我所喜欢的部分实在也还是那些题下的附注，本文的诗却在其次。古人云买椟还珠，我恐怕难免此诮，不过这并无妨碍，在我看来的确是这椟要好得多，要比诗更有意思，虽然那些注原是附属于诗的，如要离诗而独立也是不可能。阮云台序中有云：“此卷为偶咏食品之诗，通乎雅俗，然考证之多，非贯彻经史苍雅博极群书者不能也。”可谓知言。我同时所得尚有王鸣盛《练川杂咏》，并钱大昕王鸣韶和作共一百八十首，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百首，谭吉璁和作百十八首，杨抡《芙蓉湖棹歌》百首，并刘继增《惠山竹枝词》三十首为一卷。这些诗里也大都讲到风物，只是缺少注解，有注也略而不详，更不必说能在丹铅家剿说之外自陈意见的了。以诗论，在我外行看去，似朱竹汀最佳，虽然王西庄钱竹汀的有几句我也喜欢。如朱诗云：

> 姑恶飞鸣逐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
> 白花满把蒸成露，紫葚盈筐不取钱。

注云：“姑恶鸟名，蚕月最多。野蔷蔽开白花，田家篱落间处处有之，蒸成香露，可以泽发。”又云：

> 鸭馄饨小漉微盐，雪后垆头酒价廉，
> 听说河豚新入市，菱蒿荻笋急须拈。

注云：“方回题竹杖诗，跳上岸头须记取，秀州门外鸭馄饨。”王诗云：

> 西风策策碧波明，菰雨芦烟两岸平，
> 暮汐过时渔火暗，沙边觅得小娘怪。

注引宋吴惟信元王逢简句外，只云“俗呼蛏为小娘蛏”。以上注法或是诗注正宗亦未可知，不过我总嫌其太简略，与《食味杂咏》相比更是显然。“南味五十八首”之十六曰《喜蛋》，题注甚长，今具录于下：

> 古无蛋字，亦无此名，经传皆作卵，音力管反。《说文》，■，释

云，南方夷也，从虫延，声徒旱切，在新附文之首，是汉时本无此字，故叔重不载而徐氏增之。《玉篇》仍《说文》不收，《广韵》则亦注为南方夷，至《唐书》柳文皆以为蛮俗之称，《集韵》并载■■，要皆不关禽鸟之卵。今自京师及各省凡鸟卵皆呼为蛋，无称为卵者，字从虫从延，本以延衍卵育取义，蛋则■省也，考《说文》卵字部内有■字，卵不孚也，徒玩切，与蛋为音之转，盖古人呼不以之孚鸡鸭之卵而徒供食者即以孚之不成之卵名之，因而俗以蛋抵■也。隋唐前无■字，亦无此名。元方回诗曰，秀州城外鸭馄饨，即今嘉兴人所名之喜蛋，乃鸭卵未孚而殒，已有雏鸭在中，俗名哺退蛋者也。市人镊去细毛，洗净烹煮，乃更香美，以哺退名不利，反而名之曰喜蛋，若鸭馄饨者则又以喜蛋名不雅而文其名，其实秀州之鸭馄饨乃《说文》鶱字之铁注脚也。

诗中又有注云：

“喜蛋中有已成小雏者味更美。近雏而在内者俗名石榴子，极嫩，即蛋黄也。在外者曰砂盆底，较实，即蛋白也。味皆绝胜。”第二十九首为《鲜蛏》，注云：

“蛏字《说文》《玉篇》俱无，亦不见他书，《广韵》始收，注云蚌属，盖即《周官》狸物蠃■之类，味胜蚬蛤，若以较西施舌则远不逮矣。”诗中注云：

“蛏本江海所产，而西湖酒肆者乃即买之湖上渔船，乘鲜烹食极美。同年王谷原与麴生交莫逆，每寓杭乡试时邀同游西湖，取醉酒家。有五柳居酒肆在湖上，烹饪较精。谷原嗜食蛏，谓此乃案酒上品，即醉蛏亦绝佳，因令与煮熟者并供之。此景惘然。”第三十首为《活虾》，诗中有注两则，均琐屑有致，为笔记中之佳品：

家乡名渔家之船曰网船，渔妇曰网船婆。夏秋鱼虾盛时，网船婆蓑笠赤脚，与渔人分道卖鱼虾，自率儿女携虾桶登岸，至所识大户厨下卖虾，易钱回船，不避大风雨。

南中活虾三十年前每斤不过十馀文，时初至京，京中已四五倍之。近日京城活者须大钱三四百文，其不活而犹鲜者，以用者多，亦须二百左右，然大率捞之浊水中，其生于清水者更不易得。

适值那时所得的几部诗词里也还有类似的题咏，可谓偶然。其一是全祖望的《句馀土音》，系陈铭海补注本，其第五卷全是咏本地物产，共有六十九首，只可惜原注补注都不大精详。“四赋四明土物九首”之一为《荔枝蛏》诗下原注云：

“浙东之蛏皆女儿蛏也，而荔枝则女儿之佳者。”上文所云小娘蛏盖即一物，吾乡土俗蛏不尚大者，但不记得有什么别名，只通称蛏子耳。冯云鹏著《红雪词》甲乙集各二卷，乙之一中有禽言二十二章，禽言词未曾见也，又有咏海错者二十五章，其十四到十六皆是蛏，曰竹蛏，曰女儿蛏，曰笔管蛏，却无注。其第二咏白小，有注云：

“即银鱼，杜诗，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记事珠》以为面条，非也，吾通产塔影河者佳，不亚于莺脰湖。”《食味杂咏》南味之五云《银鱼》，注云：

“色白如银，长寸许，大者不过二寸，乡音亦呼儿鱼，音同泥，银言白，儿言小也。此鱼古书不载，罗愿《翼雅》于王馀脍残云又名银鱼。脍残虽相类，然大数倍，不可混也。”诗中注云：

“银鱼出水即不活，渔家急暴干市之。有甫出水生者以作羹极鲜美，乡俗名之曰水银鱼，以别于干者。”

东墅老人对于土物之知识丰富实在可佩服，可惜以诗为主，因诗写注终有所限制，假如专作笔记象郝兰皋的《记海错》那样，一定是很有可观的。至于以诗论，则谢金圃的银鱼诗与冯晏海的白小词均不能佳，因系用典制题做法，咏物诗少佳作，不关二公事也。倒还是普通一点的风物诗可以写得好，如前所举棹歌即是，关于白小可举出吾乡孙子九一绝句来：

南湖白小论斗量，北湖鲫鱼尺半长，
鱼船进港■船出，水气着衣闻酒香。

孙子九名垓，有《退宜堂诗集》四卷，此诗为《过东浦口占》之第二首，在诗集卷一中。（廿四年三月十三日，北平）

□1935 年 4 月刊《文饭小品》3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醉馀随笔

从友人处得见《国风》杂志，登载洪允祥先生的《悲华经舍杂著》，其一为《醉馀随笔》，据王咏麟氏跋谓系宣统年间在上海时所作。全书才二三十则，多明达之语，如其一云：

> 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

洪君盖学佛者，又性喜酒，故其言如此，虽似稍奇，却亦大有理。韩愈的病在于热中，无论是卫道或干禄，都是一样。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云：

>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

盛大士《朴学斋笔记》卷七云：

> 明鹿门茅氏论次古文，取唐宋八大家为作文之准的，……而韩之三上宰相、应科目与时人诸书颇为识者所訾议，乃独录而存之。

又云：

> 昌黎与于襄阳书，盛夸其抱不世之才，卷舒不随乎时，文武惟其所用，此真过情之誉也。而日志存乎立功，事专乎报主，古人有言，请自隗始，又隐然以磊落奇伟之人自命矣。乃云愈今日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足下一朝之享而已，又何其志之小也。唐人以文字干谒，贤者亦不以为讳，但昌黎根柢六经传世不朽之作后人不尽选读，而反读其干谒之文，何耶。

讲道统与干谒宰相，我看不出是两件事来，谢盛二公未免所见不广，乃欲强生分别，其实这里边只是一味烦躁，以此气象，达固不是诸葛一流，穷也不是陶一路也。如谢氏言，似歆羡公相亦不甚妨碍其为有道之士，如盛氏言，又似被訾议的干谒文字亦可与根柢六经之作共存共荣，只是后人不要多选读就行。或者韩愈对于圣道的意识正确无疑，故言行不一致，照例并不要紧，亦未可知。我辈外人不能判断，但由我主观看去总之是满身不快活，辟不辟佛倒还在其次，因为这也只是那烦躁之一种表示耳。关于李杜，不佞虽并不讴歌杜甫之每饭不忘，却不大喜欢李白，觉得他夸，虽然他的绝句我也是喜欢的。这且按下不提，再说洪君的随笔又有一则云：

> 《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

此语极精。《颜氏学记》中亦有相似的话，却没有说得这样彻透。近来常听有人提倡文天祥陆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学他，这看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又一则云：

> 去年游西湖深处，入一破寺，见一僧负锄归，余揖之曰，阶上冬瓜，和尚要他何用？僧曰，只是吃的。曰，恐吃不下许多。曰，一顿吃一个饱。曰，和尚也要饱？曰，但求一饱，便是和尚。至今思之，此僧不俗。

此僧与此居士真都不俗。十多年前曾在北京某处教员休息室中每周与洪君相

遇，惜不及共作冬瓜问答，真是失之交臂，至今展读遗语，更觉得真真可惜也。（六月）

□1935 年 6 月 21 日刊《华北日报》，署名不知
□收入《苦竹杂记》

刘青园常谈

近来随便翻阅前人笔记，大抵以清朝人为主，别无什么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罢了。郭柏苍著《竹间十日话》序云：

> 十日之话阅者可一日而毕，阅者不烦，苟欲取一二事以订证则甚为宝重，凡说部皆如此。药方至小也，可以已疾。开卷有益，后人以一日之功可闻前人十日之话，胜于闲坐围棋挥汗观剧矣。计一生闲坐围棋挥汗观剧，不止十日也。苍生平不围棋不观剧，以围棋之功看山水，坐者未起，游者归矣，以观剧之功看杂著，半晌已数十事矣。

这一节话说得极好。我也是不会围棋的，剧也已有三十年不观了，我想匀出这种一点工夫来看笔记，希望得到开卷之益，可是成绩不大好，往往呆看了大半天，正如旧友某氏说，只看了一个该死。我的要求本来或者未免稍苛亦未可知，我计较他们的质，又要估量他们的文。所以结果是谈考据的失之枯燥，讲义理的流于迂腐，传奇志异的有两路，风流者浮诞，劝戒者荒谬，至于文章写得干净，每则可以自成一篇小文者，尤其不可多得。我真觉得奇怪，何以中国文人这样喜欢讲那一套老话，如甘蔗滓的一嚼再嚼，还有那么好的滋味。最显著的一例是关于所谓逆妇变猪这类的纪事。在阮元的《广陵诗事》卷九中有这样的一则云：

> 宝应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载太平寺中一豕现妇人足，弓样宛然，同游诧为异，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妇后身也，人彘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见》命题云。忆元幼时间林庾泉云，曾见某处一妇不孝其姑遭雷击，身变为彘，唯头为人，后脚犹弓样焉，越年馀复为雷殛死。始意为不经之谈，今见安若此诗，觉天地之大事变之奇，真难于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书之。

阮云台本非俗物，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乃喜记录此等恶滥故事，殊不可解，且当初不信林庾泉，而后来忽信成安若以至不知为谁之寺僧，尤为可笑。世上不乏妄人，编造《坐花志果》等书，灾梨祸枣，汗牛充栋，几可自成一库，则亦听之而已，雷塘庵主奈何也落此窠臼耶。中国人虽说是历来受儒家的熏陶，可是实在不能达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一面固然还是“未知生”，一面对于所谓腊月二十八的问题却又很关心，于是就参照了眼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起一个冥司来，以寄托其一切的希望与喜惧。这是大众的意志，读书人原是其中的一分子，自然是同感的，却要保留他们的优越，去拿出古人说的本不合理的“神道设教”的一句话来做解说，于是士大夫的神学也就成立了。民间自有不成文的神话与仪式，成文的则有《玉历钞传》，《阴骘文》，《感应篇》，《功过格》，这在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是与孔教的经有并列的资格的。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文人思想之受神道教的支配正是不足怪的事情，不过有些杰出的人于此也还未能免俗，令人觉得可惜，因此他们所记的这好些东西只能供给我们作材料，去考证他们的信仰，却不足供我们的玩味欣赏了。

对于鬼神报应等的意见我觉得刘青园的要算顶好。青园名玉书，汉军正蓝旗，故书署辽阳玉书，生于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所著有《青园诗草》四卷，《常谈》四卷，行于世。《常谈》卷一有云：“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亦尝及之。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神灵呵护。平庸坦率，

无所短长，眼界固宜如此。”又云：“言有鬼言无鬼，两意原不相背，何必致疑。盖有鬼者指古人论鬼神之理言，无鬼者指今人论鬼神之事言。”这个说法颇妙。刘本系儒家，反释道而不敢议周孔，故其说鬼神云于理可有而于事则必无也。又卷三云：“余家世不谈鬼狐妖怪事，故幼儿辈曾不畏鬼，非不畏，不知其可畏也。知狐狸，不知狐仙。知毒虫恶兽盗贼之伤人，不知妖魅之祟人，亦曾无鬼附人之事。又不知说梦占梦详梦等事。”又一则列举其所信，有云：

> 信祭鬼神宜诚敬，不信鬼神能监察人事。信西方有人其号为佛，不信佛与我有何干涉。信圣贤教人以伦常，不信圣贤教人以诗文。信医药可治病，不信灵丹可长生。信择地以安亲，不信风水能福子孙。信相法可辨贤愚邪正，不信面目能见富贵功名。信死亡之气病疫之气触人成疾，不信殃煞扑人疫鬼祟人。信阴阳和燥湿通蓄泄有时为养，不信精气闭涸人事断绝为道。信活泼为生机，不信枯寂为保固。信祭祀祖先为报本追远，不信冥中必待人间财物为用。似此之类不一而足，忆及者志之，是非亦不问人，亦不期人必宜如此。

此两则清朗通达，是儒家最好的境地，正如高骏烈序文中所说，“使非行己昭焯，入理坚深，事变周知，智识超旷，何以及此”，不算过誉，其实亦只是懂得人情物理耳，虽然他攻异端时往往太有儒教徒气，如主张将“必愿为僧者呈明尽宫之”，也觉得幼稚可笑。卷三又论闱中果报云：

> 乡会两闱，其间或有病者疯者亡者缢者刎者，士子每惑于鬼神报复相骇异。余谓此无足怪。人至万众，何事不有，其故非一，概论之皆名利萦心，得失为患耳。当其时默对诸题，文不得意，自顾绝无中理，则百虑生焉，或虑贫不能归，或忧饥寒无告，或惧父兄谴责，或耻亲朋讪笑，或债负追逼，或被人欺骗，种种虑念皆足以致愚夫之短见，而风寒劳瘁病亡更常情也，恶足怪。若谓冤鬼缠扰，宿孽追寻，何时不可，而必俟场期耶。倘其人不试，将置沉冤于不问乎。此理易知，又何疑焉。人每津津谈异，或以警士子之无行者，然亦下乘矣。犹忆己酉夏士子数人肄业寺中，谈某家闺阃事甚■，一士摇手急止之曰，不可不可，场期已近，且戒口过，俟中后再谈何害。噫，士习如此，其学可知。

在《乡闱纪异》这类题目的故事或单行本盛行的时候，能够有如此明通的议论，虽然不过是常识，却也正是卓识了。卷一又有一则，论古今说鬼之异同，也是我所喜欢的小文：

> 说鬼者代不乏人，其善说者唯左氏晦翁东坡及国朝蒲留仙纪晓岚耳，第考其旨趣颇不相类。盖左氏因事以及鬼，其意不在鬼。晦翁说之以理，略其情状。东坡晚年厌闻时事，强人说鬼，以鬼自晦者也。蒲留仙文致多辞，殊生鬼趣，以鬼为戏者也，唯晓岚旁征远引，劝善警恶，所谓以鬼道设教，以补礼法所不足，王法所不及者，可谓善矣，第搢绅先生夙为人望，斯言一出，只恐释黄巫觋九幽十八狱之说藉此得为口实矣。

以鬼道设教，既有益于人心世道，儒者宜赞许之，但他终致不满，这也是他的长处，至少总是一个不夹杂道士气的儒家，其纯粹处可取也。又卷三有一则云：余巷外即通衢，地名江米巷，车马络绎不绝。乾隆年间有重车过辙，忽陷其轮，启视之，井也，盖久闭者，因负重石折而复现焉。里人因而汲饮，亦无他异，而远近好事者遂神其说，言龙见者，言出云者，言妖

匿者，言中毒者，有窥探者，倾听者，惊怪者，纷纷不已。余之相识亦时来询访，却之不能，辨之不信，聒噪数月始渐息。甚矣，俗之尚邪，无怪其易惑也。

此事写得很幽默，许多谈异志怪的先生们都受了一番奚落，而阮云台亦在其中，想起来真可发一笑。

（七月十八日于北平）

□1935 年 7 月 28 日刊《大公报》，署名知堂

□收入《苦竹杂记》

如 梦 录

友人从开封来，送我河南官书局所刻的几种书，其中我所最喜欢的是一册无名氏的《如梦录》。这是一个明末的遗老所撰，记录汴梁鼎盛时情景，犹宋遗民之著《梦华》《梦粱》也，向无刻本，至咸丰二年（一八五二）汴人常茂徕始据裴氏藏本参订付梓，民国十年重刊，即此书也。本来这是很好的事，所可惜的是编订的人过于求雅正，反而失掉了原书不少的好处。如常氏序中云：

“且录中语多鄙俚，类皆委巷秕稗小说，荒诞无稽，为文人学士所吐弃。如言繁塔为龙撮去半截，吹台是一妇人首帕包土一抛所成，北关王赴临埠集卖泥马，相国寺大门下金刚被咬脐郎缢死背膊上，唬金刚黑夜逃出门北，诸如此类，偻指难数，读之实堪捧腹。”因此根据了他“于其悠谬繁芜者节删之”的编例便一律除掉了，这实在是很可惜的。那些贵重的传说资料也可以说是虽百金亦不易的，本已好好地记录在书上了，却无端地被一刀削掉，真真是暴殄天物。假如这未经笔削的抄本还有地方可找，我倒很想设法找来一读，至少来抄录这些被删的民间传说，也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

话虽如此，现行本的《如梦录》里却也还有许多好材料，而且原著者的“俚言”虽然经过润色，到底是改不胜改，还随处保留着质朴的色味，读时觉得很是愉快。其《试院纪》一篇讲乡试情形甚详，今录一节云：

> 至日，按院在三门上坐点名，士子入场，散题。次日辰时放饭。大米饭，细粉汤，竹箩盛饭，木桶盛汤。饭旗二面前走，汤饭随后，自西过东，由至公堂前抬走。正行之际，晓事吏跪禀老爷抽饭尝汤，遂各盛一碗，接院亲尝可用始令放行。至月台下，一旗入西文场，一旗入东文场，至二门，二旗交过堂上，一声梆子响，各饭入号，散与士子食用。次放老军饭，俱是小米饭冬瓜汤，一样散法，按院不复尝。午间散饼果，向晚散蜡烛。

这不但可以考见那时情形，文章也实在写得不坏。《街市纪》文最长，几占全书之半，是最重要的部分，讲到封邱王府，云封邱绝后改为魏忠贤祠，忠贤势败，火急拆毁。注引《大梁野乘》云：

> 河南为魏珰建祠，树旌曰崇德报功。兴工破土，诸当事者咸往祭告，独提学曹履吉仰视长叹，称病不去拜。力役日千人，昼夜无息。当砌脊时，督工某大参以匠役张三不预禀以红氈觡包裹上兽而俟展拜，怒加责惩，盖借上兽阿奉为上寿也。工未毕，即拆毁，督工某急令先搬兽掷下，三忽跪禀曰，讨红氈觡裹下兽以便展拜。督工者复怒责之。或谓三多言取责，三日，吾臀虽苦楚，彼督工者面皮不知儿回热矣。

注盖系常氏所为，但所引事却很有意思，是极好的“幽默”，不但督工者是官僚代表，即张三亦可以代表民间，一热其面，一苦其臀，而汴梁之陆沉亦终不能免，此正是沉痛的一种“低级趣味”欤。（七月二十八日）

□1935 年 8 月 3 日刊《华北日报》，署名“不知”
□收入《苦竹杂记》

如梦录二

《如梦录》一卷，不著撰人姓名，记明季开封繁华情形，自序云，俾知汴梁无边光景，徒为一场梦境，故以为名。今所见印本有两种，其一为写梦铅字印本，其二为河南图书馆木刻本，二者皆成于民国，铅字本似较早出。

录中所记颇细致可喜，文亦质朴，惜刊本已经删削，如能觅得原本读之当更多佳处。前有咸丰二年常茂徕序，有云，“录中语多鄙俚，类皆委巷秕稗小说，荒诞无稽，为文人学士所吐弃，如言繁塔为龙撮去半截，吹台是一妇人首帕包土一抛所成，北关关王赴临埠集买泥马，相国寺大门下金刚被咬脐郎缢死臂膊上，唬金刚黑夜逃出北门，诸如此类，偻指难数，实堪捧腹。”即此可知所删去者是如何有趣味的故事，正是千钱难买的民间传说的好资料，由明末遗老辛苦的录存，抄本流传二百馀年之后，却被假风雅的文人学士一笔勾去，想起来真是十分惋惜也。

王阮亭评《梦粱录》，亦谓其文不雅驯，不知其可贵重即在不雅驯处，盖民间生活本不会如文人学士所期望的那么风雅，其不能中意自是难怪，而如实的记叙下来，却又可以别有雅趣，但此则又为他们所不及知者耳。

□1940 年 3 月 19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

① 题中“二”字为编者所加。

拜环堂尺牍

偶然得到《拜环堂文集》残本一册，会稽陶崇道著，存卷四卷五两卷，都是尺牍，大约是崇祯末刻本。我买这本破书固然是由于乡曲之见，一半也因为他是尺牍，心想比别的文章当较可观，而且篇数自然也多，虽然这种意思未免有点近于买萝卜白菜。看信里所说，似乎在天启时做御史，忤魏忠贤落职，崇祯中再起，在兵部及湖广两地方做官，在两篇尺牍里说起“石篑先叔”，可以知道他是陶望龄的堂侄，但是他的运气似乎比老叔还要好一点，因为遍查海宁陈氏所编的《禁书总录》不曾看见这部集名，在这里边讲到“奴虏”的地方实在却并不少。陶路叔的文章本来也写得颇好，但是我们看了第一引起注意的乃是所说明末的兵与虏的情形。这里可以抄引一二，如卷四《复李茂明尚书》云：

> 天下难题至京营而极矣，乱如禁丝，兼投之荆棘丛中，败烂如腐船，又沉入汪洋海底，自国朝以来几人能取而整理之？是何一入老公祖手不数月，声色不动，谈笑自若，而条理井然。去备兵营，掘狐狸之窟也，窟不难掘，而难于群狐之不号。以粮定军，如桶有箍，乃今片板不能增入矣。而粮票以营为据，不聚蚁而聚羊肉，蚁将安往？又禁充发之弊，诸窦杜尽矣。

又《与陆凤台尚书》云：

> 京师十月二十七日已后事想已洞悉。京军十万，如尘羹土饭，堪摆不堪嚼。当事者恐撄圣人怒，欲以半为战半为守，弟辈坚执不可，始作乘城之计。弟又谓乘城无别法，全恃火器，而能火器者百不得一。

此盖指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事也。又《与黄鹤岭御史》云：

> 国家七八年不用兵，持乾之士化为弱女。今虽暂远都城，而永平遵化非复我有，所恃无恐惟高皇帝在天之灵耳。

卷五《与马大将军》云：

> 虏骑渐北，志在遁逃。但饱载而归，不特目今无颜面，而将来轻视中国益复可虞。目下援兵虽四集，为鼠者多，为虎者少。

又卷四《答文太青光禄》云：

> 虏之蟠踞原非本心，无奈叛臣扣其马首，使不得前。此番之去谓之生于厌则可，谓之生于畏则不可。

复李茂明尚书更简明地说道：

> 城自完，以高皇帝之灵而完，非有能完之者。虏自去，以厌所欲而去，非有能去之者。

卷四《答荆璞岩户部》云：

> 奉教时尚未闻虏耗也，一变而至此，较之庚戌（一六一〇）其时十倍，其破城毁邑则百倍，而我师死于锋镝之下者亦百倍。内愈久而愈糜，外愈久而愈悍，中国之长技已见，犬羊之愿欲益奢，此后真不知所税驾矣。弟分辖东直门，正当虏冲，易章缝为■■，餐星寝露者四旬，今日始闻酋旌北指，或者虏亦厌兵乎。又一书盖在一年后，全文云：
>
> 记东直门答手教时五指欲堕，今且执拂驱暑矣。日月洵易迈，然虏不以客自处，我亦不以客处虏，任其以永遵作卧榻而鼾卧自如。朝士作高奇语，则轰然是之，作平实语则共诋以为恇怯。不知河水合后亦能如

---

① 《宇宙风》题作《明末的兵与虏》。

此支吾否？而司马门庭几同儿戏，弟言无灵，止付长叹，想台臺所共嗟也。

高奇语即今所谓高调，可见此种情形在三百年前已然。又有《致毛帅》（文龙）一书，说的更淋漓尽致，今录其一部分于下：

当虏之初起也，彼密我疏，彼狡我拙，彼合我离，彼捷我钝，种种皆非敌手，及开铁一陷，不言守而言战，不言战而且言剿。正如衰败大户仍先世馀休，久驾人上，邻居小民窥见室中虚实，故来挑搆，一不胜而怒目张牙，诧为怪事，必欲尽力惩治之。一举不胜，墙垣户牖尽为摧毁，然后紧闭门扇，面面相觑，各各相讥。

这一个譬喻很有点儿辛辣，仿佛就是现今的中国人听了也要落耳朵吧。

以上所说的抗清的一方面，另外还有投清的即上文所谓扣其马首的一方面。卷四《与梅长公巡抚》云：

虏踞遵永未必无归志，奈衿绅从叛者入胡则有集枯之虞，舍胡则有赤族之患，所以牵缠不割耳。

又《与陆凤台尚书》云：

世庙虏警，其来其去不越十六日。虏初阑入时举朝虽皇皇，料其不能久居，亦或与庚戌等，孰意蟠踞至此。总之白养粹等去中国则为亡虏，不去中国即得赤族，此所以牵挽不舍耳。

又《通傅元轩本兵》云：

奴虏披猖，阑入内地，我以七八十年不知兵之将卒当之，不特彼虎我羊，抑且羊俱附虎，如永遵二郡上自缙绅下及走卒，甘心剪发，女请为妾，子愿称臣，牵挽不放胡骑北去者四越月于兹，言之真可痛心，想老公祖亦不禁其发之欲竖也。

陶路叔的文章不知道说他是那一派好，大抵像王谑庵而较少一点古怪吧。在这两卷尺牍里就有好些妙语，如卷四《通张葆一巡抚》云：

弟处此譬之老女欲与群少年斗脂竞粉，不特粗眉不堪细画，亦觉宿酒不比新篘，高明何以教之？

又《与张人林年丈》，说家叔荣龄领乡荐后不得意，在睦州做广文先生，有云：

寿昌在睦州，犹身中之尻，不特声名文物两浙所绝无，即齿苋赤米不可幸致。日者携其眷属往，不一月而纷纷告归，如逃寇然。

卷五《答邹九一年兄》云：

某五年俗吏，当奇荒之后，扶饿孛之颈而求其生不得，益觉宦途滋味淡如冰雪。

又《答许芳谷抚台》云：

犹忆为儿时从先祖于贵署，东偏书室前荔枝石大如渔舟，后园垂柏高可十寻，不识至今在否。江右诸事约略如浅滩船独木桥，苦无转身地，不知粤西何如也。

这些文字都写得不坏，自有一种风趣，却又不落入窠臼，以致求新反陈，如王百谷之流那样。书中又有两封信全篇均佳，卷一《与天台山文心大师》云：

山中别时觉胸中口中有无数唱和语，而一抵家只字全无，甚哉有家之累也。蔬菜越人以此味压江南，乃天台亦产之，鹤背上又带出许多来，益惹妒矣。尊作细玩，字字清冷。序语不敢辞，或合诸刻汇成一集，抑散珠片金，且零星现露耶，便中幸示之。日者所惠藤杖被相知者持去，

又见所造叶笠甚佳，敢乞此二物以为山行胜具，不以我为贪否？一笑。

卷五《与王遂东工部》云：

> 江右相闻后至今又三载，荣俸及瓜，娇莺尚坐故枝，何也？荆去家四千里，去留都三千里，与翁台隔越遂同化外。小儿书来云，输金大邀宽政，晋谒之下饮以罗绮，浓情眷眼俱出格外，弟何施而受此赐，感谢感谢。拙剃不禁遭连鬓胡，荆南何地，有旧藩又有新藩，有水客又有陆客，有部使又有内使，旧江陵一血手溅及弟衣，遂欲与之共浣，鉴湖味如蜜，欲尝不可，奈之何哉。徐善伯差满将行，喜吴金堂为之继，尚有故乡声气，不然几孤另煞也。兹遣视小儿，手勒附谢。小儿质弱，即试未必售，山妻卧病，家间乏人，意欲稍傍宫墙即今还里，当事者倘加羁绁，犹望翁台一言松之也，并恳。

此信系寄谑庵的，说也奇怪，文字也有点像《文饭小品》中物了。剃发匠怕连鬓胡原是俗语，至今还有这句话，“遂欲与之共浣”云云乃点不好句读，究竟不知道是“共浣鉴湖”呢，还是“鉴湖味如蜜”，无论如何总觉得不大容易懂。

这两卷书百三十六页中有不少好文章好材料，很值得把他抄出来，若是照旧小说的说法，恐怕还会在梦里看见有人红袍纱帽来拜呢。但是，陶路叔生于明季，乱谈国事，居然无妨，而且清朝也没有找到他，列入禁书，这全是他自己的运气，却与我辈无干的了。（八月四日）

□1935 年 10 月刊《宇宙风》2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竹杂记》

广东新语

近来买了一两部好书。不，这所谓好书，只是自己觉得喜欢罢了，并不是什么难得的珍本，反正这都是几块钱一部的书，因为价廉所以觉得物美也未可知。这书一部是金圣叹的《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一部是屈翁山的《广东新语》。著者是明朝的遗民，书却都是清朝板，差幸是康熙年的刻本，还觉得可喜。我平常有一种怪脾气，顶讨厌那书里的避讳字，特别是清朝的。譬如桓字没有末笔，便当作“帖体”看待，玄弘二字虽然宋朝也有，却有点看不顺眼了，至于没臂膊的胤字与没有两只脚的颙字则简直不成样子，见了令人生气。顺治时刻的书没有这些样子，所以顶干净，康熙刻本里只有两个字，烨字又很少见，也还将就得过去，至于书刻得精不精尚在其次。

我很喜欢讲风物的书。小时候在丛书里见到《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北户录》等小册子，觉得很有兴味，唐以后书似乎没有什么了，《尔雅》统系的自然在外。明朝的有谢在杭的《五杂组》十六卷，虽然并不是讲一地方的，物部四卷里却有不少的好材料，而且文章也写得简洁有致。志地方风物的我在先有周栎园的《闽小记》四卷，今又加上这《广东新语》二十八卷，同样是我所爱读的。这本来与古地志如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高似孙的《剡录》等该是同类，不过更是随笔的了，文艺趣味因此增高，在乙部的地位也就变动，虽然还自有其价值。《五杂组》卷一有一则记闽中雪云：

> 闽中无雪，然间十馀年亦一有之，则稚子里儿奔走狂喜，以为未始见也。余忆万历戊子二月初旬天气陡寒，家中集诸弟妹构火炙蛎房啖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数刻地下深几六七寸，童儿争聚为鸟兽，置盆中戏乐，故老云数十年未之见也。至岭南则绝无矣。柳子厚答韦中立书云，二年冬大雪，逾岭被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仓皇噬吠，狂走累日。此言当不诬也。

《广东新语》卷一《天语》中说冰云：

> 粤无冰，其民罕知，有南风合冰东风解冻之说。岁有微霜则百物蕃盛，谚曰，勤下粪不如早犁田，言打霜也。冰生于霜，粤无冰，以无霜也，故语曰岭南无地着秋霜，又曰天蛮不落雪。即或有微冰，辄以为雪，或有微雷以为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辨者。……或极寒亦有微霰，然未至地已复为雨矣。少陵云，南雪不到地，是矣。

二文均佳，而《新语》娓娓百十言说粤之无冰无霜雪乃尤妙。或言有撰《北欧冰地志》者，其第二十章曰《关于蛇类》，文只一句云，“冰地无蛇”。庄谐不同，大意有相似者。卷二《地语》中记陈村茭塘洸口四市茶园诸文并佳，今节录其《四市》一文之上半云：

> 东粤有四市。一曰药市，在罗浮冲虚观左，亦曰洞天药市。有捣药禽，其声玎珰如铁杵臼相击，一曰红翠，山中人视其飞集之所，知有灵药。罗浮故多灵药，而以红翠为导，故亦称药师。一曰香市，在东莞之寥步，凡莞香生熟诸品皆聚焉。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也。一曰珠市，在廉州城西卖鱼桥畔，盛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土人多以珠肉饷容，杂姜齑，食之味甚甘美，其细珠若粱粟者亦多实于腹中矣。语曰，生长海隅，食珠衣珠。

又卷三《山语》中记罗浮山有云：

山远视之，一云也。大约阴则云在上，晴则云在下，半阴半晴则云在中以为常，顶曰飞云，言常在云中不可见也。又罗山在西多阴，故云常在其上，浮山在东多阳，故云常在其下。日之出，浮山先见，而罗山次之，以云在其下故也。

石洞多石，一山之石若皆以此为归，大小积叠无根柢。有曰挂冠石者，一砥一峙，峙者高数寻，砥者可坐人百许，尤杰出。自石罅行百馀武，夹壁一悬泉，仅三十尺，影蔽枫林而下，猿猴饮者出没水花中，见人弗畏。此洞之最幽处也。

《新语》的文章不像《景物略》或《梦忆》那样波峭，但清疏之中自有幽致。全书中佳文甚多，不胜誊录，其特别有意思者则卷十二《诗语》中有《粤歌》一则，凡二千三百馀言，纪录民间歌谣，今抄取数节：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声长节，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自己，此其为善之大端也。……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调踢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树石榴全着雨，谁怜粒粒泪珠红。曰：灯心点着两头火，为娘操尽几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又曰，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又曰：妹相思，蜘蛛结网恨无丝，花不年年在树上，娘不年年作女儿。《竹叶歌》曰：竹叶落，竹叶飞，无望翻头再上枝，打伞出门人叫嫂，无望翻头做女时。《素馨曲》曰：素馨栅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十月大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有曰：一更鸡啼鸡拍翼，二更鸡啼鸡拍胸，三更鸡啼郎去广，鸡冠沾得泪花红。有曰：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时则剧到如今，头发条条梳到尾，鸳鸯怎得不相寻。有曰：大头竹笋作三桠，敢好后生无置家，敢好早禾无入米，敢好攀枝无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

李雨村辑《南越笔记》十六卷，多抄《新语》原文，此篇亦在内，题曰《粤俗好歌》，但均不注出处，是一大毛病。《闽小记》文章亦佳，栎园思想却颇旧，不大能够了解那时的新文艺倾向，故书中关于闽歌没有类似的纪载，或者因为他不是本地人，所以不懂得，也说不定。清末郭柏苍著《竹间十日话》六卷，卷五中有一则云：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渡，娘子撑船来接郎。此福州儿辈曲也，明韩晋之先生载入文集中，谓此古三言诗也，闽无风，此却可当闽风。村农插秧歌云：等郎等到月上时，月今上了郎未来（叶音黎。《诗》：羊牛下来。《王母白云谣》：尚复能来。）莫是奴屋山低月出早，莫是郎屋山高月出迟？不是出早与出迟，大半是郎

没意来。记得当初未娶嫂，三十无月暗也来。词虽鄙亵，往复再三，亦文人才士托兴彤管也。

墨憨斋整十卷的编刊《山歌》只好算是例外，像这样能够赏识一点歌谣之美者在后世实在也是不可多得了。

屈翁山在明遗民中似乎是很特别的一个，其才情似钱吴，其行径似顾黄，或者还要倔强点，所以身后著作终于成了禁书，诗文集至今我还未曾买得。《广东新语》本来也在禁中，清末在广东有了重刊本，通行较多，就是在这记风物的书中，著者也时时露出感愤之气，最显著的是卷二《地语》中《迁海》这一篇，其上半云：

> 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以来，田庐丘墓子孙世守之勿替，鱼盐蜃蛤之利藉为生命。岁壬寅二月忽有迁民之令。满洲科尔坤介山二大人者亲行边徼，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资携累，仓卒奔逃，野外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明年癸卯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其八月，伊吕二大人复来巡界。明年申辰三月，特大人又来巡界。遑遑然以海防为事，民未尽空为虑，皆以台湾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孥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馀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之，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这一篇可以说是文情俱至了，然而因此难免于违碍，此正是常例也。书中禽兽草木诸语中尚多有妙文，今不再录，各文大抵转抄在《南越笔记》中，容易得见，若《迁海》者盖不可见者也。（甘四年九月十一日，于北平）

□1935 年 10 月刊《人世间》38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竹杂记》

岭南杂事诗抄

近来不知怎的似乎与广东很有缘分，在一个月里得到了三部书，都是讲广东风土的。一是屈大均著的《广东新语》二十八卷，一是李调元辑的《南越笔记》十六卷，一是陈坤著的《岭南杂事诗抄》八卷。这都不是去搜求来的，只是偶尔碰见，随便收下，但是说这里仍有因缘，那也未始不可以这样说。我喜欢看看讲乡土风物的书，此其一。关于广东的这类书较多，二也。本来各地都有这些事可讲，却是向来不多见，只有两广是特别，自《南方草木状》，《北户录》，《岭表录异》以来著述不绝，此外唯闽蜀略可相比，但热闹总是不及了。

屈翁山是明朝的遗民，《广东新语》成了清朝的禁书，这于书也是一个光荣吧。但就事论事，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内容很丰富，文章也写得极好，随便取一则读了都有趣味，后来讲广东事情的更忍不住要抄他。其分类为天地山水石等二十八语，奇而实在，中有坟语香语，命名尤可喜。从前读《酉阳杂俎》，觉得段柯古善于立新奇的篇名，如《尸穸》，如《黯》，如《肉攫部》等，《新语》殆得其遗意欤。卷八《女语》中乃列入《椓者》一则，殊觉可笑，本来已将疯人和盗收在卷七《人语》之末，那么椓者亦何妨附骥尾？但我在这条里得到很好的材料，据说五代末刘■时重用宦官，“进士状头或释道有才略可备问者皆下蚕室，令得出入宫闱”，因知明朝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之阉割优伶盖亦有所本也。

《南越笔记》出来的时候《广东新语》恐怕已经禁止了，但如我上边所说，李雨村确也忍不住要抄他，而且差不多全部都选抄。原来说是辑，所以这并不妨，只可惜节改得多未能恰好。卷四有《南越人好巫》一则，系并抄《新语》卷六《神语》中《祭厉》及《二司》之文。而加“南越人好巫”一语于其前，即用作题目，据我看来似不及原本。《二司》条下列记五种神道，全文稍长今不具录，但抄其下半于左：

> 有急脚先锋神者，凡男女将有所私，从而祷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酬之。神前香囊堆积，乞其一二，则明岁酬以三四。新兴有东山神者，有处女采桑过焉，歌曰，路边神，尔单身，一蚕生二茧，吾舍作夫人。还家果一蚕二茧，且甚巨。是夜风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红丝自屋起牵入庙中，追寻之，兀坐无声息矣。遂泥而塑之，称罗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于舟中目成，将及岸，女溺于水，男从而援之，俱死焉，二尸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为恩情庙。此皆丛祠之淫者。民未知义，以淫祠为之依归，可悲也。

《笔记》所录没有民未知义以下十四字，我想还是有的好。这令我想起永井荷风的话来。荷风在所著《东京散策记》第二篇《淫祠》中曾说过：

“我喜欢淫祠。给小胡同的风景添点情趣，淫祠要远胜铜像，更有审美的价值。”他后来列举对那欢喜天要供油炸的馒头，对大黑天用双叉的萝卜，对稻荷神献奉油豆腐等等荒唐无稽的风俗之后，结论说道：

“天真烂漫的而又那么鄙陋的此等愚民的习惯，正如看那社庙的滑稽戏和丑男子舞，以及猜谜似的那还愿的扁额上的拙稚的绘画，常常无限地使我的心感到慰安。这并不单是说好玩。在那道理上议论上都无可说的荒唐可笑的地方，细细地想时却正感着一种悲哀似的莫名其妙的心情也。”我们不能说屈翁山也有这种心情，但对于民众的行事颇有同情之处，那大抵是不错的

吧。

《岭南杂事诗抄》有些小注也仍不能不取自《新语》，虽然并不很多，大约只是名物一部分罢了。卷一有一首咏急脚先锋的，注语与上文所引正同，诗却很有意思：

既从韩寿得名香，一瓣分酬锦绣囊。
但愿有情成眷属，神仙原自羡鸳鸯。

民国初年我在大路口地摊上得到过一个秘戏钱，制作颇精，一面“花月宜人”四大字，一面图上题八字云，“得成比翼，不羡神仙”。这与诗意可互相发明。《杂事诗》卷七又有咏露头妻的一首，诗云：

乍聚风萍未了因，镜中鸾影本非真。
浮生可慨如朝露，飞洒杨花陌路人。

注云：“粤俗小户人家男女邂逅，可同寝处，俨若夫妇，稍相忤触，辄仍离异，故谓之露头妻，犹朝露之易晞也。”案此即所谓搭姘头，国内到处皆有，大抵乡村较少，若都市商埠则极寻常。骈枝生著《拱辰桥踏歌》卷上有一则云：

东边封起鸳鸯山，西边宕出鸳鸯场。
鸳鸯飞来鸳鸯住，鸳鸯个恩情勿久长。

这几首诗都颇有风人之旨，因为没有什么轻薄或道学气，还可以说是温厚。这是《杂事诗抄》的一种特色。此外还有一种特色，则是所咏大部分是关于风俗的。《诗抄》全部八卷共三百八十八首，差不多有五卷都是人事，诗数在二百首以上。草本鸟鲁虫鱼的记录在散文上容易出色，做成韵文便是咏物诗，咏得不工固然不好，咏得工又是别一样无聊，故集中才七十首，馀则皆古迹名胜也。卷五咏“半路吹”云：

妾本风前杨柳枝，随风飘荡强支持。
果能引凤秦台住，萧管何妨半路吹。

自注云：“粤俗贫家鬻女作妾，恐邻家姗笑，先向纳妾者商明，用彩舆鼓吹登门迎娶，至中途改装前往，谓之半路吹。”与上文露头妻均是好例，记述民间俚俗，而诗亦有风致。又卷七咏“火轮船”云：

机气相资水火功，不须人力不须风，
暗轮更比明轮稳，千里沧波一日通。

注云：“火轮船制自外洋，轮有明暗之分，以火蒸水取气激轮而行，瞬息百里，巧夺天工，近年中华俱能仿造，长江内河一律驶用矣。”诗并不佳，只取其意思明达，对于新事物亦能了解耳。我们随便拿陶方琦的诗来比较，在《湘麋阁遗诗》卷二有《坐火轮车至吴淞》一诗，末四句云：

“沪中地力久虚竭，凿空骋险宜荒陬，自予不守安步戒，西人于汝夫何尤。”陶君虽是吾乡学者，但此等处自不甚高明，不能及陈子厚。陶诗作于光绪丁丑，《如不及斋集》亦在此时刻成，陈诗之作当在陶前也。（十月十日）

□1935 年 10 月 25 日刊《大公报》，署名知堂
□收入《苦竹杂记》

古南馀话

自从《白香词谱笺》刻入《半庵丛书》流通世间，舒白香的名字遂为一般人所知，只看坊间多翻印《词谱》可以知道，虽然也有人把他和白香山混作一个的。但是，香的著作除《词谱》外平常却不很多见。从前我只有他的一部《游山日记》，记在庐山天池避暑时事，共十二卷，文章写得很有风趣，思想也颇明达，是游记中难得之作。后来又从上海买得一部书，无总名，共七册，内有书十一种二十九卷，其中十种都是白香所著，《游山日记》亦在内。查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辛，此即《舒白香杂著》，但书目有《骖鸾集》三卷，此本缺，而别多《联壁诗钞》二卷，录其伯祖东轩祖补亭诗各百首，父保斋诗二十五首。《缑山集》、《秋心集》、《花仙小志》各一卷，皆伤逝悼亡之作，《南征集》、《婺舲馀稿》各一卷，则行旅作也。又《和陶诗》一卷，《香词百选》一卷，系白香所作词，由其门人选录百篇。以上七种为诗词，散文则《游山日记》外有《古南馀话》五卷，《湘舟漫录》三卷，亦是诗话随笔之流，别有清新之趣，而不入于浮薄，故为难得。《古南馀话》卷四云：

> 仲实问诗馀小词自唐宋以迄元明可谓灿备，鲜有不借径儿女相思之情者，冬烘往往腹诽之，谓恐有妨于道学，其说然欤？余曰：天有风月，地有花柳，与人之歌舞其理相近，假使风月下旗鼓角逐，花柳中呵导排衙，不杀风景乎？天下不过两种人，非男即女，今必欲删却一种，以一种自说自扮，不成戏也。故虽学如文正公，亦复有儿女相思之句，正所谓曲尽人情，真道学也。道学之理不知何时竟讲成尘羹涂饭，致南宋奸党直诋为无用之尤，肆意轻侮，亦岂非冬烘妄测之过哉。夫道学所以正人心平天下也，苟好恶不近人情，则心术伪矣，亦恶能得人之情平人之心？《诗》之教，化行南国始自闺房，《书》之教，协帝重华基于妫■，理必然也，而况歌词乃导扬和气调燮阴阳之理，而顾讳言儿女乎。故自《十九首》以及苏李赠答魏晋乐章，其寓托如出一口，良由发乎性情耳。姑专就小词而论，才如苏公犹不免铁板之诮，谓其逞才气著议论也。词家风趣宁痴勿达，宁纤勿壮，宁小巧勿粗豪，故不忌儿女相思，反不贵英雄豁达，其声哀以思，其义幽以怨，盖变风之流也。其流在有韵之文最为卑近，再降而至于填词止矣，原可不学，学之则不可不求合拍。李后主，姜鄱阳，易安居士，一君一民一妇人，终始北宋，声态绝妩。秦七黄九皆深于情者，语多入破。柳七虽雅擅骚名，未免俗艳。玉田尚矣，近今惟竹垞老人远绍此脉，善手虽众，鲜能度越诸贤者。各就所得名之篇，注意之旨，揣声而学之，有馀师矣。

这可以算是白香的词论，读《词谱》的人当有可参考之处。其下一则云：

> 怡恭亲王昔重刻《白香词谱》时，问所订有遗憾否。余笑对言：有两事惜难补作，似有憾，一欲代朱夫子补作一词，一欲代姜鄱阳补捐一监。闻者绝倒。

又卷五录其少作《闲情集序》其上半云：情之正者日用于伦常之中，惟恐不足，恶得闲？然窃谓饥与谷相需，而先生之馔乃尚羞脯，所居不过容榻，而文王之圃半于国中，是闲复倍于正者何也？吾立于是，四旁皆闲地耳，使握其四旁若堑，则立者以惧。当暑而裸，冠服皆闲物耳，苟并其裘而

---

① 《宇宙风》题作《说闲情》。

毁弃，则裸者以忧。盖惧无馀地，而忧或过时，亦闲情耳。尧舜以箕颍为闲情，巢由亦以揖逊为闲情。夷齐以征伐为闲情，武周亦以饿死为闲情。将谓饿死为闲情，彼饿死何汲汲也。谓箕颍为闲情，彼遁世何无闷也。由是观之，无正非闲，无闲非正。身世之所遭，智力之所及，惨淡经营，都求美善，逮夫事往情移，梦回神往，即一身之中，旬日之内，所言所行，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又何况于局外闲观者哉。

辩说闲情，可谓语妙天下。下文又云：“吾故常默然也。不言人过失，人本无过失也。不言时务，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也，道听途说又恐传闻失实也。”引用《水浒传序》语，显然很受唱经堂的影响，虽然不曾明白说起。《湘舟漫录》中又有几节话说得很好，卷一说风流云：

黄龙寺晦堂长老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不答。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问曰，闻木犀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昨秋寓都昌南山，一夕与五黄散步溪桥间，仲实问风流二字究作何解。予曰，此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之象也，被有文无行人影射坏了，柳下惠、曾晳、庄子、诸葛孔明、陶靖节及宋之周邵苏黄，乃所谓真风流耳。吉人以为然。晦堂以禅趣释经，吾以经义训疑训，故牵连书之。

又卷三亦有类似的一则云：“雅达亦何与康济之学，而儒术重之？盖雅则贱货贵德，达则慕义轻生，故可重也。若只如世俗以诗酒书画为雅，以不拘行检为达，至于出处趣向义利生死之关，仍录录茫无择执，亦俗物耳，何雅达之有。”这种说法实在是很平实而亦新奇。为什么呢？向来只有那些不近人情的道学家与行不顾言的文人横行于世，大家听惯了那一套咒语，已经先入为主，所以对于平常实在的说法反要觉得奇怪，那也是当然的事吧。《古南馀话》有记琐事的几则亦均可喜，卷三云：

友三（案即古南寺住持僧）言往自村墟归，至野老泉下，遇见一狐低头作禹步，规行若环，而寺门一鸡即奋飞入其环中，为狐撄去，僧号逐不释。然则祝由治病，厌胜杀人，及飞头换腿之术，咸不诬矣。

友三又言，古南松鼠多而诈，竹初生则折其笋，栗未熟则毁其房，彼视狸如奴，视犬如仆，毫不畏。一日有猎人牵犬憩所巢树下，仰见鼠怒跃而号，松鼠竟直堕其前，不敢遁也。

友三尝筛米树下，一枭栖木末，俯视目眩，直堕筛中，因被擒。佃人病头眩，乞其枭，杀而食之，眩疾愈。余笑曰，理当益眩，何忽愈？然则使醉人扶醉人反不颠耶？刘伯伦有言，一石已醉，五斗解酲。是则以眩枭医眩人耳。吾问以枭食母事，友三谓一孚两子，子大则共食父母。余曰，不然，是人间只二枭矣，何宝刹枭声之多耶。盖亦犹人中之禽，偶一不孝，辄并其兄弟疑之，不尽然也。枭如能孝，吾且令乌为之友。

记录这些小动物的生态很有意思，其关于枭的说明亦有识见，虽然偶一不孝之说还不免有所蔽，至于鸡与松鼠受制于狐犬，盖系事实，如鼠之于猫，蛙之于蛇，遇见便竦伏不能动，世所习知。此虽仿佛催眠术，却与禁厌不同，盖一是必然而一是非必然，故祝由科与狐犬终不是一类也。

白香的文章颇多谐趣，在《游山日记》中最为常见，卷一记嘉庆九年六月甲子（初七日）事有一节云：“五老峰常在云中，不能识面。峰半僧庐为博徒所据，不可居。西辅至峰寺，云亦下垂，至寺门一无所见，但闻呼卢声，亦不知五峰绝顶尚离寺几千丈也。”

《游山日记》是一部很有趣味的书，其中记郡掾问铁瓦，商人看乌金太子，都写得极妙，现在却不多抄了。林语堂先生曾说想把这书重印出来，我很赞成他的意思，希望这能够早日实现，所以我在这里少说一点亦正无妨耳。

（二十四年九月廿四日，于北平）

□1935 年 11 月刊《宇宙风》4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竹杂记》

郝氏说诗

偶然得到《名媛诗话》十二卷，道光间刊，钱塘沈湘佩夫人著，卷五记钱仪吉室陈炜卿事云：

“有《听松楼遗稿》内载《授经偶笔》，序述记赞跋论家书诸著作，议论恢宏，立言忠厚，诗犹馀事耳。”《诗话》中因引其论《内则》文二篇，论“国风”《采■》及《燕燕》文各一篇，文章的确写得还简要，虽然所云阐发经旨，也就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女子平常总是写诗词的多，散文很少见，在这一点上《听松楼遗稿》是很值得注意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可以相比，这是《职思斋学文稿》的著者“西吴女史”徐叶昭，序上亦自称听松主人。《文稿》收在徐氏家集《什一偶存》里，有乾隆甲寅序，末云：

“今者综而甄之，涉于二氏者，类如语录者，近于自用自专者，悉为删去，其辨驳金溪馀姚未能平允者亦尽去之，于是所存者仅仅庶几无疵而已，以云工，未也。呜呼，予老矣，恐此事便已，如之何？”案其时盖年六十六岁也。所存文共三十五篇，多朴实冲淡可诵读，大不易得。只可惜由佛老而入程朱，文又宗法八家，以卫道为职志，而首小文十篇，论女道以至妾道婢道，文词虽不支不蔓，其意义则应声而已。又有《与大妹书》，论奉佛之非，晓晓不休，更是落了韩愈的窠臼了。所作传志却简洁得体，如《夫子鹤汀先生述》首节云：

“呜呼，君之行亦云似矣，第世之传志不免文说其辞，真与伪无从辨别，故余苟非可证今人者概不敢及。夫一呐呐然老诸生耳，乌有卓行之可称？顾无可表见之中，止此日用行习已为世俗之所不能到，其可默而不言？”这几句写得不坏，虽然不能说是脱套，末尾音调铿锵处尤为可议。此君盖颇有才气，据其自序中述少年时事云：

“■考古稽今，多所论著，如官制兵制赋役催科礼仪丧服贡举刑书，偏私臆见，率意妄言，虽其中或间有可采者，而以草野议朝章，以妇人谈国典，律以为下不倍之义，窃惴惴焉。”终乃汩没于程朱二氏韩欧八家，下乔木而入幽谷，真可惜也！

清朝女作家中我觉得最可佩服的是郝懿行的夫人王照圆。《晒书堂文集》后附有《闺中文存》一卷，系其孙郝联薇所刊，共文十一篇，半系所编著书序跋，末一篇为《听松楼遗稿跋》，中有一节云：

“颜黄门云：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余于子女有慈无威，不能勤加诱导，俾以有成，今读《授经偶笔》及尺素各篇，意思勤绵，时时以课读温经形于椠墨，虽古伏生女之授书，宋文宣之传礼，不是过焉，余所弗如者五矣。”其实据我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弗如，郝君夫妇的文章思想不知怎地叫人连想颜黄门，而以颜黄门相比，在我却是很高的礼赞，其地位迥在授经载道者之上。听松楼的《偶笔》只在《诗话》中见到几则，大抵只是平平无疵耳，照例说话而能说得明白，便难得了，不能望其有若何心得或新意思也。王照圆所著述书刻在“郝氏丛书”内者有《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正》《梦书》等，《葩经小记》惜未刻，但在与郝兰皋合著的《诗问》及《诗说》中间还保留着不少吧。之罘梦人（王照圆自称）无诗集，仅在，《读孝节录》文中见有七绝一首，亦不甚佳，但其说诗则殊佳妙，吾乡季彭山（王阳明的门人，徐文长的先生，也是鄙人的街坊，因为他的故居在春波桥头禹迹寺旁，与吾家祖屋相去只一箭之远也）所著《说诗解颐》略一拜读，

觉得尚不及王说之能体察物理人情，真有解颐之妙。《诗说》卷上云：

瑞玉问：女心伤悲应作何解？余曰，恐是怀春之意，《管子》亦云，春女悲。瑞玉曰，非也，所以伤悲，乃为女子有行，远父母故耳。盖瑞玉性孝，故所言如此。余曰，此匡鼎说诗也。

《诗问》卷二，《七月》“遵彼微行”注云：

余问，微行，传云墙下径？瑞玉曰，野中亦有小径。余问，遵小径以女步迟取近耶？曰，女子避人尔。

虽不必确，亦殊有意趣，此种说经中有脉搏也。又卷一，《氓》“三岁食贫”注云：

余问，既贿迁何忧食贫？瑞玉曰，男狭邪不务生业，女侥资财何益也。

又“总角之宴”注云：

瑞玉问：束发已私相宴安言笑，何待贸丝时？余曰，总角相狎，比长男女别嫌，不复通问，乃贸丝相诱，始成信誓。

解说全章诗意亦多胜解，如《丘中有麻》云：

《丘中有麻》，序云，思贤也，留氏周之贤人，遁于丘园，国人望其里居而叹焉。瑞玉曰。人情好贤，经时辄思，每见新物则一忆之。有麻秋时，有麦夏时，无时不思也。麻麦，谷也，李，果也，无物不思也。

《风雨》首章注云：

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解云：

《风雨》，瑞玉曰，思故人也。风雨荒寒，鸡声嘈杂，怀人此时尤切，或亦夫妇之辞。

《溱洧》解云：

《溱洧》，序云，刺乱也。瑞玉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修禊溱洧之滨，士女游观，折华相赠，自择昏姻，诗人述其谣俗尔。

《诗说》卷上载瑞玉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二句可疑。郝君引《竹书纪年》解之曰：

周公自二年秋东征，至四年春便还，前后不过年馀，举成数故云三年耳。又以见周公之悯归士，未久而似久也。且详味诗意，前三章都是秋景，至末一章独言春日，盖军士以秋归，以冬至家，比及周公作诗之时则又来年春矣，故末章遂及嫁娶之事，言婚姻及时也。此事诗书缺载，据《竹书》所记年月始终恐得其实，未知是否。瑞玉日，恐是如此。又曰，读此诗，可知越王勾践之生聚其民，不过欺卖之耳，那有真意。

此语殊有见识，即士大夫亦少有人能及。训诂名物亦多新意，而又多本于常识，故似新奇而实平实。如《七月》“七月亨葵及菽”注云：

瑞玉曰：菜可烹，豆不可烹，盖如今俗作豆粥尔。其法，菜半之，豆半之，煮为粥，古名半菽，《夏小正》谓短闵也。

又“采荼薪樗”注云：

瑞玉曰，荼苦，得霜可食。樗非为薪也，九月非樵薪之时，且下句遂言食我农夫，则二物皆供食也。樗，椿类，叶有香者，腌为菹，九月叶可食，薪者枝落之，采其叶也。

此二条亦见《诗说》中，但较详。把《诗经》当作文学看，大抵在明末已有之，如《读风偶评》可见，不过普通总以外道相待，不认为正当的说法，若

以经师而亦如此说，则更希有可贵矣。《诗说》卷上云：

瑞玉因言，《东山》诗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濛，盖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际尤难为怀，所以《东山》劳归士则言雨，《采薇》之遣戍则言雪，《出车》之劳还率亦言雪。《七月》诗中有画，《东山》亦然。古人文字不可及处在一真字，如《东山》诗言情写景，亦止是真处不可及耳。

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触物惊心，易胜今昔之感，所谓尽是刘郎去后栽者也。二句描写村居篱落间小景如画，诗中正复何所不有。

又云：

晋人论诗，亟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及訏谟定命，远犹辰告，以为佳句。余谓固然，佳句不止此也。如鸡栖于树，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写乡村晚景，睹物怀人如画，又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渺然有天际真人想。其室则迩，其人则远，渺渺予怀，悠然言外。东门之栗，有践家室，止有践二字便带画景。至如汉之广兮，不可泳思，江之永兮，不可方思，尤所谓别情云属，文外独绝者也。（十一月）

□1935 年 11 月 21 日刊《益世报》，署名知堂

□收入《苦竹杂记》

蒋子潇游艺录

日前得到一册蒋子潇所著的《游艺录》，有山阴叶承沣的原序，无年月，此乃是光绪戊子长白豫山在湖南所重刻。书凡三卷，卷上凡三十三目，皆象纬推步舆地之说，从《蒋氏学算记》八卷中抄出，门人彭龄在目录后有附记，云门人等虽闻绪论，莫问津涯者也。卷下凡二十四目，皆从《读书日记》十卷中抄出，杂论各家学术得失。第三卷为别录，凡文八篇，叶序云仙佛鬼神之作，实则为论释道及刺麻教等关于宗教者七篇，又《天方声类》序一篇，乃以亚刺伯字来讲音韵也。在这里边第一分简直一点不懂，第二分读了最觉得有意思，可佩服，虽然其后半讲医法术数的十四篇也不敢领教了。下卷各篇多奇论，如《九流》引龚定庵之言曰，九流之亡儒家最早。又《大儒五人》则列举郑司农、漳浦黄公、黄南雷、戴东原、钱竹汀。但我觉得有趣的，却是不关经学儒术大问题的文章，其论近人古文云：

> 余初入京师，于陈石士先生座上得识上元管同异之，二君皆姚姬传门下都讲也，因闻古文绪论，谓古文以方望溪为大宗，方氏一传而为刘海峰，再传而为姚姬传，乃八家之正法也。余时于方姚二家之集已得读之，唯刘氏之文未见，虽心不然其说而口不能不唯唯。及购得海峰文集详绎之，其才气健于方姚而根柢之浅与二家同，盖皆未闻道也。夫文以载道，而道不可见，于日用饮食见之，就人情物理之变幻处阅历揣摩，而准之以圣经之权衡，自不为迂腐无用之言。今三家之文误以理学家语录中之言为道，于人情物理无一可推得去，是所谈者乃高头讲章中之道也，其所谓道者非也。

八家者唐宋人之文，彼时无今代功令文之式样，故各成一家之法，自明代以八股文为取士之功令，其熟于八家古文者，即以八家之法就功令文之范，于是功令文中钩提伸缩顿宕诸法往往具八家遗意，传习既久，千面一孔，有今文无古文矣。豪杰之士欲为古文，自必力研古书，争胜负于韩柳欧苏之外，别辟一径而后可以成家，如乾隆中汪容甫、嘉庆中陈恭甫，皆所谓开径自行者也。今三家之文仍是千面一孔之功令文，特少对仗耳。以不对仗之功令文为古文，是其所谓法者非也。余持此论三十年，唯石屏朱丹木所见相同。八家以后的古文无非是不对仗的八股，这意见似新奇而十分确实，曾见谢章铤在《赌棋山庄随笔》亦曾说及，同意的人盖亦不少。我却更佩服他关于道的说法，道不可见，只就日用饮食人情物理上看出来，这就是很平常的人的生活法，一点儿没有什么玄妙。正如我在《杂拌儿之二》序上所说，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誌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假如蒋君先是那样说明，再来主张文以载道，那么我就不会表示反对，盖我原是反对高头讲章之道，若是当然的人生之路，谁都是走着，所谓何莫由此道也。至于豪杰之士那种做古文法我们可以不论，大抵反抗功令时文只有两条路走，倒走是古文，顺走是白话，蒋君则取了前者耳。又有《袁诗》一则云：乾隆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及其既卒而嘲毁遍天下，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变而以骂袁自重，毁誉之不足凭，今古一辙矣。平心论之，袁之才气固是万人敌也，胸次超旷，故多破空之论，性海洋溢，

---

① 《宇宙风》题作《谈桐城派与随园》。

故有绝世之情。所惜根柢浅薄，不求甚解处多，所读经史但以供诗文之料而不肯求通，是为袁之所短。若删其浮艳纤俗之作，全集只存十分之四，则袁之真本领自出，二百年来足以八面受敌者袁固不肯让人也。寿长名高，天下已多忌之，晚年又放诞无检，本有招谤之理，世人无其才学，不能知其真本领之所在，因其集中恶诗，遂并其工者而一概摈之，此岂公论哉。王述庵《湖海诗传》所选袁诗皆非其佳者，此盖有意抑之，文人相轻之陋习也。

这里对于随园的批评可谓公平深切，褒贬皆中肯，我们平常只见捧袁或骂袁的文章，这样的公论未曾见到过。我颇悔近来不读袁集，也因为手头没有，只凭了好些年前的回忆对于随园随便批评，未免失于轻率，我想还得研究一下再说。我并不骂他的讲性灵，大抵我不满随园的地方是在这里所说的根柢浅薄，其晚年无检实在也只是这毛病的一种征候罢。骂袁者不曾知其真本领，这话很是的确，王述庵实在也是如此，所以未能选取好诗，未必由于文人相轻。近年来袁中郎渐为人所注意，袁简斋也连带地提起，而骂声亦已大作，蒋君此文或可稍供参考，至于难得大众的赞同亦自在意中，古今一辙，作者与抄者均见惯不为怪也。

关于蒋子潇的著作和事迹，我从玄同借到《碑传集补》第五十卷，内有夏寅官的《蒋湘南传》，又从幼渔借到《七经楼文抄》六卷，其《春晖阁诗》六卷无从去借，只在书店里找来一册抄本，面题“盛昱校抄本陈蒋二家诗”，内收元和陈梁叔固始蒋子潇诗各一卷，各有王鹆所撰小传一篇，而蒋诗特别少，只有八页四十三首，纸尾有裁截痕，可知并非完本。夏寅官所作传大抵只是集录《文抄》中王济宏、刘元培、刘彤恩诸人序中语，只篇首云“先世本回部”为各序所无耳。王鹆小传则云，“故回籍也，而好食肉饮酒”，盖蒋君脱籍已久远，如《释藏总论》中云，“回教即婆罗门正派也”，便可见他对于这方面已是颇疏隔的了。夏传根据王序，云蒋于道光乙未中式举人，后乃云道光戊子仪征张椒云典河南乡试时所取中，自相矛盾。未又云：

“林文忠尝笑椒云曰，吾不意汝竟得一大名士门生。”此盖亦根据王序，原文云：

“往椒云方伯又为述林文忠公之言曰，吾不意汝竟有如此廓门生。”所谓廓即阔也，夏传一改易便有点金成石之概。叙述子潇的学术思想以王刘二序为胜，此外又见钟骏声著《养自然斋诗话》卷七有云：

“古经生多不工为诗，兼之者本朝唯毛西河、朱竹垞、洪北江三人而已，孙渊如通奉以治经废诗，故其诗传者绝少。固始蒋子潇湘南邃于经学，在《七经楼文抄》于象纬舆地水利韬略之说靡不精究，乃其《春晖阁诗》皆卓然可传。先生自言初学三李，后师杜韩，久乃弃各家而为一己之诗。又言古诗人唯昌黎通训诂，故押韵愈险愈稳，训诂者治经之本，亦治诗之本也。其言可谓切中。”我于经学以及象纬等等一无所知，古文辞也只一知半解，故对于《文抄》各篇少能通其奥义，若文章虽不傍人藩篱似亦未甚精妙，诗所见不多，却也无妨如此说。抄本中有《废翁诗》四首，因系自咏，故颇有意思，有小序云：

昔欧阳公作《醉翁亭记》，年方四十，其文中有苍颜白发语，岂文章政事耗其精血，既见老态，递不妨称翁耶。余年五十时自号废翁，盖以学废半途，聪明日减，不复可为世用，宜为天之所废也，而人或谓称翁太早。今又四年，须发渐作斑白，左臂亦有风痹之势，则废翁二字不

必深讳，聊吟小诗以告同人。

其二四两首云：

日暮挥戈讵再东，读书有志奈途穷。饥驱上座诸侯客，妄想名山太史公。作贼总非伤事主，欺人毕竟不英雄。茫茫四顾吾衰甚，文苑何尝要废翁。

万水千山作转蓬，避人心事效墙东。那堪辟历惊王导，幸未刊章捕孔融。

千古奇文尊客难，一场怪事笑书空。枯鱼穷鸟谁怜乞，遮莫欧刀杀废翁。

据我看来，蒋君的最可佩服的地方还是在他思想的清楚通达，刘元培所谓大而入细，奇不乖纯，是也。如中国人喜言一切学术古已有之，《文抄》卷四中则有《西法非中土所传论》，又《游艺录》末卷《释藏总论》中云：

余尝问龚定庵曰，宋人谓佛经皆华人之谲诞者假庄老之书为之。然欤？定庵曰，此儒者夜郎自大之说也。余又尝问俞理初曰，儒者言佛经以初至中华之《四十二章》为真，其馀皆华人所为，信欤？理初曰，华人有泛海者，携《三国演义》一部，海外人见而惊之，以为此中国之书也，其聪明智慧者嗤笑之，谓中华之书仅如此乎？及有以《五经》《论语》至者，则傲然不信曰，中华之书只《三国演义》耳，安得有此！世之论佛经者亦犹是也。余因二君之说以流览释藏全书，窃以佛经入中华二千馀年，而西来本旨仍在明若昧之间，则半晦于翻译，则半晦于禅学也。

此与《道藏总论》一篇所说皆甚有意趣，此等文字非普通文人所能作，正如百六十斤的青龙偃月刀要有实力才提得起，使用不着花拳样棒也。蒋君的眼光胆力与好谈象纬术数宗教等的倾向都与龚定庵俞理初有相似处，岂一时运会使然耶？至宋平子夏穗卿诸先生殁后此风遂凌替，此刻现在则恍是反动时期，满天下唯有理学与时文耳。查定庵《已亥杂诗》有一首云：

“问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风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过，乃是虹生与子潇。”注曰，“吴虹生及固始蒋子潇孝廉也。”惜近日少忙，不及去翻阅《癸巳存稿》《类稿》，或恐其中亦有说及，只好且等他日再查了。

［附记］《文抄》卷四有《与田叔子论古文书》，第一书绝佳，列举伪古文字八弊，曰奴蛮丐吏魔醉梦喘，可与桐城派八字诀对立，读之令人绝倒，只可惜这里不能再抄，怕人家要以我为文抄公也。

［附记二］近日又借得《春晖阁诗抄选》二册，亦同治八年重刊本，凡六卷，诗三百首。有阳湖洪符孙元和潘筠基二序，《养自然斋诗话》所云盖即直录潘序中语，王鹆撰小传则本明引洪序也。我于新旧诗是外行，不能有所批评，但有些诗我也觉得喜欢。卷一有《秋怀七首》，其第六云：研朱点毛诗，郑孔精神朗。伟哉应声虫，足以令神往。俗儒矜一灯，安知日轮广。辞章如沟潦，岂能活菱蒋。枉费神仙爪，不搔圣贤痒。我心有明镜，每辨英雄诳。诸语颇可喜。《废翁诗》四章则选中无有，盖抄而又选，所删去的想必不少，我得从盛昱本中见之，亦正自有缘分也。

（十一月八日于北平苦雨斋）

□1935 年 12 月刊《宇宙风》6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竹杂记》

三部乡土诗

近二十年来稍稍搜集同乡人的著作。“这其实也并不能说是搜集，不过偶然遇见的时候把他买来，却也不是每见必买，价目太贵时大抵作罢。”在《苦竹杂记》里这样地说明过，现在可以借来应用。所谓同乡也只是山阴会稽两县，清末合并称作绍兴县，但是我不很喜欢这个名称，除官文书如履历等外总不常用。本来以年号作县名，如嘉定等，也是常事，我讨厌的是那浮夸的吉语，有如钱庄的招牌，而且泥马渡康王的纪念也用不着留到今日，不过这是闲话暂且不提。“看同乡人的文集，有什么意思呢？以诗文论。这恐怕不会有多大意思。”这话前回也已说过。“事与景之诗或者有做得工的，我于此却也并没有什么嗜好，大约还是这诗中的事与景，能够引起我翻阅这些诗文集的兴趣。因为乡曲之见，所以搜集同乡人的著作，在这著作里特别对于所记的事与景感到兴趣，这也正由于乡曲之见。纪事写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独于乡土著作之事与景能随喜赏识者，盖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亲历，故感觉甚亲切也。”

诗文集有专讲一地方的，那就很值得翻阅。这有些是本乡人所撰，有些是出于外乡人之手，我都同样地想要搜集。孔延之的《会稽掇英集》，王十朋的《会稽三赋》各注本，陈祖昭的《鉴湖棹歌》等是第二类，第一类有陶元藻的《广会稽风俗赋》，翁元圻注本，李寿朋的《越中名胜赋》，周晋■的《越中百咏》，周调梅的《越咏》，张桂臣的《越中名胜百咏》等。但是还有几种，范围较小，我觉得更有意思。其一是《娱园诗存》四卷，光绪丙戌刊本。娱园是秦树铦的别业，在会稽小皋步，陶方琦李慈铭等人所结的“皋社”就在那里，古来也出过些名人，据我所知道，明末参严嵩的沈炼与清初撰那《度针篇》的闻人均便都是小皋步人。（至少沈青霞的后人住在那村里。）《诗存》卷一即是《皋社联吟集》，卷二三是关于娱园的题咏，卷四曰《感怀集》，皆主人“怆念存殁”之作。我的大舅父是秦君的女婿，曾经寄寓在那里，所以在庚子前后我到过娱园有好几次，读集中潭水山房微云楼诸咏，每记起三十多年前梦影，恍忽如在目前。区区一园之兴废，于后之读者似无关痛痒，但如陶方琦序中所云：

越风绵亘，盛乎诗巢。诗巢倾翳，百年阒如。
音骙多舛，吟律鲜守。皋中诗社，崛起于后。
东州蟠郁，偏师钟衍。诗社十人，争长娱园。

《诗存》四卷正是皋社文献之仅存者，颇足供参考，娱园主人的诗也只见此集中，少时虽然及见秦少渔先生，惜未能问其先世遗稿，盖其时但解游嬉或索画墨梅而已。

其二是《鞍村杂咏》一卷。道光丁酉刊本。题曰安山第七桥半亭老人，即山阴沈宸桂，著有《寿樟书屋诗钞》一卷，卷首为《马鞍村十咏》，序中述村名缘起云：

“余家在马鞍村。村口有山，其形如马。秦始皇时，望气者云，南海有五色气，遂发卒千人，凿断山之冈阜，形如马鞍。附山居民遂以名村，至今山顶凿痕具在。”次为《马鞍村春日竹枝词》八首，《村居四时杂咏》廿二首，《村名词》《庵名词》各十二首，此外杂题十三首。沈君诗本平常，又喜沿袭十景之名，或嵌字句，益难出色，唯专就一村纪事写景，亦别有意义，其村居诗更较佳，如其十八云：

老妻扶杖念弥陀，稚子划船唱棹歌。

村店满缸新酒贱，俞公塘上醉人多。

写海边村景颇有风致。其廿二末联云，“村居歌咏知多少，惟爱南湖陆放翁。”又杂题亦多拟剑南体者，可知作者的流派，正亦可谓之“乡曲之见”，殊令不佞读之不禁微笑也。

其三是《墟中十八图咏》一卷，影抄本。有毛奇龄宋衡邵廷采戴名世序，章士俞公谷陶及申跋，章标所画墟中图十八幅，章世法叙记十八则，章大来、麟化、士、成楗、成栻、应枢、锜钟、世法、标等十人五言绝句各十八首，共一百八十首。所谓墟者即会稽道墟村，章氏聚族而居之地，择墟中十八境，会章氏十人，倡为诗章，乃成是集。查文中年代为康熙四十二年壬午（一七〇二），据章士题后当时盖曾刻板，钞本则似出于乾隆时，笔迹不工，又不懂画法，所摹图尤凌乱，但即看此本而尚觉图之可喜，然则原画之佳盖可知矣。戴南山序署壬午闰六月，其称述墟中图云：

余披其图，泉石之美秀，峰岭之俊拔，园林之幽胜，亭馆之参差，云树之缥缈，鱼鸟之飞跃，以及桑麻果蔬，牛羊鸡犬，藩篱村落，场圃帆樯，莫不历历在目，而恍若身游其中，则余又何必以未至为恨乎。

这虽似应酬的套语，其实却是真话，因为他画的确有特色，不是普通的山水画那样到处皆是而又没有一处是的。我最喜欢那第十二的杜浦一幅。我从小就听从杜浦来的一个章姓工人讲海边的事，沙地与“舍”（草屋），棉花与西瓜，角鸡与獾猪等等，至今不能忘记。看那图时自然更有兴味，沿海小村，有几所人家，却不荒凉，沙碛上两人抬了一乘兜轿，有地方称“过山龙”，颇有颊上添毫之妙。又第十八宜嘉尖，画一田庄，柴门临水，门口泊酒船，有两个工人抬着一大坛往里边走。第四南阳坂，有山有河，有桥有船，有田有人，有牛有树，此真是东南农村的一角也，其真实处几乎要有点像地图了，而仍有图画之美，在寻常山水册中岂容易找得出乎。诗的数目十倍于图，但是我没有多少话可说。这里且举出章应枢的一首《杜浦》来：

沙堆何累累，来沙不见水。

负担上塘来，识是隔江子。

据章士题后云：

“岁辛已余与宗人联吟墟中，合两山之间择而赋之，得境十八，凡十人，得诗一百八十，宁涩毋滑，宁生毋熟，宁野朴不近人情，毋为儿女子嗫嚅态。”可以约略知道他们的态度。但是王维裴迪往矣，后之人欲用五言咏风土之美，辋川在前，虽美弗彰也。大抵此类书籍的价值重在文献的方面，若以文艺论未免见绌，唯墟中图则自有佳处，我只可惜未能得到原刊本耳。（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北平）

□1936 年 1 月 1 日刊《大公报》，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燕京岁时记

《燕京岁时记》一卷，富察敦崇著，据跋盖完成于光绪庚子，至丙午（一九〇六）始刊行，板似尚存，市上常有新印本可得。初在友人常君处所见系宣纸本，或是初印，我得到的已是新书了，但仍系普通粉连，未用现今为举世所珍重的机制连史纸，大可喜也。润芳序中略述敦君身世，关于著作则云：

> 他日过从，见案头有《燕京岁时记》一卷，捧读一过，具见匠心，虽非巨制鸿文，亦足资将来之考证，是即《景物略》《岁华记》之命意也。虽然，如礼臣者其学问岂仅如此，尚望引而伸之，别有著作，以为同学光，则予实有厚望焉。

其实据我看来这《岁时记》已经很好了，但是我却又能够见到他别的著作，更觉得有意思，这也并非巨制鸿文，只是薄薄地一册文集，题曰《画虎集文钞》，上有我的二月十四日的题记云：

“前得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昨游厂甸见此集，亟购归，虽只寥寥十三叶，而文颇质朴，亦可取也。”这书虽然亦用粉连纸印，而刻板极坏，比湖北崇文书局本还要难看，有几处已经糊纸改写，错字却仍不少，如庶吉士会刻作庶吉主，可见那时校刻的草草了。集中只有文十一篇，首篇是复其内弟书，叙庚子之变，自称年四十六，未为周毓之诗序，作于甲子春，署七十老人某病中拜序，可以知其年岁及刻书的时代大概。十一篇中有六篇都说及庚子，深致慨叹，颇有见识，辛亥后作虽意气销沉，却无一般遗老丑语，更为大方，曾读《涉江文钞》亦有此感，但惜唐氏尚有理学气耳。辛丑所作《增旧园记》有云：

“斯园也以弹丸之地，居兵燹之中，虽获瓦全，又安能长久哉。自今以往，或属之他人，或鞠为茂草，或践成蹊径，或垦作田畴，是皆不可知矣，更何敢望如昔之歌舞哉。”此增旧园在铁狮子胡同，即铁狮子所在地，现在不知如何了，昔年往东北城教书常走过此街，见有高墙巍巍，乃义威将军张宗昌别宅也，疑即其处。记末又言古来宫殿尽归毁灭，何况蕞尔一园，复云：

“其所以流传后世者亦惟有纸上之文章耳，文章若在则斯园为不朽矣，此记之所由作也。”今园已不在，此十三叶的文集不知天壤间尚有几本，则记之存盖亦仅矣。《碣石逋叟周毓之诗序》云：

> 癸亥嘉平以诗一卷见寄，并嘱为序，研读再四，具见匠心，间亦有与予诗相似者。盖皆读书无多，纯任天籁，正如鸟之鸣春，虫之鸣秋，嘈嘈唧唧，聒耳不已，诘其究竟，鸟既不知所鸣者为何声，虫亦不知所鸣者为何律也，率其性而已矣，吾二人之诗亦复如此。

《画虎集》中无诗钞，只在《岁时记》中附录所作六首，游潭柘山三首及钓鱼台一首均系寻常游览之作，京师夏日闺词两首稍佳，大抵与所自叙的话相合，这在诗里未能怎么出色，但不是开口工部，闭口涪翁，总也干净得多，若是在散文里便更有好处了。《岁时记》跋之二云：

“此记皆从实录写，事多琐碎，难免有冗杂芜秽之讥，而究其大旨无非风俗游览物产技艺四门而已，亦《旧闻考》之大略也。”这从实录写，事多琐碎两件事，据我看来不但是并无可讥，而且还是最可取的一点。本来做这种工作，要叙录有法，必须知识丰富，见解明达，文笔殊胜，才能别择适当，布置得宜，可称合作，若在常人徒拘拘于史例义法，容易求工反拙，倒不如者老实实地举其所知，直直落落地写了出来，在琐碎朴实处自有他的价值与

生命。记中所录游览技艺都是平常，其风俗与物产两门颇多出色的纪述，而其佳处大抵在不经意的地方，盖经意处便都不免落了窠臼也。如一月中记耍耗子耍猴儿耍苟利子跑旱船，十月的糟蟹良乡酒鸭儿广柿子山里红，风筝毽儿琉璃喇叭咘咘噔太平鼓空钟，蛐蛐儿聒聒儿油壶卢，梧桐交嘴祝顶红老西儿燕巧儿，栗子白薯中果南糖萨齐玛芙蓉糕冰糖壶卢温朴，赤包儿斗姑娘海棠木瓜沤朴各条，都写得很有意思。又如五月的石榴夹竹桃云：

> 京师五月榴花正开，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与夹竹桃罗列中庭，以为清玩，榴竹之间，必以鱼缸配之，朱鱼数头，游泳其中，几于家家如此。故京师谚曰，天篷鱼缸石榴树。盖讥其同也。

七月的荷叶灯蒿子灯莲花灯云：

> 中元黄昏以后，街巷儿童以荷叶燃灯，沿街唱曰：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恍如万点流萤，谓之蒿子灯。市人之巧者又以各色彩纸制成莲花莲叶花篮鹤鹭之形，谓之莲花灯。谨案《日下旧闻考》荷叶灯之制自元明以来即有之，今尚沿其旧也。

又其记萨齐玛等云：

> 萨齐玛乃满州饽饽，以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形如糯米，用不灰木烘炉烤熟，遂成方块，甜腻可食。芙蓉糕与萨齐玛同，但面有红糖，艳如芙蓉耳。冰糖壶卢乃用竹签贯以葡萄山药豆海棠果山里红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凉。

记赤包儿等云：

> 每至十月，市肆之间则有赤包儿斗姑娘等物。赤包儿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红，柔软可玩。斗姑娘形如小茄，赤如珊瑚，圆润光滑，小儿女多爱之，故曰斗姑娘。

赤包儿这名字常听小孩们叫，即是栝楼，斗姑娘这种植物在花担上很多见，不知道有无旧名，或者是近来输入亦未可知，日本称作“姬代代”，姬者表细小意的接头语，代代者橙也，此本系茄科，盖言其实如小橙子耳，汉名亦不可考。斗字意不甚可解，或是逗字，在北京音相同，但亦不敢定也。

唐涉江（原名震钧）著《天咫偶闻》，纪北京地理故实，亦颇可看，可与《岁时记》相比，但唐书是《藤阴杂记》一流，又用心要写得雅驯，所以缺少这些质朴琐屑的好处。两者相比，《偶闻》虽或可入著作之林，而自有其门户，还不如《岁时记》之能率性而行也。（民国廿四年除夕于北平）

□1936 年 1 月 13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毛氏说诗

民国二十五年元日，阴寒而无风，不免到厂甸去走一趟，结果只买到吾乡潘素心的诗集《不栉吟》正续七卷，此外有若干本丛书的零种。这里边有一本是《西河合集》内的《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与《续诗传鸟名卷》三卷。我是在搜集同乡的著作，但是《西河合集》却并没有，说理由呢，其一他是萧山人，不在小同乡的范围内，其二则因为太贵，这种价近百元的大书还没有买过。所以我所有的便只有些零种残本，如尺牍诗词话连厢之类，这本《说诗》也是我所想要的，无意中得来觉得很可喜，虽然这有如乞儿拾得蚌壳可以当饭瓢，在收藏家看来是不值一笑的。

毛氏说话总有一种“英气”，这很害事，原是很有理的一件事，这样地说便有棱角，虽间有谐趣而缺少重量，算来还是不上算，至于不讨人欢喜尚在其次。提起毛西河恐怕大家总有点厌他善骂，被骂的人不免要回敬一两句，这也是自然的，不过特别奇怪的是全谢山，他那种的骂法又说明是他老太爷的话，真是出奇得很。这很有点难懂，但是也可以找到相类的例。姚际恒著《诗经通论》卷前“论旨”中论列自汉至明诸诗解，关于丰坊有云：“丰氏《鲁诗世学》极骂季本。按季明德《诗学解颐》亦颇平庸，与丰氏在伯仲间，何为骂之，想以仇隙故耶？”

毛西河喜骂人，而尤喜骂朱晦庵，《四书改错》是很闻名的一案，虽然《劝戒录》中还没有派他落拔舌地狱或编成别的轮回故事，这实在是他的运气。那说诗的两种恰好也是攻击朱子的，在这一点上与姚首源正是同志，《诗经通论》卷前的这一节话可以做他们共同的声明：

“《集传》主淫诗之外其谬戾处更自不少，愚于其所关义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馀则从略焉。总以其书为世所共习，宁可获罪前人，不欲遗误后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鉴之耳。”姚最反对淫诗之说，有云：

“《集传》只是反《序》中诸诗为淫诗一着耳，其他更无胜《序》处。”毛的《说诗》中“说淫诗”十二条，占全书五分之三，“说杂诗”四条都是反朱的。《鸟名卷》虽说是释鸟，目标也在《集传》，第一则“关关雎鸠”便云：

> 《论语》，小子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朱氏解《大学》格物，又谓当穷致物理，则凡经中名物何一可忽，况显作诗注，岂有开卷一物而依稀鹘突越数千百年究不能指定为何物者。

姚氏于名物不甚措意，其说见于卷前论旨中，但与《鸟名卷》颇有因缘，这是很有意思的事。《鸟名卷》序云康熙乙酉重理残卷，姚书序亦写于是年，又毛云：“会钱唐姚彦晖携所著《诗识名解》请予为序，其书甚审博，读而有感，予乃踵前事云云。”姚亦云：“作是编讫，侄炳以所作《诗识名解》来就正，其中有关诗旨者间采数条，足辅予所不逮。”此姚彦晖盖即侄炳。《鸟名卷》之一“燕燕于飞”条下云：

> 乃燕只一字，其曰燕燕者，两燕也。何两燕？一于归者，一送者。

《诗经通论》卷三引《识名解》云：

> 《释鸟》曰，燕燕■。又《汉书》童谣云，燕燕尾涎涎。按■鸟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双飞往来，遂以双声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类，近古之书凡三见而适合，此经及《尔雅》《汉书》是也。若夫单言燕者乃乌也，《释鸟》曰，燕，白■乌，可据，孔鲋亦谓之燕乌。故

以燕燕为两燕及曲为重言之说者，皆非也。

二人皆反对《集传》重言之说，而所主张又各不同，亦颇有趣。西河既见《诗识名解》，不知何以对于燕燕双名之说不加以辩驳也。《鸟名卷》解说“鹑之奔奔”颇有妙解，奔奔朱注云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毛纠正之云：

> 按鹑本无居，不巢不穴，每随所过，但偃伏草间，一如上古之茅茨不掩者，故《尸子》曰，尧鹑居，《庄子》亦曰，圣人鹑居，是居且不定，安问居匹？若行则鹑每夜飞，飞亦不一，以窜伏无定之禽而诬以行随，非其实矣。

毛氏非师爷，而关于居飞的挑剔大有刀笔气息，令人想起章实斋。不过朱子不认识鹌鹑，以为是鹊类，奔奔疆疆的解释也多以意为之，其被讥笑亦是难怪也。又“鹳鸣于垤”，朱注云，“将阴雨则穴处者先知，故蚁出垤，而鹳就食，遂鸣于其上也。”毛云：

> 《禽经》，鹳仰鸣则晴，俯鸣则雨。今第鸣垤，不辨俯仰，其为晴为雨不必问也。但鸣垤为蚁灾知雨，雨必出垤而鹳就食之，则不然。禽凡短咮者能啄虫豸，谓之噣食。岂有大鸟长喙而能噣及蚍蚁者，误矣。

长嘴的鹳啄食蚂蚁，的确是笑话，其实就是短嘴鸟也何尝吃蚂蚁呢？大约蚂蚁不是好吃的东西，所以就是嘴最短的铁嘴麻鸟黄脰等，也不曾看见他们啄食过。晴雨不必问，原是妙语，唯上文云“零雨其濛”，则此语失其效力矣，反不如姚云：“又谓将阴雨则穴处先知之，亦凿，诗已言零雨矣，岂特将雨乎。”又《小雅》“鹤鸣于九皋，”朱注，“鹤鸟名，长颈竦身高脚，顶赤身白，颈尾俱黑。毛云：

> 《集注》凡鸟兽草木尽袭旧注而一往多误，惟此鹤则时所习见，疑翼青尾白为非是，遂奋改日颈尾黑，以其所见者是立鹤，立则敛翼垂尻，其帔黝然，实未尝揭两翮而见其尾也。明儒陈晦伯作《经典稽疑》，调笑之曰，其黑者尾耶？

又《说诗》未一则亦云：

> 鹤鸣于九皋，《正义》引陆玑疏谓顶赪翼青身白，而朱氏习见世所畜鹤铩羽而立，皆翼白尾黑者，奋笔改为顶赤颈尾俱黑，公然传之五百年，而不知即此一羽之细已自大误，先生格物安在耶？

姚亦云：“按鹤两翼末端黑，非尾黑也。彼第见立鹤，未见飞鹤，立者常敛其两翼，翼末黑毛垂于后，有似乎尾，故误以为尾黑耳。格物者固如是乎？陈晦叔《经典稽疑》已驳之。”鹤尾本微物，但是这个都不知道，便难乎其为格物君子了。名物之学向来为经学的附庸，其实却不是不重要的，有如中学课程中的博物，学得通时可以明瞭自然的情状，更能够知道世事。若没有这个，只懂得文字，便不大改得过秀才气质也。毛姚二君又有关于“七月在野”四句的解说，亦有新意，但以事关昆虫，钞来又太长，故只得从略，亦可惜也。

（廿五年一月四日，在北平）

□1936 年 1 月 16 日刊《益世报》，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游山日记

民国十几年从杭州买到一部《游山日记》，衬装六册，印板尚佳，价颇不廉。后来在上海买得《白香杂著》，七册共十一种，《游山日记》也在内，系后印，首叶的题字亦不相同。去年不知什么时候知道上海的书店有单行的《游山日记》，与信通知了林语堂先生，他买了去一读说值得重印，于是这日记重印出来了。我因为上述的关系，所以来说几句话，虽然关于舒白香我实在知道得很少。

《游山日记》十二卷，系嘉庆九年（一八〇四）白香四十六岁时在庐山避暑所作，前十卷记自六月一日至九月十日共一百天的事，末二卷则集录诗赋也。白香文章清丽，思想通达，在文人中不可多得，乐莲裳跋语称其汇儒释于寸心，穷天人于尺素，虽稍有藻饰，却亦可谓知言。其叙事之妙，如卷三甲寅（七月廿八日）条云：

> 晴凉，天籁又作。此山不闻风声日益少，泉声则雨霁便止，不易得，昼间蝉声松声，远林际画眉声，朝暮则老僧梵呗声和吾书声，比来静夜风止，则惟闻蟋蟀声耳。

又卷七己巳（八月十三日）条云：

> 朝晴暖，暮云满室，作焦■气，以巨爆击之不散，爆烟与云异，不相溷也。云过密则反无雨，令人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见。阖扉则云之入者不复出，不阖扉则云之出者旋复入，口鼻之内无非云者。窥书不见，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谓云醉。

其纪山中起居情形亦多可喜，今但举七月中关于食物的几节，卷三乙未（九日）条云：

>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仍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卷四乙巳（十九日）条云：

> 冷，雨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惟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箸。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又丙午（二十日）条云：

> 宗慧试采荞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卷五壬子（廿六日）条云：

> 晴暖。宗慧本不称其名，久饮天池，渐欲通慧，忧予乏蔬，乃埋豆池旁，既雨而芽，朝食乃烹之以进。饥肠得此不啻江瑶柱，入齿香脆，颂不容口，欲旌以钱，钱又竭，但赋诗志喜而已。

此种种菜食，如查《野菜博录》等书本是寻常，现在妙在从经验得来，所以亲切有味。中国古文中不少游记，但如当作文辞的一体去做，便与“汉高祖论”相去不远，都是《古文观止》里的资料，不过内容略有史地之分罢了。《徐霞客游记》才算是一部游记，他走的地方多，纪载也详赡，所以是不朽之作，但他还是属于地理类的，与白香的游记属于文学者不同。《游山日记》里所载的重要的是私生活，以及私人的思想性情，这的确是一部“日记”，只以一座庐山当作背景耳。所以从这书中看得出来的是舒白香一个人，也有

一个云烟飘渺的匡庐在，却是白香心眼中的山，有如画师写在卷子上似的，当不得照片或地图看也。徐骧题后有云：

“读他人游山记，不过令人思裹粮游耳，读此反觉不敢轻游，盖恐徒事品泉弄石，山灵亦不乐有此游客也。”乐莲裳跋中又云：

“然雄心远概，不屑不恭，时复一露，不异畴昔挑灯对榻时语，虽无损于性情，犹未平于嬉笑。”这里本是规箴之词，却能说出日记的一种特色，虽然在乐君看去似乎是缺点。白香的思想本来很是通达，议论大抵平正，如卷二论儒生泥古误事，正如不审病理妄投药剂，鲜不殆者，王荆公即是，“昌黎文公未必不以不作相全其名耳。”卷七云：

> 佛者投身饲饿虎及割肉喂鹰，小慧者观之皆似极愚而可笑之事，殊不知正是大悲心中自验其行力语耳。……民溺己溺，民饥己饥，亦大悲心耳，即使禹之时有一水鬼，稷之时有一饿鬼，不足为禹稷病也。不与人为善，逞私智以谿刻论人，吾所不取。

其态度可以想见，但对于奴俗者流则深恶痛绝，不肯少予宽假，如卷八记郡掾问铁瓦，卷九纪猬髯蛙腹者拜乌金太子，乃极嬉笑怒骂之能事，在普通文章中盖殊不常见也。《日记》文中又喜引用通行的笑话，卷四中有两则，卷七中有两则，卷九中有一则，皆诙诡有趣。此种写法，尝见王谑庵陶石梁张宗子文中有之，其源盖出于周秦诸子，而有一种新方术，化臭腐为神奇，这有如妖女美德亚（Medeia）的锅，能够把老羊煮成乳羔，在拙手却也会煮死老头儿完事，此所以大难也。《游山日记》确是一部好书，很值得一读，但是却也不好有第二部，最禁不起一学。我既然致了介绍词，末了不得不有这一点警戒，盖螃蟹即使好吃，乱吃也是要坏肚子的也。

中华民国廿四年十二月八日，知堂记于北平苦茶庵。

〔附记〕据《婺觜馀稿》，嘉庆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四月廿三日为白香五十生辰，知其生于乾隆廿四年己卯，游庐山时年四十六，与卷首小像上所题正合。《舒白香杂著》据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辛为《游山日记》十二卷，《花仙集》一卷，《双峰公挽诗》一卷，《和陶诗》一卷，《秋心集》一卷，《南征集》一卷，《香词百选》一卷，《湘舟漫录》三卷，《骖鸾集》三卷，《古南馀话》五卷，《婺觜馀稿》一卷，共十一种。我所有的一部缺《骖鸾集》，而多有《联璧诗钞》二卷，次序亦不相同。周黎庵先生所云“天香戏稿”即是《香词百选》，计词一百首，为其门人黄有华所选。我最初知道舒白香虽然因为他的词谱及笺，可是对于词实在不大了然，所以这卷《百选》有时也要翻翻看，却没有什么意见可说。

□1936 年 1 月刊《宇宙风》8 期，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记 海 错

王渔洋《分甘馀话》卷四载郑简庵《新城旧事序》有云：

> 汉太上作新丰，并移旧社，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鸡犬于通途，亦竞识其家，则乡亭宫馆尽入描摹也。沛公过沛，置酒悉召父老诸母故人道旧，故为笑乐，则酒瓢羹碗可供笑谑也。郭璞注《尔雅》，陆佃作《埤雅》，释鱼释鸟，读之令人作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也。

这是总说乡里志乘的特色，但我对于纪风物的一点特别觉得有趣味。小时候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与《花镜》等，所以后来成为一种习气，喜欢这类的东西。可是中国学者虽然常说格物，动植物终于没有成为一门学问，直到二十世纪这还是附属于经学，即《诗经》与《尔雅》的一部分，其次是医家类的《本草》，地志上的物产亦是其一。普通志书都不很着重这方面，纪录也多随便，如宋高似孙的《剡录》可以说是有名的地志，里边有《草木禽鱼诂》两卷，占全书十分之二，分量不算少了，但只引据旧文，没有多大价值。单行本据我所看见的有黄本骥的《湖南方物志》四卷，汪曰桢的《湖雅》九卷，均颇佳。二书虽然也是多引旧籍，黄氏引有自己的《三长物斋长说》好许多，汪氏又几乎每条有案语，与纯粹辑集者不同。黄序有云：

“仿《南方草木状》、《益部方物略》、《桂海虞衡志》、《闽中海错疏》之例，题曰《湖南方物志》。”至于个人撰述之作，我最喜欢郝懿行的《记海错》，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五卷、《闽产录异》六卷居其次。郭氏纪录福建物产至为详尽，明谢在杭《五杂组》卷九至十二凡四卷为物部，清初周亮工著《闽小记》四卷，均亦有所记述，虽不多而文辞佳胜，郝氏则记山东登莱海物者也。

郝懿行为乾嘉后期学者，所注《尔雅》其精审在邢邵之上。《晒书堂文集》卷二与孙渊如观察书（戊辰）有云：

> 尝论孔门多识之学殆成绝响，唯陆元恪之《毛诗疏》剖析精微，可谓空前绝后。盖以故训之伦无难钩稽搜讨，乃至虫鱼之注，非夫耳闻目验，未容置喙其间，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作者之体又宜舍诸。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夭条，靡不覃研钻极，积岁经年，故尝自谓《尔雅》下卷之疏，几欲追踪元恪，陆农师之《埤雅》，罗端良之《翼雅》，盖不足言。

这确实不是夸口，虽然我于经学是全外行，却也知道他的笺注与众不同，盖其讲虫鱼多依据耳闻目验，如常引用民间知识及俗名，在别人书中殆不能见到也。又答陈恭甫侍御书（丙子）中云：

“贱患偏疝，三载于今，迩来体气差觉平复耳。以此之故，虫鱼辍注，良以慨然。比缘闲废，聊刊《琐语》小书，欲为索米之资，（七年无俸米吃，）自比钞胥，不堪覆瓿，只恐流播人间作话柄耳。”即此可见他对于注虫鱼的兴趣与尊重，虽然那些《宋琐语》《晋宋书故》的小书也是很有意思的著作，都是我所爱读的。《蜂衙小记》后有牟廷相跋云：

“昔人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余谓磊落人定不能注虫鱼耳。浩浩落落，不辨马牛，那有此静中妙悟耶？故愿与天下学静，不愿学磊落，如有解者，示以《蜂衙小记》十五则。”牟氏著有《诗意》，虽不得见，唯在郝氏《诗问》中见所引数条，均有新意，可知亦是解人也，此跋所说甚是，

正可作上文的说明。《宝训》八卷，《蜂衙小记》、《燕子春秋》各一卷，均有牟氏序跋，与《记海错》合刻，盖郝君注虫鱼之绪馀也。

《记海错》一卷，凡四十八则，小引云，“海错者《禹贡》图中物也，故《书》《雅》记厥类实繁，古人言矣而不必见，今人见矣而不能言。余家近海，习于海久，所见海族亦孔之多，游子思乡，兴言记之。所见不具录，录其资考证者，庶补《禹贡疏》之阙略焉。时嘉庆丁卯戊辰书。”王善宝序云：

“农部郝君恂九自幼穷经，老而益笃，日屈身于打头小屋，孜孜不倦。有馀闲记海错一册，举乡里之称名，证以古书而得其贯通，刻画其形亦毕肖也。”此书特色大略已尽于此，即见闻真，刻画肖耳。如“土肉”一则云：

> 李善《文选江赋注》引《临海水土异物志》曰，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腹，无口目，有三十足，炙食。余案今登莱海中有物长尺许，浅黄色，纯肉无骨，混沌无口目，有肠胃。海人没水底取之，置烈日中，濡柔如欲消尽，渝以盐则定，然味仍不咸，用炭灰腌之即坚韧而黑，收干之犹可长五六寸。货致远方，啖者珍之，谓之海参，盖以其补益人与人参同也。《临海志》所说当即指此，而云有三十足，今验海参乃无足而背上肉刺如钉，自然成行列，有二三十枚者，《临海志》欲指此为足则非矣。

《闽小记》《错海百一录》所记都不能这样清爽。又记虾云：

> 海中有虾长尺许，大如小儿臂，渔者网得之，俾两两而合，日干或腌渍货之，谓为对虾，其细小者干货之曰虾米也。案《尔雅》云，■大虾。郭注，虾大者出海中，长二三丈，须长数尺，今青州呼虾鱼为■。《北户录》云，海中大红虾长二文馀，头可作杯，须可作簪，其肉可为脍，甚美。又云，虾鬚有一丈者，堪拄杖。《北户录》之说与《尔雅》合。余闻榜人言，船行海中或见列桅如林，横碧若山，舟子渔人动色攒眉，相戒勿前，碧乃虾背，桅即虾须矣。

此节文字固佳，稍有小说气味，盖传闻自难免张大其词耳。《五杂组》卷九云：

> 龙虾大者重二十馀斤，须三尺馀，可为杖。蚶大者如斗，可为香炉。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滨人习见，不足为异也。

《闽小记》卷一“龙虾”一则云：

> 相传闽中龙虾大者重二十馀斤，须三尺馀，可作杖，海上人习见之。予初在会城，曾未一睹，后至漳，见极大者亦不过三斤而止，头目实作龙形，见之敬畏，戒不敢食。后从张度阳席间误食之，味如蟹鳌中肉，鲜美逾常，遂不能复禁矣。有空其肉为灯者，贮火其中，电目血舌，朱鳞火鬣，如洞庭君擘青天飞去时，携之江南，环观挢舌。

《海错百一录》卷四记虫其一“龙虾”云：

> 龙虾即虾魁，目睛隆起，隐露二角，产宁德。《岭表录异》云，前两脚大如人指，长尺馀，上有芒刺钻硬，手不可触，脑壳微有错，身弯环，亦长尺馀，熟之鲜红色，名虾杯。苍案，宁德以龙虾为灯，居然龙也，以其大乃称之为魁。仆人陈照贾吕宋，舶头突驾二朱柱，夹舶而趋，舶人焚香请妈祖棍三击，如桦烛对列，闪灼而逝，乃悟为虾须。《南海杂志》，商舶见波中双樯摇荡，高可十馀丈，意其为舟，老长年曰，此海虾乘霁曝双须也。《洞冥记》载有虾须杖。举此则龙虾犹小耳。

将这四篇来一比较，郝记还是上品，郭录本来最是切实，却仍多俗信，如记美人鱼海和尚撒尿鸟之类皆是，又《闽产录异》卷五记豕身人首的鯀神，有云，“山精木魅，奇禽异兽，难以殚述”，书刻于光绪丙戌，距今才五十年，但其思想则颇陈旧也。郝记中尚有蟹、■、海盘缠、海带诸篇均佳，今不具引。

《晒书堂诗钞》卷上有诗曰《拾海错》，原注云，“海边人谓之赶海，”诗有云：“渔父携筠篮，追随有稚子，逐虾寻海舌，淘泥拾鸭嘴，（海舌即水母，蚬形如鸭嘴，）细不遗蟹奴，牵连及鱼婢。”郝诗非其所长，但此数语颇有意思。《晒书堂文集》、《笔录》及诸所著述书中，则佳作甚多，惜在这时不能多赘。清代北方学者我于傅青主外最佩服郝君，他的学术思想仿佛与颜之推贾思勰有点近似，切实而宽博，这是我所喜欢的一个境界也。郝氏遗书庞然大部，我未能购买，但是另种也陆续搜到二十种，又所重刻雅雨堂本《金石例》亦曾得到，皆可喜也。（廿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于北平）

□1936 年 1 月刊《宇宙风》9 期，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钝吟杂录

《池北偶谈》卷十七有“冯班”一条，称其博雅善持论，著《钝吟杂录》六卷，又云：

“定远论文多前人未发，但骂严沧浪不识一字，太妄。”我所有的一部《钝吟杂录》，系嘉庆中张海鹏刊本，凡十卷，与《四库书目提要》所记的相同。冯氏犹子武所辑集，有己未年序，盖即乾隆四年，可知不是渔洋所说的那六卷原本了。序中称其情性激越，忽喜忽怒，里中俗子皆以为迂，《提要》亦云诋斥或伤之激，这与渔洋所谓妄，都是他大胆的一方面。序中记其斥《通鉴纲目》云：

“凡此书及致堂《管见》以至近世李氏《藏书》及金圣叹《才子书》，当如毒蛇蚖蝎，以不见为幸，即欧公老泉渔仲叠山诸公，亦须小心听之。”冯氏不能了解卓吾圣叹，在那时本来也不足怪，（李氏的史识如何我亦尚未详考，）若其批评宋人的文章思想处却实在不错，语虽激而意则正，真如《提要》所云，论事多达物情。我看十卷《杂录》中就只这个是其精髓，自有见地，若其他也不过一般云云罢了。《杂录》卷一《家戒上》云：

“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成败得言文章，便是隔壁说话。”下半说得不错，上半却有问题。冯氏论事虽有见识，但他总还想自附于圣学，说话便常有矛盾，不能及不固执一派的人，如傅青主，或是尤西堂。其实他在卷二已说过道：

“不爱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不智，无以为儒也。未有不知人情而知性者。”又卷四云：

“不近人情而云尽心知性，吾不信也，其罪在不仁。不知时势而欲治国平天下，吾不信也，其罪在不智。不仁不智，便是德不明。”这两节的道理如何是别一事，但如根据这道理，则论人物而苛刻，谈政事而胡涂，即是不仁不智了，与性命绝学便没有关系。傅青主《霜红龛集》卷三十六（丁氏刊本）杂记一中有云：

“李念斋有言，东林好以理胜人。性理中宋儒诸议论，无非此病。”又卷四十杂记五云：

> 宋人之文动辄千百言，萝莎冗长，看着便厌。灵心慧舌，只有东坡。昨偶读曾子固《战国策》《说苑》两序，责子政自信不笃，真笑杀人，全不看子政叙中文义而要自占地步。宋人往往挟此等技为得意，那可与之言文章之道。文章诚小技，可怜终日在里边盘桓，终日说梦。

傅君真是解人，所说并不怎么凌厉，却着实得要领，也颇有风致，这一点似胜于钝吟老人也。我常怀疑中国人相信文学有用而实在只能说滥调风凉话，其源盖出于韩退之，而其他七大家实辅成之，今见傅冯二公的话，觉得八分之六已可证实了，馀下的容再理会。《杂录》卷一云：

> 药与无于衣食也，金石丝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诗赋无与干人事也，温柔敦厚，圣人以教民，宋儒恶之。
>
> 汉人云，大者与六经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言赋者莫善于此，诗亦然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咏之何害。
>
> 风云月露之词，使人意思萧散，寄托高胜，君子为之，其亦贤于博弈也。以笔墨劝淫诗之戒，然犹胜于风刺而轻薄不近理者，此有韵之谤

---

[1] 《宇宙风》题作《宋人的文章思想》。

书，唐人以前无此，不可不知也。

讲到诗，这我有点儿茫然，但以为放荡的诗犹比风刺而轻薄不近理者为胜，然则此岂不即是宋人论人物之文章耶。我近年常这样想，读六朝文要比读八大家好，即受害亦较轻，用旧话来说，不至害人心术也。钝吟的意思或者未必全如此，不过由诗引用到文，原是一个道理，我想也别无什么不可罢。

《杂志》卷一《家戒上》又有几节关于教子弟的，颇多可取，今抄录其一云：

> 为子弟择师是第一要事，慎无取太严者，师太严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刚强者怼而为恶，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违其天资，若有所长处，当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开其知识也，养之者所以达其性也。年十四五时，知识初开，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当二三月间，养之全在此际。噫，此先师魏叔子之遗言也，我今不肖，为负之矣。

何注曰，“少小多过，赖严师教督之恩，得比人数，以为师不嫌太严也。及后所闻见，亦有钝吟先生所患者，不可以不知。”冯氏此言甚有理解，非普通儒者们所能及。傅青主家训亦说及这个问题，颇主严厉，不佞虽甚喜霜红龛的思想文字，但于此处却不得不舍傅而取冯矣。（廿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1936 年 2 月刊《宇宙风》10 期，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窦　存

胡式钰的《窦存》四卷从前时常看到，却总没有买，因为不是价贵，就是纸太劣。其实这种书的价钱本来不会怎么贵的，不过我觉得他不能值这些，那就变成贵了，前几天才买了一部，在还不算贵的范围内。这书刻于道光辛丑，距今才九十五年，正是清朝学术中落时期，其时虽然也有俞理初龚定庵魏默深蒋子潇等人来撑撑场面，就一般的知识讲未免下降了。我们读《窦存》时颇有此感，自然就是在乾嘉时也是贤愚不齐，不见得人人都有见识，只是到了衰季更易感到，或者由于主观也不可知。

《窦存》分为书诗事语四类，其《语窦》一卷列举俗语的出典，如《恒言录》之流，而范围较宽，最无可非议。《诗窦》所谈间有可取，《书窦》多卫道之言，可谓最下，《事窦》则平平耳，大抵多讲报应怪异，一般文人的“低级趣味”都如此，不必单责胡氏也。卷一论东坡非武王，阎百诗议子游子夏，钱莘楣议程伊川，卷二论人或嗤昌黎以文为诗，皆大不以为然，其理由则不外“何得轻议大贤人”，其议论可想见了。说诗处却有佳语，如卷二云：

> 杨升庵谓杜子美滕王亭诗，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予常怪修竹本无莺啼，后见孙绰兰亭诗，啼莺吟修竹，乃知杜老用此也，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此升庵薄子美厚孙绰也。子美言之不足信，孙绰言之始足信，孙绰又本何书欤？且诗境贵真，使其时莺非啼竹而强言之，谓前人曾有此说，特因袭而已。前人未有此说而我自目击其境，斯言之正亲切耳。吾且谓子美当日有目中之莺啼修竹，而不必有孙绰之莺啼修竹可也。固哉，升庵之说诗也。

又有云：“予题汤都督《琴隐图》云，碑括前皇篆。一徒请括字来历，予曰，史皇造字即来历，前人经史等载籍岂别有来历耶。”这都说得很好，有自己的见识。但是这自信似乎不很坚，有时又说出别样的话，如云：

“宋叶适诗云，应嫌履齿印苍苔。按汉杜林高节不仕，居一室，阶有绿苔，甚爱之，辄谓人曰，此可以当铺翠耳。人有蹑屐者，曰，勿印破之。盖叶诗印字本此。”书眉上有读者批曰，“即无本亦好。”此读者不知系何人，唯卷首有一印，白文四字云，“咸弼过目，”盖即其名也。又有一条云：

“朱庆馀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杜牧诗云，空堂停曙灯。停字当本陆机《演连珠》，兰膏停空，不思衔烛之龙。”批曰，“此等字在作者只知用来稳惬，不必先有所本，乃偶然暗合也。”批语两次纠正，很有道理。胡氏论诗极推重陶公，有云：

东坡曰，吾于诗人无所好，好渊明诗。式钰谓吾于诗人无不好，尤好渊明诗。吾于诗人诗各有好有不好，有好无不好唯渊明诗。”语虽稍笼统，我却颇喜欢，因为能说得出爱陶诗者的整个心情也。

卷三所记有关于民间信仰风俗者，亦颇可取。如记佣工赵土观谈上海二十一保二十七图陈宅鬼仙有云：

> 去年（已亥）夏其家男女出耕，鬼在田中，予闻往听，鬼称予土观；予笑，鬼云，勿好笑，遂彼此寒暄数语。顷之谓其家人，我回椁，尔等当回家饭也，耕佣无不闻者。往往二三日便回鬼门关，来时声喜，去时声悲，必嘱其家人曰，为善毋恶，阴司有簿记之。

这是很好的关于死后生活的资料，如鬼门关（据云其地甚苦），鬼回椁休息，

阴司有簿记善恶，皆是也。又一则云：

世间妇女言灶神每月上天奏人善恶，故与人仇，灶诅之，有求，灶祷之。又岁杪买饧，择谷草之实制焙和之，俟新岁客来佐茶，故买饧于腊。腊月二十四日饯灶神上天，遂用饧，荐时义也，乃谓恐神诉恶，借胶其口，何鄙说之可笑乎。然俗之为恶概可想见。

此一节也记得颇有意思，只是末尾说得太是方巾气，其实未必一定为恶，人总怕被别个去背地里说些什么，此种心理在做媳妇的一定更深切地感到，也自难怪她们想用大麦糖去胶住那要说闲话的人的嘴巴罢。

卷一《书窦》的第一条是讲考证的，虽然讲得很有趣，可是有点不对。其文云：

《晋书》，贾充有儿黎民三岁，乳母抱之当阁，充就而拊之。《世说》云，充就乳母手中呜之。拊呜各通，盖谓拊其儿作呜呜声以悦之也，犹《荀子》拊循之唲呕之义，然呜字耐味。杜牧之遣兴诗，浮生长忽忽，儿小且呜呜。

拊呜原是两件事，我想《世说》作呜是对的，《晋书》后出，又是官书，故改作较雅驯的拊字罢了。查世俗顶有势力的《康熙字典》和商务《辞源》，呜字下的确除呜呜等以外没有他训，但欠部里有一个■字，《字典》引《说文》云，一曰口相就也。案《说文解字》八篇下云：

“■，心有所恶若吐也，从欠，乌声。一曰■■，口相就也。（段注，谓口与口相就也。）■，■■也，从欠，■声。■，俗■，从口从就。”《辞源续编》始出一■字，引《说文》为训，而嘼字始终不见，我把正续编口部从十一画至十三画反复查过，终于没有找到这个字。查《广韵》嘼下去，■嘼，口相就也，《玉篇》嘼下云，呜嘼也。到这里，口旁的呜字已替代了欠旁的字，虽然正式当然是连用，但后来大抵单用也可以了。这里说后来，其实还应该改正，因为单用的例在隋唐之前。《世说新语》下“惑溺第三十五”即其一。佛经律部的《四分律藏》卷四十九云：

“时有比丘尼在白衣家内住，见他夫主共妇呜口，扪摸身体，捉捺乳。”这部律是姚秦时佛陀耶舍共竺法念所译，在东晋末年，大约与陶渊明同时，所以这还当列在宋临川王的前面。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十八亦有云：

“问言少女何意毁篱，女人便笑，时邬波难陀染心遂起，即便捉臂，遍抱女身，呜咂其口，舍之而之。”据此可知呜字当解作亲嘴，今通称接吻，不知何来此文言，大约系接受日本的新名词，其实和文亦本有“口附”（Kuchizuke）一字，胜于此不古不今的汉语也。（廿五年一月）

□1936 年 2 月刊《宇宙风》11 期，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郁冈斋笔麈

《宇宙风》新年号“二十四年爱读书”中有王肯堂的《笔麈》一种，系叶遐庵先生所举，原附有说明云：

> 明朝人的著述虽很有长处，但往往犯了空疏浮诞的通病，把理解和事实通通弄错。王肯堂这一部书，不但见地高超，而且名物象数医工等等，都由实地研究而发生很新颖坚确的论断，且其态度极为忠实。王肯堂生当明末，好与利玛窦等交游、故他的治学方法大有科学家的意味。这是同徐光启李之藻金声等都是应该推为先觉的，所以我亦很喜欢看这部书。

我从前只知道王肯堂是医生，对于他的著作一直不注意，这回经了遐庵先生的介绍，引起我的好奇心，便去找了一部来看。原书有万历壬寅（一六〇二）序文，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北平图书馆用铅字排印，四卷两册实价三元，只是粉连还不是机制的，尚觉可喜。《笔麈》的著者的确博学多识，我就只怕这有许多都是我所不懂的。第一，例如医，我虽然略略喜欢涉猎医药史，却完全不懂得中国旧医的医理，我知道一点古希腊的医术情形，这多少与汉医相似，但那个早已蜕化出去。如复育之成为“知了”了。第二是数、历、六壬、奇门、阳宅等，皆所未详。第三是佛教，乃是有志未逮。我曾论清初傅冯二君云：

> “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钝吟虽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论史及论政事文章的意见，故有时亦颇有见解，能说话。”我们上溯王阳明、李卓吾、袁中郎、钟伯敬、金圣叹，下及蒋子潇、俞理初、龚定庵，觉得也都是如此。所以王君的谈佛原来不是坏事，不过正经地去说教理禅机，便非外行的读者所能领解，虽然略略点缀却很可喜，如卷四引不顺触食说东坡的“饮酒但饮湿”，又引耳以声为食说《赤壁赋》末“所共食”的意思，在笔记中均是佳作。归根结蒂，《笔麈》里我所觉得有兴趣的实在就只是这一部分，即说名物谈诗文发意见的地方，恐怕不是著者特长之所在，因为在普通随笔中这些也多有，但是王君到底自有其见解，与一般随波逐流人不同，此我所以仍有抄录之机会也。卷四有两则云：

> 文字中不得趣者便为文字缚，伸纸濡毫，何异桎梏。得趣者哀愤侘傺皆于文字中销之，而况志满情流，手舞足蹈者哉。
>
> 《品外录》录孙武子《行军篇》，甚讶其不伦，后缀欧阳永叔《醉翁亭记》，以为记之也字章法出于此也。何意盾公弃儒冠二十年，尚脱头巾气不尽。古人弄笔，偶尔兴到，自然成文，不容安排，岂关仿效。王右军《笔阵图帖》谓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吾以为必非右军之言。若未作字先有字形，则是死字，岂能造神妙耶。世传右军醉后以退残笔写《兰亭叙》，旦起更写皆不如，故尽废之，独存初本。虽未必实，然的有些理。吁，此可为得趣者道也。夫作字不得趣，书佣胥吏也，作文不得趣，三家村学究下初缀对学生也。

此言很简单而得要领，于此可见王君对于文学亦是大有见识。其后又有云：

> 四月四日灯下独坐，偶阅袁中郎《锦帆集》，其论诗云，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逮元白卢郑各自有诗

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读未终篇不觉击节曰，快哉论也，此论出而世之称诗者皆当赧面咋舌退矣。

案此论见卷四《与丘长孺书》中，与《小修诗序》所说大旨相同，主意在于各抒性灵，实即可为上文所云得趣之解说也。不过这趣与性灵的说法，容易了解也容易误解，不，这或者与解不甚相关，还不如说这容易得人家赞成附和或是“丛诃攒骂”。最好的例是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十六袁宏道条下云：

《传》有言，琴瑟既敝，必取而更张之；诗文亦然，不容不变也。隆万间王李之遗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为唐自有古诗，不必选体；中晚皆有诗，不必初盛；欧苏陈黄各有诗，不必唐人。唐诗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来异乎。一时闻者涣然神悟，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是何异弃苏合之香取蛄蜣之转耶。

这里他很赞同公安派的改革，所引用的一部分也即是《与丘长孺书》中的话。卷十七“钟惺”条下又云：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蒸鸡祸也，惟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着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

诗亡而国亦随之，可谓妙语。公安竟陵本非一派，却一起混骂，有缠夹二先生之风，至于先后说话不一致还在其次，似乎倒是小事了。朱竹垞本非低能人，何以如此愦愦？岂非由于性灵云云易触喜怒耶。李越缦称其成见未融，似犹存厚道。中国文人本无是非，翻覆褒贬随其所欲，反正不患无辞，朱不过其一耳。后来袁子才提倡性灵，大遭诃骂，反对派的成绩如何，大家也记不起来了。性灵被骂于今已是三次，这虽然与不佞无关，不过因为见闻多故而记忆真，盖在今日此已成为《文料触机》中物，有志作时文者无不取用，殆犹从前做策论之骂管仲焉。在一切都讲正宗道统的时候，汩没性灵当然是最可崇尚的事，如袁君所说，殆是气运使然。我又相信文艺盛衰于世道升降了无关系，所以漠然视之。但就个人的意见来说，则我当然造成王君的话，觉得一个人应该伸纸濡毫要写就写，不要写就不写，大不可必桎梏而默写圣经耳。（廿五年二月）

□1936 年 3 月刊《宇宙风》12 期，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王湘客书牍

今日从旧书店买了一册尺牍残本，只有四十六叶，才及原书八分之三，却是用开花纸印的，所以破了一点钞买了回来。书是后半册，只板心题曰《王湘客书牍》，卷尾又云《薄游书牍》，看内容是明临沂王若之所著，自崇祯九年丙子至乙酉，按年编排，共存书牍六十四首，其甲申年三首中有一书完全铲去，连题目共留空白七行，此外说及虏胡等处亦均空白，盖板刻于清初而稍后印者欤。编年干支照例低一格写、乙酉上则尚有二字，今已铲去，小注云：“年五十三岁，在南守制，值国大变，（缺四字）弃家而隐。”所列三书皆可抄，《寄张藐山冢宰》云：

> 客冬襄垣叩谒，方知移寓宛陵，向绝鱼鸿，起居应善。自凤麟去国，枭獍当朝，倾覆沦亡，一旦至此。（缺十字）不孝即日弃家，再远匿矣。夜行昼伏，背负衰慈，锋镝荆榛，途欺仆叛，万千毒苦，始抵湖阳，哀此茕茕，寄栖何所。思近堂翁傲屋安顿，倘蒙委曲，深感懈幪。

《答友人》云：

> 不孝忝为士夫，虽不在位，莫效匡扶，正惟草莽之中，当勖从一之节，一心坚定，百折何辞，至于身家，久付之敝屣矣。劝言若爱，实未敢闻，口占附呈，此血墨也。乙酉仲夏书。（此五字低一格小字，或系书题亦未可知。）
>
> 腐儒无计挽颓纲，荆棘崎岖但隐藏。
> 见说□□心尽□，故令率土病成狂。
> 抱头掷主周妻子，□□□□预表章。
> 天堑江流空日夜，吞声孤泪与俱长。

诗亦是小字，上有眉批云：“狂澜砥柱，一□千钧。”一字底下看意义与痕迹似应是发字，不知何以违碍，岂友人乃来劝剃发者乎。又《答友人》云：

> （缺十四字）自古未闻仁者而失天下。一治一乱，其惟时使之乎。

这三封信没有多大重要，不过可以知道他是一位遗老，末了一信乃是亡天下后的感情上的排遣话，其实是未必然，而且他的其他书牍所给予我们的教训也并不是这样说。《薄游书牍》的好处，我觉得与从前读陶路甫《拜环堂集》的尺牍相同，是在告诉我们明末官兵寇虏这四种的事情。照这些文章看来，寇与虏的发展差不多全由于官与兵的腐败，丙子年《答京贵》云：

> 不肖负疴入山深矣，蒌纬不恤而漆室过忧谈天下事乎。明问谆谆，不忍有负虚心之雅；君亲并念，亦何敢作局外之观。窃惟寇蹂躏五六省，虏跳梁十馀年，丧失虔刘，征求饥馑，天下亦甚病矣。以刍荛之愚，急则治标，策虏无攻法，策寇无守法，策财无损下之法。无攻法须守，无守法须攻，无损下之法须上节。

这所说的实在很有见识，但是这样自然就无人赞成，而且实行也有困难，如关于“上节”他的办法里有这几句话：

> 上供岁六百万，倘暂减百万。宗禄岁千万，倘暂减二三百万。上供金花籽粒即不容减，颜料油漆丝缕香蜡稍减一二可委曲也。宗禄中尉以下日用所资亦不议减，藩王郡王将军世子厚禄赡养，报本同仇，十贡二三，捐之一时，正欲享之千世也。如斯递节，以代民输。

此意虽善，明末君臣岂能行哉。书末原有小字批云：“此王少参昔年画议，今局已变，寇果合，兵愈费，财愈绌，虏愈横矣。惜也。”王湘客在南京多

管粮饷事，书中常言饷乏，却尤愁民穷，这思想本是平常，但大可佩服，他盖知道饿死事大也。如前书中曾云：

“上之节谈何容易，奈至今日下已无可损矣。窃谓止沸不在扬汤，治标必须探本，乱之本因民穷，民穷始盗起，盗起始用兵，用兵始赋重，赋重民益穷，民益穷盗益起，由今之道非策也。”戊寅年《上督师》书中云：

“日前民穷盗起，今也民极盗增，可见此时患无苍赤，不患无兜鍪也。”壬午年《与六部揭，为江左阽危不在巨贼窥伺而在盗臣蠹空事》有云：

“军粮欠断六个月，兵饷欠断四个月，盐菜欠断二十个月，荷戈怨怒，夕不谋朝。”庚辰冬《答詹侍御》书中云，若能得二万两发各营八月之饷，“庶乎各兵相信，尚肯忍饥忍寒从容俟我讲求催讨。”那么这方面也很不成样子，而其原因则如《与六部揭》所云：

“躯壳空立，血脉全枯。大老一仕肥家，田庐遂连滇黔两省矣。昔人有言，天下有穷国穷民而无穷士大夫，此之谓也。”眉批四字云，“时之痼疾。”

辛巳年书牍最多，共有二十九首，其中数书述流寇事亦大可参考，今只取《答史道邻漕抚》书为代表，后半云：

> 贼骑约七八百，妇女五六百，步数百，舁两棺，每棺舁者六十馀人，内皆银也，又抬十三鞘，驴骡负载不计数。累坠骄懈，顿一面坚闭之城下，临一面大淮之水边，咫尺方隅，正是自投死地。计凤镇骑兵千馀，步火三千，向使夜半一鼓，可尽歼此贼，不则两面围蹙，绝其人马之食，三日自毙。古昔军储不靠朝供，率因粮于敌，如剿此幺么一枝，即可坐得饷银十数万，不省四府穷民两年供输乎。乃当亭者闭门不惹，反给牌导之过淮，入豫大伙矣，想纵虎养虎，各处皆类此也。语云，两叶不剪，将寻斧柯。百日难收，一时失策，付之浩叹而已。

三百年后人读此书亦不禁浩叹，给牌导之过淮似稍过分，但类似的事则古今盖多有也。中国多文盲，即识字者亦未必读明末稗史，却不知何以先圣后圣其揆若一，《拜环堂尺牍》中所记永平遵化之附虏，《薄游书牍》中所记临淮凤阳之纵寇，真如戏台上的有名戏文，演之不倦，看之亦不厌。不晓得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不再扮演，不佞却深愧不能作答也。

书牍中也有些可读的文章。从前我抄陶路甫的尺牍，引他一篇《寄王遂东工部》，这里在丁丑年也有一篇《柬王季重兵宪》，就把他抄在下面：

> 恭惟老先生旷代绝才，千秋作者，文章憎达，早返初衣，固知世上浮云，名山不朽，而有道自许，终在此不在彼耳。若之无似，生于患难，长于困穷，不读不耕，三番苟仕，犹未即抛鸡肋，益羡千仞凤翔为不可企及已。兹也就食白下，奈两人皓首怀乡，雁户无停，浮家难定，抑又苦矣。所幸去居甚近，仰斗尤殷，敬肃八行，用布归往。芜秽之稿，友欲木灾，实是废簏久尘，不敢一示有道，老先生可片言玄宴，使若之感附骥飞扬乎。冒昧奉书，主臣曷已。

这原是寻常通问的信，但说得恰好，不是瞎恭维，我们不好说是文字上的一派，总是声气很相通的，所以要请他做序，只不知道这是什么书，查《谑庵文饭小品》，可惜也不见这些文章，或者是在那六十卷的大《文饭》里罢，这就不可得而知了。戊寅年（柬宋喜公大令》云：

“客子病，细雨天，知己远移，黯然曷已。”辛巳年《答友人》云：

敝乡山中气候，六七月似江南四五月，每岁竟似少一六月而多一腊月。寒犹可御，暑何所施，所以妻孥止觉南中之苦。”眉批云，“话故山令人神

往。”但是也只是这两篇稍为闲适，而其中亦仍藏着苦趣，若是别篇便更了然。庚辰年《寄友人》云：

离群之雁，形影自怜，蚊睫之栖，飘摇不定，屋梁云树，我劳如何。伏承道履崇佳，景福茂介。不屑弟烽烟刺目，庚癸煎心，伛偻疲筋，簿书鞅掌，风雅扫地尽矣，尚能蒙濠观化，仿高斋鱼乐笑谈也乎。孤城孤抱，真苦真愁。忽届中秋，流光可讶，缅惟五载东西南北，未能与家人父子一看团■。仕隐两乖，名实俱谬，重可慨也。

辛巳《寄杨云峤》书中自称“惟弟日夕自忙自乱自愁自叹而已”，可以知道他的景况，但是忙了愁了多少年，结果只落得以“其惟时使之乎”排遣，此又是可令后人为之浩叹者也。

王湘客的诗似乎不大佳，前引乙酉年作一首可见。辛巳年答叶瞻山掌道书后有元宵邸中四首，其二云：

回忆来官日，陵京不可支。
年荒催窃发，冬暮满流移。
列卫寒求纩，团营饥索炊。
拮据兼昼夜，寝食几曾知。

如以诗论不能说好，今只取其中间有意思有本事。据书中下半云：“十五日抽签后因借司寇银又趋上元县。一病痢委顿之人，独坐一下湿上漏八面受风无人形影之空堂，候至漏下始兑银，二鼓仍收库，回寓不及门则暴下几绝，实不知宵之为节而节之为佳也。”此即是“上元日坐上元县”的故事，节既不佳，则诗之不能佳可无怪矣。

（廿五年三月十九日，在北平）

〔附记〕近日在市上又蕴得杂著二种，一为《涉志》一卷，前有会稽沈存德序、起乙卯（万历四十三年）仲春，讫戊午季冬，记南北行旅颇有情致，盖二十三至二十六岁时事也。一为《王湘客诗卷》二卷，录五七言律诗各百首，续一卷，五六七言绝句百首。《续诗卷》中有《苦雨十首》，今录其二三四章云：

帡幪得意新，拂试明精舍，乃我照盆看，
其颜色都夜。
矢日惊通国，双眸视未能，不教欺暗室，
白昼欲燃灯。
庑下客衾单，檐前听急雨，无聊怯溜喧，
复怪鸡声苦。

诗仍不见得好，不过自有其特色，故举此以见一斑耳。

（四月三日又记）

□1936 年 3 月刊《益世报》，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梅花草堂笔谈等

前居绍兴时家中有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四五本，大约缺其十分之二，软体字竹纸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时候常拿出来看，虽然内容并不十分中意。移家来北京的时候不知怎地遗失了，以后想买总不容易遇见，而且价目也颇贵，日前看旧书店的目录，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这回《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的《笔谈》出板，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来看，总算得见全本了，也不记得那几卷是不曾看过的，约略翻阅一遍，就觉得也可以满足了。

《珍本丛书》出板之前，我接到施蛰存先生的来信，说在主编此书，并以目录见示，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加上了一个赞助的名义，实在却没有尽一点责，就是我的一部《谖庵文饭小品》也并不曾贡献出去。目录中有些书我以为可以缓印的，如《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柳亭诗话》等，因为原书都不大难得，不过我只同施先生说及罢了，书店方面多已编好付印，来不及更改了。但是在别一方面也有好些书很值得重印，特别是晚明文人的著作，在清朝十九都是禁书，如三袁，钟谭，陈继儒，张大复，李卓吾等均是。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我所有的缺少两卷，《焚书》和钟谭集都只是借了来看过，如今有了翻印本，足以备检阅之用。句读校对难免多错，但我说备检阅之用，这也只好算了，因为排印本原来不能为典据，五号字密排长行，纸滑墨浮，蹙頞疾视，殊少读书之乐，这不过是石印小册子之流，如查得资料，可以再去翻原书，固不能即照抄引用也。所收各本精粗不一，但总没有伪造本，亦尚可取。《杂事秘辛》虽伪造，还可算作杨升庵的文章，若是现今胡乱改窜的那自然更不足道了。

翻印这一类的书也许有人不很赞成，以为这都没有什么文艺或思想上的价值，读了无益。这话说得有点儿对，也不算全对。明朝的文艺与思想本来没有多大的发展，思想上只有王学一派，文艺上是小说一路，略有些创造，却都在正统路线以外，所以在学宗程朱文宗唐宋的正宗派看来毫无足取，正是当然的事。但是假如我们觉得不必一定那么正宗，对于上述二者自当加以相当注意，而这思想与文艺的旁门互相溷合便成为晚明文坛的一种空气，自李卓吾以至金圣叹，以及桐城派所骂的吴越间遗老，虽然面貌不尽相似，走的却是同样路道。那么晚明的这些作品也正是很重要的文献，不过都是旁门而非正统的，但我的偏见以为思想与文艺上的旁门往往要比正统更有意思，因为更有勇气与生命。孔子的思想有些我也是喜欢的，却不幸被奉为正统，大被歪曲了，愈被尊愈不成样子，我真觉得孔子的朋友殆将绝迹，恐怕非由我们一二知道他的起来纠正不可，或者《论语衍义》之作也是必要的吧。这是闲话，暂且按下不表，却说李卓吾以下的文集，我以为也大值得一看，不但是禁书难得，实在也表示明朝文学的一种特色，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与现今的文学也还不是水米无干者也。

现在提起公安竟陵派的文学，大抵只看见两种态度，不是鄙夷不屑便是痛骂。这其实是古已有之的，我们最习见的有《静志居诗话》与《四库书目提要》，朱竹垞的“丛诃攒骂”是有名的了，纪晓岚其实也并未十分胡涂，在节抄《帝京景物略》的小引里可以看出他还是有知识的人。今人学舌已可不必，有些人连公安竟陵的作品未曾见过也来跟着呐喊，怕这亡国之音会断送中原，其意可嘉，其事总不免可笑，现在得书甚易，一读之后再用自己的

智力来批评，这结果一定要好一点了。我以为读公安竟陵的书首先要明瞭他们运动的意义，其次是考查成绩如何，最后才用了高的标准来鉴定其艺术的价值。我可以代他们说明，这末一层大概不会有很好的分数的，其原因盖有二。一，在明末思想的新分子不出佛老，文字还只有古文体，革命的理论可以说得很充分，事实上改革不到那里去。我觉得苏东坡也尽有这才情，好些题跋尺牍在公安派中都是好作品，他只是缺少理论，偶然放手写得这些小文，其用心的大作仍是被选入八家的那一部分，此其不同也。反过来说，即是公安作品可以与东坡媲美，更有明确的文学观耳，就是他们自己也本不望超越白苏也。二、后人受唐宋文章的训练太深，就是新知识阶级也难免以八家为标准，来看公安竟陵就觉得种种不合式。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我觉得公安竟陵的诗都不大好，或者因为我本不懂诗之故亦未可知，其散文颇多佳作，说理的我喜其理多正确，文未必佳，至于叙景或兼抒情的小文则是其擅长，袁中郎刘同人的小记均非常人所有也。不过这只是个人的妄见，其不能蒙大雅之印可正是当然，故晚明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不易得承认，而其旁门的地位亦终难改正，这件事本无甚关系，兹不过说明其事实如此而已。

吾乡陶筠庵就《隐秀轩集》选录诗文百五十首，为《钟伯敬集抄》，小引中载其咏钟谭的一首七言拗体，首四句云：

天下不敢唾王李，钟谭便是不犹人，

甘心陷为轻薄子，大胆剥尽老头巾。后又评伯敬的文章云：“至若袁不为钟所袭，而钟之隽永似逊于袁，钟不为谭所袭，而谭之简老稍胜于钟，要皆不足为钟病，钟亦不以之自病也。”陶君的见解甚是，我曾引申之云：

“甘心云云十四字说尽钟谭，也说尽三袁以及其他一切文学革命者精神，褒贬是非亦悉具足了。向太岁头上动土，既有此大胆，因流弊而落于浅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态度，朱竹垞辈不能领解，丛诃攒骂正无足怪也。”现在的白话文学好像是已经成立了，其实是根基仍不稳固，随处都与正统派相对立，我们阅公安竟陵的遗迹自不禁更多感触，不当仅作平常文集看，陶君的评语也正是极好的格言，不但是参与其事者所应服膺，即读者或看客亦宜知此，庶几对于凡此同类的运动不致误解耳。

翻印晚明的文集原是一件好事，但流弊自然也是有的。本来万事都有流弊，食色且然，而且如上文所说，这些指责亦当甘受，不过有些太是违反本意的，也就该加以说明。我想这最重大的是假风雅之流行。这里须得回过去说《梅花草堂笔谈》了。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见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欢，与傅青主金圣叹等视。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世间读者不甚知此种区别，出板者又或夸多争胜，不加别择，势必将《檀几丛书》之类亦重复抄印而后止，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此固无关于世道人心，总之也是很无聊的事吧。如张心来的《幽梦影》，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爪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

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其实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盖风雅或文学都不是粮食也。

（廿五年四月十一日，于北平）

□1936 年 4 月 30 日刊《益世报》，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书法精言

偶得《书法精言》二册，首题新昌王滨洲编辑，乾隆辛卯新镌，三树堂藏板。书凡四卷，分执笔与永字八法，统论，分论·临摹，评论法帖等项，本庸陋无聊，我之得此只因系禁书耳。卷首有自序云：

> 书者，六艺之一也。夫子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书亦文中一事，是弟子不可以不学也。又曰，游于艺。是成德者不可以不事也。自古明王硕辅，瑰士英流，莫不留心笔迹，其寿于金石者亘千载而如新，孰谓斯道小伎而非士君子亟宜留心哉。故范文正公与苏才翁曰，书法亦要切磋，未是处无惜赐教。况自唐以书判取士，于今为烈，凡掇巍科而擢苑者靡不由是而升。士生今日而应科举，求工制艺而不留神书法，抑亦偏矣。但地有悬殊，遇有得失，尝有卓然向上者或不能亲名哲之辉光，指授笔阵，又无奇书秘旨以浚发其心胸，蹉跎有用之岁月，莫窥羲献之藩篱者，不知凡几。噫嘻，书谱之纂岂不贵哉。顾或言焉而不详，详焉而不精，仍无以作墨池之桴筏，以登于岸。近世不少纂录，戈氏为善，然犹未备也。钦惟我国家列圣相承，龙章凤藻，照耀星汉，而佩文书画之纂，搜罗今古，囊括宇内，焕乎若日月之昭回矣，惜下邑不获多见，贫士又限于觏求。鲰生以庚辰落第，肄业都下，恭求其本，杜门三月，得其言之尤精及夙闻于诸家者，汇为一集，约分四卷，名曰《书法精言》，借以自课也。窃念少壮蹉跎，授受无自，又性好纂录，信手涂鸦，陵迟以至于今日，中实愧恨。然实而课颖底之龙蛇，尚渐池烟之未黑；虚而玩案头之波磔，庶几笔髓之旁融。今虽马齿加长，尤愿孜孜焉日就月将，黾勉翰墨之场，以追袭古人之后尘，斯为快也已。乾隆辛卯年九月廿三日，舟过韩庄闸，豫章滨洲王锡侯书。

王锡侯的《字贯》案，在民国六年出板的《心史丛刊》三集中孟先生有一篇叙述，故宫博物院出板的《清代文字狱档》已出至第九集，却还没有讲到这案。据《东华录》载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王泷南告发王锡侯编《字贯》一书，诋斥《字典》，结果查出凡例中将玄烨胤禛弘历字样开列，定为“大逆不法”，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王锡侯编著各书不问内容如何，也都一律禁毁。孟先生文中云：

> 又据《禁书总目》所载应毁王锡候悖妄书目，有《国朝诗观》前集二集，有《经史镜》，有《字贯》，有《国朝试帖详解》，有《西江文观》，有《书法精言》，有《望都县志》，有小板《佩文诗韵》，有翻板《唐诗试帖详解》，有《故事提要录》，有《神鉴录》，有《王氏源流》，有《感应篇注》。今各书皆未之见，仅见《经史镜》一种，于其序跋见王锡侯之生平，于其义例见锡侯著书之分量，此亦谈故事者之一大快矣。

孟先生根据《经史镜》的跋查出锡侯生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一七一三），《经史镜》刊成于乾隆丙申，即被逮的前一年，年六十四，《书法精言》序云辛卯，盖五十九岁时作也。锡侯之为人，孟先生亦从序跋中略为研究，称其盖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批评极当。《经史镜》所分门目既多可笑，如首以庆殃报复，次以酒色财气四戒，孟先生已称其义例粗鄙，又如所著书有《感应篇注》，书虽未见，内容亦可想而知，总之不出那庸妄的一路罢了。此外

---

[1] 《逸经》题作《王锡侯书法精言》。

如《佩文诗韵》、《试帖详解》等，都是弋取功名的工具，《书法精言》亦是其一，读序文可知，文章既欠通顺，思想尤为卑陋，只似三家村塾师所为，连想起龚定庵的《干禄新书序》来，觉得有天壤之殊，像定公的才真够得上狂悖讪谤的罪名，锡侯那里配呢。孟先生论锡侯的学问人品云：

> 生平以一举乡试为无上之荣，两主司为不世之知己，此皆乡曲小儒气象，决非能有菲薄朝廷之见解者。……观其种种标榜之法，锡候之为人可知，要于文字获罪，竟以大逆不道伏诛，则去之远矣。陋儒了无大志，乃竟如后世所谓国事之犯，以国家雠此匹夫，亦可见清廷之冤滥矣。

王锡侯实在是清朝的顺民，却正以忠顺而被问成大逆，孟先生谓其以临文不讳之故排列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之名，未免看得太高，其实恐怕还是列举出来叫人家避用，不过老实地排列了，没有后人那样聪明，说上一字是天地某黄之某，所以竟犯了弥天大罪耳。康熙中出板的王弘撰的《山志》凡例中有云：

“国讳无颁行定字，今亦依唐人例但阙一笔。”可见在清初这种事本不怎么严密规定，又看见康熙时文人的手稿或抄本，玄字亦不全避，盖当时或者就很随便，锡侯习焉不察或不能观察世变，在《南山集》《闲闲录》各案发生之后，犹漫不经心，故有此祸。

其实这也不能责备锡侯，专制之世，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他自己亦不知道也。孟先生在论《闲闲录》案中云：

“实则草昧之国无法律之保障，人皆有重足之苦，无怪乾嘉士大夫屏弃百务，专以校勘考据为业，借以消磨其文字之兴，冀免指摘于一时，盖亦扪舌括囊之道矣。”孟先生写此文时在民国六年，慨乎其言之，今日读此亦复令人慨然也。

查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四总集类有《国朝诗观》十六卷，清王锡侯编，清乾隆三树堂刻本，盖是初集也。文化南渡，善本恐麇集于上海滩上矣，此《诗观》亦不知何时可以有一见的眼福，孟先生所说的《经史镜》似亦未必在北平，然则我所有的破烂的两册《书法精言》岂非《字贯》案中现在仅存的硕果乎。书虽不佳却可宝贵，其中含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古今最可怕的以文字思想杀人的一种蛮俗的遗留品，固足以为历史家的参考，且更将使唯理论者见之而沉思而恐怖也。

（民国廿五年三月十日，于北平知堂）

［附记］“清代文字狱考”与“禁书书目提要”，都是研究院的好题目，只可惜还没有人做。图书馆也该拚出一笔冤钱，多搜集禁书，不但可以供研究者之用，实在也是珍籍，应当宝重，虽然未必是善本。禁书的内容有些很无聊，如《书法精言》即是，上文云冤钱者意即指此，然而钱虽冤却又是值得花者也。

□1936 年 5 月刊《逸经》5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风雨谈》

蒿庵闲话

对于蒿庵张尔岐的笔记，我本来不会有多大期待，因为我知道他是严肃的正统派人。但是我却买了这两卷闲话来看，为什么呢？近来我想看看清初人的笔记，并不能花了财与力去大收罗，只是碰着到手的总找来一看，《蒿庵闲话》也就归入这一类里去了。这是嘉庆时的重刻本，卷末蒋因培的附记中有云：

“此书自叙谓无关经学不切世务，故命为闲话，然书中教人以说闲话看闲书管闲事为当戒，先生邃于经学，达于世务，凡所礼记皆多精义，固非闲话之比。”据我看来，这的确不是闲话，因为里边很有些大道理，如卷一有一则上半云：

> 明初学者宗尚程朱，文章质实，名儒硕辅，往往辈出，国治民风号为近古。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始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浸淫至天启崇祯之间，乡塾有读《集注》者传以为笑，《大全》《性理》诸书束之高阁，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后，文章猥杂最甚，能缀砌古字经语犹为上驷，俚辞谚语，颂圣祝寿，喧嚣满纸，圣贤微言几扫地尽，而甲申之变至矣。

下文又申明之曰：“追究其始，菲薄程朱之一念实渐致之。”《钝吟杂录》卷二“家戒下”斥李卓吾处，何义门批注云：

“吾尝谓既生一李卓吾，即宜一牛金星继其后矣。”二公语大妙，盖以为明末流寇乃应文运而生，此正可代表中国正统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派也。但是蒿庵也有些话说得颇好，卷一有一则云：

> 韩文公《送文畅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语，盖以学佛者为墨，亦据其普度之说而以此名归之。今观其学，止是摄炼精神，使之不灭，方将弃伦常割恩爱，以求证悟，而谓之兼爱可乎。又其《送文畅北游》诗，大以富贵相夸诱，至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与世俗惑溺人何异。《送高闲序》为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为胜于一死生解外胶，皆不类儒者。窃计文畅辈亦只是抽丰诗僧，不然必心轻之矣。

那样推尊程朱，对于韩文公却不很客气，这是我所觉得很有兴趣的事。前两天有朋友谈及，韩退之在中国确也有他的好处，唐朝崇奉佛教的确闹得太利害了，他的辟佛正是一种对症药方，我们不能用现今的眼光去看，他的《原道》又是那时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不失为有意义的事，因为据那位朋友的意思，印度思想在中国乃是有损无益的，所以不希望他发达，虽然在文学与思想的解放运动上这也不无用处。他这意见我觉得也是对的，不过不知怎的，我总不喜欢韩退之与其思想文章。第一，我怕见小头目。俗语云，大王好见，小鬼难当。我不很怕那大教祖，如孔子与耶稣总比孟子与保罗要好亲近一点，而韩退之又是自称是传孟子的道统的，愈往后传便自然气象愈小而架子愈大，这是很难当的事情。第二，我对于文人向来用两种看法，纯粹的艺术家，立身谨重而文章放荡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点放荡，亦以为无甚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中国正统道学家都依附程朱，但是正统文人虽亦标榜道学而所依附的却是韩愈，他们有些还不满意程朱，以为有义

---

[1] 《宇宙风》原题《文人之行》。

理而无文章，如桐城派的人所说。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于韩退之便不免要特别加以调验，看看这位大师究竟是否有此资格，不幸看出好些漏洞来，很丢了这权威的体面。古人也有讲到的，已经抄过了四五次，这回看见蒿庵别一方面的话，觉得也还可取，所以又把他抄下来了。

蒿庵自己虽然是儒者，对于“异端”的态度还不算很坏。卷一记利玛窦事云：

> 要之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论道术，吾自守家法可耳。

卷二论为学云：

> 杂家及二氏，药饵也，投之有沉疴者立见起色，然过剂则转生他病，或致杀人。

又有一则云：

> 与僧凡夫语次及避乱事，曰，乱固须避，然不可遂失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顾理义，平生学问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书曰，学者遇不如意事，现前便须为判曲直，处分了即放开心胸，令如青天白日，若事过时移尚自煎萦，此是自生苦恼也。

此僧固佳，但蒿庵能容受，如上节所云，“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耳目加莹，血气加王，”自亦难得。我与凡教徒都是隔教，但是从别一方面说，也可以说都有点接近，只是到了相当的距离就有一种间隔，不能全部相合或相反也。何燕泉本陶集中引《庐阜杂记》云：

“远师结白莲社，以书招渊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许饮即往矣。远许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攒眉而去。”这件事真假不可知，我读了却很喜欢，觉得甚能写出陶公的神气，而且也是一种很好的态度，我希望能够学到一点，可是实在易似难，太史公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

《闲话》卷一有一则说《诗经》的小文，也很有意思，文云：

> 《女曰鸡鸣》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此诗人拟想点缀之辞，若作女子口中语似觉少味。盖诗人一面叙述，一面点缀，大类后世弦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语叙景，错杂成文，如此类者甚多，《溱洧》及《鸡鸣》皆是也。溱与洧亦旁人述所闻所见演而成章，说家泥《传》淫奔者自叙之辞一语，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安顿。

近世说《诗》，唯姚首源及郝兰皋夫妇颇有思致，关于《女曰鸡鸣》亦均未想到，蒿庵所说算是最好了。关于《溱洧》，姚氏云：

“序谓淫诗，此刺淫诗也，篇中士女字甚多，非士与女所自作明矣。”

郝氏则云：

“序云，刺乱也。瑞玉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修禊溱洧之滨，士女游观，折华相赠，自择昏姻，诗人述其谣俗尔。”王夫人所说新辟而实平妥，胜于姚君，诗人迷其谣俗与旁人述所闻所见而成章，大意相同，而蒿庵复以弦索曲子比三百篇，则说得更妙，《闲话》二卷中此小文当推压卷之作了。我举上边评韩退之语，或尚不免略有意气存在，若此番的话大约可以说是大公无私了罢。（廿五年三月廿八日于北平）

□1936 年 5 月刊《宇宙风》16 期，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鸦片事略

查旧日记第二册、在戊戌（一八九八）十二月十三日下有一项记事云：

“至新试前，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洋一角。”小池于咸丰庚申被掳，在长毛中凡三十二月，此书即记其事，根据耳闻目睹，甚可凭信，读之令人惊骇，此世间难得的鲜血之书也。我读了这书大约印象甚深，至民国十九年八月拿出来看，在卷头题字数行云：

“中国民族似有嗜杀性，近三百年张李洪杨以至义和拳诸事即其明征，书册所记录百不及一二，至今读之令人悚然。今日重翻此记，益深此感，呜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乎。”

李小池后来做了外交官，到过西洋，著有游记等书，我未得见。孙产清《寄龛丙志》卷四云：

“近阅李小池圭《游览随笔》，载强水棉花，云以强水炼成，有干湿两种，干者得火即发，湿者置火中可以二刻不燃，以电线发之，方三寸，厚寸许，重不过二两者，百步外能震巨石成齑粉。”所记盖是棉花火药欤。又所著有《鸦片事略》，近日在北平市上获得一部，其价却比《思痛记》要高了三十倍了。书凡两卷，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刻，后于《思痛记》十五年，板式却是一样，很觉得可喜。卷首说明著书的宗旨云：

> 鸦片为中国漏卮，为百姓鸩毒，固尽人知之，而其于郡县流行之本末，禁令弛张之互用，与夫英人以售鸦片而兴戎乞抚，又以恶鸦片而设会劝禁，三百年来之事，则未必尽人知之。用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荟萃成此，附以外国往来文牍，曰《鸦片事略》。

由此可知这是鸦片文献的重要资料，北平图书馆之有翻印本也可以作证，我所留意的却不全在此，只是想看看中国人对于鸦片的态度，其次是稍找民俗的资料而已。这种材料在道光十八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奏中找得一点，乃是关于烟具的：

> 查吸烟之竹杆谓之枪，其枪头装烟点火之具又须细泥烧成，名曰烟斗。凡新枪新斗皆不适口，且难过瘾，必其素所习用之具，有烟油积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宝之。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尚可以他具代之，唯枪斗均难替代，而斗比枪尤不可离。

又云：

> 如烟枪固多用竹，亦间有削木为之，大抵皆烟袋铺所制，其枪头则裹以金银铜锡，枪口亦饰以金玉角牙，又闻闽粤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其烟斗自广东制者以洋磁为上，在内地制者以宜兴为宝。恐其屡烧易裂也，则亦包以金银，而发蓝点翠，各极其工。恐其屡吸易塞也，则又通以铁条，而矛戟锥刀，不一其状。

在奏摺中本来不易详叙，却也已写得不少，很是难得，所云甘蔗枪在小时候曾经看见过，烟斗与烟签子也有种种花样，这倒都是中国的自己创造。《鸦片事略》卷上记罂粟花云：

> 产土耳基波斯多白花白子，产印度者两种，一亦白花白子，一红花黑子，平原所植俱白花，出喜马拉山俱红花。法国人以其子榨油，香美，颇好之，英人亦用其浆为药材。印人则取于块为饼，嚼食款客，南洋诸岛有生食者，俾路芝以西各部酋皆酷嗜之，亦生食也。明末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滤去渣滓复煮，和烟草末为丸，置竹

管就火吸食。

又云：

> 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鸦片列入药材，每斤征税银三分。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

我曾听说鸦片烟的那种吸食法是中国所发明，现在已得到文献的证明了，烟具的美术工艺虽然是在附属的地位，但是其成绩却亦大有可观也。

中国人对于鸦片烟的态度是怎样呢？人民似乎是非吃不可，官厅则时而不许吃时而许吃，即所谓禁令张弛之互用也。雍正中的办法是：

“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吸食者没有关系。嘉庆中改正如下：

“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道光中议严禁，十九年五月定有章程三十九条，中云：

“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

“一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

“一制卖鸦片烟具者照造卖赌具例分别治罪。”三年后江宁条约签字，香港割让，五口通商，烟禁复弛，至于戊戌。《事略》卷末论禁烟之前途云：

> 今日印度即不欲禁，风会所至，非人力能强，必有禁之之日，禁之又必自易罂粟而植茶始。中国土烟既收税厘，是禁种罂粟之令大弛，民间种植必因之渐广，或至尽易茶而植罂粟，数十年后中国或无植茶地，印度则广植之，中国无茶以运外洋，印度亦无鸦片以至中国，漏卮塞矣，利源涸矣，而民间嗜食者亦必犹淡巴菰之人人习为固常，则亦不禁之禁，弛而不弛矣。

这一节文章我读了好几遍，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似讽刺，似慨叹，总之含有不少的幽默味，而亦很合于事实，又不可不谓有先见之明也。现今鸦片已不称洋药而曰土药，在店吸食则云试药，早已与淡巴菰同成为国货矣，中国自种罂粟而印度亦自有茶，正如所言，然则鸦片烟之在中国恐当以此刻现在为理想的止境欤。

一八七五年伦敦劝禁鸦片会禀请议院设法渐令印度减植罂粟，议院以四端批复，其首二条云：

“鸦片为东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华人自甘吸食，与英何尤，二也。”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言请弛鸦片之禁，中有云：

“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情无志不足轻重之辈。”这些话都似乎说得有点偏宕，实在却似能说出真情，至少在我个人看去是如此。去年四月里写了一篇《关于命运》，末后有一节话是谈这个问题的，我说：

> 第一，中国人大约特别有一种麻醉享受性，即俗云嗜好。第二，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以麻醉消遣。有友好之劝酬，有贩卖之便利，以麻醉玩耍。卫生不良，多生病痛，医药不备，无法治疗，以麻醉救急。如是乃上瘾，法宽则蔓延，法严则骈诛矣。此事为外国或别的殖民地所无，正以此种癖性与环境亦非别处所有耳。我说麻醉享受性，殊有杜撰生造之嫌，此正亦难免，但非全无根据，如古来的念咒画符读经惜字唱皮黄做八股叫口号贴标语皆是也，或以意，或以字画，或

以声音，均是自己麻醉，而以药剂则是他力麻醉耳。

我写此文时大受性急朋友的骂，可是仔细考察亦仍无以易吾说，即使我为息事宁人计删除口号标语二项，其关于鸦片的说法还是可以存在也。至于许君所说，不佞亦有相同的意见，不过以前只与友人谈谈而已，不曾发表过。但是，这里也有不同的地方。许君只说烟民都是浮情无志不足轻重之辈，所以大可任其胡里胡涂的麻醉到死，社会的事由不吃鸦片的人去做，只消多分担一点子就可以过去了。若照我的看法，麻醉的范围推广了，准烟民的数目未免太多，简直就没有办法。对于真烟民向来一直没有法子，何况又加上准烟民乎，我想大约也只好任其过瘾，写到这里乃知李小池真有见识，我读其《思痛记》将四十年犹不曾忘，今读《鸦片事略》，其将使我再记忆他四十年乎。（廿五年四月九日，北平）

［附记］上文写了不久就在《实报》见了王柱宇先生的两篇文章，都很有价值，十一日的一篇是谈烟具的，有许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十日的文章题为《土药店一瞥》，记北京樱桃斜街的鸦片烟店情形，更是贵重的资料。今抄录一部分于下：

“我向柜上说了声，掌柜辛苦。他说：你买什么？我说，借问一声，我买烟买土，没有登记的执照。可以吗？他说，有钱就卖货，不要执照，因为从我们这里买去的烟或是土，纸包上都贴有官发的印花，印花上边印着一条蛇一只虎，纸的四角印有毒蛇猛虎四字，这种意思便表示是官货，不是私售。”后来掌柜的又说，“你如果愿意在这里抽，里边有房间，每份起码两角。”此即报上所记的“试药”，吾乡俗语谓之开烟盘者是也。王先生记其情景云：

“楼上楼下约莫有五六间房，和旅馆相仿佛。我在各房看了一遍，每房之中有两炕的，有三炕的。一炕之上摆着两个枕头，每个枕头算是一号买卖。这种情形又和澡堂里的雅座一样，不过，枕头虽白，卧单却是蓝色的。”我真要感谢作者告诉我们许多事情，特别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毒蛇猛虎的印花，很想得他一张来，这恐怕非花二元四角去买一两绥远货不可吧。代价是值得的，只是这一两土无法处置，所以有点为难。（四月十二日又记）

［补记］从来薰阁得李小池著《环游地球新录》四卷，盖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往美国费里地费城参观博览会时的纪录，计《美会纪略》一卷，《游览随笔》二卷，《东行日记》一卷。自序称尝承乏浙海关案牍十有馀年，得德君（案税务司德璀琳）相知之雅，非寻常比，于是荐由赫公（案总税务司赫德）派赴会所。查《思痛记》陷洪军中共三十二月，至壬戌（一八六二）秋始得脱，大约此后即在海关办事，《思痛记》刊于光绪六年，则还在《新录》出板二年后了。上文所引强水棉花见于《游览随笔》下《英国伦敦京城》篇中，盖记在坞里治军器局所见也。篇中又讲到太吾士新报馆，纪载颇详，结论云：

“窃观西人设新报馆，欲尽知天下事也。人必知天下事，而后乃能处天下事，是报馆之设诚未可曰无益，而其益则尤非浅鲜。”李君思想通达，其推重报纸盖比黄公度为更早，但是后来世间专尚宣传，结果至于多看报愈不知天下事，则非先哲所能料及者矣。《东行日记》五月初一日在横滨所记有云：

“洋行大小数十家，各货山积，进口多洋货，出口多铜漆器茶叶古玩，

而贩运洋药商人如在中华之沙逊洋行者（原注，沙逊英国巨商，专贩洋药）无有也。盖日本烟禁极严，食者立治重法，国人皆不敢犯禁，虽是齐之以刑，亦可见法一而民从。惜我中华不知何时乃能熄此毒焰。”亦慨乎其言之。（五月四日加记）

□1936 年 5 月 16 日刊《宇宙风》17 期，暑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读 戒 律

我读佛经最初还是在三十多年前。查在南京水师学堂时的旧日记，光绪甲辰（一九〇四）十一月下有云：“ 初九日，下午自城南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黄昏回堂。 ”又云：“ 十八日，往城南购书，又《西方接引图》四尺一纸。 ”“ 十九日，看《起信论》，又《纂注》十四页。 ”

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虎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向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民国十年在北京自春至秋病了大半年，又买佛经来看了消遣，这回所看的都是些小乘经，随后是大乘律。我读《梵网经》菩萨戒本及其他，很受感动，特别是贤首《疏》，是我所最喜读的书。卷三在“ 盗戒 ”下注云：

> 《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颠，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

我在七月十四日的《山中杂信》四中云：“ 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然而又岂是那些提鸟笼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 ”又举“ 食肉戒 ”云：

> 若佛子故食肉，——一切生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轻垢罪。

在《吃菜》小文中我曾说道：“ 我读《旧约·利未记》，再看大小乘律，觉得其中所说的话要合理得多，而上边‘ 食肉戒 ’的措辞我尤为喜欢，实在明智通达，古今莫及。 ”这是民国二十年冬天所写，与《山中杂信》相距已有十年，这个意见盖一直没有变更，不过这中间又读了些小乘律，所以对于佛教的戒律更感到兴趣与佩服。小乘律的重要各部差不多都已重刻了，在各经典流通处也有发售,但是书目中在这一部门的前面必定注着一行小字云‘ 在家人勿看 ”，我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去问，并不是怕自己碰钉子，只觉得显明地要人家违反规条是一件失礼的事。末了想到一个方法，我就去找梁漱溟先生，托他替我设法去买，不久果然送来了一部《四分律藏》，共有二十本。可是后来梁先生离开北京了，我于是再去托徐森玉先生，陆续又买到了好些，我自己也在厂甸收集了一点，如《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十卷，《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均明末刊本，就是这样得来的。《书信》中“ 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 ”之十五云：

“ 前日为二女士写字写坏了，昨下午赶往琉璃厂买六吉宣赔写，顺便一看书摊，买得一部《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共二册十卷，系崇祯十七年八月所刻。此书名据说可译为《一切有部律论》，其中所论有极妙者，如卷六有一节云：云何厕？比丘入厕时，先弹指作相，使内人觉知，当正念入，好摄衣，好正当中安身，欲出者令出，不肯者勿强出。古人之质朴处盖至可爱也。 ”时为十九年二月八日，即是买书的第二天。其实此外好的文章尚多，如同卷中说类似的事云：

> 云何下风？下风出时不得作声。
>
> 云何小便？比丘不得处处小便，应在一处作坑。

云何唾？唾不得作声。不得在上座前唾。不得唾净地。不得在食前唾，若不可忍，起避去，莫令馀人得恼。

这莫令馀人得恼一句话我最喜欢，佛教的一种伟大精神的发露，正是中国的恕道也。又有关于齿木的：

云何齿木？齿木不得太大太小，不得太长太短，上者十二指，下者六指。不得上座前嚼齿木。有三事应屏处，谓大小便嚼齿木。不得在净处树下墙边嚼齿木。

《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上云：

用杨枝有五事。一者，断当如度。二者，破当如法。三者，嚼头不得过三分。四者，疏齿当中三啮，五者，当汁澡目用。

金圣叹作施耐庵《水浒传序》中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即从此出，唯义净很反对杨枝之说，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朝嚼齿木”项下云：

“岂容不识齿木，名作杨枝。西国柳树全稀，译者辄传斯号，佛齿木树实非杨柳，那烂陀寺目今亲观，既不取信于他，闻者亦无劳致惑。”净师之言自必无误，大抵如周松霭在《佛尔雅》卷五所云，“此方无竭陀罗木，多用杨枝，”译者遂如此称，虽稍失真，尚取其通俗耳。至今日本俗语犹称牙刷曰杨枝，牙签曰小杨枝，中国则僧俗皆不用此，故其名称在世间也早已不传了。

《摩得勒伽》为宋僧伽跋摩译，《三千威仪》题后汉安世高译，僧祐则云失译人名，但总之是六朝以前的文字罢。卷下有至舍后二十五事亦关于登厕者，文繁不能备录，但如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七不得草画地，十八不得持草画壁作字，都说得很有意思，今抄简短者数则：

买肉有五事。一者，设见肉完未断，不应便买。二者，人已断馀乃应买。三者，设见肉少，不得尽买。四者，若肉少不得妄增钱取。五者，设肉已尽，不得言当多买。

教人破薪有五事。一者，莫当道。二者，先视斧柄令坚。三者，不得使破有青草薪。四者，不得妄破塔材。五者，积着燥处。

我在《入厕读书》文中曾说：“偶读大小乘戒律，觉得印度先贤十分周密地注意于人生各方面，非常佩服。即以入厕一事而论，《三千威仪》下列举至舍后者有二十五事，《摩得勒伽》六自‘云何下风’至‘云何筹草’凡十三条，《南海寄归内法传》二有第十八‘便利之事’一章，都有详细的规定，有的是很严肃而幽默，读了忍不住五体投地。”我又在《谈龙集》里讲到阿剌伯奈夫札威上人的《香园》与印度亮科加师的《欲乐秘旨》，照中国古语说都是房中术的书，却又是很正经的，“他在开始说不雅驯的话之先，恭恭敬敬地要祷告一番，叫大悲大慈的神加恩于他，这的确是明朗朴实有古典精神，很是可爱的。”

自两便以至劈柴买肉（小乘律是不戒食肉的），一方面关于性交的事，这虽然属于佛教外的人所做，都说的那么委曲详尽，又合于人情物理，这真是难得可贵的事。中国便很缺少这种精神，到了现在，我们同胞，恐怕是世间最不知礼的人之一种，虽然满口仁义礼智，不必问他心里如何，只看日常举动很少顾虑到人情物理，就可以知道了。查古书里，却也曾有过很好的例，如《礼记》里的两篇《曲礼》，有好些话都可以与戒律相比。凡为长者粪之礼一节，凡进食之礼一节，都很有意思。中云：

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

这用意差不多全是为得“莫令馀人得恼”。故为可取，僧祗律云：

不得大，不得小，如淫女两粒三粒而食，当可口食。

又是很有趣的别一说法，正可互相补足也。居丧之礼一节也很好，下文有云：

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送丧不由径，送葬不辟涂潦。

读这些文章，深觉得古人的神经之纤细与感情之深厚视今人有过之无不及，《论语》卷四记孔子的事云：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实在也无非是上文的实行罢了。

从别一方面发明此意者有陶渊明，在《挽歌诗》第三首中云：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此并非单是旷达语，实乃善言世情，所谓亦已歌者即是哭日不歌的另一说法，盖送葬回去过了一二日，歌正亦已无妨了。陶公此语与“日暮狐狸眠霥上，夜阑儿女笑灯前”的感情不大相同，他似没有什么对于人家的不满意，只是平实地说这一种情形，是自然的人情，却也稍感寥寂，此是其佳处也。我读陶诗而懂得礼意，又牵连到小乘律上头去，大有缠夹之意，其实我只表示很爱这一流的思想，不论古今中印，都一样地随喜礼赞也。

（民国计五年四月十四日，于北平苦茶庵）

□1936 年 9 月刊《青年界》10 卷 2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风雨谈》

关于试帖

我久想研究八股文，可是至今未敢下手，因为怕他难，材料多，篇幅长。近来心机一转，想不如且看看试帖诗吧。于是开始搜集一点书。这些书本来早已无人过问，就是在现今高唱尊经拜孔的时代，书店印目录大抵都不列入，查考也不容易，所以现在我所收得的不过只有五十多种而已。

关于试帖的书，普通也可以分作别集总集诗文评三类，诗文评类中有梁章钜的《试律丛话》，见于《书目答问》，云十卷未刊，但是我却得到一部刻本，凡八卷四册，板心下端题知足知不足斋六字，而首叶后则云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高安县署重刊。寒斋有《知足知不足斋诗存》，马佳氏宝琳著，今人编《室名索引》亦载，“知足知不足斋，清满洲宝琳。”却不能知道刻书者是否此人，查诗集其行踪似不出直隶奉天，而梁氏则多在广东，恐怕无甚关系，高安县重刊或者是梁恭辰乎？《书目答问》作于光绪元年，却尚未知，不知何也。其次有倪鸿的《试律新话》四卷，题云同治癸酉（一八七三）闰六月野水闲鸥馆开雕，盖系其家刻，倪氏又著有《桐阴清话》八卷，则甚是知名，扫叶山房且有石印本了。梁氏《丛话》的编法与讲制艺的相同，稍觉平板，卷一论唐人试律，卷二三论纪晓岚的《我法集》与《庚辰集》，卷四五分论九家及七家试帖，卷六说壬戌科同榜，卷七说福建同乡，卷八说梁氏同宗是也，但资料丰富，亦有可取。倪氏新话近于普通诗话，随意翻读颇有趣味，却无系统次序也。别集太多不胜记，亦并不胜收集，总集亦不少，今但举出寒斋所有的唐人试律一部分于下。最早者有《唐人试帖》四卷，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刊，毛奇龄编，系与王锡田易三人共评注者，其时科举尚未用试帖诗也。《丛话》卷二云：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六一五）始定前场用经义性理，次场刊去判语五道，易用五言六韵一首，至于大小试皆添用试律，始于乾隆丁丑（一七五七）。”叶忱叶栋编注的《唐诗应试备体》十卷，即成于康熙乙未，鲁之亮马廷相评释的《唐试帖细论》六卷，牟钦元编的《唐诗五言排律笺注》七卷，都是康熙乙未年所撰，乾隆戊寅年重刊的。钱人龙所编《全唐试律类笺》十卷，亦是乾隆己卯年重刊，可见都是那时投机的出板，钱氏原序似在纠正毛西河的缺误，其初板想当更早，惜无年代可查。臧岳编《应试唐诗类释》十九卷，乾隆戊子（一七六八）重刊，原本未见。唯己卯年纪昀著的《唐人试律说》一卷，最得要领，为同类中权威之作，其中已引用臧氏之说，可知其出板亦当在丁丑左右也。说唐律的书尚不少，因无藏本故不具举。

我去八股而就试帖的原因，一半固然在于避难趋易，另外还有很好玩的理由：因为试帖比八股要古得多，而且他还是八股的祖宗。经义起于宋，但是要找到像样的八股文章，须得到了明朝后半，试帖诗则唐朝早有，如脍炙人口的钱起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作于天宝十年，还在马嵬事件的五年前呢。关于试帖与八股的问题，毛西河在《唐人试帖》序中有云：

> 且世亦知试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汉武以经义对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并起而应之，此试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无散文而复其句、重其语、两叠其话言作对偶者，惟唐制试士改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有破题，有承题，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而后结以收之。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其中四韵即八比也，然则试文之八比视此矣。今日为试文，亦日为八比，而试问八比之所自，则茫然不晓。是试文且不知，何

论为诗。

这实在说得明白晓畅，所以后人无不信服，即使在别方面对于毛西河不以为然。《试律丛话》卷二引纪晓岚说云：

“西河毛氏持论好与人立异，所选唐人试律亦好改窜字句，点金成铁，然其谓试律之法同于八比，则确论不磨。”又卷一引林辛山《馆阁诗话》云：

“毛西河检讨谓试帖八韵之法当以制艺八比之法律之，此实为作试帖者不易之定论，金雨叔殿撰《今雨堂诗墨》尝引伸其说。”《诗墨》惜尚未得见，唯《丛话》卷二录其自序，其中有云：

“余谓君等勿以诗为异物也，其起承转合，反正浅深，一切用意布局之法，直与时文无异，特面貌各别耳。”这都从正面说得很清楚，纪晓岚于乾隆乙卯年（一七九五）著《我法集》二卷，有些话也很精妙，如卷上《赋得池水夜观深》一首后评云：

> 此真极小之题，极窄之境，而加以难状之景，紫芝于楼钟池水一联几于百炼乃得之，诗话具载其事，方虚谷《瀛奎律髓》所谓诗眼，即此种之隔日疟也，于诗家为魔道。然既以魔语命题，不能不随之作魔语，譬如八比以若是乎从者之廋也命题，不能不作或人口气，诬孟子门人作贼也。又《赋得栖烟一点明》一首后评云：
>
> 此题是神来之句，所以胜四灵者，彼是刻意雕镂，此是自然高妙也。当时终日苦吟，乃得此一句，形容难状之景，终未成篇，今更形容此句，岂非剪彩之花持对春风红紫乎。然既命此题，不能不作，宋人所谓应官诗也。

无论人家怎样讨厌纪大烟斗，他究竟是高明，说的话漂亮识趣，这里把诗文合一的道理也就说穿了。刘熙载在《艺概》卷六《经义概》中有一节云：

“文莫贵于尊题。尊题自破题起讲始，承题及分比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尊题者，将题说得极有关系，乃见文非苟作。”尊题也即是作应官诗，学者知此，不但八股试帖得心应手，就是一切宣传文章也都不难做了，盖土洋党各色八股原是同一章法者也。

民国二十一年在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我曾说过这几句话：

“和八股文相连的有试帖诗。古代的律诗本只八句，共四韵，后来加多为六韵，更后成为八韵。在清朝，考试的人都用八股文的方法去作诗，于是律诗完全八股化而成为所谓试帖。”这所说的与上文大同小异，但有一点不彻底的地方，便是尚未明白试帖是八股的祖宗，在时间上不免略有错误。我又说这些应试诗文与中国戏剧有关系，民间的对联、谜语与诗钟也都与试帖相关，这却可以算是我的发见，未经前人指出。中国向来被称为文字之国，关于这一类的把戏的确是十分高明的，在平时大家尚且乐此不疲，何况又有名与利的诱引，那里会不耗思殚神地去做的呢。俗传有咏出恭者，以试帖体赋之云：“七条严妇训，四品待夫封。”盖古有妇人七出之条，又夫官四品则妻封为恭人，分咏题面，可谓工整绝伦，虽为笑谈，实是好例。李桢编《分类诗腋》（嘉庆二十二年）卷二诠题类引吴锡麒《十八学士登瀛洲》句云：“天心方李属，公等合松呼。”注云，“李松拆出十八，新极，然此可遇而不可求。”《试律新话》卷三说拆字切题法，亦引此二句云，“以李松拆出十八二字，工巧之极，惜此外不多见耳。”又《新话》卷二云：

“吴县潘篆仙茂才遵礼尝以五言八韵作戏目诗数十首，语皆工炼，余旧有其本，今不复存矣，惟记其《思凡》一联云，画眉真误我，摩顶悔从师。

今茂才已久登鬼篆，而诗稿亦流落人间，能无人琴俱亡之感耶。”这是诗话的很好的谈资，忍不住要抄引，正可以证明中国文字之适用于游戏与宣传也。

试帖诗的总集还有两种值得一提。其一是《试帖诗品钩元》二十四卷，道光乙巳（一八四五）江苏学政张芾选，其二是《试律标准》二卷，道光丙午山东学政何桂清辑也。张何皆道光乙未科翰林，刊书只差了一年，在这方面的成绩与工夫当然是很不错的，在别方面就可惜都不大行了。后来太平天国事起，何桂清为浙江巡抚，弃城而逃，坐法死。张芾事则见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三记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六月间事云：

> 张芾派兵守祁门之大洪岭，见有贼来，不知其假道以赴东流建德也，皆失魂而逃，贼见其逃也，故植旗于岭。此兵等遂来告，张芾惊欲遁，城内人皆移居。十五申刻贼从容拔旗去，张芾始有生气，然亦几毙矣。既苏，并不责逃兵，而犹从容写小楷哦试帖，明日又官气如故矣，必饰言伪言击退以冒功也。噫，欺君如此，真可恶哉，而仗马不言，真不可解。

悔翁快人，说得非常痛快，恐怕也不是过甚之词。我记得了这一番话，所以翻阅《试帖诗品钩元》时常不禁发笑，盖如上文所述，贼从容拔旗去，官从容写小楷哦试帖，这一幅景象真是好看煞人也。

我想谈谈试帖，不料乱写了一阵终于不得要领，甚是抱歉。不过这其实也是难怪的，因为我还正在搜集研究中，一点都没有得结果，可以供献给大家，现在只是说这里很有意思，有兴趣的人无妨来动手一下，有如指了一堆核桃说这颇可以吃，总是要等人自己剥了吃了有滋味。什师有言，嚼饭哺人，反令哕吐，关于试帖亦是如此，我就以此权作解嘲了。

（甘五年九月二十日，于北平苦茶庵）

□1936 年 10 月刊《宇宙风》27 期，署名知堂
□收入《瓜豆集》

再谈试帖

近来搜集一点试帖诗，成绩不算很好，石印洋板不要，木板太坏的也不收，到现在一总还不过一百种左右而已。偶阅杨雪沧的《孤居随录》，——我有一册诵芬堂本的《小演雅》题观颓道人编，后来知道即是杨浚，所以找他的笔记来翻阅，别无什么可看，但《续录》卷七是论试帖的，其内容如下：

一、毛西河先生《唐人试帖》序（节录）。

二、纪文达公《唐人试律说》序（同上）。

三、李守斋试帖七法。（注：原系八法，诗品未采，所选各联并全首见《分类诗腋》。）

四、梁芷林中丞《试律丛话》选。（只采绪论，其诗见原书。）

五、张芑涛学使《輶轩语》。（语试律诗四宜六忌全录。）

这里所引的书我都有了，那么理论方面的材料大抵已不愁缺乏，所应当注意的还是在别集总集吧。又阅《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年九月十四日条下云：

> 夜偕叔子看陈秋舫殿撰《简学斋试律》，颇有佳句，此虽小道，然肇自有唐，盛于当代，其流传当远于制义。制义数十年来衰弱已极，不复成文字，而试律犹有工者，故制义窃谓不久当废，试律法度尚存，其行未艾，即或为功令所去，人必有嗜而为之者。同人中叔子珊士孟调莲士皆工此体，叔子为尤胜也。

又十一月初五日读杜登春《社事始末》条下云：“予尝谓时文不出二十年必为功令所废，即此可知也。”李君在七十馀年前能预言八股文之当废，可谓有识，但他思想本旧，并不是识时务，实只是从文章上论，亦能看出兴衰之迹。所云试律将有嗜而为之者，此语未确，唯文诗优劣却说得很有道理，盖虽同是赋得体，而一说理易陈腐，一咏事物尚可稍有情味也。

陈秋舫《简学斋诗》今在《七家试帖》中，《试律丛话》卷五极称道之，有云：“殿撰试帖于咏史尤为擅长，《文姬归汉》全首云：

> 女有才如此，千金赎亦宜。存孤全友谊，忍死得归期。
> 一骑东风快，双雏朔雪饥。身如焦尾在，心岂左贤知。
> 大漠回看惨，陈留再到疑。经温刊石本，笳补入关词。
> 兵燹馀悲愤，门楣系子遗。可怜书未续，无命作班姬。

直是一篇文姬小传，而情韵隐秀，居然班范之间，此岂寻常笔墨耶。”吴谷人的《有正味斋试帖》中咏史数诗亦均佳，如《殷浩书空》云：

> 咄咄嗟何益，茫茫恨不穷。一生投热恼，几字画虚空。
> 悬腕书防脱，看天问岂通。光阴斜日后，心绪乱云中。
> 远势能飞白，惭颜莫洗红。肯教遗迹在，翻讶复函同。
> 高阁宜君辈，苍生误此公。西风回笔阵，渺渺羡烟鸿。

此诗刻画书空，唯六七联讲到殷深源，与陈作不同，却也写得很精致。《九家诗》第一卷即《有正味斋》，咸丰中魏滌生又有选注本，与王惕甫《芳草堂诗》合刻，称《二家诗钞笺略》。魏君曾撰《骈雅训纂》，为世所知，此笺精要，刻板亦佳，与普通坊本不同，其视试律殆与越缦有同意耶。自序中云：

> 夫赋得诗不足存，矧为之作注，纪文达公《庚辰集》固有哂之者矣。顾吾观今之类书踳驳舛盭，展卷即是，递相钞撮，几同杜撰，得如《庚

辰集》之本本原原，伐山自作，不由稗贩者，有几人哉。惜其不为类书而为此注，使推其例以为之，当益为后学津逮，顾林犹幸其有是书以示后人，使后之为类书者知所取则，其沾丐后人亦正未有涯也。

后又云：“后之读二家诗者不知视《庚辰集》何如，而注则不逮远甚，要之与钞撮影撰，沿讹踵谬，浮谈无根者，固有间矣。”说的很不错，如上文所引诗中末联“笔阵”注，除引《法书要录》“笔阵图”外，又云：

“又按此阵字借作雁阵解，盖以雁为书空匠者意关合，见陶谷《清异录》上禽名门。”不单呆引出典，却就本诗用意上说明，这注便活了，嘉庆中有《九家诗选注》，不能如此也。又如“苍生”句别家注只引《王戎传》，却不知其更包有本传的“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在内。《试律丛话》卷五论李伯子的《西沤试帖》有云：

“又‘鹤子’句云，阅世应无纪，传家别有经。上句用《瘗鹤铭》‘鹤寿不知其纪也’，下句用浮丘公《相鹤经》，而为之注者皆不之及，则何用注之有哉。”（案：光绪中刊《七家诗注》均已补入。）尝阅黎觉人《六朝文絜笺注》，在《荡妇秋思赋》题下有注云：“《说文》曰，秋，禾谷熟也。”不觉失笑。由此观之，魏涤生诚不易得，虽是赋得诗的注亦何害哉。魏君还有别的书如《同馆诗赋题解》等，惜均未能得到。

寒斋目下所有唐人试律的书共只十三部，其中却有一种很有意思，乃是王锡侯的《唐诗试帖课蒙详解》十卷，卷首题作《唐诗应试分类详解》，书签上云《应试唐诗分类详解》，《禁书目录》上却又云《唐诗试帖分类详解》。王锡侯《字贯》一案是清朝文字狱中很苛刻的一例，《心史丛刊》中记其本末颇详，所禁诸书我只见过《书法精言》，其次是这《唐诗试帖》。前有乾隆戊寅（一七五八）自序，盖因丁丑新定乡会试均用试帖，亦是投机的书，唯例言八则及论作诗法中案语六则均尚可读，不似《书法精言》之庸腐。如“例言一”云：

> 杂体之诗驱题就我，试帖之作束我就题，稍或纵放，语虽奇丽，与题无着矣。是天下诗之难作未有过于试帖者，试帖一工，何所不可。试帖之诗与八股文字无异，必须句斟字酌，与题相凑，精力有所不及，行间便少光采。然则西河毛氏谓八股文字起于试帖之诗，其信然也。

这书里还有一个特色，便是在有些诗的后面附有王氏自己的拟作，十卷中共有二十六首，盖亦是模仿西河而作。诗虽不甚佳，唯王锡侯身被坑书被焚，灰扬迹灭之后，尚能于此破册中保存着他的若干创作，亦可以说是吉光片羽矣，此其价值盖在于试帖以外而属于别一范围者也。

（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于北平）

□1937 年 2 月 25 日刊《益世报》，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谈》

常谈丛录

前日拿出孙仲容的文集《籀庼述林》来随便翻阅，看见卷十有一篇《与友人论动物学书》，觉得非常喜欢。孙君是朴学大师，对于他的《周礼》《墨子》的大著我向来是甚尊敬却也是颇有点怕的，因为这是专门之学，外行人怎么能懂，只记得《述林》中有记印度麻的一篇，当初读了很有意思。这回见到此书，不但看出著者对于名物的兴趣，而且还有好些新意见，多为中国学者所未曾说过的。文云：

> 动物之学为博物之一科，中国古无传书。《尔雅》虫鱼鸟兽畜五篇唯释名物，罕详体性。《毛诗》陆疏旨在诂经，遗略实众。陆佃郑樵之伦，摭拾浮浅，同诸自郐。……至古鸟兽虫鱼种类今既多绝灭，古籍所记尤疏略，非徒《山海经》《逸周书王会》所说珍禽异兽荒远难信，即《尔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鸟之等成不为典要，而《诗》《礼》所云螟蛉蜾蠃，腐草为萤，以逮鹰鸠爵蛤之变化，稽核物性亦殊为疏阔。……今动物学书说诸虫兽，有足者无多少皆以偶数，绝无三足者，而《尔雅》有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殆皆传之失实矣。……中土所传云龙风虎休征瑞应，则揆之科学万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

一个多月以前我在《希腊人的好学》这篇小文里曾说：“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恐怕直至传教师给我们翻译洋书的时候。只在《诗经》《离骚》《尔雅》的笺注，地志，农家医家的书里，有关于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中国格物往往等于谈玄，有些在前代弄清楚了的事情，后人反而又糊涂起来，如螟蛉负子梁朝陶弘景已不相信，清朝邵晋涵却一定说是祝诵而化。又有许多伦理化的鸟兽生活传说，至今还是大家津津乐道，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枭食母等。”现在从《述林》里见到差不多同样的话，觉得很是愉快，因为在老辈中居然找到同志，而且孙君的态度更为明白坚决，他声明不必曲徇古人，一切以科学与物理为断，这在现代智识界中还不易多得，此所以更值得我们的佩服也。

我平常看笔记类的闲书也随时留意，有没有这种文章，能够释名物详体性，或更进一步能斟酌情理以纠正古人悠谬的传说的呢。并不是全然没有，虽然极少见。李登斋著《常谈丛录》九卷，有道光二十八年序，刻版用纸均不佳，却有颇好的意见，略可与孙君相比。其例言之二有云：“是书意在求详，故词则繁而不杀；纪唯从实，故言必信而有征。”这颇能说出他的特色来，盖不盲从，重实验，可以说是具有科学的精神也。卷一有《蛇不畏雄黄》一则云：

> 蛇畏雄黄，具载诸医方本草，俱无异辞。忆嘉庆庚辰假馆于分水村书室，有三尺长蛇来在厨屋之天井中，计取之，以长线缚其腰而悬于竿末，若钓鱼然，蜿蜒宛转，揭以为戏。因谓其畏雄黄，盍试之，觅得明润雄黄一块，气颇酷烈，研细俾就蛇口，殊不曲避，屡伸舌舐及之，亦无所苦。如此良久，时方朝食后也，傍晚蛇犹活动如故，乃揭出门外，缚稍缓，入于石罅而逝。然则古所云物有相制，当不尽然也。又尝获一活蜈蚣长四五寸，夹向大蜒蚰，至口辄钳之不释，蜒蚰涎涌质缩且中断。是蜒蚰能困蜈蚣而为其所畏，其说载于宋蔡絛《铁围山丛谈》者，俱未

足信。凡若此类，苟非亲试验之，亦曷由而知其不然也。

又卷六有《虎不畏伞》一则云：

> 《物理小识》云，行人张盖而虎不犯者，盖虎疑也。《升庵外集》亦云虎畏伞，张向之不敢犯。以予所闻则不然。上杨村武生杨昂青恒市纸于贵溪之栗树山，邻居有素习老儒某馆于近村，清明节归家展墓毕欲复往。时日将晡又微雨，杨劝使俟明晨，谓山有虎可虞也。某笑曰，几见读书人而罹虎灾者乎，竟张伞就道。雨亦暂止，杨与二三侨伍送之，见其逾田陇过对面山下，沿山麓行，忽林中有虎跃出，作势蹲伏于前，某惊惶旋伞自蔽，虎提其伞掷数十步外，扑某于地，曳之入林去。众望之骇惧莫能为，驰告其家，集族人持械往觅不可得，已迫暮复雨，姑返，次日得一足掌于深山中，是虎食所馀也，拾而葬之。此杨亲为予言者。由此观之，虎固未尝疑畏于张盖也。又由此而推之，则凡书籍所载制御毒暴诸法之不近理者，岂可尽信耶。

杨升庵方密之都是古之闻人，觉得他们的话不尽可信，已是难得，据陆建瀛序文说，李君是学医的人，对于医方本草却也取怀疑的态度，更是常人所不易及了。其记述生物的文章，观察亦颇细密，如卷七《小蚌双足》一则，可为代表，其文云：

> 春夏之交，溪涧浅水中有蚌蛤，如豆大，外黑色，时张其壳两扇若翼，中出细筋二条，如绣线，长几及寸，淡红色可爱。其筋下垂，能蹀躞行沙泥土甚驶，盖以之为足也。稍惊触之，即敛入壳，阖而卧不动，俄复行如前。抄逐而捉搦之，则应手碎，与泥滓混融不可辨，以其质微小而脆薄故也。水田内亦间有之，老农云，是取陂池底积淤以肥田，挟与俱来，其实蚌子不生育于田也。计惟以杯瓢轻物侧置水中，手围令入而仰承之，连取数枚，带水挈归，养以白瓷盆盎，列几间殊可玩。其行时壳下覆，不审红筋如何缀生，蚌蛤稍大者即无之，亦不知何时化有为无，意或如蝌蚪有尾，至其时尾自脱落化成虾螟也。四虫各三百六十，而介虫类目前独少，蚌居介类之一，人知蚌之胎珠而不识蚌之胎子其孕产若何，古人书中皆未详载，是亦当为格物者所不遗也。

这篇小文章初看并不觉得怎么好，但与别的一比较便可知道。张林西著《琐事闲录》卷下有讲蜘蛛的一节云：

> 传闻蜘蛛能飞，非真能飞也，大约因衔丝借风荡漾，即能凌空而行。予前在杨桥曾于壁头起除蛛网一团，见有小蛛数十枚，衔断丝因风四散，大蛛又复吐丝，坠至半壁亦因风而起。前闻蜘蛛皆能御空，即此是也。

小蜘蛛乘风离窠四散，这是事实，见于法布耳的《昆虫记》，《闲录》能记录下来也是难得，但说衔丝亦仍有语弊，平常知道蚕吐丝，蜘蛛却是别从后窍纺丝，所以这里观察还有欠周密处。《丛录》说小蚌双足固然写得很精细，而此事实又特别有趣，今年夏天我的小侄儿从荷花缸里捉了几个小蛤蜊，养在小盆里，叫我去看，都小如绿豆，伸出两条脚在水中爬行，正如文中所叙一样，在我固是初见，也不知道别的书中有无讲到过。李君所写普通记述名物的小篇亦多佳作，《丛录》卷一有《画衫婆》一则云：

> 予乡溪涧池塘中常有小鱼，似鲫细鳞，长无逾三寸者，通身皆青红紫横纹相间，映水视之，光采闪烁不定，尾亦紫红色，甚可观，俗名之曰画衫婆。肉粗味不美，外多文而内少含蕴，士之华者类是也。此鱼似为《尔雅》《诗虫鱼疏》以下诸书所不载。

这种鱼小时候也常看见，却不知其名，江西的这画衫婆的名字倒颇有风趣，《尔雅》《诗疏》古代诂经之书岂足与语此，使郝兰皋独立著书，仿《记海错》而作虫鱼志，当必能写成一部可读的自然书耳。

李登斋的意见不能全然脱俗，那也是无怪的，特别是关于物化这一类事，往往凭了传闻就相信了，如卷三有《竹化螳螂》一则，这在孙仲容当然是说“亦殊为疏阔”的。但有些地方也颇写得妙，卷一《青蛙三见》中说金溪县有青蛙神三，是司瘟疫的，常常出现，下文却又云：

> 大要其神不妄作威福，即有不知而轻侮之，甚至屠践之者未尝降之以祸，谄事之者亦未得其祐助。

在作者并无成心，却说得很有点幽默，盖其态度诚实，同样地记录其见闻疑信，不似一般撰志异文章者之故意多所歪曲渲染也。

（廿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平）

□1936 年 11 月刊《青年界》10 卷 4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瓜豆集》

常谈丛录之二

今年夏天从隆福寺买到一部笔记，名曰《常谈丛录》，凡九卷，金溪李元复著，有道光廿八年陆建瀛序，小板竹纸，印刷粗恶，而内容尚佳，颇有思想，文章亦可读。卷三“女子裹足”一则有云：

> 女子裹足诸书虽尝为考证，然要皆无确据，究不知始于何时，其风至遍行天下，计当在千数百年之前耳。女子幼时少亦必受三年楚毒，而后得所谓如莲钩如新月者，作俑之人吾不知其历几万万劫受诸恶报，永无超拔也。其实女之美岂必在细足，古西施郑旦初不闻其以纤趾而得此美名也。满洲自昔无裹足之风，予间见其妇女出行，端重窈窕，较汉之蹑弓鞋步倾倚者转觉安详可悦，然则创此者真属多事也。

裹足这件事真大奇，不知何以那么久远地流行，也不知何时才能消灭。计自南宋至今已有七百年了，大家安之若素，很少有人惊怪，我看明末清初算是近世的思想解放时代，但顾亭林与李笠翁都一样的赞成或是不反对小脚，可见国人精神之欠健全了。只有做那《板桥杂记》的余澹心稍表示态度，他在替笠翁写的《闲情偶寄》序中本已说过：

“独是冥心高寄，千载相关，深恶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独爱陶元亮之闲情作赋。”他有一篇《妇人鞋袜辨》附录在《偶寄》卷三中，开头便云：

“古妇人之足与男子无异。”后又云：“宋元丰以前缠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将四百年，矫揉造作，亦已甚矣。”其次是俞理初，他有很明达的思想，但想起来有点可笑，在《癸巳类稿》卷十三里有一大篇缠足考，却题名曰《书旧唐书舆服志后》。他简要地结论云“弓足出舞利屣，”说明道：

“大足利屣，则屣前锐利有鼻而弓。古弓靴履，不弓足。南唐弓足，束指就屣鼻利处而纤向上。宋理宗时纤直，后乃纤向下。此其大略也。”又批判曰：

“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则失丁女，阴弱则两仪不完。又出古舞屣贱服，女贱则男贱。女子心不可改者，由不知古大足时有贵重华美之履，徒以理折之不服也。”李君亦主张不裹足，其理由较为卑近，曰：

“予谓当今不裹足殆有四善。从圣朝正大朴厚之风，无戾俗之嫌，一也。免妇女幼年惨痛之厄，二也。得操作奔走以佐男子之事，三也。提抱婴孩，安稳无倾跌之患，四也。人奈何无卓然之见，毅然为之哉。若以为细故，则安民之政细于此者多矣，岂通论乎。”李君盖深赞成满人不裹足的风俗，所以第一条是那样说法，他又猜想在清初当有过禁令，因故中止，说道：

“意必有明之遗臣在位者，持因循之说相劝沮，固谓为闺阃闲情，无与于政治之大，遂亦听任之也，斯人真可谓无识矣。”这所推测的并不错，俞文中云：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之制，后又定顺治二年以后所生女子禁裹足，康熙六年弛其禁。”又据《池北偶谈》卷三“八股”一则云：

>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科举改三场为二场，首场策五道，二场四书五经各论一首，表一道，判语五条，起甲辰会试讫丁未会试皆然。会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请酌复旧章，予时为仪制员外郎，乃条上应复者八事，复三场旧制其一也。尚书钱塘黄公机善之而不能悉

行，乃止请复三场及宽民间女子裹足之禁，教官会试五次不中者仍准会试三事，皆得俞旨。馀五事后为台省次第条奏，以渐皆复，如宽科场处分条例，复恩拔岁贡，复生童科岁两考等是也。

原来这都是渔洋山人的主张，恢复考八股文与裹足，他的笔记杂文虽还有可观，头脑可是实在不行，真可称之曰无识。中国的文人与学者都一样的不高明，即在现今青年中似亦仍不乏爱好细足者，读余澹心俞理初的文章，殊有空谷足音之感，李登斋本无盛名而亦有此达识，更足使人佩服了。

《常谈丛录》记名物的文章亦多佳作，盖观察周到而见识足以副之。如卷四有“攒盒”一则云：

祝允明《猥谈》云，江西俗俭，果盒作数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馀悉充以雕木，谓之子孙果盒。今予乡尚有此，但同称攒盒，不闻有子孙果盒之名。其盒之精致者则不为木格而为纸胎灰漆碟，一圆碟居中，旁攒以扇面碟四五，或多至七八，外为一大盘统承之，形制圆，有盖，不用则覆之，髹画斑烂，足为供玩，中多设瓜子，贫乏家则以煠炒熟豆，所谓菜则于盐菜也。馀间充以不可食之果，如柏子梧子相思子之类，或亦用苏州油蜡采饰看果数色，雕木具绝少。若富室则糕饼果饵皆可食者，然亦第为观美，无或遍尝焉，究何异于雕木哉。予性雅不喜此，为其近于伪也。客至瀹茗清淡，佐以果食，即一二味亦可，正不贵多品，奈何使不堪入口而仅饫人目哉，斯已失款客之诚矣。妇女胶于沿习，虽相随设之，意终未善之也。

又卷六“鸟虫少”一则中云：

连岁荒歉，百物之产，渐见亏缩，至道光十四年甲午而极。屋脊墙头恒终日无一禽鸟翔集，行山间二三里，或绝无飞鸣形声，回忆少时林间池畔，颉颃喧噪之景象，大不侔矣。水中鱼虾十仅一二，携渔具者每废然空归。凡春末交夏，入暮则蛙鸣聒耳，令人难寐，至此则几于寂静，火照渔蛙者寥寥。夏秋数月，苍蝇丛噪，盘碗羹饭为黑，粪污器物密点如麻，至此则疏疏落落，一堂之内或不盈十。此数物者，并不资生于谷粟，若苍蝇又非可充人饱餐，而亦随凶年而减少，殆于仅存，岂非天地生生之气至此忽索然欲竭耶。

像这两篇文章，在普通笔记里也不大容易找到。攒盒各地多有，但只存于耳目之间，少见纪载，盖文人所喜谈者非高雅的诗文则果报与鬼怪耳，平常生活情形以及名物体性皆不屑言也。鸟虫少一节不但其事有意义，文章亦颇佳，如将这态度加以廓大，便可以写地方的自然史，虽不能比英国的怀德，亦庶几略得其遗意乎。近来乱读清人笔记，觉得此类文字最不易得，李登斋的《丛录》在这点上其价值当在近代诸名流之上也。（二十五年十月三日，在北平）

□1937 年 3 月刊“宇宙风”社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瓜豆集》

关于尺牍

桂未谷跋《颜氏家藏尺牍》云：

“古人尺牍不入本集，李汉编昌黎集，刘禹锡编河东集，俱无之。自欧苏黄吕，以及方秋崖卢柳南赵清旷，始有专本。”所以讲起尺牍第一总叫人想到苏东坡黄山谷，而以文章情思论，的确也是这两家算最好，别人都有点赶不上。明季散文很是发达，尺牍写得好的也出来了好些。万历丁巳郁开之编刊《明朝瑶笺》四卷，前两卷收永乐至嘉隆时人百三十六，第三卷五十三，皆万历时人，第四卷则四人。凡例第二中云：

“四卷专以李卓吾袁石浦陶歇庵袁中郎四先生汇焉。四先生共跋浮名，互观无始。臭味千古，往还一时，则又不可以他笺杂。笺凡一百五十有三。”这所说很有见识，虽然四人并不一定以学佛重，但比馀人自更有价值，而其中又以李卓吾为最。《瑶笺》中共收三十六笺，大都是李氏《焚书》中所有，我很喜欢他的《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末节云：

“不闻庞公之事乎？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愿公师其远见可也。若曰，待吾与市井小儿辈商之，则吾不能知矣。”又《复焦弱侯》之一云：

>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嗾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嗾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皆在黄生术中而不悟，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今之讲道学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

读这两节，觉得与普通尺牍很有不同处。第一是这几乎都是书而非札，长篇大页的发议论，非苏黄所有，但是却又写得那么自然，别无古文气味，所以还是尺牍的一种新体。第二，那种嬉笑怒骂也是少见。我自己不主张写这类文字，看别人的言论时这样泼辣的态度却也不禁佩服，特别是言行一致，这在李卓吾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古人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所以这里要声明一声，外强中干的人千万学他不得，真是要画虎不成反为一条黄狗也。虎还可以有好几只，李卓老的人与文章却有点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他又有《与耿楚侗》的一笺云：

> 夫所谓仙佛与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皆不得已权立名目以化诱后人，非真实也，唯颜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诱。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公岂能胜我乎？何为乎公独有学可讲，独有许多不容已处也。我既与公一同，则一切弃人伦，离妻室，削发披缁等语，公亦可以相忘于无言矣。何也？仆未尝有一件不与公同也，但

公为大官耳。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若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

所云化诱一节未知是否，若后半则无一语不妙，不佞亦深有同意，盖有许多人都与我们同一，所不同者就只是为大官而已，因其为大官也于是其学问似乎亦遂大长，而可与孔孟为伍矣。李卓老天下快人，破口说出，此古今大官们乃一时失色，此真可谓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尺牍也。

其　二

清初承明季文学的潮流也可以说是解放的时代，尺牍中不乏名家，如金圣叹，毛西河，李笠翁，以至乾隆时的袁子才，郑板桥。《板桥家书》却最为特别，自序文起便很古怪爽利，令人读了不能释卷，，这也是尺牍的一种新体。这一卷书至今脍炙人口，可以知道他影响之大，在当时一定也很被爱读，虽然文献的证据不大容易找。但是我也曾找到一点儿，郝兰皋在《晒书堂外集》卷上有《与舍弟第一书》云：

> 告懿林：陶徵士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子曾子云，勿寓人我室，毁伤其薪木。古人于居处什器，意所便安，深致系恋如此。吾与尔同气虽无分别，但吾庐之爱岂能忘情，薪木无伤，鸟欣有托，吾意拳拳为此耳，莫谓汝嫂临行封锁门户便为小器，此亦流俗之情宜尔也。吾辈非圣贤，岂能忘尔我之见，令人媳妇归宁，往返数十日，尚且锁闭门庭，收藏器皿，岂畏公婆偷盗哉，盖此儿女之私情，虽圣贤不能禁也。吾与尔老亲在堂，幸尚康健，故我得薄宦游违膝下，然亦五六年后便当为归养之计。我与尔年方强壮，共财分甘，日月正长，而吾亲垂垂已老，天伦乐事得不少图几年欢聚耶。我西家房屋及器用汝须留神照看，勿寓人我室，令有毁伤，庶吾归时欣鸟有托，此亦尔守器挈瓶之智也。言至此不觉大笑，汝莫复笑我小器如嫂否？所要朱砂和药，今致二钱，颇可用，惜乎不多耳。应泰近业如何，常至城否？见时可为我致意。逢辰及小女儿知想大爷大娘否，试问之。桂女勿令使性懒惰，好为人家作媳妇也。《医方便览》二本未及披阅，俟八月寄下。《吕氏春秋》，《秘书二十一种》，便中寄至京，俟秋冬间不迟。我新病初起，意绪无聊，因修家书，信笔抒写，遂尔絮絮不休，读毕大家一笑，更须藏此书，留为后日笑话也。嘉庆五年庚申七月八日，哥哥书。

又在邵西樵所编《师友尺牍偶存》卷上有王西庄札七通，其末一篇云：

> 承示寄怀大作，拍手朗唱一味天真无畔岸句，不觉乱跳乱叫，滚倒在床上，以其能搔着痒挠着痛也。怪哉西樵，七个字中将王郎全副写照出来。快拿绍兴（京师酒中之最佳者）来吃，大醉中又梦老兄，起来又读。因窃思之，人生少年时初出来涉世交友，视朋友不甚爱惜也，及至足迹半天下，回想旧朋友，实觉其味深长。盖升沉显晦，聚散离合，转盼间恍如隔世，于极空极幻之中，七零八落，偶然剩几个旧朋友在世，此旧物也，能不想杀，况此旧友实比新友之情深十倍耶。而札云，天上故人犹以手翰下及，怪哉西樵而犹为此言乎。集中圈点偶有不当处，如弟酿花小圃云，闭门无剥啄，只有蜜蜂喧二句，应密圈密密圈。弟尝论诗要一开口便吞题目，譬如吃东西，且开口先将此物一齐吞在口内，然后嚼得粉碎，细细咀味，此之谓善吃也。奈何今人作诗，将此物放在桌

上，呆看一回，又闲闲评论其味一回，终不到口，安得成诗。弟此二句能将酿花圃三字一齐吞完，而尚囫囵未曾嚼破，此为神来之笔，应密圈也。近来诗之一道实在难言，只因俱是诗皮诗渣，青黄黑白配成一副送官礼家伙耳。只如一味天真四字，固已扫尽浮词，抉开真面矣，而无畔岸三字更奇更确更老辣，只此三字岂今日之名公所能下。弟平生友朋投赠之什，无能作此语者，盖大兄诗有真性情，故非诗皮诗渣所能及，而弟十年来尤好为无畔岸之文，汪洋浩渺，一望无际，以写其胸次之奇，所存诗二千首，文七百馀篇，皆无畔岸者也，得一知己遂以三字为定评。……倘有便羽，万望赐之手书，且要长篇，多说些旧朋友踪迹，近时大兄之景况，云间之景况，琐事闲话，拉拉杂杂，方有趣，切不可寥寥几行，作通套了世情生活。专此磕头磕头，哀恳哀恳。翘望湘波，未知把手何日，想煞想煞。馀不一。

王郝二君为乾嘉时经师，而均写这样的信札，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并且显然看得出有板桥的痕迹，“哥哥书”是确实无疑的了，“乱叫乱跳”恐怕也是吧，看其馀六封信都不是这样写法，可知其必然另有所本也。但是这种新体尺牍我总怀疑是否适于实用，盖偶一为之固然觉得很新鲜，篇篇如此不但显得单调，而且也不一定文情都相合，便容易有做作的毛病了。板桥的十六通家书，我不能说他假，也不大相信他全是真的，里边有许多我想是他自己写下来，如随笔一般，也同样的可以看见他的文章思想，是很好的作品，却不见得是一封封的寄给他舍弟的罢。

其　三

看《秋水轩尺牍》，在现代化的中国说起来恐怕要算是一件腐化的事，但是这尺牍的势力却是不可轻视的，他或者比板桥还要有影响也未可知。他的板本有多少种我不知道，只看在尺牍里有笺注的单有《秋水轩》一种，即此可以想见其流行之广了。朱熙芝的《芸香阁尺一书》卷一中有《致许梦花》一篇云：

尝读秋水尺一书，骎古人，甲今人，四海之内，家置一编。余生也晚，不获作当风桃李，与当阶兰桂共游，兹晤镜人，知阁下为秋水之文郎，与镜人作名门之僚婿，倩其介绍，转达积忱。培江左鄙人也，棘闱鏖战，不得志于有司，迫而为幕，仍恋恋于举业，是以未习刑钱，暂襄笔札，河声岳色，两度名邦，剑胆琴心，八年异地，茫茫身世，感慨系之。近绘小影，名曰航海逢春。拍天浪拥，乘槎不是逃名；大地春回，有美非关好色。群仙广召，妙句争题，久慕大才，附呈图说，如荷增辉尺幅，则未拜尊人光霁，得求阁下琳琅，足慰向来愿矣。

芸香阁之恭维秋水轩不是虚假的，他自己的尺一书也是这一路，如上文可见。不佞近来稍买尺牍书，又因乡曲之见也留心绍兴人的著作，所以这秋水轩恰巧落在这二重范围之内，略略有点知道。寒斋收藏许葭村的著作有道光辛卯刊《秋水轩尺牍》二卷，光绪甲申刊《续秋水轩尺牍》一卷，诗集《燕游草》一卷，其子又村所著有光绪戊寅刊《梦巢诗草》二卷。上文所云许梦花盖即又村，《诗草》卷上有七言绝句一首，题曰，“同伴高镜人襟兄卸装平原，邀留两日，作诗一章以谢。”又有七言律诗一首，题曰，《题朱熙芝航海逢春图》。题下有小注云：

“图中一书生，古巾服，携书剑，破浪乘槎，有美人掉小舟，采各种花，顺流至，远望仙山楼阁，隐现天光云影间。”诗不足录，即此可以见二人的关系，以及图中景色耳。朱君虽瓣香秋水，其实他还比较的有才情，不过资望浅，所以胜不过既成作家。如《尺一书》卷一《复李松石》（《镜花缘》的作者么？）云：

> 承示过岳王祠诗，结句最得《春秋》严首恶之义：王构无迎二圣心，相桧乃兴三字狱。特怪武穆自量可以灭金，何不直捣黄龙，再请违旨之罪，乃拘拘于君命不可违，使奸相得行其计，致社稷不能复，二圣不能还，其轻重得失固何如耶。俟有暇拟将此意作古风一章，即以奉和。

又《致顾仲懿》云：

> 蒲帆风饱，飞渡大江，梦稳扁舟，破晓未醒，推篷起视，而黄沙白草，茅店板桥，已非江南风景，家山易别，客地重经，唯自咏何如风不顺，我得去乡迟之旧句耳。所论岳武穆何不直捣黄龙再请违旨之罪，知非正论，姑作快论，得足下引春秋大义辨之，所谓天王明圣臣罪当诛，纯臣之心惟知有君也。前春原嵇丈评弟《郭巨埋儿辨》云，惟其愚之至，是以孝之至。事异论同，皆可补芸香一时妄论之失。关于岳飞的事大抵都是愚论，芸香亦不免，郭巨辨未见，大约是有所不满吧。但对于这两座忠孝的偶像敢有批评，总之是颇有胆力的，即此一点就很可取，顾嵇二公是应声虫，原不足道，就是秋水相形之下也显然觉得庸熟了。《尺一书》末篇《答韵仙》云：

> 困人天气，无可为怀，忽报鸿来，饷我玫瑰万片，供养斋头，魂梦都醉。因沽酒一坛浸之，馀则囊之耳枕，非日处置得宜，所以见寝食不忘也。

文虽未免稍纤巧，（因为是答校书的缘故吧？）却也还不俗恶，在《秋水轩》中亦少见此种文字，不佞论文无乡曲之见，不敢说尺牍是我们绍兴的好也。

（廿五年十月八日于北平）

［附记］第二节中所记王郝二君的尺牍成绩当然不能算好，盖其性情本来不甚相近，勉强写诙诡文字，犹如正经人整衣危坐曰，现在我们要说笑话了！无论笑话说得如何，但其态度总是可爱也。王西庄七百篇文未见，郝兰皋集中不少佳作，不过是别一路，朴实而有风趣，与板桥不相同。（九日又记）

□1936 年 11 月刊《宇宙风》28 期，署名知堂
□收入《瓜豆集》

再谈尺牍

我近来搜集一点尺牍，同时对于山阴会稽人的著作不问废铜烂铁也都想要，所以有些东西落在这交叉点里，叫我不能不要他，这便是越人的尺牍。不过我的搜集不是无限制的，有些高价的书就只好缓议，即如陶石篑的集子还未得到，虽然据袁小修说这本来无甚可看，因为他好的小品都没有选进去，在我说来难免近于酸蒲桃的辩解，不好就这样说。明人的尺牍单行的我只有一册沈青霞的《塞鸿尺牍》，其实这也是文集的一种，却有独立的名称而已，此外的都只在集中见到，如王龙溪，徐文长，王季重，陶路叔，张宗子皆是。我根据了《谑庵文饭小品》与《拜环堂文集》残卷，曾将季重路叔的尺牍略为介绍过，文长宗子亦是畸人，当有可谈，却尚缺少准备，今且从略，跳过到清朝人那边去吧。

清朝的越人所著尺牍单行本我也得到不多，可以举出来的只有商宝意的《质园尺牍》二卷，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二卷，续一卷，龚联辉的《未斋尺牍》四卷，以及范镜川的《世守拙斋尺牍》四卷罢了。商宝意是乾嘉时有名的诗人，著有《质园诗集》三十二卷，又编《越风》初二集共三十卷，这尺牍是道光王寅（一八四三）山阴余应松所刊，序中称其“吐属风雅，典丽高华，是金华殿中人语”，这是赞辞，同时也就说出了他的分限。上卷有《致周舫轩书》之一云：

> 古谚如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言马肿背。三月昏，参星夕，杏花盛，桑叶白。蜻蜓鸣，衣裘成，蟋蟀鸣，懒妇惊。——等语，清丽如乐府。尊公著作等身，识大识小并堪寿世，闻有《越谚》一卷，希录其副寄我。久客思归，对纸上乡音，如在兰亭禹庙间共里人话矣。

又云：

> 阅所示家传，感念尊公几山先辈之殁倏忽五年。君家城西别业旧有凌霄木香二架，芳艳动人，忆与尊公置酒花下，啖凤潭锦鳞鱼，论司马氏四公子传，豪举如昨，而几山不可作矣。年命朝露，可发深慨。足下既以文学世其家，续先人未竟之绪，夜台有知当含笑瞑目也。诸传简而有法，直而不夸，真足下拟陶石篑之记百家烟火，刘蕺山之叙水澄，其妙处笠山鹅池两君已评之，余何能多作赞语，唯以老成沦丧，不禁涕泪沾襟耳。便鸿布达，黯然何如。

案《越风》卷七云：

> 周徐彩，字粹存，会稽人，康熙庚子举人，著有《名山藏诗稿》。所居城西别业，庭前木香一架，虬枝蟠结，百馀年物也，花时烂熳香满裀席，余曾觞于此而乐之，距今四十年，花尚无恙。子绍■，字舫轩，诸生，著有《舫轩诗选》。

两封信里都很有感情分子，所以写得颇有意思，如上文对于城西别业殊多恋恋之情，可以为证，至于《越谚》那恐怕不曾有，即有也未必会胜于范啸风，盖扁舟子的见识殆不容易企及也。又致陶玉川云：

> 夜来一雨，凉入枕簟，凌晨起视，已落叶满阶矣。寒衣俱在质库中，陡听金风，颇有吴牛见月之恐。越人在都者携有菱芡二种，遍种于丰宜门外，提篮上市，以百钱买之，居然江乡风味，纪以小诗，附尘一览。大兄久客思归，烟波浩森之情谅同之也。

这里又是久客思归，故文亦可读，盖内容稍实在也，说北京菱芡的起源别有

意思，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七月下有菱角鸡头一条云：“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读尺牍可以知其来源，唯老鸡头依然丰满而大菱则憔悴不堪，无复在镜水中的丰采矣。

《秋水轩尺牍》与其说有名还不如说是闻名的书，因为如为他作注释的管秋初所说，“措辞富丽，意绪缠绵，洵为操觚家揣摩善本”，不幸成了滥调信札的祖师，久为识者所鄙视，提起来不免都要摇头，其实这是有点儿冤枉的。《秋水轩》不能说写得好，却也不算怎么坏，据我看来比明季山人如王百穀所写的似乎还要不讨厌一点，不过这本是幕友的尺牍，自然也有他们的习气。《秋水轩》刊于道光辛卯（一八三一），《未斋》则在乙巳（一八四五），二人不但同是幕友，而且还是盟兄弟，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可是他们二人的身后名很不一样，《秋水轩》原刊板并不坏，光绪甲申（一八八四）还有续编出版，风行一时，注者续出，《未斋》则向来没有人提起，小板多错字，纸墨均劣，虽然文章并不见得比《秋水轩》不如。凡读过《秋水轩》的应当还记得卷上的那“一枝甫寄，双鲤频颁”的一封四六信吧，那即是寄给龚未斋的全部十四封中的第二信也。未斋给许葭村的共有八封，其末一封云：

> 病后不能搦管，而一息尚存又未敢与草木同腐。平时偶作诗词，只堪覆瓿，唯三十馀年客窗酬应之札，直摅胸膈，畅所欲言，虽于尺牍之道去之千里，而性情所寄似有不忍弃者，遂于病后录而集之。内中唯仆与足下酬答为独多，惜足下鸿篇短制为爱者携去，仅存四六一函，录之于集，借美玉之光以辉燕石，并欲使后之览者知仆与足下乃文字之交，非势利交也。因足下素有嗜痂之癖，故书以奉告，录出一番，另请教削，知许子之不惮烦也。

《秋水轩》第十四封中有云：“尺牍心折已久，付之梨枣，定当纸贵一时，以弟谫陋无文亦蒙采入，恐因鱼目而减夜光之价，削而去之则为我藏拙多矣。”可以知道即是上文的回答，据《未斋尺牍》自序称编集时在嘉庆癸亥（一八〇三），写信也当在那时候吧。《秋水轩》第一封信去谢招待，末云：“阮昔侯于二十一日往磁州，破题儿第一夜，钟情如先生当亦为之黯然也。”《未斋》第一封即是复信，有云：

> 阮锡侯此番远出，未免有情，日前有札寄彼云，新月窥窗，轻风拂帐，依依不舍，当不只作草桥一梦。来翰亦云破题儿第一夜，以弟为钟情人亦当闻之黯然，何以千里相违而情词如接，岂非有情者所见略同乎。夫天地一情之所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学究迂儒强为讳饰，不知文王辗转反侧，后妃嗟我怀人，实开千古钟情之祖，第圣人有情而无欲，所为乐而不淫也。弟年逾五十，而每遇出游辄黯然魂消者数日，盖女子薄命，适我征人，秋月春花，都成虚度，迨红颜已改，白发渐滋，此生亦复休矣。足下固钟情人，前去接眷之说其果行否乎。■缕及之，为个中人道耳。

第二封是四六复信，那篇“一枝甫寄”的原信也就附在后边，即所谓借美玉之光也。第四封信似是未斋先发，中云：

> 阮君书来道其夫人九月有如达之喜，因思是月也雀入大水，故敝署五产而皆雌，今来翰为改于十月免身，其得蛟也必矣，弟亲自造作者竟不知其月，抑又奇也。舍侄甘林得馆之难竟如其伯之得子，岂其东家尚未诞生也。今年曾寄寓信计六十馀函，足下阴行善事不厌其烦，何以报

之，唯有学近日官场念《金刚经》万遍，保佑足下多子耳。

秋水轩答信云：

昔侯夫人逾月而娩，以其时考之宜为震之长男，而得巽之长女，良由当局者自失其期，遂令旁观者难神其算也。令侄馆事屡谋屡失，降而就副，未免大才小用，静以待之，自有碧梧千尺耳。寓函往复何足云劳，而仁人用心祝以多子，则兄之善颂善祷积福尤宏，不更当老蚌生珠耶。

他们所谈的事大抵不出谋馆纳宠求子这些，他们本是读书人之习幕者，不会讲出什么新道理来，值得现代读者倾听。但是从他们谈那些无聊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一点性情才气，我想也是有意思的事。特别是我们能够找着二人往来的信札，又是关于阮昔侯这人看他们怎样的谈论，这种机会也是不容易得的。讲到个人的才情我觉得未斋倒未必不及秋水轩，盖龚时有奇语而许则极少见也。《未斋尺牍》卷一与徐克家云：

敝斋不戒于火，将身外之物一炬而烬之，不留一丝，不剩一字，真佛家所谓清净寂灭者矣。友人或吊者，或贺者，吊者其常，贺者则似是而非也。夫凡民之于豪杰在有生之初而已定，如必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彼夏商周之继起为君者无所谓忧患，而世之少为公子老封君者曾安乐之足以为累否耶。不肖中人以下之资，即时时有祝融之警，终不能进于上智，若无此一火，亦未必遂流为下愚，不过适然火之，亦适然听之而已。孟夫子之言为豪杰进策励之功，非凡民所得而借口也。质之高明，以为然否。

又卷四与章含章云：

诸君子之至于斯也，仆未尝不倒屣而迎也，而素畏应酬，又无斯须之不懒，竟至有来而无往。最爱客来偏懒答，剧怜花放却慵栽，此十年前之句，非是今日始，疏野之性有不可以药者，而外间随以仆为傲。夫有周公之才之美尚不可以骄吝，矧吾辈依人作嫁，碌碌鱼鱼，无足以傲世，更何所傲为。弟与足下交最久，知我独深，望为我言曰，其为人懒而狂，非傲也。至诸侯大夫之至止者为丞相长史耳，更与张君嗣无涉也，懒也傲也均无关于轻重，可一笑置之。

卷四有答周氾荇书与论“公门造福”，嬉笑怒骂颇极其妙，惜文长不能抄，自谓其苦可及其狂不可及也。《秋水轩》中便少此种狂文，鄙见以为此即《未斋》长处，盖其本色所在，但此等不利于揣摩之用，或者正亦以此不能如《秋水轩》之为世人所喜欤。（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北平）

□1937 年 4 月 8 日刊《益世报》，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谈》

读风臆补

好几年前在友人手头看见一部戴忠甫的《读风臆评》，明万历时闵氏朱墨套印，心甚爱好，但求诸市场则书既不多，价又颇贵，终未能获得。日前有人送给我几本旧书，其中有一函两册，题曰《读风臆补》，陈舜百著，清光绪庚辰年刻，凡十五卷，乃即是全录戴评而增补之者，书虽晚出而内容加多，是很可喜的事。查《四库书目提要》十七诗类存目中有戴氏《臆评》，批云：

“是书取《诗经》国风，加以评语，纤仄佻巧，已渐开竟陵之门径，其于经义固了不相关也。”《四库提要》的贬词在我们看来有些都可以照原样拿过来，当作赞词去看，如这里所云于经义了不相关，即是一例。我们读《诗经》，一方面固然要查名物训诂，了解文义，一方面却也要注重把他当作文学看，切不可奉为经典，想去在里边求教训。不将三百篇当作经而只当作诗读的人，自古至今大约并不很多，至少这样讲法的书总是不大有，可以为证，若戴君者真是希有可贵，不愧为竟陵派的前驱矣。清代的姚首源著《诗经通论》，略可相比。郝兰皋以经师而能以文学说诗，时有妙解，亦是难得。今知咸丰中尚有陈君，律以五百年一贤犹比膊也之言，可谓此诗学外道之德亦并不怎么孤了。

《臆评》对于《国风》只当文章去讲，毫不谈到训诂，《臆补》亦是如此。这于我这样经书荒疏的人，自然也不大方便，不过他们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不能怪他，只好自去查考罢了。戴君似很不满意于朱注，评中常要带说到，如《王风》“有兔■■”章下云：

> 有兔二语，正意已尽，却从有生之初翻出一段逼蹙无聊之语，何等笔力。注乃云，为此诗者犹及见西周之盛云云，令人喷饭。

又《桧风》“匪风发兮”章下云：

> 匪风二语，即唐诗所谓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春草绿萋萋。注乃云，常时风发而车偈。顾瞻周道，中心恒兮，多少含蓄。注更补伤王室之陵迟，无端续胫添足，致诗人一段别趣尽行抹杀，亦祖龙烈焰后一厄也。

陈君对于朱注不敢作如此声口，盖时为之也。唯二人多引后人句以说诗，手法相同，亦是此派之一特色。如《周南》“采采卷耳”章下《臆评》云：

> 诗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唐人诗，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亦犹是卷耳四句意耳，试取以相较，远近浓淡孰当擅场。

又《豳风》“我徂东山”章下云：

> 有敦瓜苦四句，老杜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差堪伯仲。若王建家人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以视鹳鸣于垤，妇叹于室二语，更露伧父面孔。

《臆补》中此种说法尤多，今选取其更有风致者，如《周南》“南有乔木”章下云：

>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永叔云，犹古人言，虽为执鞭所欣慕焉者也。朱子悦之深，意亦同。唐人香奁诗云，自怜输厩吏，馀暖在香鞮，此即欧朱意也，孰谓《周南》正风乃艳情之滥觞哉。

又“遵彼汝坟”章下云：

> 怒如调饥，后来闺怨不能出此四字。韩诗调饥作朝饥，薛君章句所

谓朝饥最难忍也。焦氏《易林》云，怒如旦饥。晋郭遐周诗，言别在斯须，怒焉如朝饥。汉晋去古未远，尚得其实耳。

《召南》“嘤嘤草虫”章下云：

采薇蕨而伤心，正所谓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也。若杜审言诗，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则与诗意相对照矣。

《邶风》“燕燕于飞”章下云：

瞻望勿及，伫立以泣，送别情景，二语尽之，是真可以泣鬼神矣。

张子野短长句云，眼力不如人，远上溪桥去。东坡送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

此类尚多，今不具举。

陈君别有一特色，为前人所无，即对于乱世苛政之慨叹。如《王风》“有兔■■”章下云：“极沉痛刻酷之作”。又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醉到太平时。”《魏风》“十亩之间兮”章下《臆评》云：“读此觉后人招隐词为烦”。陈君则补评云：“桑园可乐，风政尚佳。后世戈矛加于鸥鸟，征徭及于鸡犬，并野亦不可居矣。至曰闲闲，曰泄泄，往来固自得也，亦实有黜陟不知理乱不闻意。”又《硕鼠》章下云：“呼鼠而汝之，实呼汝而鼠之也，怨毒之深，有如此者。”又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向生处乐，即适彼乐土意。谁之永号，姚承庵谓即哀哀寡妇诛求尽，痛哭郊原何处村也。”《桧风》“隰有苌楚”章下云：“宋琬诗云，寄与武陵仙吏道，莫将征税及桃花，又是一意。及诵桑柘废时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徭之句，更不禁凄然叹息也。”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苦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有兔■■”，《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少此种感觉，唯“垂死病中惊坐起”及“毋使蛟龙得”各章尚稍记得，但也只是友朋离别之情深耳，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兴观群怨未知何属，而起人感触则是事实，此殆可以说是学诗之效乎。今得陈君一引伸，乃愈佳妙，但不知今人读之以为何如。诗人生于东周，陈君以至不佞读诗时皆在清末，固宜有此叹息。现在的青年如或读《国风》诸篇及陈君所评不佞所谈皆觉得隔膜，则此乃是中国的大幸事，不佞此文虽无人要读亦所不怨也。即使如此，戴陈二君的书却仍有其价值，要读《诗经》的人还当一看，盖其谈《诗》只以文学论，与经义了不相关，实为绝大特色，打破千馀年来的窠臼。中国古来的经书都是可以一读的，就只怕的钻进经义里去，变成古人的应声虫，《臆评》之类乃正是对症的药。如读《诗经》从这里下手，另外加上名物训诂，便能走上正路，不但于个人有益，乌烟瘴气的思想的徒党渐益减少，其于中国亦岂不大有利乎。（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1936 年 11 月 22 日刊《中央日报》，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谈》

读书随笔

在《又满楼丛书》中有沈赤然著《寒夜丛谈》三卷，颇有妙语。如卷二《谈礼》中云：

> 行吊之日不饮酒食肉，后世恐无此人。盖其吊时本无哀心，即有哀心，吊毕忘之矣。当求之眼不识杯铛而又能长斋绣佛者。
>
> 妇人及五十无车者皆不越疆吊人，今时皆然。非守礼也，盖无车者则懒于行路，妇人则惜舟车费耳。

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点意思，便想搜求他别的著作来看，总算得到了几种，有《寄傲轩读书随笔》十二卷，《续笔》《三笔》各六卷，《五砚斋文钞》十卷，据《丛书举要》四五说还有《诗钞》二十卷，不能得到虽是可惜，但是我是不大懂得诗的，所以也就罢了。《文钞》卷四《名字释误》云：

“予初名玉辉，字韫山，后应童子试，更名赤熊，而字则如故。甲申岁试入德清县学黉，案发乃误熊为然。”卷二《更生道人自序》中云：

“予平生有砚癖，有书画癖，皆以贫故其癖得不甚。性好游，闻佳山水辄神往，苦无济胜具，遇嵌崟历落则止，遇林木丛密则止，故败意时常多。又好酒，苦不能卯午饮，不能长夜饮，有公事不饮，无佳酝不饮，对俗人不饮，故不醉日常多。”又云：

“所为诗古文及行草书皆无师，师古人，虽十不得一，视窃今人面貌者谬自谓过之。”卷五《答吴谷人论文书》云：

“仆亦有所不为者三焉。一曰，故为艰涩以托于古奥。二曰，摭拾浮艳以破坏法度。三曰，刻意规模以失吾本真。故仆之为文，词达而已矣，不鄙俚，不失体裁，即已矣。”这几节关于自己的表白都很有意义。《论文书》末尾又有云：

“近时为古文词者，惟同年友山阴章君学诚，择精语详，神明于法，海内作者罕有其比。”很足以证明他自己的立场。卷三有《与章实斋书》云：

> 比示《文史通义》一书，内论六经皆史云云，初谓词胜于理，反复读之，乃叹汉唐以来未有窥此秘者，足使大师结舌，经生失步矣。志乘诸论议亦足补刘子元《史通》所不逮，然见少多怪，恐急索解人不得耳。又云，讲韩欧之法者不可以升马班之堂，深马班之学者岂复顾韩欧之笔，初亦不能无疑，及读至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数语，又闻所未闻，何论之奇而确也。夫人情贵远而贱近，此书一出，讥弹者必多，然天下大矣，安知无如桓谭其人者在乎。仆近著《读书随笔》十卷，中论经子百馀条，颇有创解，然自信未坚，他日得就政足下，或不叱其病狂，此外虽有笑我骂我者，亦听之而已。

查刘氏刻《章氏遗书》，未见有答书，唯《文史通义》外篇二王穀塍编目中有《评沈梅村古文》，有目无文，后始刻入《章氏遗书补遗》中，其起首数语云：

“同年友梅村沈君（名赤然，钱塘人）杂钞前后所著古文词为一卷，示余辱问可否。君志洁才清，识趣古雅，所撰皆直舒膺臆，无枝辞饰句，读其书可想见其为人。”《读书随笔》共三集二十二卷，皆读经史的札记，多有好意思，我觉得这乃是他的杰作，比文章更有价值，惜章实斋不及评，想或未及见也。《随笔》卷六有二则云：

> 梁蔡樽为郡，不饮郡井。非不饮也，盖斋前既自种白苋紫葵以为常

饵，不能不凿井浇灌，衙斋既有井矣，故不须更汲于外。若在官以饮水为嫌，是固蚓之所不能也，而况于人乎。

到溉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尝疑一冠十年事或有之，履不应耐久若是，至朝服穿补尤非致美黻冕之道。凡若此者，未可信也。

所说皆有理，而又富于情趣，故不易企及。卷七云：

后唐赵在礼在宋州时，人苦之，及罢去，宋人喜，私相谓曰，眼中丁今拔矣。寻复受诏居原职，乃籍其部内口率钱一千，日拔丁钱。此与郑文宝《江表志》载张崇之征渠伊钱捋须钱极肖，正如乞儿强丐，任尔唾骂，不得残羹冷饭终不去也，可奈何。

又云：

宋既南渡，江淮以北悉非所有，然数十年后，户亦有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视宣和前仅减七百万，固由从龙而南者实蕃有徒，然休养生息亦不可谓非和议之力。

此则本平凡无奇，唯查三集对于南宋时大家所喜谈的和战问题并不提及，只此处间接说着，其见解似亦有独异处。卷八云：

欧阳公自言，平生作文构思多在马上枕上厕上。钱思公亦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厕上则读小词。然厕上构思，古今文人通病，若展卷其间，无乃太亵乎。因忆左太冲作《三都赋》，溷处亦置纸笔，不知有底忙，却抛不下此片刻工夫耳。

卷九云：

士生秦汉后，佛固不必佞，亦正不必辟，盖立身自有本末，非仅撒粪佛头即可上侪颜孟也。昔司马温公不好佛，谓其微言不出儒书，而家法则曰十月斋僧诵经，可见温公亦未尝尽排斥也，况远不及温公者乎。

又云：

洪景卢谓退之潮州上表与子瞻量移汝州上表同一归命君父，而退之颇有摧挫献佞语，子瞻则略无佞词云云。此论固当，然退之岂好为谄谀者，唯生死看得太重，不觉措词过于乞怜，如游华山不得下，便痛哭作书与家人诀，亦只是怕死耳。子瞻深于禅理，故能随在洒然，然狱中二诗何尝不哀迫怕死耶。

前两篇都是很好的小文章，末篇说穿韩退之的毛病，大是痛快，这样一个可笑人而举世奉为圣贤，何耶？《续笔》卷三云：

臧洪杀爱妾食将士，将士咸流涕。夫婉娈之肉区区几何，乃忍解割于刀俎之上，烹燔于鼎镬之中，以求坚众心而作士气，岂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吾读史至此等事，未尝不笑其愚而憎其很也。

卷四云：

昭成帝尝击贼，为流矢所中，后得射者，释不问，曰各为其主也。石勒擢参军樊坦为章武内史，入辞，衣服弊甚，勒问之，坦率然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货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耶？今当偿卿。坦悟，大惧叩头谢。勒曰，孤律自防狡吏，不关卿辈老书生也。竟厚赐之去。此等大度尤人所难。天生豪杰岂限华夷，彼蒂芥睚眦以语言罪人者，视此不适成虮肝蝇腹耶？

沈君生于乾隆十年乙丑（一七四五），序《续笔》时为嘉庆十年乙丑，盖年已周甲矣，语言文字之狱见闻必多亲切，今为此言，读了更令人感叹，想见著者意识下很有不平的块磊在也。《三笔》卷一有读经的一则云：

《论语》“子路曰不仕无义”一节，皆以为子路为丈人家人言之，然朱注言尝见福州国初时写本，子路下有反字，曰字上有子字，盖子路既反而夫子言之也。余谓丈人既行，其家止有村妻稚子，更有何人能理会得此段说话，其为今本脱去二字无疑。

这里说子路在丈人家里大发牢骚为未必有，固然不错，照朱注这样一改，就讲得过去了，可是这回未免有点使得孔子为难，因为孔子对于子路大发牢骚也可笑，而且情形也不像，孔子平时对于这些隐逸不大这样的发脾气，如长沮桀溺楚狂接舆可以为证。我引《三笔》的这一则，只为他说得有意思，若论解释则未能恰好，本来“丈人”一章的文章很不好讲也。

沈梅村的著作近来颇不易得，盖嘉道间刊本经太平天国之乱多毁于兵火，大抵如此，觉得也就可以珍重，而其文章思想亦均有特色，因抄录数则为之绍介。读史的札记大都易犯一种毛病，即是陈旧褊狭，沈君却正相反，甚为难得，读去常有新的气味，不像是百年前人所说的话，有时实在比今人还要明白有理解也。（二十五年十一月）

□1936 年 12 月刊《宇宙风》31 期，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谈》

林阜间集

《越缦堂日记补》第三册咸丰六年二月初三日条下云：

> 阅吾乡潘少白谘《林阜间诗文集》。少白足迹半天下，借终南为捷径，旅京华作市隐，笠屩所至，公卿嗜名者争下之，而邑人与素游者皆言其诡诈卑鄙，盖亦公道可征也。然其文实修洁可喜，虽洼泓易尽，而一草一石间风回水萦，自有佳致，写景尤工，唯满口道学为可厌耳。或更夸其高淡，则正其才力薄弱，借此欺人者也。然在本朝自当作一名家，越中与胡稚威差可肩随，铁崖、天池则跨而上之矣。

后有批语，盖周素人笔，云：“论潘少白此语绝当，其《常语》却不可及。”

寒斋所有潘少白诗文集凡两种。一曰《林阜间集》，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刻，文六集，诗五卷，《常语》二卷。一曰《潘少白先生集》，道光甲辰（一八四四）刻，文八卷，无诗，《常语》二卷。后者据陈莲史云是其自订定本，但增减不甚多，《常语》则完全一样也。《常语》盖实是潘少白语录，李越缦所谓满口道学为可厌耳即指此书，而周素人又称之为不可及，对照得妙。但据我的意思则觉得李君的话说得不错，贬固对褒也对。我不懂诗，若其文我亦颇喜欢，修洁，工于写景，如《自彭水梯山之大酉暮宿珠窦筈与人书》，《与故友陈其山书》，《南野翁寓庐记》，《夜渡太湖至湖州小记》，《水月庵记》等，都颇可喜。不过周君也不算全说错了，因为《常语》大半固是道学语，却亦不无可取处，为平常道学家所不能言或不能知者。如卷上云：

> “草木盛时，风日雨露皆接为体，及其枯槁，皆能病之，此草木气机内仁不仁之别也。”又云：
>
> “太极之理，毫发内皆充满无间。”这头一条我们稍读过一点植物学的便知道不对，第二条则简直不知说的是什么，不禁掩口胡卢。但他也有说得好的，如云：

> 孟子以能言距杨墨即引为圣人之徒，后人都看错能言二字。时杨墨深染人心，其真差谬处皆言不出，莫知所距，至孟子始具眼訾之，人尚不信，斯时有能与孟子同一识见，必于正道理会过来，见之亲故距之力也。后人袭前人已尽之言，于道理上亦未会得，人人以能言为事，亦何取哉。

所说当时情形像煞有介事的，也未必可靠，因为我们看战国时的记载并不如孟子所说那样，有不归杨则归墨的形势。但是结论却很有意思，正如西儒说过，第一个将花比女人的是才子，第二个说的便是呆子，后世之随口乱骂无父无君者便都是这一类的货色了。袭前人已尽之言，这是很辛辣的一句话，是做洋策论的人的当头棒喝。又云：

> 古人以豆记善恶念，日省工夫密矣，而后人附以名利福泽之说，使人日望名利福泽，此正恶念所始，犹乡里妇人念佛，云一句阿弥陀佛，天上便贮下一金钱，其贪愚无知岂可理解。

中国士大夫自称业儒，其实一半已成了道士，拜文昌念《太上感应篇》的不必说了，上焉者也仍是讲功过信报应，有名如吾乡刘蕺山还不能免，可以知矣。潘君干脆的比之于贪愚的念佛老太婆，殊为痛快，在这一点上道学同行中人盖莫能及也。又卷下云：

> 失节事大，人人当知，但以劝愚夫妇，必令免于死亡，然后可驱而

之善。宋人每以极至诣责妇人小子，故所行多龃龉。

这意思本来也很平凡，孟子曾说过：“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不过后来道学家早就没有这种话了，他们满嘴“仁义礼智”，却不知道人之不能不衣食，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他们的知识与情感真是要在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之下了。宋人有名的教条之一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不能算错，但可惜他们不知道，须得平常肚皮饱，这才晓得失节事大，有时肯饿死。若是一直饿着，那就觉得还是有饭吃第一要紧了。向来提倡道学的人大抵全是宋人嫡系的道学家，明白事理如潘少白者可以说是绝少，曰不可及，盖非诬也。卷上有一条系答牛都谏论《实政录》者，关于用民力有云：

“农民小贩工匠十日内费一日工，则一年即缺半月之用。”此亦明通之见，与闭了眼睛乱说者不同。文集中也有些好的意思。可以抄录一二，其单有文词之美者姑从略，《至彭水复友人书》劝阻文人之从军，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其中有云：

> 故武夫厌于铠胄，而儒生诗歌乐言从戎，实不过身处幕幄，杯旁掀髯狂歌自豪，一种意气为之耳。果令枕戈卧雪，裹伤负粮，与士卒伍，前有白刃，后有严威，未有不惨然神沮者矣。……前有杜某者，言王三槐负隅时，或奋然思作谕诱之策，闻老林一带刀槊植地望之无尾，骇不敢议。夫一围之颈，尺刃足以斮之，刀槊丛植亦何事，彼岂冀贼无寸铁而思往哉。

《答人问仙术书》云：

> 凡其所事，核之此生皆一息无可旁委，自少至老一日失事则谓之不尽命，安有暇日以求其外？其有暇日以习异说者，皆未尽生理者也。百物受质，无久住之理，亦无长凝不运之气，故生死非有二义，使其果有一人生不复死，是即天地之乖气。

这两节都说是很有意思，前者揭穿那些戎马书生的丑态，深足为今人之鉴戒。我曾说过，中国要好，须得文人不谈武，武人不谈文，这比岳鹏举的不爱钱不惜死恐怕更是要紧。后者不信神仙，似亦是儒者常事，孔子所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都是实例，但在读书人兼做道士的后世这就很难说了，潘君还能说没有长生不老的事，此亦是不可及之一也。大抵潘少白本是山人者流，使其生在明末清初，其才情亦足以写《闲情偶寄》，若乾隆时亦可著《随园诗话》吧，不幸而生在道光时，非考据或义理无由自见，遂以道学做清客，然而才气亦不能尽掩，故有时透露出来，此在纯伪道学立场上未免是毛病，我们则以为其可取即在于此，有如阮芸台记妇人变猪，后足犹存弓样耳。此谑殊可悔，但操刀必割，住手为难，悔而仍存之，谑庵亦有先例。得罪道学家原所不计，南野翁亦解人，当不计较也。（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于北平）

[附记]潘少白文中多言姚镜塘，极致倾倒，卷四有《水月庵记》、专为姚君记念而作，文亦甚佳。卷五《归安姚先生传》中有云：

“喜读书吟步看山，与之酒，怡然不可厌，故与游者常满室。人至其居，蹙然病其贫，日就之，知其乐。尝曰，吾视百物皆有真趣。”其人似亦颇有意思。因搜求其文集读之，得光绪重刻《竹素斋集》十册，凡古文三卷，时

文四卷，诗三卷，试帖一卷。文中关于少白的只有诗草画册跋各一首，亦殊平常，唯卷三有《酒诫》颇佳，列举五害，根据经训，谓宜禁戒，而后复有《书酒诫后》云：

“余既作《酒诫》而饮之不节如故也，窃自惧，已而叹曰，事无巨细，法立而不能守者有矣，若无法安所守。乃立之法曰，平居偶饮以杯为节，昼则五之，夜则十之，宴集倍之，及数即止。苟可止，虽未及数，止也。”证以“与之酒怡然不可厌”之语，可以想见其为人。卷二有《太上感应篇注序》，盖踵惠松崖柴省轩之后而补注者，书尚未得见，但既信“太上垂训”，即逃不出读书人兼做道士的陋俗，姚君于此对于少白山人不能无愧矣。

（二十六年四月三日再记）

□1936 年 12 月 13 日刊《中央日报》，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谈》

谈字学举隅

偶然借到宋倪正父的《经鉏堂杂志》四册，万历庚子年刻，有季振宜印，卷面又有人题字一行云：昌乐阎恭定公家旧书，道光丁未夏借读。可知这书是有来历的了。倪君的议论也有可取处，字体又刻得很精致，原来也是一部好书，可是被妄人涂抹坏了，简直不能再看。先有人拿朱笔写了好些批语，后来又有人拿墨笔细心的把它一一勾掉或直掉，这倒还在其次，最要不得的是又有一个人（或者即是勾批语的也未可知），将书中每个帖体简笔字都照了《字学举隅》改正笔墨，如能所此于等字，无不以昏墨败笔加以涂改，只馀第八卷末十五叶不曾点污，岂读至此处而忽溘然耶。展卷一望，满眼荆棘，书中虽有好议论，也如西子蒙不洁，不欲观也已。我们看了其墨之昏笔之败，便如见其头脑之昏败，再看其涂抹得一塌胡涂，也如见其心地之胡涂，举笔一挥，如悟能之忽现猪相，真可异也。书虽可读，因面目可憎，心生厌恶，即还原处，竟不及读毕一卷，此种经验在我也还是初次，所以不免少见多怪的要说这一大番话，假如将来见识得多，那么自然看惯了也就不多说了吧。

《字学举隅》这把戏我是搅过的，并不觉得怎么的了不得，我在小时候预备举业，每日写一张大字之外还抄《字学举隅》与《诗韵》，这个苦功用得不冤枉，在四十岁以前，上下平三十韵里的某字在某韵我大抵都记得清楚，仄声难免有点麻胡，直到现在才算把它忘记完了，《字学举隅》的标准写法至今还记得不少，——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大家都知道，《字学举隅》是写馆阁体字的教科书，本是曹文正公曹振镛的主意，而这曹文正公也即是传授做官六字秘诀的祖师。秘诀维何，曰多磕头少说话，是也。所谓字学，实亦只是写馆阁体字（象征磕头的那一种字体）的方面而已，与文字之学乃是风马牛十万八千里也。

不佞少时失学，至廿五岁时始得见《说文解字》，略识文字，每写今隶，辄恨其多谬误，如必丸等字简直苦于无从下笔，如鱼鸟等字亦均不合，盖鸟无四足，鱼尾亦非四歧也。及后又少识金文甲骨文，更知小篆亦多转变致讹，如凡从止的字都该画一足形，无论怎么简单均可，总不能如小篆那样，若欲求正确则须仔细描出脚八桠子才行。不佞有志于正字，最初以为应复小篆，后更进而主张甲骨文，庶几不失造字本意。其意美则美矣，奈难以实行何？假如用我最正确的主张，则我便非先去学画不可，不然就无从写一止字也。小篆还可以知道一点，惜仍不正确，若今隶更非矣，而《字学举隅》又是今隶中之裹小脚者耳，奚足道哉。

不佞不能写象形文字，正字之大业只好废然而止，还来用普通通行的字聊以应用，只求便利，帖体简笔固可采取，即民间俗字亦无妨利用，只不要不通就好了。不能飞入天空中去，便不如索性老实站在地上，若着了红绣鞋立在秋千上离地才一尺，摇摇摆摆的夸示于人，那就大可不必，《字学举隅》的字体即此类是也。不知何等样人乃据此以涂改古人的书，那得不令人恶心杀。

□1936 年 12 月 29 日刊《世界日报》，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谈》

关于谑庵悔谑

《谈风》社的朋友叫我供给一点旧材料，一时想不出好办法，而日期已近，只好把吾乡王谑庵的《悔谑》抄了一份送去，聊以塞责。这是从他的儿子王鼎起所编的《谑庵文饭小品》卷二里抄出来的，但以前似乎是单行过，如倪鸿宝的叙文中云：

“而书既国门，逢人道悔，是则谑庵谑矣。”又张宗子著《王谑庵先生传》中云：

“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谑》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这里不但可以知道《悔谑》这书的来历，也可以看出谑庵这人的特色，传中前半有云：

> 盖先生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川黔总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闲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宴先生于滕王阁，时日落霞生，先生谓公曰，王勃《滕王阁序》不意今日乃复应之。公问故，先生笑曰，落霞与孤鹜齐飞，今日正当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鹜齐飞殆为年兄道也。公面赧及颈，先生知其意，襆被即行。

这里开玩笑在我的趣味上说来是不赞成的，因为我有“两个鬼”，在撒野时我犹未免有绅士气也，虽然在讲道学时就很有些流氓气出来。但是谑庵的谑总够得上算是彻底了，在这一点上是值得佩服的。他生在明季，那么胡闹，却没有给奄党所打死，也未被东林所骂死，真是侥天之幸。他的一生好像是以谑为业，张宗子编《有时越人三不朽图赞》，其赞王谑庵有云：

“以文为饭，以弈为律。谑不避虐，钱不讳癖。”特别提出谑来，与传中多叙谑事，都有独到之见。《三不朽图赞》凡一百单八人，人人有赞，而《琅嬛文集》中特别收录王君像一赞，盖宗老对于此文亦颇自熹欤。传中又引陆德先之言有云：

“先生之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用事者。”可谓知言，亦与上文所说相合。谑庵著书有刻本《王季重九种》以至十一种，世上多有，寒斋所藏《谑庵文饭小品》，只有五卷，而共有五百页，仓卒不及尽读，难于引证，姑就卷一中尺牍一部分言之，盖九种云云之中无尺牍，故用以为例。第一则“简夏怀碧”云：

> 丽人果解事，此君针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即欲为之作缘，恐职方亦自岳岳。买鱼喂猫则可，买鲋鱼喂猫，无此理矣。

第二则“柬余慕兰”云：

> 敦睦如吾兄，妙矣。然吾兄大爷气未除，不读书之故耳。邵都公每每作诗示弟，弟戏之曰，且云做官做吏，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渠怫然。闻兄近日亦染其病，读书可也，作诗且慢，不容易鲍参军耳。

第十五则“上黄老师”云：

> 隆恩寺无他奇，独大会明堂有百馀丈，可玩月，门生曾雪卧其间者十日。径下有云深庵，曾以五月啖其樱桃，八月落其苹果。樱桃人啖后则百鸟俱来，就中有绿羽翠翎者，有白身朱咮者，语皆侏■■舌，嘈杂清妙。苹果之香在于午夜，某曾早起嗅之。其逸品入神，谓之清香，清不同而香更异。老师不可不访之。第十九则“简周玉绳”之二云：

不佞得南缮郎且去，无以留别。此时海内第一急务在安顿穷人。若驿递不复，则换班之小二哥，扯纤之花二姐，皆无所得馍馍，其势必抢夺，抢夺不可，其势必争杀，祸且大乱，刘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相公速速主持，存不佞此语。

第二十则又云，“刘掌科因父作马头被县令苦责，毛御史则因在京置妾，其妻忽到，遂发议罢驿递。”也是很有趣的掌故。

第二十五则“答李伯襄”云：

灵谷松妙，寺前涧亦可。约唐存忆同往则妙，若吕豫石一脸旧选君气，足未行而肚先走，李玄素两摆摇断玉鱼，往来三山街，邀喝人下马，是其本等，山水之间着不得也。

材料太多太好，一抄就是五篇，只好带住，此虽是书札，实在无一非《悔谑》中逸语也。卷首又有“致语”十篇，黄石斋评曰：

“此又笺启别体，冰心匠玉，香味吐金，望似白描，按之锦绚，苏黄小品中吉光摘出，何以敌此。”其中如《鲁两生不肯行》，《严子陵还富春渚》，《陶渊明解绶》诸篇，都颇有风趣，今惜不能多引。

谑庵一生以谑为业，固矣，但这件事可以从两边来看，一方面是由于天性，一方面也有社会的背景。《文饭小品》卷二中有“风雅什”十三篇，是仿《诗经》的，其《清流之什》（注曰，刺伪也。）云：

矫矫清流，其源僻兮。有斐君子，巧于索兮。
我欲舌之，而齿断兮。
矫矫清流，其湍激兮。有斐君子，不胜藉兮。
我欲怒之，而笑哑兮。

所以有些他的戏谑乃是怒骂的变相，即所谓我欲怒之而笑哑兮也。但是有时候也不能再笑哑了，乃转为齿■，而谑也简直是骂了。如《东人之什》（注云，哀群小也）云：

东人之子，有蒜其头。西人之子，有葱其腿。
或拗其脸，或摇其尾。
东人之子，膝行而前。西人之子，蛇行宛延。
博猱一笑，博猱一怜。

书眉上有批云：“至此人面无血矣。门人马权奇识。”哀哉王君，至此谑虽虐亦已无用，只能破口大骂，惟此辈即力批其颊亦不觉痛，则骂又岂有用哉。由此观之，大家可以戏谑时还是天下太平，很值得庆贺也。

《文饭小品》卷二末有一首七律，题曰《偶过槐儿花坐》，系弘光乙酉年作，有云：

舆图去半犹狂醉，
田赋生端总盗资。

此时虽谑庵亦不谑矣，而且比《东人之什》也骂得不很了，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

（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灯下，记于北平之苦雨斋）

□1937 年 1 月刊《谈风》6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瓜豆集》

读 檀 弓

我久矣没有读《檀弓》了。我读《檀弓》还是在戊戌年的春天，在杭州花牌楼寓内冬夏都开着的板窗下一张板桌上自己念的，不曾好好的背诵，读过的大抵都已忘记，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前回一个星期三在学校里遇见适之，他给了我一册《中国文学史选例》，这只是第一卷，所选自卜辞至《吕氏春秋》，凡二十五项。其中第十六即是《檀弓》，计选了六则，即《曾子易箦》，《子夏丧明》，《孔子梦奠》，《有子言似夫子》，《黔敖嗟来》，《原壤歌狸首》是也。在从学校回家来的路上，我把这六篇读了一遍，觉得都很好，后来又拿《檀弓》上下卷来理旧书，似乎以文章论好的也就不过是这几章罢了。这里边我最喜欢的是曾子的故事：

>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这篇文章写得怎么好，应得由金圣叹批点才行，我不想来缠夹，我所感叹的是写曾子很有意思。本来曾子是怎么一个人物我也并不知道，但根据从《论语》得来的知识，曾子这临终的情形给予我很谐和的恰好的印象。我觉得曾子该是这样情形，即使《檀弓》所记的原只是小说而不是史实。据说，天上地下都无有神，有的但是拜神者的心情所投射出来的影。儒家虽然无神亦非宗教，其记载古圣先贤言行的经传，实在也等于《本行》及《譬喻》等，无非是弟子们为欲表现其理想之一境而作，文学的技工有高下，若其诚意乃无所异。《檀弓》中记曾子者既善于写文章，其所意想的曾子又有严肃而蕴藉的人格，令千载之下读者为之移情，犹之普贤行愿善能现示菩萨精神，亦复是文学佳作也。《原壤歌狸首》一篇也是很好的文章，很能表出孔子的博大处，比《论语》“宪问第十四”所载要好得多。其文曰：

>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浮。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要知道这里的写得好，最好是与《论语》所记的比较一下看：

>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看老而不死这句话，可知那时原壤已经老了。戴望注：《礼》，六十杖于乡。那么孔子也一定已是六十岁以上。胡骂乱打只有子路或者还未能免，孔子不见得会如此，何况又是已在老年。我们看《檀弓》所记便大不相同，我觉得孔子该是这样情形，正如上文关于曾子我已经说过。“执女手之卷然”下据孔颖达《正义》云：

> “孔子手执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欢说仲尼，故注云说人辞也。”

假如这里疏家没有把他先祖的事讲错，我们可以相信那时孔子的年纪并不老，因为一是用女子之手比孔子，二是孔子手执斤斧，总不会是六

十岁后的事情。把两件故事合起来看，觉得孔子在以前既是那么宽和，到老后反发火性，有点不合情理。不过我们也不能就说那一件是真，那一件是假，反正都只是记者所见不同，写出理想的人物来时亦宽严各异耳。清嘉道间马时芳著《续朴丽子》中有一则云：

> 传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胸而欲出其妻，听母言而止。此盖周之末季或秦汉间曲儒附会之言也。曲儒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呜呼，若此类者岂可胜道哉。

马君主张宽恕平易，故以袒胸出妻为非，但亦有人以严切为理想，以为孟子大贤必当如是，虽有诚意，却不免落于边见，被称为曲儒，两皆无怪也。记原壤的故事两篇，见地不相同，不佞与马君的意思相似，不取扣胫之说，觉得沐椁一篇为胜。读《论语》中所记孔子与诸隐逸周旋之事，特别是对于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都很有情意，并不滥用棒喝，何况原壤本是故人，益知不遗故旧为可信，且与经传中表示出来的孔子的整个气象相调和也。

不佞未曾学书，学剑亦不成，如何可谈文艺？无已且来谈经吧，盖此是文化遗产，人人都有分，都可得而接受处分之者也。（廿六年一月）

[附记]清乾隆时人秦书田，著《曝背馀谈》，卷下有一条云：

> 《檀弓》载曾子易箦一事，余深不然其说。若以此箦出季孙之赐，等赵挺之之锦裘，则曾子当日便毅然辞之而不受，不待至是日而始欲易。若等于孔子孟子之交际，即不易何害，乃明日之不能待耶。其诞妄明甚，乃后儒因得正而毙一语，传为千古美谈，殆亦不度于情矣，乌知情之所不有，即为理之所必无耶。

又云：“观隅坐执烛句，意只在作文字耳，奈之何曰经也。”秦君识见通达，其主张理不离情甚是，唯上节似不免稍有误会，曾子之意盖在物不在人，谓不当用大夫之箦耳。下节寥寥数语却很有理解，此本非经，只是很好的一篇描写，若作历史事实看便误，秦君知道他是在作文字，与我们的意见正相近也。（二十六年三月四日又记）

□1937 年 2 月 8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谈》

莲 花 筏

去年厂甸时我在摊上看见一本书，心里想买，不知怎的一转头终于忘记了，虽然这摊上的别的书也买了几本。不久厂甸就完了，我那本书便不再能够遇见。今年的旧元旦天气很好，往厂甸去看看，一看就在路西的书摊上发见了去年的那书，很是喜欢，赶紧买了回来。说起来也很平凡，这只是一册善书，名曰《莲花筏》，略为特别的是颐道居士除文述所著而已。

我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近二十几年来喜搜集一点同乡人的著作，关于邵无恙我得到他的《历代名媛杂咏》三卷，《梦馀诗钞》稿本八卷，《镜西阁诗选》八卷。这末了一种乃是碧城仙馆所刻，题曰“陈文述编”，而实盖出其子妇汪允庄手，陈序述刻集的经过有云：

“君之识余也，余子裴之甫在襁褓。君生平交游结纳，岂无一二知己，乃残缣断简一再散佚，而掇拾裒辑转成于寒闺嫠妇之手。既请于余，复乞助于余内弟龚君绣山，端侄小米，及闺友席怡珊夫人，并质钗珥以资手民，始成此集，以供海内骚坛题品也。”这很使我注意汪女士的著作，便去找《自然好学斋诗钞》来看，结果只能得到同治年间的重刊本，虽然她夫妇追悼紫姬的《湘烟小录》的道光原刊却已找得了。诗我是不懂，但看诗钞觉得汪允庄有几点特色，一是饮佩高青丘而痛恨明太祖朱元璋，二是表扬张士诚及其部属，其三是从一出来的，即由高青丘而信吕岩及道教，是也。卷十，《雷祖诞辰恭赋二律》有云：消尽全家文字孽，莲花同上度人船。注云，《莲花筏》，翁大人所著。”又卷末《敬书翁大人莲花筏后》，有序云：

> 劝善之书，得未曾有，真救劫度世之宝筏也，即为跋语，更赋此诗：
> 此是西方大愿船，花开玉井不知年。
> 普陀大士瓶中露，太乙慈尊座下莲。
> 欲度世人先度己，能回心地可回天。
> 生机即是金丹诀，合证龙门救劫仙。

注云：“《莲花筏》销尽三千劫，小艮先生语也。”诗钞卷首颐道著《孝慧汪宜人传》中有云：

“宜人之论文也，不袭前人成说，谓余古文不受八家牢笼，足以自成一子，说理论事深切著明，此由见解通达，不尽关于文字。然端于翁文取《莲花筏》而不取《葵藿编》，以《莲花筏》劝人为善，体用兼备，闵真人谓救劫度世功行非凡，当非虚语。”这部《莲花筏》我终于得到手了，查其中并无汪女士跋，却有摩钵道人管守性序，有云：

“今以所刻《莲花筏》见寄，意主度人，内蒙养、戒杀、善书、崇俭诸篇，现身说法，于人心当有裨益，至儒佛诸篇所论虽是，然未免好辨。”又云：

“然则此书虽佳，是儒家之糟粕，而非佛道两家之上乘。君近日究心数学，虽出自希夷康节之传，于身心性命亦无益也。愿君之著书止于是也。”所说不同，却亦颇妙。如断章取义我倒宁取摩钵之说，盖鄙见以为此类善书都无益也，现在只因是颐道所作，故想略谈谈耳。

书中第一篇为《蒙养管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在儿童自四五至七八岁时所读书中，除《三字经》等以外尚有《感应篇》与《阴骘文》，注云，“有以此二书为道家之书者，谬也。”第三篇《善书化劫说》力言善书的功用，以为儒道佛三家书皆弗及，又说应当尊信之理，有云：

《感应篇》，太上所作，太上即老子，道家之祖，孔子所从问礼者也。《功过格》，太微仙君以授真西山者也。《阴骘文》、《劝孝文》、《劝惜字文》、《蕉窗十则》，文昌帝君所作，科名主宰，士子所归依者也。《警世》、《觉世》诸经，关帝所训，国家所崇奉，与先师并列者也。

颐道文集太贵，我尚未能买，但读其秣陵西泠诸诗集，觉得亦是慧业文人，（此语姑且承误用之，）今所言何其鄙陋耶。此事殊出意外，盖我平时品评文人高下，常以相信所谓文昌与关圣、喜谈果报者为下等，以为颐道居士当不至于此也。第二篇《戒杀生四则》，意亦平常，但因此也比较地可读。不佞本不反对戒杀，唯其理由须是大乘的，方有意思，若是吃了虾米只怕转生为虾米去还债，仍不免为鄙夫之见耳。此文刻于道光丙申（一八三六），次年丁酉刻《蕃厘小录》，首列戒杀放生诗二十四首，此四则亦复收入，寒斋幸存一册。《莲花筏》中此外还有文十二篇，较重要的是《佛是药说》，论儒佛及儒道书共五，《答友人辟佛书》，今不具论。正如《蕃厘小录》自序所说，“近日儒门之士，无宋人理障之习，兼通二氏”，原是好事，唯抛开《原道》而朗诵《阴骘文》，半斤等于八两，殊无足取。削发念佛，不佞自己无此雅兴，但觉得还自成一路，若炼金丹求长生的道教本至浅陋，及后又有《阴骘文》一派，则是方士之秀才化，更是下流，不能与和尚相比矣，读书人乃多沉溺于此，高明者且不能免，何哉。

陈颐道与汪允庄均师事闵小艮，即金盖老人是也，《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十有挽诗三首，序中略述闵氏生平，所著《金盖心灯》似最有名，今尚流传，唯价不廉而书又未必佳，终未搜得，不能言其内容何似。挽诗注云：“先生证位玉斗右宫副相神玑明德真君。”又题《花月沧桑录》诗注有云，“才女贤妇隶西王母，节女烈妇隶斗母。”集中此类语甚多，在我们隔教的人看去，很觉得荒漠无可稽考。据颐道著《汪宜人传》中云：“宜人茹荼饮蘖，所作皆单凫寡鹄之音。因巫言身后有孽，从金盖闵真人言，日对遗像诵《玉章经》，至临终不废。”又云：

宜人礼诵诚格神明，不可思议，其最明显者则在感通高祖青丘先生一事。宜人选刻明诗竟，论定三百年诗人以先生为第一，世无异议，尚以不知身后真灵位业为恨，于吕祖前立愿诵《玉章经》十万八千卷，求为超升天界。诵既竣，为塑像期供奉葆元堂。……神降于坛，言久借境升天，掌法南宫，辅相北帝，至今无不知九天洪济明德真圆真人之为青丘先生，则宜人一诚之所感格也。

这里一部分的理由当如胡敬在《汪允庄女史传》中所云：

“宜人素性高迈，于九流家言道释诸书蔑视不足学，及夫死子疾，茹荼饮蘖，稍稍为之，亦犹名士牢骚之结习也。”古今此种事极多，王荆石女亡而为昙阳子，屠赤水化女湘灵为祥云洞侍香仙子，叶天寥女小鸾则本是月府侍书女，尤为有名，即乡里老妪亦信巫言，以死者已任某土地祠从神为慰，却不知道土地爷实在不过是地保的职务而已。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者流宜知此意，但人世多烦恼，往往非有麻醉之助不能忍受此诸苦痛，虽贤者亦或不免，我们看到这些记述，初意虽欲责备，再加思量唯有哀矜之意耳。汪允庄信道而又特别尊崇高青丘，这却别有一种道理。颐道著传中云：

梅村浓而无骨，不若青丘澹而有品，遂奉高集为圭臬。因觅本传阅

之，见明祖之残害忠良暴珍名儒也，则大恨。犹冀厄于遭际而不厄于文字也，及观七子标榜，相沿成习，牧斋归愚选本推崇梦阳而抑青丘，则又大恨。……誓翻五百年诗坛冤案而后已，因是选《明诗初二集》也。

后又云：

宜人因先生（案即青丘）之故深有憾于明祖之残暴，而感张吴君相之贤为不可及也；谓张吴与明祖并起东南，以力不敌为明所灭，不能并其礼贤下士保全善类之良法美意而灭之也。

所著《元明逸史》虽不传，集中尚存《张吴纪》律诗二十五首，表章甚力，传中记其语曰：

“吾前生为青丘先生弟子，既知之矣，抑岂张吴旧从事乎，何于此事拳拳不释也。”其实理由似不难解，此盖作者对于自己身世的非意识的反抗，不过借了高启与朱元璋与张士诚等的名义而已。青丘的诗我不甚了了，惟朱元璋的暴虐无道则夙所痛恶，故就事论事我也很赞成这种抗议，若为妇女设想，其反逆（或稍美其名曰革命亦可）的气分更可以了解，但尚未意识的敢于犯礼教的逆鳞耳。最初发端于高青丘的诗，终乃入于神仙家言，如治病抽“白面”，（本当作■，今从俗，）益以陷溺，弄假当真。传中述汪允庄临终之言云：

自言前世为元季张氏子，名佛保，师事青丘先生，并事张吴左丞潘公为云从，张吴亡，入山修道，赖青丘师接引入吕祖玉清宫为从官，奉敕降世，为明此段因果，今事毕，夙世之因亦尽，将归故处，令备舆马。

此是印度大麻醉梦中似的幻影，但我们虽少信亦安忍当面破坏之哉。谭友夏在《秋闺梦戍诗序》中有云：

《伯兮》之诗曰，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彼皆愿在愁苦疾痛中求为一快耳。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梦，梦馀不使之有诗，此妇人乃真大苦矣。嗟乎，岂独妇人也哉。

我前讥颐道的鄙陋，细想亦是太苛，颐道晚年同一逆境，其甘心于去向梦与诗中讨生活，其实亦可理解，多加责备，使其大苦，自是不必。唯其所著书只可自遣，如云救劫度世，欲以持赠人，则是徒劳耳。一切善书皆如此，今只就《莲花筏》等说，实乃是尊重颐道居士与汪女士故也。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于北平）

[附记]前两天因为查阅张香涛所说的试帖诗的四宜六忌，拿出《輶轩语》来看，见《语行第一》中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项，其中一则云：

昨在省会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忽言性理，忽言易道，忽言神灵果报，忽言丹鼎符箓，鄙俚拉杂，有如病狂，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诋而麾去之。明理之士急宜猛省，要知此乃俗语所谓魔道，即与二氏亦无涉也。

又其第三则云：

士人志切科名，往往喜谈《阴骘文》《感应篇》二书。二书意在劝化庸愚，固亦无恶于天下，然二书所言亦有大端要务，今世俗奉此则唯于其末节碎事营营焉用其心，良可怪也。

《輶轩语》（其实这名称还不如原来的《发落语》为佳）成于光绪元年，去今已一周甲，张君在清末新党中亦非佼佼，今读其语，多有为现今大人先生

所不能言或不及知者，不禁感叹。兹录其关于“魔道”的一部分于右，大有德不孤之喜，但一喜亦复正多一惧耳。

（二月廿六日又记）

□1937 年 2 月 28 日刊《中央日报》，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谈》

双节堂庸训

今年的新年过得不大好。二十五年的年底就患流行感冒，睡了好几天，到了二十六年的年头病算是好了，身体还是很疲软，更没有兴致去逛厂甸。可是在十日内去总是去了一趟，天气很好却觉得冷的很，勉强把东西两路的书摊约略一看，并不见什么想要的东西，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其中一本是《钦定万年历》，从天启四年甲子起至康熙一百年辛巳止，共百四十八年，计七十四叶。这于我有什么用处呢？大约未必有，就只因为他是“殿板”而已。又二本是《双节堂庸训》六卷，《梦痕录节钞》一卷，都是汪龙庄的原著。我初见龙庄遗书时在庚子辛丑之交，以后常常翻阅，其《病榻梦痕录》三卷最有兴趣，可以消闲。近来胡适之瞿兑之诸先生都很推重这部《梦痕录》，说是难得的书，但据胡先生说他所藏的没有同治以前刻本，瞿先生著《汪辉祖传述》，卷首所模小像云据《龙庄遗书》，原刻亦不佳。寒斋藏书甚少，《梦痕录》虽想搜罗，却终未得到嘉庆中汪氏原刊本，今所有者只是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桂林阳氏本，有像颇佳，又咸丰元年（一八五一）清河龚氏本，与《双节堂庸训》合刻，复次则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盱眙吴氏即望三益斋本，合《学治臆说》等共为八种，此后《龙庄遗书》各刻本皆从此出，据吴序则《梦痕录》等又即从龚氏本出也。《梦痕录节钞》有同里何士祁序，无刻书年月，大抵是光绪中吧，书别无足取，不过也是一种别本，可以备《梦痕录》板本之数而已。

这回所买的书里我觉得最有兴趣的还是那一册《双节堂庸训》。这一本书看里边的避讳字是同治后刻本，但与望三益斋和官书局翻本又都有异，不知道是什么本子，本来内容反正一样，书眉上却有自称象曾者写上好些朱批，觉得好玩，所以就买了来。《庸训》自序很佩服《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二书，故其所说亦多通达平实，但是我读了卷一《述先》中所记“显生妣徐太宜人轶事”，特别有感慨。汪君生十一年而孤，恃继母王氏生母徐氏食贫砺节，以教以养，及成立乃请得旌表，以双节名堂，刻《赠言》凡五十卷，又集录绍兴府属六县节孝贞烈事实为《越女表微录》五卷，盖其所感受者深矣。徐氏本是妾，出身微贱，如《梦痕录》上乾隆三十六年条下所记可以知道，而汪家亦甚穷苦，轶事虽只寥寥六则，却很深刻的表现出来，正可代表大多数女人的苦况。如第二至四则云：

> 病起出汲，至门不能举步。门故有石条可坐，邻媪劝少憩，吾母曰，此过路人坐处，非妇人所宜。倚柱立，邻媪代汲以归。
>
> 尝病头晕，会宾至，剥龙眼肉治汤，吾母煎其核饮之，晕少定，曰，核犹如是，肉当更补也。后复病，辉祖市龙眼肉以进，则挥去曰，此可办一餐饭，吾何须此。固却不食。羊枣之痛，至今常有馀恨。
>
> 吾母寡言笑，与继母同室居，谈家事外，终日织作无他语。既病，画师写真，请略一解颐，吾母不应。次早语家人曰，吾夜间历忆生平，无可喜事，何处觅得笑来。呜呼，是可知吾母苦境矣。

龙庄的文章，正如阮芸台所说，质而有法，上文所引又真实有内容，我读了不禁黯然，这里重复的说，于此可以见女人永劫的苦境矣。以我个人的阅历来说，我的祖母就是这样的。论地位她是三四品的命妇，虽然是继室，

---

[1] 《宇宙风》题作《女人的命运》。

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后不久死了，论境遇也还不至那么奇穷，有忍饥终日的事情，但是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虽细目不同而结果还是仿佛，我看上文三则觉得似乎则则都是祖母的轶事，岂不奇哉。祖母不必出汲，但那种忍苦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龙庄亲见其二母之苦辛，乃准当时的信仰，立双节坊求名人题咏以为报，更推及乡邑，纂《越女表微录》，亦即以为报母之一端。谈官诰序云：

> 举凡空闺孤嫠所谓天荒地老杳杳冥冥于同声一哭之中者，无一不破涕为笑，光日月而垂千春，然后孝子报母之心快然而无憾，非是则孝子之生也有涯，几长抱无涯之戚也，呜呼，至矣。

此种意思可以了解，可以同情，但是从现在看来，都是徒然。使人家牺牲其一生或一命，却以显扬崇祀为报酬，这是很可笑的事，在士人拚命赶考冀得一第虽倒毙闱中而无怨的时代却是讲得通的，因为情形相象，姑且不谈愚不愚民，我想也总是近于治病的“抽白面”吧。《越女表微录》卷一中有一则云：

> 瞿美斯妻来氏。美斯攻举子业，尝授徒山中，闻学使试绍兴，冒暑往，则院门已扃，遂病。语来曰，吾以不与试至此，他日嗣我幸以秀才。言讫而卒。来拮据长二孤女，归之士族，见族子慕学者辄啬食用资其膏火，冀得成夫志也，然贫甚，讫无为之后者。

汪君文笔殊妙，但读之辗然亦复戚然，觉得天下可悲的喜剧此为其一，真令人如孟德斯鸠感到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不敢说“没有法子”亦当云“怎么办”（Chtodjealtj？），而此问题乃比契耳尼舍夫斯奇（Chernyshevski）的或更艰难也。旌表与科第的麻醉中毒是一件事，麻醉外有何药剂又是一件事，要来讨论也觉得在微力以上。我没有力量打乡族间的不平，何暇论天下事，但我略知妇女问题以后，又觉得天下事尚可为，妇女的解放乃更大难，而此事不了，天下事亦仍是行百里的半九十，种种成功只是老爷们的光荣而已。我向来怀疑，女人小孩与农民恐怕永远是被损害与侮辱，不，或是被利用的，无论在某一时代会尊女人为圣母，比小孩于天使，称农民是主公，结果总还是士大夫吸了血去，历史上的治乱因革只是他们读书人的做举业取科名的变相，拥护与打倒的东西都同样是药渣也。日本驻屯军在北平天津阅兵，所谓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女人着了白围身（Apron）的服装跟了去站班，我就是外国人也着实感到不愉快。记得九年前我写一篇批评军官杀奸的文章，末了说：

> “我看那班兴高采烈的革命女同志，真不禁替她们冤枉。（你们高兴什么？）”这里更觉得冤枉。语云，佐饔得尝，佐斗得伤。附和革命，女人尚得不到好处，何况走别的路。蔼理斯（Ellis）的时代尽管已经过去，希耳息弗尔特（Hirschfeld）尽管被国社党所驱逐，他们的研究在我总是相信，其真实远在任何应制文章之上。希公在所著《男与女》中有云：
>
> “什么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广远的，更深入于社会的与性的方面之若干改革。”凯本德（Carpenter）云：
>
> “妇女问题须与工人的同时得解决。”此语非诳，却犹未免乐观，爱未必能同时成年也，虽然食可以不愁耳。不佞少信而多忧，虽未生为女人身可算是人生一乐，但读《庸训》记起祖母的事情，不禁感慨系之。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美哉寓言。假我数年五百以观世变，庶几得知究竟。愧吾但知质

与力，未能立志众生无边誓愿度也。（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试笔）

[补记]胡适之先生有一部《病榻梦痕录》，没有刻书年月，疑心是晚出的书。后来经我提议，查书中宁字都不避讳，断定是嘉庆时汪氏原刻，这样一来落后的反而在前，在我们中间是最早刻本了。（四月十八日校阅时记）

□1937 年 2 月刊《宇宙风》35 期，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谈》

人境庐诗草

黄公度是我所尊重的一个人。但是我佩服他的见识与思想，而文学尚在其次，所以在著作里我看重《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其次乃是《人境庐诗草》。老实不客气的说，这其实还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我收藏此集就因为是人境庐著作之故，若以诗论不佞岂能懂乎。我于诗这一道是外行，此其一。我又觉得旧诗是没有新生命的。他是已经长成了的东西，自有他的姿色与性情，虽然不能尽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说是大抵完成了。旧诗里大有佳作，我也是承认的，我们可以赏识以至礼赞，却是不必想去班门弄斧。要做本无什么不可，第一贤明的方法恐怕还只有模仿，精时也可乱真，虽然本来是假古董。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这只是个人的偏见，未敢拿了出来评骘古今，不过我总不相信旧诗可以变新，于是对于新时代的旧诗就不感到多大兴趣。此其二。有这些原因，我看人境庐诗还是以人为重，有时觉得里边可以窥见作者的人与时代，也颇欣然，并不怎么注重在诗句的用典与炼字上，此诚非正宗的读诗法，但是旧性难改，无可如何，对于新旧两派之人境庐诗的论争亦愧不能有左右袒也。

那么，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的呢？我这里所想谈的并不是文学上的诗，而只是文字上的诗，换一句话来说，不是文学批评而是考订方面的事情。我因收集黄公度的著作，《人境庐诗草》自然也在其内，得到几种本子，觉得略有可以谈谈的地方，所以发心写此小文，——其实我于此道也是外行，不胜道士代做厨子之感焉。寒斋所有《人境庐诗草》只有五种，列记如下：

一、《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日本印本，四册。

二、同上，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民国十九年北平印本，一册。

三、同上，黄能立校，民国二十年上海印本，二册。

四、同上，钱萼孙笺注，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印本，三册。

五、同上四卷，人境庐抄本，二册。

日本印本每卷后均书“弟遵庚初校梁启超复校”，本系黄氏家刻本，唯由梁君经手，故印刷地或当在横滨，其用纸亦佳，盖是美浓纸也。二十年上海印本则署“长孙能立重校印”，故称再板，亦是家刻本，内容与前本尽同，唯多一校刊后记耳。高尤本加句读，钱本加笺注，又各有年谱及附录，其本文亦悉依据日本印本。这里有些异同可说的，只有那抄本的四卷。我从北平旧书店里得到此书，当初疑心是诗草的残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页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五字，书签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长二十三公分五，而签长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但是拿来与刻本一比较，却并不一样，二者互有出入，可知不是一个本子。仔细对校之后，发见这抄本四卷正与刻本的一至六卷相当，反过来说，那六卷诗显然是根据这四卷本增减而成，所以这即是六卷的初稿。总计六卷中有诗三百五首（有错当查），半系旧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删者有九十四首，皆黄君集外诗也。钱萼孙笺注本发凡之十五云：

“诗家凡自定之集，删去之作必其所不惬意而不欲以示人者，他人辑为集外诗，不特多事，且违作者之意。黄先生诗系晚年自定者，集外之作不多，兹不另辑。”这也未始不言之成理，就诗言诗实是如此，传世之作岂必在多，古人往往以数十字一篇诗留名后世，有诗集若干卷者难免多有芜词累句，受

评家的指摘。但如就人而言，欲因诗以知人，则材料不嫌太多，集外诗也是很有用的东西吧。黄能立君校刊后记中说，黄君遗著尚有文集若干卷，我们亦希望能早日刊布，使后人更能了解其思想与见识，唯为尊重先哲起见，读者须认清门路，勿拿去当作古今八大家文看才好耳。

抄本四卷的诗正与刻本的六卷相当，以后的诗怎么了呢？查《诗草》卷六所收诗系至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止，据尤编《年谱》在十六年项下云：

“先生自本年起始辑诗稿。自谓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庚辛之交随使欧洲，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藉以自娱。”又黄君有《人境庐诗草自序》亦作于光绪十七年六月，那么这四卷本或者即是那时所编的初稿也未可知。（诗草自序在尤本中有之，唯未详出处，曾函询尤君，亦不复记忆。钱编年谱在十七年项下说及此序，注云：

“先生《诗草自序》原刊集中不载，见《学衡》杂志第六十期，编者吴宓得之于先生文孙延凯者。”（诗话下引有吴君题跋，今不录。）罗香林君藏有黄君致胡晓岑书墨迹三纸，诗一纸，又《山歌》二页，老友饼斋（钱玄同）录有副本，曾借抄一通，其书末云：

> 遵宪奔驰四海，忽忽十馀年，经济勋名一无成就，即学问之道亦如鹪退飞，惟结习未忘，时一拥鼻，尚不至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删存诗稿犹存二三百篇。今寄上《奉怀诗》一首，又《山歌》十数首，如兄意谓可，即乞兄钞一通，改正评点而掷还之。弟于十月可到新嘉坡，寄书较易也。

下署八月五日。其《寄怀胡晓岑同年》一诗，末署“光绪辛卯夏六月自英伦使馆之搔蚌处书寄。”此诗今存卷四中，题曰《忆胡晓岑》，卷末一首为《舟泊波塞》，盖是年九月作。总计四卷本共有诗二百四十七首，与书中所言二三百篇之数亦大旨相合。《饮冰室诗话》所云丙申（一八九六）年梁任公何翩高诸人所见《人境庐集》，事在五年后，或当别是一本，不能详矣。

四卷本中有二十四题全删，共六十首，题目存留而删去其几首者有十六项，其最特别的是删改律诗为绝句，计有三项。卷一中《闻诗五妇病甚》云：

> 中年儿女更情长，宛转重吟妇病行。四壁对怜消渴疾，十洲难觅反魂香。每将家事探遗语，先写诗题说悼亡。终日菜羹鱼酱外，帖书乞米药钞方。

刻本只存首尾两联，中四句全删。《为梁诗五悼亡作》及《哭张心谷》亦均如是，后者本有六首，其第三删改为七绝，即刻本的第一首是也。全删的诗在卷一中有《榜后》四首，《无题》三首，《游仙词》八首，皆可注意。今录《游仙词》于下，其后即列癸酉追和罗少珊诗，盖是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所作：

> 新声屡奏郁轮袍，混入群仙亦足豪，夜半寥阳呼捉贼，
> 九天高处又偷桃。
> 招摇天市闹喧哗，上界年年卜榜花，贯索囷仓齐及第，
> 群仙校对字无差。
> 贝宫瑶阙矗千层，欲上天梯总未能，但解淮王炼金术，
> 便容鸡犬共飞升。
> 上清科斗字犹存，检点琅函校旧文，亲写绿章连夜奏，
> 微臣眼见异风闻。
> 臣朔当年溺殿衙，颇烦王母口赍嗟，金盘玉碗今盛矢，

定比东方罪有加。
星宫昨夜会群真，各自燃犀说旧因，不识骑驴张果老，
是何虫豸是前身。
新翻妙曲舞霓裳，何故人间遍播扬，分付雏龙慎防逻，
不容■笛傍红墙。
懊侬掷米不成珠，十斛珠尘又赌输，至竟如何施狡狯，
亲骑赤凤访麻姑。

又卷三中删去在日本所作诗二十二首，其中有“浪华内田九成以所著名人书画款识因其友税关副长苇原清风索题，杂为评论，作绝句十一首。”注云，“仿渔洋山人论诗绝句体例，并附以注。”也是颇有意思的，不知何以删去。还有好些有名的咏日本事物的诗，如刻本卷三中的《都踊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等，抄本里也都没有，难道是后来补作的么，还是当初忘记编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法子解决，现在只好存疑。

部分的删去的诗以卷一为多，如《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八首删其四，《二十初度》四首删其三，《寄和周朗山》五首删其四，《山歌》十二删其四，《人境庐杂诗》十删其二，皆是。今举《杂诗》的第九十两首为例：

扶笻访花柳，偶一过邻家。高芋如人立，
疏藤当壁遮。絮谈十年乱，苦问长官衙。
春水池塘满，时闻阁阁蛙。
无数杨花落，随波半化萍。未知春去处，
先爱子规声。九曲栏回绕，三叉路送迎。
猿啼并鹤怨，惭对草堂灵。

至于《山歌》的校对更是很有兴趣的事。抄本有十二首，刻本九，计抄本比刻本多出四首，而刻本的末一首却也是抄本中所没有的。这里碰巧有罗氏所藏黄君的手写本，共有十五首，比两本都早也更多，而且后边还有题记五则，觉得更有意思。今依手写抄录，略注异同于下：

自煮莲羹切藕丝，待郎归来慰郎饑，为贪别处双双箸，
只怕心中忘却匙。

案此首三本皆同，以后不复注明。饑字各本均如此，当依古直笺作饥。

人人要结后生缘，侬要今生结眼前，一十二时不离别，
郎行郎坐总随肩。

案，第二句抄本刻本均作“侬只今生结目前”。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
谁知亲切更伤离。
送郎送到牛角山，隔山不见侬自还，今朝行过记侬恨，
牛角依然弯复弯。

案，手写本第二句以下原作“望郎不见侬自还，今朝重到山头望，恨他牛角弯复弯”，后乃涂改如上文。刻本中无，抄本“自还”作“始还”，“弯复弯”作“弯又弯”。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不容易，
从今不养五更鸡。

案，“不容易”抄本刻本均作“想无法”。“西流”钱本作“东流”，恐误。

邻家带得书信归，书中何字侬不知，待侬亲口问渠去，
问他比侬谁瘦肥。

案，“待”抄本刻本均作“等”。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声声铜鼓门前打，

打到中心只说郎。

案，第三句抄本刻本均作“街头铜鼓声声打”，“到”均作“着”。

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头侬自怜，记得来时同食乳，

同在阿婆怀里眠。

案，“来时”抄本刻本均作“初来”。

阿嫂笑郎学精灵，阿姊笑侬假惺惺，笑时定要和郎赌，

谁不脸红谁算赢。

案，手写本“惺惺”原作“至诚”，后改，“赌”写作“睹”，当系笔误，抄本刻本均无。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时春。做雨要做连绵雨，

做人莫做无情人。

案，抄本刻本均无。

见郎消瘦可人怜，劝郎莫贪欢喜缘，花房胡蝶抱花睡，

可能安睡到明年。

案，手写本“可能”原作“看他”，后改，抄本作“如何”。刻本无。

自剪青丝打作条，送郎亲手将纸包，如果郎心止不住，

请看结发不开交。

案，“送郎亲手”抄本刻本均作“亲手送郎”，“请看”均作“看侬”。

人人曾做少年来，记得郎心那一时，今日郎年不翻少，

却夸年少好花枝。

案，却夸年少抄本作却夸新样。刻本无。

人道风吹花落地，侬要风吹花上枝，亲将黄蜡粘花去，

到老终无花落时。

案，抄本有，刻本无。

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芙蓉并枣子，

有缘先要得郎怜。

案，并刻本作五，“有缘先要”作“送郎都要”。抄本无。其后有题记云：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鸡啼郎过广”一语，可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

往在京师，钟遇宾师见语，有土娼名“满绒遮”，与千总谢某昵好，中秋节至其家，则既有密约，意不在客，因戏谓汝能为歌，吾辈即去不复赐。遂应声曰：“八月十五看月华，月华照见侬两家，（原注，以土音读作纱字第二音），满绒遮，谢副爷。”乃大笑而去。此歌虽阳春二三月不及也。

又有乞儿歌，沿门拍板，为兴宁人所独擅场。仆记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时，一时只走两三间，一间只讨一文钱，苍天苍天真可怜。”

悲壮苍凉，仆破费青蚨百文，并软慰之，故能记也。

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录成编，当远在《粤讴》上也。

黄君与晓岑书中有云：“惟出门愈远，离家愈久，而惓恋故土之意乃愈深。记阁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其欲作《客话献征录》，有记录方言之意，写《山歌》则即搜集歌谣也。此是诗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对之乃颇感到亲切，盖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倾向，在大众看来或未必以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黄公度其人，并不限于诗，因此觉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应当表章，集外诗该收集，文集该刻布，即《日本杂事诗》亦可依据其定本重印，国内不乏文化研究的机关与学者，责任自有所在，我们外行只能贡献意见，希望一千条中或有一个得中而已。

顺便说到《日本杂事诗》的板本，根据黄君所说，计有下列这几种：

一，同文馆集珍本，光绪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环报》馆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凤文书局巾箱本，未详。

四，中华印务局本。

五、六，日本东西京书肆本，均未详。

七，梧州自刊本，光绪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长沙翻本，未详。九，长沙自刊定本，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以上一二七九各种寒斋均有，又有一种系翻印同文馆本，题字及铅字全是一样，唯每半页较少一行，又夹行小注排列小异，疑即是中华印务局本。尤《年谱》称“后上海游艺图书馆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详，黄君似亦不曾见到，或者是在戊戌作跋后的事乎。香港巾箱本当即是天南遁窟印本。钱《年谱》在光绪五年项下云：

“夏，先生《日本杂事诗》出板。”小注云：“为京师译署官板，明年王韬以活字板排印于上海，为作序。”据王韬在光绪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又《弢园尺牍续编》卷一《与黄公度参赞》书中云：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载，首丘之思，靡日或忘。”时为辛巳，即光绪七年。可知所谓“余处”当在香港，而活字板与集珍亦本是一物，不过译署官板用二号铅字，遁窟本用四号耳。以言本文，则遁窟本似较差，注文多删改处，未免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价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献。《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跋中自己声明道：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至其改订的意思则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写一篇小文介绍，登在《逸经》上，现在收入文集《风雨谈》中，不复赘。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这定本《杂事诗》虽然是“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书面皆是徐仁铸所写），其改订的时候却还在八年前，说明这经过的自序系作于“光绪十六年七月”，——与他作《人境庐诗草》自序在一个年头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偶然的事。我们虽然不必像吴雨僧君对于诗草自序的那么

赞叹，但也觉得这三篇序跋在要给黄君做年谱的人是有益的参考资料。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为假如这些事情略为弄得有点头绪，我们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费气力来说这些闲话了。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记]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姚书共十卷，题“出使日本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谨呈”，其内容则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译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节却都注明，这倒还诚实可取。黄书卷首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咨总理衙门文，中有云：

“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末又云：“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此虽是公文，对于二书却实地比较过，所评亦颇有理，可见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绝异也。绝异之点还有一处，是极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姚君在例言中畅论攻取日本的路道，其书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于言用兵，虽然单靠日本的一册《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够用。黄书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会从这里发生出来。原板《日本国志》后有光绪二十二年（甲午后二年）的梁任公后序云：

>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人境庐诗草》卷十《三哀诗》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云：

> 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青梅雨翛翛，
> 煮酒论时事。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
> 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
> 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

钱《年谱》列其事于光绪二十一年，且引黄君从弟由甫之言曰：

> 爽秋谓先生《日本国志》一书可抵银二万万。先生怪问其故，爽秋云，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刊布，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梁任公作黄君墓志中云：

>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案墓志作于宣统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由是观之，黄姚二书黄莸之别显然，不待繁言。还有一层，《日本国志》实与《日本杂事诗》相为表里，其中意见本是一致。《杂事诗》定本序云：

>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

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

他自己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平凡的读者也能感到，若说《日本国志》非黄公度之作，那么《杂事诗》当然也不是，这恐怕没有人能够来证明吧。本来关于《日本国志》应该专写一篇文章，因为其中学术志二卷礼俗志四卷都是前无古人的著述，至今也还是后无来者，有许多极好意思极大见识，大可供我抄录赞叹，但是目下没有这工夫，所以就在这里附说几句。（二月八日再记）

□1937 年 3 月刊《逸经》25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秉烛淡）

诗人黄公度

清末的诗人中间，有一个人为我所最佩服，这就是黄公度。公度名遵宪，是广东嘉应州人，曾参与戊戌政变，但是他政治上的主张不及文学上的更为出色。不过讲到诗的问题上，我是个外行，我所以佩服他的，还因他的学问与见识，古人所谓“买椟还珠”，我其实是难免这句话的讽刺的。

黄公度的著作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和《日本杂事诗》这三种，都已有刻本。《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看似平常，这里却有黄公度的特色。第一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看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的地方特别清楚，也很有兴趣。第二又因为他懂得新学，知道凡事应当革新，所以他对于改革能够了解。这两种特色若不能具备，一个人的意见便不免于偏。杂事诗定本序有云：“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因为定本刊于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已在初版十九年之后，他的对于变法的见解已经大有改进了。如原本卷上七十二论诗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
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

定本却改作：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

日本人学做汉诗，可以来同中国人唱和，这是中国文人所觉得高兴的一件事，这里黄君却简单的加以取消，无丝毫留恋之意，这在当时是不可及的了。

《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是他的诗集，其特色在实行他所主张的“我手写我口”，开中国新诗之先河，此外便不是我所能说的了。我以前曾经得到一种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页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五字，书签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高二十三公分，而签长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书凡四卷，与刊本比较一下，内容大致与前六卷相同，其中有九十四首乃被删去，当系少作的集外诗，但也很值得收罗，只可惜这个抄本今已失去了。其中也有不少好诗，刊本中有《人境庐杂诗》八首，抄本原有十首，所删第九、十两首昔曾抄存，今录于下，也是人境庐的掌故。

扶笻访花柳，偶一过邻家。高芋如人立，
疏藤当壁遮。絮谈十年乱，苦问长官衙。
春水池塘满，时闻阁阁蛙。
无数杨花落，随波半化萍。未知春去处，
先爱子规声。九曲栏回绕，三叉路送迎。
猿啼并鹤怨，惭对草堂灵。

□1958 年 8 月 14 日刊《羊城晚报》，署名启明
□收入《木片集》

朴 丽 子

实在全是偶然的事，我得到了一部《朴丽子》。朴丽子本名马时芳，河南禹州人，副榜举人，嘉庆道光间做过几任教官，他的经历就止于此。这部书正编九卷，续编十卷，光绪乙未大梁王氏刊行，由巩县孙子忠选钞，刻为各上下二卷，已非原书之旧了。

这样说来，似乎书与人都无甚可取，——然而不然。邵松年序开头云：

“朴丽子学宗王陆，语妙蒙庄。”老实说，我是不懂道学的，但不知怎的嫌恶程朱派的道学家，若是遇见讲陆王或颜李的，便很有些好感。冯安常著《平泉先生传》中叙其中年时事有云：

“父棻洲公以拔萃仕江西，先生往省，过鄱阳湖遇暴风舟几覆，众仓皇号呼，先生言动如常。或问之曰，若不怕死耶？先生曰，怕亦何益，我讨取暂时一点受用耳。”这一节事很使我喜欢，并不是单佩服言动如常，实在是他回答得好，若说什么孔颜乐处，未免迂阔，但我想希腊快乐派哲人所希求的“无扰（Ataraxia）或者和这心境有点相近，亦未可知罢。为求快乐的节制与牺牲，我想这是最有趣味也是最文明的事。倪云林因为不肯画花为张士信所吊打，不发一语，或问之，答曰，一说便俗。虽然并不是同类的事情，却也有相似的意趣。这些非出世的苦行平常我很钦佩，读马君传遂亦不禁向往，觉得此是解人，其所言说亦必有可听者欤。

> 余以菲才，性复戇愚，为世所弃，动多龃龉，块然寂处于深箐茅庵中，如是者亦有年。远稽于古，近观于今，农圃樵牧之属，街谈巷议之语，以及一饮一食一草一木之细微，有所感发于心，辄警惕咨嗟而书之，或情着乎笔端，或意含于辞外，其间未必悉合，要皆反身切已之言，得诸磨炼坚苦之中.其干涉世之方三折肱矣。朴，不材木也，花不足以悦目，实不足以适口，匠石数过之而弗觀也。丽者，丽于是以安身也。朴丽子其别号，遂以名其书。

这是他的自序，说得不亢不卑，却十分确实，我觉得在这里边实在有许多好思想好议论，值得我们倾听，其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反对中国人的好说理而不近情，这样他差不多就把历来的假道学偏道学（即所谓曲儒）一齐打倒了。我读了不禁叹息，像朴丽子这样的讲道学，我亦何必一定讨厌道学乎。如卷上有云：

> 叔嫂不亲授受，礼与？曰，礼也。有叔久病行仆地，嫂掖之起，兄见之逐其妻。朴丽子在棘闱中，涵厕积垢不可当，出入者必闭其门。朴丽子出，适有入者至，因不闭，入者出亦不闭。朴丽子遥呼闭门，答曰，户开亦开，户阖亦阖，门固开，余岂宜阖。旁一人曰，天下事为此等措大所坏。人但知剑栽足以杀人，而不知学问之弊其害尤烈。何也？所持者正，所操者微也。正也难夺，微也易惑。语云，不药当中医，此语可以喻学。夫学焉而不得其通，固不如不学之为犹愈也。

又云：

> 有共为人佣耕者，馇以腊肉，或取其半置禾中曰，归以遗阿母。群佣相觑无言。一少年攫食之尽，谓曰，此肉乃主人劳苦我辈，片栽少润枯肠，而曰归以遗母，而母当自奉养，鸡鱼羊豕可胜市乎。众皆笑之。朴丽子曰，孝，懿德也，而不免见哂于众者，拂人情也。人情不可拂也，愦乱不可劝也，盛怒不可折也。余尝适野，佃户詈其乡人，喝止之，则

大怒狂悖不可当，余俯首去。盖彼盛暑大劳，气血奔放，吾言又值其盛怒，是吾之过也夫。

又云：

有款宾者，宾至，为盛馔，主人把盏，一少年独不饮。己数巡，主人起复把盏属之，辞。主人曰，余老且贱，诸君辱临皆尽欢，君不怜余之老而少假之，其有所不足于我乎？复手自洗爵，固劝之。座客皆曰，君素饮，今何靳于一盏。犹不饮。主人举爵口边曰，不饮，当使君之衣代饮。少年即取爵自浇其衣，酒淋漓滴地上。顷之，主人复前曰，席将终矣，君卒不赐之一饮乎。执爵笑曰，此而不饮，必自沃里衣则可。少年从容以左手启其衣领，以右手接杯从项灌下，嘻怡缓语，酒见于足。主人面如土，席遂散。一时哄传以为怪谈。亦有称少年为有力量者。或以告朴丽子，朴丽子曰，昔王敦客石崇家，崇以美人劝客酒，曰不饮则斩美人头。客无不醉者。至敦，敦不顾，已斩二人矣，敦亦漫不屑意，崇不能强，识者知其他日必作贼。敦以强胜，少年以柔胜，吾不知其所至矣。闻此少年好观诸先儒语录，见先儒节概多，彼必有所本矣。夫参芪术苓可以引年，取壮夫及婴儿遍啖之，其亡也忽焉。故学不知道，圣经贤传皆足以遂非长傲，帝王官礼亦祸世殃民之资，可俱也已。近见一般后生少聪明露头角者，往往走入刚僻不近情一路，父兄之教不先，师友之讲不明，悠悠河流，何时返乎。昔人有善忧者，忧天之坠，人皆笑之。余今者之忧岂亦此与？悲夫！

以上三则的意思大旨相近，未一则却尤说得痛切。学不知道，即上文所谓学焉而不得其通，任是圣经贤传记得烂熟，心性理气随口吐出，苟不懂得人情物理，实在与一窍不通者无异，而又有所操持，结果是学问之害甚于剑戟，戴东原所谓以理杀人，真是昏天黑地无处申诉矣。其实近时也有礼教吃人这一句话，不过有些人似乎不大愿意听，以言出典的确还不古，所以我在这里改引了戴君的话，庶几更有根据。对于古人的事，朴丽子亦多所纠正，是更具体的例。《续朴丽子》卷上云：

呜呼怪哉，郭巨埋儿邓攸系子之事，斯可谓灭绝性根者矣！推其故，在好名。推好名之故，彼时乡举里选之制未尽废，在因名以媒利禄。此何异易牙竖刁之所为，而世顾称道弗衰，何也。许武让产之事，赵惕翁诋其欺罔。世道不明，勉焉益厉，郭巨邓攸许武异行而同情，皆名教之罪人，必不容于尧舜之世，然安得如龙坡居士者与之读书论古哉。

又云：

《传》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胸而欲出其妻，听母言而止。此盖周之末季或秦汉间曲儒附会之言也。曲儒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呜呼，若此类者岂可胜道哉。

又卷下论方孝孺有云：

盖孝孺为人强毅介特，嗜古而不达于事理，托迹孔孟，实类申韩，要其志意之所居，不失为正直之士，故得以节义终。然而七百馀口累累市曹，男妇老稚沥血白刃，彼其遗毒为已烈矣。

他把古代的孝子忠臣都加以严正的批判，此已非一般道学家所能为。他又怀疑亚圣大贤的行事，不好意思说他不对，便客气一点将这责任推给那些曲儒。这对于他们不算冤枉，因为如马君所说，“曲儒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那是确实无疑的。据我看来，其实这还是孟子自己

干的事吧。我们没有时间的望远镜（与《玉历钞传》上的孽镜台又略不同，孽镜须本人自照，这所说的与空间的望远镜相似，使用者即能望见古昔，假如有人发明这么一个镜的话。）来作实地调查，那么也还只好推想。照我读了《孟子》得来的印象来说，孟子舆的霸气很重，觉得他想要出妻的事是很可能的，虽然其动机或者没有如郭鼎堂所写的那么滑稽亦未可知，自然我也并不想来保证。朴丽子的解说可以说是忠厚之至，但是他给孟子洗刷了这件不名誉事，同时也就取消了孟母的别一件名誉事了，因为我佩服孟母便是专为了她的明达，能够纠正孟子的错误，曾经写文章谈论过，若是传为美谈的三迁，我实在看不出好处来。孔子曾说，“吾少也贱，多能鄙事。”我们不知道孔子小时候住在什么地方的近旁，玩过怎样的游戏，但据他自己的话，可以知道他所学会的未必都是俎豆之事这些东西。如为拥护孟母起见，我倒想说那三迁是曲儒所捏造的话，其中并无矫情苟难的分子，却有一种粗俗卑陋的空气，那样的老太太看去是精明自负的人，论理是要赞成出不守礼的新妇的，此在曲儒心眼中当然是理想的婆婆也。

闲话说得太远了，且回过来讲朴丽子的思想吧。在正编卷上有一则说得极好：

> 朴丽子曰：一部《周官》盛水不漏，然制亦太密矣，造至末季变而加厉，浮文掩要，委琐繁碎，莫可殚举，若之何其能久也。秦皇继之以灭裂，焚之坑之，并先王之大经大法，一切荡然，无复留遗，斯亦如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者矣。东汉节义，前代罕比，一君子逃刑，救而匿之者，破家戕生相随属而不悔，至妇人女子亦多慷慨壮烈，视死如归。及魏晋矜为清谈，以任诞相高，斯又与东汉风尚恰相反背矣。夫大饥必过食，大渴必过饮，此气机之自然也。君子知其然，故不习难胜之礼，不为绝俗之行。节有所不敢亏，而亦不敢苦其节也。情有所不敢纵，而亦不敢矫其情也。居之以宽恕，而持之以平易.是亦君子之小心而已矣。

又续编卷上云：

> 未信而劳且谏，民以为厉，君以为谤，甚无谓。然此等岂是恒流，圣贤垂训，于世间英杰特地关心。大抵自古格言至教决不苦物，即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此时定以不得死为苦耳。古之人或视如归，或甘如饴，良有以耳。

此两节初看亦只似普通读书人语，无甚特别处，但仔细想来，却又举不出有谁说过同样的话，所以这还是他自己所独有的智慧，不是看人学样的说了骗人的。“夫大饥必过食”以下一节实是极大见识，所主张的不过庸言庸行，却注意在能实现，这与喜欢讲极端之曲儒者流大大的不同。至于说格言至教决不苦物，尤有精义，准此可知凡中国所传横霸的教条，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父叫子亡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都不免为边见，只有喜偏激而言行不求实践的人，听了才觉得痛快过瘾，却去中庸已远，深为不佞所厌闻者也。古代希腊人尊崇中庸之德（sophrosyne），其相反之恶则曰过（hybris），中时常存，过则将革，无论神或人均受此律的管束，这与中国的意思很有点相像。这所谓自然观的伦理本来以岁时变化为基本，或者原是幼稚浅易的东西，但是活物的生理与生活，也本不能与自然的轨道背离，那么似乎这样也讲得过去，至少如朴丽子自序所说，在持躬涉世上庶几这都可以有用，虽然谈到救国平天下那是另一回事，“其间未必悉合”，或亦未可知耳。大家多喜欢听强猛有激刺的话的时候，提出什么宽恕平易的话头来，

其难以得看客的点头也必矣，但朴丽子原本知道，他只是自己说说而已，并不希望去教训人，他的对于人的希望似亦甚有限也。《续朴丽子》卷上有一则可以一读：

金将某怒宋使臣洪皓，胁之曰，吾力海水可使之干，但不能使天地相柏耳。朴丽子与一老友阅此，笑谓之曰，兄能之。友以为戏侮，怒。徐谢之曰，兄勿怪，每见吾兄于愚者而强欲使之智，于不肖者而强欲使之贤，非使天地相拍而何？（二十六年一月）

〔补记〕　《朴丽子》卷下又有一则云：

有乡先生者，行必张拱，至转路处必端立途中，转面正向，然后行，如矩。途中有碍，拱而俟，碍不去不行也。一日往贺人家，乘瘦马，事毕乘他客马先归。客追之，挽马络呼曰，此非先生马，先生下。先生愕然不欲下，客急曰，先生马瘦，此马肥。乃下，愠曰，一马之微，遽分彼我，计及肥瘦，公真琐琐，非知道者。而先生实亦不计也。后举孝廉，文名藉甚，谒其房师。房师喜。坐甫定，房师食烟，举以让客。先生曰，门生不食烟，不唯门生不食，平生见食烟人深恶而痛绝之。师默然色变。留数日，值师公出，属曰，善照小儿辈。遂临之如严师。朴丽子曰，闻先生目近视，好读书，鼻端常墨。今观其行事，必有所主，岂漫然者哉。古人云，修大德者不谐于俗，先生岂其人欤，何与情远那。先生殁且数十年矣，今里闬间犹藉藉，而学士辈共称为道学云。

此文殊佳，不但见识高明，文章也写得好。我那篇小文中未及引用，今特补抄于此。原文后边有孙子忠批语云：“王道不外人情。情之不容已处即是理，与情远即与道远，何道学足云。”其实原本意思已很明了，虽然写得幽默，故此批语稍近于蛇足，但或者给老实人看亦未可少欤。

（二月二十二日再记）

□1937 年 3 月刊《青年界》11 卷 3 号，署名周作人
□收入《秉烛谈》

曝背馀谈

从估客书包中得到一册笔记抄本，书名《曝背馀谈》，凡二卷五十纸，题恒山属邑天慵生著。卷首有归愚斋主人鲍化鹏序，后有东垣王荣武跋，说明著者为藁城秦书田，馀均不可详。又有一跋，盖是抄者手笔，惜跋文完而佚其末叶，年月姓名皆缺，但知其系王荣武族孙，又据抄本讳字推测当在道光年中耳。鲍序有云：

“一日手一编授余，名曰《曝背馀谈》，闲情之所寄也，或论古今人物，或究天地运会，或正名物之讹舛，或阐文章之奥妙，名章隽句，络绎间起，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王跋云：

“其间抒写性情，傅核古今者十之六七，范模山水，评骘词章者十之三四，宏才俊思，郡人氏罕其匹也。”佚名跋中亦云：

“卷分上下，约二万馀言，其中闲情逸致，隽语名言，率皆未经人道，诚绩学之士，亦未易才也。”三君所言真实不虚，我也愿加入为第四人，共致赞辞。秦君系乾隆时人，然则此书流传下来至少已有百五六十年，不知何以终未刊行，编刻《燕赵丛书》者亦未能搜罗了去，真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

《曝背馀谈》里所收的都是短篇小文，看去平淡无奇，而其好处即在于此。普通笔记的内容总不出这几类：其一是卫道，无论谈道学或果报。其二是讲掌故，自朝政科名以至大官逸事。其三是谈艺，诗话与志异文均属之。其四是说自己的话。四者之中这末一类最少最难得，他无论谈什么或谈得错不错，总有自己的见识与趣味，值得听他说一遍，与别三家的人云亦云迥不相同。秦书田的《馀谈》我想可以算是这类笔记之一，虽然所见不一定怎么精深，却是通达平易。书上有眉批，对于著者颇能了解，系鲍化鹏笔。又有朱批，署名於文叔，多所指摘，盖稍有学问而缺少见识者也。如卷上原文云：

> 李笠翁论花，于莲菊微有轩轾，以艺菊必百倍人力而始肥大也。余谓凡花皆可借以人力，而菊之一种止宜任其天然。

於文叔批云：“李笠翁金圣叹何足称引，以昔人代之可也。”即此可知其是正统派，要他破费工夫来看这一类文章，实在本来是很冤枉的也。

这两卷书里我觉得可喜的文章差不多就有三分之一，今只选抄数则于下：

魏武临卒，遗命贮歌妓铜雀台及分香卖履事，词语缠绵，情意悱恻，摘录之作儿女场中一段佳话，便自可人，正不必于为真为伪之间枉费推敲也。

人之欲学仙者，以仙家岁月悠长，远胜人间耳。世传王质遇仙看弈，一局甫更，已历数世。如彼所言，终天地之期自仙家当之不过一年，是仙家之岁月更促于人世，蝉蜕羽化不反为多事乎。

人谓元代以词曲取士，此相传之妄，实未尝有是也。乃有明至今，小试之文伊然花面登场，无丑不备，士人而徘优矣。世风至此，尚可问乎？使大临吕氏见之，当不知如何叹息痛恨矣。

齐宣王以文王囿七十里为问，其语甚痴，孟子答以刍荛雉兔云云，明说文王不特无七十里之囿，并无一里半里也。其如宣王之不解何，其如后人之不解何。阎百诗先生必指地以实之，认蕉鹿为真有而按梦以求，不多事乎。

有女同车，无是女也。无是女而是女之容色气韵佩服自为描绘，而

又自为赞叹。历历活现如在目前者，心老回惑。眼花撩乱，高唐洛神之蓝本也。

仓庚之至率以二三月，见之经书及前人诗赋者无不皆然，韦苏州以夏莺为残莺，（韦诗，残莺知夏浅。）陆放翁诗，山深四月始闻莺，盖异之也。今二三月奋无至者，四五月中始寥寥一见耳。古今之不同也如此，世岂无有心如康节其人者乎，书之以俟参考。或曰，子北人也。西北地寒故后至，焉知南方之不如昔。曰，余所未至诚不知何如，然古今作诗赋者不尽南人，幽地尤属西北，是可征矣。

鹎■，报晓鸟也，一名夏鸡，燕赵呼茶鸡，音之转也。迟明报晓，鸣声清婉可爱，十数年尚闻之，今亦不至。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乃知清妙难得，不独人为然也。

元宵灯火不知起于何时，其发端创始之人殊乏玲珑之致。月之清光既受夺于灯火，灯火之艳发复见淡于月色，欲两利俱存，反致两贤相厄。是可乏利导之术乎，请移之中和，洗此笨气。（原注，唐中叶以正月晦日为中和节。）

在这几则里都可以看出著者的感情与思想，他没有什么很特异之处，只是找到一个平常的题目，似乎很随便的谈几句，所说的话也大抵浅近平易，可是又新鲜真实，因为这是他自己所感到想到的，在这里便有一种价值。有些兴会上的话自然也不可太认真，如关于元宵批评得很对，不过要移到月底去却是行不通的事，盖元宵实在只是新年的一个掉尾，假如民间不能将新年的庆贺延长到整整一月，到得月末再来重起炉灶弄元宵，不特事实上有困难，恐怕实在也没有多大兴趣也。

《徐谈》中还有几条小文，大都是流连光景的，却也值得一读，抄录于后：

桃花以种村落篱墙畦圃处为多，探之者必策蹇郊行始得其趣，笠翁之论妙矣，余无以易之而意与之别。彼之所重在真，吾之所重在远，梅红柳绿，正妙在远望处入画也。

春夏楼居，不惟免剥啄之烦，云霞宛宿檐端，竹巅木抄，晨昏与时鸟共语，亦自极仙人之乐也。

扫室焚香，读书之乐。吾谓室可勤扫，香可不焚。盖芸檀之属，气味原自重浊，何况加之以烟。茶药味美，用以相代，庶于亲贤远佞之意有合乎。

余性爱山，而所居无山，以云■代之。每当夕阳雨后，信步原野，游目横空，会心独得，兴致淋漓，不减陶靖节篱下悠然时也。

这是全书的末一节，我读了很喜欢也很感动，他真是率真的将真心给人家看，我们读笔记多少册不容易遇见一则，即此可见其难得可贵矣。（廿六年三月十三日，在北平记）

〔附记〕梁清远著《雕丘杂录》卷十有一则云：

古今纪载理之所无者，莫如王质烂柯一事。夫神仙之道欲其长生，正以日月悠长为可乐耳，乃一局棋便是人间数百年，数局棋便是人间数千年矣，由此言之，数万年不抵人间一两月，日月如是之速，神仙亦有何佳处耶。以此为寓言则可，以为实有此事，吾甚为神仙苦其短促也。

与上文学仙一节意相同，文亦有致。梁君亦是真定人，与天慵生是同乡，仿

佛觉得滹南遗老的流泽尚不甚远也。

（廿六年四月十八日校阅时记）

□1937 年 3 月 21 日刊《中央日报》，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谈》

老学庵笔记

吾乡陆放翁近来似乎很交时运，大有追赠国防诗人头衔的光荣。这件事且莫谈，因为我不懂诗，虽然我也是推尊放翁的，其原因却别有所在。其一因为放翁是我的小同乡。他晚年住在鲁墟，就是我祖母的母家所在地，他题《钗头凤》的沈园，离吾家不到半里路。五年前写《姑恶诗话》中曾说起过：

“清道光时周寄帆著《越中怀古百咏》，其沈园一律未联云，寺桥春水流如故，我亦踟蹰立晚风。沈园早不知到那里去了，现在只剩了一片菜园，禹迹寺还留下一块大匾，题曰古禹迹寺，里边只有瓦砾草莱，两株大树。但是桥还存在，虽是四十年前新修的圆洞石桥，大约还是旧址，题曰春波桥：即用放翁诗句的典故，民间通称罗汉桥，是时常上下的船步，船头脑汤小毛氏即住在桥侧北岸，正与废园隔河相对。越城东南一隅原也不少古迹，怪山，唐将军墓，季彭山故里，王玄趾投水的柳桥，但最令人惆怅者莫过于沈园遗址，因为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壮烈，还不十分难过，唯独这种啼笑不敢之情（如毛子晋题跋所说），深微幽郁，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最难为怀，数百年后，登石桥，坐石阑上，倚天灯柱，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荻萧萧，犹为之怅然，——是的，这里怅然二字用得正好，我们平常大约有点滥用，多没有那样的切贴了。”放翁三十二岁时在沈园见其故妻，至七十五岁又有《题沈园》二绝句，其二云：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这种情况是很可悲的。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绝笔也本写得好，却不能胜于此二首，虽然比起岳鹏举的《满江红》来自然已经好多了。

再说第二个原因是我爱读他的游记随笔，即《老学庵笔记》与《入蜀记》。据《四库书目提要》云笔记十卷，续二卷，《书目答问》亦如是说，注云《津逮》本、《学津》本。但是我不幸一直没有能够见到续笔记，查毛子晋所刻的无论是《放翁全集》本或《津逮秘书》本的笔记，都只有十卷，民间八年上海活字本据穴砚斋钞宋本亦无续笔，大约这只在《四库》里才有，而《答问》所注乃不可靠也。《复堂日记补编》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条云：

“阅《老学庵笔记》十卷，放翁文士多琐语，不足为著述也，然吾师吴和甫先生最嗜此书，盖才识与务观近耳。”谭复堂亦是清末之有学识者，而此言颇偏，盖其意似与《四库提要》相近，必须“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才是好笔记也。我的意思却正是相反，轶闻旧典未尝不可以记，不过那应该是别一类，为野史的枝流，若好的随笔乃是文章，多琐语多独自的意见正是他的好处，我读《老学庵笔记》如有所不满足，那就是这些分子之还太少一点耳。

笔记中有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即关于李和儿的炒栗子的事。文在卷二，云：

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

赵云松著《陔馀丛考》卷三十二“京师炒栗”一则云：“今京师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说，汴京李和炒栗名闻四方，绍兴中陈长卿及钱恺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炒粟十枚来献，自白曰，汴京李和儿也，挥涕

而去。盖金破汴后流转于燕，仍以炒栗世其业耳，然则今京师炒栗是其遗法耶。”所云宋人小说当然即是放翁笔记，唯误十裹为十枚，未免少得可笑也。郝兰皋著《晒书堂笔录》卷四中亦有“炒栗”一则云：

“栗生啖之益人，而新者微觉寡味，干取食之则味佳矣，苏子由服栗法亦是取其极干者耳。然市肆皆传炒栗法。余幼时自塾晚归，闻街头唤炒栗声，舌本流津，买之盈袖，恣意咀嚼。其栗殊小而壳薄，中实充满，炒用糖膏（俗名糖稀），则壳极柔脆，手微剥之，壳肉易离而皮膜不粘，意甚快也。及来京师，见市肆门外置柴锅，一人向火，一人坐高兀子，操长柄铁勺，频搅之令匀遍。其栗稍大，而炒制之法和以濡糖藉以粗沙，亦如余幼时所见，而甜美过之，都市炫鬻，相染成风，盘钉间称佳味矣。偶读《老学庵笔记》二言，云云。惜其法竟不传，放翁虽著记而不能究言其详也。”郝君所说更有风致，叙述炒栗子处极细腻可喜，盖由于对名物自有兴味，非他人所可及，唯与放翁原来的感情却不相接触，无异于赵云松也。《放翁题跋》卷三有《跋吕侍讲〈岁时杂记〉》云：

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吕公论著实崇宁大观间，岂前辈达识固已知有后日耶。然年运而往，士大夫安于江左，求新亭对泣者正未易得，抚卷累欷。庆元三年二月乙卯，笠泽陆游书。读此可知在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后之读者安于北朝与安于江左相同，便自然不能觉得了。但是这种文字终不能很多，多的大都是琐语，我也以为很有意思。卷三有一则云：

今人谓贱丈夫日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长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受！此其证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汉，自恶人犯其名，谓汉子曰兵士，举官皆然。其妻供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大保请官教点兵士书。都下哄然传以为笑。

又卷五有类似的一则云：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答，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这两则在正统派看去当然是萧鹏巴曾鹑脯之流，即使不算清谈误国，也总是逃避现实了吧。但是仔细想来，这是如此的么？汉子的语源便直戳了老受异族欺侮的国民的心，“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谚岂不是至今还是存在，而且还活着么？这种看法容易走入牛角湾的魔道里去，不过当作指点老实人出迷津的方便如有用处，那么似乎也不妨一试的吧。又卷一有一则云：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

卷七有谈诗的一则云：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

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放翁的意见固佳，其文字亦冷隽可喜，未数语尤妙：“不妨其为恶诗”，大有刀笔徐风，令人想起后来的章实斋，上节记“不行于世”虽非放翁自己的话，也有同样的趣味。卷八又有云：

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烟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支欲啖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资政吃荔支，请众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支。魏公为一笑。恶发犹云怒也。

又卷二云：

钱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吴音握恶相乱，钱塘人遂谓其处曰，此钱大王恶发殿也。

连类抄录，亦颇有致。笔记中又有些文字，亦是琐语而中含至理，可以满正宗读者之意，如卷一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瞶，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瞶矣。

上官道人其殆得道者欤，行事固妙，所说治国卫生的道理寥寥几句话，却最高妙也最切实。我想这或者可以说是黄老之精髓吧，一方面亦未尝不合于儒家的道理，盖由于中国人元是黄帝子孙而孔子也尝问礼于老聃乎。所可惜的是不容易做，大抵也没有人想做过，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乱与夭，这实是件奇事。中国的思想大都可以分为道与儒与法，而实际上的政教却往往是非道亦非儒亦非法，总之是非黄老，而于中国最有益的办法恐怕正是黄老，如上官道人所说是也。读《老学庵笔记》而得救国之道，似乎滑稽之甚，但我这里并不是说反话。真理原是平凡的东西，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也。（廿六年三月三十日）

□1937 年 5 月刊《青年界》11 卷 5 号，署名周作人
□收入《秉烛谈》

思痛记及其他

中国近世的丧乱记事我也曾搜集一点来读，可是所见很不多。如关于道光壬寅（一八四二）“唉夷”犯江南之事，见有上海曹静山的《十三日备尝记》，丹徒法又白的《京口偾城录》，杨羡门的《出围城记》，朱月樵的《草间日记》等。长毛即太平天国时的记载有山阴陈昼卿的《蠡城被寇记》，会稽杨华庭的《夏虫自语》，鲁叔容的《虎口日记》，都是关于绍兴的，李小池著《思痛记》二卷则记江宁句容金坛一带，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一亦记江宁破城事。这里边与我最有情分的要算是《思痛记》了。这一小册书我已买有三本，第一次是在光绪戊戌（一八九八），据日记上所记云：

“十二月十三日，阴。午，至试前看案尚未出，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洋一角。”其次是在北平，今年一月二日买得，价二元四角。复次则在上海，三月中托友人代为买来，价一元二角八分也。我看这本书前后几四十年，大有韦编三绝之概，每看时或不看而想起时辄发生许多感慨，因为太多而且深切了，所以觉得无从说起，只好不说。这回决心想写小文绍介，可是仍旧没法子抄录，我想这书是应该整本子的读下去的。假如有志士仁人肯出资刊印，我想这书应该与孙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辛稼轩”的《南渡录》，——不问所说徽钦二帝的事真伪如何，或辛君的名字确系假冒，总之这三部书是值得合刻，给中国人读一遍的。还有一个缘故，单抄出几节残杀的记事也不是好方法，这岂不是与节抄《金瓶梅词话》的淫事相似么？唱经堂《杜诗解》卷四举三绝句的第一首云：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杀人更肯留妻子。”圣叹评云：

“杀人句妙于更肯字，本是杀其人而淫其妻，却写得一似蒙其肯留，感出意外者，非是写惨恶事犹用滑稽笔，不尔便恐粗犷不可读也。”金君故是解人，此语说得很好，读了更令我难于选抄，其实只怕抄得不好使文章没有气力，粗犷还是托词而已。我重复的说，这书是须得全读的，部分的选抄不适宜也没有用。吾乡孙子久著《退宜堂诗集》卷二有“严鞠泉广文逸自贼中赋赠”一首，并序云：

> 城陷，鞠泉虏系，夜将半，贼遍索赂，斫一人颅，衔刀灯下示怖众，寻缚十四人递戮之，既十人，遽止。鞠泉竟免，次三人袁杜姚并得逸。
>
> 听谈已事沮交颐，生死须臾命若丝，
>
> 夜半灯光亮于雪，衔刀提出髑髅时。

还不如引这别一件事的诗聊以填空，若是原书那一定是非全读不可者也。

不过想介绍《恩痛记》而一句都不引，似乎也不相宜，所以我这里来弃武就文，撇开太平天国的残杀淫掠而稍谈其文化政策吧。《思痛记》卷上记咸丰庚申（一八六〇）闰三月二十五日在金坛城外时事云：

> 李贼出坐殿中椅上，语一年约二十徐，发已如辫长，面白身矮瘦贼曰，掌书大人，要备表文敬天父。贼随去，少顷握黄纸一通置桌上，又一贼传人曰，俱来拜上帝。随见长发贼大小十三四人至，分两边挨次立，李贼立正中面向外，复谓一贼曰，可令新傢伙们立廊前观听。馀众至，则李贼首倡，众贼和之，似系四字一句不了了，约二十馀句，唱毕，所谓掌书大人者趋至桌前北向捧黄纸，不知喃喃作何语，读罢就火焚之。闻七日一礼拜，届期必若是，是即贼剿袭西洋天主教以惑众也。

悔翁《乙丙日记》卷一，记咸丰癸丑（一八五三）二月中事有云：

十二日，邻人刘宅有贼于其家打馆夕食，闻诵经声毕则齐声呼杀妖而罢。初闻惊恐，谓其有邪术也。先是传言贼能放青烟以迷人，相去甚远可以忽至人前，有青烟酸入人鼻不可耐云云，其言出于藩署幕友，谓为信然，既闻此益坚信不疑。十二日，见娄宅壁上粘赞美云云，不知何为。既至城外，贼持一单令人人诵读，不熟者将挞之。其词云：

赞美上帝，惟天圣父。赞美耶稣，救世真主。
赞美圣神，夙为神灵。赞美三位，合一真神。
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
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宏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
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云云，即娄宅壁上所粘，又即刘宅贼匪所诵也。时城外谭宅厅事为道州贼，后为歙人，道州贼日食必率其徒诵此，又教敏人率吾辈诵之，乃知其空言恐吓，实无邪术也。

悔翁自己曾经诵过赞美，其后妻亦因诵读不熟将被挞，二女愿代，七月中记云：

“十六日，女婆来打，二女代其母受扑五十。”至九月初十日，二女终以不食死，悔翁记之云：

“此后日子难过，后母气难受，日甚一日也。”悔翁一节日记及文集中“次女哀辞”均极酸楚，其所记关于女人生活的偏激之论盖亦从此出也。胡光国著《愚园诗话》卷一载周葆濂所作《哀江南》曲，有一节云：

可记得，逢七日，奏章烧。
甚赞美，与天条，下凡天父遗新诏。
一桩桩胡闹，都是这小儿曹。

盖即指此事。《思痛记》在叙述敬天父后又云：

贼目令众坐，于是踞者蹲者，跷足者，倚肩搭背、舞手动脚，贼相毕露。小贼二三人立贼目后装水烟，呼馀众至问姓名，各报讫，掌书一一注簿。贼目又言，尔众系新来人，宜一心归顺天朝，不可逃走，逃走必死。复问能挑担打先锋者须自言，强壮者咸答曰能。馀五人答皆不能挑担，只会打杂，贼乃派令打杂，心始定。又曰，我是典圣粮官，指各贼曰，他们都是老兄弟。……自明日起逐日随老兄弟们去打粮，不能去者留馆烧火当差。说毕令人带回，贼众亦都散，此又贼中所讲道理也。

陈子庄著《庸困斋笔记》卷四有一条云：

贼之最无道理者日讲道理。每遇讲道理之时，必有所为也。凡掳众搜粮则讲道理，行军出令则讲道理，选女色为妃嫔则讲道理，驱蠢夫壮丁为极苦至难之事则讲道理。究其所讲者，其初必称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莫大功德，理应供奉欢喜，娱其心志，畅其体肤，尔等众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财禄，骄淫怠情，犯天条律云云。以后则宣扬贼将欲为之事，以一众心，而复引天父之语以证之，如谓孔子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将其责打手心等语，闻之令人发指，即在贼中之人听之亦不复信也。

《愚园诗话》又载马寿龄的新乐府一首，题曰“讲道理”，其词云：

锣鼓四声挥令旗，听讲道理鸡鸣时。

桌有围，椅有披，五更鹄立拱候之。
日午一骑红袍驰，戈矛簇拥萧管吹。
从容下马严威仪，升座良久方致辞：
我辈金田起义始，谈何容易来至斯。
寒暑酷烈，山川险巇，千辛万苦成帝基。
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
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无怨无恶无悲啼。
妖魔扫尽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为提携。
听者已倦讲未已，男子命退又女子，
女子痴憨笑相语，不讲顺理讲倒理。

陈马二君似未尝被掳，所说或难免传闻异辞，但大体当可信，盖李君所遇或是普通仪式，陈马则属于特殊者，而其中又有分别，即一是政治的宣传，一乃教义的训练是也。

太平天国在反抗满清这一点上总是应当称赞的，虽然他的估价不能高出朱洪武之上。明朝文化恐怕只有八股，假如其间没有一个王怕安出来乱闹一阵子。洪门文化不幸尚未建立成功，他以会党作基础再加上了教会，这个样子很有点蹊跷，至少我是觉得没有多少意思的。至于武化，杀妖是一件事，杀人又是一件事，这里暂且不谈。《思痛记》所记杀人事很可观，自有原书在也。（民国廿六年四月十三日，于北平）

□1937 年 5 月刊《谈风》14 期，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思 痛 记

李小池著《思痛记》二卷，余于戊戌冬问买得一册，于今已四十馀年矣，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李氏别种著作，亦曾着意收罗，见《思痛记》尤欲得之，至今已有三册，新旧稍不同，内容则一，前又得其一，墨暗纸敝，未叶墨题一行云，丙申九月彼园读于沪滨，印文曰小园，各本均只有光绪六年高鼎序金遗跋各一，此本乃多有光绪十三年黄思永序一篇，盖后刻加入者，故为早印本所无也。

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乃如此，黄氏自称固身遭大痛而未忍言者，序云，今读是编，语语酸楚人心坎，不觉旧痛触发，涕泣交流，良可悲矣。往日尝读鲁叔容《虎口日记》，杨德荣《夏虫自语》，李召棠《乱后记所记》，觉得都不甚奇，惟此记所书殆可与《扬州十日记》竞爽，思之尤可畏惧，此意正亦不忍言也。余收集《思痛记》已有四册，本意亦拟分给他人，惟解者不易得，故至今未损一册。前曾借给胡适之君一读，不知其印象如何，当时不愿追问，适之亦是识者，想亦以此不曾给什么回答也。（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记）

□1940 年 4 月 29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晚明小品选注

个月前偶然到琉璃厂去，在店头看见一册《晚明小品选注》，是《学生国学丛书》之一，去年冬天新出版的，我见了喜欢，就买了一册回来。我对于晚明文是颇有好意的，因为那时是一种思想文章的解放时代，大抵自从王阳明把儒门打开，放进禅味来以后，这就发生变化，一个李卓吾与一个徐文长虽然力量大小不同，总之可以表示这方面的发展趋向。小说戏曲的成绩很大，不过我是绝对外行，不敢动一个手指头，只有散文还觉得好念，所以有点喜欢，然而古书又很难得，得有选本新著亦正慰情胜无耳。说到选本往往遇见高明人的白眼，这其实是极应当的，假如作者有全集行世，学者又愿专攻，那么为甚弃全集而取选本，岂不是自甘墙面么。但是话分两面说，也有些全集不易得，而读者又未必想作专家的，那么选本倒也是有用的东西，可以应付这个需要，各图书馆里固然都备有《全唐诗》，即寒斋书架上唐人诗集也有若干部，可是不佞的诗的知识实在还是从《唐诗三百首》来的，此固由懒惰不好学之故，但我自己的经验上诚不敢看轻选本也。我这里只是泛论，至于这一册晚明小品选得如何不在议论之列，请看客各自着眼，盖这里我所注意者乃在注而非选也。

笺注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本书选注者在叙例中立例九则，其第八云：

> 本书注释力求简明，然一字之疑必探其本，一句之晦必竟其源，间有考检不获则注明未详二字。……郢书燕说，庶几或免，虽然，松之往矣，孝标不再，博识异闻非所能详，浅陋之诮又乌敢辞。

这话说得很好，可是做到很难。据我所知道只有《骈雅训纂》的著者魏茂林可以佩服，所著有《同馆诗赋解题》、《二家诗钞笺略》均佳。其作注不单呆引出典熟语，却就本诗用意上说明，不但博闻，且有常识，能予读者以不少帮助。如有正味斋咏史诗“殷浩书空”未联云：“西风运笔阵，渺渺羡烟鸿。”别家注释大抵只引《法书要录》“笔阵图”而已，魏君于此外又说明云：“又按此阵字借作雁阵解，盖以雁为书空匠者意关合，见陶毅《清异录》上禽名门。”我曾读梁元帝的《荡妇秋思赋》，查黎经诰所著《六朝文笺注》，题下注有云：“说文曰，秋，禾谷熟也。”看了不禁觉得好笑，不知禾谷熟了为什么荡妇要胡思乱想，恐怕许叔重也说不出道理来吧，黎注据说是李善式的，而魏注则自称以纪氏的《庚辰集》为法，两相比较，我宁取纪大烟斗矣。

《晚明小品》共选文一百五十九篇，篇篇有注，我未及遍读，只挑了袁中郎的几首游记来看，觉得未能满意。如《西湖一》云：“晚同子公渡净寺，觅阿宾旧住僧房。”注云：“阿宾谓唐骆宾王。旧传宾王尝亡命为僧，驻锡西湖。”案骆宾王虽然传说曾在灵隐寺遇见宋之问，这里的阿宾却并不是他。《解脱集》及梨云馆本都云阿宾，袁小修所编中郎全集中独改作小修二字，可知阿宾即是小修的小名也。

又《飞来峰》中云：“壁间佛像皆杨秃所为，如美人面上瘢痕，奇丑可厌。”注云：“杨秃谓杨惠之，唐塑像名家。”案《西湖梦寻》卷二“飞来峰”项下云：“深恨杨髡遍体俱凿佛像，罗汉世尊栉比皆是，如西子以花艳之肤，莹白之体，刺作台池鸟兽，乃以黔墨涂之也。”又“峋嵝山房”项下有张宗子自作小记，亦见《陶庵梦忆》卷二，中有云：

> 一日缘溪走看佛像，口口骂杨髡，见一波斯胡坐龙象，蛮女四五献

花果，皆裸形，勒石志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诸蛮女，置溺渡处以报之。寺僧以余为椎佛也，咄咄怪事，及知为杨髡，皆欢喜赞叹。

杨秃杨髡都是一人，即元杨髡真伽。

又《天池》中云：“因大书简板曰：种阿僧祇善根，亲非亲，怨非怨，阳焰空华，诸法皆如幻；遍阎浮提佛土，去自去，来自来，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选注本首句在僧字下点句，注云：“阿，语词，是僧人祇须种善根。”案此系对联，下联阎浮提既系连用，则此处亦自不得断。据《翻译名义集》卷八数量篇三十六云：“阿僧祇，或阿僧金耶，此云无央数。《楚辞》云，时犹未央。王逸曰，央，尽也。《大论》云，僧祇秦言数，阿言无。”准此可知原云种无量数的善根，不能如字解说也。

不佞自己不能做选注工夫，却来多说风凉话，自知不该，唯正因看重此种工作有益于人，故愿有所助益，贡其愚得，不然新书多矣，鄙人无暇看更无暇挑眼，想读者当能喻此意耳。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于北平）

□1937 年 5 月 6 日刊《益世报》，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南堂诗抄

偶然得到两本清初的诗集。我说偶然，因为诗我是不大懂的，平常诗集除了搜集同乡著作之外就不买，所以这两本的确可以说是偶然得来的，虽然亦自各有其因缘。其一是吴景旭的《南山堂自订诗》四卷。吴景旭字旦生，著有《历代诗话》八十卷，刻入嘉业堂的《吴兴先哲遗书》中，是我所喜欢的一种书，这回看见他的诗也想拿来一读。书无序跋，目录也撕去了一半，疑心他不全，查诗话刘承干跋只云“有南山自订诗”，也不说卷数，到后来拆开重订，乃见后书面的里边有字两行，左云：

“《南山堂自订诗》，下册七卷至十卷佚阙。”右云：

“旦生公遗著，裔孙永敬识。”盖估人作弊，将书面反折改装，假充完全，却不知即使是残本不佞也会要也。但此册实止四卷，或者下册当是五至十，亦未可知。集中所收诗自顺治己丑至康熙甲辰，凡十六年，卷四有五十二偶作，时为壬寅，案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刘跋亦称其为明诸生，其诗却极少遗老气，辛丑有《喜光儿得赐探花》一诗可知，唯时有放恣或平易处亦觉得可喜。卷一《罱泥行》上半云：

一溪小雨直如发，尖头艓子长竿揭，
凭将两腕翕复张，形模蛤蚆相箝镊。
载归取次壅桑间，平铺滑汰孩子跌。

卷三有诗题云：

“己亥闻警，雉侯下令荷戈戍城上，家贫无兵械，因销一■花小锄为刃，作长句伤之。”诗并不佳，故不录，但只此一题也就够有意思了。

其二是方贞观的《南堂诗抄》六卷。这诗集是全的，前有李可淳序，又乾隆戊午汪廷璋序，盖即是刻书的那一年。方贞观是方苞的从弟，方苞的诗极恶劣，谢枚如在《赌棋山庄笔记》中曾大加以贬斥，贞观所作却大不相同，如李序所说，宛转沉痛，言短意长，及后更益造平淡近自然。各卷卷首皆题《方贞观诗集》，唯卷三则曰《方贞观卷葆集》，有小引云：

“癸巳之岁，建亥之月，奉诏隶归旗籍。官碟夕至，行人朝发，仓卒北向，吏役驱逐，转徒流离，别入版籍。瞻望乡国，莫知所处，先陇弃遗，亲知永隔，行动羁鞅，存没异乡。呜呼哀哉，岂复有言。而景物关会，时序往复，每不能自己，始乎去国，迄于京华，其呜咽不成声者去之，存若干首，命曰卷施集，庚信所谓其心实伤者也。后之君子尚其读而悲之。康熙五十八年四月望，贞观记。”案《方望溪集》后附苏惇元编年谱，在雍正元年癸卯条下有记事云：

“先是《滇游纪闻》案，先生近支族人皆隶汉军，至是肆赦，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自癸巳至癸卯，贞观盖隶旗籍者满十年，《卷施集》一卷即此十年中所作，所云宛转沉痛的诗多在此中，殆哀而至于伤矣。这是我们说他哀伤，若是从上头说来何尝不是怨怼，那么就情罪甚重了。如卷三第一首《别故山》有云：

衰门自多故，怀壁究何人。

《出宗阳》云：

生逢击壤世，不得守耕桑。

《泊牛渚》云：生男愿有室，生女愿有家。

缅彼尧舜心，岂曰此念奢。

我亦忝蒸黎，何至成浮槎。

《欲暮》云：

岂有声名如郭解，自知肥白愧张苍。

《望见京城》云：

独有覆盆盆下客，无缘举目见青天。

《寄家书》云：

馀生不作大刀梦，到死难明破镜由。

但是最重要的还应该举出那第三首《登舟感怀》来，其词云：

山林食人有豺虎，江湖射影多含沙，
未闻十年不出户，咄嗟腐蠹成修蛇。
吾宗秉道十七世，雕虫奚足矜搜爬，
岂知道旁自得罪，城门殃火来无涯。
破巢自昔少完卵，焚林岂辨根与芽。
举族驱作北飞鸟，弃捐陇墓如浮苴，
日暮登舟别亲故，长风飒飒吹芦花。
语音渐异故乡远，回头止见江天霞，
呜呼赋命合漂泊，磐砧变化成虚搓。
杀身只在南山豆，伏机顷刻锄坑瓜，
古今祸福非意料，文网何须说永嘉。
君不见，乌衣巷里屠沽宅，原是当时王谢家。

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二《秋前集》下批语有云：“特其自知罪重谴轻，甘心窜滴，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犹为可谅。”今贞观诗怨甚矣，不但坚称冤枉，以杨恽自拟，还拿了秦始皇坑儒来比，岂不是肆口诽谤乎。我取出《禁书总目》来一查，“我找着了”！《南堂诗抄》的的确确收在里边。我很高兴我的眼力不差，假如去做一名检查官大可胜任愉快也。

卷六有一篇诗题云，“乾隆戊午冬中三日，余马齿六十矣”，可以知道方贞观是于康熙十八年己未，三十五岁隶旗籍，四十五岁放免，五十八岁被徵博学鸿词，谢老病不赴。关于这件事有一首妙诗，题云：“部碟复至，备见敦迫，终不能赴，再寄孙公”：

纁币与安车，吾闻其语矣，书传半真伪，窃恐未必尔。
今者符檄来，汹汹吏如鬼，幸不见执缚，几为敦迫死。
家无应门童，我病杖乃起，老妇惊踰垣，问祸来所以。
敢希稽古荣，奚至捕盗比，寄言谢故人，铭心佩知己。
世不乏应刘，樗栎何足齿，偃蹇负弓旅，免蹈虚声耻。

这里有意思的事，第一是博学鸿词敦迫的情形，大有锁拿沈石田的样子，其次是方君仍旧的那样大不敬，他描写吏如鬼之汹汹，还说窃恐未必尔的古代安车之类，真可以说幽默得很。卷一《乡大水》一篇末云：

官家积谷如山丘，立法本为苍生谋。
便宜行事汲都尉，流亡愧俸韦苏州，
古来书传半真伪，两人未识诚有否。
杀人不问挺刃政，屠伯何须在录囚。

这书传半真伪的话，可见早见用了，虽然是苏东坡恐本无扬雄的故典之转化，却用得很有力量。同一篇中又有云：

小民赋命本饿殍，熟也不活奚灾伤。

这也比孟子的乐岁终身苦的话更说得辛辣，其区别盖因一是正言而一是逆说，此正是幽默之力也。方君少年时盖颇有许行之徒的倾向，其《耕织词》云：

贫女不上机，宫中皆草衣。农夫不耕田，侯王都饿死。

鸡鸣向田间，采桑朝露新，望望红日高，照见晏眠人。

又《题古战场图》云：

岂不畏锋镝，将军骄欲行。威尊身命贱，法重生死轻。

力尽□偏狡，天寒虏益横。谁非人子骨，千载暴边城。

第五句第三字原缺，或者是胡字吧？即此诸诗可以见作者思想之一斑，在清朝桐城派虽有名，不佞以为方氏之荣誉当不在苞而在贞观耳。

诗我都不大懂，上边所谈只是就诗中所有的意思，随意臧否，也不敢自以为是，并不真是谈诗。或恐有朋友疑心我谈诗破例，顺便声明一句。

廿六年四月廿七日，在北平苦住庵记。

〔补记〕《南山堂自订诗》十卷，嘉业堂有新刻本，末有癸亥刘承干跋，中有云，自卷一至卷五为其裔孙渔川观察所藏弃，以畀余，惜已佚半，嗣留心访求，竟获卷六至卷十，遂为完壁。渔川即吴永，然则我所得残书即是其底本，但不知何以又流落在旧书摊头耳。近年又得全书一部，卷首有朱文长方印曰，闽戴成芬芷农图籍，内容与刘刻本悉相同，唯原本有目录三十一页，而刘刻略去，改为总目一页，未免少欠忠实。（民国癸未冬日编校时记）

□1937 年 5 月刊《逸经》30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秉烛后谈》

东莱左氏博议

近来买到一部书，并不是什么珍本，也不是小品文集，乃是很普通很正经，在我看来是极有意义的书。这只是四册《东莱左氏博议》，却是道光己亥春钱唐瞿氏清吟阁重雕足本，向来坊刻只十二卷八十六篇，这里有百六十篇，凡二十五卷。《东莱博议》在宋时为经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广，我们小时候也还读过，作为做论的课本，今日重见，如与旧友相晤，亦是一种喜悦，何况足本更觉得有意思，但是所谓有意义则别有在也。

《东莱左氏博议》虽然“四库书目”列在“经部春秋类二”，其实与经学不相干，正如东莱自序所说，乃是诸生课试之作也。瞿世瑛道光戊戌年跋文云：

> 古之世无所谓时文者。自隋始以文辞试士，唐以诗赋，宋以论策，时文之号于是起。而古者立言必务道其所心得，即言有醇有驳，无不本于其中心之诚然，而不肯苟以衒世，文之意亦于是尽亡矣。盖所谓时文者，至宋南渡后创制之经义，其法视诗赋论策为胜，故承用最久，而要其所以名经义者，非诚欲说经，亦姑妄为说焉以取所求耳。故其为文不必果得于经所以云之意，而又不肯自认以为不知，必率其私臆、凿空附会，粉饰非者以为是，周内是者以为非，有司者亦不论其所知之在于此，而始命以在《宇宙风》题作《谈〈东莱博议〉》。彼之所不知，于是微言奥旨不能宿通素悉于经之内，而枝辞赘喻则可暂假猝辨于经之外，徒恃所操之机熟，所积之理多，随所命而强赴之，亦莫不斐然可观，以取盈篇幅，以侥幸得当于有司之目。噫，不求得于心则立言之意亡，不求通于经则说经之名戾，时文之蔽类然已。《东莱左氏博议》虽作于其平居暇日，苟以徇诸生之请，然既以资课试为心，故亦不免乎此蔽，其所是非大抵出于方执笔时偶然之见，非必确有所低昂轩轾于其间，及其含意联词，不得不比合义类，引众理以壮其文，而学者遂见以谓定论而不可夺，不知苟欲反其所非以为是，易其所是以为非，亦必有众理从而附会之，而浅见者亦将骇诧之以为定论矣。

关于经义的变迁，吾乡茹敦和著《周易小义》序中说的很简明，今抄引于下：

> 经义者本古科举之文，其来旧矣。至宋王安石作《三经新义》，用以取士，命其子雱及吕惠卿等著为式颁之，此一变也。元延祐中定科举式，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书，以《易》《诗》《书》《礼记》《春秋》经文为五经，别之为书义经义，又于破题承题之外增官题原题大讲大结等名，此再变也。明成化中又尽易散体为排偶，束之为八比，此三变也。至嘉隆以后于所谓八比之中稍恢大焉，渐至排中有排，偶中有偶，乃于古今文体中自成一体，然义之名卒不改。

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两件事实。其一是八股文原是说经的经义，只是形式上化散为排，配作四对而已。其二是《东莱博议》原是春秋类的经义，不过因为《春秋》是记载史事的书，所以博议成为一种应试体的史论。这两件事看似平常，其实却很重大，即是上边所说的有意义。

我们平常骂八股文，大有天下之恶皆归焉之概，实在这是有点儿冤枉的，至少也总是稍欠公平吧。八股文诚然是不行，如徐大椿的《时文叹》所说：

>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

---

[1] 《宇宙风》题作《谈〈东莱博议〉》。

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啼，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

又如我的《论八股文》中讲到中国的奴隶性的地方有云：“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钝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不过我们要知道八股乃是应试的经义而用排偶的，因为应试所以遵守功令说应有尽有的话，是经义所以优孟衣冠似的代圣人立言，又因为用排偶，所以填谱按拍那样的做，却也正以此不大容易做得好，至今体魄一死，唯馀精魂，虽然还在出现作祟，而躯壳败坏之后己返生无术矣。《博议》一类论事的文章在经义渐渐排偶化的时候分了出来，自成一种东西，与经义以外的史论相混，他的寿命比八股更长，其毒害亦更甚，有许多我们骂八股文的话实在都应该算在他的账上才对。平常考试总是重在所谓书义，狭义的经义既比较不重要，而且试文排偶化了，规矩益加繁琐，就是做《春秋》题也只有一定的说法，不能随意议论，便索性在这边停止活动，再向别方向去发展，于是归入史论一路去，因为不负责任的发议论是文人所喜欢的事，而宋人似乎也特别有这嗜好。冯班《钝吟杂录》卷一《家戒》上云：

> 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成败得失，古人自有成论，假令有所不合，闭之可也。古人远矣，目前之事犹有不审，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悬言其是非乎。宋人乡不审细止，如苏子由论蜀先主云，据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将也。考昭烈生平未尝用孔明为将，不据蜀便无地可措足，此论直是不读《三国志）。宋人议论多如此，不可学他。

又卷八《遗言）有云：“宋人说话只要说得爽快，都不料前后。”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十六（宋文鉴）之十云：“宋儒论古人多好为迂刻之言，如苏辙之论光武昭烈，曾巩之论汉文，秦观之论石庆，张来之论哪吉，多非平情。孔子曰，尔责于人终无已时。大抵皆坐此病。”又蒋超伯（南渭椿语）卷四云：“痰字从无人诗文者，朱直《史论初集）低胡致堂云：双目如菩，满腹皆痰。鄙俚极矣，不可为训。”蒋氏原意在于论痰字，又未有的议论或者也未必高明，反正这种东西是没法作得好的，但总之批评胡致堂的话是很对，而且也可以移作许多史论的评语。史论本来容易为迂刻之言，再加上应试经义的参和，更弄得要不得了，我说比八股文还有害的就是这个物事。盖最初不过是双目如替，满腹皆痰，实为天分所限，随口乱说，还是情有可原，应试体的史论乃是舞文弄墨，颠倒黑白，毫无诚意，只图入试官之目，或中看官之意，博得名利而已。此种技俩在翟君的跋文中说得非常透彻，无以复加，我们可以不必再来辞费，现在只想结束一句道：八股文死矣，与八股文同出于经义的史论则尚活着，此即清末的策论，民国以来的各种文字是也。

去年我写过一篇小文，说明洋八股即是策论，曾经有这几句话：“同是功令文章，但做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其一重在模拟服从，其一则重在胡说乱道也。专做八股文的结果只学会按谱填词，应拍起舞，里边全没有思想，其做八股文而能胡说乱道者，仍靠兼做策论之力也。”这个意思我觉得是对的，关于八股文的话与徐灵胎相合，关于策论则与冯钝吟等人相合，古人所说正可与我互作注脚也。

小时候在家读坊刻《东莱博议》，忽忽三十馀年，及今重阅，已不记那几篇读过与否，唯第一篇论郑庄公共叔段，《左传》本文原在卷首，又因金

圣叹批点过，特别记得清楚，《博议》文亦尚多记得。如起首一节云：

> 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且为钩饵以诱鱼者钓也，为陷阱以诱兽者猎也，不责钓者而责鱼之吞饵，不责猎者而责兽之投阱，天下宁有是耶？

又结末云：

> 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钓者之自吞钩饵，猎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讵至此乎？故吾始以庄公为天下之至险，终以庄公为天下之至拙。

读下去都很面善，因为这篇差不多是代表作，大家无有不读的，而且念起来不但声调颇好，也有气势，意思深刻，文字流畅，的确是很漂亮的论，有志写汉高祖或其他的论文的人哪能不奉为圭臬呢。但细看一下，也不必用什么新的眼光，便觉得这确是小试利器，甜熟，浅薄，伶俐，苛刻，好坏都就在这里，当作文章看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秀才胚子，他的本领只有去做颂圣诗文或写状子而已。只可惜潜势力太大，至今还有多数的人逃不出他的支配，不论写古文白话都是如此，只要稍为留心，便可随时随地看出新策论来。在这时候如要参考资料以备印证，《东莱博议》自然是最好的，其次才是《古文观止》。试帖诗与八股文不会复活的了，这很可以乐观，策论或史论就实在没有办法，土八股之后有洋八股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八股出来，我相信一定都是这东西的变种，盖其本根深矣。

我写这篇小文，并不是想对于世道人心有什么裨益，吾力之为微正如帝力之大，如孟德斯鸠所说，实在我是一点没有办法。傅青主《书成弘文后》云：“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派，真恶心杀，真恶心杀。”我也只是说恶心而已。

（二十六年六月七日，于北平苦住庵）

□1937 年 7 月刊《宇宙风》44 期，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后淡》

贺贻孙论诗

谢枚如著《课馀偶录》卷一有一则云：

> 永新贺子翼贻孙先生著述颇富，予客江右尝借读其全书，抄存其《激书》十数篇收之箧衍。其《水田居文集》凡五卷，议论笔力不亚魏叔子，且时世相及，而名不甚显，集亦不甚行，殆为易堂诸子所掩耳，要为桑海中一作手，非王于一陈士业辈所能比肩也。有云：遵时养晦，藏用于正人无用之时，著书立说，多事于帖括无事之日。（答李谦庵书）。贫能炼骨，骨坚则境不摇，彼无骨者必不能不逢迎纷纭，无怪其居心不静也。无骨之人，富贵尤能乱志，贫贱更难自持（复周畴五书）。有意为闲，其人必忙，有意为韵，其人必村，此不待较量而知也（书补松诗后）。安贫嗜古之意溢于言下，可以觇其所养矣。

《四库全书总目》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著录文集五卷，评云：

> 所作皆跌宕自喜，其与艾千子书云，文章贵有妙悟，而能悟者必于古人文集之外别有自得，虽针砭东乡之言，而贻孙所以自命者亦大略可见，特一气挥写过于雄快，亦不免于太尽之患也。

又一二五“杂家类存目二”著录《激书》无卷数，评云：

> 所述皆愤世嫉俗之谈，多证以近事，或举古事，易其姓名，借以立议，若《太平广记》“贵公子炼炭”之类，或因古语而推阐之，如“苏轼书曹孟德”之类。其文称心而谈，有纵横曼衍之意，而句或伤于冗赘，字或伤于纤丽，盖学《庄子》而不成者，其大旨则黄老家言也。

《四库提要》对于非正宗的思想文章向来是很嫉视的，这里所说还算有点好意。平景孙著《国朝文薮》题辞卷一中也有一则是讲《水田居文集》的，并说及《激书》，文云：

> 子翼少工时文，与茂先、巨源、石庄诸公齐名，举崇祯丙子副贡生，入国朝隐居不出，顺治丁酉巡按笪江上欲以布衣荐，遂改僧服。据叶擎霄《激书》序，似卒于康熙丙子，年九十一矣。文笔奔放，近苏文忠，集中史论最多，其文意制峭诡，有似柳州、可之、复愚者。《激书》二卷，包慎伯最爱之，谓近《韩非》《吕览》，而世少知者。盖嘉庆中骈体盛而散文衰，桐城派尤易袭取，慎伯与完庵、厚堂默深、子潇诸子出，以丙部起文集之衰，故有取于是。其风实自阳湖浑李二氏昉，于是古文复盛，至于今不衰。

看了这些批评我就想找《水田居集》来一读，可是诗文集未能买到，只搜得其他五种，即《激书》二卷，《易解》七卷，《诗解》六卷，《骚筏》一卷，《诗筏》一卷，《易经》我所不懂，《诗经》颇有说得好的地方。《四库书目》十六“诗类存目一”著录《诗解》，评有云：

> 每篇先列小序，次释名物，次发挥诗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而其所从入乃在钟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盖迂儒解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贻孙解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

其实据我看来这正是贺君的好处，能够把《诗经》当作文艺看，开后世读诗的正当门径。此风盖始于钟伯敬，历戴仲甫、万茂先、贺子翼，清朝有姚首

---

① 《宇宙风》题作《论诗》。

源、牛空山、郝兰皋以及陈舜百，此派虽被视为旁门外道，究竟还不落莫，《四库书目》中评万氏《诗经偶笺》云：

> 其自序有曰，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云云。盖钟惺谭元春诗派盛于明末，流弊所及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之贻害于学者可谓酷矣。

我想这正该反过来说，《诗归》即使在别方面多缺点，其以诗法读经这一点总是不错的，而且有益于学者亦正以此，所可惜者现今绍述无人，新文艺讲了二十年，还没有一部用新眼光解说的《诗经》，此真公安竟陵派不如矣。我们不必一定去爱古人；但有时难免有薄今人之意耳。

贺君说《诗》仍从序说，虽然只取古序发端一语，以为此外皆汉儒续增不尽足据，其解释《诗》旨难得有新意思也是当然的，唯关于诗词颇多妙语，如《卫风》“氓之蚩蚩”一诗，仍遵序云刺时也，解有云：

> 此篇与《谷风》篇才情悉敌，但《谷风》词正、此诗词曲，《谷风》怨而婉，此诗恧而婉，其旨微异耳。且其列叙事情，如首章幽约，次章私奔，三章自叹，四章被斥，五章反目，六章悲往，明是一本分出传奇，曲白关目悉备，如此丑事却费风人竭力描写，色色逼真，所谓化工，非画工也。今或从注说，谓必淫妇人自作乃能委悉如此，不知今古弃妇吟经曹子建辈锦心绣肠从旁揣摩，比妇人声口尤为酸楚，况抱布贸丝车来贿迁，分明是《出像会真记》，岂有妇人自供之理。
>
> 钟伯敬曰，子无良媒，滤之也，奔岂有媒乎。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亦谑之也，盖贸丝春时事也，此时已许之矣，故又谚之。古今男女狎昵，情词不甚相达，但口齿蕴藉，后人不解，遂认真耳。

这里所说道理似均极平常，却说得多么好，显得气象平易阔宽，我们如不想听深奥的文艺批评，只要找个有经验人略给指点，待我自己去领解，则此类解说当最为有益了。《诗筏》一卷凡二百则，亦即以此气象来谈古诗，自《十九首》以至明末。其自序云：

> 二十年前与友人论诗，退而书之，以为如涉之用筏也，故名曰《诗筏》。今取视之，几不知为谁人之语，盖予既已舍之矣。予既舍之，而欲人之用之，可乎？虽然，予固望人之舍也，苟能舍之，斯能用之矣。深则厉，浅则揭，奚以筏为？河桥之鹊，渡则去焉，葛陂之龙，济则掷之，又奚以筏为？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所极，送君者自涯而返，君自此远矣。是为用筏耶，为舍筏耶，为不用之用不舍之舍耶？夫苟如是而后吾书可传也，亦可烧也。

卷中佳篇甚多，意见通达，倾向公安竟陵而能不偏执，极为难得。略举其数则如云：

> 不为应酬而作则神清，不为谄读而作则品贵，不为迫胁而作则气沉。

此虽似老生常谈，古今文人却没有几个人担当得起，上二是富贵不能淫，还有许多人做得到，下一是威武不能屈，便不大容易，况威武并不限于王难耶。又云：

> 公宴诗在酒肉场中露出酸馅本色，寒士得贵游残杯冷炙，感恩至此，殊为可笑，而满篇搬数他人富贵，尤见俗态。惟曹子建自露家风，而应瑒侍建章集诗末语不忘儆戒，颇为得体耳。大抵建安诸子稍有才调全无骨力，岂文举正平见杀后，文人垂首丧气，遂软媚取容至此，伤哉。
>
> 《巷伯》之卒章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节南山》之卒章曰，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是刺人者不讳其名也。《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烝民》之卒章日，吉甫作诵，其诗孔硕。是美人者不讳其名也。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毁不避怒，誉不求喜，今则为匿名谣帖，连名德政碑矣。偶触褊心则丑语丛生，唯恐其知，忽焉摇尾则谀词泉涌，唯恐其不知也。至于赠答应酬，无非溢词，庆问通赞，皆陈颂语，人心如此，安得有诗乎！

此后举储光羲《张谷田舍诗》杜子美《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二篇为例，以为唐人为之尚能自占地步，若在今人不知如何丑态矣，文繁不能备引。又有云：

凡诗可盗者，非盗者之罪而诲盗者之罪。若彭泽诗诸葛出师文，宁可盗乎？李杜韩欧集中亦难作贼，间有盗者，雅俗杂出，如茅屋补以铜雀瓦，破衲缀以葡萄锦，赃物现露易于捉败。先明七才子诸集，递相剽劫，乃盗窝耳。

徐文长七言古有李贺遗风，七言律虽近晚唐，然其佳者升少陵子瞻之堂，往往自露本色，唯五言律味短，而五言古欠蕴藉，集中诙语俊语学之每能误人，此其所病，然嘉隆间诗人毕竟推为独步。近日持论者贬剥文长几无馀地，盖薄其为诸生耳。谚云，进士好吟诗，信哉。

少陵不喜渊明诗，永叔不喜少陵诗，虽非定评，亦足见古人心眼各异，虽前辈大家不能强其所不好。贬己徇人，不顾所安，古人不为也。

近日吴中山歌挂枝儿语近风谣，无理有情，为近日真诗一线所存。如汉古诗云：容从北方来，欲到到交趾，远行无他货，惟有凤凰子。句似迂鄙，想极荒唐，而一种真朴之气，有张蔡诸人所不能道者。晋宋间子夜曲及清商曲亦尔，安知歌谣中遂无佳诗乎。每欲取吴讴入情者汇为风雅别调，想知诗者不为河汉也。

这几节我觉得都很好，有他自己的见识与性情，虽本是诗话而实是随笔，并不讲某侍御某大令的履历，选录几首样本的诗，却只是就古今现成的资料来发展他的感想，这里自然以关于诗的为限，实在可以看出他对于生活的许多意思，这我以为是最有趣味的事。大约因为他是接近公安竟陵派的缘故吧，他关于山歌也有高明的意见，大有编选吴歌集之意，只可惜没有实行，这个光荣却给龙子犹得了去了。这一点长处，大约比较的顶容易为看官所承认，其馀的难免心眼有异，恐怕会被人看作偏激，不合潮流亦未可知，不过在我个人总以为然，觉得《诗筏》这一卷书是很值得破费工夫去一读的。《骚笺》我也喜欢，现在却不想谈，因为《楚辞》我实在有点生疏，将来还得好好的读了再来看这部书，那时才会得有话可说。

《激书》我读过几篇，这是该属于丙部而且又是杂学类的。长篇大论这一路文章我不大喜欢，总觉得难免文胜于物，弄得不好近于八大家，好也可以近《庄子》吧，可是谁都没有这把握。《激书》里有些意思与部分的文章却也有好的，如《四库提要》所说的证以近事，或举古事易其姓名这一类，看了很好玩。《酌取》篇中维扬巨贾公子炊饭必用炼炭，本《太平广记》，已见《提要》。又《疑阳）篇叙贵州少年人鬼国，被鬼巫用“送夜头”法送之登舟，原注亦云见《广记》中。《求己》篇述其友龙仲房访求王雪湖梅谱，乃得画眉之李四娘与话媒之官媒李娘，盖用近事而文甚诙谐。又《失我》篇引二事，其出典当在《笑府》中欤：

献贼掠禾阳时，禾阳之张翁假僧衲笠与之同匿。须臾贼至，踉跄相

失，疾呼僧不应，翁哭以为僧遇贼死矣。忽自视其衲笠皆僧物也，复大哭曰，僧则在是矣，我安在哉？

楚湘有竖善睡，其母命之登棚守瓜。盗夜尽窃其瓜，竖睡正酣，盗戏为竖剃发舁入僧寺。凌晨母见瓜竖皆失，踪迹至寺，竖尚鼾呼如雷，母怒痛挞之至醒。忽自寻其首无发，诉曰，失瓜者乃寺内沙弥，非我也。

这种作法，说得古可以上接孟子舆的月攘一鸡，说得今也就是张宗子的《夜航船》里和尚伸伸脚之类，要恭维或骂倒任凭自由，都有充足的口实可找，不佞别无所容心，但自己则颇喜此体，惜终是写得不能好耳。讲到意思，也有觉得可取的，如《汰甚》一篇，梅道人评云：

“天崇间举朝惯使满帆风，只图一时之快，遂受无穷之伤。贺子尝抱漆室之扰，故其文痛快如此，今读之犹追想其拊膺提笔时也。”文中主意不过是不为已甚，其言曰：“善治天下者无取乎有快心之事也，快心之事生而伤心之事起矣。”此意亦自平常，但绝不易实行，况在天崇间乎，言者之心甚深又甚苦，然而毫无用处，则又是必然也。

二十世纪的人听到天崇间事不禁瞿然，不知为何。陈言更复何用，徒乱人意，故可不必再引，不佞今日所谈似可始终以诗为限，故遂题曰“贺贻孙论诗”云。

（廿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北平记）

〔附记〕见书目有“吴兴丛书”本《诗筏》一册，吴大受著，以为偶同书名耳，今日有书贾携来，便一翻阅，则内容全同，不禁哑然。查卷末附传，大受为吴景旭曾孙，卒于乾隆十八年，年六十九，计当生于康熙二十四年。《诗筏》中云：“余于兵燹后借得唐人残编一帙，其中可笑诗甚多”，当然系指甲申后事，非吴氏所及见。又末一则云：“以此二诗糊名邮送万茂先，定其甲乙。”案万茂先著《诗经偶笺》在崇祯癸酉，尚在吴氏诞生前五十二年，二人恐无相见的可能。况贺氏《诗筏》固自存在，不知何以错误。刘刊本卷首题吴大受删订，或者原来只是抄录贺书，（却亦并未有删订，但缺一小引耳。）后人不察以为即其所著，也未可料。名字虽然错乱，但《诗筏》有了新刻本，于读者不无便利，只须知道这是水田居而非南山堂就好了。（七月十六日记于北平之苦住庵）

□1937 年 7 月刊《宇宙风》45 期，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后淡》

俞理初的诙谐

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女》一篇云：

《白虎通》云：女，如也，从如人也。《释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嫮。嫮，忤也，始生时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时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广记》《长恨歌传》云：天宝时人歌曰，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悲酸。则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台新咏》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生女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避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低头私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心乖甚水火，有戾集其身。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一见，一绝逾参辰。此谚所谓姑恶千辛，夫嫌万苦者也。《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亦贵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妇人苦》诗云：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其言尤蔼然。《庄子·天道篇》云；尧告舜曰，吾不虐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书·梓材》：成王谓康叔，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此圣人言也。《天方典礼》引谟罕墨特云：妻暨仆，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盖持世之人未有不计及此者。

俞君不是文人，但是我读了上文，觉得这在意思及文章上都很完善，实在是一篇上乘的文字，我虽然想学写文章，至今还不能写出能像这样的一篇来，自己觉得惭愧，却也受到一种激励。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馀卷，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悃愊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如俞理初的《癸巳存稿》，郝兰皋的《晒书堂笔录》是也。讲到学问与诗文，清初的顾亭林与王渔洋总要算是一个人物了，可是读他们的笔记，便觉得可取的地方没有如预料的那么多。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却是必要的，因此无论别的成绩如何，在这方面就难免很差了。这一点小事情却含有大意义，盖这里不但指示出看笔记的途径，同时也教了我写文章的方法也。

俞理初生于乾嘉时，《存稿》成于癸巳，距今已逾百年矣，而其见识乃极明达，甚可佩服，特别是能尊重人权，对于两性问题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论，葵子民先生在《年谱》序中曾列举数例，加以赞扬，如上文所引亦是好例之一也。但是我读《存稿》，觉得另有一种特色，即是议论公平而文章乃多滑稽趣味，这也是很难得的事。戴醇士著《习苦斋笔记》有一则云：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南北东西，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

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这是很有价值的一种记录，从日常言行一小节上可以使人得到好资料，去了解他文字思想上的有些特殊问题。《存稿》卷三《鲁二女》一篇中说《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公羊谷梁二家释为淫通，据《左传》反驳之，评云：“季姬盖老矣，遭家不造，为古贵妇人之失势者，不料汉人恕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又云：“听女淫佚，则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帅师，非君命不书，非告庙不书，淫佚有何喜庆，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瞽儒秽言无一可通者。”又卷三《书难字后》有一节云：

《说文》，亡从入从└，为有亡，亦为亡失。唐人《语林》云：有亡之亡一点一画一乙，亡失之亡中有人，观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二怪字，欲令人观之。

又关于欸乃二字云：“《冷斋夜话》引洪驹父言欸乃音奥，可为怪叹，反讥世人分欸乃为两字。此洪识难字诚多矣，然不似读书人也。”又有云：“又短书言宋乩神示古忠恕乃一笔书，退检古名帖，忠恕草书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谬，乩神亦荒谬也。”又卷四《师道正义》中云：

《枫窗小牍》言：宋仁宗时开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为其父母所讼，为抵死。此则非人所为。师本以利，诚不爱钱，即谢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损，乃苦守聚徒取钱本意而致出钱幼童于死，此其昧良尤不可留于人世也。

又云“《东京梦华录》云：市学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敛诸生钱作会，诸生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此固生财之道，近人情也。卷十一《芭蕉》一文中谓南方雪中实有芭蕉，王维山中亦当有之，对于诸家评摩诘画乃神悟不在形迹诸说深不以为然，评曰：“世间此种言语，誉西施之颦耳，西施是日适不曾颦也。”卷十四《古本大学石刻记》中云：

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从《礼记》写出《大学》本文，其识甚高。时有张夏者辑《闽洛渊源录》，反极诋守仁倒置经文，盖张夏言道学，不暇料检五经，又所传陈澔《礼记》中无《大学》，疑是守仁伪造。然朱子章句见在，为朱学者多以朱墨涂其章句之语。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览朱子章句，致不知有旧本，可云奇怪。

后说及丰坊伪作石经本《大学》，周从龙作《遵古编》附和之，语多谬妄，评云：“此数人者慷慨下笔，殆有异人之禀。”又《愚儒莠书》中引宋人所记不近情理事以为不当有，但因古有类似传说，因仿以为书，不自知其愚也。篇末总结云：“著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可谓穷形极相。古今来此类层出不尽，惜无人为一一指出，良由常人难得之故。盖常人者无特别希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识，即是向来所为谓人情物理，寻常对于一切事物就只公平的看去，所见故较为平正真切，但因此亦遂与大多数的意思相左，有时也有反被称为怪人的可能，如汉孔文举明李宏甫皆是，俞君正是倖而免耳。

中国贤哲提倡中庸之道，现在想起来实在也很有道理，盖在中国最缺少的大约就是这个，一般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点异人之禀，喜欢高谈阔论，讲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话，宁过无不及，此莠书之所以多也。如平常的人，有常识与趣味，知道凡不合情理的事既非真实，亦不美善，不肯附和，或更辞而辟之，则更大有益世道人心矣。俞理初可以算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常人了，不

客气的驳正俗说，而又多以诙谐的态度出之，这最使我佩服，只可惜上下三百年此种人不可多得，深恐只手不能满也。

□1937 年 9 月刊《中国文艺》1 期，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后谈》

水田居存诗

贺贻孙《水田居存诗》三卷，凡诗七百首，词四十四首，其友人李陈玉所选，有序，即梅道人也，卷首题同治庚午年新镌，似以前并未有刊本。卷二七律二首，题曰“戊戌僧装诗”，注云，“有序未录”。平景孙《国朝文薮》题辞卷一《水田居文集》项下云：“顺治丁酉巡按笪江上欲以布衣荐，遂改僧服。”诗序即说此事，惜不传。《僧装诗》第一首中一联云：

问猎应高灵隐坐，谈诗又喜浙江潮。

用骆宾王事。第二首中云：

佛汗几回增涕泣，经声一半是离骚。

洛阳平等寺佛汗雨兆尔朱之祸，盖不仅寻常离乱之感。这里令人想起同时的陈章侯来。《宝纶堂集》中有五古一首，题曰：

“丙戌夏悔逃命山谷多猿鸟处，便剃发披缁，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闻我予安道兄能为僧于秀峰猿鸟路穷处，寻之不可得，丁亥见于商道安珠园，书以识怀。”情事相似，唯早十二年而已。毛西河有报周栎园书，述章侯遗事，有云：

“又一诗期以某时过敝里，而以年暮故畏死先期来，其中云，老迟五十二年人。老迟者以甲申后更其名悔迟，故称老迟，非老莲之误也。”沈西雍《匏庐诗话》卷中乃有一则云：

“唐刘驾弃妇词云，昨日惜红颜，今日畏老迟。老迟云者，谓垂老而迟暮也，陈章侯自号老迟，当取诸此。”此说未妥，《宇宙风》题作《贺贻孙村谣》。悔迟乃明遗民的口气，与迟暮意不同，盖陈章侯贺子翼方密之屈翁山等人的出家都是同一的意思，章侯序中所谓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也。

《水田居诗》卷二又有七律十二首存八，题曰《戏和梅道人歌馆惜艳诗》，有序云：

> 艳思已枯，绮语长断，然陶赋闲情，何损白璧，宋说好色，乃见微词。金陵婉娘歌馆翘盼，以身奉人，道人惜之，偶尔赋赠，寄托规讽，别有指陈，索余次韵，遂尔效颦。言外索之，方知道人与余所咏者实非妇人也。

题序殊佳，唯不知此辈为何如人，岂亦牧斋梅村之流亚欤。诗亦有妙句，如云：

每恨情多到妾少，翻因夜短梦君长。

*

偷筹有意嗔宜怒，掩袖无声笑近徘。

*

单思一枕游仙梦，许嫁千番捣鬼词。

原注云：捣鬼谓诳词，单思谓痴想，皆娼家方语。案《开卷一笑》卷二有《金陵六院市语》一篇，此注可为补遗也。诸诗妙在只是歌馆惜艳，仿佛所咏者实只是妇人，别有讽刺的地方不大明瞭，我想这或者正是诗人用意处，盖惜妇人入歌馆原来只是贼出关门，若在其前还有点希望以后就只好描写以身奉人的境况，说以寄规讽可，说以寄惆怅更可也。对于非妇人的委身歌馆也只同样的措词，不更作严刻的谴责，岂必由于诗人之温柔敦厚，殆亦以此为最好的作法耳。

---

① 《宇宙风》题作《贺贻孙村谣》。

卷三中有《村谣》，三十二首存二十八，写民间疾苦，别出一种手法。有序云：

赤魆方殷，白额尤横，僻邑小民，何辜于天。不可咏也，伊可怀也。

陈章侯有《避乱诗》一百五十三首，其《作饭行》自叙有云：

山中日波波三顿，鬻图画之指腕为痛焉，儿子犹悲思一顿饭，悲声时出户庭，予闻之凄然若为不闻也者。商絅思闻之以米见饷，此毋望之福也，犹不与儿子共享毋望之福哉，乃作一顿饭，儿子便欢喜踊跃，歌声亦时出户庭。今小民苦官兵淫杀有日矣，犹不感半古之事功否。感赋。

诗末有二联云：

鲁国越官吏，江上逍遥师。

避敌甚喂虎，篦民若养狸。

其词可谓严厉矣，所指却是明之义师，而出诸遗民之口，其事大可哀，若《村谣》中乃是记清之文武官吏虐民的事，情形不同，口气亦遂有异，今抄录数首于下：

其八：

保甲输钱役未宁，社仓旧籍索逃丁，

奸胥倚杖先贤法，枉被穷檐骂考亭。

其九：

襁负相牵避远村，饥烟冉冉出柴门。

桃源复苦桑麻税，何处仙家不断魂。

其十：

邻翁窜去又三年，空室长肩鸟乱喧。

废圃无人邀我醉，桃花独自饱春烟。

其十二：

紫柰青梨税入城，名园斫遍为朱樱。

官府不容栽果树，儿童何处打流莺。其十四：

官司虽苛怨无言，但怨先人旧业存。

羡杀东家家破后，催租夜半不惊魂。

其十七：

令箭频来小户诃，沿门遍发长官龃。

村儿不识将军贵，但怪虎牌斩字多。

原注云：营将贩盐，和沙发卖。

其十八：

役重偏愁有此身，今生髓竭莫辞贫，

鬻儿权作斯须喜，明日朝餐省一人。

其二十五：

十年野哭迭相赓，鬼啸悲凄尚有情。

今日死亡都惯见，行人无泪鬼吞声。

其二十六：

杨枝入户晓烟迷，绿向前村一树低，

犬吠烟中挨牒到，邻鸡飞上树头啼。

原注云：上官差兵挨查异色。

其二十七：

羽流缁客走如僵，搜索惊啼恐夕阳，

小尹青牛留不住，普贤白象亦踉跄。

原注云：僧道亦以挨查逃去。

以上共抄了十首，以诗论不必尽佳，只取其诗中有史耳，且语多诙诡，正其特异处，二十八首中尽有语平正而意悲怆者，读之反不见佳，盖由说得容易太尽之故欤，略举一二例如下：

其二十二：

娇妻嫁去抵官银，临别牵裾吏尚嗔，

夜梦都忘身在械，枕边犹唤旧时人。

其二十四：

催赋健儿势绝伦，儒冠溺后拭红裙，

山歌联唱杯联饮，脂粉含羞不忍闻。

将这两首诗读过一遍，觉得他的力量总不及前面的十首，为什么缘故虽然我不知道，但这却是事实。这十首差不多全是打油诗，论理应该为文坛所不齿，一边的正宗嫌他欠高雅，不能载道，又一边的正宗恨他太幽默，不能革命，其实据我看来却是最有力，至少读过了在心上搁下一点什么东西，未必叫他立刻痛哭流涕，却叫他要想。拍桌跳骂，力竭声嘶，这本是很痛快的，但痛快就是满足，有如暑天发闷瘀，背上乱扭一番，无论扭出一个王八或是八卦，病就轻松，闷着的时候最是难过，而悲惨事的滑稽写法正是要使人闷使人难过。假如文章的力量在于煽动，那么我觉得这种东西总是颇有力量的吧。从前读显克微支的小说，其《炭画》与《得胜的巴耳德克》两篇都是用这方法写的，使我读了很受感动，至今三十馀年还是不曾忘记。这回看水田居的诗得见那几首村谣，很是佩服，这一半固然由于著者的见识，一半也因为是明末清初在公安竟陵之后，否则亦未必可能也。

贺子翼在《诗筏》卷上有一则云：

看诗当设身处地，方见其佳。王仲宣《七哀》诗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昔视之平平耳，及身历乱离，所闻所见殆有甚焉，披卷及此，始觉酸鼻。此是好一则诗话，却也可应用在他自己的诗上。我不知现今的人看了他这些诗，稍觉得酸鼻乎，抑以为平平乎。我个人的意见不足贡献，还是要请看客各自理会耳。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六日，于北平苦茶庵）

□1937 年 10 月刊《宇宙风》48 期，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后谈》

读大学中庸

近日想看《礼记》，因取郝兰皋笺本读之，取其简洁明了也。读《大学》《中庸》各一过，乃不觉惊异。文句甚顺口，而意义皆如初会面，一也。意义还是难懂，懂得的地方都是些格言，二也。《中庸》简直是玄学，不佞盖犹未能全了物理，何况物理后学乎。《大学》稍可解，却亦无甚用处，平常人看看想要得点受用，不如《论语》多矣。不知世间何以如彼珍重，殊可惊异，此其三也。

从前书房里念书，真亏得小孩们记得住这些。不佞读“下中”时是十二岁了，愚钝可想，却也背诵过来，反复思之，所以能成诵者，岂不正以其不可解故耶。（三月五日）

□1938 年 6 月 24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绍兴十八年　　同年录止后

石公搜集古今年谱，得《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抄本，携以相示。余告石公海王村书肆尚有乾隆活字本，遂又取来，乃是郎园藏本，首有题识。是录以第五甲有朱晦庵名，故流传至今，唯余观录中列举诸人小名小字，此种资料更是珍重，陈解元辑《古贤小字录》，自汉迄宋，才得二百，今此一卷中便有三百三十人，甚可喜也。此书今归龙川厉君，以余有前记因缘，属题数语，因漫书其事，以为纪念。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灯下）

□1938 年 6 月 24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东山谈苑

《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余澹心记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书八卷，以余观之，总无出此一条之右者矣。尝怪《世说新语》后所记何以率多陈腐，或歪曲远于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马树犹如此之语，难得一见。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灯下记于苦茶庵西厢。

□1938 年 6 月 24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经律异相

阅梁宝唱编《经律异相》，卷四十八“禽畜生部十”，“千秋”条下引《婆须蜜经》第八卷云，”千秋人面鸟身，生子还害其母，复学得罗汉果，畜生无有是智及有尊卑想，不受五逆罪。”中国旧说，鸟兽中之不孝者有枭与破镜，破镜不知是何物，枭则世间多有，只会吞吃小鸟及老鼠等，不能食他鸟也，而久蒙食母之恶名，千秋人面鸟身，岂亦其同类耶。印度事情不能知悉，惟其体察物情，开遮合理，先贤博大之精神可想也。中国儒生严于人禽之辨，而此等处又缠夹不清，有愧和尚们多矣。（三月九日晨记）

□1938 年 6 月 29 日刊《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柳崖外编

徐昆后山著《柳崖外编》十六卷，笔意学聊斋，世又传其为蒲留仙后身，论其位置，大抵也就是如此。卷十五《断肠草》一则，辨证名物，别有意思，案语第二节中，辩《兼明书》谓蔓菁即萝菔之非，有云：

> 如黄鸟亦名仓庚，亦名黄鸧，《诗经》屡见，而乡人不作如此呼也。余少年初到家乡，时春日双桐斋畔黄鸟■晥可听，而乡人呼之日黄瓜娄，盖即黄栗留之转讹，若非羽毛声音显然可辨，又乌知黄瓜娄之即黄鸟也。世儒泥于章句，不暇向老农老圃细细商榷，妄逞臆说，未有不如《齐民要术》及《兼明书》之自以为是者。

此数语说尽笺注虫鱼之通病，只郝兰皋一人或可称例外耳。现代博物学家可以有兴趣来提倡古文，却无意于考订文史上的名物，此是别一种鄙陋，而其病源则一也。博雅之士，才真能使学术与艺文接触，中国到何时始有此希望，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思之怅然。

□1938 年 6 月 29 日刊《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云仙散录

《云仙散录》三百馀条，一读即可知是冯氏所自造，大抵爱华丽纤巧，与陶穀之《清异录》鼻息相通也。援引虽不足凭信，后世即据此为故实，通用至今者亦复不少。卷中三出渊明列传，所写却都不似，犹不如《庐阜杂记》所说攒眉一事，能具陶公面目。其记孟浩然的两节，如苦吟至眉毫尽落，又看视鱼竹，均颇有可喜处，虽然竹有几节，鱼有几鳞，不佞亦是不知，本来笑不得孟君也。（三月廿一日）

□1938 年 6 月 29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题藤阴杂记

戴蒲塘《藤阴杂记》十二卷，清末有重刊本。数年前曾求得其原刻，自序署嘉庆丙辰，题叶只写书名，不记年岁。近日又得一部，则左右有字两行云，嘉庆庚申增辑，石鼓斋镌。校阅本文，计卷一末多一则，卷八多两则，卷十二多一则，原板补刻者也。昔尝与饼斋戏语，模拟书中所记，大抵如云，朱竹垞迁居至南横街，中途覆车，损一书箧。惟事虽琐屑，亦复有可喜处，只可惜诗多而记事少耳。

（四月十三日烛下记于北平知堂）

重刊板现存湖州会馆，民国初年有董君新印若干以赠人，寒斋因亦有其一部。董君时为部吏不得意，一日访乡先达于积趾步斋，大发牢骚，意欲蹈海。先达倾听良久，徐答曰，我看可以慢慢的来。本系方言，难以记录得恰好，惟此应答极有意思，前辈风度俨然如见，可以收入民国的《世说》中去。因《藤阴杂记》辄复忆及，附记于此，亦复可备吴兴掌故之一也。（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1938 年 7 月 2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孔子集语

孙星衍辑《孔子集语》卷二，据《太平御览》四百八十二引师觉授《孝子传》云：

>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卫，赴蒯聩之乱，卫人狐黶时守门，杀子路。子崔既长，告孔子欲报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备，须后日于城西决战。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而与子崔战而死。

此文重在记子崔之孝，但是我们看过去留在眼里的，却是狐黶。此等人盖是周时所特有，如《孟子》里的庾公之斯，《檀弓》里的工尹商阳，武士而有儒雅气，殆是儒家理想的传说英雄，与《史记》刺客列传中人气味又不相同也。传说中的人物与事件，未必实有，但于此可以见造作者的心情愿望，亦是有趣味的事。我所以喜欢此故事者，盖亦为此故耳。

（甘七年四月十四日）

□1938 年 7 月 2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题乡言解颐

《乡言解颐》五卷，十年前在孔德学校见书估挟此书，隅卿谓尚可看，劝以薄值收得。内有缺叶，去年夏从石君借得一本，抄补卷末所缺两纸，卷三则仍缺一叶也。书中不出撰人姓名，惟自序称瓮斋老人，据本文知其姓李，宝坻人，号朴园而已。前日在南新华街得《虚受斋诗抄》十二卷，附《朴园感旧诗》一卷，宝坻李光庭著，乃知即是此人。《乡言》中之造室十事（庚子），消寒十二事之八（己丑），新年十事（丁亥），杂物十事（己亥），金银钱三事（戊戌），各诗均见集中，注有年岁。诗抄止于庚子，《乡言》题署庚戌，盖又十年后矣。朴园诗虽卷卷有张南山批点题咏，以余观之，其可喜终不及《乡言》，而《乡言》中之记述注解亦比所收韵语为可贵。余喜得诗抄，因其为瓮斋之作，实犹屋上之乌鸟耳。《乡言》在隆福寺街又陆续得二部，卷三缺叶如故，殆真是板缺，无可如何，至今亦未能借得全本抄补之也。（四月二十六日）

□1938 年 7 月 2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题十种古逸书

三十年前曾有《茆氏十种》一部，竹纸旧印，心甚喜之，惜久已失去，欲再买，终因循未果。前日有书估携此一部来，白纸而书品不佳，以价不昂，乃收得之。辑录古书，本多可喜，惟余所惓惓于此书者，殆有故友之思，如《毛诗品物图考》类耶。十种中觉得最有意思者是《古孝子传》，因其收罗特备，便于观览，原本文章质朴，态度真率，无论记何事都不失静穆之气，所以可取也。尝欲取《列女传》《孝子传》以至《东山谈苑》，以意点定之，亦可消遣，只可惜中选者恐不能多，未免扫兴，以是迟迟耳。

（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顷又得一部竹纸印者，有“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珍藏”印，板心较高大，当是原刊本。此翻刻不知系何时所刊，苟非得别本比较，一时亦不易看出。首叶序文第九行，原文云，所赖于后来者，今误赖为颖，此或是一种后刻之证明欤。

（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再记）

□1938 年 7 月 2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题莛圃藏书题识续录

此《续录》两册价奇昂，在此时尚有人刻木板印连史纸，已属难得，价昂可原谅也。惟其纸乃横折，触手即知，余最所不喜。能刻书而不知用纸，何耶？

（五月三日记于北平）

□1938 年 7 月 2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解脱集

袁中郎与江进之书云：

越行诸记描写得甚好，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居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把似如今假事作文章人看，当极其嗔怪，若兄决定绝倒也。

此语殊不虚，但如《鉴湖》一篇中所言，亦有失之颠处。要知此不必一定是解脱，盖颠狂也会有谱，反而不解脱也。前半说贺家池实佳，其夸石篑语则真大大的落了套矣。大家却亦笑不得中郎，只可默识之以自镜耳。

诗不敢说，贺家池诗中自称袁阿宏，诗文中又常提及阿宾，偶尔见之亦觉得有风致。中郎殁后，小修为订定全集，乃于其《西湖一》中改去觅阿宾旧住僧房一句，此等处均颇有情趣，思之亦复可笑可喜也。（五月八日晨书于旧苦雨斋东窗下）

□1938 年 7 月 2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眉山诗案广证

《眉山诗案广证》卷六附载中，录东坡祭黄州太守徐君猷文，张秋水案语中有一节云：

> 君猷后房甚盛，东坡“常闻堂上丝竹”词中，谓“表德原来是胜之”者，所最宠也。东坡北归，过南都，则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开宴，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

余读之颇有感，东坡之不能忘君猷，与胜之之不记得，岂不皆宜哉。又见《东坡事类》卷十二引《宋稗类抄》云：

> 王定国岭外归，出歌者劝东坡酒，歌儿日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丽，家世住京师。坡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此言甚柔和，却是极悲凉。嗟乎！此正与胜之大笑相表里也。吾不解儒者何以不能懂得此意，不佞非学佛人，于此稍有知识，盖亦半从儒出者耳。审如是，则儒之衰久矣，吾辈乃得其坠绪而维系之者也。此语奇矣，我却相信是不错的，但知者自知，若勉强告示，犹如嚼饭哺人，或敲头劝学，殆无用处也。

（二十七年五月一日，知堂记）

□1938 年 7 月 6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养和轩随笔

陈伯雨著《养和轩随笔》云

纪文达公《阅微草堂笔记》云，蟹受汤镬之苦比他物为甚，未尝不触君子远庖厨之心。及阅俞曲园《茶香室丛抄》，引骈藻道人《姜露庵杂记》云，蟹生而母死，争食其肉，水族之枭也，则老饕之嗜可援以自解矣。

案骈藻道人即吾乡施山，著有《通雅堂诗抄》十二卷，其《杂记》六卷有申报馆印本，后又有家刻木板本，在说部中尚非下乘，而卷二说蟹及鳢乃极可笑。越中老年人食湖蟹，尚须备木墩铁椎，用以敲壳，不知小蟹如何得食，此即不合物理；若其谈及虫鱼的伦常，不能如印度大师之明智，却尚在其次耳。关于鳢鱼则云，鳢生而母盲，以身饲母，水族之乌也。如既已以身饲母，世间便无有小鳢矣；且渔人常捕乌鳞鱼，货之于市，亦未尝见有盲者。施寿伯当是居于直乐施一带的水乡人，对于水族之事似殊不甚了了，亦可异也。（五月二十一日）

□1938 年 7 月 6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陶庐五忆

金武祥著《陶庐五忆》有“踏青更带小鸡钱”之句，注云：

昔人诗云，杖头闲挂百钱游。吾乡则有‘踏青须带小鸡钱”之谚，盖暮春田家伏卵哺雏，巷陌皆满，举步偶一不慎，致伤微禽，或须给钱以偿之耳。

沈同芳评乃云，“小鸡钱亦曰小饥钱，谓携钱购食以充饥也。”案金注自是事实，江浙情形相去不远，读之如见春日长闲光景，住民以门前为其院落，鸡豚游行自在，固与石板地改为马路后迥不同耳。沈评盖后起附会之说，小饥钱固嫌不词，且如此说便索然无味，真是点金成铁手也。注解家好出奇制胜，往往如此，鸡尸牛从，即其好例。但天下佳妙事又多在寻常中，若懂得这一点，则读书作文当可以无大过矣。

（五月甘三日漫记）

□1938 年 7 月 6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题阮庵笔记

廿七年戊寅端午前三日，隆福寺书估携此书来，乃收得之。在此时尚买闲书，奇矣，但不看书又将如何？

《阮庵笔记》素所喜爱，惜《餐樱庑随笔》等尚未收入耳。好奇处第一是不记怪异，谈报应。谈报应是明清文人一大毛病，虽阮伯元亦不能免，但如一染此病，百事便都不足观矣。

《蕙风簃二笔》卷二注云，余撰笔记，雅不喜撮抄近人词诗，惟于乡邦文献，则未忍概从弃置。此意亦可喜。而其文笔朴实，风趣闲雅，自有胜地，近代著作中少见其匹。粟香室亦有五笔，而持与比校，显有上下床之别，此中固自有确实可据者在也。

五月三十一日晨风雨晦冥中，坐旧苦雨斋东窗下记。庭院中水已没阶，有巨蛙鸣声出自草里，忽断忽续也。

□1938 年 7 月 6 日刊《北平晨报》，暑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泊宅编

《泊宅编》卷上有一则云：

宗泽，婺州农家子，登进士科，任馆陶尉，凡获逃军即杀之，邑境为之无盗。时吕大资惠卿帅大名，闻其举职，因召与语，仍荐之，且诫曰，此虽警盗贼之一策，恨子未阅佛书，人命难得，安可轻杀，况国有常刑乎。泽靖康中为副元帅，后尹开封卒。

《四库提要》乃议之曰，至宗泽乃其乡里，而徽宗时功名未盛，故勺颇讥其好杀，则是非未必尽允。案原文明系泽做了副元帅开封府尹后所说的话，而《提要》乃以为在其功名未盛时，故施轻诋，可笑甚矣，此无他，亦只是要统制思想耳。宗岳诸公既奉为偶像，便不能再说，即记其从前好杀好掠，亦是是非未允了。这里更有感触的，乃是胜残止杀还得求之于佛书，读圣贤书，登进士科，而尚不能知人命之重，念之郁郁不快者久之。（六月八日记）

□1938 年 7 月 15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记海瑞印文

偶读《论印绝句》，查药师诗有注云

海忠介公印，以泥为之，略锻以火，文日司风化之官。观之觉忠介严气正性，肃然于前。见周栎园《印人传》。

余平日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此辈实即是酷吏，而因缘以为名，可畏更甚。观印语，其肺肝如见，我不知道风化如何司，岂不将如戴东原所云以理杀人乎。姚叔祥《见只编》卷上云：

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周栎园《书影》卷九所记与此同。余读之而毛戴。海瑞不足责矣，独不知后世啧啧称道之者何心，若律以自然之道，殆皆虎豹不若者也。（六月八日，知堂书）

□1938 年 7 月 15 日刊《北平晨报》，暑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白石诗词题记

《白石诗词集》，寒斋有四印斋王氏，榆园许氏，野水闲鸥馆倪氏，涵芬楼影印陆氏各本，同出一源。此外有一本，诗词各止一卷，末有跋，署康熙甲午秋禊日玉几山人陈撰书。同时别得一本，原板后印，前有序署雍正丁未四月，歙陔华洪正治书，陈跋末康熙甲午云云十四字，则改刻为：

陔华先生服奇道古，雅喜是编，爱为开雕，冀垂永久，盖其表章之功匪细也。丁未清和，钱塘陈撰玉几书。

盖陈本系原刊，其后十数年板归洪氏，乃改窜旧跋，未免可笑。其实玉几山人与陔华先生实在有何情分，亦尚不可知也。洪氏刊有《证人堂人谱》二册，甚精好，序署雍正丙午，正是前一年事，而白石诗词乃如此苟且，奇矣。况周仪《香东漫笔》卷一，列记所藏白石集，有歙洪正治本，无陈撰名字，四印斋榆园各刻亦只举洪本，然则悉未曾见玉几山人原本耶。此一册有康熙甲午跋者，虽经裁截改订，书品不佳，盖亦难得而可宝矣。

（六月十五日）

□1938 年 7 月 15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关于南浦秋波录

得《南浦秋波录》抄本四册，分为纪由、宅里记、习俗记、岁时记、琐事记、纪人各篇，文笔既佳，亦颇有见解，在此类书中不可多得。题曰华胥大夫著，谢枚如在《赌棋山庄诗集》中有《〈南浦秋波录〉题后》六首，自注云，是录张亨甫所著，盖述台江冶游之事。亨甫又著有《金台残泪记》三卷，今收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一辑中，据我看去殊不及《秋波录》，盖文情实不足，不尽由于鄙人恶男倡之偏见也。《秋波录》所记习俗琐事多可备考究，文字简洁，又殊有见地，如“习俗记”中所云：

> 诸姬皆不缠足。（原注云，案缠足或以为始于六朝，始于中唐，始于齐东昏，始于李后主，其说不一，然前明被选入宫之女尚解去足纨，别作宫样，可知不缠足原雅装也。）所穿屧，墙纵不过四寸，横不过二寸，底高不过二寸，长不过三寸，前斜后削，行袅娜以自媚，视燕齐吴越缠而不纤，饰为假脚者，觉美观矣。

尝阅崔东壁《读风偶识》，见卷二“伯兮”章下有云：

> 古之妇女膏沐而已，膏沐以为夫容而已。秦汉以来始有脂粉，唐人尤以为重，宋元之际加以缠足，而天真几不复存矣。

一谈冶游，一讲经学，而此处意见甚相似，觉得很有意思。谢在杭著《文海披沙》卷五有“缠足”一条，末有云：

> 乐天但言跌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笋，谢灵运素足之妇而不及短足之姝，即东昏玉奴步生莲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缠实佳。

张亨甫对于谢君的话盖亦多佩服，在“琐事记”中曾屡次称引，末一节云：

> 谢在杭又云，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以来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于游人歌伎哉，六朝以声乐亡，而东汉以节义，宋人以理学，亦卒归于亡耳。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足妆染太平，良胜悲苦呻吟之声也。

案原文见《五杂组》卷三地部一，在正经人看了或者以为不足为训，我却喜其平易近人情，胜于假道学，虽然歌伎的制度本来也不是我所赞成的。《赌棋山庄词话》卷六云：

> 去省会南门十里，地曰洲边、湾里，皆水阁诸姬所居，详张亨甫《南浦秋波录》。……道光辛巳洲边灾时，太守王君楚常禁人扑救，延烧殆尽，后虽屡有兴作，而壮丽终逊从前，非必严禁知敛迹，盖亦一时财力之不及。吾友张任如仁恬尝言，神而五帝则人无不媚之者，人而娼妓则人无弗溺之者，故二处为销金巨壑，至五帝叹寂寞，娼妓多贫窭，则民穷财殚可知矣。乙曰予游连江，填《金缕曲》寄芭川，中云：
>
> 官府催租声不断，
> 误几家红粉飘零死，
> 乐游曲，犹佳耳。
>
> 盖亦本此意也。嗟乎，论治者亦知歌舞为太平之象哉！

这意思与上文相似，谢枚如盖亦知言者也。我们又因此得知太守王某的故事，此人必是道学家，故能有此断然处置，如俞理初所谓虐无告也。《秋波录》“琐事记”中又有一则云：

> 《唐才子传》，西域辛文房所撰，《四库全书》无完本，而日本固

有之，其于唐赵光远颇致讥词，以其作《北里志》故也。然光远此书能流传异代，远播绝域，视著书千万言一旦灰飞烟灭，幸而存者又徒供人覆酱瓿，则犹愈矣。

此言盖是作者为自己解嘲，道理却亦不错。——不过远播绝域一语稍有误解，西域人见到《北里志》恐亦还是在中国也。二书同是述青楼红粉之言，正如文房所说，但《秋波录》出于近代，所记琐屑事尤多，都是风俗史上的很好资料，我觉得更有意思。近来想稍收集关于冶游之书，而既不专精，又复吝啬，结果自然是不能大有所得，但就所有的书中看去，则此册要算是很好的一种了。此类书籍的蒐集保存责在图书馆，个人力量终是有限，寒斋收藏至今亦总不过二十馀种而已。

孙耀卿编《丛书目录拾遗》卷三云，《华胥大夫杂著》，建宁张际亮撰，光绪庚寅刊，其首二种即为《金台残泪记》与《南浦秋波录》，各三卷。高坐庵主人近从海王村得《秋波录》刊本，较抄本多人表数叶，又有自序，计百五十字，末署太岁庚寅送春日。案录中说及道光壬午后八年事，正是庚寅，乃道光十年，距刻书之年已甲子一周矣。（六月十九日记）

□1938 年 7 月 20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南阜山人诗集

幼时读《板桥诗抄》中绝句二十三首，乃于音五哥图清格之外记得有高西园。近阅鲍辛甫著《稗勺》，见有题曰《真雅文俗》，其文云：

紫幢王孙文昭厌交旗下人士，谓非真雅。高南阜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二君皆与余善。

觉得南阜山人洵是妙人，出诗集七卷读之，虽有可喜处，惜实不解诗，总无可说。不佞最善傅青主，可谓真雅，若南阜者当在次位。诗集卷二中有《儿童诗》《小娃诗》各四首，此类文字非俗士所能下笔也。

（廿七年七月十六日）

□1938 年 7 月 26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题四奇合璧

《四奇合璧》四卷，光绪八年刊，题花下解人编，卷首有三借庐主人序，称吾友慕真山人所作。案邹弢著《三借庐赘谈》卷四有俞吟香一则，中云：

君姓俞名达，自号慕真山人，中年累于情，余以惜玉怜香才人常事，未敢深惩其失也。比来扬州梦醒，志在山林，而尘绁羁牵，遽难摆脱，甲申初夏遽以风疾亡，为之叹息不已。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等书，诗亦清雅不俗。

《申报》馆光绪四年间刊有《青楼梦》六十四回，亦是慕真山人著，有邹弢序文，而《赘谈》中并不说及。《四奇合璧》岂即《花间棒》耶，疑未能明。所谓四奇，乃是美谈、韵语、痴想、绮愁各一卷，盖是李笠翁《闲情偶寄》，张山来《幽梦影》之馀绪，而本来力弱，又是学步，遂愈见竭蹶，大有秀才岁考之概矣。光绪初吴下多才人，如王韬、蔡尔康、邹弢皆是，而一样才薄，此派盖已成弩末，亦是大势所趋也。书中自称《四奇合璧》，王廷学题字乃于其上加品花二字，其实本非谈冶游者，如时式说法，当云香艳小品耳。（七月十六日）

□1938 年 7 月 26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小柴桑喃喃录

陶石梁的声名虽然不及他老兄石簣的大，他的文集也未得见，但是我读所著《小柴桑喃喃录》二卷，却很觉得佩服。此书自序中云，“余年已望七。”其时为崇祯乙亥，在明亡前十年，阅历既多，忧深思远，而文笔朴实，令人想起《颜氏家训》来，每展卷不胜感叹。

卷上有一则云：

> 吾辈治家，于凡五谷果茹之类，皆须自为料理，至于下人偷窃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则可矣。慈湖先生曰，先君尝步至蔬圃，谓园丁曰，吾蔬每为人盗取，何计防之。园丁曰，须拼一分与盗者乃可。先君因欣然顾某曰，此园丁吾师也，作家者亦宜知此意。

语甚平淡，却不能轻轻看过去。不佞亦是附和陶君之一人，但是如此世间如此办法，究竟是好是坏，难道在中国儒与法竟不能用，惟黄老之术乃可耶。不佞虽曾思索，终未能明白也。（七月十六日）

去年得石梁集于杭州，名曰《赐曲园今是堂集》，现存诗十卷，词一卷。其后或当有文集，今无存。卷首有崇祯壬午刘念台序，称私谥文觉先生，已在石梁卒后。查诗集卷十最后为己卯，时年六十九，盖其卒年，因此可知其生于隆庆五年辛未，卒于崇祯十二年己卯也。目录首行下有长行朱文印曰，吕晚村家藏图书，真伪亦不可辨。（民国癸未九月廿四日秋分节记）

□1938 年 7 月 26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毛诗草木疏

唐子西《文录》云：

《诗疏》不可不阅，诗材最多，其载谚语如络纬鸣懒妇惊之类，尤宜入诗用。

《茶馀客话》卷十一云：

宣圣训学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予尝谓《尔雅》是一部好诗料，他如陆玑《诗草木疏》，刘杲《离骚草木疏》，王方庆《园庭草木疏》，李文饶《山居草木疏》，皆诗家之碎金也。

就作诗而言，这些话都不错，欲求诗料本来须得向自然里去找也。但是《诗疏》这书却实有可喜处，在此类古书中自当占第一位。刊本颇多，不佞最喜焦理堂所编本，毛子晋《广要》亦佳，则取其繁富耳，原刻本虽不难得，不佞以为青照堂重刊本更便，李时斋有眉评，亦时有佳语也。（七月廿二日雨后）

□1938 年 8 月 10 日刊《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舒艺室随笔

张文虎著《舒艺室随笔》六卷，考证经史文字，非不佞所甚解，但亦买得一部，盖贪其纸大而字清疏也。卷一关于《尔雅》有一则，却甚喜欢，文云：“蚬缢女，注，小黑虫赤头，喜自经死。案此虫当秋后作茧，吐丝自悬，非死也，久之乃化蛾蝶之类飞去，盖亦蚕之一类，然如蛅蠥尺蠖皆如此，不知何以独擅此名。蚬疑即■之异文，《六书故》引唐本《说文》云即茧字，是也。”郝懿行在《尔雅义疏》此条下云：“案今此虫吐丝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悬，而非真死，旧说殊未了也。《尔雅翼》云，有虫半寸以来，周围植丝以自裹，行则负以自随，亦化蛹其中，俗呼避债虫。罗愿说此于蛅蠥下。不知此乃蚬缢女也。”查《尔雅翼》卷二十四，“有虫半寸以来”六字原作“今石榴上复有一种，聚短梗半寸以来”，郝氏所引盖脱落“聚短梗”三字，故语意稍不明。此种虫小时候常看见，俗称袋皮虫，袋皮者麻编米袋也。小儿捕得之，辄迫之出袋以为游戏，并无上吊的联想，孙炎乃至谓此虫多民多缢死，则何耶。古人观察物情或多谬误，此亦不足怪，但后人往往因袭旧说，不知改正，乃为可笑耳。张君知道缢女非缢，与郝兰皋的意见相合，可谓难能矣。不佞考据非所知，但觉得即此一节已大可取，盖自然之考据在中国学士文人间最为希有可贵也。

（七月廿三日晨记）

□1938 年 8 月 10 日刊《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黄生义府

黄生著《义府》卷下《穷袴》一则云：

晋无名氏乐辞，爱惜加穷袴，防闲抚守宫。穷袴字出《汉书》上官后传，师古注，今之裩裆袴。穷袴守宫皆防闲之具，惟其爱惜，故加防闲也。又云，今日牛羊上丘陇，当年近前面发红。盖女子幼时情事尚带羞涩，至盛年则不复然，譬之丘陇牛羊所便，其进前唯恐不速矣。以其为上陇之牛羊，此穷袴守官之所以不能已也。

案世俗有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之说，或以之入请旌节母之文中，传为故实，黄生亦大有此意，其大胆处可喜也。大凡说太新奇，也就容易不能确立，如《诗》“采绿”云，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毛传云，妇人五日一御。大毛公说诗至此盖有邪心矣，无怪郑君之笺即已别立异说，后世可与之同意者其唯罗典乎。

（七月廿四日）

日前得罗典著《读诗管见》十四卷阅之，其中妙论虽甚多，“五日为期”乃解为昏期，詹同占，谓筮而詹其期之吉也，则其说亦不奇也。又闻江叔海说，“视尔如荍”罗氏以为比喻生支，今案亦不确，《管见》以荍为荞麦，谓其花秾丽而可爱，与朱晦庵之荆葵相差无几，唯罗氏谓子仲之子为丈夫子，《东门之枌》乃是男色之诗，则是其特见耳。

（八月一日又记）

近阅梁章矩著《试律丛话》，卷三举吴谷人“腐草为萤”诗三四句云，今宵萤熠熠，前度草离离，谓是逆挽法。又引纪晓岚说，李义山《马嵬》诗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亦用此格，最为跳脱。晋乐辞正其前例，所谓丘陇鄙意以为盖实是丘陇也。此是普通讲法，不辞迂阔，聊记于末。

（九月七日晨记于苦雨斋）

□1938 年 8 月 30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题谋野集删

《谋野集》尺牍本非上乘，读一二首可知其色味均不正，盖是秋水轩之先河，更益犷悍耳，而后世颇得虚名，岂即喜其火气耶。日本有覆刻本，题曰《谋野集删》，凡一卷，田子舒编，有江忠囿腾忠充二序，署享保乙卯，即清雍正十三年，距今已二百年矣。《晨风阁丛书甲集》有此书，乃朱衣点所选，析为二卷，尽去原序而自题记其上，愈见伧俗，铅字油光纸却尚其次也。王生之尺牍，本有如圣叹所说，何必删者也，而删之不已。不佞昔日搜集尺牍。苦《谋野集》太贵不能得以备数，乃得其删，及今日重看细想，其多事岂不相等乎。

（廿七年十月十五日）

□1938 年作，1944 年刊 ” 新民 ”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读带经堂诗话

余有《带经堂诗话》，原刻稍后印，系叶焕彬遗书，卷首有藏书印一方。王渔洋文笔颇佳，此书编集有法，便于翻读，余甚喜之，惟展卷常见有墨丁，盖剜除钱谦益名氏，《渔洋诗话》则改为圆圈，见之每为气闷。余非有厚于蒙叟，只觉得书册如此，有如歌女面黥陈诜字样，令见者不得过耳。著书刻书都是雅事，乃弄得如此乌烟瘴气，此正与避讳及改削同是人间丑事之一也。

（十一月三日夜漫书）

□1938 年作，1994 年刊 ” 新民 ”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读李氏见物

偶从估人得《见物》五卷二册，明李苏所撰，惜阴轩刊本也，万历辛巳吕坤序。书分叙禽兽鳞介昆虫，各系以论及赞，多借题发挥，不脱文人旧习。夫人诚宜以物为师，但此事要有眼光有胆力，通物理，顺人情，乃能有所见耳，鄙意此等处当有天分限之，不可强为也。李君论虽无谓，其所记叙却有可取处，又不信鹤鹊等以声交，果赢负子，腐草化萤火诸说，均颇有见识。其论蜉蝣曰，“朝生暮死，亦谓其微耳，谁适见之”，则殊有滑稽之趣矣。五卷书中以《虫物》一编为最佳，盖由易见故耶。

（十一月十四日晨书）

□1938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毛诗多识

偶阅《毛诗多识》，书面有旧日题记云

此书系十年前刻本，惟印本似不多，书估遂尔居奇，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从邃雅斋买得，价尤奇昂。

《毛诗多识》凡上下两卷，今刻为“求恕斋丛书”之一，有乙丑刘承干序，时为民国十四年也。序云多隆阿姓舒穆录氏，字文希，称其为乾嘉间经学名家，事迹则未详。案王棻友《蛾术编》卷下有致多雯溪先生书，注云先生名隆阿，书中即言《毛诗多识》事，王君谓书刻板后须卖之，而多以为不可，故致书重申此意。今据刘序似书终未刻，卷上有王棻友识语十数则，稍留痕迹而已。王书不著年月，以书中语考之，当为去乡宁县后所作，计其时在咸丰壬子夏后，去乾隆末年已五十七载矣，可知多隆阿乃是嘉道间人，盖与王棻友是同行辈人也。

□1939 年 1 月 12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紫幢轩诗

鲍冠亭《稗勺》中有《真雅文俗》一条云

紫幢王孙文昭厌交旗下人士，谓非真雅。高南阜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二君皆与余善。

《南阜山人诗集》昔年曾搜得一部，今在琉璃厂又得《紫幢轩诗》，但只三种四卷，仅有其全部七八分之一耳。卷首有题辞云

子晋为渔洋弟子，学有所自，故得卓然成家。是本有梧门私印，是奉选《熙朝雅正》时搜得之也，惜仅三种，非全集也，存之求是斋中，时时展卷耳。

下钤朱文印曰文淇读过。初疑是刘孟瞻，后查延清编《遗逸清音集》卷三收有文淇诗十七首，注云文淇高氏，汉军正白旗人，著有《求是斋诗草》，盖清末人，入民国尚存也。《紫幢轩诗》第一页下方有法梧门印三、文曰堂堂堂印，存素堂珍藏，诗龛居士存素堂图书印，皆朱文。诗题上时贴有红纸碎片书字作记，盖是入选之作，惟五七言律诗均标作五七言立，不写律字，岂是法梧门家讳耶。书刻印甚精，而时有误字，不知何故，如桥误槁，有两处均如此，其一且还是押韵处也。

紫幢轩诗美恶如何，非不佞所能说，但翻读此四卷书，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诗中时常说及街上叫卖东西的事。《槐次吟》中《暖屋》云，后巷黄昏人卖炭。《立冬夜昨》云，听卖街前辣菜声。《艾集》卷上《闻卖豆声》云，独轮车上小灯悬，则并写其状态。卷下《冬街夜归》云，素纸周糊芦菔担，过街似点上元灯。亦是此一类。《里门望雨》云，马乳蒲挑马牙枣，一声听卖上街初。《年夜》云，漏深车马各还家，通夜沿街卖爪子。《枕柝轩瞑坐》云，市声只隔寒烟外。以上所举，盖悉是市声也。有一诗题云：

枕柝轩中自巳至酉，书卷开阖，悉以市声为准，戏成一首。

有句云，小柝重过晚市油。案敲梆卖油至今尚然，用入诗中，不知芑婴居士而外尚有何人。又《连夕不饮》诗中有一联云，柝喧街下夜，火响炕封煤。此是打更的梆声，但总之似乎都喜欢听，故以枕柝名轩，若封火细事，却亦是北方生活的一点滴，亏得他收拾来放到诗里去。昔日读闲园鞠农之《一岁货声》，铁狮道人之《燕京岁时记》，心正喜之，其爱景光识名物之意有相同者，今在紫幢轩亦得见一斑，此数人者可谓不俗者矣。

□1939 年 1 月 23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西斋偶得

近日搜集蒙古博明著作，得西斋三种，计《西斋诗辑遗》三卷，《西斋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并嘉庆辛酉年刊，而书中宁字悉已剜改，盖是道光时所印也。博氏进士出身，而通晓蒙古满洲唐古忒诸国语，故所见自较广，与一般文人不同。《西斋偶得》卷一蒙古呼汉人一条曰：

蒙古呼汉人为契塔特，盖蒙古初为忙古部，越在大漠北，至后五代时始通中夏，惟时燕云十六州皆属契丹，故以辽国名称之。

又西洋呼中国一条云，“西洋呼中国为吉代，盖亦契丹之讹。”案此西洋当是指俄国，俄语称中国正云吉泰，今哈尔滨尚有吉代思卡耶街，据此知其源当出于蒙古语，瓦剌一条下说此本是唐古忒语之美称，明史误为专名，结论之曰，“故中国人不可与谈边外之事，中国之书生更不可与谈边外事也。”语虽不敬，却亦是事实，书生辈百口莫辩，大抵因为只读中国文，或者即通外国语亦只取便口给，未能利用到文章学问上来耳。

《西斋偶得》卷下佛书文字一条中，引王阮亭《居易录》，抄录董斯张《吹景集》所举佛典里中国古语，云当是内典偶合耶，抑袭取耶？西斋称之曰，“盖佛书本皆梵文，主席其中国语皆译者援据经史文以释之，不惟非偶合，亦非袭取。”说得何等简单明了。其实佛经元是印度文，由译人用汉文写出，此事明明白白何劳再说，而名士如董王诸公似均未知，岂非奇事。

西斋的识见胜于中国书生多多矣，此无他，亦只是有常识，能明辨而已。儒者言佛经以初至中华之《四十二章》为真，其馀皆华人之谲诞者假老庄之书为之，龚定庵俞理初蒋子潇闻之大笑，加以嘲弄，见子潇《读释藏日记》中。此三君者，盖是嘉道间之人杰，龚蒋亦喜杂治梵藏满蒙天方文字，其识见之能广大，殆亦非偶然也。

□1939 年 2 月 7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疑　耀

《疑耀》七卷，明张萱撰，今刻入《岭南遗书》中，通行于世。明时坊本题李贽之名，后人屡有辨正，其实看本文即可了然，不烦旁证，即今刻本中张萱自序，竭力声明，亦可不必也。

《疑耀》中虽有数则为张和仲采入《千百年眼》，亦本平平，其识见乃实甚卑陋，不出书生窠臼，与卓吾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信此书为李氏所著者倒未免可笑耳。如卷二《佛字辨》，谓佛字义为拂，不能译为觉。卷四《佛经不真》，又《佛经恐非西来大意》，卷五《佛书可疑》，皆意主辟佛，而不知翻译为何事，与王渔洋等相似，正是好例。卓老即使不崇佛，亦何至于此乎？

又卷五《妇人遭乱》一条，实即是饿死事小之小注。至论淫乱之始，以为始于夏少康时之女岐，尤为匪夷所思，此事乃亦有原始可考耶？想起来可为绝倒。至其自序中丑诋闽秃，全不为自己的文章少留地步，此又可见其短少趣味的修养，惟世人多犯此病，或不能单怪张君也。

□1939 年 2 月 11 日刊《实报》，暑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北　风　集

余前得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颇想读其诗文而不可得。久之始在厂甸买得《画虎集文抄》，虽只寥寥十数页，而文多质朴可取，又得见其《南行诗草》，小序与注甚多，又常采小说家言，此亦正是其有情味处也。庆博如为《岁时记》书序，因亦留意其人，著作只得到一种，曰《铁梅花馆北风集》，内容比《画虎集》更少了，题序等倒有八页，本文则只五页而已，共计律诗绝句三十四首。此系庚子在郊外避乱时所作，有好些都觉得可喜，卷末《归家》二首尤令人读之怅惘。鄙人昔时曾恨不得遇身历乱离之人，听他讲讲过去的事，然而今日不敢请与相见也。闻庆君今健在，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如或有缘能得他种著作读之，便已满愿矣。《北风集》板心下署“铁梅花馆丛书第二十四”，不知此外尚有何书也。

上文系二十八年一月间所写，阅两月承张君次溪惠赐铁梅花馆著作三种，即《怀古集》，《闷翠诗》各一卷，合订一册，《铁梅七十自述诗》一卷。自述诗序题壬寅，为民国二十七年，计其生年当为清同治八年己巳也。编订时记。

□1939 年 3 月 5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天咫偶闻

杨钟义《雪桥诗话馀集》卷八记震在廷事，云著述甚夥，以《天咫偶闻》最为精审。鄙人读震氏书，亦同此意。《偶闻》大体虽似《藤阴杂记》，惟《杂记》太近诗话，在不懂诗如鄙人者读之，常不免有骨多肉少之感，《偶闻》则无此恨矣。

二十六年秋间卧病，阅清人笔记以自遣，见有可喜者随笔录其题目，凡阅五十馀种，所选共六百则，《偶闻》十卷中计录出二十条，《杂记》乃一无所取，即脍炙人口之《阅微草堂五种》亦只取其八，大都不谈果报者耳。

《偶闻》中多记八旗文学艺术家事，亦是一种特色，读博西斋著作后颇感兴趣，故此一方面于我亦有用处。《涉江诗文抄》各一卷，《海上嘉月楼勖学遗楠》二卷，均得一读，不能有所臧否，晚年不得意故走而卫道，此固是无可奈何，若私意则所不喜也。又壬子后易姓名为唐晏，此事本应从主人，惟鄙人爱《天咫偶闻》，习见震钧之名，今仍愿以是相称。《妙峰山琐记》的作者易名鲍汴，鄙人仍称之曰奉宽先生，亦聊以示相敬之意耳。

□1939 年 3 月 26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輶 轩 语

往时见张之洞著《輶轩语》，嫌其名太陈腐，不一披阅。丁丑旧上元日游厂甸，见湖北重刊本，以薄值买一册归读之，则平实而亦新创，不知其何不径称“发落语”，以免误人乎。《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輶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千金，”可谓知言。六十年来世事变更，乃竟不见有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与抗衡者，念之增慨。

张氏不喜言神灵果报。《阴骘文》《感应篇》文昌魁星诸事，即此一节，在读书人中亦已大不易得，其中鄙意者亦正以此。若其语学语文固不乏切理近情之言，抑又其次矣。近常有人称赞《阅微草堂笔记》，即贤者亦或不免，鄙意殊不以为然。纪氏文笔固颇干净，惟其假狐鬼说教，不足为训，反不如看所著《我法集》犹为无害。我称张香涛，意识下即有纪晓岚在，兹故连及之。二人皆京南人，均颇有见识，而有此不同，现今学子不妨一看《輶轩语》，《阅微草堂》则非知识未足之少年所宜读者也。

□1939 年 3 月 31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文字蒙求

秋间患腹疾久不出门，日前因事不得不到南城去，便中从琉璃厂书店求得《正字略》一册归读之，对于王菉友大有敬意。此书亦是《字学举隅》之流，而由读《说文》人为之，便自不俗，陈雪堂字亦较之翰苑分书似有不同也。

安丘王氏著作，寒斋旧有《说文》数种，未及细读，惟《文字蒙求》四卷，昔曾涉猎，今日又取阅，亦觉得多可喜处，所说根据《说文》，改变处却亦不少，且其著书目的全为儿童，与《鄂宰四种》中念念不忘后生初学相同，此意甚可感，亦实希有可贵。清朝乾嘉以后国学大师辈出，但其所经营者本是名山事业，殆无意为小学生预备入门梯阶，故至今《说文》仍为难读之书，所谓“小学”终非大人不能去翻看第一页也。王菉友于文字学想到童蒙求我，虽是草创之作，历整整百年，还须推独步，思之可尊重，亦令后人愧恧耳。蒯氏“广义”作于光绪辛丑，已是六十馀年后矣，却殊不足观，可知此事甚难，愿力与识力如不相副，亦是徒尔。佛说因缘，疑此中正亦有之，末法难挽，大士不出，吾辈乏力梵志坐树下慨叹弥日，复何补也。

□1939 年 4 月 13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新文字蒙求

晚清时代的学者里面有好些是我所佩服的人，现在只说某一方面的共有两个，这便是王菉友与张香涛。或者要有人觉得奇怪，此二人有点列举得不伦不类，这批评也颇有理，假如我们认为那是《说文释例》的与《劝学篇》的作者。不过我这里的看法稍有不同，我把他们的《书目答问》《輶轩语》与《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相提并论，其间自然可以有一种连系，共通的特色是肯为后生初学指点说法，我所佩服的便是这一点。两三年前写《看书偶记》曾约略说及，《读輶轩语》中有云：

“《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輶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千金，可谓知言。六十年来世事变更，乃竟不见有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与抗衡者，念之增慨。”又《读文字蒙求》中云：

“清朝乾嘉以后国学大师辈出，但其所经营者本是名山事业，殆无意为小学生预备入门梯阶，故至今《说文》仍为难读之书，所谓小学，终非大人不能去翻看第一叶也。王菉友于文字学上想到童蒙求我，虽是草创之书，历整整百年，还须推独步，思之可尊重，亦令后人愧恧耳。”我常这样想，现代的学者太是小乘的了，平常在研究所埋头用功，苦心著书，本是很好的事，但其目的差不多就是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只要有惊人的新发明，即使转入牛角湾去也无妨碍，这正是声闻乘的行为，至多是得到阿罗汉果，还仍是个自了汉罢了。大乘菩萨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固然不容易做到，但是这样态度却是学者所应有的，自己辛苦的得闻半偈，便当想念有些人无缘闻法，要怎样帮助他们才好。学者为青年人设想，宁可耽误了自己的修行，分出点功夫来写入门的书，此正是法施功德，可以与济贫相比，即使只是戋戋小书，而中含大慈悲心则无有殊异。可惜的是这种人太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后边就接不上，我们小时候见到《书目答问》，这是如何的重宝呢，指引我们审择买书，赛过有良师益友，可是眼看四十个年头过去了，还只是那一部书，近来范希曾始有《补正》，未能算是新作，这与《文字蒙求》之后只有蒯礼卿的《广义》一样。王菉友原书本来也是根据《说文》，但其中改变旧说、自出新意的地方亦所在多有，《广义》于此等处却重引前说，或涉及阴阳五行，悉与本文乖违，未免可笑。如月、巾下原文云：

“以上二字各有象形，不必谓之从冂也。”《广义》乃一一引《说文》，云“从冂，二其饰也”，又云，“从冂，丨象系也”。卷首第一字为日字，原文云：

“日中有黑影，初无定在，即所谓三足乌者也。”是完全以象形解释，《广义》则加以玄学的说明云：

“太阳之精不亏，故从□，一以象形。中央之一，古文乙字之变。阳中有阴，故日中有黑影，如离卦然。”此种说法以谈文字，既未必高明，持予童蒙，更难领受矣。

上文所说张王二君的四种书，现在都很需要，因为是启蒙的或是初学工具书，缺少这些，则学问不易发达，虽有专门家亦只是为学界做装饰而已。不过我们所要的乃是新作，并非单是增订或注疏之类。例如“新书目答问”的内容，应当于《书目答问》之上加上《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贩书偶记》的分子，使读者一检即得，能知是书之刻本异同优劣，可以不合于大师之家法，总须适于学子之实用。至于“新文字蒙求”，也用同样的方针，参加古

今中外的材料，不必定想把文字学的精义传授给人，至少能引起青年人对于汉字的一点兴趣，就很好了。王氏自述中云：

> 雪堂谓筠曰，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苟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筒御繁之法乎。

这个意思本来很对，在西欧言语学上也就是语源的解说，不算什么新鲜，从前学英文时从马孙氏文法上见到一点，觉得很有意思，使我对于文法书颇感兴趣。这是在讲名词之阴阳属的变化，注中说及主人（Lord）这字乃是古英文 hlafweard 之省，意云面包管理者，而主妇（Lady）原语为 hlaefdige，意云制面包者。后来我又知道古英文中有 hlafaeta 一语，意云吃面包者，乃是仆人，更有诙谐之趣矣。此外就偶然记忆的说，如甘草（Liquorice）字一见似是拉丁来源，而实出希腊语 glyko-rhiza，意云甘根。又蒲公英（Dandelion）雏菊（Daisy），都是常见的草花，其原文一为法文 dentdelion，意云狮子牙齿，一为古英文 daegeseage，意云日之眼。在拼音文字里就只是这些意义的变迁觉得有趣味，英国都已有威克来与斯密士等人写了好许多书，引人入胜，若汉文又有象形指事的花样，更为有趣，自然更容易写成可读的书。

本来《文字蒙求》也编得很好，只是一个个字的罗列，兴趣容易分散，尚不宜于初步的读者，此外则因时代关系，甲骨钟鼎文字的材料未能利用，亦是可惜。现在似乎可以像斯密士著那小册英语（TheEnglishLanguage）的样子，分几章来讲，或依六书，或照语类，深入显出，触类旁通，迤逦说来便自有佳趣，不要怕损了学者的“纱帽翼子”，但求得童蒙的一顾，此事便不白做矣。《蒙求》中收止字，此本是足趾，只有小篆，已不甚似，此处即应不客气的照甲骨文写一个脚八桠子，以此为本而讲到步，由此而陟而涉，与陟相对的降，辶从彳从止，便牵连到行，及出亦从止，各从倒止，意即是格，而客字也跟了出来，这样的安排，在内行人的手里，运用丰富的材料，大抵可以写成一章通俗而充实的文吧。不过话说到这里，要紧的还是须得人来写，这却又须得不但是专家而且还要肯做这利他的工作的。从前曾经对故友烨斋提过几次，他总是说原则上赞成，因病不能写，现在难道可去电灯柱上贴广告么，也只好这样说说空话，表示一种漠然的希望罢了。或曰，何不自己来动手？庄生说得好，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

□1940 年作，1944 年 1 月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教童子法

王棻友著《教童子法》一卷，附《四书说略》后，虽只十三纸，却颇有精采语，即使未能上比古人，亦足与张香涛《輶轩语》竞爽矣。如云，“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又云，“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均清楚爽利可喜。又谓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哮，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则可通于文艺制作，尤有见识，非平常为父师者之所能知矣。

《四书说略》虽多为作时文而设，亦多有隽语明通语。有一处云，“古人带经而锄，樊迟何故学之，即学之又何用请之？请之者，浮海之意也。”案李氏《焚书》卷三，《卓吾论略》中云，“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间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上下三百馀年，意见暗合，此亦难得而可贵也。山东学者似特别多情味，不佞所喜者有三人，即桂未谷、郝兰皋与王棻友是也

□1939 年 4 月 15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李越缦诗

《白华绛柎阁诗》十卷，光绪十六年刻，而印书似不多，市价乃踊贵。近年杭州抱经堂朱氏书肆觅得旧板，重印行世，字画完好无缺，且卷首多有平步青撰传一篇，尤为可喜，可见新印本有时亦较旧者为胜也。传后有自记八行，中有云：

> 君尝言文非予所长，最为知己。自闻恶耗，雪涕沾衿，即思为诔及哀辞，以舒四十五年同案之悲，苦不成一字，江南老尚才尽，况不通如予乎。

语颇诙诡，李君如地下有知，亦当干笑，平步青这样写了，王继香亦遂刻在诗集里边，都不愧为达者，俗人便不能知道这些，以为不雅驯，乃抽去不印，如不是此次旧板新印，我们将不知有此一回事矣。甚矣，俗人之误事，而旧书之后印本亦有时会有用，不可一笔抹杀也。

□1939 年 4 月 27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戊戌秦稿

阅麦仲华所编南海先生《戊戌奏稿》，颇有见识，六月“请禁妇女裹足摺”中尤多佳语，如云：

> 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富人苦之，贫家尤甚。亲操井臼，兼持馈浣，下抚弱息，上事病姑，跋往报来，走无停趾，临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扪足叹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隳命，或因楚病而伤生。若夫水火不时，乱离奔命，扶夫抱子，挟物携衣，绝涧莫逾，高峰难上，乱石阻道，荆棘钩衣，多有缢树而弃生，堕楼而绝命者，不可胜数也。

我尝怪古今有识者何以不憎恶缠足，今见康君，乃始得为中国男子解嘲，事虽不成，可以传矣。《癸巳类稿》中俞理初有《旧唐书舆服志书后》，《天苏阁丛刊》中徐仲可有《天足考略》，此二者当可与竞爽。其馀多是杨廉夫王贻上一流人物，可以坐灯棚下吹笙歌诗，醉饱而散，无从与谈人世辛苦也。

□1939 年 4 月 27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扪烛脞存

陈馀山《扪烛脞存》十二卷，前有蒋子潇序，至民国甲寅始以活字板印行。此系《诗诵》作者之笔记，目录亦颇有意思，殊多期望。但一阅爽然若失，与一般读书人的本领盖无所异也。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于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陈氏如此两关都透不过，莫怪不能给予及第分数耳。

卷五《艺术脞》中引《鹤林玉露》云，陆象山观棋局，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弈而得大胜，评之曰，可知艺与道无所不通。焦里堂在《易馀■录》卷二十亦述此事，而断之曰：

> 此妄说也，天下事一技之微，非习之不能精，未有一蹴便臻其极者。至云河图数，尤妄。河图与棋局绝不相涉。且河图当时传自陈希夷者，无甚深奥，以此悟之于棋遂无敌天下，尤妄说也。此等不经之谈，最足误人，所关非细故也。

此数语极高超，亦极平常，只是有常识耳，而此在世间又甚少有，真真有百年旦暮之感，读之不禁感激。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这一点常识，又加以洁癖，乃更至于以此杀身矣。适买得《初潭集》三十卷，遂联想及之，使人怅惘终日。

□1939 年 5 月 2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千百年眼

明末张和仲著《千百年眼》十二卷，评论史事颇有见识。卷三“吴亡不系西施”一则云：

> 昔人谓女色迷人，以为破国亡家，无不由此。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湛卢之藏，朝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

案此意盖本于李卓吾，《初潭集》卷三记汉武魏武嗣宗仲容诸人后曾有所发明，有云，

> 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也。周之共主寄食东西，与贫乞何殊，一饭不能自给，又何声色之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业之由，英雄为本。彼琐琐者非恃才妄作，果于诛戮，则不才无断，威福在下也。此兴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

此种特见实在只是有常识耳，正如花红柳绿，个个都应看见，而偏多病眼者，反而把看见的人当作怪物，大是奇事也。

□1939 年 5 月 7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寒灯小话

曩读李氏《焚书》，喜其心直口快，思想明达，最所敬仰，而文章煞辣，亦有可畏之处，但见卷四《寒灯小话》四则所记，则其人又是蔼然富于人情者也。如第一段云：

> 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气急，独坐更深，向某辈言曰，丘坦之此去不来矣，言未竟泪如雨下。某谓大人莫太感伤，因为鄙俚之语以劝大人，语曰，这世界真可哀，乾坤如许大，好人难容载，我劝大人莫太伤怀，古来尽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尽天下无知己，必然有时还来。乱曰，此说不然，此人大有才，到处逢人多相爱，只恨一去太无情，不念老人日夜难待。

读此节大有悲凉之气，窃意是卓吾生活的极重要资料，只怕识者不易多得耳。我们看《日知录》中论李贽处，便可知顾宁人毫无感觉，只是人云亦云，有如隔巷听人家呼捉贼，便尔跟着大嚷，发挥其优越感而已。一代学者如顾氏尚如此，他更何望哉。

□1939 年 5 月 10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多岁堂古诗存

《多岁堂古诗存》，成书选，本八卷，而卷二分上下，实是九卷也。前阅《天咫偶闻》，中录《古诗存》例言四十七则，颇可喜，因求得全书读之，评点不多费笔墨，却多有佳趣，思想尤明达，至不易得。卷七评陈后主云：

> 后主的系词人，倘止携暄范诸狎客为贵游子弟，则文采风流，未始非千秋佳话，乃位违其才，遂致倾败，亦其大不幸也。

又卷八评隋炀帝云：

> 帝之清词丽句与陈后主同工，而浑灏之气时或过之，足压时辈，何恨恨于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耶？然亦足见古人虚心刻翳无论矣。

平心想来，只是有常识，故说来合于情理，但试看古今来有若干人能说，即此可知是大不容易，值得我们佩服也。《冷斋夜话》卷四记其弟超然论诗语曰：

> 陈叔宝绝无肺肠，诗语却有警绝者，如曰，午醉醒未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

此虽深许其诗得于天趣，洪公亟叹为知言，但仍牵扯行事，未能免俗，与成误庵相比，犹差一级耳。

□1939 年 5 月 20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 字 书

《雕丘杂录》六云：“家君尝侍赵忠毅公，公教以读字书最为有益。余见有名能文章而于字音读尚多讹者，甚矣识奇字为学者第一义也。”《輶轩语》二云，解经宜先识字，注有云：《说文》初看无味，稍解一二便觉趣妙无穷。”今人钱氏《课馀闲笔补》云：

> 每有天下人趋之若狂，而余竟莫名其妙者。葱蒜何味，而世人群以为美。烟草鸦片何物，而世人群以为香。《说文》琐屑，有何意义，而世人尊而敬之，几欲置之四子五经之上。余于此惟有谢不敏而已。

读字书，看《说文》，都很有意思，就只是入门为难耳。钱君谓《说文》琐屑，此正是初看无味，或者如人说磊落人不能注《尔雅》，却不知在草木虫鱼间亦自有趣妙无穷，但如不入便无可奈何也。鄙人常喜人家看字典文法，不但能识字，亦复可能通史。英国有人著书，曰《英语里的历史》，此意亦妙。但是《说文解字》未足以任此，须有人集合甲骨钟鼎大小篆文，自写一册《新文字蒙求》，庶乎其可，而新的大字典亦是必要。如能悠悠然待之数十年，或可有成，但亦或不然，此事正极难言也。

□1939 年 6 月 25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法一角》

金冬心题记

金冬心题记小文，别具风致，久为世间所重，原刻近已不可见，寒斋所有者只乾隆间花韵轩刊《巾箱小品》本，嘉庆间种榆仙馆本，同治壬申桐西书屋本，光绪戊寅当归草堂本，皆翻刻也。当归草堂本今收入《西泠五布衣集》中，最易得，魏稼孙编校，便于阅读，陈曼生本序甚佳，字体与所刻《佛尔雅》相同，古朴可喜，而《画竹题记》多缺，似不及矣。魏氏附记云：

> 余为当归草堂校刊此种，旋得湖州凌子与霞邗上来书云，《冬心画记》尚有吴门潘氏桐西书屋刻本，时剞劂垂成，道远不及借校，附记于此。

案潘本盖亦从《巾箱小品》出，而编校不佳，如自写真题记末一则中匾□者一语，各本均缺中一字，今乃将此三字全删去，即其一例。惟卷末附刻王笈甫《画钟进士像记》二十四则，虽未足与昔耶居士抗衡，亦颇有意思，盖取其别致耳。

□1939 年 9 月 30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大瓢偶笔

从松筠阁取来《大瓢偶笔》八卷，抄本四册，索价甚昂，但却想得之，则以乡人著述故耳。卷首有印朱文曰，会稽章氏藏书，末有朱书题记四行云：

> 光绪乙巳九月，重游广陵，适老友凌子兴家书籍散出，旧抄本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及此册遂为余有。小阳九日粗读一过，校数十馀字，读毕漫记之。老硕。

此盖是章硕转售物，章氏藏书前只得到所刊《绝妙好词笺》一部，各卷首尾有章贞读书等印三方，今又得此本，上有题跋，更可喜矣。看抄本文字，琰宁均缺笔，当是道光年间所写，去今才百年，不能算很旧，又此书有筠石山房刻本，亦不甚难得，容再求之。《偶笔》所谈皆关于写字的事，于鄙人殊有隔教之感，唯文章尚佳，亦颇可读，仿佛如阅黄山谷的一部分题跋也。

□1939 年 10 月 4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分类诗话

今人著《茇楚斋续笔》卷十云；

南昌喻端士编辑新城王文简公士禛《皇华纪闻》、《陇蜀馀闻》、《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分甘馀话》六种中论诗之语，分志趣、风雅、感慨、考证、评论、汇编六门，每门一卷，汇编分上下卷，乾隆己酉五月信江枕山亭自刊本。一本名《谐声别部》，一本名《分类诗话》，一人所辑，同时所出，而序文例言两书一字不易，亦无一言言其更名，是真不可解矣。

此书寒斋有一部，即名《分类诗话》，每叶中缝鱼尾上悉空白，只存卷数，卷首及序文中书名则是剜补，形迹显然，可知此名乃是后改。其初当名《谐声别部》，例言末一则中云，“和声鸣盛，贵谐人心，风雅鼓吹，此为别部”，可以知之。至于改名理由，或者书板归于他氏，嫌其原名太晦涩，故易名以顺俗耳。观其剜补殊不雅观，新名亦笼统，可见非解人所为《续笔》以为是喻端士自己有此二种刻本，非但观人不审，即察物亦有误也。《谐声别部》原书近来亦得一部，刻印均相同，惟不经残毁，自觉得更悦目耳。

□1939 年 10 月 6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天津文抄

中国向来有汇刻地方著述为丛书或总集者，此虽似未免乡曲之见，但保存文献功效甚大，于读书人亦极有便利。近来因搜集徐沅青著作，稍买得天津的总集类书，有《天津文抄》四册，亦是庚申岁金氏所刻，纸墨颇佳，与《屏庐丛书》相同。原书分二十四卷，华少梅编，其子听桥所增订，今裁并为七卷，多所删削，即使后人于义法体例有见到处，以此改变昔人著述面目，觉得亦是得失参半。闻近世有人重刊《戴南山集》，乃倩人篇篇加以斧正，使成为桐城派文，以此例彼，固尚少胜耳。

书名原为《津门文抄》，盖拟与梅氏诗抄相对，今改称《天津文抄》，虽云纪实，揆之名从主人之义，亦不无缺憾。华少梅又著有《脞录》二卷，幸得有一册，首尾无序跋题叶。有墨笔点窜及书眉批语。看首叶碧琅玕馆一印，知是杨庸叟手笔，亦可珍也。

庸叟著有《碧琅玕诗抄》正续各四卷，文集惜不得见，只于《文抄》中录存四首而已。《文抄》刻颇精而校似有疏忽处，卷一胡捷余武贞公议中，主张以周定夫、王玄趾、潘子祥诸人从祀，玄误刻作立字，胡象三盖原籍会稽，故文中尚称吾越也。

□1939 年 10 月 7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扬州画舫录

鄙人甚不喜皮簧戏以及二胡，推至戏考剧评，亦无不然，盖几于恶乌及屋矣。阅《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多记戏班事，却颇有可喜处，如一则云：

二面蔡茂根演《西厢记》法聪，瞪目缩臂，纵膊埋肩，搔首踟蹰，兴会飙举，不觉至僧帽欲坠。斯时举座恐其露发，茂根颜色自若。

此外小丑滕苍洲，贴旦谢瑞卿、魏三儿各节，亦均有情致。乃知天下事无不可书，只要见识趣味文字三者足以胜之。我辈平日所见者多低级的书，但知考较嗓音，赏玩脂粉耳，谭复堂之《群芳小集》尚未能免，他更不必论矣。李艾塘记景物风俗及琐屑事亦多可取，卷十一虹桥爪一带的描写，凡声伎饮食有十五六节，无不佳妙，有《景物略》《梦忆》之风而更少作客态，故亦遂更为自然，多情味也。

秋冷多闲，摘录数则，庄诵一过，且喜且愧，自己无论如何用心，总写不出这样好文字，若写时又须由会而至不会，则愈亦难矣。

□1939 年 10 月 11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姑苏杂咏

偶阅明清人所作地方名胜诗集，看到高青丘的《姑苏杂咏》二卷，乃是黄晦闻先生的遗物。《杂咏》诗凡一百三十一首，已散编入《大全集》，此尚系原本，后有洪武三十一年周傅跋，盖是青丘被害后二十四年也。去年在隆福寺街得此集，卷首有印曰沈以恭印，敬斋，又曰陈天爵印，天士，两册首别有印曰黄节读书之记。晦闻卒于民国廿四年一月廿四日，次日撰一联挽之云：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附以小注云：“近来先生常钤一印曰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学讲亭林诗，感念今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晦闻卒后，藏书多散出，偶在书肆见此册，遂以六元买得之。青丘原书固不多见，无意得到故人手泽，亦可记念也。

查《瓯北诗话》卷八，讲高青丘的一部分中有几句关于他的著作的话云：

> 青丘诗有《吹台集》，《缶鸣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等编，洪武中未敢梓行，景泰时有徐庸字用理者汇而刻之，共一千七百七十馀首，名之曰《大全集》。

所说似不甚确。寒斋所有此《姑苏杂咏》二册，即系洪武年中所刻者也。《静志居诗话》卷三“高启”条下云：

“有《凤台》《吹台》《江馆》《青丘》《南楼》《槎轩》《姑苏杂咏》等集，自选为《缶鸣集》。”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条下云：

“所著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凡二千馀首，自选定为《缶鸣集》十二卷，凡九百馀首。”朱竹垞纪晓岚二君说《缶鸣集》似亦有待考处。涵芬楼本《大全集》卷首存《缶鸣集》原序三篇，其谢徽的一篇署年月为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序中有云：

“是编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后有作当别自为集。”又金氏文瑞楼刻本所录原序，其第三篇为《姑苏杂咏自序》，署年月云洪武四年十二月，案即辛亥年也。照这年代看去，《姑苏杂咏》当然未曾编入《缶鸣集》内，因为《杂咏》之成在《缶鸣集》选定后一年，自当别行，洪武三十一年之革行本即其一证，至徐用理乃复杂糅增益编为一集耳。《杂咏》周傅跋有云：

“锡山蔡伯庸氏得其全集，谋锲诸梓，虑其传写之讹，属傅编次而校正之，复需言识于简末。”此云全集即指《杂咏》全本，似以前只有传抄，此为初次上木也。书分上下两卷，风俗，古迹，祠庙，冢墓，山川，泉石，园亭，寺宇，桥梁，杂赋等十类，共一百十题，诗百三十一首，自序云一百二十三，跋又云一百三十六，不知何以计数各异。编全集固自有则例，唯鄙见则以为分体不如编年，原来各种小集亦以罗列为宜，胜于拆散分排，特别如《姑苏杂咏》有其个性者，尤不宜鲁莽割裂，如成串的星月菩提子，单个非不可赏玩，但无甚兴味耳。不佞最爱其《临顿里》十首，原本有小序云：

> 在城东，旧为吴中胜地，陆鲁望所居也。皮陆有诗十首咏之，余悉次其韵，盖仿佛昔贤之高致云。

此诗今收在《大全集》卷十三，却无小序，亦是缺恨。《杂咏》每篇有序，金檀注《青丘诗集》，始重复一一列入题下，称之曰原注，其实在《大全集》中乃原无有也。景泰刻本虽曰名贵，但在读者，还不如看金氏文瑞楼本，古

本或粗而今本或精，往往有之。但如或得《缶鸣集》等各原本，加以复印，则亦是佳事，因此可见本来面目，虽未必更佳，亦总是有异，此即值得传播耳。金檀注本例言之二云：

“《姑苏杂咏》间有旧刻单行，中多脱谬，国朝康熙己卯周氏本锓版亦潦草。”此言原非妄，唯《杂咏》虽有误，总比《大全集》为胜，如《杂咏》《走狗塘》一题在目录上乃误刻作《是狗塘》，可为一例，唯卷下《锦帆泾》一首，末二句下作穷奢毕竟输渔父，长保秋风一幅蒲，《大全集》则父刻作交字，渔乃是墨丁。《杂咏》全本皆刻作软体字，殊不潦草，只可惜无青丘自序，或者此当在康熙周氏本中，抑已破损佚去，皆不可知也。（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记于北平）

〔附记〕凡编集，文可分体，诗不可以分体，最好是依年代合刻各原编小集，而别附一分体目录，略如索引，庶几得中。盖依体分编，不但破坏内容的统一，如《姑苏杂咏》是，且亦破坏作风的统一，例如袁中郎的《解脱集》，完全是代表公安派的最高潮，不特在各篇诗歌之间，即诗与文其间亦有息息相通处，合而读之，便极易了解，真是事半而功倍，如此则文诗且并不宜分编，须一切仍其旧也。

各集有原序，亦多有用处，编合集时大抵弃去，甚为可惜，后世作序跋固多泛滥，但单只考查其编印的本末年代，已大有用矣。《大全集》录存序文三数篇，尚有可取，但如周傅跋便无有，即不能知《杂咏》在洪武中曾有刻本了。（六月十九日记）

〔再记〕张君索稿，愧无以应，只得以旧作塞责，计前后距离已有三十月，此种陈言，岂复值得一读，思之唯有惶悚。（廿八年九月六日）

□1939 年 10 月刊《中国文艺》1 卷 2 期，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洞灵小志

近来专看闲书遣日，得龙顾山人著《洞灵小志》及《续志》，甚为喜欢，盖又可供数日卧读之资也。《小志》刻于甲戌，《续志》则在丙子，去今才三四年，而板刻颇精致，比用铅字洋纸印者更惬心目。近年木刻书不多，但如天津金氏之《屏庐丛刻》及《天津文钞》等，刻印均颇佳，与水竹村人各集相似，或是同一系统，若《天津诗人小集》，又嫌稍细弱矣。

谈鬼怪殊有佳趣，但须以艺术出之，东坡居士强人说鬼，云姑妄言之，甚能得此中三昧。为说鬼而说鬼，第一必须说得好才行。文章宜朴质明净，六朝唐人志怪最擅胜场，传奇文便已差了，则因渐趋于华丽雕饰，《阅微草堂》与《聊斋》之比较亦正是如此。第二必须无所为，即不讲因果以至譬喻。讲到这里，《聊斋》却又要胜一筹，盖其记狐鬼艳情中有别无用意者，而《阅微草堂》于此全无是处，只是文尚佳，故或可一读耳。

洞灵二志若依据此例论其短长，可以说正与阅微五记相同。不佞通读一过，喜其记述大方，又多涉及近人，故颇有兴味，若其鬼神设教之趣旨，与不佞乃全是隔教也。有数处写鬼趣，本于人情，觉得颇妙，如《续志》卷四记许润斋客死广西，魂附家中佣媪，径入厅事，观陈设丧具，摇首曰，何必乃尔。又卷五记李檗子之丧，受吊日黄桐生见李魂方于丧棚下周览挽章，均是。

此外所记虽出于今人见闻，实乃陈陈相因，读之殊觉单调，盖此等作料已是甘蔗渣，即使不是吝啬人所嚼过，亦已毫无滋味，做不出什么好点心来也。

□1939 年 11 月 1 日刊《中国文艺》1 卷 3 期，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金陵游记

得《金陵游记》一卷，渔洋山人著，板心下端刻“阮亭古文”四字。考其时当是康熙三年甲辰也。卷中凡游记八篇，题名记七篇，大抵均见于《渔洋文略》卷四、而文字稍有异同。第六篇《六朝松石记》《文略》不收，馀亦多所删削。《文略》刻于康熙三十四年，渔洋年已六十有二，故文益简劲，但游记得存其少作，又两本异同处有如原稿上改窜之迹，阅之亦极有意思。

卷首有小序六，为杜茶村、陆丽京、施愚山、冒辟疆、尤西堂、陈其年之作，王西樵题诗一章，在合集中便不可得见矣。此数文在诸人集中不知收存否，即有之亦极不易见到，因此更感觉原刻单行本之可贵，盖与合集允宜并重者也。

阮亭文雅洁，少嫌其欠腴，茶村序称欲撰《金陵景物略》非阮亭不可，恐是过誉。此事须得有见识魄力，阮亭于此殆未能胜。如多写此类游记数十篇，固亦可喜，但仍是文集中物，未必能自成一部著作耳。

□1939 年 12 月 14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旗人著述

想一看金息侯的著作，承友人借给《瓜圃述异》等三四种，也就满足了。这些书铅印尚无妨，却都用洋粉连印，售高价，故不想收藏一份，其所说虽不免多夸饰，亦殊有可取处，值得读一过也。

不知怎的我觉得读旗下人的文章常比汉族文人高明，而平常大官的说话也比卑陋的读书人大方，这恐怕是同一的道理。如博明之《西斋偶得》，震钧之《天咫偶闻》，锡缜之《退复轩随笔》，遐龄之《醉梦录》，敦崇之《芸窗琐记》，奭良之《野棠轩摭言》，或见识明达，或态度大雅，文词之巧拙在其次，似反无甚关系矣。

《瓜圃丛刊叙录》中有金氏的《满洲老档秘录叙》，又徐世昌序，都还说得过去，惟有一跋，中云“臣纾以犬马馀生”云云，末署“宣统庚申举人臣林纾谨跋”，比较起来便显得很是寒伧。故家纵出了纨袴子弟，仍有点大方气象，不至与跟班混同，此总是实情。鄙人对于旗人何必雪中送炭，亦只是说实话而已。

□1939 年 12 月 22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野园诗稿

偶从书肆估得《野园诗稿》抄本，四册三种，稿纸中缝上刻野园二字，存题签三，曰《西清载笔录》、《野园诗集》、《留都集》，各铃三印，一壶卢形，朱文曰“佟雅”，一方形白文曰“濠濮间想”。

卷首无书名，惟《野园诗集》首行下有印，白文云“臣介福”，朱文云“珥笔承恩”，末尾二大印，朱文云“景庵”，白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壶”。全书末空白半叶，有题识曰：

> 右稿三种为满洲介福所著，案《熙朝雅颂集》，介福字受兹，一字景庵，雍正癸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官至侍郎，有《西清载笔录》，《退思斋诗》，《野园诗集》，《留都集》，《关中纪行集》，《采江小草》，《采茶歌》。今读其诗，颇多秀句，且有见道之言，在满洲人中可谓难能足贵者矣。张芝圃送阅属题，因识数语归之。戊寅九月，退翁周肇祥。

查《雅颂集》，介福诗在卷四十六，所注正同，惟其著作实只六种，盖《采茶歌》乃是集中所录第一首之诗题耳。《天咫偶闻》卷五列记八旗人著述目录，集部中有介福之《野园诗集》等五种，而《西清载笔录》则收入史部，在《槐厅载笔》之前，此亦有误，今据抄本乃是古今体诗九十六首，大都是应制和韵之作，并非散文记录也。

《偶闻》卷三云，佟府有野园，介受兹先生福自号野园，即此，至今尚在。佟雅盖即是野园之姓，佟府后为贝满女学校，园不知如何，距震在廷著书时不及四十年，尔时仅存之旧邸第皆已易主矣。

□1939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题留我相庵诗草

不佞不懂诗，故买诗集往往不以其诗而以其人，犹搜集手迹之意耳。吕光晨不知为何人，因见卷首有钱振锽序盛称之，故从厂甸摊头买得，此则更是间接因钱君的关系，反正诗原是不懂，亦无耳食之嫌也。共读楼辑本《室名索引》不免尚多阙略，而留我相庵则已著录，可知此事亦有因缘，寒斋未有许多大家别集，却存此二册诗草，正是同样的实例也。（一月廿八日）

□1939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思元斋续集

得《西斋三种》后，稍搜集八旗人著作，此中健者自当推法式善，百龄、铁保虽亦与于三才子之列，抑又其次矣。诗文集颇不少，一时难以悉收，因先以板刻佳好者为限。《茶楚斋随笔》中举高斌《固哉草亭诗》，高其倬《味和堂集》，以为致佳，此二者固亦不恶，近得《思元斋续刻诗文集》乃亦别有风趣。案《八旗文经》五十九，作者考丙云：

> 宗室裕瑞，字思元，豫通亲王裔，封辅国公。尝画鹦鹉地图，即西洋地球图。通西蕃语，谓佛经皆自唐时流入西藏，近日佛藏皆出一本，无可校雠，乃取唐古特字译校，以复佛经唐本之旧，凡十馀箧。悉存于家，伯熙云犹及见之。著有《思元斋全集》、《续集》。

据所记可知其为非凡人，观《续集》亦正如是。全书皆手写精刻，《东行吟抄》稍工整，作亦平平，《沈居集咏》《枣窗文续稿》二种则用行楷，皆潇洒出俗，诗亦有佳语而文尤胜，虽只十四小篇，足以胜人多多许矣。《二桃杀三士论》，《邓攸弃子存侄论》、《韩昌黎盘谷序论》、《厚葬薄葬论》，均可读，见识通达，文士中不可多觏，若《试金石砚记》、《鳇说》，则又是别一类佳作也。《集咏》自序满是牢骚，而以诙诡出之，颇疑其当初以文字得祸，序首自称于嘉庆癸酉岁十月获谴居东，作序时在道光戊子，文稿序在庚寅，可知其谪居沈阳盖已历十七年矣。

查《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条下有云，“以失察故，革禄康、裕瑞职，发往盛京居住。”然则其获谴乃因林清一案。文盖以穷而工，其诗文之奇气与居沈自当有关，惜未得其前集六种阅之，一证其异同如何耳。《文经》所收文不见佳，盖出前集中者，其不能赏识《续稿》之文，殆亦不足怪也。

（五月八日）

龚定庵《己亥杂诗》中有一首，题曰《别镇国公容斋居士》，注云：

> 居士睿亲王子，名裕恩。好读内典，遍识额纳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满汉字，又核定全藏，凡经有新旧数译者皆访得之，或校归一是，或两存之，或三存之，自释典入震旦以来未曾有也。

案此与思元斋主人甚相似。定庵既与容斋交好，而盛伯熙又曾亲见思元之校本，则均当无误。惟二人名字同有一裕字，不无可疑。不佞颇疑此本是一人之事，或盛氏所见即是裕恩物，因名近似讹，但是天下奇事往往有偶，故亦未敢随意决定也。

（廿五日又记）

□1939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大谷山堂集

偶得蒙古梦麟《大谷山堂集》六卷，卷头曾题记曰，此诗集本无甚足取，今从松风堂购得之，因其为震在廷故物耳。卷首有海上嘉月楼印，末叶一印曰涉江。此书题叶为吴兴刘承干署，后书戊午仲冬刊于维扬，平常均称为嘉业堂刊本，即所谓《辽东三家诗抄》之一。近阅《瓜圃丛刊叙录》，总目后有金息侯之子关东识语，中有云，“忆前岁家在廷先生震钧与我父约刻八旗名贤遗著，编目得数百种，仅合刊《大谷山堂》数集，在廷先生既去世，板归刘翰怡京卿承幹印行。”由是可知此书本是震氏所刊，后归刘氏，我当初以为此本系刘所持赠，今乃知是震生前所印，自铃印记者也。据海上嘉月楼《勖学遗笺》所记，震氏晚年正住在扬州，卷下收有戊午己未数函，惜未曾说及，如不见关东识语，几无从得知此事真相矣。

今通行之《辽东三家诗抄》，所收为李锴《睫巢集》七卷，长海《雷溪草堂诗集》一卷，《大谷山堂集》六卷。《大谷山堂集》有庚申上巳日刘承幹序，有云：“同社友唐元素司马始以表章遗献，将合《大谷山堂》并《睫巢》《雷溪草堂》诸集汇为一编，成兹三种，未及印行而其事中辍，今以其板归余。”而《睫巢集》又有民国十七年戊辰三月袁金铠序云：“三家诗抄原椠在吴兴刘君翰怡承幹处，本年春介长白金君息侯梁让归吾奉，保存于京师奉天会馆。”乃知楚弓楚得，板又易主者，而三家之称亦是后起，盖震氏原意陆续重刊，今乃偶然存此三部耳。惟据《涉江遗稿》张志沂跋，震氏殁于庚申之秋，今刘序署庚申上巳日，是时震氏故尚健在，然则关东所云在廷去世后板归刘翰怡之说，似又非是事实矣。一部诗集刻印的事迹尚且如此难查明白，那么别的考证自然更不容易了。

□1939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太上感应篇

近来买几种天津的总集，得到郭师泰编《津门古文所见录》四卷，亦颇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庙碑记》，中有云：

> 世所传《帝君阴骘文》，大者皆六经之渣滓，微者如老妇之行仁，报应多端，义利所不能析也。

编者注曰：

> 吾见败德之人，妄希福泽，曰吾能诵《阴骘文》数百遍矣，日吾能施《阴骘文》几百本矣，此记正为若辈当头棒喝。”

案《□轩语》卷一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条，云：

> 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此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诃而麾去之。

此诸人意见皆明白难得，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谓”四书五经”外，又有“感应”“阴骘”“明圣”三书，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诵，其有识盖不亚于张香涛也。

唯鄙人重读《太上感应篇》一过，却亦不无恕词，觉得其乌烟瘴气处尚不甚多。篇中列举众善，能行者是为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禄随之一句稍足动俗人歆羡，而归结于神仙可冀，即说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为恶的罚则是夺算。由是可知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于照原来说法，北斗本不管铨叙事务，那还是别一件事也。

□1940 年 1 月 1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八卷，明谢在杭撰，有《申报》光绪丁丑活字本，今尚易得。《申报馆续书目》《文海披沙》项下云，惟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流，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按活字本有万历辛亥焦竑序，宝历己卯幡文华及宽延庚午鱼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语，故并未问世，殊非事实，唯中土传本罕见，《申报》馆乃据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曰，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计宽延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宝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则五十一年矣。

鱼目道人不知为谁，序中有云，校先师遗书，载宁馨儿，引《文海》说。查伊藤东涯著《秉烛谈》卷三，“宁馨”条下引有《文海披沙》语。然则当是东涯之弟子也。序文又云，“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耳。夫训诂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语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自然佳处难以力致耳。”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馀》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组》《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

□1940 年 1 月 17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四史疑年录

买得《四史疑年录》两册，凡七卷，阮刘文如著。前有阮云台嘉庆二十三年序，著者自序，谭复堂光绪二十一年序，题叶后面乃署宣统元年春王月刊。案此盖是榆园许氏旧刻，当成于光绪丙申，十馀年后不知为谁氏所得，乃改刻年月，村俗可笑。卷五中是仪之名凡两见，均未避讳，又每卷撰人题曰仪征女士某，可知其非刻于宣统时也。

录中第一人是项羽，得年三十一，此人的确不愧为英雄。但是看下去，最可叹异的还是董贤，年止二十三，这除了有些王子后妃以外，名人中顶年青的总要算是他了。吾乡金古良撰《无双谱》，“垓下叹”与“恐惊寐”均俨然居卷首。此二人真不可及，而张子房更出其上，此则由于金君黍离之感，与其以文山结末同一意思耳。

□1940 年 1 月 24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三千威仪

佛教戒律本是传而非经，颇似中国的《礼记》，其中有《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尤为鄙人所喜读，盖其所说又甚类《曲礼》也。如卷上云：

> 夜起读经有五事。一者，不得念我经戒利，馀人不如我。二者，设不利，不得言我经戒不利正为某比丘事故乱我意。三者，不得坐念人恶。四者，设明日欲问所疑，不得说馀，直当说不解者所知而已。五者，不得念言当持是经中语以行问人使穷。但有是念，非贤者法。

此即可以移示中国的读书人。卷下又云：

> 教人破薪有五事。一者，莫当道。二者，先视斧柄令坚。三者，不得使破有青草薪。四者，不得妄破塔材。五者，积着燥处。

此则朴实细致，虽朱柏庐亦未能说到，令人读之感叹，觉得希有可贵也。大抵古人好处就只是切实，懂得人情物理，说出话来自然体会得宜，后来和尚忙于做法事，读书人应科举，叩头上宰相书，更无工夫来想这些事情，唐宋以来家训毫无《曲礼》气味，正不足怪，即百丈之《清规》持与《威仪》相比，其厚薄亦迥殊矣。

□1940 年 1 月 26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初潭集

久欲得《初潭集》，畏其价贵不敢出手，去冬书贾携一册来，少敝旧而价不出廿元，颇想留之。会玄同来谈，又有生客倏至，乃属玄同且坐苦雨斋北室，即前此听虾蟆跳处，今已铺席矣，可随意偃卧，亦良便利也。比客去，玄同手《初潭集》出曰，此书大佳，如不要勿即退还。——盖自欲得之也。未几全书送来，议打一折扣而购得之，尚未及示玄同，而玄同已殁矣。今日重翻此集，不禁想起往事，感慨系之，于今能与不佞赏识卓吾老子者尚有几人乎。

廿八年二月四日夜，知堂记于北平。

此是不佞题所藏《初潭集》的话，于今转眼将一年矣。今日取出书来看，不胜感慨。玄同遇虾蟆事在民国十三年，查旧日记七月廿五日条下云：

“阴，上午十一日玄同来谈，至晚十时去。”又八月二日条下云：

“下午雨。玄同来访，阻雨，晚留宿客房。”次晨见面时玄同云，夜间室内似有人步声，何耶？我深信必无此事，以为当是幻觉，及客去收拾房间，乃见有大虾蟆一只在床下，盖前此大雨时混入者也。尹默闻之笑曰，玄同大眼，故虾蟆来与晤对耳，遂翻敬亭山诗咏之曰，相看两不厌，虾蟆与玄同。昔日友朋戏笑之言，流传人间，衍为世说，或有传讹，实则只是如此耳。因题记语加以说明，念古人车过腹痛之感，盖有同情也。

玄同和我所谈的范围极广，除政治外几于无不在可谈之列，虽然他所专攻的音韵学我不能懂，敬而远之，称之曰未来派。关于思想的议论大抵多是一致，所不同者只是玄同更信任理想，所以也更是乐观的而已。但是我说中国思想界有三贤，即是汉王充，明李贽，清俞正燮，这个意见玄同甚是赞同。我们生于衰世，犹喜尚友古人，往往乱谈王仲任、李卓吾、俞理初如何如何，好像都是我们的友朋，想起来未免可笑，其实以思想倾向论，不无多少因缘，自然不妨托熟一点。三贤中唯李卓吾以思想得祸，其人似乎很激烈，实在却不尽然，据我看去他的思想倒是颇和平公正的，只是世间历来的意见太歪曲了，所以反而显得奇异，这就成为毁与祸的原因。思想的和平公正有什么凭据呢？这只是有常识罢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便是人情物理。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说出话来，无论表面上是什么陈旧或新奇，其内容是一样的实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烧，颠扑不破，因为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一句有常识的名言，多么诚实，平常，却又是多么大胆呀。假如这是某甲说的，说不定也会得祸，幸而出于《礼记》，读书人没有办法，故得幸免，不为顾亭林辈所痛骂耳。

我曾说看文人的思想不难，只须看他文中对妇女如何说法即可明。《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条下记阅俞理初的《癸巳类稿》事，有云：

> 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恕心，恕则家道坏矣。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

李君是旧文人，其非薄本不足怪，但能看出此一特点，亦可谓颇有眼力矣。李卓吾的思想好处颇不少，其最明了的亦可在这里看出来。《焚书》卷二《答

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云：“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初潭集》卷三列记李夫人、阮嗣宗邻家女、阮仲容姑家鲜卑婢诸事后，加案语云：

> 李温陵曰，甚矣声色之迷人也，破国亡家，丧身失志，伤风败类，无不由此，可不慎欤。然汉武以雄才而拓地万馀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据有中原，又何尝不自声色中来也，嗣宗仲容流声后世，固以此耳。岂其所破败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欤。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也。周之共主，寄食东西，与贫乞何殊，一饭不能自给，又何声色之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业之山，英雄为本，彼琐琐者非恃才妄作，果于诛戮，则不才无断，威福在下也。此兴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

此所言大有见识，非寻常翻案文章可比。又卷四“苦海诸媪”项下记蔡文姬王昭君事，评云：

“蔡文姬王昭君同是上流妇人，身世不幸，皆可悲也。”又记桓元子为其侄女宥庾玉台一门，曹孟德为文姬宥董祀，评云：

“婿故自急，二氏一律，桓公亲亲，曹公贤贤，呜呼，曹公于是为不可及矣。”书眉上有无名氏墨书曰：

“上数条卓吾皆以为贤，乃欲裂四维而灭天常耶。”其后别有一人书曰：

“卓吾毕竟不凡。”李卓吾此种见解盖纯是常识，与《藏书》中之称赞卓文君正是一样，但世俗狂惑，闻之不免骇然。无名氏之批，犹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之疏耳，其词虽严，唯实在只是一声吆喝，却无意义者也。天下第一大危险事乃是不肯说诳话，许多思想文字之狱皆从此出。本来附和俗论一声亦非大难事，而狷介者每不屑为，致蹈虎尾之危，可深慨也。二月中题《扪烛脞存》中曾云：

“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这一点常识，又加以洁癖，乃更至于以此杀身矣。”但只有常识，虽然白眼看天下读书人，如不多说话，也可括囊无咎，此上又有洁癖，则如饭中有蝇子，必哇出之为快，斯为祸大矣。

《初潭集》三十卷，万历十六年卓吾初落发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时年六十二岁。书分五部，曰夫妇、父子、兄弟、师友、君臣，又各分细目，抄集故事，有如《世说》，间附以评论。中国读书人喜评史，往往深文周纳，不近人情，又或论文，则咬文嚼字，如吟味制艺然。卓吾评乃随意插嘴，多有妙趣，又务为解放，即偶有指摘亦具情理，非漫然也。卷十一“儒教下”云：

> 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也。主人以玑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阶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

评曰：“太管闲事，非子言也。”又云：

>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有蒙袂戢履，贸贸而来。曰，嗟，来食，曰，余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评曰：“道学可厌，非夫子语。”据《檀弓》所说，这里说话的是曾子，不知何以写作仲尼，但这两节所批总之都是不错的。他知道真的儒家通达人情物理，所言说必定平易近人，不涉于琐碎迂曲也。《焚书》卷三《童心说》中说得很妙，他以为经书中有些都只是圣人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此语虽近游戏，却也颇有意思，

格以儒家忠恕之义，亦自不难辨别出来，如上文所举，虽只是卓吾一家的看法，可以作为一例也。近来介绍李卓吾者有四川吴虞、日本铃木虎雄、福建朱维之、广东容肇祖，其生平行事思想约略可知矣，《焚书》亦已有两三次活字翻印，惜多错误不便读，安得有好事者取原书并续书影印，又抄录遗文为一集，公之于世，以便学者乎。

（廿九年一月廿七日）

□1940 年 1 月刊《中国文艺》1 卷 5 号，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杂文》

习苦斋画絮

戴醇士著作，旧得有《习苦斋文》四卷诗八卷，同治五年刊，《笔记》一卷，十年刊，《画絮》十卷，光绪十九年刊，皆木板也。后又得《画絮》别本四册，曾题其端云：“平常所见《画絮》皆惠年编刊十卷本，今此书只四卷，字画精好，胜于惠刻，而前后无题序，意者或即戴兆春所云，先君于服官吴门时曾裒集付刻数卷者耶。此系吴仲怿旧藏，卷首有海丰吴氏石莲庵一印。”顷读《春在堂杂文》，五编卷七有《习苦斋画记类编》序，叙惠菱舫得《习苦斋画絮》读之而画学大进，又云：“然《画絮》一书只刻四卷，尚有《习苦斋画记》十卷，未刻也。”惠氏取《画记》排比，比类相从，付之剞劂，题曰《习苦斋画记类编》。今查惠年刊本中此序固在，且系曲园手书，唯上文所引数语已改为“然其书十卷未刻也”八字，又其后《画记类编》之记亦改作絮字，唯题叶篆书仍作“戴文节画记”耳。由此乃知四卷本确系戴氏初刻之《画絮》，盖是十卷之一部分，曲园谓画记别有一书，当为传闻之讹，而惠菱舫所刻改变体例，亦不宜袭《画絮》原名，如序中所称加类编二字，庶几名实相副乎。今只通行十卷本，原刻四卷几已无人知之矣，不佞幸得石莲庵藏本，又于曲园集中见未删改之序文，乃能明白此事颠末，亦正是一幸事也。

□1940 年 2 月 13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耳 食 录

从旧书堆中找出《耳食录》正续共二十卷，坊刻粗纸印，错字满目而文可读。《复堂日记补录》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云，阅乐莲裳《耳食录》，文采丽密，稗乘中可取者。复堂常阅小说，见于日记，据其批评以《耳食录》为最佳。乐君本能文，文章的确写得不错，虽终未脱《聊斋》科臼，却亦有其佳处。

大抵志怪之书要在无所为，若《还冤志》《金刚经鸠异》标明宗旨者，别是一类，亦无妨碍。《耳食录》亦谈报应，但其纯为志怪而作者多诙诡可喜，如卷一之《邓无影》，卷六之《廊下物》，颇有《诺皋记》之风。又卷五《白衣妇人》一则，迷离惝怳，莫明究竟，后世小说中少见此种写法，实乃是《诺皋记》下卷戴訾事的翻案，可知乐君受段柯古之影响为不浅矣。唯原文云訾为诸妇人牵入坑，及訾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訾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耳食录》述少年语曰，彼甚乐，尚何哭为。此则殊有点金成铁之概。文字之事盖甚难言，乐君尚未能辨其中边甘苦，益可知此事之真不易矣。卷六《南野社令》一则记溺鬼因慈心得任土地，虽是劝戒老调，而文情斐娓，无惹厌处，其工巧似出《阅微草堂》之上，盖纪晓岚工于文而主意太显露，使人觉得如吞糖衣丸药，若能味如橄榄或萝卜，虽是用意在润喉清火，亦可吃得有味，乐莲裳此文可为一例矣。

鄙人常说说鬼要无所为，其实重要的还是在于文章与态度，假如二者皆诚实质朴，自有其美，虽有所说示，有如个人的宗教倾向，读者亦可以礼相接，或赞或否，均无所嫌也。由此观之，写文章本无一定的规律，无所为固然最好，却亦可以有例外，大抵作者的趣味与见识乃是必要的两重基本，即态度之所从出。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语虽陈旧，实颇有理，盖文章与器识本来是一物之表里耳。

□1940 年 2 月 13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琐事闲录

张林西著《琐事闲录》正续各二卷，咸丰年刊，书本寻常，而近来贾人居奇，以高价始得一部，盖几需十金矣。林西河间人，殆慕其乡先达观奕道人者，亦多谈因果怪异，唯尚质朴可喜，又肯多记琐屑事，不负其题名，如卷上之《苹果枣》与《甜瓜》，续编卷上之《■》，皆一般随笔中所鲜见。

续编卷上又有《不入诗话》一则云：

> 先叔祖幼不读书，而聪明颖悟，古近体杂作颇富，惜皆散遗，游幕江南日与袁太史往来，正值《随园诗话》开雕之时，薄其行止，终不肯出稿以相示也。曾云，袁某好相人阴，两三次晤叙之后，必设法窥验，殊为可鄙。

按随园身后是非甚多，窃意关于诗文方面，蒋子潇《游艺录》中所说最为持平，若论其人，则只凭著作想望其丰采者与曾经面接者两方可以有很大的距离，亦可以说都各有道理者也。

林西的叔祖弼亭，据《闲录》中所记，曾向兄索钱不得，携纸锭来焚化，则其人似亦非君子。惟所云随园陋习，当未必尽虚，盖士大夫中常有此等事，尚不如续编《食性》一则中记嗜痰与鼻涕者之尤为少见也。张君记此琐事，虽意在非袁，却亦可贵。鄙人曾从故友烨斋闻知名人逸事三四，自己见闻亦有若干，尚未能振笔直书，留为后世人作谈资，则朴直处不逮前人远矣。

□1940 年 3 月 1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跨鹤吹笙谱

顾子山著《眉绿楼词》，凡八种，分类成书，体例颇新。末一种曰《跨鹤吹笙谱》，皆赋其园中之景物，调寄《望江南》，凡六百首，诚如潘遵祁所云，创前人所未有。寒斋别有一册单行本，中缝无谱名，前有艮庵七十小像，盖是光绪庚辰年刻，在甲申总集上则像与题词小有修改，题作七十四岁矣。余又得《跨鹤吹笙续谱》一册，词千九十五首，系毛订批校本，唯只校至五十五叶，又多所删削，恐亦不能实行也，末尾题字一行云：“辛丑正月忆云读于武林”，小印朱文白“已庵”，似与批校者又非是一手。东厂图书馆续目中有此书，注云民国二十二年刊本，或者别是一本乎。闻平伯言，幼时曾游怡园，盖至光绪末园尚完好。冈千仞著《苏杭日记》，卷上记甲申闰五月初五游怡园事云：

> 归途过顾艮庵文彬，门陈“肃静”“道台”“翰林”“布政”等朱牌，皆在官时所用。导观其所辟怡园，曲房无阿，间以奇卉异草，澄池虚潭，交以古木怪石，石大者二三丈，岩窦四凿，突怒偃蹇，无斧削之痕，彩笼饲孔雀丹鹤锦鸡诸异禽，未知洛阳名园有此壮丽否？

冠盖游山，昔人所讥，然中国士大夫往往不免，如上文记顾君所陈头牌执事，亦其一例。自公退食，脱冕置几，枕石暂卧，固两不相妨，若乡绅花园门前立清道牌，虽是常事，思之亦自可笑也。

□1940 年 3 月 6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九烟遗集

小时候读《昭代丛书》中《将就园记》，心甚喜之，故至今还记得黄九烟的名字。近有书估以《九烟先生遗集》见示，道光己酉年刊，凡六卷，园记在卷二中，如见敌人，喜而留之。但现今重读，亦不见得大佳，惟文中却亦有佳作，桐城派甚恨吴越间遗老多放恣，九烟之可取盖亦即在此。《戏为逆旅主人责皋伯通书》，尽嬉笑怒骂之妙，在嘉道间谐文盛时似亦少如此好文章也。

据小引言，此集系依据《夏为堂别集》而加以增补，今查《贩书偶记》卷十四，《夏为堂别集》下附注篇目，则今本乃多所删削，如《岂想庵选梦略刻》一卷，便不复存。五年前在故友马隅卿君处见别集抄本，曾借阅一过，忆有《情窦诗》七律五首，今亦不见。《选梦略刻》只四十八则，手抄一本，尚在箧中。朱日荃弁言云，梦约万计，皆咄咄叱嗟，设想所不能到，兹刻尚未全梦也。按遗集卷一《陶密庵诗序》云，余故有《选梦》一编，纪平生梦中所得诗文联额之属，凡十馀卷。又卷二寄陶谿公云，仆生平颇多奇梦，尝裒辑梦中所见诗文联额之类，录为十卷，大都自作者什七，阅他人作者什三。盖《选梦》原本甚多，《略刻》只其一部分耳，今并此删去，大是可惜。且后人重刻先世遗集，而肆意去取，亦为不敬。此极浅近事，而世人多不了知，未免可笑也。

□1940 年 3 月 12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存拙斋札疏

罗叔蕴不愧为吾乡杰出之学者，亦颇有见识，其文章朴实尤可喜，所作序跋致佳，鄙意以为近时殆无可与伦比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用铅字排印，虽云仿宋，实不耐观，深惜其不用木刻。旧刻诸书昔曾有之，已多散失，近日始再搜集，如《读碑小笺》、《眼学偶得》、《面城精舍文》，均尚易导，《存拙斋札疏》稍少，不意中却得两本，略有异同，因合订存之。第一本有题叶篆书五字，背题光绪戊子夏刊，本文十二叶，末有汪悔翁跋。第二本无题叶，本文十八叶，汪跋后别有自题记，署壬辰仲夏，盖四年后所改订也。本文前五叶两本悉同，第二本六至十一凡六叶系新增入，十二至十八则与第一本六至十二各叶相同，唯末两叶中删去三则，补入一则为异耳。又第一本卷头小引署名罗振钰，第二本改为振玉，第一本之末尾有“弟振铭校字”一行五字，亦削去矣。此等异同虽本无关紧要，唯亦颇有意思，如看文章草稿，往往于涂抹添改处可以见其用意之所在。

读罗君晚年所为文，常自炫鬻其忠义，不免如范啸风言，令人心■，此则其一病也。

□1940 年 3 月 26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姚镜塘集

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纪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其实这些牵连来的大抵亦无甚可观，却终未厌弃。姚集初得一部，系光绪间重刻者，殊不满意，近日买到道光丁亥刊本，乃以旧有者转赠步庵，知其亦有潘集也。

龚定庵《己亥杂诗》之六十说及姚镜塘，注云：“抱功令文二千篇见归安姚先生学■，先生初奖借之，忽正色曰，我文着墨不着笔，汝文笔墨兼用。乃自烧功令文。”余前读姚集，见其中时文三卷，无所用之，颇为轻视，殊不知其如此名贵。定庵诗云，此事千秋无我席，故毅然一炬，若然，则余之不懂更何怪乎。《湖州府志》有周学濬所作姚君传，中引《己亥杂诗》注记焚时文事，云时仁和龚自珍负才傲睨，独心折至不敢道其字，称曰姚归安。此盖亦根据杂诗“毅然一炬为归安”一语，而似未免失之速断，诗注中原称其名曰姚先生学濬，其曰归安者只是诗语耳，如云镜塘固不叶平仄，即称姚公姚先生亦欠妥帖，自以地名为宜，未必是定称，到处都如此说法。或病琐窗幽一案不免以文章造意境，窃意此正是常有，亦复无妨，若必欲一筐樱桃先给予怀王，不但为古学家所笑，其实即作白话诗者亦未必以为是也。

□1940 年 4 月 2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汴宋竹枝词

书贾来，得河南官书局新刻《汴宋竹枝词》一册，板刻不精，纸亦粗疏，均不足怪，唯横摺，阅之未免不快耳。书凡二卷，共诗百首，宝丰李于潢著，前有蒋湘南撰李李村墓志铭，知其卒于道光乙未，盖已阅百年矣。蒋文不见于《七经楼文钞》，首节云，豕怜犬，犬怜牛，牛怜马，马怜龙，凡百七十三言，语殊诙诡，而其后叙述及铭共四百六十言，又极朴实而生动，为余所深喜。我不懂得诗，但竹枝词以志民俗风物，又事属汴京，作者对于风土之变不能无深恫，如小引所言，此则读者虽是风雅外行，亦能赏识也。

卷上有句云，相蓝买得葫芦种，才过清明便发芽。注引《过庭录》：黄鲁直曰，某顷见京师相国寺卖大葫芦种，仍背一葫芦甚大，一粒数百金，人竞买，至春种结仍瓠耳。又引《东原录》，俗谓一钱为一金。卷下句云，买得奇方赌不输。注引东坡《志林》，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奇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之曰但止乞头。从前读《志林》此则，对于千金一语总疑不能明，今得见上引二节，乃始恍然悟，然则我读竹枝词却又得增加知识，古人云，开卷有益，信然。清初之隆仁寺，现今之护国寺，非即宋之相蓝寺耶，想必仍有卖此种种可意物事者，乃自王洋以来未曾多识，以至于今。吾重翻前注，乃益叹宋人之有趣，诚为后人所不能及也。

□1940 年 4 月 4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绕竹山房诗稿

《绕竹山房诗稿》，馀姚朱文治著，正续共二十四卷。馀姚为会稽邻县，故买得之。诗不甚懂得，续稿中有绝句数十首纪乡土风物，颇觉可喜，唯注中解说常不甚高明耳。卷七《消寒竹枝词》中咏儿童玩具，注云，“不倒翁者使人立脚得住，假面者小儿要嬉戏，先蒙面以存羞恶心，吾意古人置一物大约如此。”案《潜夫论》浮侈第十二中云，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以为宜禁，固已过于严肃，今则颠倒的加以道德的解释，其可笑殆更过之矣。

又卷十《夏日遣怀诗》之五有云，“枫树不如丰市好，六书原是有谐声。”注云，“近葺石婆桥庙，余为书额，因改丰市。”盖地名原为枫树，馀姚土音树市同读，因为改题，取利市云。其实据我看来，枫树之名亦大佳，正不必改，改为丰市，尤见得有俗气，近于所谓市井小儿之见矣。

我们读《诗经》，觉得最特别处是其所谓兴，也最有风致。孔子说，多识于兽草木之名，就只是赏识些动植物也大有意思。读书人不能领解此等旨趣，更无怪商工纷纷以兴隆丰盛命名，招牌满街，全是吉利语矣。希望三多九如，本亦是人情之常，但这只可是一方面，今若使其统率一切，把对于自然的趣味都消灭了，学问便无从发芽，此损失不小也。

□1940 年 4 月 8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冷红轩集

前从杭州买得江宁人著作三部，悉有渔村印记，后又得二书，一为忏花庵刊《柳亭诗话》，一为《冷红轩诗集》，种类不同，然亦均有此印或题记，亦一奇矣。《冷红轩诗集》二卷，词一卷，长白女史友兰氏著，其子麟趾手书付刻，故颇精工，咸丰七年刊，但似不多见，《天咫偶闻》卷五八旗人著述书目中亦未列入。友人有搜集闺秀著作者，余则欲得旗人文集，因连类及之耳。据序跋言，作者燕山相国寡媳，斌良题词云燕山是其兄，盖即是桂良，斌良法良均有诗集，桂良则似无之。友兰姓萨克达氏，适得奕赓所著《清语人名译汉》，检之，萨克达下注曰母野猪，此尚有春秋时古风，唯以氏女诗人得无唐突，犹之诗人姓牛，亦终嫌不相称也。

《贩书偶记》卷十八别集类，《冷红轩诗集》二卷，长白女史百保友兰撰，光绪壬午葆真斋刊。《芸香馆遗诗》卷下有和友兰三姊诗数首，附录原唱二首，署名百保，下注友兰，今亦见《冷红轩诗》中。可知友兰本名百保，原集上不书，未审何故，殆至光绪重刊时始加上耶。

□1940 年 4 月 15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稗海纪游

偶从旧书估得《稗海纪游》一编，纸敝墨劣，而文可读，价亦不廉，但终收得之，因其记游历台湾事，盖亦不多见也。书共八十四叶，纪游居其大半，后附《伪郑逸事》，《番境拾遗》，《海上纪略》三种，题武林郁永河沧浪稿，襄平达纶经圃校刊，首叶则题道光乙未新镌，枣花轩主人订。据达纶序云，幼时于琉璃厂得写本，后官秦中，为之付梓，盖在郁氏游台百三十八年后矣。案《野棠轩文集》卷三有赵公行状，达纶为赵尔巽之祖，道光癸未进士，著有《台湾风土记》，《枣花轩稿》，《经圃日记》等，所云风土记疑即纪游之误。

郁永河游台湾在康熙丁丑（西历一六九七），因采硫黄，深入鸡笼番地，所记多险怪可喜，文亦颇佳。其记郑成功遗事虽只寥寥八则，陈永华父女传各一，而语殊翔实。其同行友人顾敷公于永历十三年被掠至台，留居三十馀年，故所据必多可信，且亦颇有推重语，达氏序中称其论郑氏事尤有古良史遗意，可谓有识矣。清末《申报》馆收入《屑玉丛谈》三集中，今亦已罕见，如或杭人有好事者收入小丛刻中，亦是胜事也。

□1940 年 4 月 18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左庵词话

《左庵词话》二册，不记卷数，各册页数自为起讫，惟一册末有跋语六行，姑以此定为上下册耳。下册有一则云：

> 《草堂诗馀》所录皆鄙俚，万不可读。舒白香《词谱》虽仅百首，调多未备，然皆选佳作，足资规模，不枉竹当年向钱遵王家巧偷得来。

偶然兴到涉笔，将《词谱》与《绝妙好词》混而为一，张冠李戴，虽是疏忽，但亦事所常有，不足深怪也。龙顾山人撰《清词玉屑》卷五云，

> 许迈孙娱园亦曰榆园，池亭树石，胜擅江左，其佳处曰疏香林屋，曰潭水山房，曰藕船，曰还读书堂，曰莲花诗龛，曰微云楼，山阴王眉叔各谱《望江南》写之。

其错误亦正相同。许迈孙固亦有其娱园，惟有疏香林屋等之娱园乃在会稽小皋步，盖是秦秋伊之园，戊戌前后屡游其地，微云楼已不能登，潭水山房尚完好，乃只是一楹屋，阶前有一方池，别无甚佳趣也。秦氏于光绪丙戌刻有《娱园诗存》四卷，卷三为《萝赏集》，集录同人题咏诗词，王眉叔《望江南》词共十首均收在卷内，龙顾山人所录盖是王氏《笙月词》，此词适为许迈孙所刻，遂以此误会耳。

□1940 年 4 月 20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七修类稿

郎仁宝著《七修类稿》，文笔拖沓，见识卑陋，阅之闷损，惟卷帙颇富，资料可取，仍不失为明代重要说部之一。卷十五至十八为“义理类”，发挥意见多在此数卷内，但亦偶有佳论，如卷十七“邓攸弃子全侄”一条云：

> 弃子全侄，《中兴书》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复系子于树。予意子侄皆幼，势难两全，故弃子而全侄，今既追及，则不惟可与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刘须溪以为无是事，喜谈全侄而甚之之辞也，然考之本传及当时人之言皆同，则又实有是情。呜呼，可与同行而又系之树，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无儿，何天道无知哉。噫，晋之好名至此极矣。

按邓攸事正与郭巨埋儿是一类，人性有偏至，当时或迫而出此，后世当以悯默处之，不必多论，惟若标榜以为孝弟轨范，则大是害理，俞理初所谓酷儒莠书，不可轻许耳。郎氏以不忍人之心立言，自是正论，惟谓此所以伯道无儿，犹未免有报应之陋见，其实亦只是求仁得仁而已。又归结到晋之好名，亦不对题，盖莠书目的，在于私利，于名无所与者也。

尝见启蒙书中引陆陇其著《崇明老人记》，近日读《甘泉乡人稿》，又见其演述为诗，为之不快者累日。老人鬻其四子为人奴，晚年得诸子孝养，唯以赌博度日，此岂非平世莠民？而陆钱诸公盛称之，以为是幸福的父亲的榜样，儒生失理性至于此，则又比较表扬邓郭为尤甚矣。

□1940 年 4 月 23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辛卯侍行记

陶拙存著《辛卯侍行记》六卷，书不难得，而多用毛太纸，近日始得官堆纸印者一部，与原《求己录》仿佛，亦可喜也。此书记西北地理，间有记事言处，亦殊有理致。卷一记五月十三日出怀庆东门，注云：

> 有郭巨故里碑。按巨虑子分母食，何不托子于友，曲为斡旋，乃欲埋之，则大伤母心，不得为孝，岂可传之丹青乎。凡编训蒙之书，当取切近情理者。向见某书图画故事，首卷即绘唐人元德秀以丈夫生乳湩，乳其犹子一事，此为理所必无，近时童子多狡，以此等谰言示之无益有损。

案郭巨事大悖理，后世亦多非之者，所云训蒙书一节尤为有识，操觚者不可不知。其实不仅是元德秀，即董永亦是一例，《太平御览》中记此事颇详，云引刘向《孝子传》，而冯梦龙的《笑府》与赵梦白的《笑赞》中均录有笑话云，董永行孝，天使仙女嫁之，众仙女饯行，皆嘱付曰，此去下方访有行孝者，寄个信来。此不必待赵君之赞，已知其悠谬，但董永不过使人觉得可笑而已，尚无大害，若元德秀则竟是人痾矣。又卷六记腊月初四日至三角泉，云南山下出泉，成沟，有草地数里。注云：

> 皆旱芦及拳曲之短茨，俗呼刺疙疸，间有席其草，或作息鸡，或作芟箕。集吉、芨芨。戈壁中得水气，只生此三卉，远望芃芃，近视则数步一丛，仍是粗沙细石及碱块，罕有土壤，非独不可耕植，即移他处之草于此亦不能活。大漠不毛十而七八，车中望见荒草，为之一释愁容也。

此记塞外风物，颇有情致，又得之亲历，与耳食者迥殊，书中曾讥评主蒙古屯田议者，龚定庵虽倔强，于此亦当无可争辩也。

□1940 年 4 月 26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舌 华 录

《舌华录》九卷，明曹臣纂著，采录诸书，惟取语不取事，分“慧语”以至“凄语”凡十八类。昔在人家曾见过不全小本，近年乃搜得大本两部，其一首有万历乙卯潘之恒序，袁中道序无年月，有宋兰挥藏印数方，其二只存袁序，而板刻稍佳，似是原刊本。

小时候读《砚云甲编》中《陶庵梦忆》，始知《舌华录》的名字，原文有云：

> 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余父余叔至不能饮一蠡壳，食糟茄面辄发赧。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一簋进，弟兄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有客在，不待客辞，亦即立去。山人张东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近有伦父载之《舌华录》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板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

今查原书乃不见此条，细看卷三“冷语”第六中间两本均缺一叶，乃从友人借上海有光纸石印本阅之，补抄七则，恰在其内。文云：

> 会稽张状元诸孙四五辈皆不饮酒，善肴物，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尽乃止。沈曼长日，张氏兄弟赋性奇哉，遇肴不论美恶只是吃，遇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

卷首列所采书目五十馀部，不知此条出于何书，纵或失实，曹氏可不负其责，惟与张东谷语比较，确有不及处。又以张元汴为会稽人，亦有错误。

□1940 年 4 月 30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夷 坚 志

《夷坚志》全书共四百二十卷，小说家中卷帙为最繁，惜已不全，今只存甲乙丙丁各二十卷，十万卷楼依影宋钞本重刊，流行于世。洪景卢喜编著大部书，内容不免芜杂，《研经室外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三称其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评甚公允。丙志卷十八有契丹诵诗一则云：

> 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

案此所记盖是汉文对读之常态，但在昔时少所见，不免以为奇怪耳。契丹文字少见，不知中国有人通其读法否，此处尚可想见其句法排列，亦可喜也。平常池中多作池边，契丹语译则说定为倒影水底之树，又鸟译作者鸦，均可广异闻，未必读鸟为乌，大抵在此景色中以乌鸦为更相适欤。周松霭辑《辽诗话》二卷，矩细毕搜，此一则亦殊有风趣，不知何以遗失也。

又案《辛卯侍行记》卷一注中论华英文难易，其十一难曰，华文多顺理成章，其倒讲者绝少，英文大都倒讲，如曰尔若干岁，译之为如何老是你也。陶拙存在清末亦是有识者，于此尚未免有倒顺之见，洪君古人，自更不足怪矣。

□1940 年 5 月 5 日刊《庸报》，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入都日记

从杭州书店得旧书数种，均颇可喜，此店在清波门内花牌楼，戊戌居杭时曾住在此街，距塔儿头不远，殊有怀旧之思。书皆小品，其一为医俗道人著《俗语指谬》三卷，《杭州白话报》抽订本，木板竹纸，辛丑年刊。其二为钱大昭著《迩言》六卷，光绪四年“啸园”重刊中箱本，唯与茹氏《越言释》均未收入丛书中，不知何也。其三为《南菁丛书》本《戴氏论语注》二十卷。其四则《入都日记》一册不分卷，不菁撰人姓氏，唯读第一叶即可知为李圭所著书，记光绪丁亥进京验看引见事，自六月十九至十月十二逐日有记，极琐屑切实可观。

记中常及与黄思水相见事，有数处更与《思痛记》有连，如八月十七日条下云，令仆分送子畴慎之诸同乡土仪，火腿各一肘，茶叶各四瓶，《环游地球新录》《思痛记》各一部。又九月二十三日条下云，慎之读余《思痛记》，悲往日被难之惨不减于余，为加序焉。案《思痛记》一本有黄思永序，署光绪十三年九月下浣，时日正相合。卷末又附到省记事，十月二十九日条下云：

申刻登城隍山，访伍公祠，当日在难中题壁诗已不见。前诗云：

罡风吹我下杭州，江水滔滔去不休。

今日伍公祠畔立，何期吾尚戴吾头。

追忆昔日所遭，犹不禁酸鼻也。

此一绝句亦可补入《思痛记》中，前后相去盖有二十七年矣。李君著作余着意收罗，虽重复亦必收，今于无意中又得此日记，亦大是可喜事也。

□1940 年 7 月 14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老老恒言

慈山居士曹庭栋所著书，寒斋只有《逸语》十卷，《永宇溪庄识略》六卷，皆乾隆时原刻。《老老恒言》五卷有两种，其一为光绪己卯孙氏刻本，收在《楳李遗书》内，其二题光绪癸卯偶园刊本。案《楳李遗书》本孙稼亭跋云旧本罕存，金眉生得之私为枕秘，既而刻之乡塾，曾以一册见贻，因重校付梓。今偶园本有同治九年金氏序，文中恬字未避讳，板式行款及中缝上下鱼尾等悉与《永宇溪庄识略》相同，当系所云乡塾原板，后为偶园所得，改刻年代，此类事盖数见不鲜者也。《识略》卷六为《识阅历》，即自撰年谱，记文甚简，而事多有趣味。乾隆十一年丙寅下云：

“是岁著《逸语》，勿少懈。注及盗泉二字，未考所出，检《水经注》已终卷不得，忽风过几案间，揭开盗泉出处，乃注明之。”与孙渊如的《孔子集语》相比，《逸语》自觉谨严少逊，唯因此亦别有其风趣。注语多通达，如盗泉一节即是好例。《逸语》卷十“州里”第十九引《尸子》云：“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注云：

> 盗泉，《水经注》曰：洙水西南流，盗泉水注之，泉出卞城东北卞山之阴。盖盗泉近孔子之居，孔子往来常过之，既不宿其地，亦不饮其水，故记者志之日，恶其名也。愚谓不宿不饮，必有心恶其名而然，圣人不若是之迂也。盖暮矣可宿而犹可无宿，即不宿，渴矣可饮而犹可无饮，即不饮，行所无事而自出于正。特在记者窥测之，则以为恶其名耳。然学者苟即是说而推焉，亦足为慎微谨小之方也。

曹氏自称慈山居士，《老老恒言》孙跋中云，园有土阜数仞，因家居奉母，命曰慈山，晚岁即以自号，《年谱》乾隆九年甲子下云：

> 邑中有浚河之役，园艮隅馀隙地，令堆积淤泥，人便之，更拆去北廓五架，尽为堆积地，数日间岿然成山，以恰值母寿，名曰慈山。尝赋诗，有“时维二月九，春和气融漾，慈帏敞寿筵，适对兹山爽，兹山讵云高，我乡却无两”之句。

此说慈山原始，更为详尽。跋又云，乾隆丙辰词科再启，君与兄古谦明经庭枢均以鸿博特征。朱序云，己未丙辰两次鸿博，祖子顾少宰尔堪、兄古谦明经庭枢皆就征，此盖为跋语所本，其实却未确。检《年谱》，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八岁，十一月古谦弟生。丙辰词科与试未用者二百二人，中有曹庭枢，即慈山之弟，名当作廷而非庭。《识略》卷三《识杂文》中有《慈山居士自叙传》，末云：“名庭栋……初名廷，后改为庭，以示终老牖下之意云。”《年谱》乾隆元年丙辰条下云，是岁以孝廉方正荐，敦促验看，自问不敢当此，以病辞。查丙辰不就试者二十五人，其中亦无慈山名，可知所谓以鸿博征亦是传文之误。又《年谱》卷首载祖蓼怀公讳鉴伦，康熙己未进士。曹子顾举顺治壬辰进士，在康熙已未二十七年前，为慈山曾祖子闲之弟，见于《西堂杂组》。朱孙二君与慈山同里闬，而所记均不免有谬误，于此盖可见考证之难矣。

《老老恒言》有序跋，自述著作大意，《年谱》中所记亦更为实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七十四岁下云：

“自秋入冬薄病缠绵，终日独坐卧室，著《老老恒言》四卷。”三十八年癸巳下云：

“元旦口占：爆竹声喧日上初，醒犹恋枕起徐徐，衰年自笑曾何补，四

卷新编老老书。”又云：

“夏初发刻《老老恒言》，补著《粥谱》一卷，共五卷，岁暮刻工始竣。”《年谱》记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慈山年七十八岁，据金序称其寿至九十馀，然则尚有十馀年未记，亦可惜也。

我读《老老恒言》，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说是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他所说多通达事理。著者在卷四之末说明道，总之养生之道惟贵自然，不可纤毫着意，知此思过半矣。卷二《燕居》中云：

> 少年热闹之场，非其类则弗亲，苟不见几知退，取憎而已。至与二三老友相对闲谈，偶关世事，不必论是非，不必较长短，慎尔出话，亦所以定心气。

又同卷《见客》中云：

> 喜淡旧事，爱听新闻，老人之常态，但不可太烦，亦不可太久，少有倦意而止。客即在座，勿用周旋，如张潮诗所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可也。大呼大笑，耗人元气，对客时亦须检束。

此等文字一看似亦甚平常，但实在却颇难得，所难即在平常处，中国教训多过高，易言之亦可云偏激，若能平常，便是希有可贵矣。孔子有言，及其者也，戒之在得。得不必一定是钱财，官爵威权以及姬侍等都是，即如不安于老死，希求延年长生，也无不是贪得之表示。《恒言》的著者却没有这种欲望，自序称亦只就起居寝食琐屑求之，《素问》所谓适嗜欲于世俗之常，绝非谈神仙讲丹药之异术也。大抵此派养生宗旨止是啬耳，至多说是吝，却总扯不到贪上去，仿佛是杨朱的安乐派，出于道家而与方士相反，若极其自然之致，到得陶公《神释》所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境地，那也就与儒家合一，是最和平中正的态度了。

第二的理由，因为这是一部很好的老年的书。三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很慨叹中国缺少给中年以及老年人看的好书，所谓好书，并不要关于宗教道德虽然给予安心与信仰而令人益硬化的东西，却是通达人情物理，能增益智慧，涵养性情的一类著作。此事谈何容易，慨叹一时无从取消，但是想起《老老恒言》来，觉得他总可以算得好书之一，如有好事人雕板精印，当作六十寿礼，倒是极合适的。说到小毛病当然亦不是没有，最明显的是在卫生上喜谈阴阳五行，不过他引的本来多是古书，就是现在许多名医岂不也是讲的这一套，知识阶级的病人能有几个不再相信的，那么对于慈山居士也觉得不好怎么责备了。孟子说老吾老，又说幼吾幼，今《老老恒言》有书可读，闻有《幼幼集成》，却无意去看，恐怕只是普通的小儿科罢。老人虽衰病，尚能执笔，故可自做书自看，小孩子则话还说不好，难怪无所表见，若父兄忙于功名，亦无暇管闲事也。

此外还有一点意见。我觉得养老乃是孝之精义。从前见书中恭维皇上，或是他自夸，常说以孝治天下，心里总怀疑，这是怎么治法呢？近日翻阅《孟子》，看到这样一节，这才恍然大悟。《离娄上》云：

>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

又《梁惠王上》云：

>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同样的话，孟子对了梁惠王齐宣王都说了一遍，意思极是郑重，很可见养老之政治的意义。《说文解字》八云：“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又云：“ 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 ”由是可知，善事父母亦着重在老年，我想中国言孝之可取即在于此。从前我写过《家之上下四旁》一文，曾说道：“ 父母少壮时能够自己照顾，而且他们那时还要照顾子女呢，所以不成什么问题。成问题的是在老年，这不但衣食等事，重要的还是老年的孤独。 ”只可惜后世言孝者不注重此点，以致愈说愈远，不但渐违物理，亦并近于非人情矣。《老老恒言》在此点上却大有可取，盖足为儒门事亲之一助，岂止可送寿礼而已哉。

□1940 年 7 月刊《中和月刊》1 卷 7 期，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宋琐语

郝兰皋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学者。他在乾嘉时代主要的地位是经师，但是他的学问里包含着一种风趣与见识，所以自成特殊的格调，理想的学者我想就该是那么样的吧？近日拿出《宋琐语》来读，这是一册辑录书，早一点的有周两螣的《南北史裙华》，再早是张石宗的《廿一史识馀》，虽然都还可以看得，也只是平平罢了，但郝君的便有点儿不同。小序云：

> 沈休文之《宋书》华瞻清妍，纤秾有体，往往读其书如亲见其人，于班范书陈寿志之外别开躁径，抑亦近古史书之最良者也。

他赏识《宋书》的文章，很有道理，所录凡二十八类，标目立名，亦甚有风致，与《世说新语》所题差可比拟，馀人殆莫及也。本文后偶着评注，多可启发人意，读之唯恨其少。如“德音第一”述宋高祖将去三秦，父老诣门流涕陈诉事，注有云：

> 三秦父老诣门之诉，情旨悲凉，颇似汉祖入关约法时。然武帝此举实非兴复旧京也，外示威棱，内图禅代，匆匆东归，而佛佛遂乘其后。青泥败窜，几至匹马只轮，义真独逃草中，仅以身免，而关中百二仍化为戎场矣。父老流涕，至今如闻其声云。

“藻鉴第二”记何长瑜在会稽郡教读，不见尊礼事，注云：

> 按蔡谟授书皇子，仅免博士之称，长瑜教读惠连，乃贻下客之食，晋宋间人待先生已自俭薄乃尔。近日馆谷不丰，贻为口实，京师人遂入歌谣，良无怪已。又“谈谐第二十四”引“武二王传”云，南郡王义宣生而舌短，涩于言论。注云：
>
> 按舌短亦非生就，多是少小娇惯所为。《颜氏家训》谓郢州为永州，亦其类也。

凡此皆有意致，与本文相发明，涉笔成趣，又自别有意思，如舌短之注，看似寻常，却于此中可以见到多少常识与机智，正是大不易及。

□1940 年 8 月 11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南园记

爽良著《野棠轩摭言》卷三《言文》中有一则云：

陆放翁为《南园记》《阅古泉记》，皆寓策励之意，今之人使为达官作文，不能尔也。韩败，台评及于放翁，不过以媚弥远耳，亦何足道。而后人往往讥之，虽曲园先生亦为是言（见《茶香室四钞》）。先生至为和平，持论向为通允，此盖涉笔及之。袁子才独不尔，信通人也。前见陈作霖著《养和轩随笔》，有云，“大抵苛刻之论，皆自讲学家始，而于文人为尤甚，如斥陆放翁作《南园记》，亦其类也。”当时甚服其有见识，今爽氏所言则又有进。讲学家好为苛论，尚只是天资刻薄而已，若媚权臣，岂不更下数等耶。士大夫骂秦桧而又恶韩侂胄，已反复得出奇矣，在数百年之后还钻弥远，益不知是何意思，憩叟揭而出之，诚不愧为通人，或当更出随园之右也。〔曲园先生持论通允，而论放翁未能免俗，盖因和平故乃不克为直言以忤世俗耳。〕

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为读史的正途。向来文人不能这样作，却喜欢妄下雌黄，说千百年前人的好坏，我想这怕不是书房里多做史论的缘故么？外国人做文章便不听说如此牵引史事，譬如英国克林威尔，法国那颇伦，总算史上有名，而且好坏都有可说的了，却并不那么常见，未必是西洋人的记忆力差，殆因未曾学做策论之故吧。无论看哪一部史书，不要视为文料或课题，却当作自家的事看去，这其中便可以见到好些处令人悚然，是即所谓殷鉴，尔时虽不能惧思，也总无暇写厚于责人的史论矣。

□1940 年 8 月 18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

[1] 本文于 1941 年收入《药堂语录》后，又于 1944 年收入《书房一角》，加入了方括弧内的一句话，同时删去了（见《茶香室四钞》）一语和从“古人云”起最后一整段。

燕窗闲话

《燕窗闲话》二卷，光绪辛卯年刊，题江阴郑守庭先生著，盖其门人辈所编刻者也。卷末附墓志铭，亦其门人所撰，而生卒年月不可考，但记其七十五岁时事，云“明年卒”，如抓云雾。惟查卷上记中举人时自云已未生，乃知其生于嘉庆四年，卒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中国为传记于此多不注意，“疑年录”之叠出殆亦不得已耶。

《闲话》所记悉其半生阅历，不说果报妖异，自有特色，虽大事不出教读、赈饥、讲乡约诸端，但写小时候琐事，亦复朴实可取。有一节云：

> 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解仅数语，阅三四本后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说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然所解时有谬误者，读“子罕言利”，误认子罕为宋之乐喜。读《易经》“象曰”，不知为大象小象，误认为舜弟，窃疑所言俱佳，想为舜所化，克谐之后学问大进也。思之俱堪发粲。

余前作《我学国文的经验》一文，曾说以前所读之经书于我毫无益处，后来之能够写文字，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这即是看闲书小说。平常我劝青年多学外国文，主张硬读，对于一种文字约略入门之后，便来查字典看书，头一次即使只懂得十之一二，还是看下去，随后覆阅就可懂三四分，逐渐进至七八分之多，那便有了把握了。郑君所说差不多即可为我作证明，古人云，德不孤，必有邻，其是之谓欤。

□1940 年 9 月 2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澹庵文存

数年前得《芸香阁尺一书》二卷，无锡朱荫培撰，读之知其与秋水轩有关，盖尺牍颇受许葭村影响，卷中又有致许又村书也。去年老友覃公以吾乡《平蝶园酒话》抄本见贻，前有朱氏序，云平筠士见属，筠士即蝶园子，为朱氏门人，《尺一书》有跋语，即其所编刻。后得《咒笋园剩稿》，作者傅霖亦吾乡人，又有朱氏序跋在焉。因为这些因缘，我对于芸香阁著作颇想搜集一看，却是不易得，近日始从杭州寄到一册《澹庵文存》，据尹继美跋语，似同治丁卯已经评刻，今内有己巳年遗文，当系殁后重订，只有抄本欤。

书凡二卷，存文十七篇，诸人题词称其壮年好为骈俪诙谐之文，后从梅伯言闻义法，乃识宗派。今读一过，简炼可取，而其屈就义法处恒失之略或夸，此盖是桐城派文必然的短长也。《咒笋园剩稿》序今见《文存》卷一中，原本序跋各一，合并为一篇，大加修改，益朗朗可诵矣。尹评云吞吐有神，可谓适当，但如想要在其中采集事实，则远不及原刻二文。如序言卒时年仅三十七，跋言时为咸丰七年十月初五未时，改本均无。又序云遗橐千金，散之立尽，改本乃作万金。跋云，将死，邻左右厌苦之，雨莼曰，朱某心殓而葬我，不汝累也，改本添两句曰，我前世僧也，行将去矣。实的事情削去，虚的增上，皆为行文计耳。一唱三叹，附以教训，文成矣而情益减，良不如《尺一书》中致傅雨莼一札，多大皮囊装得如许愁恨云云，虽是秋水轩调，尚得见多少情意也。其馀各文别无甚意见，读去原自成为一篇古文，后人不必多下雌黄，因无比较材料，好坏说来也不明显，今悉从略。

□1940 年 10 月 8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松崖诗钞

《松崖诗钞》一卷，武康李钟撰，抄本，皆近体诗，共一百一首。首叶有印，白文云阮亨梅叔，末有墨笔题字一行云，“甲子冬日扬州阮亨梅叔敬读于武林抚院之诚本堂”，名字上盖二印，朱文曰仲嘉，白文曰阮亨印，皆颠倒，二之上重盖朱文印梅叔，故重叠猝难辨识。卷首夹红纸一幅，似系第二纸，首二字曰钧诲，当系承上文，下云：

> 武康僻在群山中，辁材讽说之士，专务帖括，以习古为大愚。广文髦而好学，其诗又天机清妙，实为此乡所仅有。若蒙夫子题辞奖借，则闻者必踵而起，固陋之俗，可以小变。伏求赐以弁言，慰其慕韩之意，则广文幸甚，熊飞幸甚。

此盖是徐雪庐手笔，其上又有草字涂改，其文云：

> 讽说之士，专务帖括，以习古为大愚，今广文之诗，颇似陆放翁，而胸次更无芥蒂焉。王右丞云，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真趣矣。吾于广文之诗亦云。嘉庆甲子，扬州阮元序。

有白文印云伯元。案阮君编集《两浙辅轩录》，成于辛酉癸亥，此书呈进稍迟，又录例不收生存人，故未能入选。惟潘峄琴编《续录》及《补遗》共六十卷，在九十年后，乃亦不收入，未知何故，岂传抄本不多，采访者未之见那。徐雪庐著《春雪亭诗话》颇可喜，据小引盖作于嘉庆乙丑，卷中常引故人诗句，而亦不及松崖，然则松崖诗岂真在此一册中欤。余不知诗，惟喜其多真率处，又常言酒，似是真爱饮酒者，与寻常诗料不同。《避地》五律中云，市近亲赊酒，村荒寄卖鱼，句云，酒债急须偿，又云酒债嫌多积，赊盖属实。其自咏广文先生生活之七律有云，喜酒不嫌妻对酌，以诗论不知如何，然此语总之极佳，殆可谓自有其真趣者也。

□1940 年 10 月 16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读诗管见

江叔海《石翁山房札记》卷三有牟陌人《诗切》一则云：

栖霞牟廷相陌人，孜孜三十馀年成《诗切》一书，手稿凡六易，大旨谓当劾郑笺，黜卫序，寻博征，申浮丘申培之坠义，顾所改侍序类多影响依附，或凿空臆撰，无所谓寻博征申坠义也。其最可嗤鄙者，如《桑中》刺丑夫欲得美室而不谐也，《有菴》咏丑妇欲去其夫也，《有狐》童子宦学，其友作诗戒之，以卫多女间也，《葛生》刺寡妇不谨也，《东门池》观美女戏舟也，《东门杨》咏夜游张灯也，《泽陂》嘲人怕妇也，《鱼丽》刺众客无廉耻而嗜饮食也。说《诗》至此，风雅扫地矣。近人罗慎斋《诗说》尤多创论，至谓“视尔如菽，贻我握椒”为指男女阴。此真诗之一厄。

案江君此说颇有传讹，亡友饼斋尝以问馀杭先生曰，菽何物也？先生曰，大头菜耳。此语至今流传。后饼斋从老铁借得凝斋《读诗管见》阅之，始知所说不实。罗氏原书卷五云，“视尔如菽，谓其色与菽之华同耳。菽华白而浅红，布地繁密，亦秾丽而可爱者。椒性辛温大热，食之走气分而助火。”并未曾指男女阴，江君殆出误记。又罗氏生乾隆时而称之曰近人，亦误。唯凝斋以椒为春药，谓猝投之而强使吞之。又释子仲之子云，子为子仲之丈夫子，非女子也。谓诗咏强暴者于白昼稠人间掠美少年以去，则解亦大奇，惟不如札记之所云耳。牟氏《诗切》不可得见，但其序尚有传本，又罗氏《诗问》中间或引其数语，“视尔如菽”二语下引牟陌人云，妇人相语也。想必别有说法，惜不能得其详矣。《诗切》所说序虽多似诙诡，然亦颇有适切者。如《泽陂》之第三章云：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
有美一人，硕大且俨。
寤寐无为，辗转伏枕。

牟氏解之为陈人怕妇诗，岂不极似？徐读一过，直令人忍俊不禁。此虽未能谓为确解，总不得不说殊有巧思也。

□1940 年 12 月 3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曾衍东诗

春间偶得《哑然绝句》诗一册，内题“ 哑然诗句 ”，“ 七如道士曾衍东著 ”，手写木刻，半叶六行，行十二至十五字不等，皆七言绝句，每首连题共四行，一叶得三首，凡七十七叶，计诗二百四十首有半，末尾残缺。首有序云。

> 七如诗句多不成话，却又好笑。以其不成话，便当覆瓿。因其多好笑，搁在巾箱，舍不得遭蹋他了。久之成堆，公然一集。古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
> 哑然绝句自序，嘉庆戊辰，七如道士曾衍东。

我读其诗其序文，看其字其款式，如“ 嘉庆戊辰 ”四字夹行并写，其图章，如云“ 曾大诗书画 ”，“ 曾先生妙笔 ”，可知是郑板桥一派，又一印文云，宗圣裔六十七世孙衍东，则是曾子之后也。曾见王西庄郝兰皋所写信，有模仿板桥体者，可以想见其时风气之一斑，只可惜现在找材料不大容易，若此诗集在这一点上颇有价值，若其多好笑读了有趣，又其次也。关于曾君的事，只见方士淦《蔗馀偶笔》中有一则云：

> 楼未起时先有鹤，笔从搁后更无诗，曾大令衍东题黄鹤楼太白堂楹帖也，超妙之作，足冠斯楼。阮太傅总制楚中，命去之，然早已脍炙人口矣。

今集中有《黄鹤楼》一首云：

> 楼高多少步楼梯，直上高楼远水低，
> 画鹤鹤飞都不见，大江东去夕阳西。又有下乡诗云：
> 丝縷榔竿轿大乘，四围雪亮玉壶冰，
> 村姑不识玻璃面，纤手摸来隔一层。

此盖是居官时作，但不知是何处令君，或者当在两湖乎。曾君圣裔，而喜作打油诗，岂不怕世人之攒诃聚署耶？此一事亦令我感到兴趣。前见孔传铎所作《申椒集》及《红萼词》各二卷，多隽艳可喜，此人乃衍圣公也，虽是性质略略不同，但亦可谓无独而有偶矣。

□1940 年 12 月 10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右台仙馆笔记

《艺风堂文续集》卷二有《俞曲园先生行状》，末有云：

> 古来小说，《燕丹子》传奇体也，《西京杂记》小说体也，至《太平广记》，以博采为宗旨，合两体为一帙，后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笔记》，以晋人之清谈，写宋人之名理，劝善惩恶，使人观感于不自知，前之者《阅微草堂五种》，后之者《寄龛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华者所可比也。

缪君不愧为目录学专家，又是《书目答问》的著者，故所说甚得要领，以纪晓岚孙彦清二家笔记与曲园相比，亦有识见，但其实铢两殊不能悉称，盖纪孙二君皆不免用心太过，即是希望有功于世道，坐此落入恶趣，成为宣传之书，惟以文笔尚简洁，聊可一读，差不至令人哕弃耳。

《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虽亦有志于劝戒，只是态度朴实，但直录所闻，尽多离奇荒陋，却并非成见，或故作寓言，自是高人一等，非碌碌馀子所可企及也。试以卷一为例，第一则记冯孝子，虽曰以表纯孝，庶几左氏之义，写的落落大方，有古孝子传之风。又何明达、王慕堂二则，写市井细民之高义，可以愧士大夫，而了无因果的结局，近世说部中均极少见。若其记范婉如及扬州某甲女，痴儿怨女之情死，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乃多有恕词，此则又是儒家之精神，为不佞所最崇敬者也。潮州制柿饼人砍断虎尾，因而获虎，末曰：“孔子曰，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为也。”应敏斋在钱唐江沙洲上见绿色巨人，末曰：“《搜神记》载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馀，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出与战，仆之于地，乃是大鲠鱼。君之所见，或亦此类乎。”此等处骤视似只是文人旧习，所谓考据癖耳，实则极有意思，轻妙与庄重相和，有滑稽之趣，能令卷中玄怪之空气忽见变易，有如清风一缕之入室，看似寻常，却是甚不易到也。

卷首附刻征求异闻启并小诗二首，其一末联云，“正似东坡老无事，听人说鬼便欣然”，夫听说鬼之态度有如东坡，岂复有间然，而先生年老又似乐天与放翁，更无些子火气，则自愈见醇净矣。

□1940 年 12 月 17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方晓卿蠹存

近来旧书大涨价，但比较起来总比洋书为廉，所以还要买些来看。我看书没有专门可以做个界限，只是凭了兴趣，简单的说目的只是想知道罢了。

而拉扯开去便有点近于芜杂。时常看见了一部书，随即想找这著者的别的东西来看，结果往往是很花了一点钱，而又大抵看了没有什么意思。买到姚福均的《铸鼎馀闻》四卷，很是别致，于是设法去我了《补篱遗稿》八卷，《海虞艺文志》六卷来。其次是方旭的《虫荟》五卷，续找来的有方晓卿《蠹存》二卷，光绪戊戌刊本。《虫荟》收罗材料颇不少，可以算是关于动物的一部类书，特别是蛇的一部分，读去仿佛是听讲希奇故事，也颇有意思。

《蠹存》却是一部怪书，目录共分天文时令神鬼形体妇婴食物植物等十八目，据序言凡因应之大，事物之细，罔不毕具，以广见闻，神日用，似乎是《万宝全书》之类，而又实是笔记，所以是特别。如时令中多列禁忌，宫室方位，方药亦杂神异，其所主似近于方技，用现代语当称之为非科学的，但因此亦多保存好些旧传承或是民俗的好资料也。

神鬼一目颇足比拟《西阳杂俎》，其说鬼尤多妙语，但不著出处，稍为可惜，所说不必一致，故疑其非出于一源。“水鬼”一则云：

> 鬼作纸灰气，惟水鬼作羊臊气，如人在船中闻羊臊气，急向空写嚣字，则不为害。按溺鬼作羊膻气，亦见《子不语》，岂已视为水怪故耶，写嚣字可以避害亦奇，符咒的心理亦大值得研究，但恐不易得此闲人耳。

□1940 年 12 月 24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春在堂杂文

《春在堂全书》十年前购得一部，共一百六十本，堆放书架上，有望洋之叹。不佞不懂经学，全书中精粹部分以是不能了解，以前陆续抽读的只是尺牍随笔杂抄笔记这一类，大都是曲园先生业馀遣兴之作罢了。我向来很佩服曲园先生以一代经师而留心轻文学，对于小说故事做过好些研究，读《右台仙馆笔记》中《黄土老爷》诸篇，觉得是好文字，非一般说部中所有。近来闲居无事，拿出《杂文》来看，有许多文章看得甚喜欢，特别是序文一类，觉得在近代文章中极少有的。

平常讲词章的人批评曲园先生的诗文总说是平庸，本来曲园诗自说出于乐天放翁，文也自认文体卑弱，似乎一般的批评也还不错。但是，诗我不大懂今且慢谈，文的好坏说起来颇有问题，因为论文的标准便有好些差异。有喜谈义理者，不但主张言中有物，其物还必须是某一派的正统思想，所以如不是面红耳赤的卫道，或力竭声嘶的辟邪，便不能算是好文字。又有好讲音律者，凡是文章须得好念，有如昔人念韩愈《送董邵南序》，数易其气而后成声，然后铿锵镗鞳，各有腔调，听之陶然。然而在此二派之外还可以有一种看法，即是不把文章当作符咒或是皮黄看，却只算做写在纸上的说话，话里头有意思，而语句又传达得出来，这是普通说话的条件，也正可以拿来论文章。我就是这一派看法的，许多传世的名文在我看去都不过是烂调时髦话，而有些被称为平庸或浅薄的实在倒有可取，因为他自有意思，也能说得好，正如我从前所说有见识与趣味这两种成分，我理想中好文章无非如此而已。《春在堂杂文》现在便可以给我做一个很好的例。

序文极是常见的东西，人们即使不从文集里去找了来读，无论看什么书大抵前面总可见到一两篇序文的。但是平常有谁看了觉得喜欢呢？我近二十年来才学会看书先看序，可是结果多是不满意，难道真如郑板桥所说敷衍的太多么。其实例还因为照程式做的多了的缘故，这些大都选得进《古文范》里去，在我们想找平庸的说话看的人却也就不免失望了。曲园先生的序文在书上常可见到，这不仅如章太炎先生所微讽，先生好以笔札泛爱人，《杂文》自序中也自己承认性好徇人之求，那么这些序文一定多有敷衍的了。然而我们的经验是，一部书上有几篇序，其中如有曲园先生的在内，则其中最可读的必定就是曲园先生的那一篇。在《天津征献诗》、《槃邁纪事初稿》、《习古斋画絮》、《眉绿楼词》等诸书中，都是这样。为什么缘故呢？作序即使同是敷衍，因为这多少总是赋得，但敷衍也有不同，有如寒暄，一种是照例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种也是说今天天气好或是冷，不过关于冷稍有发挥，说是早上见了霜，或是阴寒得很萧寂，有些物理人情上的根据，这就觉得有点意味了。曲园先生的序便是关于这事物总有意见要说，说得又有诚意又有风趣，读下去使人总有所得，而所说的却大抵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道理，此正是难能可贵的地方，近世一般文人所极不易及者也。

现在试举几个实例。《杂文》卷一《逊学斋诗集序》说风与雅的区别，说明后世的诗里也有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荔园词序》论诗词曲三者变迁之迹，即阐明其特色所在。三编卷三《王子安集注序》论骈散文甚有精义，最可佩服，以骈俪为文之正轨，真通文章体例者之言。又云宋人以八代为衰，奉昌黎为鼻祖，自此以往遂有语言而无文字。此与鄙意甚相合。《秦肤雨诗序》引扬子云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论诗中有偏丽偏则两派，《击壤》遗音，

《香奁》流弊，均所不取。《玉可庵词序》论词之正宗贵清空不贵恒灯，贵微婉不贵豪放，与《荔园词序》可互相发明。四编卷六《眉绿楼词序》论诗词分类编年之是非，谓诗宜编年，可以考定其生平，词则以分类为宜，盖词之体率婉媚深窈，或言及出处，亦以微言托意，不如诗之显明，依年编录未必足供考证，故不如分类读之，窥见其性情之微，转足以想见其为人。又《槃薖纪事初稿序》对于艰深之文微致讽词，五编卷七《可园诗钞序》自述诗宗香山剑南，亦即是此意。有云，“诗固所以写性情也，雕■性情而为诗，其犹戕贼杞柳以为杯棬乎。”此语亦甚佳，与上文文崇骈俪之说似两歧，而实俱有至理。曲园先生著作未有专篇论文学者，仅散见于杂文中，序类中为最多，虽只是散金片羽，而言简意赅，往往与现代意见相合，实盖为之先导，此则甚可贵也。

《杂文续编》卷二有文数篇，皆关于金石文字者，如《慕陶轩古砖图录序》，《问礼庵彝器图序》、《两罍轩彝器图释序》、《画馀庵古钱拓本序》、《百砖砚斋砚谱序》，文章议论均可喜。《古砖图录序》有云：

余经生也，欲通经训必先明小学，而欲明小学则岂独商周之钟鼎，秦汉之碑碣，足资考证而已，虽砖文亦皆有取焉。

此数语可以包括诸文大意，简单的文句里实具有博大的精神。中国学者向来多病在拘泥，治文字者以《说文解字》为圣经，钟鼎碑碣悉不足取，砖瓦自更不必论矣。太炎先生曾谓古代日用食器且少见，独多钟鼎，大是可疑，龟甲兽骨则是今人伪作，更不可信。曲园先生乃独能有些创见，如在金石学家本亦无奇，以经师而为此言，可谓首开风气者矣。此外文章随便举例如六编卷八《唐栖志序》、《徐淡仙百兰稿序》，卷九《东城记馀序》，并无特殊意见可说，而就题写去，涉笔成趣，不费气力，不落蹊径，自成一篇可读之小文。《杂文补遗》即七编卷二有《外弟姚少泉所著书序》，则又亦庄亦谐，姚君喜谈道与兵与医，曲园先生称其谈道之书明白晓畅，又谓惜余钝根仍茫乎未得其门径，与之论兵则只取其兵贵藏锋一语，“其论医亦多心得，余固执废医之论者，姑勿论也。”微词托讽，而文气仍颇庄重，读之却不觉绝倒。此种文字大不易作，游戏而有节制，与庄重而极自在，是好文章之特色，正如盾之两面，缺一不可者也。寿序与记各类中尚有佳文，兹不具论，只以序文为限，亦不及详举也。

读曲园先生的序文，有时觉得与读欧罗巴文书籍时的感觉有点相似。有些正论学术文艺，有如导言，但少简短耳。有些抒情说理，笔致如随笔小品，虽是七八十年前著作，而气味新鲜，一似墨色未干者，此可异也。我们平日写文章，本来没有一定写法，未必定规要反古，也不见得非学外国不可，总之只是有话要说，话又要说得好，目的如此，方法由各人自己去想，其结果或近欧化，或似古文，故不足异，亦自无妨。《春在堂杂文》中有些与新文学相通即以此故，若我辈写序虽力或未逮，用意则固不谬，今见曲园先生序文有相近者，此又我们之大幸也。朋友相语，常苦没有适宜的文章可以给学生读，《左传》《史记》非无名篇，不过那只可当文学赏鉴，不能作自己写作的参考，若要勉强去学，势必画虎类狗，做成烂调古文而后已。如今看见曲园先生的许多序文，很是喜欢，觉得这颇足供启蒙之用，虽然一时不能指定那几篇最合用，但总之在这中间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很好的资料来，使青年学子读了得到益处。近来长久不写文章，觉得荒疏了，夏天读《春在堂杂文》很想写一篇小文，但是不敢下笔，一半也因为怕说得不对，唐突先贤，

到现在才决心来写，盖我深信此类杂文甚于学子有益，故仍来饶舌一番，不管文章的好坏，若是为个人计最好还是装痴聋到底，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1940 年刊《学文月刊》2 期，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读列女传

有友人来叫我给杂志写文章。近年来文章不大写，因为没有什么话想说，但也不是全不执笔。假如有朋友的关系，为刊物拉稿，那么有时也写一点聊以应酬，至于文章之写得没意思，那自然是难免的了。既然是友人来说，似乎不好不写，问是哪一种刊物，答说大约是妇女杂志。杂志有特殊的性质，写文章便须得守住范围，选取题材大不容易，这又使我为难起来了，虽然我未始不曾做过些赋得的文章，在学堂里得到汉文老师的好些佳批，写倒也不难，只是这何苦来呢。可是我想了一回之后，终于答应了，关于妇女问题，并不如友人在电话里笑说，你还可以来得几句，实在因为以前曾经留心过，觉得值得考虑，这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发表一点意见。经过很久的思量，仍旧不能决定来说什么，结果还是写了一个《列女传》的古老题目。

这题目定得不算好，一看就像是所谓赋得体，是其一。其次是，当初就有私意，前年秋天曾写过这样一篇小文，有窗稿可以利用。那篇稿只有二百多字，现在假如拉长了五倍，岂不够用了么。话虽如此，实际并不容易做，旧稿中可以抄来的细看只是一小半罢了，而且这题目到底是枯窘，要想舒展也大费力，题是赋得式的，文章却不想那么做，不喜欢说新奇的或是陈腐的两样假话，此其所以为难也。

寒斋所有《列女传》，计有下列几种：一、“四部丛刊”本影明板《古列女传》，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梁端的《列女传校注》，萧道管的《列女传集解》，本文相同，都是刘向所编撰的原本八卷。二、刘开所纂《广列女传》二十卷。我们平常所说的《列女传》大抵是指的第一种。我最早所有的是梁注本，以后得到王管二家注解本，到手的时候常连正文翻看一过，所以想起来看了也已有好几回了。普通的印象是，如王回所说，奥雅可喜。前年秋天题记中有别的看法，大意云：

> 《列女传》自昔为女教经典，至今读之也无甚可厌处，不独“贤明”“仁智”诸人通晓事理，可为良妻贤母之规矩，即贞顺传中人亦确然有其个性，异于易损之货物。后世书中为人父者诏子女以孝，为人夫者教妻妾以节，无论措语如何工巧，他人见其肺肝，闻之但可发微笑耳。《列女传》尚少此感，良由古人文情质实，且亦态度不同也。

这个意见，在现今重录的时候，还是一样。《列女传》卷四“贞顺传”中，宋恭伯姬不肯避火，楚昭贞姜不肯下台，死于水与火，如颂所云，其一守礼一意，其一处约持信，之死不二，此古侠士之风，及于闺阃，与匹妇被迫之寻短见者，区以别矣。我们不必发思古之幽情，以为上古定是乐土，但前人质朴，即或粗野较多，而卑劣分子故当较少，丈夫与女子虽气风不同，自宜各有其人格存在，非汉以后人之比也。后世男子自己的地位益落，其视女人亦自更低，如钱塘夏先生所言，盖已非复奴隶而是货物矣，上者才及金丝雀，下者如犬马而已，太平之时多畜置以为玩饰，及至乱世则唯歼绝之，可以轻身自保，并可易得令名，为家门之光，亦有利于前程者也。鄙人读史志文诗，见记妇女死兵死难者一族一邑有若干数，侈陈以为光荣，未尝不为作恶终日，邦国多乱，妇人不幸罹害为最，而男子或反因而得利，思之黯然。《广列女传》本以刘子政书为范，多收原文，卷十三至十六为“烈妇类”，乃有四卷，分量为全书冠，死者固可矜，男子读之更应知此正是生者之耻耳。《列女传》一类书，此时如能虚心读之，颇有好处，但须当作史料，不可奉

为教训，古传中的守礼持信固佳，广传中的急迫死难，亦均可供男女两方的参考，促其反省也。

俞正燮《癸已存稿》卷十四有“谈莠书”六则，其二曰“愚儒莠书”，后半云：

>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陈尧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为乐，母夫人日，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技，岂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鱼。射为六艺之一，州将习射乃正业，忠孝之行也。受杖当解金鱼，杖碎金鱼，金坚且碎，人骨折矣。衰门贱妇亦不至此，尧咨母不当有此言此事。明方听《集事诗鉴》引此为贤母，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

案《广列女传》卷七“母仪类下”即载此事，赞以颂曰：“辅国有训，惟忠惟孝。小技自矜，何关政教。怒而惩之，进以大道。”对照读之，大可发笑。曰愚与莠，或未免太言重一点罢，但驳斥得不能说得不对。窃意如有此种见识，则去看古今一切书，无不如扬糠筛米，精粗立辨，随处得益，至可歆羡。俞君为嘉道间杰出的学者之一人。《书目答问》附录“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列在汉学专门经学家、史学家、经济家三项下，说明中有云，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此评语本亦不错，但我以为俞君之难及处，还在其见识之平实，如上文可见，其关于妇女问题者尤为独绝。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记阅《癸已类稿》，有云：

> 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想也，忽则家道坏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答四十，此使妇女无可妒，法之最善者。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

越缦俗儒，满腹都是男子中心的思想，其以俞君语为偏谲本不足异，唯比拟为出于周姥则极有意思，本是排调却转成赏誉矣。以周公制礼，而能得周姥之意，非忠恕一贯岂能至此，可不谓之大贤乎。有如此平正通达的见识，可以谈妇女问题，无有偏执，亦可以写新列女传，读之益人神智，惜乎未曾下笔，至今无能代者，可为嗟叹也。

□1940 年作，曾刊《新光》杂志，刊期及署名不详
□收入《药堂杂文》

学海谈龙

汤纪尚著《槃遹纪事初稿》四卷，光绪乙酉年刊，有俞曲园序文，后并缩成三卷，为《槃遹文》甲集，以丙戌迄壬辰文二卷为乙集，附癸巳迄乙未所作文为别录，重刻行世，曲园序则已无有，盖序中颇议其文多艰深也。乙集卷上有最录龚璱人逸文一篇，云已授朱之棒传之，今检龚集补编朱序，果云系汤伯述所遍，而序语亦即袭用槃遹文上半，但少改为流畅而已。原文末有云：

> 逸文竟刻，更得《学海谈龙》一书，说郡国山川彝鼎，说金石杂事，皆可喜，小学家伟之，亟写副呪苏州吴副都，人间遂有传本。

案张祖廉著《定庵年谱外纪》卷上云，“嘉庆戊寅纂平生师友言论及所见古物，为《学海谈龙》四卷。”《娟镜楼丛刻》中又有张氏所辑《定庵遗著》一卷，序文之末乃云，“所望四方闳达之士，访羽陵饱蠹之简，获《学海谈龙》之编”，则在民国辛酉时此书固未传于世，所云录寄苏州之副本不知浮沉何所也。吴张二君皆吴中人，搜访定公著作又至勤苦，而《谈龙》竟不出，思之闷损。吴副都岂是窓斋耶，若如是则踪迹当亦易易，或《槃遹文》人少见者，乃致失之交臂，亦未可知耳。

□1940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香祖笔记

王贻上虽见识平常，曾请解八股文与缠足之禁，但其论文诗亦有可取处。《香祖笔记》卷一云：

> 《类纂》载武林女子金丽卿诗：家住钱塘山水图，梅边柳外识林苏。郎瑛谓其不能守礼，当出则拥蔽其面。时方食，不觉喷饭满案。

又云：

> 高季迪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此三家村学究语，所谓下劣诗魔，不知季迪何以堕落如此，而盲者反以为警策。

此二节语皆极通达。鄙人最不喜史论及咏史诗，不特千百年前事不能详知，未便武断下褒贬语，且更怕养成文人习气，轻易裁判别人，以刻薄为能，非细故也。窃意此事当从学塾改起，不令生徒作史论，庶几正本清源之道，虽其效或当在百年后，苟能有效即是大幸矣，百年何足道哉。

□1940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鲊　话

近来收到佟世思著《与梅堂遗集》十二卷，附《耳书》、《鲊话》各一卷，系其六弟世畿所编集，有康熙辛巳序，但刻板似在雍正时，王渔洋序文署名已避讳矣。案《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云：佟世思，先世居于佟佳地方，姓佟佳氏，省言以佟为氏，隶汉军镶蓝旗，又言法海介福均其族人，唯集卷十二《先高曾祖三世行略》云，自北燕时远祖讳万讳寿者，俱以文字显，然则其世系远出六朝，与籍隶满洲之佟佳氏如介野园等固自不同也。《熙朝雅颂集》卷十三引《八旗通志》云：

> 《与梅堂遗集》十二卷，佟世思撰。是集凡诗十卷，词一卷，杂文一卷，其弟世集裒而刻之，末附《耳书》一卷，皆记所闻见荒怪之事，分人物神异四部，《鲊话》一卷，则以公事至恩平而记其风土也。

《四库书目提要》亦如此说，盖为《通志》所本。《雅颂集》选其诗为十三四两卷，计百另二首，《雪桥诗话》卷三谈俨若诗有四则，最称赏其《横林雨夜访邵之莱夫子宅》四首，如其一云：

> 舟行常苦热，雷雨晚凉生。
> 杨柳一时碧，桔槔忽不鸣。
> 沟田增细响，村鼓应初更。
> 我欲扶筇去，稻花香里行。

不佞虽不懂诗，读此亦觉得可喜。文十八篇多可读者，如《游红螺山记》、《思恩县开征记》、《与范彦公表叔书》均是，但是我觉得最有兴味的却是那两种附录。《耳书》文字颇简洁，所记事亦普通，可目为笔记中上品，末一则《唵嘛呢叭弥吽》，云是六字真言，传自西域，有谓唵嘛呢叭弥吽盖俺那里把你哄也。昔曾闻此传说，今知见于著录，亦颇有意思。《鲊话》据自序盖作于康熙乙丑，时至广东访其三弟世男于恩平县，记所见闻得三十九则，其序云，时在安徽同友人饮白酒啖鲟鲊，“昔陶母却鲊，而恩平无鲊可以奉亲，伟夫一官冰冷，仅足供兄弟友生一席鲊话耳。”书名即取此意。记文短者才十馀字，最长者只二三篇，亦不及二百字，读之无不可人意，盖如序中所云，恩平以弹丸黑子，奇凋异敝，不可名状，世传有非山非水非人非鬼之地，殆将近之，其事本奇，而文足以副之，故遂耐读，所谓诚可悲可笑矣也。《鲊话》一序，计二百三十一言，亦诚实，亦波俏，而《八旗文经》则收录一篇俗调的《耳书序》，可知文章鉴别自有不可假借之处，观于《六经》选者之取舍，乃更相信自己见识渐益可靠，凡所取舍常与世俗相违，此即其征也。

《鲊话》中可抄者甚多、今只录其二三于下：

> 县署无头门二门，勉强向败墙下设门一合，以蔽道路往来者。无大堂，有墙三面，横以竹，覆以草，无栋梁门柱。前令设木屏高五尺，阔二尺有五，以别内外。伟夫孟浪，撤而易以门，再八步计步弓四步，即令君妻下榻处也。
>
> 士子无城居者，来则跣足骑牛，至城下就河水洗足，着屐而后入。每来谒，伟夫必与饮食，无一人知进退周旋之节者。伟夫多事，必捉襟曳肘而教之。予亲见伟夫以白面微髭之知县教白头诸生，拜揖酬酢，始终不能而罢焉。
>
> 堂置木架一座，上置鼓一面，即以乱棕缚云板于下，此伟夫升堂号

召胥役之具也。夜间，一老人身不满二尺，蹲鼓下司更，或自三鼓交五鼓，或自四鼓又交二鼓，从来无伦序，但随其兴会耳。闻伟夫曩者怒，命易之，谒通邑无可代者，因仍之。

通城无三尺平净地，处处皆瓦砾，生野慈姑于上。予与槃十步城上，小立，谓此地恐多蛇。言未已，一蛇丈许，窜胯下过。

案恩平属肇庆府，距新会不远，不知何以荒秽如此。近人奭良著《野棠轩摭言》卷七《言多》中有一则，言广西思恩府之苦，其文云：

其地谚曰：虎上房，蛇上床，皂隶上墙。侵晨将启户先四望，房上有踞虎则不开门。地卑湿连山，山蛇如蚁，宵中桓为蛇所扰如蚊虻。居民极少，皂隶无应募者，但于大堂两翼墙画衙役，以壮观瞻耳。

案佟世男为恩平县知县，世思记其地风土既极奇怪，而自己又适知思恩县事，真可谓偶然又偶然矣，只可惜不再写一卷续鲊话，不然必当有好文章可读也。遗集卷十二杂文中有《重修思恩县堂记》，述由贺县至思恩事云：“再调思恩，水土恶厉更倍于贺，亢则三冬热眩，哑不能言，雨则六月生寒，重裘莫御。”又《思恩县开征记》叙四乡头人来输纳情状，但云：“届期果来，老而皤者，少健者，棕帽者，布裹头者，徒行者，乘马者，聚数百十人，率皆衣青短衣，裸膝跣足，佩环刀七尺于胁下。”此盖如下文所云，思恩古属交趾日南，为环州生蛮之恒状，亦并不大奇。文中又有吏白开征有日之语，则固有胥吏，岂画壁者止是皂隶，而吏不在其内耶。《野棠轩摭言》引夏闰庵所见为证，似是近数十年中事，在康熙三十年顷反不若是之甚，亦不可解。唯《重修县堂记》言至广西后，宾客仆从不习于水土死者二年之内一十八人，而佟君自己亦遂是年卒于官，时为康熙辛未，年四十有二，此则与夏闰庵所遇之思恩守志白石运命相同，似前后无甚变化，亦大奇也。

□1941 年 1 月刊《中国文艺》3 卷 5 期，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淞隐漫录

数日前从上海寄到几部旧书，其中有王韬的《泖隐漫录》十二卷，我看了最感兴趣。天南遁叟的著述在清末的文化界上颇有关系，其在甲申前后之意义与庚子前后的梁任公差可相比，虽或价值高下未能尽同，总之也是新学前驱之一支，我曾略为搜集，以备检考，这回买《淞隐漫录》的原因即是为此，但是感到兴趣则又是别的缘故。我初次看见此书时在戊戌春日，那时我寄住杭州，日记上记着，“正月廿八日阴，下午工人章庆自家来，收到书四部，内有《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其时我才十四岁，这些小说却也看得懂了，这两部书差不多都反复的读过，所以至今遇见仍觉得很有点儿情分。当时所见的乃是小册四本，现在的则是大本十二卷，每卷一册各二十叶。据《弢园著述总目》云：

> 是书亦说部之流，聊作一时之消遣，而借以抒平日之牢骚郁结者也，其笔墨则将无同，其事实则莫须有，如目为刘四骂人，未免深文周内矣。初散编于画报中，颇脍炙于人口，后点石斋主人别印单行本行世，而坊友旋即翻板，易名曰《后聊斋志异图说》图画较原刻为工。

此十二册本篇末常有红绿纸痕迹，盖是从画报中拆出订成者，可以说是初印，比小册便览多矣，唯披阅一二卷，华璘姑何蕙仙等虽极是面善，而已无复当年丰姿，此正与重读盛氏本《阅微草堂》相似，今昔之感固亦寂寞，但眼经磨练，犹之阅历有得，不可谓非是进益也。弢园此类著作，尚有《遁窟谏言》与《淞滨闲话》各十二卷，平日见之亦不甚珍重，今之特别提出《漫录》，实以有花牌楼之背景在耳，而转眼已是四十四年，书味亦已变易，他更不足论矣。（一月三十日）

□1941 年 2 月 17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列 仙 传

郝兰皋著《晒书堂笔录》卷三，“诙谐”条下有云：《列仙传》云：

马明生从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华阴山合金液，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初学记》地部引）。此语真堪绝倒。

又云，“道家者言多荒怪不足辨，今《列仙传》亦无此言。”郝君正论自是不错，但以我所知列仙中却要算马明生为最有风趣，其只愿为地仙，不乐升天，也与鄙意颇相合，鄙人设想地仙之乐自儿时至今不少变，惜不能信有金液可内服耳。读王夫人校正本《列仙传》，所言固多荒怪，而记叙殊可喜，其事亦质素，不令人读之生厌，盖是古人的一种长处。张鲁辈虽是妖法，却胜吕岩十倍，此事言之甚奇，惟唐宋以来的神仙日趋堕落，其记述亦不复足观，乃总是事实也。

看《列仙传》中七十名仙人的履历，除自然神异之外，不出服食补导二途，以云高明殆不可矣。惟鄙人窃有取者，以其颠来倒去只是服补脑汁的办法，以行迹近于隐逸，以视后来厕身天阙，星冠羽衣，趋跄拜舞，比出家的和尚更忙者，毕竟清浊迥殊，盖鄙意关门做神仙总较开门做节度为胜一筹也。五斗米道中想也有品级，今不详知，若夫近代道教的典制，岂不即是直抄人间的帝制者耶。

□1941 年 5 月，刊“庸报社”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沮江随笔

《沮江随笔》二卷，朱锡绶著，前有咸丰八年盛徵琪序，盖朱氏为湖北远安县知县时记所见闻也，内容与文笔均佳，可为此类笔记中之佳作。卷下《白菜》一则中有云，

余《幽梦续影》有云，真嗜茶者神清，真嗜菜根者志远。粟影师赠句云，神清半为编茶录，志远真能咬菜根。

因从《啸园丛书》取《幽梦续影》查阅，此即是第一则，粟影所拟赠楹帖亦在，惟咬字作嗜。前有潘祖荫序云：

吾师镇洋朱先生名锡绶，字撷筠，盛君大士高足弟子也，著作甚富，屡困名场，后作令湖北，不为上官所知，郁郁以没。先生诗集已刊，板毁于火，他著作亦不存，仅从亲知传写得此一编，原题曰《幽梦续影》。

潘君之意对于此绮语小言似颇不满，惟以不忍使其语言文字无一二存于世间，辄为镂板，以贻胜流，而未知其早有《随笔》之刻，亦大可惜。

序作于光绪戊寅，随笔当刊于咸丰戊午，盖在二十四年前也。潘序称其字撷筠，《随笔》则署啸筠，盛序作小云，当不误，或初字撷筠后乃为作啸筠欤。盛徵琪为大士之子，《随笔》卷上《巨瓠》末有注云，盛稚兰表兄名徵琪，蕴素师之才子也，时同客楚北。然则大士又当是朱氏之舅父也。

（三十年三月廿二日）

朱氏《疏兰仙馆诗集》四册，现有光绪三年丁丑重刊本，有潘祖荫同治十三年序，盖是为原刊本所作。《幽梦续影》潘序作于光绪四年，乃亦未知诗集重刊之事，可见当时消息殊不灵通也。编校时附记。

□1941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尔雅义疏杨氏刊本

《尔雅义疏》二十卷，旧有同治乙丑郝氏沛上重刊本，以前尚有学海堂及沔阳陆氏本皆不全，聊城杨氏足本为此本所从出，但不易得，故平常欲读《尔雅义疏》者止可得到郝氏本而已。近日有书估以杨氏刻本见示，较郝本贵至五六倍，终收得之。此书有咸丰丙辰胡珽跋，叙刻书始末，云全稿为高均儒所求得，今书面有题字一行云，“己未孟冬在袁浦高伯平手赠”，又卷首有印五，一云“吴兴世家”，一云“曾植印信”，盖沈寐叟旧藏，亦可珍也。

咸丰丙辰至同治乙丑，前后才及十年，而书已至不易得，郝联薇跋云，亟觅原本，在济南晤阳湖汪叔明，欣然以所藏杨氏足本相授，始得付梓，可以见之。大抵道咸时江浙刻书，板悉毁于太平天国之乱，至今成为稀本，其价值往往数倍于康乾板书，杨氏板在苏城，自亦在庚辛浩劫中矣。寒斋此本，不但因为是寐叟手泽故可珍重，且以出于兵火之馀，此意亦甚可记念耳。

（六月十一日记）

□1941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文章缘起

《文章缘起》一卷，陈懋仁注，方熊补注，列雅书院藏板，卷首有翰林院印，盖是《四库》底本。案《总目》卷一百九十五，《文章缘起》，两淮马裕家藏本，附存陈方两家注，与此正合。序下白文印曰“丛书楼”，少上朱文印曰“结一庐藏书印”，白文印曰“醒梦轩”，本传首行下铃一印朱文曰“彦升”，墨笔小注云，道光壬寅秋得此铜印，附印于此，东卿记。此殆叶氏物耶。

卷末有方熊后序，署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旧得方氏刻本《陶诗》，中缝下端刻侑静斋三字，与此相同，或谓是咸同时刻，郭绍虞君根据查世标题字，以为当在康熙中，惟不能确定其年岁。今有此后序，便有确证可凭矣。《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不列此本，可知其不常见也。（七月八日）

□1941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唐才子传

《唐才子传》十卷，自昔以《佚存丛书》本最佳，嘉庆中王氏三间草堂重刊本流传最广，近得巾箱本五册，题味古书屋藏板，道光十九年岁在己亥秋七月开雕，卷首录《四库提要》，后有附识，所据亦为佚存原本，署龙溪孙云鸿。案近年影印巾箱《琵琶记》末有题字一行云，“辛亥闰月十九日舟次观，云鸿。”翁松禅附注云，“此孙总戎题字也，总戎雅尚儒术，尝刊香光《笔势论》，今求之弗可得矣。”由是可知即是一人，惟翁氏未提及所刻《唐才子传》，《书目答问补正》亦不载，岂不多见耶。

《补正》中列董氏影印日本五山本，寒斋曾得有一册，惟所云光绪间清隐山房巾箱本，惜未能见，颇疑或即是孙氏原板，后为他人所得因而改名者，但无所依据，甚愿得一见此种刻本，俾释其疑也。（八月十日）

味古书屋又刻有《小石帆亭著录》六卷，时为道光二十年庚子，此外或尚有所刻书，惜未能见。编校时记。

□1941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柳如是事辑

《柳如是事辑》一卷，题“雪苑怀圃居士录”，题叶署光绪癸卯，盖是庚子后三年刻也。所搜辑遗事不少，可备观览。惟所录《春浮园集》中与钱牧斋书一则，此类其实尚多，不知何以不取。集中《读牧翁集》七则之五云，钱牧老语余言，每诗文成，举以示柳夫人，当得意处，夫人辄凝睇注视，赏咏终日。此一则更是绝好资料，而亦遗之，岂不大可惜耶。（十一月二日）

偶阅赖古堂《尺牍新抄》，见采有萧伯玉与钱牧斋书一首，即是《事辑》所录者，乃知其只依据《新抄》转载，盖未见春浮园原书也。编校时记。

□1941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竹 人 录

《竹人录》二卷，嘉定金元钰著，嘉庆丁卯自序，距今不过百三十年，余所得一册已残缺，存上半及卷下十叶，惟所缺均是前人诗文，尚无大妨碍。卷上小传三十七篇，所记凡五十七人，皆嘉定之以刻竹名者，亦是工艺史之好资料，而文复雅洁可喜，序言愿得窃附于《印人传》《陶说》诸书，与栎园诸书殆可以相比。

金坚斋为钱竹汀弟子，在瞿木夫《古泉山馆诗集》中常有说及，嘉庆庚申有题扇诗，道光庚寅有挽诗，盖坚斋弟为木夫之妹婿，亦与有戚串关系也。民国甲寅义州李放编刊《中国艺术家征略》六卷，卷二竹类中转录金氏小传全部，而易其名曰《嘉定竹人传》，虽亦名实相符，惟随意改写书名，未免稍失谨慎耳。（十二月十日）

□1941 年 12 月 10 日作

□收入《书房一角》

圭庵诗录

近代写刻书籍中，林吉人之三部作与沈芥舟之三跋最有名，几尽人皆知矣。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一《明文在》条小注云：

> 秀水朱梓庐先生《小木子诗三刻》《梓庐旧稿》为同邑辜启文书，仿柳诚悬体；《壶山自吟稿》嘉兴陈寓新笈书，用文衡山体；《俟宁居偶咏》为先生兄子声希吉雨书，体兼颜赵，亦吾乡一佳刻也。

又徐兆丰《风月谈馀录》卷三云：

> 《心向往斋和陶诗》二卷，曲阜孔宥涵先生继■所作，吴让之先生为手录付梓，可称双璧，余曾得初印本，乱后失之，今所传者皆翻刻本矣。

此二书寒斋幸皆得到，雨窗兀坐，时一展览，亦殊可喜。

但此外一二小册，虽不是有名的书，亦可算作一类，觉得颇有意思。其一是《叶石农先生自编年谱》，本文自称则曰“跛奚年谱”，咸丰五年刊，高均儒书。叶君著作我只有一册《跋奚诗法浅说百篇》，乃是试帖诗入门书，上有朱批圈点，书贾云是梁鼎芬笔，亦未能详。年谱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共二十八叶半，读之顷刻即尽，惟字甚肥大悦目，高君手迹亦可重也。其二是《圭庵诗录》一卷，题叶背面云，光绪五年己卯正月，蒉斋校刊韬庵写本。圭庵本名吴观礼，仁和人，我不知其生平，诗又所不懂，此一册书七十二叶，有诗二百七十首，翻开看时实在只是看陈伯潜写的字而已，此盖与说茶热得好无异，但是没有别的法子，盖假如我不是为的看所刻的字，则此诗集就也未必买也。后来又见秦树声自笔写刻的《乖庵文录》，体杂行草，颇觉虽致，但是笔画似乎太细，不甚好看，所以未曾收存。

□1941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勤艺堂题跋抄

近来买几册旧书闲看，常遇到勤艺堂邹氏藏本，起初不大注意，但其书多有题跋，觉得颇有意思，因汇抄在一起，聊为邹君略留鸿泥之迹而已。

（一）梦 忆

《梦忆》八卷，张岱著，道光壬午王见大第二次刊巾箱本。《梦忆》向来有一卷本，乾隆乙未金忠淳刻入《砚云甲编》，光绪初年有申报馆铅印本，又八卷本乾隆甲寅王见大刻，咸丰壬子伍崇曜据以刻入《粤雅堂丛书》，若王氏第二次刊本则未之前闻，唯《复堂日记》卷三所云，癸酉春间在娱园见王见大所刻甚工雅，或即指此书亦未可知。书四册，卷首白文印曰“邹氏家藏”，朱文曰“师竹楼主人珍藏”，每卷第一叶下朱印曰“丽生存淦”，第四册七八两卷系手抄本，末有题跋云：

> 家藏《梦忆》五册，计八卷，山阴张岱撰，前有王文诰序。成丰庚辛之间避乱官家埠，失去七八两卷，兹借得南海伍氏《粤雅堂丛书》本录补之，并录《砚云甲编》所载序文及伍崇曜跋，以资考证。据崇曜所见本每条具缀纯生氏云云，且每卷直题王文诰编，而此本无之，伍氏又冠以“陶庵”二字，而此本惟题“梦忆”，意者崇曜所据以刻入丛书者别是后人所重刻者，此则确为王氏原本无疑也。李敏达公《西湖志》载先生尚有《西湖梦寻》五卷，惜未见。光绪己卯十一月，海宁三百有六甲子老人邹存淦俪笙氏识于杭州白莲花寺前之勤艺堂。白文印曰“邹存淦印”，朱文曰“俪笙”。

（二）西江诗话

《西江诗话》十二卷，裘君弘辑，康熙时妙贯堂刊本。《西江诗话》前已得一部，并附有《妙贯堂馀谭》六卷，唯印工纸张均不及此本，故重复收得之。卷首有白文印曰“杭州邹存淦鉴藏书画之章”，朱文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邹俪笙读书印”，末有跋二，其一云：

> 先王父星桥公极爱书，虽零缣只字，断卷残编，宝之不啻拱璧。予自束发受书，即亦爱先王父之所爱，粤匪未扰浙西前，尝会计所藏卷至一万有馀，亦云富矣，及贼来半遭窃攘，半付劫灰，所留者仅寄存村舍十分中之一二耳。此书系在山阴斗门市购得者，前有高禹泉先生题字，禹泉为斗门先哲，有能书名。予深惜家藏之书保之不能及身，虽爱之如命，奈金尽床头，未必能如前积聚，而又叹高先生之书不能保及子孙，披览之馀，不禁泪随言下，因即泚笔记之。同治五年丙寅长至日，海宁邹存淦俪笙氏识于山阴客居所居堂。

朱文印曰“俪笙”，偏左又一朱文大印曰“客居所居堂印”。其一云：

> 《西江诗话》十二卷，新建裘君弘著，略仿《全唐诗话》例，而留意梓桑，亦诗话中之卓绝者。乾隆间访遗书，凡涉逊国事，立论舛谬及语句有违碍者，皆在禁燬之列，是书卷十内黎祖功髻山诗，“我颈不屈如老鹤，我发已剪如秃鸽”句似触碍，又书内有钱谦益名，亦为江西巡抚郝公查禁，然所禁惟此两句，似不应听其湮没不传。溯自丙寅以后，

十八年来积聚之书约得一万八千馀卷，新刊十之七，旧板仅十之三，市上失传之本则百中无一，此书或可首屈一指，吉光片羽，尚足宝贵，况全书乎。兹复重加面页，将第三卷蛀洞修补完整，储诸箧衍，后之人其保之。光绪十年甲申立冬前二日，海宁三百三十有五甲子老人邹存淦重识于杭州勤艺堂。

印二如《梦忆》跋。高禹泉题字今不存，想是写在书面上，政邹君重加面页以保护之，其后殆均已失去矣。

（三）兼本杂录

《兼本杂录》原订一厚册，目录下朱文印曰，“邹俪笙读书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卷一首页白文印曰，“邹氏家藏”。末有跋云：

右《兼本杂录》四卷，毛西河先生奇龄撰，书名下有“艾堂辑阅”四小字，艾堂不知何人，所存仅传二卷，碑记志铭各一卷，前有目录适满一页，其只此四卷，抑尚有别种，均未知。是书板式与《西河全集》同，确系当时毛氏刻本，惟全集中未载，盖由集辑录之本，原不妨别行也。惜卷端已被鼠啮，三四两卷边上字亦失去。予于同治庚午挈眷回杭时得于清河坊之旧货摊头，为之整理一过，欲补缺字未能也，今又为蠹所蚀，复折补之。按西河所撰《四书改错》及《四书正事括略》今通行本皆未载入，不仅此书也，所足重者，此板久亡，似已无第二本传于世耳。补成，略述数行于后。时光绪戊戌冬至后十日，海宁邹存淦俪笙氏识于杭州寓舍之勤艺堂，时年政七十。

印如前。

（四）西湖柳枝词

《西湖柳枝词》五卷，嘉庆辛酉刊，前有阮伯元、王述菴二序。序后空白页有邹氏题云：

西子湖边烟树昏，空城穴■阵云屯，钱唐世世无兵燹，
冲晦之言奚足论。
读罢乾嘉绝妙辞，感时怀旧几人知，愿教重享承平福，
去作西湖泣柳诗。

咸丰辛酉避乱山阴，得王兰泉先生主敷文书院时所辑《西湖柳枝词》五卷，时粤匪窜杭，兵戈载道，读之不胜今昔之感，因附题两绝句于后。海宁后学邹存淦谨识。

朱文印曰“俪笙”。卷一首页白文印曰“俪笙珍藏”，朱文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卷末白文印曰“俪笙复阅”。

（五）茹古斋诗文抄

《茹古斋诗抄》一卷，《文抄》二卷，张复著，邹氏手抄本。卷首有边浴礼序，阮伯元题辞，吴清鹏题诗，高炳麐撰传，谭复堂赞。邹君所作别传，称其精太乙数，知未来事，语多神奇。《诗抄》后记云：

甲子秋分前三，借山阴金氏藏本抄。光绪戊寅初夏，重录一过。俪

笙记。

似其原本在山阴也。《文抄》卷上后记云：

同治甲子八月，海宁邹存淦手抄于山阴斗门镇之客居所居堂。

光绪戊寅四月，次儿维祺误用以褙书，幸未散弃，惟答马元伯书磨灭五六字，因复重抄一过。予年才五十，视已茫茫，两手又患风气，故不复能端楷云。四月廿七日，俪笙誌于杭州白莲花寺前勤艺堂。

（六）怪吟杂录

《怪吟杂录》二卷，蔡绍周著，邹氏手抄本，蓝格直行稿纸，中缝下有字一行曰“师竹友兰室抄”，盖即是师竹庐所专用也。卷首有白文印曰“邹氏家藏”，前为王闻、张应桂二人题辞，嘉庆甲子自序，署名“土桥一怪”。末有跋云：

蔡藕船《怪吟杂录》二卷，兵燹后板已不存，次儿璟得之友人案头，因借录出，以娱暇日，惜卷尾各缺，无从补全为可憾耳。是书与吾乡郭雪帆先生《捧腹集》后先称同调，滑稽玩世，有东方曼倩之风，似出寒山拾得上，是耶否耶、读之者当有以辨之。光绪八年壬午十月望前九日，海宁三百二十有三甲子老人邹存淦俪笙甫识于杭州勤艺堂之南窗。

印文同《梦忆》跋。按《捧腹集》诗抄一卷，海宁郭尧臣著，光绪丁丑啸园葛氏刊，为《闲情小录》八种之一，葛理斋序称为同人所著，然则郭雪帆当是同光时人，与蔡藕船相去约有五十年，若以诗论则不得不许后来居上耳。

（七）修川小志

《修川小志》一册不分卷，邹存淦著，原稿本。卷首朱文印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有同治丙寅陈敦彬序，丁卯姚夔序，内分河道、桥梁等十四目，目后有记云：

长安镇一名修川，海宁州西北之一隅也，四面无山，方广仅五六里，语焉而详，所见亦小矣。然古人穷愁著书，各有见地，予生于是乡，自非穷愁，易尝留心于此。后山曰，士大夫见天下不平事，不可懔不平之意。予因非不平而鸣者，况布衣而非士大夫乎。尝记辛酉秋红羊劫至，一镇之人不克保其乡土，镌老挈幼，奔走苍皇，幸而获全，己无所归矣。嗟乎，昔之画栋连云，今则荒烟蔓草，抚今追昔，能不依依，因表其所见所闻，以类分隶之，修川之典故略云备矣。知我罪我，俟之后之君子。同治甲子新秋，海宁长安里人邹存淦述。

末又有跋云：

《修川小志》一卷，辑于山阴斗门镇，当避乱之时，怀古思乡，情有不能自已者，惜艺文一册已付劫灰，不能复称全璧。第修川向无志书，李梁两先生所辑又复不存，虽后之学者自能超越前辈，知所未知，亦宜略存梗概，以备考究，故于暇日重录一过，付儿辈藏之。光绪五年冬十月之吉，三百有五甲子老人邹存淦俪笙氏识。

印文同前，所用亦是师竹友兰室纸，与《怪吟杂录》相同。庙祀类中记金龙四大王庙，书眉有附签，引《矩斋杂记》，文凡七行，末署男寿祺谨补。据此乃知邹君即是邹适庐之先德，觉得亦是一新发见也。邹适庐原名寿祺，光

绪己丑举人，后因得一汉铜印，乃改名从之曰邹安，民国初年在仓圣明智大学，从姬觉弥编刊书报，即用此名，其题记文字时有疵累，亡友饼斋常引为谈助。勤艺堂著作惜不得多见，《修川小志》虽只是地志小册，似甚为著者所珍惜，亦竟未得刊行，广仓学窘盖亦不能赏识也。丁丑战后江浙故家书物多散出，杭州书店目录上且列有《适庐日记》多种，可以想见。鄙人所收有勤艺堂题记之书只此数册，此外无可访求，念之怅怅。唯劫火之馀，金石消铄，尚能有此诸书落吾手中，不可谓非大幸，此正亦值得记念者也。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记于北京。

〔附记〕寒斋所收勤艺堂藏本尚有《钝吟文稿》及《杂录》、《武陵山人遗书》、《清谷文抄》、《书契原恉》等，因无题记，今从略。又饼斋曾对太炎先生谈邹适庐事，先生笑曰，景叔是我同门，盖亦是曲园先生门人也。

□1942 年 9 月刊《中和月刊》3 卷 9 期，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杂文》

陈授衣诗

潘清撰著《挹翠亭诗话》卷一云：“《韩江雅集》，全谢山为序，《田家杂兴》题，陈授衣云：

儿童下学恼比邻，抛堉池塘日几巡，
折得花枝当旗纛，又来呵殿学官人。

闵廉风云：

驴背田翁傍晚回，绕身儿女笑轰雷，
城中完纳官租了，带得泥婴面具来。

数诗描写难言之景，可谓体贴入微。”寒斋适有陈氏《孟晋斋诗集》，乃取出翻检两过，尽二十四卷中不见儿童下学之诗，殆未编入集中也。

但别又找到几首说及儿童生活，亦均可喜。卷十二《苦雨》云：

水田高下没青秧，一月无多见太阳，儿女不知调整事，
绿窗苦怨扫晴娘。

又《清明二首》之一云：

燕子低飞掠草烟，城隅绿浪系红船，溪童三五趁朝雨，
偷折柳枝来卖钱。

卷二十《上巳偶书》云：

清明杨柳重三荠，采折儿童竞卖钱，可惜一离烟渚畔，
竟随葱薤市门前。

此种景象其实并不怎么难写，只是平常诗人看不上眼，不肯收拾来作诗料，故极少见耳。诸诗中仍以下学一绝为最有意思，因其主意即咏儿嬉，与他诗之偶用作材料者不同。《宾退录》中载路德延《孩儿诗》五十韵，亦是难得之作，唯每句只咏一事，有如百宝衣，少有贯串耳。

□1942 年，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和 陶 诗

《和陶诗》以东坡为最有名，曾得民国十一年张朗声等集资翻刻之本，清朗悦目。清代有舒白香、姚春木、孔宥涵诸人和诗，孔集近有嘉业堂刘氏刊本，原刻已不易得。徐兆丰《风月谈馀录》卷三云，“《心向往斋和陶诗》二卷，曲阜孔宥涵先生继■所作，吴让之先生为手录付梓，可称双璧，余曾得初印本，乱后失之，今所传者皆翻刻本矣。”予于北京得一竹纸印本，卷端有白文小印曰汉军钟广，盖是杨子勤旧物，又从杭州得白纸本，皆是原刻，白纸本尤阔大，但别无印记。壬午冬日又得一册，白纸初印，卷首有朱文圆印曰蘗宦，白文长印曰消沉文字海，卷末朱文长圆小印曰子培阅。王氏序后空白有墨笔题记云，“惜庵先生为下相名士，藏书甚富，予过宿迁拟访之，未果也。今观是文，殊异流俗，以序宥函之诗，可谓双绝已。诗中投赠多予故人，宥函既逝，诸人亦多零落，五官与季重之书真不堪卒读也。咸丰庚申，丹徒庄棫书。”下有白文印曰蒿庵。又题一诗云，枨触山阳渎，风流事竟乖，安仁不可作，公绪又生埋，遗稿谁相颂，高文轨与侪，佳儿亦我友，拭泪望长淮。书刊于道光己酉，相去才十年也。予又曾见后印本，虽有破碎漫漶处，而细看乃出于同一板本，《风月谈馀录》所云翻刻本却未得见，不知是何时何人所刻也。（三十一年五月）

□1942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钱写本说文窥管后记

钱玄同先生手写《说文窥管》十四叶，旧藏浙江图书馆，今不知尚存否。偶从杭州书店得照相本一份，因为影印流传，亦聊为亡友作纪念也。玄同写是书时盖在民国元年，正供职浙江教育司，余亦任视学，同住头发巷丁氏三十六峰室楼上。余既不出发，又无办公处所，常倚枕观书，所谓卧治时代是也。转眼三十年，玄同墓草已三枯荣，坐对遗编，过去事迹历历心头，曷胜惆怅。后有刘子庚先生跋语，子庚殁亦十馀年矣。跋称文之著书散佚，盖未确。文之有《柯亭子诗文集》共三十五卷，道光末所刻，子庚殆未之见也。陆氏校记补正缺文，颇有用处，唯其中亦有玄同故意改写者，须分别观之，因原本有此二纸，故仍附于末。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周作人记于北京之苦雨斋。

□1942 年刊北大图书馆影印本书，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谪麟堂遗集

戴子高诗文集各二卷，最初所见为风雨楼活字本，心甚喜之，欲求原刻，得嘉业堂新印本。内有补刊六叶，而文集卷二漫漶处尚多有，甚以为恨。又买得旧本两种，价颇居奇，惟徐有壬周中孚诸传仍有残字，但无补刊叶而已。

近日从小店买来一部，乃始完全无恙，大为喜慰。此集刻于光绪元年，至今不及七十年，佳本已难得如此，岂以板本不良之故，故易于残缺耶。戴君治公羊学，推重阳明，诗文中又常有故国之思，亦是清末之一奇士，刘申叔邓秋梅诸人曾加以表章，近三十年来渐就沉晦，后生恐将不复能举其名字，此亦深可叹息者也。（六月十一日）

□1942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恒 言 录

昨日以六金买得《恒言录》二册，可谓廉矣。此书原有一部，乃十年前从修绠堂得来，照例极贵，书上记有年月，但不书钱数耳。惟凡有可喜之书予见即复留之，有重出二三者，今买此书亦为是故，阅之却复有所得，盖虽同一板本而又有殊异也。旧本题阮长生序，今改作常生，本文中长生案云云亦悉剜改，惟卷末有三处仍作长生，又元字旧缺末笔，今亦补足，间有遗漏未补者散见各处。阮长生不知何时改名常生，乃一一剜改旧文，可谓不惮烦矣，至补足缺笔字，则又何耶。

旧本只末叶题曰，“后学甘泉阮鸿北渚、仪征院亨梅叔校”，今于目录后添刻一行云，“仪征阮亨仲嘉校”，或者此本校改乃出仲嘉之手，以避家讳为无谓，为之改正，亦未可知。此等板本之变更其事甚微，却亦甚有意思，值得查考记录者也。（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记）

□1942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列仙图赞

中国画列仙者向来无甚好手，近世竟称任渭长之《酒牌》，但细看亦只是配景见长，若仙人本身但是其间一部分，且亦不大见得若何仙气也。日前偶从书贾得日本释寂照所作《列仙图赞》三册，安永庚子刻，后归芸草堂印售，却颇别致。每册各四十图，图中大抵一人，略如绣像，只偶有所执持跨坐而已，其最特别处则仙人容貌多奇古或枯槁衰老，如广成子老子黄石公诸人。酒牌亦有之，而二者极异。凡人固不得见真仙，但如以白云观老道之例推之，即或延年而未必能驻颜，则此所图写者或反近真，亦未可知耳。

中国神仙家大约可以分作两派，其一禁欲的，辟谷导引以求不死，与印度外道仙人稍相近。其二服金石以至御女，可以说是纵欲的，秦皇汉帝以来信徒不少，观于举世艳称吕岩，可以知之，吕仙图像固俨然一多福多男子之员外相也。写枯槁的仙人，中国竟似无此观念，即萧山任君亦未着手，思之亦可惜事也。（六月十六日）

□1942 年作，1944 年 5 月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樵 隐 集

《樵隐集》五册，丹徒李遵义著，刻于民国癸亥，诗文杂著凡九种，殆因印书不多之故，市价奇昂。但一借阅，以个人偏好论之，则其中亦只《毛诗草名今释》，《鱼名今考》二种一册，差可取耳。《诗存》三卷中，《山居杂事》《岘南杂兴》等绝句四十馀首，写农家风物，亦有佳句，作集序者称其书确为农家云云，诗中只此可为左证，其馀都浑不似矣。

《诗存》中有《哀发吟》七解，词既荒恶，而宝爱辫发，有类失心，似竟不知辫之历史者，可谓异事。大抵前清遗老惟知模拟明末隐君子而不能辨别情事之殊异，《西江诗话》载黎祖功诗，我颈不屈如老鹤，我发已剪如秃■，固堪称强项有骨气，今乃曰，虎豹犬羊一齐鞮，髡奴吾民何罪恶，此岂复成语耶。

文人弄笔，纰谬时亦难免，惟赖其益友为校订厘正之，今观诸序亦多梦梦，则自无望矣。古人云，士先器识，正非迂谈，但翻阅别集，深觉此事大难。结果只能反求诸己，惟读者有器识，乃可杂览，虽不希望拣金，披沙之能则不可缺者也。

吴街南《读书论世》卷十二“金代”一则云：

> 建炎初金人禁民间汉服，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真定太守李邈被执三年，使髡发，大骂，挝击其口，犹吮血噀之，遂遇害。前此北魏孝文用华服，契丹破晋，令华人华服，契丹人仍契丹服，自服通天冠绛纱袍，元入宋亦无改服之令，独金人不如式之令何严耶。《读书论世》以是被禁毁。前后才二百年，街南之书几不可复见，后人乃盘辫而大言，亦宜也。（十月五日）

□1942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二十七松堂集

廖柴舟《二十七松堂集》以前只有日本翻刻十六卷本，首有文久壬戌盐谷世弘序，即清同治元年，此板似至近时尚存，故书甚常见，每部十册售价才二金耳。

今年偶从杭州得原刻本，凡九册，计文十八卷，诗六卷，似系康熙时刻而后印者。与日本刻本比较，卷首朱藻序及自序均相同，独多乾隆三年高纲序，曾璟撰传注云载《通志》，盖是后来所加。文卷一至十六亦同，惟有两篇题目上剜去三字，日本刻本不缺，可知所据为早印本，至于此处朱吟石之名为何有违碍，则未之知也。卷十七为《四书私谈》十八则，《答客问》五则，《山居杂谈》六十五则，卷十八则为杂文，编列颇凌乱，诗集六卷而题作卷十七至二十二，原来与文集并算，及文集添刻两卷亦列为十七十八，故看去乃似重出也。书系原装，每卷首叶有朱文直行印曰“戴同寿藏”，馀别无印记。（十一月十日）

□1942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憩亭杂俎

庚辰旧除夕得常熟鸽峰草堂抄本《憩亭杂俎》二册，海宁许树棠著，凡文三十七篇，末附《十二禽言》，目录未列入。所收皆游戏文章，其位置在尤西堂缪莲仙之间，《海昌备志》曾著录。案海宁郭尧臣著《捧腹集诗抄》一卷，啸园葛氏刊巾箱本，为《闲情小录》之一，蔡绍周著《怪吟杂录》二卷，今存勤艺堂邹氏抄本，自署武林，似此类著作多出杭州，如在江南则须推苏州也。

据卷首孙清所录小传，憩亭嘉庆戊辰举人，己巳进士，壬申卒，年二十八，又夫妇生卒均同时日，亦奇事也。案《续夷坚志》卷一“任氏翁媪”一则云，定襄沙村樊帅所居，说里中任实洎其妻张氏七十三岁，同年月日时生，复同年月日时死，古今所无有。今得许氏夫妇，可谓无独有偶，然亦太是偶然矣。（壬午立冬后二日）

□1942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栖云阁诗

《栖云阁诗》十六卷四册，旧布帙题签下注云，“高南阜手跋，癸亥五月得于胶西故家。”第一册书面上有题字四行馀，文曰：

> 淄川宗家少司寇公念东先生刻集，其文孙绎常弟子壬戌三月廿五日邮寄至，越五日左手识存，翰。

下有白文方印，似是“西园图书”四字，题字左下方有二印，文模糊不可辨。目录后有题字八行云：

> 余向随先大人于淄川时，曾一遥瞻司寇公丰采于栖云阁，又十馀年再入淄川，逢其文孙绎常弟，留榻阁上，复数晨夕，今寄诗至而余老病竟无人理，追想陈迹，何胜偶然。壬戌二月重病左手记。

案高南阜卒于乾隆八年癸亥，年六十一，此为其一年前，计距今正二百年矣。高君左手书画真迹未得一见，今于无意中乃得其手书十馀行，亦大可喜，至于高念东诗亦复别有佳趣，则是别一事，抑亦其次也。（十二月八日）

□1942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清诗初集

《清诗初集》十二卷，蒋玉渊选，康熙二十年辛酉自序，乾隆时列入禁书目。所选有方孝标诗三首，即卷七卷九及卷十二，五七律七绝各一，殆亦是违碍之一原因欤。李文石著《旧学庵笔记》中有“方楼冈诗”一则，录其手书仿唐人拟古乐府百首之三，云方楼冈集已奉旨销毁，其诗与书至不易得，三诗颇有唐贤气息，与褐夫古文可称二妙也。予不知诗，未审《清诗初集》所选者如何，但因此而方楼冈之诗共得有六篇，亦大是好事也。（十二月十日）

□1942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印 人 传

周栎园《读画录》四卷，《印人传》三卷，赖古堂原刊本，于市上分两处得来，而大小如一，可以合装一函，亦可喜也。《读画录》无印记，《印人传》卷一有白文印曰，汉阳叶名澧润臣甫印。此书旧有风雨楼邓氏合刻本，白纸铅印，亦颇明净可读，今得原本，自更可珍重耳。栎园平常虽喜骂竟陵派，而究系明末人，流风馀韵固亦尚在，所著书如《闽小记》、《因树屋书影》各种，均颇有风趣，此二录虽谈画与印，而不涉艰涩，多记性情事迹，盖实以传记为主而艺术为副也。

《印人传》卷一书许有介自用印章后云，君大腹，无一茎须，望之类乳媪，面横而肥，不似文人，字画诗文恒多逸致，见其手笔者拟其貌若美好妇人，亦异事也。又云，翻阅诸章，如见君鼓大腹，以巨觥合面上时。此与印章或无甚关系，惟描写极妙，读之真觉得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又书文国傅印章后云，公左目虽具，而不能视，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此种写法亦非普通所有，却是关于文寿承的难得资料，甚可贵也。

卷二书黄济叔印谱前，录其致济叔小札两通，惟阅《尺牍新抄》卷十二，此札具在，而署名周折，字百安，抚州人，著有《尝实堂集》，则自别有其人，不知何以混合，岂栎园不欲自表暴，故借用其宗人之名耶，疑莫能明也。

□1942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画钟进士像题记

《金冬心杂著六种》，寒斋有《巾箱小品》本，种榆仙馆刻本，当归草堂刻本，最后乃得桐西书屋刻本。当归草堂本目录后有魏稼孙题记，末云：

余为当归草堂校刊此种，旋得湖州凌子与霞邗上来书云，冬心画记尚有吴门潘氏桐西书屋刻本，时剞劂垂成、道远不及借校，附记于此。

案潘氏刻题画记五种时在同治壬申，比了氏本才早六年，有王鸿朗跋，不言所据何本，略一比较，似反多鲁莽删改处，唯末附刻王笈甫先生《画钟进士像题记》一卷，却颇可喜。王笈甫即鸿朗，前有光绪丁丑潘介繁序，画钟馗题词世多有之，但只散见各人集中，今汇为一卷，一人之作而有二十二则，可谓难得矣。今年夏日乃又得一册，则上有红蓝二色批语及墨笔题识，语多可取，且亦有足资考据处，因择要摘录之。卷首《画竹题记》自序后墨笔题云：

光绪三年丁丑之夏，余客楚北，椒坡舍弟以需次在彼相见，各出行箧书互观，贻我此卷，盖镌板武昌郡中者。是岁九月余归吴郡，椒坡亦往湘楚，匆匆分手。令检箧，此种乃有两本，因分一以贻棱伽先生，先生善画工诗，古趣奇趣，与昔邪居士殊不相让，且与舍弟亦素交，想必展卷一笑也。香禅居士记于二鱼庵，时光绪六年庚辰，端午后三日。

朱文印曰香禅，曰瘦羊，前一印曰二鱼庵。《画竹题记》第一叶栏外朱文印曰惟德堂，曰化生，白文印曰香禅居士，又白文曰顾芸台印，朱文曰鞠翁，曰駸老，白文曰顾曾寿，曰顾亮基印。第一则题记首云，饥凤非竹实不饱，余画竹，竹之实岁无所收，末云，余之常饥又何怪乎。书眉蓝笔批曰：

“第一条即是江湖口吻。”又朱笔批曰：

“王渔洋朱竹垞批杜诗所谓乞相。黄山谷云：开口辄言穷，其意欲何为，又云，客来献穷状。张山来曰，其意但求布施耳。”卷末空白处朱笔题曰：

“先生胸襟故高，惜激而不广，干青云而直上之意未见也。庚辰五月，棱伽山民。”又蓝笔题诗云：

“精玉两呈人各见，鱼熊兼爱性难同，光芒太露缘何事，未免胸怀欠抱冲，民又书。”《自写真题记》上亦有眉批两则，不具录。《画马题记》卷末朱笔题曰：

“为人学问，不宜愤激，不宜炫耀，冬心先生才气虽优，德器终不足也，惜哉。棱伽山民。”又蓝笔题曰：

“冬心题画诸诗皆不见佳。”案香禅是潘钟瑞，棱伽则顾氏也，所评虽严切，然亦深中冬心之病。《画钟进士像题记》序后亦有识语，墨笔云：

曩余游鄂渚，值丁丑端午，曾以素纸乞笈甫先生画钟进士像，未得也。去年闰春复往，笈甫见余即言负君债未还，余因索之，遂出戊寅端午所画一帧携归，刚及端午，悬诸斋壁。今又逢端午，而笈甫下世已数月矣。重展画幅，又诵斯编，辄忆老馗霑醉奋笔时也。庚辰五月七日，香禅记。

又朱笔云：“笈甫先生不得意，画出终葵吓小鬼，题诗无乃太疏豪，棱伽山民为嘘唏。先生海盐人，大才不售，在湖北阔幕，奉事主稿，豪于诗酒，年五十馀而卒矣。”据此可知王氏卒于光绪庚辰，唯云海盐人则不确，题记自署古盐官，实为海宁州也。卷中有眉批五处，其一云：

“诗意极是，而诗之旨终不是，言尽意穷，失之于薄，才大量狭故也。”

未蓝笔总批云：

“此公才气比冬心开阔，然器量亦狭。”所评大旨亦不差，唯此本笔黑游戏，自然语多尖新或涉排调，如欲以温柔敦厚相期，未免失之太高。题记第一则为张樵野作，原本小注云：

> 图中古木搓枒，霜叶半脱，老旜倒戴纱帽，沉醉不能步，张天师星冠象简，掖之而行。一小鬼于路侧屈半膝，持手板作通谒状。下临深潭，潭中月影与天际光相射。

第十二则为芝舫作，小注云：

> 图中石床一，竹炉旁设茶具，一鬼汲水，一鬼持扇。老旜反袂侧立作凝睇状，背有小鬼提酒壶，乾手揶揄之，山径转处两鬼扛一竹篮，红签标题八分书四字云，六安春茗。

又第十四则画作年少钟旜图，第十八则作柳岸纳凉图，具旖旎风流之致，记云，“虬须飘然，梨涡夹侍，老子于此，兴复不浅矣。”观此诸例，可以想见图之一斑，题诗在上头，那得不嘻笑怒骂耶。

王笈甫著作不知有几种，寒斋所得此外只有《游蜀纪程》上下二卷，有时乃风序及自序，鲍瑞骏等六人题辞，时氏序署庚午，盖同治九年刻也。书记同治八年七月随李鸿章由湖北入四川，十月仍回武昌，棱伽山民所云阔幕，盖即指此。记文清丽可诵，如记七月初六日事云：

> 初六日晴，好风送帆，百二十里。帅舟峨峨，胶于浅沙，百夫推挽，江潮上迎，天人交助仅而得达。抵老鹳嘴，日暮遂泊。侧有木筏，修广盈亩，茅茨鳞比，俨如江村，试登其上，匠方锯材，邪许之声，与波相答。

我常觉得用八大家的古文写景抒情，多苦不足，即不浮滑，亦缺细致，或有杂用骈文句法者，不必对偶，而情趣自佳，近人日记游记中常有之。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六朝的散文多如此写法，那时译佛经的人用的亦是这种文体，其佳处为有目所共见，唯自韩退之起衰之后，文章重声调而轻色泽，乃渐变为枯燥，如桐城派之游山记其写法几乎如春秋之简略了。《游蜀记略》本不是大著，不过因为是王笈甫之作，所以收得，文章也只是带便说及而已。

潘介繁字椒坡，曾得其所著《晓梦春红词》一卷，有吴嘉涂许赓陶二序，许序署同治己巳，或即是刻书之年，盖在刻冬心题画记之三年前也。（民国壬午年十月二十八日）

□1943 年 4 月刊《风雨谈》创刊号，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杂文》

左 庵 诗

《刘申叔遗书》近已上市，因购得一部，铅印白纸七十四册，价颇不廉，闻且有上涨之趋势，至其原因则未详也。申叔卒于民国八年，十五年后宁武南氏乃为编刊遗稿，及钱玄同君参与编订，常来谈及，始知其事，盖已在民国二十四五年顷矣。当申叔避难居东时，余亦在东京，曾数为《天义报》撰稿，惟终未相见，后来同在北京大学教书，除在校遇见外亦无往来，对于申叔绝学不能了知，故亦无悔，但于编《遗书》时余亦得有一二贡献，殊出望外，如《鲍生学术发微》，是亦寒斋之光荣也。

买到遗书之后，无意中却又得到几种申叔著作的刻本。其一是《周书补正》六卷，后附《周书略说》一卷，板心下端刻“左庵丛书”四字，题叶为秦树声著，未记刻书年月。案《遗书》中所收《周书补正》据总目注明系用抄本，在后记中亦未说及曾经刊刻，但取两本比较，别无大异，后与赵斐云君谈及，则所云抄本即是赵君手笔，昔年在南京据刻本移写者，乃知此刻本实是祖本，其无异同宜也。（其偶异处恐是遗书校字者之误。）

其二是《左庵诗》一卷，题叶书辛未八月，李植署，背面云华阳林氏清寂堂刊。前有林进恩“校刻左庵诗序”，时为辛未，目录后又有癸酉题记，盖初刻于民国二十年，至廿二年补刻十九首，别有自序，乃无年月。《遗书》中《诗录》四卷，为玄同所编定，卷二即名《左庵诗》，系据刘氏家藏抄本编入，后记云，《匪风集》与《左庵诗》似皆有刻本，但从未见过。后记作于廿五年五月，刻本早已出板，卷首有朱印曰成都茹古书局印行，可知亦是发客者，不审其时何以不至北京，不克供编集者之参考，而余乃于无意中得之，奇矣。刻本系根据申叔自订本，与《诗录》相较，除续刻十九首外，全本相同，惟《诗录》有阙字，《从军行》之二第三四联原文云，“为惜卿忧惕，葱我瑶华遗，鸿飞递南北.且舒刀环思。”今缺“为惜”至“鸿■”十二字，借刻本得以补正，亦是可喜事也。玄同为申叔编诗文集，备极辛勤，而未及见此二刻本，念之怅惘，今乃归于余，得无有明珠投暗之叹邪。

□1943 年 9 月刊《古今》30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河渭间集选

《河渭间集选》十卷，钱价人撰，魏耕序。此书一见似亦寻常，偶于北京市上得之，却甚可珍，亦可喜也。案杨凤苞《秋室集》卷一钱瞻百《河渭间集选》序云：

> 嘉庆甲戌戴比部金溪得之吴山书肆，不知瞻百出处，介许武部周生以问余，为据旧闻疏其大略以复之。钱瞻百为允武族人，与魏雪窦为友，及康熙辛丑允武为孔孟文首告，瞻百亦为吴之荣所构，谓其连络山海，妄思吹烬，为之主谋，至壬寅二月三人遂同及于难。集中纪年至己亥止，是刻成未几而被祸，故流传绝少。

杨君在百二十年前已如此说，余今乃得见，不可谓非眼福矣。

魏雪窦遗文除此集序外恐已无有，《集选》诗题常及魏氏，卷二有《春暮拟陶和雪窦》，惜原诗不可得见。《竹垞文类》卷三有《梅市逢魏子》诗，《曝书亭集》卷六亦载，列在上章困敦即康熙庚子年，题改作“梅市逢魏壁”。案《海东逸史》卷十四忠义一，魏耕原名壁字楚白，甲辰后改名。一死一生，交情未变，朱十亦是君子也。

前清康熙乾隆两朝禁书，不知总有若干。文字狱古已有之，阅《乌台诗案》，其情形亦颇相似，惟乾隆中因修四库书，搜查禁毁，其数乃尤多，咫进斋虽有重刊书目数卷，尚不完备，安得有笃学之士，仿安阳谢氏《晚明史籍考》之例，肯以数年辛苦，搜编为清代禁书考，其有功于学问当非浅鲜。惟此等书籍不堪为贾人所利用，若凭此以为居奇之证据，则吾辈书生反将大受其害。寒斋所有《河渭间集选》，即以坊刊禁书目中不曾列名，故尚能以平价买得，如同时所得之蒋玉渊编《清诗初集》，便不能如此矣。

□1943 年 9 月刊《古今》30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尔雅义疏

郝氏《尔雅义疏》余最初所得为同治丁卯郝氏家刻本，末有刊误一纸，可知是早印者也。

次得咸丰丙辰聊城杨氏刻，即同治本所从出，此二者皆是足本。后读殷礼《在斯堂丛书》中《尔雅郝注刊误》，见罗振玉序盛称王念孙删本之善，因再求得道光庚戌沔阳陆氏刻本藏之，即木犀香馆本，有石印本未见。

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二，有陆刻本《尔雅义疏》二十卷，云五本之中杨胡本希见，次则陆刊，此即陆本也。叶氏记此时为民国己未，今又过十馀年，寒斋却能全都得到，亦正可喜。

至于删本与足本二者孰优，此问题未易一口断定。据陆本陈奂跋，删节出王氏手当无疑义，服膺王氏之学及主张谨严者推重固是当然，但或以为新说假设不妨多有，又或著者原意多宜保存，亦均合理。若如家刻本郝联荪跋中所云，先大母临终犹谆谆以亟觅原本为诫，则婉佺夫人亦未满意于节本也。

但以形式论，鄙意以为陆刻本最佳，清疏悦目，为各本所不及。陈氏跋叙著者自道其治经之难，云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常与老妻焚香对坐，参证异同得失，论不合，辄反目不止，语甚有风致，此亦《世说》中之好资料也。

邵氏《尔雅正义》昔曾有之，惟见《释虫》果蠃蒲芦注下仍主化生之说，私意甚不满，亦备品而已。

去年又得一部，白纸早印，清洁疏朗，为望江倪氏旧藏，有大雷经锄堂藏书及倪模诸印，卷中《释宫》以下朱批甚多，大抵有所纠正，此亦不愧为二云之诤友也。

□1943 年 9 月刊《古今》30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山海经释义

小时候在书房里读书，虽然背得很熟，后来大抵不感到什么兴趣，但是自己随便看的却时常想起，即使是极平凡的书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山海经》便是其一。那时最初见到的《山海经》不知道是什么板本，总之是极粗糙的坊刻，中本黄纸印刷，每半叶一图，雕刻拙劣，但心甚喜爱，其中龙首马蹄的“ 疆良 ”图像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以后又见过仿佛是广百宋斋的一种石印本，图用红绿套印，亦是中本而半页有四图，殊不明晰，故记忆不清，此两书均早已失去，不复可踪迹矣。

经过了三十年之后，重新再买《山海经》来看，却是别一路的东西了，如毕秋帆的《新校正》，郝兰皋的《笺疏》都是纯正的学术书，没有图像，吴志伊的《广注》虽说有图五卷，现在却也不见，汪双池的《山海经存》石印本有图，但是重描得不好，觉得还不如坊刻粗本尚有古拙之趣。

最近所得有王德徵的《山海经释义》，明万历丁酉年刊，在今三百四十馀年前，有图七十五叶。据《四库总目》卷一百四十四“ 小说家类 ”存目二云，是书全载郭璞注，崇庆间有论说，词皆肤浅，其图亦书肆俗工所作，不为典据。案《山海经》多记怪物，毕氏书序虽力说未尝言怪，亦只是惟理的解说，未足凭信，因此图多怪相正是当然，即使根据唐宋人画本，也未必便足为典据，所可重者只是古耳，今《释义》本在我所见已是最古之图，虽出自俗工亦无妨碍也。《郑堂读书记补逸》卷十六云，是编就郭景纯注本，于每节后各为之释义，词多肤浅，于经注无甚发明，间有驳及经文，尤为乖谬。此评语盖本于《四库存目》，别无新意，惟特别提出驳及经文，是已能知《释义》之要点，但持与毕郝诸氏之书相较，则明清学风不同，自难以并论矣。《释义》郭璞序后蒋一葵识语中有云，景纯语怪专信物，德征语常专信理。此语极得要领，盖《释义》非笺疏而是批评，往往反驳经语为不可信，其实此惟理主张与毕氏本无二致，但与经生家法不合，为郑堂所不喜正是难怪也。

我颇喜《释义》的话，但也更爱那些俗工的画，《海内经》云南方有神曰延维，人首蛇身衣紫衣，大为王君所笑，而其图观之亦复有趣，（惜未画紫衣，）盖论事理应疾虚妄，若作小说看时，姑妄言之姑听之，正亦不恶也。

□1943 年 9 月刊《古今》30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消寒新咏

我不喜看戏，却常收集些梨园史料，此殆如足迹不入狭斜者之读《板桥杂记》《南浦秋波录》乎。近日得《消寒新咏》四册，乾隆乙卯年刊，题三益山房外编，以时代论，仅后于《燕兰小谱》十年，亦是极好资料。数年前张次溪君编刊《燕都梨园史料续编》，所收只是目录，似其书不多见。

全书四卷，卷一二为正编，选优伶十八人，以花鸟比其声色，分题合咏，为消寒之计，故名。卷三为纪实，就诸伶擅长之戏，加以诗评，所举以正编十八人为限，此外复选京中诸大班旦色，为卷四曰杂载。每人每篇先有短序，往往比诗更有意思，令人有买椟还珠之感。作者三人，曰铁桥山人，姓李，案即李澐，山阴人，曰石坪居士，姓刘，曰问津渔者，姓陈，又有讷道人等十一人时贤佳作，汇为集咏一卷，附刻于后。

这里边最有兴味的，我觉得是第三卷的纪实，因为如正编杂载那种写法，许多同性质的书大抵如此，若是咏剧的诗似乎还不多见。本来观剧诗古已有之，金桧门三十绝句最有名，王朱皮叶诸家和作共有二百馀，见于《双梅影闇丛书》。宣瘦梅《三十六声粉铎图咏》为《申报馆异书四种》之一。棠梨馆主何青耜有《戏寄》一卷，诗一百首。但是这些只是以剧名为诗题而已，其注重伶人技术者，恐只此《新咏》一卷，此外则《日下梨园百咏》吧。

《百咏》一册，光绪辛卯天津石印书屋印，钱江醉薇士居著，目录上每一戏题均注明戏角姓字，又或系以堂名小字，虽品评不详备，但亦有史料的价值，与普通观剧绝句有异。此诗又有一特色，即是百首皆是五言八韵的试帖诗，亦是仅见。不佞曾搜罗清代试律，昔得铭岳所著《咏物全咏》抄本，分咏北京儿戏玩具共三十首，陈其泰编《宫闺百咏》，诧为试帖中珍品，今得此册，乃鼎足而三，更可喜矣。

□1943 年 9 月刊《古今》30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天 籁 集

吕善报《六红诗话》卷二云：

康熙初钱塘郑扶羲旭撰《天籁集》，计诗四十八首，自序谓如来趺莲台，矢四十八愿，度一切众生，脱离苦海，读是集者，当作如是观。余细读之，词虽鄙俚，饶有奇趣，其书不甚流传，余偶于友人胡松坪大宇处见之，摘录数首以见大凡，正不得以小儿女塘戏之词少之也。

此书光绪丁未有活字小本，题郑旭旦评，又有卷二则署钱塘悟痴生编，初意二者皆是今人，及见诗话，乃始省悟。

集中所录皆是江浙间通行童谣，什九与现今相同，可知是诚实的集录，未经文人加点，故可贵也。其评语则颇有唱经堂意味，中有数处对于缠足加以痛骂，当初亦疑为留学生口吻，今乃知是康熙时人语，盖其时思想界亦颇有新气象，故曾有禁缠足与废八股文之事，非是偶然。

近又从杭州得同治壬戌芝秀轩刻本，有许之叙许郊二人序跋，得见原书面目，甚为可喜，惟序中只云郑君旭旦，不及扶羲名，未知诗话何所依据，或康熙刻本如此作欤。活字本所据当即是芝秀轩本，惟原有郑君自作序跋各一篇，今只有跋而无序，又误郑为陈，疑或是据传抄本乎，殊未能明了也。

商嘉言《■亭诗草》卷十有诗云：

八月五日风雨舟中读郑扶曦先生
《天籁集》题后

万木响刁调，扁舟一叶飘。两间自天籁，
千古乃童谣。情最苍苍重，魂都恋恋销。
有心人不见，风雨正潇潇。

小注云，“首自序云，将质之苍苍者，末自跋云，恋恋于中而不能已也，故及之。先生自谓古之有心人。”此诗作于嘉庆庚辰，可知其时所见本序跋俱存，诗话则编定于嘉庆甲戌，相距才五六年，似尔时《天籁集》原本尚有流传，但至今日而同治重刻本乃亦甚稀有矣。

□1943 年 9 月刊《古今》31 期，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荆园小语

少时在族人处见石印小本《笃素堂外集》，借读一遍，颇觉可喜，倏忽已是四十馀年，更求得而读之，则石印不精，近始获一木活字本，语亦平平，有似儿时果饵，再尝亦殊不甚甘也。读《荆园小语》，却觉得颇佳，胜于《聪训斋语》，此比较亦难细定，大旨岂不以艰难与安乐所处之异故耶。《荆园小语》向为世所重，多刊入丛书中，最近者为平步青之《墓园丛书》，光绪癸未年刻，有汝南堂抱杞序，即平氏别名。中有云：

> 《■园丛书》类取浙东先正暨师友遗著，今开雕《小语》旧本，颇讶重复可己，读至第二十八条，《冬夜笺记》所采者，憬然作而喟曰，嗟夫，意在斯乎，何闵人之深也。

此序今收入《安越堂外集》中，《小语》第二十八条论《金瓶梅》，序文则指《野叟曝言》之翻刻，所谓抱杞盖即此耳。寒斋得平氏门人杨宁斋藏本，《小语》全本有圈识，末录识语云：

> 癸丑征君年五十五，则当生于万历己未，端愍甲申殉难，征君年二十六耳，杜门课弟，发名成业，此卷尤为修齐之要，岂第幼学指南。仆幼时先大夫以此诲读，谓一切格言善书无不赅括，读此可无须更读他书，守之终身可也。今年予亦五十有五，征君之品诣万不敢望，其学亦岂能涉其万一哉。丙戌嘉平三月，霞外人。

此文未发表，但于此可以看出重刻《小语》的意思，更为明瞭。乾隆中平原张予觉辑录先正嘉言，可与《小语》互相发明，或足备参观者，分条笺注，名曰《荆园小语集证》，分为四卷，至咸丰七年始由张氏后人刊行。修养之书，有人为作笺证，事不多有，可知此类书中《小语》之独为人所重也。张氏《集证》意见多通达，可供阅览，惟征引不著所出，不但有失传述之本意，亦并减少读者之兴味耳。

□1943 年 9 月刊《古今》31 期，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容膝居杂录

《容膝居杂录》六卷，昆山葛芝著，自序云丁巳年六十矣，为顺治十四年，书则是康熙初刊也。葛宇龙仙，崇祯时诸生，书中记乙酉春曾至绍兴访刘念台，又多说及徐俟斋，共有五六处。卷三中《论志墓之文》云：

> 及吾之生存，当求吾友俟斋先生为作一传。余六十年中排纂生平行业，作纪年录，已成书矣，亦不欲出之以示俟斋。盖俟斋知吾深，但须凭空结撰，必能得吾精神意思之所在也。

同卷中《记轶事之一》云：

> 姜行人如须鼎革后隐于吴中，一日与徐孝廉昭法酒间相谑，姜忽送一纸于徐云，“桓温鸱张，尚有枋头之败”，以昭法名枋也。徐不假思索，立答一纸云，“项羽虎视，不免垓下之亡”，以如须名垓也。坐客绝倒，叹为风流蕴藉。

罗叔言编《徐俟斋先生年谱》中则引《池北偶谈》载：

> 姜吏部垓南渡后流寓吴郡，与徐孝廉枋善，一日行间门市，姜顾徐曰，“桓温一世之雄，尚有枋头之败”；徐应声曰，“项羽万人之敌，难逃垓下之诛。”相与抵掌大噱，市人皆惊云云。

罗氏按语云：

> 如须先生卒于顺治十年，乙酉以后五年居吴，而先生乙酉以后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宁有抵掌吴市之理，此记事之小失实也。

不佞拿出《池北偶谈》来查看，乃遍觅不得，恐怕是在渔洋山人别的著作中吧，一时也不及再查。葛龙仙与徐昭法既相知甚深，所记当可信凭，渔洋山人得之传闻，又加以藻饰，遂不免有失实处，盖酒间原可在山在野，不必一定在阊门市也。寒斋未有《居易堂集》，不知其中有葛君所云之传在否？又年谱注中说及葛瑞五，疑即葛芝之字，亦未能明。葛君与顾亭林同时同县，而书中不一提及，则因顾氏北游不返，或不相知也。

□1943 年 9 月刊《古今》31 期，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柯园唱和集

《柯园唱和集》不分卷，序一叶，本文百十六叶，题《柯园十咏》，王衮锡首唱，主人沈㮚元五和之，此外和者五十二人，共得七言绝句五百八十首。鄙人不解诗，读之亦觉得无甚好句，但是对于此集感到兴趣者，则以柯园乃是沈园故址故也。作序者亦为王衮锡，为谑庵居士之孙，署戊戌秋，盖是康熙五十七年。

序中云，柯园在蠡城东南，墨莲桥之阳，地接稽山，巷隔深辙，沈子宜士卜居焉。末又云，或云柯园地即沈园旧址，陆放翁梦游处，果尔，此《十咏》数百篇。恨剑南不及见之。

《越风》卷九沈㮚元条下云：

> 沈翁家有园亭，在春波桥畔，放翁逢其故妇诗，曾见惊鸿照影来，即此地也。少时觞咏其下，有和主人柯园诸景诗。内一方池澄泓，可鉴毫发。

今案十咏之二为澹影池，殆即此。

各诗注云，相传青海鲁公见魁星于此，或云，人有十影，至四五则乱，数尽者大贵。又云，额系王山阴先生书，案即谑庵也。惟商宝意云曾和诸景诗，查集中并未见，但有商元柏，则是宝意之父。案宝意生于康熙四十年，在戊戌才十八岁，或者觞咏尚在其后，故诗亦遂未得刻板欤。

《越风》记王衮锡著有《十三楼诗集》，沈㮚元有《柯亭诗草》，陶元藻《全浙诗话》引录，寒斋有安越堂校本，改亭为园字。惟同书又引杨鲁藩《国朝诗话》，称其著有《吹竹集》，据《贩书偶记》卷十五，原书名《柯亭吹竹集》，初二集共九卷，则似柯亭字不误。集中余石帆诗注亦称主人为柯亭，当系其别号也。

□1943 年 9 月刊《古今》31 期，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越 言 释

《越言释》二卷，茹敦和三樵著，余求之二十馀年，共得两本。一啸园葛氏刻巾箱本，凡有两部，以其一赠钱玄同君，二原刻大本，书两卷不分别上下一二，惟灯之卷居前，筷之卷次之，与啸园本正相反，不知何也。

巾箱本有道光己酉杜竹庄序云，周君一斋读而悦之，缩为巾箱本，重梓单行，啸园刻本即从此出，或上下分卷尔时即如此耶。一斋公于余为从曾祖行，幼时犹及见其子揆初公，惜所刻书不可得见，盖毁于太平天国之乱，江浙间道光咸丰年刻书常极难得，殆过于雍正乾隆本，即以此故也。

□1943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越中金石记

《越中金石记》十卷，山阴杜春生编录，道光十年詹波馆刊，因印本流传不多，市价颇高，曩得一部，在二十金以上。近年得见新印白纸本，末有陈遹声吴隐二跋，吴跋署己未仲秋，盖是民国八年，有云：

> 是书以道光庚寅付梓，距今九十馀年，传本稀如星凤，乡邦之雅故，翰墨之伟观，惧其久而失传也，拙藏有初印精本，爰与同里陈丈蓉曙，吾宗善庆，集资重付剞劂，以广其传，阅数月而工竣。

似是近日重刻，而翻阅书中断烂处比比皆是，因知此实是原板新印，非新刊也。其实修补旧板印以行世，亦何尝不是好事，如会稽徐氏之小李山房本《札朴》是也，今观漫漶之处并不补正，虽自称新板，实则一目了然，即欲欺近视者亦不可得。《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观妙斋金石文考略》下云，道光丁酉盛氏印本，原雍正中刊本，盛氏得其板片，诈为重刊，正是同一的例，此等事盖亦古已有之也。

□1943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左腴周氏刻本

《左腴》十四编，系讲《左传》之书，分上中下三卷，会稽潘希淦著，有道光戊申杜煦序，男尚楫序，同年十二月刊，下卷末叶有字一行曰，年再侄周以均命男锡祺校刊，中卷末又署孙婿周以墉鸿卿校刊，此盖是覆盆桥周氏刻本。书估索高价，以其为吾家故物，乃收得之。

潘跋云，去夏沈墨庄周一斋纂修县乘，购访遗书，查道光《会稽县志》稿，艺文部分已缺，卷十七人物儒林下有潘希淦传，语多与杜序相同。一斋公为曾祖八山公之从弟，曾重刊《越言释》，鸿卿公则曾祖之同祖兄弟，即花塍之父，同治壬戌死于寇难，谱载名之錞，以墉之名反不著录。

□1943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蕉轩摭录

《蕉轩摭录》十二卷，山阴俞梦蕉著，旧有申报馆活字本，因系越人著作，故欲搜求其原刻，通行木刻多是咸丰年刊本，今得一部，乃道光元年刊，当是最早之本矣。活字本有顾丙辉序及自序，均署嘉庆乙亥，案即嘉庆二十年，而刻本中尚多韩廷辉乙亥序，孙光照丁丑序，潘榛题辞七绝三首，沈潮七古一首，例言四则，活字本均无之。又活字本载题词七绝四首，下署失名，刻本则有印章二方，盖即是韩廷辉作耳。

俞梦蕉不知其名，今见刻本自序后有墨色印文二，朱文曰梦蕉，白文曰国麟，又每卷题签上均钤一白文朱印曰俞国麟篆，可知此本尚是作者自藏之书也。

《摭录》似系模仿《谐铎》之作，而思想庸陋，文章亦未能超脱，不佞之搜求实惟以乡曲之见故耳，而道光刻本颇佳，翻看一过，比校看活字本时印象要好得多，不但序题有多少不同已也。由是可知板本与内容甚有关系，铅字石印虽是便利，但终不能悦目，故只是便于携带与检查，若为细读久藏起见则仍以木刻为宜，而刻之先后与精粗亦殊重要，未可稍忽视也。

□1943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越妓百咏

壬午年中从杭州书店得安越堂平氏藏书十馀种，其中有红格抄本两册，皆杂录诗词，以会稽韩氏作为多，计所记时日大抵在乾嘉之交十七八年间，卷首为嘉庆癸亥韩慕樵与侄予良书，未有平景孙题字五行。册中所抄多极凌乱，惟其中有九叶首尾完具，题曰《越妓百咏》，下注云，自壬戌起至戊辰止共七年，萼桴氏未定草，后附《吴妓二十咏》，亦萼桴作，末有《题越妓杂咏诗后》二首，署名鸿轩氏。案抄本中韩汝■，亦名昶，字萼不、萼桴、鹤夫，韩昂字鸿轩，又字芸沚、耘子。曾见《胭脂牡丹尺牍》六卷，道光乙巳年刊，题韩鄂不著，因知其人盖是游幕者，韩昂亦有嘉庆戊午新城官署与王楷堂唱和诗，可以为证。吕善报《六红诗话》卷三云。

> 会稽韩萼桴汝■与从兄鸿轩昂集王次回句为无题七律各八十首，较张云轩制所集多至十倍，真奇观也。萼桴诗以清丽为主，佳句如：帘额寻香飞凤子，墙腰抛箨长龙孙，春日偶成句也；天遥万里杳无迹，人静一村微有香，月下寻梅句也；禅关悟道心偏淡，闺阁吟成姓也香，咏柳絮句也，皆不让元人。

此百二十咏本系游戏之作，中多狎亵语，亦正是狭斜恶少之本色，惟在诗中却甚少见，又因此得知其时越中游女之姓氏与人数，不失为绝好史料也。《越缦堂日记补》丙集，咸丰丙辰六月初七日条下记夜中微行，三叩夜度娘家，虽记述简略，差可比拟，此外则不易寻找矣。六七年前题张亨甫《南浦秋波录》有云，“近来想稍收集关于冶游之书，而既不专精，又复吝啬，结果自然是不能大有所得，但就所有书中看去，则此册要算是最好的一种，文情俱胜，《板桥杂记》或在其次耳。”《百咏》只是七言绝句一百首，别无记述，岂足与名著抗衡？但艳史所记都是堂子里的事，而此则是一府城里的私门子，正是极难得的记录，在寒斋旧书中甚值得提出来一说者也。

□1943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吴歈百绝

三十六七年前在东京旧书店买得顾禄著《清嘉录》十二卷，日本天宝八年（清道光十七年）翻刻，记吴中一年间的风俗，觉得很有趣味，其中多引蔡云《吴歈》，亦多佳作，不知共有若干首。后来又搜得蔡云，《吴歈抄》二卷，天保五年刊巾箱小本，即从《清嘉录》抄出者，上下卷共得七十四首，以为蔡氏之作尽于此矣。

近来于无意中收得原本《吴歈百绝》一册，乃是全本，末有同治十一年石渠跋，云道光初其诗文集已刻，乱后散失，今据抄本重刊。案蔡氏《月令》卷首有小传，记所著有《月令》两卷，《癖谈》六卷，《借秋亭制艺》，诗文集不及《吴■百绝》，或者原系诗集中之一卷欤。《清嘉录》刊于道光十年，意其时所引即据《借秋亭集》本，惜只采其四分之三，又原诗均有小注，录中亦不及引，今得见原书，极可喜也。《吴■抄》所缺诗共二十六首，计春秋各七，冬夏各六，其中颇多有趣味之作，如春之二云：

潜投红刺姓名轻，
安步时防裂爆惊，
深巷乱鸡更迭叫，
村童结队卖芦笙。

注云，“俗甚重贺岁，然非素相习者，止以名刺投门隙，甚无谓也。群儿聚嬉，爆声连路。芦笙吹以娱小儿者，葭管箬簧，饰成冠羽，名曰叫鸡。”又其九云，

耍煞儿童十数天，夺魁入阁快争先。
铮铮排户投琼响，
半掷床头压岁钱。

注云，“夺魁谓状元筹，入阁谓升官图，小儿局戏，以骰掷者。除夜将睡，以钱掷小儿女枕边，名压岁钱。”写新年风俗，兼及儿童生活，殊有情致。传称其家居酒一棬，书一卷，或篆刻小印，摩抄古泉以自娱，盖其人亦是很有风趣者也。（十月末日）

□1943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虎口日记及其他

不佞离乡已久，有二十五年不曾入浙江境了。可是至今还颇有乡曲之见，特别是关于文献一方面，很想搜集一点乡贤著述，以清代为主，宋明的如有自然也收，但如陆放翁，王龙溪，徐文长，陶石匮石梁，王季重，张宗子诸大家而外，有些小诗文集便很难访求了，所得遂以清代为多，这也是自然的结果。一面我又在找寻乱时的纪录，这乃以洪杨时为主，而关于绍兴的更为注意，所得结果很是贫弱，除了陈昼卿的《蠡城被寇记略》，杨德荣的《夏虫自语》一二小篇以外，没有什么好资料，使我大为失望。后来翻阅陈昼卿的《补勤诗存》，在卷十三《还山酬唱》中有一诗题云，《鲁叔容虎口见闻录），小注云，“绍城之陷，鲁叔容陷贼中，蹲踞屋上，倚墙自蔽，昼伏夜动，凡八十日，几死者数，仅以身免，然犹默记贼中事为一书，事后出以示人，不亚《扬州十日记》也。”又见孙子九的《退宜堂诗集》卷二有诗题云《题鲁叔容溅泪日记》并序。序云，“叔容陷贼中阅八十日，排日书闻见成编，余取少陵诗语名之，并题两绝句。”同卷中又有题云《严菊泉广文逸自贼中赋赠》并序。兹录其序与诗于下：

城陷，菊泉虏系，夜将半，贼遍索赂，斫一人颅，衔刀灯下示怖众。寻缚十四人递戮之，既十人遽止，菊泉竟免，次三人袁杜姚并得逸。

听谈己事泪交颐，生死须臾命若丝。夜半灯光亮于雪，

衔刀提出髑髅时。于是我记住了鲁叔容的名字，却不知道其日记是否尚存，其次是严菊泉，也不知道他有否著述。这样荏苒的过了二十年之后，于民国癸酉元旦，在厂甸土地庙的书摊上，忽然见到一本陶心云题签的《虎口日记》，内署于越遁安子述，可是陈元瑜序中明明说叔容，孙子九陈昼卿的题词亦皆在，而且还有严菊泉的诗两首，署会稽严嘉荣菊泉。其诗云：

锦绣蠡城付劫灰，一编野史出新裁，懔然变色思谈虎，

我亦曾从虎穴来。

杀人如草血风腥，咋舌谁疑语不经，天遣才人遭厄运，

从教魑魅写真形。

《虎口日记》题叶后书光绪丙申季春锓于福州，不知为何人所刊，别无记录，陈元瑜序署同治壬戌，序中称《虎口日记》，似其原名如此。孙氏题诗在癸亥，陈氏则在丙寅，书名皆不同，岂最初实为见闻录，其后又改为日记欤。鲁叔容不知其名，绍兴县志局资料长编引补过老人《乡隅纪闻》，记鲁叔容事，大旨亦只是根据日记，惟云山阴人，年七十卒，今假定辛酉遭难时年三十，则至丙申才六十六岁，计刻日记时其人当尚存也。

严菊泉的著作虽不可见，但是其履历却容易查得多多了。据光绪甲午科浙江乡试同年齿录，中式第六十一名严弼，即是菊泉的次子，不过日记题词署会稽，而这里写的是山阴，恐应以此为准。上栏开列父嘉荣，注云，“字怀庆，号菊泉，府学增广生，道光乙未恩科举人，甲辰会试荐卷，乙巳恩科会试堂备。大挑二等，选授平湖县学教谕，内阁中书衔，推升嘉兴府学教授，保举卓异，候选知县，宦绩详《平湖县志》。京都山会邑馆设栗主，配飨先贤。著有《见闻录》，遭难己佚，《铎鉴》，《越中忠义录》，《逸香斋诗文集》，试贴诗，待梓。”再查《平湖县志》云：

严嘉荣，字菊泉，山阴人，道光乙未举人，同治癸亥任教谕。其时值粤匪初平，文教衰息，乃举行月课，优给膏火，丹铅笔削，士皆争自

濯磨。又以文庙礼乐缺如，筹置祭器，选取乐舞，豆笾龠翟，讲肄时勤。朔望率诸生洒扫庙庭，先师诞日行释奠礼，春秋丁祭，尽敬尽诚，声容之盛，观者叹明备焉。复捐赞田三十馀亩，为礼乐公产及祭胙之需，通详立案，以垂永久。壬申铨升本府教授，兴废举坠，亦有政声，年七十三卒。

严菊泉的著作据齿录所记也有好些，但现今已不可考，只从杭州书店见到他一册日记，起同治九年庚午四月朔日，讫十二年癸酉八月二十九日，正是在平湖做县学教谕，升转嘉兴府学教授这一时期，虽然记有朔望洒扫课文，行香差贺，以及彩蛋香肉等的送礼，可以知道一点七十年前的教官生涯，但是这总还不能满足我的期望。此外还有一册，没有书名，看笔迹是严氏手稿，列记辛酉绍兴死难男女的事迹，大约是《越中忠义录》的底稿，卷首夹入一纸，题曰“采访殉义士女启”，末署同治癸亥春三月，山会同人公具，后有凡例五条，其五云，“殉难以御贼为上，骂贼次之，寻常为贼所戕，似不胜纪，但无罪而死，情亦堪悯，未忍就删。”这里所说很有情理，盖严氏曾从虎穴来过，对于此等事不但谈之色变，亦且思之神伤，其著此书殆出于悲悯之心，与一般高谈人心世道者要自不同。全本凡五十叶，如以每叶八人计，所录亦才及四百人，固不能云详备，惟其意则自大可感耳。看稿中删改之迹，言语动作上不无藻饰之处，例以鉏麑触槐，或亦古已有之，信史本难得，亦可不必深求，录中记男子部分之末有一则云：

> 山阴王英康居水澄巷，业儒，工时文，为童试翘楚。咸丰辛酉九月廿九日被掠入贼馆，系于门外。俄一贼来问向习何业，答以读书，贼于笑谓其党曰，此人无用处。拽至大善寺木鱼下，遂加刃焉，年十九。

《虎口日记》十月二十七日项下有云，“有冯氏妇者，为余言，贼重读书人，称先生，有加礼。”贼固不必一致，但即此可见乱世秀才之苦，几于无路可走矣。录中又一则云：

> 山阴张柳堂居下和坊，贩书自给，事父以孝闻，积资为弟完姻，终身不自娶。辛酉城陷不出，十月五日掠赴萧山，将启行，贼见其面有愁色，曰，此人中途必逸，不如杀之。遂被戕于江桥南岸，年三十七。张吉生述。

观此乃又叹盗亦有道，阴鸷坚决，很心辣手，世所谓英雄豪杰者非耶，古之名将如曹彬或胡大海，盖无不如此，或者不如此亦不能胜利，惟成则为王，败则为贼，非真是《虎口日记》之周文嘉不及《保越录》之胡大海也。儒家主忠恕，重中庸，识者辨孔子无杀少正卯之事，正是当然，但亦由此可知其敌不过桓魋柳跖之流，此事想起来很有意义，只有稍有点阴冷，令人觉得有如感寒耳。（民国癸未十月二十日）

□1944 年 1 月刊《风雨谈》9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口甘口》

陶集小记

我平常很喜欢陶渊明的诗。说到陶诗，差不多不大有人不喜欢的，这难道确是雷同附和么？也未必然。陶诗大概真有其好处，由我个人看来，当由于意诚而辞达乎。陶集板本甚多，桥川既醉、郭绍虞诸君已有专篇著录，我辈见之只有望洋兴叹，但愿案头有一两部纸墨明净的本子，可供朝夕披诵，也就满意了。日前为得查考形夭无千岁的问题，把架上所有的陶集拿来一翻，实在贫弱得很，不但没有善本，种类也并不多。但是关于两三种觉得有点闲话可说，所以记了下来，依照《买墨小记》之例，定名如上。

寒斋所有的陶集不过才二十种，其中木刻铅字石印都有，殊不足登大雅之堂，不过这都没有关系，反正供常人翻阅，也大抵可以够用了。今列记于下：

甲、《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四册，李公焕集录，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宋丛书”之十一，民国二年刻成。

乙、同上，二册，“四部丛刊”初集本，民国十年顷上海涵芬楼影印。

丙、《陶渊明诗》不分卷，一册，曾集编，“续古逸丛书”之三四，民国戊辰涵芬楼据绍熙本影印。

丁、《陶靖节先生诗》四卷，二册，汤汉注，嘉庆元年吴氏拜经楼刊本。又同上一册，光绪中会稽章氏重刊。

戊、《陶诗集注》四卷，四册，詹夔锡纂辑，康熙甲戌刊，附《东坡和陶诗》一卷。

己、《陶靖节集》六卷，二册，方熊诵说，侑静斋刊本。案侑静斋所刊有《文章缘起注》，方氏跋署康熙甲戌，可以推知陶集刊行时代当相去不远也。

庚、《陶靖节集》六卷，二册，康熙甲戌胡氏谷园刊本，民国戊午上海中华书局影印。

辛、《陶公诗注初学读本》二卷，一册，孙人龙纂辑，乾隆戊辰一经代授山房刊。

壬、《陶诗本义》四卷，抄本一册，马墣辑注，乾隆庚寅序，此书有刊本来见。

癸、《靖节先生集》十卷，四册，陶谢集注，道光庚子刊本，又江苏官书局有重刊本。

子、《陶渊明集》十卷，二册，光绪二年徐椒岑仿缩刻宋本，前有莫友芝题字，世俗所谓莫刻本也。

丑、《陶靖节诗笺》四卷，一册，古直著，“隅楼丛书”之一，民国十五年铅字排印本。

寅、《陶渊明诗笺注》四卷，一册，丁福保编纂，民国十六年铅字排印本。

卯、《陶渊明文集》十卷，四册，世称苏东坡写本，汲古阁用钱梅仙摹本付刊，嘉庆十二年丹徒鲁氏重刊本。

辰、同上，二册，同治癸亥何氏笃庆堂用姚铨卿临本重刊者。

巳、同上，三册，光绪己卯陈澧题记，据胡伯蓟临本重刊于广东。

午、同上，二册，光绪五年会稽章氏用汲古阁影宋本刊，无题跋，盖是章石卿也。

未、同上，二册，即是章氏原板，而改题光绪十四年九月稷山楼藏。渊明小像后添刻四言赞十八句，署光绪庚寅七月四十五世孙浚宣敬赞，卷末有跋二首，文云：

仿苏体书《陶靖节集》传自南宋，波磔戈点，具法眉山。尝谓靖节之诗天怀简至，纯任自然，流水白云，神行无迹。东坡兴寄亮特，遇物超然，其所为诗风格虽殊，性源则一，惠州所和，几同笙磬，即论心画，亦本天真，如云在天，如水行地，故写靖节诗者惟苏书为宜。吾乡郡东陶氏，系本柴桑，代传竹帛，吾友文冲同年邃精坟典，著述斐然，八法之工追迹汉魏，今得此本，墨而传之，踵企先芬，模范高躅，不特此集增一善本，而银钩璀粲，冠家集之珍雕，翠墨风流，补稽山之韵事矣。

光绪庚寅夏五，越缦李慈铭书。

刻有三印，朱文曰湖唐林馆山民，白文曰慈铭私印。又朱文四行印曰，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予家旧藏陶集汤注大字本，纸墨安雅，非必宋椠，然出汲古本以前，献童幼未能校读，旋复散佚。近时会稽章氏刻吴春本陶诗，即汤注也。汲古主人毛扆尝得旧写本征士集，相传为东坡书，卷中避讳阙笔审为宋本，“鬻及借人为不孝”则元以后印记。毛氏钩刻之本传世甚稀，殆如星凤，迩者人间取传本上木，点■丰蔚，神采不远，抑亦老成典刑已。刻成板归同年友陶君文冲，弃诸稷山草堂，所以述祖德，寄古怀，乃模印分贻同学，献得之触手光发，顿还旧观。念魏晋以来别集专行绝少，往往掇拾窜乱，亡复真本，独靖节集卷第目录尚为昭明太子叙次之书，此本出宋贤手迹，首尾完具，垂垂六七百年，传诸好事，展转铅椠，辉映艺林，今又归诸好学笃信之云仍，尊若鼎彝，世守弗坠，后有考证艺文如王伯厚者，增成故实也已。光绪己丑冬十月，杭州谭献仲仪跋。

后刻白文印曰“浚宣长寿”，又朱文曰“会稽陶氏稷山楼藏书”，此跋审字迹盖是陶氏所书也。

案会稽章氏翻汲古阁影宋本，虽著录于《书目答问补正》，而流传甚少，其后原板归于陶氏，模印分贻，亦大是好事，但须明著来源，不唯大方，亦见盛德，乃读李谭二跋，均隐约其辞，似从道旁拾得者，此何故耶。谭跋上边已说及章氏刻汤注陶诗，而其后乃泛称之曰人，或者未知此即是章石卿欤。昔尝见有人得杜氏《越中金石记》刻板，称为新刻，此在市人亦不足异，稷山居士雅人，似不宜如此也。

申、《靖节先生集抄》不分卷，二册，陶及申较录，手写本。首叶总题菊径传书，靖节集，筠厂手录，朱文印曰会稽陶氏家传。陶氏有《各书抄读》，《筠庵文选》中收录其小引二十篇，陶集小引未见，今录于下：

靖节诗非惟不能学，亦不可学。昭明选不多，而选者自佳，东坡讥之太过。晋书宋书南史俱为靖节立传，序靖节诗文者无虑数十家，总无出昭明右者，即白壁微瑕一语，亦缘爱人以德，何可轻诋也。集本多舛谬，诸校刻都自称善，独恨其不多缺疑，则真所谓小儿强解事者耳。原载《群辅录》而不载《搜神后记》，今仍之。庚申桂月，及申谨识。

案其时为康熙三十一年，筠厂五十七岁，所言较以前各文甚为简要，书名为抄而实系全部，与所抄《帝京景物略》同，盖其所喜也。各种抄读寒斋共得五种，其中亦以此二书为最可珍重也。酉、《和陶集》不分卷，抄本一册，张岱评。书名和陶，而实则具录渊明原诗，附列东坡和作，其后有张宗子补

和者二十五首，前半有张氏评语，其评宗子和作部分或出于王白岳辈之手乎。抄本在东坡和诗末尾有朱笔题记五行云：

> 张岱号蝶庵，所著小品如《西湖梦寻》，《越人三不朽》，已经梓行，其未梓者有《陶庵文集》，《石匮全书》，《夜行船》，《快园道古》数种。兹编予于会稽谢氏案头见之，丹墨犹新，盖其手自评点者也，较订陶集异同各字，视他本最善，因借抄一册，以为行笈秘玩云。戊子仲冬朔有三日，汉阳朱景超识。

宗子和诗后又有三行云：

> 右蝶庵和陶，如和“规林阻风”及“六月遇火”等作，中间涂抹不一，或注改字另入字，此盖其未必定稿也，姑仍之，以俟获正集时再订。虎亭识。

案抄本中胤字缺笔，所署戊子当是乾隆之三十三年，去今亦已百七十五年矣。

宗子对于东坡殊不客气，评渊明诗固多倾倒，但也有一两处，如《答庞参军》批云，亦是应酬语，又《和胡西曹》批云，陶诗亦复不佳，语甚戇直，陶诗评语中殆不多见，颇有意思。宗子和陶诗有小引云：

> 子瞻喜彭泽诗，必欲和尽乃已，不知《荣木》等篇何以尚遗什分之二。今余山居无事，借题追和，已尽其数。子瞻云，古人无追和古人者，追和古人自子瞻始。乃今五百年后，又有追和古人者为之拾遗补阙，子瞻见之，得不掀髯一笑乎。

宗子所和诗不知视东坡何如，读去觉得却也还不恶，但我感觉有意味的，乃是于此搜得宗子逸诗多首，又有好些资料，如《和赠长沙公》序中有云：“博闻洽记，余慕吾家茂先，因于读《礼》之暇，作《博物志补》十卷，以续其韵。”可知宗子尚有此种著述。又《归鸟》原本四章相连，和作则分为四首，序云：“会稽土产，日铸茶，破塘笋，谢橘，杨梅，他方罕比，东坡有言，无事而受此诸事之备，惭愧惭愧，因和渊明《归鸟》韵，作诗颂之。”鸽峰草堂周氏抄本《陶庵诗集》中，有咏方物五律三十七首，得此四章，可以增补。诗集中有四言《述史》十四章，与此本不同，又五言《和贫士》七章，《和述酒》《和有会而作》《和挽歌辞》三章，此本均无之，盖因东坡已和，故不重复收入欤。

以上各本中惟章石卿陶心云仿苏本有故实可考，陶筠厂抄本与张宗子评本各有意见，又希见可贵，而恰巧都是会稽山阴人，亦颇妙也。鄙人固是真心爱好陶公诗文，此处所言乃似出于乡曲之见，诚哉我犹未免为乡人也，但此亦正是不妨，因其为事实耳。

□1944 年 1 月刊《古今》39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口甘口》

两种祭规

案头放着两部书，草草一看似乎是很无聊的东西，但是我却觉得很有意思，翻阅了几回之后，决心来写一篇小文，作为介绍。

这是两种祭规。其一，萧山汪氏的《大宗祠祭规》，嘉庆七年刊，为汪辉祖所订定，有序文。其二，山阴平氏的《灂祭值年祭簿》，约在光绪十六年，为平步青所订定，手写稿本。祭规本来只是宗祠或房派的祭祀规则，想来多是呆板单调的，没有什么可看，但是祭祀是民俗之一重要部分，这祭规正也是其中的一种重要资料，况且汪平二氏都是绍兴大家，又经过两位名人的手定，其文献上的价值自然更是确实无疑的了。

在宗祠或房派之祭祀，除夕与元旦都是同样重要，平常轮值交代大抵在冬至之后，新值年房份便从年末的祭祀办理起头。现在便从汪氏《大宗祠祭规》中值祭条款，将除夕元旦两项抄录于下：

除夕：三日前值祭家至祠，洒扫拂尘，堂室神道等处整理牌位，务使洁净。除夕下午设案菜一桌，内用特杀鸡，共十二味，酒饭杯箸十二副，中座及左右两边并祔祀所各用宵烛一对，大纸一块，足锭三百，爆竹十枚。值祭五房俱至礼拜。

元旦：中座用半通烛一对，线香一股，两边及祔祀所各用门宵一对，线香三枝，以后早晚俱用二枝，至初五日晚止。

平氏祭簿所记如下：

除夕悬像。像前用高香，大门宵烛一对，二两，横溪纸一块，即顶长，大库锭四百个，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酒四杯，胡太君茹素，供开水一杯，饭五碗，筷五副，莲子高茶五盅，供果五寸盘五盘，年糕，粽子，水果三色，攒盒一个，供至新正初五日收。各房子孙随到随拜，值年房备茶，不散胙。

元旦像前供汤圆五碗，早晚点香烛，至初五日止。黎明至宗祠，备二两烛一对同点。

这里或者要稍加说明，上文所云宵烛门宵即是二两烛，半通即八两烛，一斤者名斤通，意谓可点通夜，故宵烛或者亦指时间，谓可点至定更也。黄纸相对互切，抖之则拖垂如索，与银锭同焚，俗云以作钱串，名曰烧纸，大块狭长者名横溪，本是造纸地名，大纸亦即指此。煮莲子加糖，名莲子茶，以供宾客，若供祖则用高茶，剪圆纸板上糊红纸，以浆糊粘生莲子成圈，数枚叠置，以次渐小，成圆锥形，装茶盅上，高可三寸，故名，或以生莲子散置盅内，则名懒惰茶，不常用，嫌不敬也。

家祭重二至，祠祭则重二分。《大宗祠祭规》中关于二分祭日所记甚详，今节录之：

大宗祠于二分之祭最重。祭先五日，写帖数张，粘示通衢数处，知会统族。祭日黎明鸣锣邀集，至再至三，迟者听其自误，与祭不到，不准饮酒。

大厅中堂祭品祭器式：汤猪全体，蒸羊二腔，熟鹅二只，肥鸡二只，鲜鱼二尾，馒首二盘，秋分加月饼一盘，减馒首一盘，五事全副，供花一对，桌围三张，面架一座，手巾一条，铜盆三面，水果五碗。高尺三，半通一对，黄香一两，方桌二张，蒲墩拜垫。

神座前祭筵式：水果五碗，高一尺，案菜两桌，陈酒两壶，宵烛一

对，大纸两块，足锭一千，祭文一通，三献每三，酒羹饭，汤饭杯箸廿四副。

饮福式：每桌十味，五人合席，各人给馒首二枚，猪羊等肉俱照分量，以熟为度。酒用真陈，司酒者当堂开坛，每桌先给酒签两支，酒有定提，不得增减，违者公同议罚。猪肉熟一斤，白切。羊肉熟十两，拌杂。藕，肠肝，装鹅熟八两，鲜鱼生一斤，羊杂，装鸡六两，芽豆，血汤。

案祭桌用香炉一，烛台二，插供花之瓶二，通称五事，如天花瓶则称三事，多以锡为之，间有用古铜者。水果高尺三或一尺者曰高果，与高茶相似，大抵用竹签穿金橘荸荠等，数本直立，插黄土墩上，置特制锡碗中，但以饰观瞻，不中吃也。饮酒每席五人，桌一面悬桌帏，对面一座，由房份长老分占之，上下四座则后辈杂坐矣。

春秋分日祠祭照例有祭文，汪氏祭规所记秋祭祝文较为简明，录之以为一例。文曰：

维年月日，主祭裔孙某率各支大小等，谨以刚鬣柔毛，清酌时馔之仪，致祭于始祖考云云，以暨阖堂先灵之神座前曰，祭以时举，孝思是将。懿惟祖德，源远流长，十世百世，勿愆勿忘。幽歌其获，早稼登场，我稻可荐，我酒可觞。敬修祀事，济济跄跄，我祖顾之，庶几乐康，式饮式食，降福穰穰。尚飨。

平氏祭簿不曾记有冬夏二至祭祀成式，惟诞讳祭祀时却用祝文，今录其一：

维年月日，孝宗孙某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几世祖考某某府君之神位前曰，呜呼，岁序流易，诞日复临，追远感时，不胜永慕。薄具牲醴，用申奠献，谨奉几世祖妣某太君配享。尚飨。

簿中所记诞讳日期共有十六，祭文则只此一篇，惟改换人名及诞讳字样而已。诞讳祭祀俗称做忌日，用祝文者似不多见，而用法简便，亦复特别，岁序流易等四句朴实可喜，文词简易而意思充足，非凡手所能作，或出于平景孙之手乎。

祭簿中记录最详的是清明扫墓成规，原有娄公、花径、璜山三处，大同小异，今录娄公一篇，取其最完备也。

座船两只，（小注云，向例岁内冬至宗祠内汇齐，写定船票，清明前后为期，每只约船钱银三钱几分不等，临时给船米七升五合，酒十五钓、鱼二尾、鸡蛋二个，折午饭九四钱百文，点心等俱无。后改一切俱包，回城上岸时每只给掸舱酒一升壶。）今改大三掉船一只，酒饭船一只，厨子船一只，吹手船一只，吹手四名。

祀后土神祭品，肉一方，刀盐一盘，腐一盘，太锭一副，烧纸一块，上香，门宵烛一对，酒一壶，祝文。

墓前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三牲一副。鹅、鱼、肉。水果三色，百子小首一盘，坟饼一盘，汤饭杯筷均六副，上香，门宵烛一对，横溪纸一块，大库锭六百足，祝文。酒一壶，献杯三只。

在船子孙每房二人。值年房备茶，半路各给双料荤首两个，白糖双酥烧饼两个，粉汤一碗，近改用面。散胙六桌，八荤两素，自同治三年起减为两桌。每桌酒几壶不等，酱油醋各二碟。小桌二桌，三炉十碗，吹手水手半路各给小首二个，烧饼两个，粉汤一碗，近年止改用面一中

碗。管坟人给九四钱二百文，酒一升壶。

案酒十五钓即是十五提，普通只写作吊。九四钱以九十四文作一百，当时无足陌钱，至多亦止九八而已。三棹今通称三道船，亦称三明瓦，谓有蛎壳窗三重也。百子小首者小馒首之略，坟饼当是上坟烧饼，双酥烧饼每个二文，此则或是一文两个也。三炉碗系家常用菜碗，较大者名二炉碗，或称斗魁，更大则是海碗矣。

扫墓照例有祝文，祭簿亦载有成式，三处均是同文，今录其一于下。祝后土祝文云：

维年月日，信士平某敢昭告于某地后土尊神之位前日，惟神正直聪明，职司此土。今某等躬修岁事于几世祖考某某府君几世祖妣某氏太君之墓，惟时保佑，实赖神麻，敢以牲醴，用申虔告。尚飨。

墓前祝文云：

维年月日，孝宗孙某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几世祖考某某府君几世祖妣某氏太君之墓前曰，呜呼，岁序流易，节届清明，瞻拜封茔，不胜永慕。薄具牲醴，用申奠献。尚飨。

这两篇文章也都简要得体，祭墓祝文更与忌日所用者相同，尤有意思。大抵祭祀原是仪式，必须庄重，因此仪文言动也有一定规律，乃得见其严肃，这祝文程式的一致，我想即其一端。有些人家用扫墓祝文不是一样，多就各地发挥做去，文词绚烂，声调响朗，容易失却庄严之致，反不合式。因平氏祝文而想到，觉得简单庄重实为祭祀之要点，繁文缛节，仆仆亟拜，均非所宜也。

上述祭规中未记拜法，盖因人人皆知也，惟各处风俗亦不尽同，今就所知补记于此。平常祭祖先，家长上香后以次四跪四拜，拜毕焚纸钱，再各一跪四拜，家长奠酒，一揖，灭烛，再一揖，撤香礼毕。祠墓祭行三献，人多不能参与陪祭者，于献后分排行礼，四跪四拜毕即继以一跪四拜，中间不再间断。此种拜法不知始于何时，惟通行颇广，所谓拜者乃是叩首兼揖，其一跪三叩首则俗称为官拜，惟吊丧时用之。妇女只用肃拜，合两袖当胸，上下数四，跪而伏拜，起立又拜而退，俗语称妇女拜曰时越切，亦须以乡音切之，国语无此音，疑其本字亦只是肃耳。范啸风著《越谚》三卷，为破天荒之书，惟关于祭祀名物亦多缺略，上文所注多记忆所及，述其大概，未能详备。吾家旧有祭簿，悉留越中族人处，未得查考，七世致公祭祭规为曾叔祖一斋公所订，具有条理，大旨与平氏相似，惟记得簿中记有忌日酒菜单，大可备考，今不得见，甚可惜也。（民国癸未十月十五日）

□1944 年 2 月刊《中和月刊》5 卷 2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口甘口》

妄 妄 录

偶买得《妄妄录》十二册，卷首有王季烈题记一叶，文曰：“ 妄妄录十二卷，朱海撰，海字蕉圃，吴县人。此书作于乾隆五十八年甲寅，自序云，头颅渐老，多病多愁，行将与鬼为邻，则非少年之作可知。至道光十年庚寅付刊，观凡例语气，其时作者尚生存，是已寿逾耄耋矣。笔墨修洁，可资劝惩，记吾吴琐闻，间亦有关掌故，其姓名不载方志及诸生录，殆毕生潦倒，落魄天涯，以终其身者欤。卷首有道光壬午闽抚叶世倬序，自称乡同学弟，叶字子云，上元人，乾隆间举人，道光间抚闽，服官甚久，所在以兴教化美风俗为己任，作者与之同学相友善，则亦非庸庸之士矣。然生前既沦落不遇，死后遂姓名翳如，吁，可悲矣。此书刻本罕见，今春祝嘏行在后，游京师海王村肆见之，索值甚昂，余以乡先生之著作，不忍释手，费十锾得之，携以归里门，询之纂修县志之诸君子，无有知其人与书者，因记之于此。宣统辛亥后二十年，春王正月既望所得，阅三月，蟫楼记。 ”

案朱氏自序中有云，效坡仙谪黄州时故事，日强人说鬼，绝不作治生计，半年来妄言妄听，并追忆旧闻，随笔记十二卷，名曰《妄妄录》，神仙诡幻之事不载，惟鬼则记之，盖士不得志，笔下即有神，亦当化为鬼耳。故王君重其为吴郡文献，在不佞则取其专门说鬼，颇足为欲知鬼之情形者之参考，此类资料蒐集不易，乃为可贵也。如卷二《河水鬼》一则，记溺鬼化为■浮水面，诱人拾取，指入坛口遽被拖住，是时水发腥气。又卷三《溺鬼喜豆》一则，言在武林曾见有夫溺于河，妻以炒豆为祭品，散之溺所，佥言溺鬼喜食炒蚕豆，亦奇。此类记录尚不少，皆可甄采。惟书中嬉笑怒骂亦多有之，如卷三《鬼公子》一则，似系故意造作以骂人者，所云汪近涛即是江声，汪字鲸涛，文中明言其苦攻《尚书》，又书小札或购物开帐必用篆字，所记与钱梅溪牴牾或系事实，至于受鬼公子种种侮弄，则当是著者所编造，盖即从文字上亦可以看出痕迹。至卷七之《报怨鬼》，丑诋汪容甫但化名为汪蓉圃，乃尤为显明矣。（癸未九月二十日）

□1944 年 5 月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萝庵游赏小志

《李越缦杂著》抄本一册，从杭州书店得来，内为《萝庵游赏小志》、《霞川花隐词抄》、《乐府外集》，共三种。书面题龙集光绪二十有四年九月霞庐主人志庾甫假傅氏抄本录竟题面，朱文长印曰太原公子，内又有印曰志庾珍藏。卷首附粘任秋田手札，文曰：

> 志庾仁仲如握，月前由润田交到《越缦堂杂著》一册，见系手抄，足见恣意文囿，孟晋无量。记此三种曾于都门奉读一过，假抄未果，今复展诵，弥觉录味不置。间有校讹处订正处，笔之简首，请阅后一印证之，即撕去可也。手此鸣谢，藉颂著祺，不尽缕缕。愚小兄膝顿首。

审其语气，当是师弟关系。案任君《倚舵吟遗稿》章琢其跋语中说及王君子馀，为昔日门下士，然则志庾即王子馀世裕无疑，王君关心越中文献，曾于《绍兴公报》社印行《文献辑存》书第一二辑及《越中三不朽图赞》，此稿云从傅氏传录，或是节子原抄本欤。

《霞川花隐词》刻入《二家词抄》，《乐府》有萧山钟氏刻本，《游赏小志》仅由番禺沈氏刊入《晨风楼丛书》甲集，铅字光纸，脱误满目，今得此本，据以校正，佳处甚多，共改正百三十馀字，添小注九处，又本文一则，差可披诵矣。任秋田批注八条，最重要者为第四，文云：

> 破产一节是先生恨事，曩在都谈次每裂眦言之，然余以为事关前定，即不结社不交一人，未必不破家也。烟云过眼，付之太空最妙。此注似亦可删。秋田注。

案此盖指壬子二月条下原注，龂龂诉比匪破家事，似当时读《小志》者多注意及此。《越缦堂日记补》壬集，同治壬戌十月二十三日项下录有复潘伯寅书，起首云：

> 顷奉手谕，并蒙掷还《萝庵小志》，奖饰逾恒，遂使腐札回荣，枯词溢润，语林未出，见赏庾郎，本论初成，折衷叔夜，方之鄙作，深愧昔流，虽知过情，能无感发。承示志中宜删一节，具承风义，勉我古贤，刻状虺蛇，诚污简牍。当如来旨，即事芟除。

但以后接叙二周前事，凡费四百馀言，岂独裂眦，且复切齿，其无意于删削注语，盖已显然可知矣。

□1944 年 5 月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广阳杂记

十多年前听亡友饼斋说刘继庄，极致倾倒之意，云昔曾自号掇献，以志景仰，因求得其所著《广阳杂记》读之，果极有意思。

书凡五卷，“功顺堂丛书”本，卷首有王昆绳撰墓表甚佳，胜于全谢山所作传，盖了解较深也。墓表称继庄颖悟绝人，博览，负大志，不仕，不肯为词章之学，又云，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其气魄颇与顾亭林相似，但据我看来，思想明通，气象阔大处还非顾君所能企及。还有一点特别的，继庄以北人而终老吴中，与亭林正相反。古诗云，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二君所为均有志士苦心存于其中，至今令后人思之亦不禁感奋。传中亦云，“又其栖栖于吴头楚尾间，茫不为枌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所以也不能说是不了解，但既称继庄之才极矣，又谓其恢张过于彭躬庵，而对于继庄之许可金圣叹一事乃大叹诧，岂非还是与顾亭林骂李卓吾一样，对于恢张之才仍是十分隔膜也。刘继庄的感愤是很明瞭的，如卷一二中记洪承畴为其母及师所不齿之事，至再至三，又记金陵遗老逃而之禅别成心疾的仙人李拗机，卷二三中屡记赐姓遗事，及倒戈而终施行迁海策的黄澄施琅辈，及与杨于两谈赐姓成就人材，杨谓闽向以文胜，今多武勇之士，举林兴珠为例，继庄乃慨然曰，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遂投箸而起。此言甚可思，但此并不是继庄的唯一的长处，我觉得可佩服的此外还是其气度之大，见识之深，至少一样的值得称扬，这里文抄公的工作也不是可以太看轻的。首先我们看他自述为学的方法，卷二云：

“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见，奋笔书曰，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迄今十年，乃不克践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难也。”又卷四云：

“陈青来执贽于予，问为学之方，予言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卷二谈岣嶁禹碑文字不可考释，结语云：

“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则欺人与为人所欺耳，六经诸史暨三藏十二部诸家之书皆然，不止一岣嶁碑已也。”卷三云：

“图麟述其前日见里巷邻家有丧，往来杂遝，而已独立门前，萧然无事，援笔书云，世俗之礼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论不畏，然后其势孤，势孤然后能中立。予闻其语，亟令图老书于便面，以赠伯筠。”这几节的话都说得极好，但只是理论而已，到底他自己如何运用，我们可以很简要的抄出几则来。卷二有两则云：

>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令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
> 余尝与韩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图老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宜严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复数千

言，图麟拊掌掀髯叹未曾有。彼时只及戏文小说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为《易》《礼》之原，则六经之作果非徒尔已也。

卷四云：

旧春上元在衡山县曾卧听采茶歌，赏其音调，而于辞句懵如也。今又□衡山，于其土音虽不尽解，然十可三四领其意义，因之而叹古今相去不甚远，村妇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国之章法，顾左右无与言者，浩叹而止。

大抵明季自李卓吾发难以来，思想渐见解放，大家肯根据物理人情加以考索，在文学方面公安袁氏兄弟说过类似的话，至金圣叹而大放厥词，继庄所说本来也沿着这一条道路，却因为是学者或经世家的立场，所以更为精深，即在现今也是很有意义的，盖恐同意的人还不能很多也。此外有谈琐事者，如卷二云：

涵斋言，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继庄曰，宇宙之中万美毕具，人灵渺小，不能发其蕴，如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为火药，方济伯偶试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见者，非算数譬喻所能尽，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后，必有大圣人者出而发其覆也。

记白糖原始亦是常事，我仿佛曾经见过不止一次，说的与看的人都是这样的过去完事，这里却引起那一段感想，而其见识和态度又是那么的远大厚重，显示出对于知识之期待与信赖，此即在并世亦是不易得的事。又卷一云：

大兄云，满洲掳去双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予谓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会也。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以此知汉高之思丰沛，太公之乐新丰，乃人情之至，非诬也。

我以前查考朱舜水遗事，曾见日本原公道著《先哲丛谈》卷三中有一则云：“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当时读之怆然有感，今见此文，可用作笺疏，而称其有至理，刘君之情乃尤可感矣。《杂记》原本或是随时札记，亦有从日记录出者，如记叙各地风物小文，似均是其中之一部分，寥寥数十字或百许字，文情俱胜，在古文游记中亦绝不多见。卷四中诙《水经注》，有云：

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读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馀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

这里赞《水经注》铺写景物话，正好借了来称赞他，虽然这也只是如文中所说的一点馀力而已。如卷二云：

“长沙小西门外，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远近舟楫上者下者，饱张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无不入画，天下绝佳处也。”卷三云：

“七里泷山水幽折，非寻常蹊径，称严先生之人，但所谓钓台者远在山

半，去江约二里馀，非数千丈之竿不能钓也。二台东西峙，覆以茅亭，其西台即宋谢皋羽痛哭之处也，下有严先生祠，今为营兵牧马地矣，悲哉。”卷四云：

“蕲州道士洑在江之西南，山极奇峭，有兰若临江，树木丛茂，大石数十丈踞江边。舟过其下，仰望之，复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画里，佳绝。”又云：

“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望汉阳诸山，苍翠欲滴。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

“汉水之西南，距大别之麓，皆湖渚，茭芦菱芡，弥漫苍莽。江口筑堤，走龟山之首，约里许，自西达东，石甃平整，循堤而东，南望湖渚，有江南风景。”

“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一人而荡两桨，左右相交，力均势等，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信哉。”

末了我辈再来引一段做结束，卷三云：

> 偶与紫庭论诗，诵魏武观沧海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洪波涌起。紫庭曰，只平平写景，而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犹将见之，汉魏诗皆然也，唐以后人极力作大声壮语以自铺张，不能及其万一也。余深叹服其语，以为发前人未发。紫庭慨然诵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难，听者正自不易也。

这一节后我们刚好拿来作《杂记》的总评，紫庭所说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正是刘继庄所自有的，只可惜在《杂记》中零星的透露出来，没有整个的著作留下，可以使我们更多知道一点。王昆绳在墓表中说，盖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已任，使得志行乎时，建立当不在三代下，这意见我是极为赞同的，虽然在满清时根本便不会得志，大概他的用心只在于养成后起的人而已吧。这里就是那十九首的悲哀，乾隆以来大家已是死心塌地的颂圣，若全谢山能知继庄行踪之异，也算是不易得的了。清季风气一转，俞理初蒋子潇龚定庵戴子高辈出，继庄的学问始再见重于世，友人间称扬此书者亦不少。饼斋治文字音韵之学，对继庄这一方面的绝诣固极心折，但其所最为倾倒者当亦在于思想的明通气象阔大这一点上，则与鄙人盖相同也。我得《广阳杂记》，阅读数过，蓄意抄录介绍，数年来终不果，至今始能草草写成此文，距饼斋谢世则已五阅春秋矣。（三十三年除夕）

□1944 年作，1945 年刊“太平”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立春以前》

寄龛四志

数年前写过一篇小文谈《右台仙馆笔记》，引《艺风堂文续集》卷二中《俞曲园先生行状》云：

> 古来小说，《燕丹子》传奇体也，《西京杂记》小说体也，至《太平广记》，以博采为宗旨，合两体为一帙，后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笔记》，以晋人之清谈，写宋人之名理，劝善惩恶，使人观感于不自知，前之者《阅微草堂五种》，后之者《寄龛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华者所可比也。

后边加以案语云，

> 缪君不愧为目录学专家，又是《书目答问》的著者，故所说甚得要领，以纪晓岚孙彦清二家笔记与曲园相比，亦有识见，但其实铢两不能悉称，盖纪孙二君皆不免用心太过，即是希望有功于世道，坐此落入恶趣，成为宣传之书，唯以文笔尚简洁，聊可一读，差不至令人哕弃耳。

《寄龛全集》见于《丛书目录拾遗》卷十，甲乙丙丁四志各四卷即在其中，光绪年间所刻，市上多有，不为世人所重，艺风老人独注意及之，觉得可佩服，鄙人则以乡曲之见，收集山会两邑人著作，于无意中得来者也。

据薛炳所撰家传，孙德祖字彦清，会稽县人，同治丁卯举人，光绪庚辰任长兴县学教谕，戊申卒于家，年六十九，盖生于道光二十年庚子，即西历千八百四十年。洪杨乱后居于小皋部，薛传云，与皋中诸子联诗社相唱和，一时文宴之盛，为泊鸥言社所未有，世所称皋社是也。皋社设在秦氏娱园，社中同人除主人秦树铦秋伊外，有孙垓子久，李慈铭爱伯，王诒寿眉叔，马赓良幼眉，陶方琦子珍，曹寿铭文孺，沈宝森晓湖，以及孙德祖彦清，诸人诗文集恰巧都多少收罗到了，不过这里不想研究皋社诗人，所以不必细表，所要说的只是孙君的著作而已。

《寄龛全集》的内容，据寒斋所有者是《寄龛文存》四卷，《诗质》十二卷，《词问》六卷，甲乙丙丁志十六卷，《长兴县学文牍》二卷，《学斋庸训》一卷，《若溪课艺》一卷。诗是不大懂得，文则并不想谈，剩下来的所以只有那《寄龛四志》了。

昔者陆放翁作《老学庵笔记》，至今甚见珍重，后来越人却不善著书，未曾留下什么好的笔记，寒斋所有清朝著作十五种中可取才及二三，平步青的《霞外捃屑》乃是容斋之流，其《蚬斗蕞乐府本事》一卷六十则，可以算是传奇体之佳者，小说体则只得以此四志充数矣。

孙君文笔颇佳，系清道桥许伸卿刻板，未必精好，而字体多似古，亦不尽从《说文》，却亦复可喜，其缺点在于好言报应轮回，记落雷或桥坏伤人，必归诸冥罚或前生事以至劫数，嫌其有道士气，此为读书人之大病，纪晓岚之短处亦正相同。但是四志有一特色，即附带说及的民俗资料颇不少，普通文人著作一心在于载道翼教，对于社会间琐屑事情都觉得不值得记录，孙君却时时谈及绍兴民间的风俗名物，虽多极简略，亦是难得而可贵也。今抄出数则，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系鬼事的，二是关于俗语的。《丙志》卷二云：

> 俗传妇女以不良死者，其鬼所至常有脂粉气。

《甲志》卷四云：

> 《续新齐谐》云，溺鬼必带羊臊气，信然；然以为带羊臊者不能祟人，必五年后无此气乃能为祟，则非也。余故居半塘桥，宅后园有大池，

与邻茹氏共之，茹氏凡溺三人，一婢之死先余生数年，其后一米铺学徒，一佣媪，则余皆目击，惟时皆闻水有羊膻，不出三日果溺人，平时未学有也。

《丁志》卷一云：

余邻村大皋部有王氏子二人死干溺，是同堂兄弟，兄已浴矣，弟强之再浴，拍浮间兄见中流有物，如豕涉波，泅而趁之，为所持，不胜，呼弟为助，遂并没。其时别有幼弟与偕，惧而逸得免，述所睹如此。

《甲志》卷一云：

凤姑者以鬻鸦片烟为业，居昌安门外之芝凤桥，与余故居乐安堂隔一水，迤南不及半里，一夕火作，一家七人同尽，余年已十馀，望见之。业此者越人谓之开烟盘，大率置联榻，多设烟具，以便游手无籍之徒，灯火青荧，往往达旦。焚后比邻连夕闻叩关乞油声，或开户洒之，次旦审视地上亦绝无油渍。

相传死于火者鬼常苦灼，得油则解。

又云：

越人信鬼，病则以为祟于鬼，宜送客。送客以人，定一人捧米筛盛酒食，一人捻纸燃火导之大门外，焚楮钱已，送者即其处饮焉，谓之摸螺蛳，则不解其所由来，又何所取义也。

皋坪村人孙忠尝佣于小皋部秦氏，为之送客，与其侣摸螺蛳，各尽一杯酒，再斟即不复得，以食饭，已而视壶中固未罄也，复饮则化为浆，稠粘而酸，不可沾唇矣。舒丈芙娇亦言，少时读书山寺，司■老人能视鬼，性好酒，每酤得酒，辄有鬼来窃饮，与之争不胜，为所嗅，酒故在而味淡于水。

案，送客又通称送夜头，摸螺蛳之名或起于诙谐，乡间有爬螺蛳船，以竹器沿河沿兜之，可抄得螺属甚多，送客者两手端米筛，状颇相似。《乙志》卷四云：

越中病者将死，则必市佛经焚之，以黄纸包其灰，置逝者掌中，谓之三十六包，以为入冥打点官司之用。或仑卒未及购致，有忍死以待者，设不及待而死，指伸不得握，得而焚与之乃握，所闻如是者比比，俗益神其事。

又卷二云：

归煞见《颜氏家训》，越人谓之转煞，读去声，尤笃信之。余家嘉德质库友张某殁后，有所司帐目未得明白，于其转煞夕姑置纸笔坐隅，居然启椟磨墨濡笔，作数行字，然蒙绕如蛇蚓，卒无一字可辨识。

段柯古《支诺皋》云，鬼书不久即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虽其迹不同，鬼之能书则较然可见，不知鬼无形质，何以能运用器物如此。

《丁志》卷一云：

鲁哀公祖载其父。孔子曰，设五谷囊乎。公曰，五谷囊者起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恐魂之饥，故作五谷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为。见《艺文类聚》引《丧服要记》。

此殆《颜氏家训》所谓粮罂，今越俗送葬犹用之，取陶器有盖者，子妇率孙曾男女凡有服者各于祖筵夹品物实其中，严盖讫，各以绵线绕其外，或积之数十百层，既窒而纳诸圹。

案，此种陶器出自特制，约可容一升，俗名盎打头瓶，不知字当如何写，范寅《越谚》中亦未收。《丙志》卷三记慈谿事，云邻人有作夜牌头者，注云，此称越亦有之，盖生人之役于冥者。宁波绍兴语多相通，夜牌头正是其一，唯《越谚》亦失载。又卷二云：

越俗有所谓关肚仙者，能摄逝者魂灵入腹中，与生人对语，小说家多有记其事者，或冤魂所附，或灵鬼凭之以求食，但与今异其名尔。余曾于亲串见女巫为之，语含胡不甚可辨。间从问者口中消息钩距之，盖鼓气伪为者居多。慈谿谓之讲肚仙。

以上各节涉及鬼事，虽语焉不详，但向来少见纪录，而学老师著书志本在资劝惩，文字又务雅正，却记述及此，虽是零星资料，亦足珍矣。其次关于俗语者亦复不少，今略抄数则，《甲志》卷四云：

道光中萧山有王阿二者以妒奸杀女尼十一人，谳定磔之省城。至今萧山人赌牌九者，得丁八一，辄目以“王阿二起解”。

盖此戏数牌之点数，以多寡为胜负，又分文武，三点为丁，八点有二六三五两牌，皆武也，以丁侣八，除十成数只馀一点，莫少于是。他牌虽同为一点，有文牌者，如重四之八为人牌，重二为长二，重幺为地牌，重三为长三，幺三为和牌，幺五为短六，幺六为短七，皆属文，可侣他牌成一点，皆足以胜之，极言其无幸免也。案，骨牌名称除汁点者外，民间尚有俗名，如重二为板凳，幺五为拳头，或曰铜锤，幺六为划楫、重五为梅花，皆取象形，唯五六称为胡子，则义不可晓。幺二称钉子，二四转讹或称臭女婿，盖因其为武牌，唯与幺二配成至尊，若侣他牌则遇同点数之文牌无不败者，世轻之为臭，平常亦称为二四。《乙志》卷二云：

《宋书·乐志》载晋咸康中散骑侍郎顾臻表云，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足以蹈天，头以行地，云云。今越中亦有此戏，谓之竖蜻蜓。龙舟竞渡，或于小艇子上为之，艇狭而长，画鳞为龙形，两舷各施画楫十馀，激水如飞，一人倒植鹢首，屹然如建铁柱，谓之竖老龙头，可以经数时之久。

又卷四云：

货郎担越中谓之袋络担，是货杂碎布帛及丝线之属，其初盖以络索担囊囊炫且鬻，故云。小皋部邻沈媪有二子，曰袋络阿八袋络阿九，并以其业名。

《丙志》卷四云：

越俗患顽童之好狎畜狗若狸奴或为所爪啮也，曰骑猫狗者娶妇日必雨；患其好张盖而敝之也，曰非暑若雨及屋下张盖者躯不复长。皆投其所忌，缪为之说以惧之，然寻常鞭挞所不能止者，无勿帖然不敢犯。

上边所记未见于他书，均颇有意思，拣择出来，也是民俗研究的好材料。

中国古来是那么一派学风，文人学者力守正宗，唯于不经意中稍或出轨，有所记述，及今视之甚可珍异，前人之绩业只止于此，我们应知欣感，岂得再有所责求耶。自己反省虽途径能知，而缺少努力，且离乡村已久，留滞都会中，见闻日隘，不能有所成就，偶读茹三樵《越言释》，范啸风《越谚》，平景孙《玉雨淙释谚》诸书，但有感叹，今抄《四志》亦复如是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东郭生记。

□1945 年刊“太平”初版本，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焦里堂的笔记

清朝后半的学者中间，我最佩服俞理初与郝兰皋，思想通达，又颇有风趣，就是在现代也很难得。但是在此二人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这便是焦里堂。《雕菰楼集》以及《焦氏遗书》还是去年才买来的，《易馀■录》二十卷却早已见到了，最初是木犀轩刻板的单印本，随后在“木犀轩丛书”全部中，其中还有焦君的《论语通释》一卷。《■录》本是随笔，自经史政教诗文历律医卜以至动植无不说及，其中我所最喜欢的是卷十二的一节，曾经引用过好几次，现在不禁又要重抄一遍，其文曰：

>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焦君这里自述其家学，本来出于《礼记》，而发挥得特为深切著明，称为圣人不易，确实不虚。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论权第五条，反对释教化的儒生绝欲存理之主张，以为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后又申明之曰：

“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戴氏此项意见可以说是与古圣人多相合，清末革命思想发生的时候，此书与《原善》均有翻印，与《明夷待访录》同为知识阶级所尊重。焦里堂著《论语通释》及集中《性善解》等十数篇，很受戴氏的影响，上文所引的话也即是一例。本是很简单的道理，而说出来不容易，能了解也不容易，我之所以屡次引用，盖有感于此，不仅为的我田引水已也。

但是这里我想抄录介绍的却并非这些关于义理的话，乃是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部分，这是于后人最有益的东西。如卷八有一则云：

> 《汉书》霍光传，光废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如淳曰，以珠饰襦也。晋的曰，贯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按此太后即昭帝上官皇后也，外戚传言六岁入宫立为皇后，昭帝崩时后年十四五，当昌邑王废时去昭帝崩未远，然则太后仅年十四五耳，故衣珠襦。读诏至中，太后遽曰止，全是描摩童稚光景，说者以为班氏效左氏“魏终和戎”篇后羿何如之笔法，尚影响之见也。晋灵公立于文公六年，穆嬴常抱之，至宣公二年亦仅十四五耳，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熊蹯不熟，杀宰夫置诸畚，皆童稚所为。故读史必旁览博证，其事乃见。仅就一处观之，则珠襦之太后以为老妇人，嗾獒之灵公且以为长君，以老妇而著珠襦，以长君而弃人用犬，遂出情理之外矣。

此则所说，可谓读书的良法，做学问的人若能如此用心，一隅三反，自然读书得间，能够切实的了解。这一方面是求真实，在别方面即是疾虚妄，《■录》卷二十中实例很多，都很有意思，今依次序抄录数则于后：

> 《鹤林玉露》言，陆象山在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住与棋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着者俱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故手矣。此妄说也。天下事一技之微非习之不能精，未有一蹴便臻其极者，至云河图数尤妄，河图与棋局绝不相涉，且河图当时传自陈希夷者无甚深奥，以此悟之于棋，遂

无敌天下，尤妄说也。此等不经之谈，最足误人，所关非细故也。

《西阳杂俎》记一行事，言幼时家贫，邻母济之。后邻母儿有罪，求救于一行，一行徙大瓮于空室，授奴以布囊，属以从午至昏有物入来其数七，可尽掩之。奴如言往，有豕至，悉获置瓮中。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何祥也？一行请大赦天下，从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按一行精于天算，所撰《大衍术》最精，然非迂怪之士也，当时不学之徒不知天算之术，妄为此言耳。近时婺源江慎修通西术，撰《翼梅》等书，亦一行之俦也。有造作《新齐谐》者称其以筒寄音于人，以口向筒言，远寄其处，受者以耳承之，尚闻其声。又称其一日自沉于水，或救之起，日，吾以代吾子也，是日其子果溺死。此傅会诬蔑，真令人发指。嘉庆庚申六月阮抚部在浙拒洋盗于松门，有神风神火事（余别有记记之，在《雕菰集》），遂有传李尚之借风者。尚之精天算，为一行之学者也，余时在浙署，与尚之同处诚本堂，尚之实未从至松门。大抵街谈巷议，本属无稽，而不学者道听涂说，因成怪妄耳。

《宋史》，庞安常治已绝妇人，用针针其腹，腹中子下而妇苏，子下，子手背有针迹。旧《扬州府志》乃以此事属诸仪征医士殷榘，而牵合更过其实，前年余修《府志》，乃芟去而明辨之。又有一事与此相类，相传高邮老医袁体庵家有一仆病咳喘，袁为诊视，日不起矣，宜急归。其仆丹徒人，归而求治于何澹庵，何令每日食梨，竟愈。明年复到袁所，袁大惊异，云云。按此事见于《北梦琐言》，亦如庞安常事傅会于殷也。（案：原本录有《北梦琐言》原文，今略。）所传袁何之事，正是从此傅会。余每听人传说官吏断狱之事，或妖鬼，大抵皆从古事中转贩而出，久之忘其所从来。偶举此一端，以告世之轻信传闻者。

张世南《游宦纪闻》记僧张锄柄事云，张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妇随众往谒，张命至前，痛嘬其颈。妇号呼，观者哄堂大哂。妇语其夫，夫怒奋臂勇往诟骂。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宜令再来。骂者不听，居无何，妇以他恚投缳以死。此即世所传僧济颠事，大约街谈巷议，转相贩易，不可究诘。乾隆己酉庚戌间，郡城西方寺有游僧名兰谷者，出外数十年归，共传其异，举国若狂，余亦往视之，但语言不伦，无他异，未几即死。至今传其事者尚籍籍人口，大抵张冠李戴，要之济颠嘬颈之事，贩自张锄柄，而张锄柄之嘬颈，不知又贩自何人，俗人耳食，多张世南“往往传诸口笔”之书，遂成故事矣。宋牧仲《筠廊偶笔》，记扬州水月庵杉木上，伊然白衣大士像，鹦鹉竹树善才皆具，费滋衡亲验此木，但节间虫蠹影响略似人形，作文辨其讹。

这几则的性质都很相近，对于世俗妄语轻信的恶习痛下针泛，却又说的很好，比普通做订讹正误工作的文章更有兴趣。我们只翻看周栎园的同书和禹门福申的续同书，便可看见许多相同的事，有的可以说是偶合，有的出于转贩，或甲有此事，而张冠李戴，转展属于乙丙，或本无其事，而道听涂说，流传渐广，不学者乃信以为真。最近的例如十年前上海报上说叶某受处决，作绝命诗云：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案此诗见于《玉剑尊闻》，云是孙黄蕡作，又见于《五代史补》，云是江为作，而日本古诗集《怀风藻》中亦载之，云是大津皇子作，《怀风藻》编成在中国唐天宝之初，盖距今将千二百年矣。此种辨证很足以养成读书力，遇见一部书一篇文或一件事，渐能辨

别其虚实是非，决定取舍，都有好处，如古人所云，开卷有益，即是指此，非谓一般的滥读妄信也。

焦里堂的这些笔记可以说是绣出鸳鸯以金针度人，虽然在著者本无成心，但在后人读之对于他的老婆心不能不致感谢之意。焦君的学问渊博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见识通达尤为难得，有了学问而又了解物理人情，这才能有独自的正当的见解，回过去说，此又与上文所云义理相关，根本还是思想的问题，假如这一关打不通，虽是有学问能文章，也总还济不得事也。

关于焦里堂的生平，有阮云台所作的传可以参考，他的儿子廷琥所作《先府君事略》，共八十八则，纪录一生大小事迹，更有意思。其中一则云：

> 湖村二八月间赛神演剧，铙鼓喧阗，府君每携诸孙观之，或乘驾小舟，或扶杖徐步，群坐柳阴豆棚之间。花部演唱，村人每就府君询问故事，府君略为解说，莫不鼓掌解颐。府君有《花部农谈》一卷。

案焦君又著有《剧说》六卷，其为学并不废词曲，可见其气象博大，清末学者如俞曲园谭复堂平景孙诸君亦均如此，盖是同一统系也。焦君所著《忆书》卷六云：

> 余生平最善客人，每于人之欺诈不肯即发，而人遂视为可欺可诈。每积而至于不可忍，遂猝以相报；或见余之猝以相报也，以余为性情卞急。不知余之病不在卞急，而正坐姑息。故思曰溶，容作圣，必合作肃作乂作哲作谋，否则徒容而转至于不能容矣。自知其病，乃至今未能改。

此一节又足以见其性情之一斑，极有价值。昔日读郝兰皋的《晒书堂诗抄》，卷下有七律一首，题曰：“余家居有模糊之名，年将及壮，志业未成，自嘲又复自励。”又《晒书堂笔录》卷六中有“模糊”一则，叙述为奴仆所侮，多置不问，由是家人被以模糊之名，笑而颔之。焦郝二君在这一点上也有相似之处，觉得颇有意思。

照我的说法，郝君的模糊可以说是道家的，他是模糊到底，心里自然是很明白的。焦君乃是儒家的，他也模糊，但是有个限度，过了这限度就不能再容忍。这个办法可以说是最合理，却也最难，容易失败，如《忆书》所记说的很明白。前者有如佛教的羼提，已近于理想境，虽心向往之而不能至，若后者虽不免多有尤悔，而究竟在人情中，吾辈凡人对之自觉更有同感耳。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

□1945 年作，1959 年刊“大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过去的工作》

读 书 疑

《读书疑》甲集四卷，刘家龙著，道光丙午年刊，至今刚是一百年，著者履历未详，但知其为山东章丘人，此书汇录壬寅至乙巳四年前读书札记，刊刻与纸墨均极劣，而其意见多有可取者。如卷四云：

> 通天地人谓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术。或问通人而不通天地则何如，余曰：此非儒所能，必尧舜孔子也。尧不自作历而以命羲和，孔子不自耕而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儒之止于儒者，正以兼通天地也。

此言似奇而实正，兼通天地未必有害，但总之或以此故而于人事未能尽心力，便是缺点。从来儒者所学大抵只是为臣之事，所谓内圣外王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及科举制度确立，经书与时文表里相附而行，于是学问与教育更是混乱了。卷四云：

“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而已。《易）则三代以前之书，《春秋》则三代末所用，故皆缓之也。场屋之序，考试之体，非为学之序也。”卷二云：

“周礼以诗书礼乐教士，孔子以《诗》《礼》训子，而雅言亦只添一书。程子曰：《大学》入德之门，亦未言童子当读也。朱子作《小学》，恐人先读《大学》也。自有明以制义取士，三岁孩子即读《大学》，明新至善为启蒙之说矣，遂皆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又卷一云：

“灵台本游观之所，而于中置辟雍；泮林亦游观之地，而于中置泮宫。孔子设教于杏坛，曾子亦曰无伤我薪木，书房之栽花木，其来远矣。今则科场用五经，无暇及此，亦时为之也。”卷二讲到以经书教子弟，有一节云：

> 金圣叹曰：子弟到十馀岁，必不能禁其见淫书，不如使读《西厢》，则好文而恶色矣。或曰：曲终奏雅，曲未半心已荡，奈何？不如勤课以诗书。然吾见勤课者非成书呆即叛而去耳，要之教子一事难言哉，惟身教为善耳。父所交皆正人，则在其所者皆薛居州也，谁与为不善。

未了说的有些迂阔，大意却是不错的，他说教子一事难言哉确是老实话，这件事至今也还没有想出好办法，现代只有性教有这一种主张，其实根本原与金圣叹相同，不过有文与实之分而已。前者凭借文人的词章，本意想教读者好文而恶色，实在也不无反要引人入胜之虞；后者使用自然的事实，说的明白，也可以看得平淡，比较的多有效力。刘君对于圣叹的话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但他觉得子弟或不必给《西厢》读，而在成人这却是有用的。如卷四云：

“何谓圣人？费解之书爱之而不读，难行之书爱之而不读，是圣人也。食粪土，食珠玉，其为愚人一也。邪淫之书却不可不读，蔬食菜羹之味不可不知也。故圣人不删《郑风》。”又卷云：

> 余喜作山歌俗唱梆子腔姑娘柳鼓儿词，而不喜作古近体诗，尤不喜作试帖。孔子言思无邪，又曰兴观群怨，皆指风言。山歌俗唱，风也。古近体，雅也。试贴，颂也。今不读山歌俗唱梆子腔梆子戏者，想皆翻孔子案，别撰尧舜二诗置于《关雎》前者也。若此之人，宜其胸罗万卷之书，诸练历代之典，而于人情物理一毫不达也。

这个意思本是古已有之，袁中郎在所撰《叙小修诗》中云：“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此种意见看似稍偏激，其实很

有道理，但是世人仍然多做雅颂，绝少有写山歌者，乃是因为真声不容易写，文情不能缺一，不如假古董好仿做也。卷三有一则云：

> 杨墨佛老皆非真邪教也，由学术之偏而极其甚者也。《吕刑》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地天通”不知何人所作，不知成书几卷，乃千古邪教之祖也，其书虽不传，以其字义揣之，殆今之《阴骘文》《功过格》也。尧舜于“地天通”则禁绝之，今之富民于《阴骘文》《功过格》则刻之传之，可谓贤于尧舜矣。

案《尚书》注云：使民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今谓是邪教经典似无典据，惟其排斥《阴骘文》《功过格》的意见我极为赞同，中国思想之弄得乌烟瘴气，一半由于此类三教混合的教义，如俞理初所言，正可谓之愚儒莠书也。刘君深恶富民之传刻邪教之书，不知儒生的关系更大，近代秀才几乎无不兼道士者，惠定字尚不能免，即方苞亦说骂朱子者必绝后，迷信惨刻，与巫道无异，若一般求富贵者，非奔走权门则惟有乞灵于神鬼，此类莠书之制作宣扬传布皆是秀才们所为，富民不过附和，其责任并不重大。鄙人不反对民间种种祷祀，希求得福而免祸，惟一切出于儒生造作之莠书曲说至为憎恶，往见张香涛等二三人言论，力斥扶乩及谈《阴骘文》等为魔道，今又得刘君，深喜不乏同调，但前后百年，如《笑赞》中所说，圣人数不过五，则亦大是可笑耳。

书中多有不关重要问题，随笔纪录者，自具见解，颇有风趣，虽或未必尽当，亦复清新可喜。如卷一云：

> “古者以萧为烛，如今之火把，故须人执之也。六代时已有木奴，代人执烛。杜诗，何时秉银烛，银已是蜡台矣，何用人执之耶？而韩忠献在军中阅文书，执烛之卒■其须，则何故耶？谈墓者空中楼阁，修史者依样壶卢，类如此。”又卷三云：

> “古人祭祀纳金示情，唐明皇东封金不足用，张说请以楮代之，此纸钱之始也。吴谷人《墦间乞食》诗云，归路纸钱风，可谓趣矣。若据为纸钱之考证则呆矣。”又云：

> “《聊斋》者不得第之人故作唱本以娱人耳，后人尊之太过，反失其实矣。即如其首篇《考城隍》云：堂上官十人，惟识关壮缪。夫红脸长须者戏台之壮缪耳，其本来面目亦如此乎？乡人入朝房，谓千官皆忠臣，问何以知之，曰奸臣皆满脸抹粉也。《聊斋》之言与此何异？又如有心为善，善亦不赏，岂复成说话乎？”此处批评蒲君，似乎太认真，但亦言之成理。古语云，先知不见重于故乡，《聊斋》恐亦难免此例。若武松之在清河，张飞之在涿州，则又是别一例，盖英雄豪杰惟从唱本中钻出来的乃为群众所拥戴。放翁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即其反面也。

> 颜路请子之车，是时孔子之年七十二矣，是孔颜老而贫也。孟子后丧逾前丧，是老而富也。其故何也？春秋之君不养士，故郑有青衿，刺学校废也。战国之国争养客，故鸡鸣狗盗皆上客也。士即筮仕，亦止为小官，而所任则府史之职，但作文章而已。故孔子主颜雠由，而其告哀公曰，尊贤不惑，敬大臣乃不眩也。客则直达于君，而受虚职焉。故孟子馆于雪宫，又馆于上宫，且为客卿而出吊也。是则春秋无客，战国无士矣。古之人君不甚贵，臣不甚贱，故不分流品，春秋尚然，至战国则君骄臣谄，臣不敢任事，亦不能任事，而有才者皆为客矣。此书院之膏火所以廉，而称知县曰父师，慕客之束修所以重，而称知县曰东家也。

孔子必闻其政，则子禽以为奇事，孟子传食诸侯，而景春谓其不急于求仕，皆此之由也。

这一则在第四卷之末，说孔孟贫富的原因很是详细，说得像煞有介事的，觉得很有意思，中间书院膏火与幕友束修的比较更为巧妙，著者的深刻尖新的作风很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上边所引的文章里边，这一则似乎最漂亮，一面说起来却也是比较的差，因为这样的推究容易出毛病，假如材料不大确实，假设太奇突，心粗手滑，便成谬说。我们这里引了来看他怎么说，并不要一定学他说，重要的还是在前边的那几节，其特点在通达人情物理，总是平实无弊者也。（乙酉年五月二十五日）

□1945 年作，1959 年刊“ 大地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过去的工作》

北京的风俗诗

竹枝词在文学史上自有其源流变迁，兹不具详。这本来是诗，照例应属于集部，宋朝人的郴江嘉禾各种百咏在四库总目里都收入别集内，而提要中又称其于地志考据不为无助，可见以内容论这也可以属于史部，而且或者更为适切亦未可知。但是这一类诗的性质也不完全统一，大抵可以分作三样来说。

一是所咏差不多全属历史地理的性质的，较早的一部分如宋元的各种百咏，虽说是歌咏其土风之胜，实际上只是山川古迹，往往与平常怀古之诗相似，如李太白诗云：

官女如花满春殿，至今惟有鹧鸪飞。

作为越中百咏之一也是绝好的作品。

二是如四库提要所云，踵前例而稍变其面目者，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一百首是最好的例，所谓所谓诗情温丽固是特色，因此极为世人所重，经谭舟石陆和仲张文鱼诸人赓续和作，共约四百首，蔚为大观，所咏范围亦益扩大，使读者兴趣随以增加。如《棹歌》之十八云：

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

又五十二云，

不待上元灯火夜，徐王庙下鼓冬冬。

这里加入岁时风物的分子，都是从来所少的，这不但是好诗料，也使竹枝词扩充了领域，更是很好的事。寒斋所有又是看了觉得喜欢的，乾嘉以来有钱沃臣《蓬岛樵歌》正续各百首，所咏事物甚众而注亦详备，蔡云《吴歈百绝》，厉秀芳《真州竹枝词》四百首，前有引万二千馀言，皆专咏年中行事者，《武林新年杂咏》系吴谷人等六人合著，又用五言律诗，体例少异，却亦是此类的佳作。

三是以风俗人情为主者，此种竹枝词我平常最喜欢，可是很不可多得，好的更少。这是风俗诗，平铺直叙不能讨好，拉扯故典陪衬，尤其显得陈腐，馀下来的办法便只有加点滑稽味，即漫画法是也。所以这一类竹枝词说大抵是讽刺诗并无不可，不过这里要不得那酷儒莠书的一路，须得有诙谐的风趣贯串其中，这才辛辣而仍有点蜜味。可惜中国历来滑稽的文字与思想不很发达，漫诗的成绩与漫画的一样不佳，实在是无可如何的。

我想道家思想本来是还博大的，他有发生这种艺术的可能，但是后来派生出来的儒法两家却很讲正经，所以结果如此也未可知。汉武帝时柏梁台联句，东方朔和郭舍人都那么开玩笑，可见其时还有这样风气，看东方朔的诫子诗，可以知道他原是道家的人。《史记滑稽列传》中云，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这两句话说得很好，与鄙见大抵相同。滑稽——或如近时所谓幽默的话，固然会有解纷之功用，就是在谈言微中上也自有价值，可以存在，此正是天道恢恢所以为大也。太史公所记，淳于髡与二优人皆周秦时人，褚先生所补六章中除王先生与西门豹并非滑稽外，郭舍人东方朔即联句者，与东郭先生皆汉武时人物，此后惜无复有纪录。

佛教新兴，以至禅宗成立，思想界得一解放的机缘，又以译经的便利，文章上发生一种偈体，这与语录的散文相对，都很有新的意义。在韵文方面，韵这一关终于难以打破，受了偈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还只是王梵志和寒山子的五言诗，以至牛山的志明和尚的七言绝句。正如语录文被宋朝的道学家拿

了去应用一样，这种诗体也被他们拿了过去，大做其他们的说理诗，最明显的是《击壤集》著者鼎鼎大名的邵尧夫，其实就是程朱也还是脱不了这一路的影响。本来文字或思想的通用别无妨碍，不过我们这里是说滑稽的文诗，所必要的是具有博大的人情，现在却遇见这样的话，如朱晦庵骂胡澹庵的诗云，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能不令人索然兴尽，掷卷不欲再观。大概在这方面儒生的成绩不能及和尚，不但是创始与追随之差，实在也恐怕是人物之不相及。志明的《牛山四十屁》中有云：

秦时寺院汉时墙，破破衣衫破破床，感激开坛新长老，
常将语录赐糊窗。

又云：

闲看乡人着矢棋，新兴象有过河时，马儿蹩脚由他走，
我只装呆总不知。

这些诗虽不能说怎样了不得的好，总之谐诗的风格确已具备，可以作讽刺诗了，拉过来说则作风俗诗也正是恰好、问题只是在于时机而已。明朝因王阳明李卓吾的影响，文学思想上又来了一次解放的风潮，公安派着重性灵，把道学家的劝世歌似的说理诗挽救了过来，可是他们还是抓住诗的系统，虽是口里说着劈破玉打草竿是真人之诗，却仍不能像和尚们摔下头巾，坦率干脆的做了异端。这风气传到清朝，在康熙的李笠翁，乾隆的郑板桥诸人上面可以看出，我曾见一册《哑然绝句诗》，是曾子六十七世孙曾衍东所作，全是板桥一派而更为彻底一点，所以也是难得。等到《文章游戏》四集的编者缪莲仙，《岂有此理》二集的作者周竹君出现，老实承认是异端，同牛山志明长老的态度一样，自做他的打油诗，不想来抢夺诗坛的交椅，这样表明之后谐诗独自的地位也可以算是立定了。单行的著作我只看到郭尧臣的《捧腹集诗抄》一卷，蔡铭周的《怪吟杂录》二卷，别的不知道还有些什么，此外则我所想说的歌咏北京风俗的竹枝词也可以算在这里边。

本来各地方的竹枝词很不少，可是多自附于著作之林，大抵追随竹垞的一路，上焉者也能做到温丽地步，成为一首好绝句，其次则难免渐入于平庸窘迫，觉得还是小注较有趣味了。清代的北京竹枝词如樊文卿的《燕都杂咏》，计五言绝句三百六十馀首，材料不为不丰富，可是仍用正宗的诗体咏史地的故实，正是上边的一个好例，与咏风俗的讽刺诗相去很运。可以称是风俗诗的，就鄙人所知就没有多少种。大概可以分列如左：

甲，杨米人著《都门竹枝》一百首，未见，只在乙的小引中提及，大约是乾嘉间之作吧。

乙，无名氏著《都门竹枝》词八十首，嘉庆癸酉年刊，小引中说本有一百首，其二十首删去不存云。

丙，得硕亭著《京都竹枝词》一百八首，题曰《草枝一串》，序文不记年月，惟中云甲戌见竹枝词八十首，案即癸酉之次年，为嘉庆十九年也。

丁，杨静亭著《部门杂咏》一百首，序署道光二十五年即乙巳岁，原附《都门纪略》后，今所见只同治元年甲子徐永年改订本，所收除静亭原作外，又增入盛子振王乐山金建侯张鹤泉四人分咏，总共二百十六首，计静亭诗有一百首，可知未曾删削，惟散编在内而已。光绪三年丁巳改出单行本，易名为《部门竹枝词》，增加三十五首，不著撰人名字，且并原本五人题名亦删去之，殊为不当，至十三年丁酉《都门纪略》改编为《朝市丛载》，照样收入，又增二十馀首，则文词且欠妥适，更不足取矣。光绪后亦有新作，今不

多赘。

照上边所记看来，大概以乙丙两种为优，因为讽刺多轻妙，能发挥风俗诗的本领，《草珠一串》序云，《京都竹枝词》八十首不知出自谁手，大半讥刺时人时事者多，虽云讽刺，未寓箴规，匪独有伤忠厚之心，且恐蹈诽谤之罪，友人喷喷称善，余漫应之而未敢附和也。可见在癸酉甲戌当时，这讽刺觉得很锐利，作者不署名或者也由于此，到了今日已是百馀年后，无从得知本事，可是感觉说得刻薄，总是真的，而这刻薄的某种程度在讽刺诗上却也是必要，所以不能一定说他不对。平心而论，此无名氏的著作比较硕亭得老夫子或者还是高出一分，也正难说。说到这里我连想起日本的讽刺诗或风俗诗来，这叫做川柳，在民国十二年夏天我在燕京文学会讲演过一回，其中有一节云：

> 川柳的讽刺大都是类型的，如荡子、迂儒、出奔、负债之类，都是所谓柳人的好资料，但其所讽刺者并不限于特殊事项，即极平常的习惯言动，也因了奇警的着眼与造句，可以变成极妙的漫画。好的川柳，其妙处全在确实地抓住情景的要点，毫不客气而又含蓄的抛掷出去，使读者感到一种小的针刺，似痛似痒的，又如吃到一点芥末，辣得眼泪要出来，却刹时过去了，并不像青辣椒那么粘缠。川柳揭穿人情之机微，根本上没有什么恶意，我们看了那里所写的世相，不禁点头微笑，但一面因了这些人情弱点，或者反使人觉得人间之更为可爱，所以他的讽刺乃是乐天家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并不是厌世者的诅咒。

上边提到东方朔，现在可以知道凡滑稽家他们原是一伙儿的。中国风俗诗或谐诗未曾像川柳似的有过一段发达的历史，要那么理想的好自然也不容易，但原则上我想总是一致的，至少我们的看法可以如此。要举出充分的例来，有点可惜珍贵的纸，姑且把别家割爱了，只引用无名氏的词本，而且只以关于书生生活为限，这就是上文所谓迂儒的一类。如《考试》十首之一云：

> 水陆交驰应试来，桥头门外索钱财，乡谈一怒人难懂，
> 被套衣包已割开。

其二云：

> 惯向街头雇贵车，上车两手一齐爬，主人拱手时辰久，
> 靠着门旁叫腿麻。

又其三云：

> 短袍长褂着镶鞋，摇摆逢人便问街，扇络不知何处去，
> 昂头犹自看招牌。

这里把南来的考相公写得神气活现，虽然牛山和尚曾有老僧望见遍身酥之咏，对于游山相公大开玩笑，现今一比较却是后来居上多多了。又《教馆》十首亦多佳作，今录其二首云：

> 一月三金笑口开，择期启馆托人催，关书聘礼何曾见，
> 自雇驴车搬进来。

又其八云：

> 偶尔宾东不合宜，顿思逐客事离奇，一天不送先生饭，
> 始解东君馆已辞。

其十云：

> 谋得馆时盼馆开，未周一月已搬回，通称本是教书匠，
> 随便都能雇得来。

这诗真是到现在还有生命，凡是做过书房或学堂的先生的人谁看了都觉得难过。近年坊间颇盛行的四大便宜的俚语云，挤电车，吃大盐，贴邮票，雇教员。教书匠的名号至今存在，那么受雇解雇的事自然也是极寻常的事，这条原理不料在一百三十年前已经定下了。替塾师诉苦的打油诗向来不少，如《捧腹集》中就有《青毡生随口曲》七绝十四首，蒙师叹七律十四首，可是无论处境怎样窘迫，也还不过是“栗爆偶然攒一个，内东顷刻噪如鸦”之类而已，不至于绝食示意，立刻打发走路。《随口曲》有云：

一岁修金十二千，节仪在内订从前，适来有件开心事，
代笔叨光夹百钱。

原注云，市语以二百为夹百。

乡馆从来礼数宽，短衫单裤算衣冠，燥脾第一新凉候，
赤脚蓬头用午餐。
最难得是口头肥，青菜千张又粉皮，闻说明朝将脞溇，
可能晚膳有鲹■。

这样看来，塾师生活里也还有点有趣的地方，不似都门教馆的一味暗淡，岂海宁州的境况固较佳乎，理或有之，却亦未敢断言也。（民国乙酉年六月十五日）

□1945 年作，1961 年刊“三育”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知堂乙酉文编》

漫谈四库全书

中国读书人说起《四库全书》来，总是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其实是错误的。旧的人不必说了，新的受了欧美人的影响，也都觉得这是一宗了不得的文化遗产，至于它的实在价值却全不大明瞭。《四库》是什么呢？这只是清朝乾隆帝弘历所开办的图书馆，收集的东西虽不少，却都是经过誊写、不讲校勘的抄写本，装潢好看，内容并不可靠，远不及后来诸家各校本之有学术价值，此其一。有些古刊珍本，另存别处，不在《四库》之内，因为《四库全书》是要板本大小一律，都是由举人秀才等手抄而成的。这些科举出身的老爷们本来不懂得什么是学术，抄写编纂只当作差使公事办，而皇帝是天作之圣，君师合一，更是任意妄为，有如乾隆尊崇关羽，改谥法壮缪为忠武，并将陈寿《三国志》里的本文也改掉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鹿部麋字下注云：

乾隆三十一年，纯皇帝目验御园麈角于冬至皆解，而麋角不解，敕改时宪书之麋角解之麋为麈，臣固知今所谓麈正古所谓麋也。

王筠《说文句读》又部爪字下注云：

《康熙字典》引云，象其甲指端生形，此乃内府善本，筠未曾见。

段王皆是谨饬的学者，绝不敢以文字贾祸，这里却也忍不住要讽刺一下了。清朝系异族，对于书中说到夷夏问题的地方非常注意，古代泛论的悉加删改，近时直说的则全体抹杀，禁书与文字狱是其结果，可以说是《四库全书》的一个大收获，此其二。我们只举前者，即是删改古书的例来看。《四库》中有一部晋皇侃所著的《论语疏》，是极难得的古书，《知不足斋丛书》内有翻刻本，可是这里发现一件怪事，同是知不足斋所刻的，假如你运气够好，便会得到两样不同的本子。请看《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一章，底下的两本行款字数都是一样，而文句完全不同。为什么呢？这便因为皇氏原注贬斥夷狄，皇帝见了生气，叫翰林们改，也亏得他们辛苦经营，依照原有字数，改作补入，知不足斋也照样挖改，所以与前印本截然不同了。关于这件事，记得鲁迅曾有文章详细讲过，读者可以查考。

康熙乾隆两朝编纂了好些类书，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至今同《四库全书》一样为读书人所称道不衰，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康熙字典》里引《说文》的话，如上文王筠所举出，是在原书中所没有的，可以见一斑，各种错误虽另有高邮王氏的考证，可是字典因为是钦定的书，至今未加改正，似乎现在钦定的权威也还是存在的，而且现今亦还很通行，实在民国以来并不见有更是便宜适用的书出来，可以替代它的。什么时候中国读书人不再迷信《四库全书》，不再依靠《康熙字典》了，那时中国的国文国学才会有转机，这时期或者很快，或者很慢，都是难说。

□1949 年 3 月 31 日刊《自由论坛晚报》，署名鹤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说四库全书①

鲁迅平常有一个意见，似乎一直不大为人所注意，所了解继承，这便是他看不起《四库全书》以及《康熙字典》等官书的意见。乾隆开四库馆收书，主要目的是搜查反满清思想，结果几百十种的文史列为禁书，一网打尽。就是古书中“违碍字样”也都涂抹改作，例如皇侃的《论语义疏》，夷狄之有君一节注，知不足斋初印本与后来通行本完全不同，这便因为说夷狄犯了忌讳，由皇帝叫人改过了，奇怪的是字数全然一样，可知那改作的人象是织补匠似的也很费一番工夫哩。初印本收毁不尽，偶有馀留，后来从日本又传来皇侃原本，这把戏就大众周知了。鲁迅曾写些杂文，骂过《四库全书》，把这件事说在内，大概读过的人也还记得。

其次皇帝忽发奇想，就任意改窜古书。乾隆大抵是读《三国演义》入了迷，要赏给关羽好谥法，这本来也没甚关系，他却下令说陈寿《三国志》中壮缪的谥法不对，着改为忠武，于是大家所佩服的四库本和殿板的《三国志》关羽传里，都是说谥忠武了。这不但变乱古史，而且改了陈寿原文，这忠武的谥法好像是刘阿斗给他的样子了，你想可笑不可笑。

□1951 年 4 月 2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四库全书

中国有最迷人的一部古书，不大有人看见过，读过，说起来却是五体投地的佩服，这便是《四库全书》。说起来也怪不得佩服，这样大部的结集，是古来所希有的，而且时间还是在十八世纪，我们提起乾隆、嘉庆，似乎还不很远，其实已经过了二百多年了。十五世纪的《永乐大典》诚然伟大，但那个已经散佚，除了现今留存的一点点，实已无法挽回了。我们现在还有《四库全书》两部，的确是很幸运的，然而它们实用价值已不甚大，说起来也只是可供参考罢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满清政府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也是清政府所编，但那只是出于官僚之手，有点马虎而已。这却别有政治作用，加以删削篡改，比马虎要有害得多。大家知道，前清兴起多少次文字狱（从前故宫博物院刊行过一种《文字狱档》，出到第十一册，这须得由史家编一总录，另外还应搜集禁书，出版一册图录），压伏民族的反抗，以乾隆时为最厉害。这回借此差不多对古今书籍来一次总检查，非思想正统者不能录取。我们只看《论语义疏》，乃是晋朝皇侃所作，万不能来反对清朝的了，只因在孔子“夷狄之有君”一节话发挥了几句，便被删改得一塌糊涂，连《知不足斋丛书》里的《义疏》，也得改刻过，原本绝不易得了。后来《四部丛刊》出来，才得看见皇侃的本来面目，原来他不过通论夷狄不好，乾隆皇帝却听了不高兴，要干涉千馀年前古人的说话了。这是最明显的一例。到了宋朝以后的人的著作，因为有辽金元的对峙，说话益发有违碍，于是《四库》的编修官也就忙于笔削，鲁迅从前有些文章揭发过，我这里不再来抄录了。

总之《四库全书》不能称为善本，因为它故意的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来适合皇帝的好恶，所以不值得人民的珍视。其中有外间少有的几种，已经翻印为《四库珍本丛书》，以及有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书，有《武英殿聚珍板丛书》，在现今《永乐大典》几乎全然消灭了的时候，也是难得的。清朝的考据学很有进步，有些书是乾隆、嘉庆以来学者校订的。其精审远在《四库》之上，其风气直传至清末，所以我们对于精校的近刊著作也是不可轻视的。既然有了以上三种丛刊，可以说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已经全有了，其他的也就可以随它去，不必再加以什么留恋了吧。

《四库全书》的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笔表过了，但是那一部《四库书目提要》，虽然也是出于官僚之手，却是还别有价值的。主要的原因由于这总裁其事的乃是纪昀，通称纪晓岚，著有《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为世人所知。他也只是皇帝近旁的一个文学弄臣罢了，但是他脾气很特别，不很喜欢那些讲迂腐话的宋儒，这意思很明白的见于他的笔记中，借了好些故事来对于他们加以嘲笑，在《书目提要》中却是正面的来说，以钦定的官书里面能对宋儒不表示敬意，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了。唯纪晓岚因讨厌宋儒的“二气之良能”这一类的迂话，反而主张有鬼，讲好些半真半假的迷信故事，宣传报应，落入道士派窠臼，实在是很可惜的。《笔记》的文章很是干净利落，自成一家，与《聊斋志异》分道扬镳，《聊斋》是唐传奇一派，《阅微草堂》却是六朝志怪的末裔，只是为劝戒之说所累，所以未免有一股俗气罢了。

□1964 年 1 月 22 日刊香港《新晚报》，署名启明

---

[1] 本文前三节曾刊 1958 年 3 月 23 日《新民报晚刊》，题同。

□未收入自编文集

四库全书与康熙字典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假如一半真是为的要收书，那么至少一半也是为的检查并销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思想。收到的犯忌的书，老实不客气的禁毁了（没有送来的，奖励人来告密），古书则叫翰林改过，如皇侃《论语疏》夷狄之有君一节的话，知不足斋初印本里是原文，后印本则是别一番话，乃是依四库本改正，是假冒了。关羽原谥壮缪，乾隆要改叫他忠武，上谕命将《三国志》中原文改掉，蜀汉的事实，陈寿的文章，也可以由皇帝随意变动的。有一年（据说是一七六六年），他在御园看见麈角于冬至皆解而麋角不解，命将书中麋角解均改为麈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记其事于麈字下，不敢明言他的谬误，只婉委其词云，臣因知今所谓麈正古所谓麋也，岂不即是说他误叫麋为麈，却要妄改古文么？王筠在《说文句读》中便更不客气，在一个什么字底下说《康熙字典》引《说文》云云，为原书所无，颇为荒唐，乃云筠案此盖内府秘本，外人所不能见者，挖苦而又俏皮，实属大不敬，如在乾隆时必将为人所告发而捉将官里去了。

康熙比较乾隆学问稍好，因为他还肯同几个西洋人搞天文数学，但敕撰的官书都由些翰林们胡乱去弄，与坊本一样的糟，却顶着皇帝的招牌，没有人敢说话。到了民国以后，皇帝的这些纸老虎才渐渐戳穿，可以希望不大有人再相信它们了。

□1950 年 8 月 6 日刊《亦报》，署名鹤生
□收入《饭后随笔》

康熙字典

《大公报》列举中国的天下第一，第四十八项说纪购等奉令所编《康熙字典》是第一部最完整的词典，削颖先生已查明纪购生于雍正二年（一七二四），不能够于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二）去参加编辑字典的事务了。但说这部字典从旧观点说，不论音韵注释，都很完整，诚如所言，那却是不的确的。这字典里的引证一塌胡涂，从前国学家非难很多，只是因为是钦定的，不敢明说，王引之（？）在嘉庆时有过一部补正，说的很是温暾，也未通行，只有同治时王棻友才说过几句挖苦的话。他的《说文句读》手头没有，记不清是什么字了，他引《康熙字典》中《说文》云云，与今本舛异，说道谨案此盖是御府秘本，外边所未见者也。字句错误（或杜撰），书名错误，据说多得很，但这须问专门家，我未能具体的回答。老友东阳仲子曾叹息说，现在还只得查《康熙字典》。他是国学者，办过中学大学，他说这句话乃是痛话恶话，我们到了民国二十年，还只能来用《康熙字典》吗！他因为要骂新的那些辞典，所以称赞《康熙字典》，这话是我亲自听见，所以很是了解的。要称说中国字典之天下第一，为什么不抬出许叔重的《说文解字》来？此书完全成于公历一二一年，可以够得上说世界第一早出的字书了吧。

□1951 年 4 月 1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谈康熙字典

清朝皇帝统治汉人，有很巧妙而恶辣的方法，除用武力迫压外，更重要的是愚民政策，依照明朝成法，加重提倡八股，此外还有欺骗人的文化工作，即《康熙字典》与《四库全书》。关于《四库全书》的事，已经有许改先生详细报道了，它的用意固然不正，成绩也并不好，虽然是那么的一大堆。近时上海书店编印《四部丛刊》采访古本，《四部备要》则用校订善本，都没有用《四库》的钦定官抄本，可以谓是中国学界差强人意的一件事情。《康熙字典》原来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实际只是根据梅氏《字汇》和吴氏《字汇补》来混合一下，并不比原书好，单靠着专制君主的威权，独霸小学界，经师学者看着它谬误百出，都不敢明白说一句话。辛亥革命至今已四十年，可是还有人在佩服它，也还有人使用。佩服自然是很荒谬的，使用却也是不得已，因为近代有了新编的辞典，终于找不到适用的字典，没有可以替代的东西。辞典固然也很要紧，但一般总是太贵，平常查考一个字的音义，需要以字为主的字典，这一类并不是没有，却是不完备，因此不能适用。字典、辞典可说是人人必需的工具书，于文化前途至有关系，必须价廉物美才好，这个编刊的工作便非由国家来担任不可，因为编纂上要赔钱，印刷上不预备赚钱，不是营业本位的店家所做得来的也。

□1951 年 12 月 27 日刊《亦报》，署名祝由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关于章氏丛书

汪旭初先生在《寄庵谈荟》中答柳君非杞问，关于《章氏丛书》所见说明，今就所知略为补充。

《章氏丛书》康氏排印本错字颇多，现今市中亦已难得，浙江图书馆本虽板渐模胡，想尚可买到。

此外《章氏丛书续编》，于民国廿二年在北平刊成，木板四册，共收书七种十六卷，《薤汉昌言》及《体撰录》均在内，新出《三体石经考》系钱玄同手书，写刻精工，似比初编中的《小学答问》更好。

此书系由章门弟子中若干人发起，出资刊刻，汪先生也在内，《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上且列名校勘，不知何以说《体撰录》始终未刊，是否当时未曾收到刻好的全书？

刊校印刷的事闻由吴检斋经理，参加的人各分得三五部，大家愿意将书板寄赠章氏国学讲习会，后来听说未曾实行，吴检斋死后这事更无可考了。虽然据说吴氏经手印过一批，在旧书店中或尚可见到，但总之比较初编要难得多吧。

分载《国华》及《制言》中的文字，经孙世扬编辑，有《太炎文录续编》七卷，各卷多分上下，实有十三卷，于民国十三年在汉口排印出版，共四册，为《章氏丛书三编》之一部分，只印了五百部，未附分送名单，在重庆项下也有汪先生的名字。

书虽印的不多，但在西南想应当还可找着，若在北方，则正与续编相反，很不易得，据单上分到的只有五六部而已。以上据所见闻略述一二，以供参考，如承指示增广，至为欣感。

□1950 年 1 月 28 日刊《大报》，署名荣纪

□收入《饭后随笔》

钱玄同与章氏丛书

钱玄同从太炎先生听讲，最初是在东京大成中学的国学讲习会，后来在《民报》社特别听讲《说文》，有时便留下不走，与太炎“抵足而眠”，彻夜谈论文字问题，结果逼得先生承认写字非用篆字不可。太炎给学生的信，托便人带来的，封面上有写篆文的，但是江声老先生的旧办法到底也难实行：于是玄同提出依照小篆用楷字写之一法，写起来倒并不难看，虽然不大好认，圆笔变方了，反而面生，一也，须用本字，一见难认，如认之作仞，二也。经了苦心研究之后，终于写成了四卷《小学答问》，木刻精印，民国后收入《章氏丛书初编》内，但后印本究竟精彩差得多了。

民国二十二年在北京编刊《丛书续编》，由玄同与吴检斋主其事，每卷之后均有二人复校的署名，可以算作记号，其中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也是玄同手书，写法却有点改变了，太炎跋云：

> 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忽忽二十馀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亨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矣。稿本尚有数事未谛，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夏今名玄同云。

续编系文楷斋镌刻，颇为精致，弟子们愿意刻成后即举以奉赠，移送苏州，由吴检斋任其事，而迟迟久未办，南方乃另行影印，吴旋去世，原板不知尚存否，如有人得到初印有小像本，应知何如的珍重也。

□1950 年 1 月 28 日刊《亦报》，署名鹤生
□收入《饭后随笔》

太炎文录的刊行

据古籍刊行社消息，不久将印行章太炎先生的《检论》、《国故论衡》和《太炎文录》。这完全是及时的也正是必要的一件事。太炎先生的著作以前也实在流行的太少了，这和他文字的艰深也多少是有关系的。在清末民初这几位学者中，他的文章实在要算难懂，现在来加以整理出版，所以是很必要但也是很困难的事。

太炎先生的著作，除民国以前，有过零星出版外，计有三次汇刊。第一是浙江图书馆木刻的《章氏丛书》，是他全集的基本，流布得算最广，《检论》等三种都在内。第二是《章氏丛书续编》，只有四册七种。系一九三三年在北京刻板，由其旧日门人酸资而成，印刷甚精。我藏有蓝印者一部，卷首有一张相片，手指间卷烟出烟缕缕可见，照得极好。刻好后原拟将全部木板赠给章氏，终于不果，而抗战发生，这板的行踪遂不可查考了。其中有一卷《新出三体石经考》，由钱玄同手写付刻，太炎先生似甚为满意，手写序文云：

> 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音学五书》，忽忽二十馀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变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矣。稿本尚有数事未谛，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夏今名玄同云。民国二十二年三月，章炳麟记。

第三乃已在太炎先生故后，由章氏国学讲习会在汉口编集铅印，名为《章氏丛书三编》，只刊成《太炎文录续编》七卷四册，时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当时计共印五百部，寄赠各处。据赠书单上所开，寄至北京者共六部，此刻除我以外的五个人，都已归道山久矣。此次拟印行的《太炎文录》，不知是否包含续编，这一点似乎值得注意。

太炎先生的文章本有句点，如照样翻印，尚不成问题，倘若要加以整理注解，经验上觉得很不容易。《訄书》（后名为《检论》）不必说了，其不易读是有名的，即如《国故论衡》，也像读秦汉以前的书相似，不能畅快的读下去。“五四”前后，北京大学首先刷新教材，提倡“学术文”选录注解，里边就有不少《国故论衡》的文章。据当时注解的人说，确实煞费苦心，幸而里边多有旧日的弟子，有的有着先生《论衡》的原稿，打开来看，可以查出改掉的是什么字，知道原来的意思。鲁迅曾说人家做古文的秘诀，先写一篇平平常常的文章，随后仔细将其中字句掉换成古字，这就成为一篇古色古香了。当然这也有很拙劣的，弄成竹马为“筱骖”，夜梦不祥为“宵寐匪祯”，但就是最上的文人也就用的是这一副本领。《检论》与《国故论衡》文字的艰深，不仅读者难以亲近，连注解者也难得适当的人。唯有《太炎文录》稍为平易，便是照样翻印，也还可以，因为里边多是为《民报》而作，算是他的一种比较通俗的文字。

□1958 年 1 月 14 日刊《新民报晚刊》，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耕 织 图

中国向来称重农之国，可是农家的书少得很，大概在《四库书目》中只占一卷吧。南北朝时的《齐民要术》是古典书了，自然是可贵，却也只是古罢了。元朝的《农书》与明朝的《农政全书》平常不容易得到，手头只有一册《天工开物》，是上海翻印本，图是石印的，所以也还可以看得。第一卷《乃粒》，第二卷《乃服》，是分讲农桑两事的，虽然叙述简单，却喜图还不少，关于农功有大小十六图，蚕桑包括棉花，有二十五图，第三卷《粹精》，继续讲打稻脱壳，又有图二十二，总得六十三图，虽不精工，但尚近真实，如南方的风车，北方的石碾，皆非亲见实物的人不能画得出来。

清康熙时敕绘《耕织图》，绘者焦秉贞乃是钦天监一小官，其画法据说有郎世宁的传授，郎系义大利人，自长于西洋画，焦所作则仍是中国画，但布置整齐，比例匀称，无文人画臃肿倒塌的神气，看去觉得细腻可喜，此虽是应制之作，却可算得这一类中的佳作了。

《耕织图》在很久以前看过，记的不很清楚了，但看《天工开物》，觉得有些乃是从此中脱胎，如簸扬一图，与焦氏作极相似，又砻与舂臼亦然，若取两者比较一下，即可知端的。在都市里的文化人要知道农家情状，最好自然是下乡去，其次是看图画，现代尚无好资料时，则此种旧书还不妨利用，比较的可靠。《天工开物》自序末云，“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此公文章与意思都有点乖僻，但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书，只是于功名之士没有关系而已。

□1950 年 3 月 18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收入《饭后随笔》

北京风俗图

陈师曾画《北京风俗图》三十四幅，在姚茫父处，每幅有茫父题词一阕，民国十六年由淳菁阁影印出版，大本两册，今淳菁阁早已关门，此书绝版久矣。顷从友人处借看一过，觉得很有意思。师曾为清季诗人散原老人的长子，曾留学日本，书画篆刻皆佳妙，在教育部任编审，后因侍父病，传染肠热症，遂以不起。

画师图风俗者不多见，师曾此卷，已极难得，其图皆漫画风，而笔能抒情，与浅率之作一览无馀的绝不相同。如送香火、执事夫、抬穷人、烤蕃薯、吹鼓手、丧门鼓等，都有一种悲哀气，若是用时式的话来说，道地写出民众的劳动生活，虽是尚在三十多年前，却已经颇有新时代的空气了。

此外又有几幅，写的很有趣味，如压轿嫲嫲，据程穆庵题诗注云：

北京风俗，凡遇婚事，必于亲友家择一寿考多福之妪，先乘花轿诣女家迎新妇，谓之压轿。右幅正扶持上轿之状，画者尤能毕尽其神态也。

又夫赶驴，茫父题词注云：

一妇骑驴抱子，声“得得”从者夫也，京东人上京多如此。

一幅本是茶馆说书，作者自题曰“墙有耳”，茫父词注云：

此原题也，画则二人窃听于门前，有招曰“雨前”。

茫父题词长短三十四阕，为切题面，遣词运典亦多佳处，惟我觉得未能与画面的空气恰合，今录其题“墙有耳”《浣溪沙》，以见一斑，词云：

啼笑犹能感路旁，闲来窃听话偏长，几人身后蔡中郎。

暂许属垣教悦耳，不烦钻穴待逾墙，茶前一样耐思量。

□1950 年 3 月 18 日刊《大报》，署名荣纪

□收入《饭后随笔》

艳史丛编

张次溪编印《清代梨园资料》，出过正续两编，所收材料的确不少。关于青楼的只有王紫诠的《艳史丛编》，出得很早，内容也不多，大概只有十种左右吧。丛刊固然便于翻检，但原本别有好处，究竟更为正确而且完全，至于有些不曾收录的，自然更是有价值了。

青楼资料我曾经搜集过好些，就中最好的仍旧要算余怀的《板桥杂记》与张际亮的《南浦秋波录》，不过这也是矮子队里的长子，其好处还是文章多而文献少的。固然六经皆史，就是那些矮子何尝无文献的价值，只是差得多，因为那是属于嫖客一方面的，可以说是乙类，例如他们如何享乐倚翠偎红，如何夸称艳福，都是士大夫的一面相，可是更有价值的文献该属于妓女方面的，这便算是甲类了。这甲类又可以有上下两部分，普通常见的多是甲下，即是妓女生活的表面部分为嫖客所见到的，在书中常有记录，但因为是通过小金边茶晶眼镜所看见的，还是士大夫的观点，有历史的科学的价值的资料，那就几乎没有什么。

二十年前曾见一册日本书，名曰《隐里考》，是研究妓院的，著者是一个医药博士，里面有一部分是关于妓女身价的研究，某年代卖身价若干至若干，又注明当时米价一石若干，以资比较。

这种材料不知是哪里得来的，中国书里总不曾见过。这种书本来应该一面是艳史一面也是痛史，在中国却仍不免终是片面的，于此亦可以见士大夫的势力之大了。

□1950 年 7 月 2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收入《饭后随笔》

天 京 录

卢冀野先生寄赠所著《天京录》一册，是《金陵秘笈》之一，木刻竹纸印，至为可喜。书有前年十二月自序，共三卷，分宫城建置，朝野逸闻，大事年表三项，记太平天国时南京旧事，极有历史价值，我们只作笔记看也很有意思。卷二云：“天京风俗人死不用棺殓，殓以棺者是为妖，谓死为升天，喜事也，不当哭。”升天云云本是基督教的话，无甚道理，唯葬不用棺一事极好，可惜不知道他们的葬法是怎样的。

中国的厚葬是封建的遗风，弊害很多，近见《山西文艺》中一篇《新文人周小发》，说因葬父向地主赊了一口价值十元的棺木，须终年给服役以代利息，等于长期为奴，亦其一例。蒋超伯笔记中集录六朝人遗令数篇，都主张薄葬，但仍用棺，唯前汉杨王孙遗令裸葬，明末李卓吾令用芦席垫盖，又宋时张角派信徒用白布袋盛尸，见于记载而已。太平天国虽有禁令，恐民间亦未通行。闻父老说余春生为书吏，“长毛”时颇见宠任，“小长毛”忌之，乘首领外出，令余枕门槛上而斫其颈，昏厥而未殊，首领归叹惋，命予以厚葬，乃从人家异大寿材来，顿放于地，一震而余苏，遂复活，唯自此头遂歪云。风俗之改革至不易，如要薄葬须由公家主办，有如管理秽土下水似的，简单的举行土葬和火葬，实在这也可以说是公用与卫生事业的一项呀。

□1950 年 7 月 26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收入《饭后随笔》

对相杂字

在前清末年，我看见过好些小书，名叫《对相杂字》，或《日用杂字》，木刻中本，大概每半叶两行，每行若干格，每格字画各占其半，如字曰白菜，便画作一颗白菜，所谓对相就是说文字与图像相对吧。这差不多是一种图解小字汇，有些厨房等人要上账的时候，可以翻翻，一定也得过不少的帮助。民国以来这种书不见了，市上有《看图识字》之类出现过一二，可是价格高了，或者实用上的用处也并没有那么大。我又见过一部名叫《河工器具图说》的旧书，是一个做过河道总督的人所编，把与治河有关的东西大大小小的都收在一起，图颇精工，说亦简要，我看过后也认识了好些特殊的器物。

现在归结起来说，这是不是可以应用到知识连环图画上来，也来出些这一类的图说呢？譬如说菜蔬，一页页的把萝卜白菜举出来，萝卜白菜中又有种种差别，罗列在一页中，或是各自分列，自可由编者酌定，总之这于增加我们的知识是很有效的。假如有关于菜蔬果品等的这样连环图画出版，我预定在先，一定要买一本。日前曾将此意供献于我们专家齐公，不知他怎样的批答。

□1950 年 10 月 29 日刊《亦报》，署名持光
□未收入自编文集

太平欢乐图

因了吴友如的画，自然就想起《太平欢乐图》来。现在只是一册石印小本，原本却是很讲究的，据说是乾隆中金德舆编了送给皇帝看的，由方兰坻作图，自太平萧以至年画，凡一百种职业。金方二人都是浙西人，所以可以看见百七十年前江浙民间的风俗一斑，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所可惜的这是“进呈御览”的东西，免不了有许多封建气，如各色行商人头戴大帽，身穿长衫，与事实太不相符，其着短衣或戴卷边毡帽的不到十分一二。

我自己还并不怎么馋痨，但不知怎的颇关心吃食的事，在这册图里略一检点，却发见卖点心的和卖水果的都只是各有八样，未免不满，大概实在也是行业太多，一百种包罗不下去的缘故。小时候最熟悉的馄饨担这里便没有，在《江南铁泪图》中，戏台下画出一担来，觉得很可喜，虽然精工不及此书中的元宵担。吴友如画中或者不少此类小装点，只可惜隔的日子太久，已经记不清楚了。现今上海马路边的摊贩花样大有变化，如有吴友如似的人描写起来，那么百十种也一定不成问题的吧。

□1951 年 1 月 22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朱收入自编文集

徐仲可的笔记

一

徐仲可是我佩服的老新党之一，他是蔡子民的乡试同年，有几分相像，而多写笔记，虽似琐碎，却诚实可喜，自成一种特色。他特别相信西医，又主张火葬，常常说及，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他的著作我曾有《天苏阁丛刊》一二集，《天足考略》等便收在一集里，二集里有《可言》好些卷，是他的笔记，此外的书都已忘记了。又有几册零本，不知是否三集，其中《大受堂札记》占大部分，内有一则关于戏曲的，我曾抄录下来，出于卷五，今载于此以见一斑。

“儿童臾妪皆有历史观念，于何征之，征之于吾家。光绪丙申居萧山，吾子新六方七龄，自塾归，老佣赵馀庆于灯下告以戏剧所演故事，如《三国志》《水浒传》等，新六闻之手舞足蹈。乙丑春居上海，孙大春八龄，女孙大庆九龄，大庚六龄，皆喜就杨媪王媪听谈话，所语亦戏剧中事。杨京兆人，谓之曰讲古今，王绍兴人，谓之曰说故事，三孙端坐倾听，乐以忘寝。珂于是知戏剧有启牖社会之力，未可以淫盗之事导人入于歧途，且又知力足以延保姆者之尤有益于儿童也。”

徐君的书都是用仿宋铅字，毛边纸印，在商务寄售，但在很早以前，都已绝板，我所看见过的也都是从旧书店得来的。

二

徐仲可的《大受堂札记》里只说得小孩们喜欢听讲故事，所谓儿童叟妪皆有历史观念这一点，不曾有什么证明。他的话实在是不错的。清初刘继庄曾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在鲁迅小说中出现过的运土，在民国初年更直接的说，现今官府禁止迎会做戏，叫我们更从哪里知道一点前朝的事情呢？

知识分子看小说听说书，只是一种娱乐与消遣，在小孩与人民即是儿童叟妪，却是学习，虽也是娱乐与消遣，他们未必一字一句的相信实情如此，但以为其中情节是事实，那总是的确的。证如长板坡、拦江夺阿斗、气死周瑜、泥马渡康王等，相信都是实在的事，他们看不到《蜀志》和《宋史》，怎么能怪他们，况且史书上不可靠的荒唐话本来也并不少呢。

问题是现在怎么来正当的满足他们这个需要，编印通俗的历史故事书是其一，而利用戏剧说书则是其二，却是更重要，因为这可以事半而功倍。我想这当多采用有意义的史实做题材，一面表彰祖国的可爱，民族的伟大，一面使民众得到悦乐，换句话说，尽可能的要真善美齐备，但要警戒的还是在反面，生怕偏于新奇，有害真实，因为这样便不是历史性的剧本，而只是浪漫主义的个人作品而已。

□1951 年 2 月 25—26 日刊《亦报》，署名鹤生
□收入《饭后随笔》

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是古诗文选本最通行的一种，百馀年来，风行全国；至“五四”以后，说它是“陋”书，似乎一时衰歇了。但平心说来，也还是足供参考的，所以近年又复印行。我看去年七月第四版，已经印行十六万册，以人口比例并不算多，但总是洋洋大观了。这选本的缺点不是没有，凡选本皆有缺点，他有一种主张，这里显明的具体的排列出来，容易有什么倾向。编这《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是前清乾隆时人，他的意见只是那时代的东西，与现代不能相合，那是当然的。他序言选择“脍炙人口”的诗，李杜的长篇，王孟的短什，的确是应有尽有了，要他客观的罗列唐诗历期的好处，初盛中晚四期各有它的特色，这未免强人所难，没有人能够做到。在没有这样一种理想的选本以前，姑且以此补充，也未始不是办法吧。

俗语有一句话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当时我颇疑心是有了这书以后的说话，但是看蘅塘退士的序文中已经引用此语，后边接下去云：“请以此编验之。”乃知书名反是从这里出来的。有许多人的确从这里知道诗的形式，而且开始仿作，所以这话是有几分道理。

但诗的格调并不限于“唐诗”，有些宋诗也是脍炙人口，可供参考。而宋人的诗另有意境，也有与唐人不同的地方，是很可贵的。从前看孙扩图的《一松斋集》，见随笔中有一则云：

> 南宋杨与立《幽居》诗：柴门阒寂少人过，尽日观书口自哦。馀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鸟往来多。溪头石磴坐盘桓，时见修鳞住复还。可是水深鱼极乐，不须妄意要垂竿。余谓有道之言，自尔可爱，唐人不肯作，殆亦不解作也。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不必硬来叫唐宋人比短长，但总之宋诗比唐诗又有一进境，便是可以发议论了。照王渔洋的说法，唐诗之佳在于有神韵，发议论便不韵了，不过这种过时的言论，现在并无拘泥之必要。我记得以前有过一部书，名叫《宋元明诗三百首》，不知系何人所编，似乎不妨找它出来一看，翻印一下，以补其缺，也不必要印几万，还是看这书值得印多少，便印多少可也。这对于学做旧体诗会有些好处，因为我看学做的诗与其说学唐人，还不如说是学宋人倒相像一点。

□1958 年 4 月 1 日刊《新民晚报》，署名十堂
□收入《木片集》

古文观止[①]

在“五四”时代，主张打倒封建礼教，造成一种破坏思想，对于古代文化，一笔抹煞。即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这种书，也并不平心估计，只因它从来风行，也看不起它，客气一点也贬称之曰“陋书”。其实仔细一想，我们得以获到一点常识，知道唐诗和古文的大略，何尝不是靠这两部“陋书”呢？当时谁也得不到《全唐诗》和《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还只好拿这简本来应用，藉此知道一个大概，便是日后能够得到那两部繁本，谁又有工夫真去细心的看呢。所以为常人设法，从古文学中汲取知识，唐诗看了《唐诗三百首》，古人看了《古文观止》，大体便已经够用了。

《唐诗三百首》现在已有陈婉俊补注本，覆刊行世，已可应用，唯《古文观止》还没有适用的本子。记得从前绍兴四有书局印行的一种，虽系有光纸铅印本，用的底本是平步青订本，是颇可信赖的一种本子。他每篇都根据原书，一一校正异同，有错误脱漏的地方都补正好了。这是很可凭信的了，以前说它是“陋”，也就不陋了，拿来看看，可以知道国文里散文的一个大略，也就不错。古人选本，从现代的眼光看去，不免有许多缺点，但在现今急切得不到更好的选本，没有更完善更全面的，那么利用古本中比较为世人所熟识的，也是不得已的事。四有书局本的铅印还是在民国十多年，去今尚不很远，所以印本不难找到，希望在杭州一带地方的人加以留意。⊙如能设法来从新印一下，那就比旧本要好得多了。

说到古文选本的缺点，我们这里不妨略谈一下。这也不只是《古文观止》一书的问题，其实就是《古文析义》或北方盛行的《古文释义》，都是有同样的毛病，就是中了“八大家”的毒。近代的更要不得的是“桐城派”，这乃是古文之八股化。唐宋八大家以韩愈为首魁，他的文章气势轩昂，声调铿锵，很适宜于考试、所以明朝人便以它为程式做八股文，于是选取同样的文章，共得八家，桐城派更加约取，吴闿生名之为“古文范”，几乎要篡取古文之名为八家所专有了。

《古文观止》出现在桐城立派之前，还没有这种谬见，其所选自史汉开始，这一部分比较的没有问题，所以更值得读，事实上《古文观止》的编者的意见也是尊重“八大家”的，不过因为唐代以前的文章没有经过“韩文公”的改造，还不大有什么“制义”气，所以较为纯粹罢了。所选唐宋以后的古文，特别是韩愈的著作，仍是八大家的观点，看时须加注意，以免不意的吃下八股调子去，譬如那篇有名的《送孟东野序》，用一个“鸣”字东拉西扯的诌上一大篇，自宋朝洪容斋起识者时有皆议，但是有名如故，直到今日。这就因为八股调与京戏一样，是中国人所喜欢听的缘故吧。

□1964 年 1 月 16 日刊香港《新晚报》，署名岂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①] 本文从开头到第二段记号⊙止，曾刊 1957 年 11 月 13 日《新民报晚刊》。

第三辑谈旧小说等

镜 花 缘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在二十年前已经故去了，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学做时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

我幼年时候所最喜欢的是《镜花缘》。林之洋的冒险，大家都是赏识的，但是我所爱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所以《山海经》《十洲记》《博物志》之类千馀年前的著作，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呵。《镜花缘》中飘海的一部分，就是这些分子的近代化，我想凡是能够理解荷马史诗《阿迭绥亚》的趣味的，当能赏识这荒唐的故事。

有人要说，这些荒唐的话即是诳话。我当然承认。但我要说明，以欺诈的目的而为不实之陈述者才算是可责，单纯的——为说诳而说的诳话，至少在艺术上面，没有是非之可言。向来大家都说小孩喜说诳话，是作贼的始基，现代的研究才知道并不如此。小孩的诳话大都是空想的表现，可以说是艺术的创造；他说我今天看见一条有角的红蛇，决不是想因此行诈得到什么利益，实在只是创作力的活动，用了平常的材料，组成特异的事物，以自娱乐。叙述自己想象的产物，与叙述现世的实生活是同一的真实，因为经验并不限于官能的一方面。我们要小孩诚实，但这当推广到使他并诚实于自己的空想。诳话的坏处在于欺蒙他人，单纯的诳话则只是欺蒙自己，他人也可以被其欺蒙——不过被欺蒙到梦幻的美里去，这当然不能算是什么坏处了。

王尔德有一篇对话，名 TheDecayofLying（《说诳的衰颓》），很叹息于艺术的堕落。《狱中记》译者的序论里把“Lying”译作“架空”，仿佛是忌避说诳这一个字，（日本也是如此，）其实有什么要紧。王尔德那里会有忌讳呢？他说文艺上所重要者是“讲美的而实际上又没有的事”，这就是说诳。但是他虽然这样说，实行上却还不及他的同乡丹绥尼：“这世界在歌者看来，是为了梦想者而造的”，正是极妙的赞语。科伦（P，Colum）在丹绥尼的《梦想者的故事》的序上说：

> 他正如这样的一个人，走到猎人的寓居里，说道，你们看这月亮很奇怪，我将告诉你，月亮是怎样做的，又为什么而做的。既然告诉他们月亮的事情之后，他又接续着讲在树林那边的奇异的都市，和在独角兽的角里的珍宝。倘若别人责他专讲梦想与空想给人听，他将回答说，我是在养活他们的惊异的精神，惊异在人是神圣的。
>
> 我们在他的著作里几乎不能发见一点社会的思想。但是，却有一个在那里，这便是一种对于减缩人们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对于凡俗的都市，对于商业的实利，对于从物质的组织所发生的文化之严厉的敌视。

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与在黄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梦想，虽然

她们的颜色不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她，但终究还回到她的怀中来。我们读王尔德的童话，赏识他种种好处，但是《幸福的王子》和《渔夫与其魂》里的叙述异景总要算是最美之一了。我对于《镜花缘》，因此很爱他那飘洋的记述。我也爱《呆子伊凡》或《麦加尔的梦》，然而我或者更幼稚地爱希腊神话。

记得《聊斋志异》卷头有一句诗道，“姑妄言之姑听之”，这是极妙的话。《西游记》、《封神传》以及别的荒唐的话（无聊的模拟除外），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不过这也是对于所谓受戒者（Thelnitiated）而言，不是一般的说法，更非所论于那些心思已入了牛角弯的人们。他们非用纪限仪显微镜来测看艺术，便对着画钟馗供香华灯烛；在他们看来，则《镜花缘》若不是可恶的妄语必是一部信史了。

□1923 年 3 月 31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关于何典[1]

半农兄：

昨日下午往访掌柜先生，适值《何典》出世，便讨了一本，一口气看了，觉得的是吴老爹之道统，颇有意思。张南庄的历史大可查考一下子，想上海县志中或当言之。你是说《何典》当是《常言道》之老师，现今看来似未必然，因张南庄系乾嘉时人，而《常言道》之序为嘉庆甲子（九年——一八〇四），据海上餐毒客《〈何典〉跋》似此书存稿至光绪始刊行。大约当时有这一种风气。以俗语编故事，张南庄在上海，《常言道》著者在苏州，（或此风盛于江浙，观缪莲仙之执《文章游戏》之牛耳可知，）同时有这两种。若论成绩则自然《何典》居上也。尊校有数处似不尽对，如一五二页黑漆大头鬼……骂海骂，你说“当缺一山字”，我想“骂海骂”当是一成语，只是胡骂，俗云“说海话”，即说大话。又四九页“淀清阳沟水”，上二字亦未必是“靛青”之误，大约是说澄（沉淀）过的水，绍兴语有“淀”字，读若丁去声，本字或即系沉淀之淀欤。又九十页“无数铜银子”，恐铜下亦无脱字。本文中有数处变了空格，觉得亦是缺点。阅了后，就所想到字此奉告，再会。六月六，弟之作。

□1926 年 6 月刊《语丝》第 85 期，署名“之作”
□未收入自编文集

[1] 见《语丝》刘半农《关于何典里方方方及其他》文中，题为编者所加。

聊斋鼓词六种序

回想小时候所读的书总有好些不能忘记的印象，其一就是蒲留仙的《聊斋志异》。最初读小说自然都是白话的，但到了《三国志演义》作一结束，一面便转到文言的小说里去，《聊斋志异》在次序上与价值上都是第一部，所以至今想起来还是很有兴趣。他是继承六朝的志怪与唐朝的传奇文而集大成的，不过在传奇文方面他是的确成功了，志怪的短篇了无特色，不及《阅微草堂》远甚，在《聊斋》中只可以说是失败之作。传奇文中我觉得《婴宁》一类的东西做得最好，《促织》与《罗刹海市》等倒还在其次。他写狐鬼和人一个样子，除了说明她们本相的地方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妖气，我想在青年读者羡慕之馀，以为狐鬼亦佳者当复不少，所以他这实在是狐鬼的人化，俗传此书本名《狐鬼传》，专以讽刺人间者，未免是齐东野人之语了。我又记得题词中有这两句：“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我很喜欢这种态度，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不汲汲于功利，但也不是对于人事完全冷淡，只是适中地冷静处之罢了。

今年秋天淄川马君以抄本见示，我才知道蒲留仙还著有这些鼓词。现在所见者只有六篇，据说还有几种一时找不到，所以没有收入，但即此六篇也尽够表明蒲君的这方面的好成绩了。

说起鼓词，我们第一要想到《万古愁》和《木皮鼓词》这两种名文。《万古愁》无论是归玄恭或熊燮庵所作，——我看归君《诛邪鬼》那种口气，觉得曲中有些话不是他所能说，虽然我也并不能断定作者即为熊君，——《木皮鼓词》则有云亭山人等人题记知为贾凫西的文章，总之都是“改革时人”就是明朝的遗老，故“以神工鬼斧之笔，掊苦恨牢骚之意”，二百馀年后犹令读者感动不能自已，此固由革命时代的意气与宋明遗民易于共鸣，但文字的美妙盖亦有很大的力量。聊斋的作品上虽因时世关系缺少那些遗老气，但是文词圆润，诙谐轻妙，依然是木皮正统，其中《东郭外传》一篇与“大师挚适齐”全章正堪媲美，而丰富流畅似尤过之。醉溪道人读《木皮词》，“不禁撮舌惊叹曰，鲁何奇士之多也！”我们正有同感。大约明末曾流行这种文字，因系一种新兴的文学，照例有些弹力与生气，可以用了活泼自由的言词，表现滑稽清新的趣味，激昂诚实的感情，所以用作那些悲愤文章正是恰好。聊斋那时不能再做遗老了，他就以那种豆棚瓜架的态度来应付，做出别一类的东西来，比从前要更近于文艺的，虽然较少了一点儿社会的意义。郑板桥、徐洄溪等的道情我想也就是这个流派的馀风，不过已有成了强弩之末的形势。到了复古运兴，一面朴学固然奏了大功，一面文学却受了巨创，清真雅正的文诗再走半步即是腐化，文艺界成为反动的，而此公安派潮流中的一小波澜也就在那时完全被复古的洪水所冲没了。

现在马君找到这鼓词，设法发表出来，可以供给文学史的资料，又可以作文学作品读，原是极好的事，而且这又正是我们所熟识的《聊斋志异》作者的作品，更使我们感到兴趣。此外还有一种得陇望蜀的要求，便是希望马君将来能够访求到所散失的那三篇著作，或是别位有这类东西编订刊行，以供大家欣赏。

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北平市。

□1928 年作，1929 年刊“ 北新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苦茶庵笑话选序

查笑话古已有之，后来不知怎地忽为士大夫所看不起，不复见著录，意者其在道学与八股兴起之时乎。幼时读圣经贤传，见孟子述宋人揠苗助长芒芒然归情状，不禁微笑，孔夫子说其父攘羊其子证之，至今尚有如此笑话，若韩非子所录种种宋人故事，简直是后来呆女婿的流亚了。《隋经籍志》中著录魏邯郸淳的《笑林》三卷，至唐有侯白的《启颜录》等，宋初所编类书中尚多引用，但宋朝这类的著作便很少，虽然别方面俗文学正逐渐生长，笑话在文学的地位却似乎没落下去了。明朝中间王学与禅宗得势之后，思想解放影响及于文艺，冯梦龙编《笑府》十三卷，笑话差不多又得附小说戏曲的末座了，然而三月十九天翻地覆，胡人即位，圣道复兴，李卓吾与公安竟陵悉为禁书，墨憨斋之名亦埋没灰土下，《笑府》死而复活为《笑林广记》，永列为下等书，不为读书人所齿，以至今日。其实，这是很不公道的，笑话自有其用处，显明可数。其一，说理论事，空言无补，举例以明，和以调笑，则自然解颐，心悦意服，古人多有取之者，比于寓言。其二，群居会饮，说鬼谈天，诙谐小话亦其一种，可以破闷，可以解忧，至今能说笑话者犹得与弹琵琶唱小曲同例，免于罚酒焉。其三，当作文学看，这是故事之一，是滑稽小说的根芽，也或是其枝叶，研究与赏鉴者均可于此取资，唯中国滑稽小说不知为何独不发达，笑话遂有孤苦伶仃之感耳。其四，与歌谣故事谚语相同，笑话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而尤为直截彻透，此正是民俗学中第三类的好资料也。如小脚的嗜好，固为社会上明白的事实，诗文歌谣弹词戏剧随处致其赞美，再看笑话中《脚像观音》及《逐段烘》诸条，则美刺具备，而男子们对于小脚之感情乃大明瞭矣。又如《换灰》（此本未录）《卖粪》，具见南方民间风俗之一斑，此种小事从来文人学士素不屑记，除了贾思勰郝懿行这几位，但这都是北方学者，编笑话者多系南人，大抵缺少这种朴实的学风，而无意中却在这里保留下好些风俗琐事，大是可喜的事。石天基记录过一则笑话，说儿子割了别人的股去行孝，这一面是《二十四孝》提倡的一个反影，一面又何尝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真，忠实地写下来只略略地滑稽化而已。我们自国难以来，这两年里所见所闻，像这“割股”的事情岂不亦已多乎？这种的笑话是先民的脉案，然而到现在还可应用，皮鞭打出去，鞭梢还回到自己的脊梁上来，笑话也而有苦辣的讽刺小说的风味，此又其别有意义的用处之一也。但是，我的意思还是重在当作民俗学的资料，兹先选抄明清文人所编者为一集，如能更往民间从老百姓口头录下现时通行笑话为第二集，则其价值当更大矣。

笑话的内容，根据《笑林广记》的分类，有十二类，即一古艳（官职科名等），二腐流，三术业，四形体，五殊禀（痴呆善忘等），六闺风，七世讳（帮闲娼优等），八僧道，九贪吝，十贫窭，十一讥刺，十二谬误，是也。总合起来又可以简单地分做挖苦与猥亵两大类，二者之间固然常有相混的地方，但是猥亵的力量很大，而且引人发笑的缘故又与别的显然不同，如挖苦呆女婿的故事，以两性关系为材料，则听者之笑不在其呆而在猥亵、如《戳破肚皮》（见《笑府》，此本未录）等例可见，即均属此类，故猥亵的笑话为数殆极多。所谓挖苦者指以愚蠢残废谬误失败为材料的皆是，此类性质不一，有极幼稚简单者，亦有较复杂者。大抵人情恶常而喜变，对于违反习俗改变常态的事物言动多感兴趣，此在儿童最为明显，故“张貌”则笑，见爹

爹戴宝宝的帽或宝宝戴爹爹的帽亦均可笑，而贾波林在银幕上且以此艺术倾倒一世，可谓伟矣。其次则幸灾乐祸，虽是人之大病，然而此种机微的表现在凡人都不能免，听了人家的愚蠢谬误，能够辨别，显出智力的优胜，见了别人的残废失败，反映出自己的幸运，这大抵是使人喜乐的原因，或者也可以作精神的体操之一助罢？十年前我记录《徐文长的故事》数则，说明中曾云，“从道德方面讲，这故事里的确含有好些不可为训的分子，然而我们要知道，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这只要检查中外的童话传说就可以知道。”这几句话借了来又可以当作别一部分的说明。至于猥亵的分子在笑话里自有其特殊的意义，与上面所说的颇有不同。——的确，猥亵的事物在各色社会上都是禁制的，它的突然的出现原也是一种违反习俗改变常态的事，与反穿大皮鞋或酒糟鼻子有些相像，不过它另有一种无敌的刺激力，便是引起人生最强大的大欲，促其进行，不过并未抵于实现而以一笑了事，此所以成为笑话而又与别的有殊者也。这个现象略与呵痒相似，据蔼理斯说，呵痒原与性的悦乐相近，容易引起兴奋，但因生活上种种的障碍，不能容许性的不时的发泄，一面遂起阻隔，牴牾之后阻隔随去，而馀剩的力乃发散为笑乐，其实悦乐在笑先，笑则不复乐也。英国格莱格（J.Y.T.Greig）在所著《笑与喜剧的心理》第五章论两性的猥亵的（男女关系事物）不雅的（两便事物）篇中曾说，“在野蛮民族及各国缺少教育的人民中间猥亵的笑话非常通行，其第一理由是容易说。只消一二暗示的字句，不意地说出，便会使得那些耕田的少年和挤牛奶的女郎都格格的笑，一种猥亵的姿势使得音乐堂里充满了笑声。其第二个更为重要的理由则是有力量，猥亵的笑话比别种的对于性欲更有强烈的刺激力。”由此看来，我们对于这类笑话的横行可以得到谅解，但是其本相亦随明瞭，短长显然可知，翻开各笑话书即见此类叠出不穷，而选择安排到恰好处，可入著作之林者，盖极不易得，即为此故。其表示刻露者，在民俗资料上多极有价值，今惜未能选入，但可取其稍稍尔雅者耳。猥亵歌谣故事与猥亵语之搜集工作亦甚切要，今日国风乃趋于浮薄与苛酷两端，如何可言，即云且待将来，亦不知此将来将在何日或毕竟有否也。

闲话少说。且说不佞今所集录笑话，凡三种，皆明末清初原本，一为《笑府》，二为《笑倒》，《山中一夕话》本，三为《笑得好》，《传家宝》一二集本。我的意思是想使笑话在文艺及民俗学上稍回复他的一点地位，故有三种计划，一辑录古书中的笑话，二搜集民间的笑话，三选取现存的笑话书。第一种考古的工作非我现在所能担任，第二种事业虽更繁重我却愿意投效，不过成功须在将来，到那时再说，目下所做的便是那第三种的玩意儿了。说到现存的笑话书，范围很大，分量也当不小，要求完备当然是不可能，此外还有一个限制，便是尽先取用有编者姓名的，结果是决定了这三种书，而《笑林广记》以至《一见哈哈笑》之流也就只能暂请落第了。

《笑府》原本十三卷，题墨憨斋主人撰。墨憨斋是冯梦龙的公开的笔名，他用这别号所编著的戏曲小说等书甚多，其地位盖在李卓吾金圣叹之间，是明季纯文学界的主帅之一人。他所编《古今谈概》集史传笑谈之大成，至清初为人删改，名《古今笑》或《古笑史》，有李笠翁的序文，《笑府》则纯系假作，以讥笑为目的，二者的异同正犹传说之与童话焉。《笑府》后改编为《笑林广记》，原本遂不传，今所知者唯大连满铁图书馆云有一部，亦未

得见，今但以日本刻选本二种为依据，其一有二卷，一只一卷，题风来山人删译。风来山人为十八世纪日本天才作家，译虽未知真伪，但其声名正足与墨憨抗衡，故书坊遂取用之亦未可知。二本内容多不同，今参酌抄录，猥亵类有太甚者不得已暂从舍割，原有序文，今录于下，亦妙文也。文曰：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代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耳。后之话今，亦犹今之话昔，话之而疑之，可笑也，话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十三篇犹云薄乎云尔。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墨憨斋主人题。

说到这里，不禁联想起《开卷一笑》卷七的一篇布袋和尚的《呵呵令》来了，不嫌繁冗，把全文录在下面，因为很有点儿意义，而且原书也不易见。文曰：

你道我终日里笑呵呵，笑着的是谁？我也不笑那过去的枯髅，我也不笑那眼前的蝼蚁。第一笑那牛头的伏羲，你画什么卦，惹是招非，把一个囫囵囵的太极儿弄得粉花碎。我笑那吃草的神农，你尝什么药，无事寻事，把那千万般病根儿都提起。我笑那尧与舜，你让天子，我笑那汤与武，你夺天子，你道是没有个旁人儿觑，觑破了这意思儿也不过是个十字街头小经纪。还有什么龙逢比干伊和吕，也有什么巢父许由夷与齐，只这般唧唧哝哝的，我也哪里工夫笑着你。我笑那李老聘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去打木鱼，弄些儿穷活计，哪曾有什么青牛的道理，白牛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达摩老臊胡来，把这些干屎橛的渣儿，嚼了又嚼，洗了又洗。又笑那孔子的老头儿，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又笑那张道陵许旌阳，你便白日升天也成何济，只这些未了精精儿到底来也只是一个冤苦的鬼。住住住！还有一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戴着平天冠，穿着衮龙袍，这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且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着什么来由干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去去去！这一笑笑得那天也愁，地也愁，人也愁，鬼也愁，三世佛也愁，那管他灯笼儿缺了半边的嘴。呵呵呵！这一笑，这一笑，你道是毕竟的笑着谁？罢罢罢！说明了，我也不笑那张三李四，我也不笑那七东八西，呀，笑杀了他的咱，却原来就是我的你。

这末了几句就是墨憨斋所师法的地方罢，上头对于两仪列圣的不敬其实也从此出，不但此也，即那归玄恭或熊鱼山所作的有名的《万古愁》曲其格调意思与《呵呵令》很多相像，我们不好说布袋和尚一定是这群人的老师，但至少总可以见那时文坛上有这么一种空气，而《万古愁》这种作法也不是作者一人的创始，这是很明了的事实了。

《开卷一笑》有日本宝历五年（西历一七五五）翻刻第二卷本，巢庵主人小序中云，《开卷一笑》明李卓吾所辑，屠赤水亦加参阅，后人删补改曰《山中一夕话》，上集下集各有七卷，上集专集词赋传记，下集多出笑言嘲

咏。北京大学藏有一部，有老田海内氏家藏图书印，盖亦系从海外传来，原刻上集七卷，序目皆改称《一夕话》，而板心均仍作《开卷一笑》，卷首署“卓吾先生编次”。第三卷尚留存“一衲道人屠隆参阅”一行字样，馀悉挖改矣。下集原刻未见，今通行《山中一夕话》盖即其改刻本、其中有《笑倒》一卷，皆录笑话，今便据以选录。全书上有序，为“咄咄夫”所作，文亦佳妙，今并抄之于下：

莫怪一夕间有许多饶舌也。古今一旦暮尔，孩髦一梦觉尔，窃闻尧舜中天方属正午，不知今夕何夕，曾交未申时不？嗟乎哉，苍苍者天，茫茫者地，即不幻出无数皮囊，亦觉饶有别趣，何苦板板捏住轮回，夺头诱人于生生死死之中，复诱人于不生不死之地哉。因悟天地无人殊大寂寞，定不可少此万亿陪堂，演此一本大戏文来也。咄咄夫不知何许人，亦不知生旦净丑中哪脚色，更不知演到第几出将半本未？一夕思烦神躁，忽欲邀天地于几案而问答之，而又苦声臭都无，不可理会，因大呼曰，天何言哉，夕死可矣。于是从无可消遣中觅一消遣法，唯有对快士作快谈，代为天地设一传宣官而已。因与口先锋约曰，今夕大闷，赖尔能颐我，原为天地轮回，今且欲轮回天地也。话须冲破斗牛，慎勿效俗儒喋喋，不令人点首勿话，不令人拍案勿话，不令人忽笑忽哭，不令人忽欲手舞足蹈勿话，如有听之欲卧者皆汝罪，若不话宁但作咄咄声，闷气犹得从此处发泄也。爱集十种话，聊破一夕颜，若以为胜十年读书也则吾岂敢。时戊戌春正月望日，咄咄夫题于半庵。

《笑倒》为十种之四，上面有一篇小引，其文曰：

大地一笑场也，装鬼脸，跳猴圈，乔腔种种，丑状般般。我欲大恸一番，既不欲浪掷此闲眼泪，我欲埋愁到底，又不忍锁杀此瘦眉尖。客曰，闻有买笑征愁法，子易效之？予曰，唯唯。然则笑倒乎，哭倒也。集《笑倒》。

《笑倒》和《笑府》的序态度颇有点相近，都是发牢骚，借了笑话去嘲弄世间，但是到了《笑得好》便很不相同，笑话还是笑话，却是拿去劝善惩恶，有点像寓言了。《笑得好》一卷，二集一卷，首有自序，说明用意，而文殊不佳，今姑录存于下：

人性皆善，要知世无不好之人，其人之不好者总由物欲昏蔽，俗习熏陶，染成痼疾，医药难痊，墨子之悲深可痛也。即有贤者，虽以嘉言法语，大声疾呼，奈何迷而不悟，岂独不警于心，更且不入于耳，此则言如不言，彼则听如不听，真堪浩叹哉。正言闻之欲睡，笑话听之恐后，今人之恒情，夫既以正言训之而不听，曷若以笑话怵之之为得乎。予乃著笑话书一部，评列警醒，今读者凡有过愆偏私矇昧贪痴之种种，闻予之笑，悉皆惭愧悔改，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因以‘笑得好’三字名其书。或有怪予立意虽佳但语甚刻毒，令闻者难当，未免破笑成怒，大非圣言含蕴之比，岂不以美意而种恨因乎？予谓沉疴痼疾非用猛药何能起死回生，若听予之笑，不自悔改而反生怒恨者，是病已垂危，医进良药，尚迟疑不服，转咎药性之猛烈，思欲体健身安，何可得哉？但愿听笑者入耳警心，则人性之天良顿复，遍地无不好之人，方知刻毒语言有功于世者不小，全要闻笑即愧即悔，是即学好之人也。石成金天基撰。

用笑话作教训，说得古一点，这倒是孔孟的传统罢，不过物以希为贵，古人偶一为之，后世又当作古逸笑话的吉光片羽，所以很有意思，若是整本

的去做，就难免是笨伯了。而且顶奇怪的是在这道学派的笑话集中特别多那些极不堪的故事，有些简直除猥亵外别无什么可取，附加的教训自然全是胡扯，在这里我想那编者的态度实在也同普通说猥亵话的一样，教训只是一种掩饰，向来标榜名教而写淫书的人便多是如此，《野叟曝言》著者夏二铭即其一例。但平心论之，石天基《传家宝》四集的宗旨大都是教人苟全性命于治世而已，卫道气还不十足，其编集笑话虽内容芜秽，也还肯用真姓名，这是还可取的一点罢。

中国现时似乎盛行“幽默”，这不是什么吉兆。帝俄时代一个文人说，讽刺是奴隶的言语，这话很有意思。乡民相遇，说某人“伽蓝菩”了，虽与当铺钱店的伙计酒醉饭饱将头比屁股为戏仿佛相似，实际却有一个暗黑的背景。让人民去谈论，发泄他们的鸟气，无论是真的苦痛或是假的牢骚，这倒是一种太平气象罢。在此刻来编集笑话，似乎正赶上幽默的流行，有点儿近于趋时，然而不然，我没有幽默，不想说笑话，只是想听人家说的笑话，虽然听笑话在笑话里也要被嘲笑。我现在找几种编者署名的笑话书，再由我署名编选为一集，当作俗文学及民俗资料的一种，将来如能找到原刊《笑府》和《开卷一笑》下集加以补正，那便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中华民国廿二年七月廿七日，周作人记于北平。

□1933 年 9 月刊《青年界》4 卷 2 号，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潮州七贤故事集序

林培庐君辑《潮州七贤故事集》，来信索序。这我当然乐意做的，只是照例难免拖延，一直拖到书已将印成了，见到林君的催信，才急忙拿起笔来写，空虚之上加以仓卒，其写得不行当然是意中事了。

《七贤故事集》的校样承林君寄给我一份，好好地读了一遍。这是传说类的名人故事，但其内容与童话自多共通，又因这种轶事大抵以游戏玩弄为主，自然更近于笑话，如平常所说的徐文长也是如此。明末墨憨斋编《古今谭概》，清初竹笑居士删订为《古笑史》，又编《笑府》，后游戏主人改编为《笑林广记》，是很好的例。《谭概》本来都是“古笑史”，其特色是在笑话上规定了时地人，《笑府》却是泛指的，他的脚色是塾师聋子之类而不是张龙赵虎，这便是童话而不是传说了。但是这些故事有地方与笑话颇有差别，笑话的重心是他人的愚蠢和失败，虽然读者的愉快出于自己的优胜感这一点似乎原是一样。其实也是无害的消遣，在这点上却容易受到非难，无论是故事或笑话。我在《徐文长的故事》的说明里曾说过这几句话：从道德方面讲，这故事里的确含有好些不可为训的分子，然而我们要知道，老百姓的思想还有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这只要检查中外的童话传说就知道。现在我们又不把这些故事拿去当经书念，要找出天经地义的人生训来，那么我们正可不必十分去认真了。

七贤故事是地方名人传说，这又是很有趣味的一点，他们都是文人，也都是官，官固然不尽是文人出身，但文人的顶高的出路是官，那是五百年来的定理了。故事里的名人或英雄大抵有两种。一是官，一是文人，前者如包龙图海瑞彭宫保，后者如罗隐秀才解学士徐文长，至于聪明的白衣——例如后世社会上很有势力的流氓，则不大有份。这或者因为在科举制度下的社会里起码非秀才不能有势力，或者也因为那时流氓便由秀才们兼做去的缘故罢。总之这一点里与西洋很有不同，假如不把主教来当作官，教徒与武士当作文武秀才看。七贤是本地人，他们在故事里的地位所以并不是官，可以像彭宫保那样地有许多作为，但只是一位乡绅，那么也就归入文人队中，跟了徐文长去活动活动罢了。徐文长一派自罗隐秀才以来便不大阔气，只有解学士算是有一官半职，如今前后七贤都是不很小的官儿，真可以说是同路人中最有光荣的了。记得容元胎君序中说及因此可以考见中国人民尊重官和科名的心理的一斑，我觉得这也说得很有道理。这种心理是全国的，或者说是全文化的亦无不可，因为在朝鲜安南恐怕也逃不了这影响。其次，这些故事多是流动的，流传在各处，集合在一个箭垛上，便成了传说，散出来又是种种的童话或笑话。因为如此，七贤的地方传说颇缺少地方色彩，大抵与罗解徐诸前辈的言行同一轨范，故其地位不重在地方文艺上，但以国民传说的研究资料论，则自有其真价值也。

中国民俗学的运动渐渐发达，特别在广东浙江两省，因了钟敬文娄子匡林培庐诸同志的努力，有好些研究机关与刊物，这是很可乐观的事。研究的初步重在搜集资料，中国地大物博，这种工作也就颇烦重，不是现今少数同志所能办好，在这样困难之下却总能有那些成绩，风俗和歌谣故事方面有了不少记录，不能不说是很好的成绩了。但是资料搜集固然多多益善，而搜集的得法不得法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最要注意的是其记录的方法。我们现

在只就故事来讲，搜集故事的缺点是容易把它文艺化了，它本来是民间文学，搜集者又多是有文学兴趣的，所以往往不用科学的纪录而用了文艺的描写，不知不觉中失了原来的色相，这当做个人的作品固有可取，但是民俗学资料的价值反未免因而减少了。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件，所以记录故事也当同歌谣一样，最好是照原样逐字抄录，如不可能则用翻译法以国语述之，再其次则节录梗概，也只可节而不可改，未后二法已是搜集故事者的特许自由，为搜集歌谣者所不能援引者也。大凡愈用科学的记录方法，愈能保存故事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资料之价值，这本是极普通的话，因为偶然想到，便蛇足地写在这里了。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于北平苦雨斋。

□1933 年作，1934 年刊，“ 天马 ”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墨憨斋编山歌

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后来埋没了，现在却应当记忆的，一是唱经堂金圣叹，二是墨憨斋冯梦龙，——此外还有湖上笠翁，现在且按下不表。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心史丛刊》中有一篇考，说得颇详细。佩服圣叹的人后世多有，但我想还应以清初的刘继庄与廖柴舟为代表。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有一篇《金圣叹先生传》，圣叹死后三十五年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云。传未论断曰：

“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又曰：

“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柴舟对于圣叹极致倾倒，至于原因则在其能揭发“文章秘妙”，有功后学。刘继庄著《广阳杂记》五卷，有两处说及圣叹。卷三讲到潘良耜的《南华会解》，以内七篇为宗，外篇杂篇各以类从分附七篇之后，云：

> 后游吴门，见金圣叹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删去《让王》《渔父》《盗跖》《说剑》四篇，而置《天下》篇于后。予尝问金释弓曰，曾见潘本《会解》否？释弓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则圣叹当时印可此书可知。

卷四说蜀中山水之奇，“自幼熟读杜诗，若不入蜀，便成唐丧”，后云：

“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有诗云，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馀生得到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想先生亦是杜诗在八识田中作怪，故现此境，不然先生从未到成都，何以无端忽有此想耶。”全谢山为继庄作传，末有附识两则，其二曰：

> 继庄之才极矣，顾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极许可金圣叹，故吴人不甚知继庄，间有知之者则以继庄与圣叹并称，又咄咄怪事也。圣叹小才耳，学无根柢，继庄何所取而许可之，乃以万季野尚有来满而心折于圣叹，则吾无以知之。然继庄终非圣叹一流，吾不得不为别白也。

谢山虽有学问却少见识，故大惊小怪，其实这一个大不可解很易解，《广阳杂记》卷二有此两则云：

>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
> 余尝与韩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图老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宜严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复数千言，图麟拊掌掀髯，叹未曾有。彼时只及戏文小说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为《易》《礼》之原，则六经之作果非徒尔已也。

茅塞儒者之心盖已久矣，此段道理本甚平实的确，然而无人能懂，便是谢山似亦不解，当时盖唯继庄圣叹能知之耳。圣叹评《离骚》《南华》《史记》《杜诗》《西厢》《水浒》，以次序定为“六才子”，此外又取《易》《左

传》等一律评之，在圣叹眼中六经与戏文小说原无差别，不过他不注重转移世界的问题而以文章秘妙为主，这一点是他们的不同而已。说到这里，冯梦龙当然也是他们的同志，他的倾向与圣叹相近，但他又不重在评点，而其活动的范围比圣叹也更为博大。说也奇怪，圣叹著述有流传而梦龙简直不大有人知道，吾友马隅卿先生搜集梦龙著作最多，研究最深，为辑《墨憨斋遗稿》，容肇祖先生曾撰论考发表，始渐见知于世。墨憨斋在文学上的功绩多在其所撰或所编的小说戏文上，此点与圣叹相同，唯量多而质稍不逮，可以雄长当时而未足津逮后世，若与圣叹较盖不能不坐第二把交椅了，但在另一方面别有发展，即戏文小说以外的别种俗文学的编选，确是自具手眼，有胆识，可谓难能矣。梦龙集史传中笑谈，编为《古今谭概》，又集史传中各种智计，编为《智囊》正续两编，此外复编《笑府》十三卷，则全系民间笑话也。今《谭概》尚可见到，后人改编为《古笑史》，有李笠翁序，亦不难得，《智囊》稍希见，而《智囊补》则店头多有，且此种类似的书亦不少，如《智品》《遣愁集》皆是，唯《笑府》乃绝不可见，闻大连图书馆有一部，又今秋往东京在内阁文库亦曾一见而已。《笑府》有墨憨斋主人序曰：

>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后之话今，亦犹今之话昔，话之而疑之，可笑也，话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经书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十三篇犹云薄乎云尔。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

《笑府》所收笑话多极粗俗，与《笑林广记》里的相似，《广记》盖即根据《笑府》而改编者，但编者已不署名，到了后来再改为《一见哈哈笑》等，那就更不行了。笑话在中国古代地位本来不低，孔孟以及诸子都拿来利用过，唐宋时也还有人编过这种书，大约自道学与八股兴盛以后这就被驱逐出文学的境外，直到明季才又跟了新文学新思想的运动而复活过来，墨憨斋的正式编刊《笑府》，使笑话再占俗文学的一个坐位，正是极有意义的事。与这件事同样的有意义的，便是他的编刊《山歌》了。《山歌》一书未曾有人说起，近为吾乡朱君所得，始得一读，书凡十卷，大抵皆吴中俗歌，末一卷为《桐城时兴歌》，有序曰：

>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令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儿》而次及《山歌》。

案原书总题《童痴二弄》，然则其中应包含《挂枝儿》与《山歌》两种，今《挂枝儿》已佚，仅存其《山歌》这一部分耳。序中所言与刘继庄谓好唱

歌为性天中之《诗》同一道理，继庄在《广阳杂记》卷四中又有一节，可以参证：

> 旧春上元在衡山县，曾卧听采茶歌，赏其音调而于辞句懵如也。今又在衡山，于其土音虽不尽解，然十可三四领其意义，因之而叹古今相去不甚远，村妇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国之章法，顾左右无与言者，浩叹而止。

袁中郎《锦帆集》卷二《小修诗序》中亦云：

>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倘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此种意义盖当时人多能言之，唯言之不难，实行乃为难耳。墨憨斋编刊《童痴二弄》，所以可说是难能可贵，有见识，有魄力，或者这也是明末风气，如袁中郎在《觞政》中举《金瓶梅》为必读书，无人见怪，亦未可知，但总之此类署名编刊的书别无发见，则此名誉仍不得不归之墨憨斋主人也。

《山歌》十卷中所收的全是民间俗歌，虽然长短略有不同，这在俗文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上是极有价值的。中国歌谣研究的历史还不到二十年，搜集资料常有已经晚了之惧，前代不曾有一总集遗传下来，甚是恨事，现在得到这部天崇时代的民歌集，真是望外之喜了。还有一层，文人录存民歌，往往要加以笔削，以至形骸徒存，面目全非，亦是歌谣一劫，这部《山歌》却无这种情形，能够保存本来面目，更可贵重，至于有些意境文句，原来受的是读书人的影响，自然混入，就是在现存俗歌中也是常有，与修改者不同，别无关系。从前有人介绍过《白雪遗音》，其价值或可与《山歌》比，惜只选刊其一部分，未见全书，今朱君能将《山歌》复印行世，其有益于学艺界甚非浅鲜矣。关于冯梦龙与《山歌》的价值，有马隅卿顾颉刚两先生之序论在，我只能拉杂写此一篇，以充跋文之数而已。

中华民国念三年十一月念四日，识于北平苦茶庵。

□1934 年作，1935 年刊“ 北新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茶随笔》

刘香女[1]

离开故乡以后，有十八年不曾回去，一切想必已经大有改变了吧。据说石板路都改了马路，店门往后退缩，因为后门临河，只有缩而无可退，所以有些店面很扁而浅，柜台之后刚容得下一个伙计站立。这倒是很好玩的一种风景，独自想象觉得有点滑稽，或者檐前也多装着蹩脚的广播收音机，吱吱喳喳地发出非人间的怪声吧。不过城郭虽非，人民犹是，莫说一二十年，就是再加上十倍，恐怕也难变化那里的种种琐屑的悲剧与喜剧。

木下■太郎诗集《食后之歌》里有一篇《石竹花》，民国十年曾译了出来，收在《陀螺》里，其词云：

走到薄暮的海边，
唱着二上节的时候，
龙钟的盲人跟着说道，
古时人们也这样的唱也！
那么古时也同今日没有变化的
人心的苦辛，怀慕与悲哀。
海边的石墙上，
淡红的石竹花开着了。

近日承友人的好意，寄给我几张《绍兴新闻》看。打开六月十二日的一张来看时，不禁小小的吃一惊，因为上面记着一个少女投井的悲剧。大意云：

城东镇鱼化桥直街陈东海女陈莲香，现年十八岁，以前曾在城南狮子林之南门小学读书，天资聪颖，勤学不倦，唯不久辍学家居，闲处无俚，辄以小说如《三国志》等作为消遣，而尤以《刘香女》一书更百看不倦，其思想因亦为转移。民国二十年间由家长作主许字于严某，素在上海为外国铜匠，莲香对此婚事原表示不满，唯以屈于严命，亦无可如何耳，然因此态度益趋消极，在家常时茹素嗪经，已四载于兹。最近闻男家定于阴历十月间迎娶，更觉抑郁，乃于十一日上午潜行写就遗书一通，即赴后园，移开井栏，跃入井中自杀。当赴水前即将其所穿之黑色哔叽鞋脱下，搁于井旁之树枝上，遗书则置于鞋内。书中有云，不愿嫁夫，得能清祸了事，则反对婚姻似为其自杀之主因，遗书中又有今生不能报父母辛劳，只得来生犬马图报之语，至于该遗书原文已由其外祖父任文海携赴东关，坚不愿发表全文云。

这种社会新闻恐怕是很普通的，为什么我看了吃惊的呢？我说小小的，乃是客气的说法，实在却并不小。因为我记起四十年前的旧事来，在故乡邻家里就见过这样的少女，拒绝结婚，茹素诵经，抑郁早卒，而其所信受爱读的也即是《刘香宝卷》。小时候听宣卷，多在这屠家门外，她的老母是发起的会首。此外也见过些灰色的女人，其悲剧的显晦大小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暗淡阴沉，都抱着一种小乘的佛教人生观，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此种灰色的印象留得很深，虽然为时光所掩盖，不大显现出来了，这回忽然又复遇见，数十年时间恍如一瞬，不禁愕然，有别一意义的今昔之感。此数十年中有甲午戊戌庚子辛亥诸大事，民国以来花样更多，少信的人虽不敢附和谓天国近了，大时代即在明日，也总觉得多少有些改变，聊可慰安，本亦

[1] 《宇宙风》题作《女子的去路》。

人情，而此区区一小事乃即揭穿此类乐观之虚空者也。

北平未闻有宣卷，宝卷亦遂不易得。凑巧在相识的一家旧书店里见有几种宝卷，《刘香女》亦在其中，便急忙去拿了来，价颇不廉，盖以希为贵欤。书凡两卷，末叶云，同治九年十一月吉日晓庵氏等敬刊，板存上海城隍庙内翼化堂善书局，首叶刻蟠龙位牌，上书“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四句，与普通佛书相似。全部百二十五叶，每半叶九行十八字，共计三万馀言，疏行大字，便于诵读，唯流通甚多，故稍后印便有漫漶处，书本亦不阔大，与幼时所见不同，书面题辛亥十月，可以知购置年月。完全的书名为《太华山紫金镇两世修行刘香宝卷》，叙湘州李百倍之女不肯出嫁，在家修行，名唤善果，转生为刘香，持斋念佛，劝化世人，与其父母刘光夫妇，夫状元马玉，二夫人金枝，婢玉梅均寿终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得生上品。文体有说有唱，唱的以七字句为多，间有三三四句，如俗所云攒十字者，体裁大抵与普通弹词相同，性质则盖出于说经，所说修行侧重下列诸事，即敬重佛法僧三宝，装佛贴金，修桥补路，斋僧布施，周济贫穷，戒杀放生，持斋把素，看经念佛，而归结于净土信仰。这些本是低级的佛教思想，但正因此却能深入民间，特别是在一般中流以下的妇女，养成她们一种很可怜的‘女人佛教人生观”。十五年前曾在一篇小论文里说过，中国对于女人轻视的话是以经验为本的，只要有反证这就容易改正，若佛教及基督教的意见，把女人看作秽恶，以宗教或迷信为本，那就更可怕了。《刘香女》一卷完全以女人为对象，最能说出她们在礼教以及宗教下的所受一切痛苦，而其解脱的方法则是出家修行，一条往下走的社会主义的路。卷上记刘香的老师真空尼在福田庵说法，开宗明义便立说云：

你道男女都一样　　谁知贵贱有差分

先说男子怎样名贵，随后再说女子的情形云：

女在娘胎十个月　　背娘朝外不相亲
娘若行走胎先动　　娘胎落地尽嫌憎
在娘肚里娘受狱　　出娘肚外受嫌憎
合家老小都不喜　　嫌我女子累娘身
爷娘无奈将身养　　长大之时嫁与人

嫁人的生活还都全是苦辛，很简括的说道：

公婆发怒忙陪笑　　丈夫怒骂不回声
剪碎绫罗成罪孽　　淘箩落米罪非轻
生男育女秽天地　　血裙秽洗犯河神
点脂搽粉招人眼　　遭刑犯法为佳人
若还堂上公婆好　　周年半载见娘亲
如若不中公婆意　　娘家不得转回程

这都直截的刺入心坎，又急下棒喝道：

任你千方并百计　　女体原来服侍人
这是前生罪孽重　　今生又结孽冤深

又说明道：“男女之别，竟差五百劫之分，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嫁了丈夫，一世被他拘管，百般苦乐，由他做主。既成夫妇，必有生育之苦，难免血水触犯三光之罪。”至于出路则只有这一条：

若是聪明智慧女　　持斋念佛早修行
女转男身多富贵　　下世重修净土门

我这里仔细的摘录，因为他能够很简要的说出那种人生观来，如我在卷上所题记，凄惨抑郁，听之令人不欢。本来女子在社会上地位的低尽人皆知，俗语有做人莫做女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之语。汪悔翁为清末奇士，甚有识见，其二女出嫁皆不幸，死于长毛时，故对于妇女特有创见。《乙丙日记》卷三录其“生女之害”一条云：

人不忧生女，偏不受生女之害；我忧生女，即受生女之害。自己是求人的，自己是在人教下的。女是依靠人的，女是怕人的。

后又说明其害，有云：

平日婿家若凌虐女，己不敢校，以女究在其家度日也，添无限烦恼。婿家有言不敢校，女受翁姑大伯小叔妯娌小姑等气，己不敢校，遂为众人之下。

此只就“私情”言之，若再从“公义”讲，又别有害：

通筹大局，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

故其所举长治久安之策中有下列诸项：

弛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家有两女者倍其赋。严再嫁之律。广清节堂。广女尼寺，立童贞女院。广僧道寺观，唯不塑像。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

又有云：

民间妇女有丁钱，则贫者不养女而溺女，富者始养女嫁女，而天下之贫者以力相尚者不才者皆不得娶，而人少矣，天下之平可卜。

悔翁以人口多为祸乱之源，不愧为卓识，但其方法侧重于女人少，至主张广溺女之法，则过于偏激，盖有感于二女之事，对于女人的去路只指出两条最好的，即是死与出家，无意中乃与女人佛教人生观适合，正是极有意义的事。悔翁又絮絮于择婿之难，此不独为爱怜儿女，亦足以表其深知女人心事，因爱之切知之深而欲求彻底的解决，唯有此忍心害理的一二下策矣。《刘香女》卷以佛教为基调，与悔翁不同，但其对于妇女的同情则自深厚，惟爱莫能助，只能指引她们往下走去，其态度亦如溺女之父母，害之所以爱之耳。我们思前想后良久之后，但觉得有感慨，未可赞同，却也不能责难，我所不以为然者只是宝卷中女人秽恶之观念，此当排除，此外真觉得别无什么适当的话可说也。

往上走的路亦有之乎？英诗人卡本德云，妇女问题要与工人问题同时解决。若然则中国所云民生主义耳。虽然，中国现时“民生”只作“在勤”解，且俟黄河之清再作计较，我这里只替翼化堂充当义务广告，劝人家买一部《刘香宝卷》与《乙丙日记》来看看，至于两性问题中亦可藏有危险思想，则不佞未敢触及也。（廿五年六月廿五日，于北平）

□1936 年 7 月 16 日刊《宇宙风》21 期，署名知堂
□收入《瓜豆集》

读 笑 赞

《笑赞》一卷七十二则，明清都散客著，即赵梦白，曾参劾严嵩之赵忠毅公是也。其第五十一则云：

> 郡人赵世杰半夜睡醒，语其妻曰，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接，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其妻曰，男子妇人有甚差别。世杰遂将其妻打了一顿。至今留下俗语云，赵世杰半夜起来打差别。赞曰，道学家守不妄语为良知，此人夫妻半夜论心，似非妄语，然在夫则可，在妻则不可，何也？此事若问李卓吾，定有奇解。

案卓吾老子对于此事不曾有什么表示，盖因无人问他之故，甚为可惜，但他的意见在别的文章中亦可窥见一点，如《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云：“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即此可知卓吾之意与赵世杰妻相同，以为男子妇人有甚差别者也。此在卓吾说出意见或梦白提出疑问，固已妙矣，但还不算甚难，若赵世杰妻乃不可及，鄙人涉猎杂书，殊未见第二人，古今富贵人有恃其富贵而大胆胡行者如武则天，则虽入《无双谱》，却不能与此相比也。至于被打盖是当然，卓吾亦正以是而被打，梦白隐于笑话，亦幸而免耳。若赵世杰者乃是正统派也，正统派在社会上是正统，但在笑话书中便是笑话了。笑话乃是草里春秋，鄙人之所以不敢轻看滑稽文学者盖以此耳。

□1938 年 8 月 14 日刊《晨报》，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笑　赞

十几年前我编过一册笑话选，专就近代有撰人姓氏的笑话书中选取，计有三种，一为《笑府》，冯梦龙撰，二为《笑倒》，小引署咄咄夫题于半庵，案《半庵笑政》一卷收在《檀几丛书馀集》中，署陈皋谟字献可，当是其真姓名。三为《笑得好》，石天基撰。此外还有《笑赞》一卷，题清都散客述，清都散客又著有《芳茹园乐府》，即明赵南星，故此书亦特别有意思，惜传本木板漫漶，不能据录。星云堂书店曾有刊本，张寿林校录，字句多缺，读之闷损，其后中华书局将《乐府》《笑赞》合刊，名曰《清都散客二种》，有卢前吴梅序跋，而文中残缺如故。似此书至今尚多流传，而皆是板坏后所印，故缺文无法校补，每一翻阅，常感觉可惜。

近时偶尔见到一部，印似较早，虽亦漫漶而尚多可辨识，因借校一过，《乐府》中只有两个字缺其半边，《笑赞》则《推官》条中缺一字，《南风诗赞》中缺一行十三字而已。卢跋称原书为明活字本，世罕流传，其实乃不然。寒斋所有一本，字甚多残缺，而纸墨均新，其第四十四叶且系近时补刊，看来至早是光宣年物，如此外五十来板系明活字，恐不能排着保存下来。还有可笑的是，补刊的一叶中缝有四字曰《笑赞题词》，书面贴签亦如是写，可知主其事者并非内行，但见第一时有题词，以为即是书名，疑是祠堂管事人之类所为，唯印刷所用尚非是有光纸，故推定定系民国前之物，原板或系明末所刊，至于字迹可辨的一本大概亦是百年内所印，未必能很早也。《清都散客二种》的序跋中，卢冀野的小引写得算最好，其文云：

> 清都散客者，高邑赵南星之别署。南星字梦白，号侪鹤，万历二年举进士，除汝宁判官，寻迁户部主事，调吏部考功，历文选员外郎，以疏陈四大害触时忌乞归。万历中再起为考功郎中，主京察，要路私人贬斥殆尽，遂被严旨落职。光宗立，起为太常少卿，继迁左都御史。天启初任吏部尚书，终以进贤嫉恶，忤魏忠贤，削籍戍代州，天启七年卒。南星籍东林，与邹元标顾宪成世称三君。所作有《笑赞》、《芳茹园乐府》。尤侗云，高邑赵侪鹤冢宰一代正人也，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作填歌曲，乃杂取村谣俚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所谓杂取村谣里谚者，《乐府》如是，《笑赞》亦如是，此其所以不重于士夫而转流播于里巷欤。爰合二种，刊以行世。甲戌正月，卢前引。

《笑赞》跋中又云：“《笑赞》之作，非所以供谐谑之资，而赞者故刺之谓也。所录共七十二则，原书为明活字本，都五十二叶，叶十六行，行十四字，世罕流传。见者往往亦以短书少之，不知其言外之义，抑可惜已。”案著者作《笑赞》的原意，在题词中本已说明白，其文云：

> 书传之所纪，目前之所见，不乏可笑者，世所传笑谈乃其影子耳，时或忆及，为之解颐，此孤居无闷之一助也。然亦可以谈名理，可以通世故，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其为机锋之助良非浅鲜。漫录七十二则，各为之赞，名《笑赞》云。

嬉笑怒骂本是相连，所不同者怒骂大有欲打之意，嬉笑则情迹少轻又或陋劣，鄙夷不屑耳，其或有情的嘲弄，由于机智迸出，有如操刀之必割，《诗》所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者，当然可以不算在内。若是把笑话只看作谐谑之资，不知其有讽刺之意，那是道地的道学家看法，压根儿就没法同他说得通了。我在《苦茶庵笑话选》中曾经简单的说明笑话的用处，略云：

“其一，说理论事，空言无补，举例以明，和以调笑，则自然解颐，心悦意服，古人多有取之者，比于寓言。其二，群居会饮，说鬼谈天，诙谐小话亦其一种，可以破闷，可以解忧，至今能说笑话者犹得与弹琵琶唱小曲者同例，免于罚酒焉。其三，当作文学看，这是故事之一类，是滑稽小说的萌芽，也或是其枝叶，研究与赏鉴者均可于此取资，唯中国滑稽小说不知为何不发达，笑话遂有孤苦伶仃之感耳。其四，与歌谣故事谚语相同，笑话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而尤为直截彻透，此正是民俗学中第三类的好资料也。”又在别的一篇小文里说过：

“秋风渐凉，王母暴已过，我年例常患枯草热，也就复发，不能做什么事，只好拿几种小话选本消遣。日本的小话译成中国语当云笑话，笑话当然是消闲的最好材料，实际也不尽然，特别是外国的，因为风俗人情的差异，想要领解往往须用相当的气力。可是笑话的好处就在这里，这点劳力我们岂能可惜。我想笑话的作用固然在于使人笑，但一笑之后还该有什么馀留，那么这对于风俗人情之理解或反省大约就是吧。笑话，寓言与俗谚，是同样的好资料，不问本国或外国，其意味原无不同。”这里所谓对于风俗人情之理解即是上文的其四，而其反省的则是其一，也就是卢君所说的言外之意。这一类的笑话古人著书有利用的，其例颇多。幼时读圣贤书，见孟子述宋人揠苗助长芒芒然归情状，不禁失笑，孔夫子说月攘一鸡，至今传诵，若韩非子所记种种宋人故事，简直是后来呆女婿的流亚了。古来贤哲常用这种手法，见于圣经贤传中，赵梦白东林贤者，继作《笑赞》，正是当然，而且即此更可以见得他明朗通达，与平常道学家不同。他说明古今不少可笑可气的事，世间所传笑谈乃其影子，他指影给我们看，正要我们自己去找那形出来，这或者是别人，或者就是读者自己也说不定。《笑赞》第四十三则云：

唐朝山人殷安尝谓人曰，自古圣人数不过五，伏羲，神农，周公，孔子，（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其人曰，老先生是一个。乃屈五指曰，不敢。

“赞曰，殷安自负是大圣人，而唐朝至今无知之者，想是不会装圣人，若会装时，即非圣人，亦成个名儒。

又第五十一则云：

郡人赵世杰半夜睡醒，语其妻曰，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接，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其妻曰，男子妇人有甚差别。世杰遂将其妻打了一顿。至今留下俗语云，赵世杰半夜起来打差别。

赞曰，道学家守不妄语为良知，此人夫妻半夜论心，似非妄语，然在夫则可，在妻则不可，何也。此事若问李卓吾，定有奇解。

这里面的人有名有姓，已是真形了。但此类事甚多，所以又可以转借过来作影子，至于赞语甚为透彻，此等本领已非冯子犹所及，唯有金圣叹李卓吾才能如此，赵君也已说及，此是他的大不可及处。一般小心小胆的人，守住既得的道德上的权利，一点不敢动，听见金李诸人的话便大感不安，起来嚷嚷，此正是赵世杰之打差别，其不为清都散客之所笑者几希矣。

《芳茹园乐府》中所收的是散套与小令，我们本来可以不谈了，但是其中也有与《笑赞》相关的地方。《笑赞》第十二则云：

辽东一武职素不识字，被论，使人念劾本，至所当革任回卫者也，痛哭曰，革任回卫也罢了，这者也两个字怎么当得起。

赞曰，至公至明，乃可以劾人，不然，者也二字断送了多少好人，

真是难当也。

《乐府》中有《慰张巩昌罢官》一首，有二语云，容易的所当者也，断送的归去来兮，就用这个典故。本来这是散曲，不好拿了什么义法去范围，可是正经朋友往往不能了解，觉得刚正与诙谐难以并存，便有种种的议论。吴瞿安题记云：

> 梦白正人，游戏声歌，本无妨碍，而集中多市井谑浪之言，如《银纽丝》，《一口气》，《山坡羊》，《喜连声》，《劈破玉》诸曲，再读一过，疑是伪托。

又卢冀野跋尾云：

> 世传刘煇以词诬六一，堂上簸钱，遂成罪语，日月之明故无伤也。侪鹤填词，见《西堂百末词》跋。案此小集瑕瑜参半，谑浪之言或更掺入。当其遁迹，不平之气溢于辞表，绝恶佯狂，唯疑可案，既归林泉，偶有吟咏，好事传之，岂容尽信，披沙拣金，是在读者。顾继散词，厥维小曲，兹集所传，小曲为多，风气使然，虽贤者未能免耳。

二跋对于作者备致爱护，其意固可感，而语则甚为纰缪，必如海瑞霍韬乃为正人，此非不佞之所领教也。以文字罪人，最是中国史上污点之一，刘煇之诬六一，舒亶之劾东坡，世所共弃，岂可阳违阴奉，斤斤以此裁量人。昔梁简文帝《诫子当阳公书》有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吾深叹服此言，以为文人的理想应当如此，今见赵梦白，乃知此处有一人在，大可喜也。吴君所说《劈破玉》乃是卷末一章，今录于后：

俏冤家，我咬你个牙厮对。
平空里撞着你，引的我魂飞，
无颠无倒，如痴如醉。
往常时心似铁，到而今着了迷，
舍死忘生只为你。

这是很好的情歌，无论他早在什么时代所作，都觉得是有意思的事。又有一首题为《折桂令后带急三枪》，小注云与诸弟同冯生酒集，其词云：

一丢丢些小亭中，花似君香，竹爱人情。
喜煞潘安，吟穷杜甫，醉坏刘伶。
谣词儿气气声声，新酒儿淡淡浓浓。
怪友狂丁，瓦钵磁钟。
见放着平地神仙，又何须白日飞升。
咱们咱们胡海混。
就地儿圆着圈，咱们流杯，
咱们吃个流杯会，咱们撒会村。
笑特特喜坏了咱们，咱们咱们打个滚。

这真是近于天籁的好文章，想见作者的性情与气象，海阔天空，天真烂漫，自有其伟大处。《阅微草堂笔记》卷二记高邑赵忠毅“东方未明之砚”，背有铭曰：

残月荧荧、太白■■，
鸡三号，更五点，
此时拜疏击大奄，
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贬。

忠义之气如见，亦可佩服，但实只是一种类型，不及读此两册短书，从富有

人情处更能看见其所特有的平凡之伟大也。（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日）

□1945 年 3 月刊《杂志》14 卷 6 期，署名十山
□收入《立春以前》

常言道[1]

十天前我写一封信给一位朋友，说在日本文化里也有他自己的东西，讲到滑稽小说曾这样说道：

“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的所谓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 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鞑’，亦仍无济于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〇四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的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读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是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当时我所注意的是日本从“气质物”（katagimono，chara-cters）出来的，写实而夸张的讽刺小说，特别是三马的作品，差不多全部利用对话，却能在平凡的闲话里藏着会心的微笑，实在很不容易，所以我举出《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却又放下，觉得都不很像，不能相比。但若是单拿这几部书来说，自然也各有他们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现在单说《何典》与《常言道》，我又想只侧重后者，因为比较不大有人知道。《常言道》有嘉庆甲子（一八〇四）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两刻本，《何典》作者是乾嘉时人，书至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始出板，民国十五年又由刘半农先生重刊一次，并加校注，虽然我所有的一册今已不见，但记得的人当甚不少也。

本来讲起这些东西，至少总得去回顾明季一下，或者从所谓李卓吾编的《开卷一笑》谈起，但是材料还不易多找，所以这里只得以乾嘉之际为限。这一类的书通行的有下列几种，今以刊行年代为序：

一、《岂有此理》四卷，嘉庆己未（一七九九）。

二、《更岂有此理》四卷，嘉庆庚申（一八〇〇）。

三、《常言道》四卷，嘉庆甲子（一八〇四）。

四、《何典》十回，乾嘉时人作。

五、《皆大欢喜》四卷，道光辛巳（一八二一）。

六、《文章游戏》四集各八卷，初集嘉庆癸亥（一八〇三），四集道光辛巳（一八二一）出板。这里边以《文章游戏》为最有势力，流通最广，可是成绩似乎也最差，这四集刊行的年月前后垂二十年，我想或者就可以代表谐文兴衰的时代吧。《岂有此理》与《更岂有此理》二集，论内容要比《文章游戏》更佳，很有几篇饶有文学的风味。《皆大欢喜》卷二《韵鹤轩杂著》

[1] 《宇宙风》题作《中国的滑稽文学》。

下，有《跋岂有此理》云：

> 《岂有此理》者吾友周君所著，书一出即脍炙人口，周君殁，其家恐以口过致冥责，遂毁其板，欲购而不可得矣。余于朱君案头见之，惜其庄不胜谐，雅不化俗，务快一时之耳目，而无以取信于异日，然如《谐富论》，《良心说》二作已为《常言道》一书所鼻祖，则知周君者固尚留馀地，犹未穷形极相也。

又《跋梦生草堂纪略后》云：

“周子《梦生草堂纪略》述剑南褚钟平弱冠读《西厢记》感双文之事，思而梦，梦而病，病而垂死。……”卷四《韵鹤轩笔谈》下，《觞佐》中有云：

“周竹君著《人龟辨》一首，以龟为神灵之物，若寡廉鲜耻之辈，不宜冒此美名，遂以乌龟为污闺之讹，究是臆说。”又云：

“《常言道》中以吴中俚语作对，如大妈霍落落，阿姨李菹菹，固属自然，余因仿作数联，以资一笑。”查《岂有此理》卷二有《人龟辨》，卷三有《梦生草堂纪略》，可知此书作者为周竹君，虽此外无可查考，但此类书署名多极诙诡，今乃能知其姓名，亦已难得了。又据上文得略知《常言道》与《岂有此理》的关系，鼻祖云云虽或未必十分确实，却亦事出有因，《谐富》《良心》二文对于富翁极嬉笑怒骂之致，固与《常言道》之专讲小人国独家村柴主钱士命的故事同一用意，第三回描写钱士命的住宅有云：

> 堂屋下一口天生井，朝外挂一顶狒轴，狒轴上面画的是一个狒狒，其形与猩猩相似，故名曰假猩猩。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大姆哈落落，下联写着阿■俚沮沮。梁上悬着一个杜漆扁额，上书梦生草堂四字。

这里梦生草堂的意思虽然不是一样，却正用得相同，似非偶然。下文叙梦生草堂后的自室云：

> 自室中也有小小的一个扁额，题我在这庐四字，两边也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青石屎坑板，下联写着黑漆皮灯笼。

第十五回中则云后来对联换去，改为大话小结果，东事西出头二句，《觞佐》所记俚语对百六联，这两副却都写在里头，《更岂有此理》卷三有俗语对，共一百八十四联，这与做俗语诗的风气在当时大约都很盛，而且推广一步看去，谐文亦即是这种集俗语体的散文，《常言道》与《何典》则是小说罢了。这种文章的要素固然一半在于滑稽讽刺，一半却也重在天然凑泊，有行云流水之妙，——这一句滥调用在这里却很新很切贴，因为这就是我从前为《莫须有先生》作序时所说水与风的意思。《常言道》的西土痴人序有云：

“处世莫不随机应变，作事无非见景生情。”又云：

“别开生面，止将口头言随意攀谈，屏去陈言，只举眼前事出口乱道。言之无罪，不过巷议街谈，闻者足戒，无不家喻户晓。虽属不可为训，亦复聊以解嘲，所谓常言道俗情也云尔。”《何典》著者过路人自序云：

> 无中生有，萃来海外奇谈，忙里偷闲，架就空中楼阁。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一路顺手牵羊，恰似拾蒲鞋配对，到处搜须捉虱，赛过挖迷露做饼。

这里意思说得很明白。《岂有此理》序后钤二印，一曰逢场作戏，一曰见景生情。《更岂有此理》序云：

一时高兴，凑成枝枝节节之文，随意攀谈，做出荒荒唐唐之句。点缀连篇俗语，尽是脱空，推敲几首歪诗，有何来历。付滥调于盲词，自从盘古分天地，换汤头于小说，无非依样画壶卢。嚼字咬文，一相情愿，插科打诨，半句不通。无头无脑，是赶白雀之文章，说去说来，有倒黄霉之意思。纵奇谈于海外，乱坠天花，献丑态于场中，现成笑话。既相仍乎岂有此理之名，才宽责于更其不堪之处。亦曰逢场作戏，偶尔为之，若云出口伤人，冤哉枉也。

他们都喜欢说逢场作戏云云，可见这是那一派的一种标语，很可注意。普通像新旧官僚似的苟且敷衍，常称曰逢场作戏，盖谓有如戏子登台，做此官行此礼，在后台里还是个滥戏子也。这里却并不同，此乃是诚实的一种游戏态度，有如小孩的玩耍，忽然看见一个土堆，不免要爬了上去，有一根棒，忍不住要拿起来挥舞一回，这是他的快乐的游戏，也即是他诚实的工作，其聚精会神处迥出于职业的劳作之上，更何况职业的敷衍乎。这才是逢场作戏，也可以说就是见景生情，文学上的游戏亦是如此。《常言道》第七回的回目云：

化僧饱暖思行浴，卬诡饥寒起道心。

我们看了觉得忍俊不禁，想见作者落魄道人忽然记起这两句成语，正如小孩见了土堆，爬山的心按捺不住了，便这么的来他一下子，“世之人见了以予言为是，无非点头一笑，以予言为非，亦不过摇头一笑，”也就都不管了。这样写法不能有什么好结构，在这一点真是还比不过同路的《何典》，但是那见景生情的意思我们也可以了解，用成语喜双关并不是写文章必然的义法，但偶见亦复可喜，如沙士比亚与兰姆何尝被人嫌憎，不过非其人尤其是非其时的效颦乃是切忌耳。吴中俗语实在太多太好了，难怪他们爱惜想要利用，虽然我读了有些也不懂，要等有研究的笃学的注释。《何典》作者为上海张南庄，《常言道》序作于虎阜，《岂有此理》作者周竹君是吴人，《皆大欢喜》序亦称是苏人所作，《文章游戏》的编者则仁和缪莲仙也，我们想起明末清初的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诸人，觉得这一路真可以有苏杭文学之称，而前后又稍不同，仿佛是日本德川时代小说之京阪与江户两期。因此我又深感到中国这类文学的特色，其漂亮与危险，奉告非苏杭人，学也弗会，苏杭人现在学会了也没意思，所以都无是处。至于看看原本无妨，万一看了也会出毛病，那么看官本身应负其责，究竟看书的都已经不是摇篮里的小宝宝了，咀嚼尝味之力当自有之，若患不消化症便不能再多怪他人也。（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于北平）

〔补记〕沈赤然《寒夜丛谈》卷三有一则云：

文士著述之馀，或陶情笔墨，记所见闻及时事之可悲可喜可惊可怪者，未为不可。自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多借题骂世。于是汩泥扬波之徒踵相接矣。近年《谐铎》一书，已如国狗之瘈，无不噬也，甚至又有《岂有此理》及《更岂有此理》等书名，谩谰秽亵、悖理丧心，非惟为枣梨之灾，实世道人心毒药也。而逐臭诸君子方且家有一编，津津焉以资为谈柄，又何异承人下窍而叹其有如兰之臭耶。沈梅村著作所见有《五砚斋文》及《寄傲轩读书随笔》三集，其人亦颇有见识者，此乃未免鄙陋，似并未见《岂有此理》等书，只因其题名诙诡，遂尔深恶痛绝，其实二书品位还当在《谐铎》之上，且其性质亦并不相同也。沈君承下窍云云，却

颇有《谐铎》之流风，为不佞所不喜，惜乎作者不能自知耳。（廿五年九月八日记）

□1936 年 8 月刊《宇宙风》23 期，署名知堂
□收入《瓜豆集》

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还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的，近来重读一过，觉得实在写得不错。平常批评的人总说笔墨漂亮，思想陈腐。这第一句大抵是众口一辞，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句也并未说错，但是我却有点意见。如要说书的来反对科举，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无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还想入圣庙，则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当选矣。《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又喜讲道学，而安老爷这个脚色在全书中差不多写得最好，我曾玩笑着说，像安学海那样的道学家，我也不怕见见面，虽然我平常所最不喜欢的东西道学家就是其一。此书作者自称恕道，觉得有几分对，大抵他通达人情物理，所以处处显得大方，就是其陈旧迂谬处也总不使人怎么生厌，这是许多作者都不易及的地方。第三十五回鬼神示兆，说此人当中，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大毛病，全书中本来不谈神怪，此处乃落了《棘闱夺命录》的窠臼，很是可惜。为十三妹除了龙仁寺前后一段稍为奇怪外，大体写得很好，天下自有这一种矜才使气的女孩儿，大约列公也曾遇见一位过，略具一鳞半爪，应知鄙言非妄，不过这里集合起来，畅快的写一番罢了。书中对于女人的态度我觉得颇好，恐怕这或者是旗下的关系，其中只是承认阳奇阴偶的谬说，我们却也难深怪，此外总以一个人相对待，绝无淫虐狂的变态形迹，够得上说是健全的态度。我小时候读《天雨花》，很佩服左维明，但是他在庭前剑斩犯淫的侍女，至今留一极恶劣的印象，若《水浒传》之特别憎恶女性，为废名所指摘，小说中如能无此等污染，不可谓非难得而可贵也。鄙人所言颇似多捧在旗的人，好在此刻别无用心，止是直抒胸臆，想知者亦自当知之耳。《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据《八旗文经》卷五十九作者考丙云：“ 文康字铁仙，勒保孙，历官理藩院员外郎，安徽徽州府知府，驻藏大臣。 ”所说较他处为详，所为文有《史梅叔诗选序》一篇，收在《文经》卷十九中，其文亦颇佳，末署道光乙未，逮马从善为评语作序，时为光绪庚寅，相距已有四十三年矣。

□1939 年 5 月 30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谈儿女英雄传[①]

我每提到《红楼梦》的时候，总要想到《儿女英雄传》。这个理由我也不能明白的说明，最显明的或者是在语言上，二者都是用北京话所写，在这一点上是可以与吴语所写的《海上花列传》等相比的。《红楼梦》写时代与地方很是朦胧，至少他不说明是清朝，也不说及什么岁时风俗，显出地方色来，《儿女英雄传》则明白的说是旗下人家，书中纪献唐虽是映射年羹尧，但所写的社会家庭，依照著者的年代推测，当是乾隆嘉庆的时候吧。描写清朝中期的家庭社会，特别是那考试的情形颇为明细，很是难得，不是科举出身的满洲世家子弟没有人能写，就是曹雪芹在这上面也不能不让一步了。

书中所写人物，我只觉得安得海与何玉凤即十三妹最好。安老爷是讲道学的，可是他虽有点迂阔而很通人情，我曾戏说，我痛恶道学家，但是像安得海的却还不妨见他一面。十三妹是个任才使气的女孩儿，在现今也还可以见到，自然只得她的一面，像能仁寺的那一场那是戏台上的事情，我们不能希望现世真有这样的大姑娘，虽然中国社会最为欢迎，只看《十三妹》这部戏文的风行可以证明，在全书中却最是软弱部分，因为前有《剑侠传》，后有各种侠义小说，虽描写得很有点幽默之外，说不上有什么特色。

这书与《儒林外史》一样，现在恐怕难得青年们的真正的赏识，（我所说的赏识，单赏识十三妹的武艺便不能算是真正。）可是二者的价值却是一样的重要，因为小说中讲到科举的只有这二者，现代的中国人是值得注意的。大学里如要开小说研究班，这两部书作一组，第一应当列入，作为研究资料，正式的八股文的研究自然更好，不过那是严肃的沉重的功课，不能像这个的有兴趣了。

□1949 年 12 月 8 日刊《亦报》，署名申寿
□收入《饭后随笔》

[①] 题中“谈”字为编者所加。

品花宝鉴

从市场得赵景深君著《小说戏曲新考》，卷上有《品花宝鉴考证》，说及著作年代，根据杨掌生《梦华琐簿》的记录，云《品花宝鉴》的前三十回成于道光十七年，后三十回补足于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十二年后全书方才告成，刊印的时代是咸丰二年，案此处所举年岁稍有错误，寒斋藏有一部，书系原刻，题叶后有长方框，隶书三行云，戊申年十月幻中了幻斋开雕，己酉六月工竣。是即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梦华琐簿》原文在丁酉年记事下注云，《品花宝鉴》是年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广西归京，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见其刊本。此书盖实刊成于道光己酉，而杨掌生见到时乃在咸丰壬子，本是两件事，非见书时即刊印时也。又云丁酉年先成三十回，与陈少逸自序校对，亦略有不合。自序言某年秋后着手，是年有顺天乡试，可知是道光丁酉，两月间得十五卷，明年往粤西，稿置敝箧中八年之久，及后北返，自粤至楚舟行七十日，又写得十五卷，是年应顺天乡试，当是丁未，故前三十回之成前后盖十年，不得云成于丁酉也。后三十回则在道光丁未年腊底续写，五阅月而成，已是戊申的夏天，到冬天付刊，次年毕工，是很近情理的事。序中不记干支，但据所说两次在京应秋试的事实来考查，丁酉丁未均适合，可知上文所推算的大旨是不错的了。写到这里，想起孙子书君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来，查卷四中《品花宝鉴》项下注曰，存，清咸丰间刊本未见，光绪己酉刊本，半叶八行，行二十二字。原来这里也为杨掌生所误，以为原刊是咸丰间的，无怪其见不到了，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回事，没有料到这己酉年的八行本即是原刊，硬把他退下一甲子去，说他是光绪己酉年的翻本。其实光绪并无己酉，那时已是宣统元年了。还有一层，戊申己酉年本明明写着幻中了幻斋开雕，假如该斋初刊于壬子，到己酉重刊，这其间已经隔了五十七年，幻中了幻居士在初刊时如年正二十，至此也已是七十八岁了，恐怕难得再有刻书的雅兴吧。《小说新考》与《书目》二者都是专门著述，而于此点皆不免有小错误，可见人言之难以凭信也。

□1939 年 6 月 12 日刊《实报》，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曲成图谱

偶从纸裹中找出俟堂抄本《曲成图谱》一册，题钱唐夏鸾翔造，无序跋，本文六十五叶半，首为图板，以后每半叶列二图式，共一百二十八种，图名两两相对，惟其中方背椅之对方无图，当系原缺也。此盖是七巧图之流亚，图板增至十三，凡大小三角四对，大小牙璋形二对，方一，排成各图，较七巧更复杂，而善用不等边形相，故仍具大方之气度。尝见童叶庚所著《益智图》全帙，图样繁富，新奇可喜，但总似太细巧些，图板十五块中所谓四象最能见巧，也最是缺点，故觉得反不能及《曲成》也。

夏君列图题名又颇多诙谐之趣，如一幅出腰鼓式灯笼，柄上有钉，题曰《公务》，对叶则曰《私窠》，乃是一屋而斜开其门，又《同谐到老》为男女履各一，比《益智续图》之出同样的绣鞋两只，亦更为有意思矣。其模写品物，如虾米蛏干，猫笋蚕豆，皆颇有风趣，盖不独能具神韵，古拙而不方板，惜因此亦令人难以划分排列耳。七巧图简易，然其生命固自存在，重看儿时熟识的莲叶百合游鱼诸图，还觉得流连不忍弃，惟佳谱难得，听月山房《七巧书谱》自序中所云一斋主人真本，凡有一式，必引古人诗句以合其意，读之令人欣羡，不知现今尚有此书存在否也。

（五月廿三日大风中记）

《复堂日记》卷七，光绪戊子年间记有夏凤翔鸾翔兄弟事，鸾翔字紫笙，通畴人术业，诗不多作，高华朗诣，步武唐贤，有《春晖草堂集》二卷，《复堂文续》卷一有序。紫笙之子即夏穗卿曾佑，民国初年曾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此图谱或系夏氏家藏，俟堂故得借抄一本，世间似尚无流传也。六月三日又记。

□1939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小　说

提到小说，可以回想的事情实在应当不少罢。其实却不尽然。我读小说的历史开始得很迟，大约在十一二岁时，最初所读的记得是《镜花缘》，以后大概是《西游记》、《封神传》，《水浒》，《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七侠五义》，《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所举都是代表的，其类似模拟者不再列记。这些小说当时读了很有兴趣，后来想起来觉得也得到了好些益处，有如小时候乱吃的糖与水果以及杂拌儿，虽然曾经吃坏了胃或牙齿，但其营养分子也总是不可完全抹杀的。我对于上记各项小说觉得都有可取，但是回想起来时却也不能说出那一部特别有意思，特别有什么地方可以怀念。说也奇怪，我现今提起小说来，自己寻问记得的部分是什么，这大抵不是小说本身而是小说的有些批注。古人云，买椟还珠，这颇有点儿相像，岂不是《笑林》里的材料么。我是想说实话，所以这也是无法。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可是《三国演义》与《红楼梦》也不坏，大约还可以考在一等之内。我读《水浒》，本文与批同样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汤同咽才好，《西厢》亦然，王斫山出来时尤其有相声之妙。多少年前上海刊行新标点书，亚东本的《水浒》校订周密，有学问上的价值，但我觉得平常翻看则仍不如唱经堂本为佳，盖批注圈点不独增加兴趣，亦足为初学指导，养成了解赏鉴之力，与明师指点不异。不过话须得说过来，这里条件第一要批注有趣味有见识，不是凡批皆佳，第二是限于章回体旧作，他本来是说书人口吻，旁边有人再插嘴说几句，并不扰乱原来的空气，若是新小说，则上文所云自不能适用也。此外我还读过不少违碍小说，回想比较的容易找，但此等书既系犯禁，也就不便再谈了。

（一月九日）

□1941 年 1 月 20 日刊《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七 巧 图

小时候玩过的书本里头，最不能忘记的要算七巧图了。回想起来，当时所见者只是一册极普通的《七巧八分图》，实在并没有什么好，就是一种坊本而已，但是有些图如莲叶百合游鱼，简洁浑厚，有古典之趣，此所以不可忘也。听月山房《七巧书谱》自序中有云，曾得一斋主人真本，乃吕青先生所序，凡有一式，必引古人诗句以合其意。此书惜未得见，意必有佳趣，求之书肆亦久不能获。

《七巧八分图》十六卷，补遗一卷，此为繁本，仁和女士钱芸吉撰辑，同治甲戌年刊，去今才六十八年，似亦已不易得。商务印书馆有石印本。寒斋有原刻一部，乃从东京得来，朱墨二色套印，颇为精致，而图样平凡，惟全部有千七百馀图，数量甚可观耳。

近日得《信手拈来》一卷，光绪辛丑年刊，自序署桐乡冯汝琪，云侗斋遭庚子之乱，自恨所学非所用，为世诟病，每思覆酱瓿物一无可传，惟《信手拈来》一册乃广《七巧图》之作，推陈出新，自谓有突过前人处。书才六十页，共计百二十图，颇多佳作，每幅题一二成语，隽雅可喜，序中自诩之语盖非过夸也。图中如“郑家诗婢”、“北地胭脂”、“采莲宫女分花了，笑把兰篙学刺船”、“一心咒笋莫成竹”等，均有诗味画趣，大旨其构图妙处近于夏紫笙之《曲成图谱》，题句则似童松君之《益智图》。此二书亦自佳胜，但所用图板太多，易于见巧，不如《七巧》之简单而大方。一斋主人真本不知何如，得见侗斋本，中多可喜，亦已足矣，惟此系成人之书，若为儿童计，则或仍以小时候所见纯朴之《七巧图》为合宜耳。（一月十八日）

□1941 年 2 月 3 日刊《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西厢记酒令[①]

《巾箱小品》四册，我看见他也在四十多年以前，其面目亦已屡有变易了。最初所见是日本翻刻本，刻工颇佳，不过字的左边有和训句读，可以知道，其次是一部中国刊本，大约就是所谓华韵轩本吧，可是现在都已不存，前者不知何时遗失，后者则于十年前送给别人了。第三次所得，现今还在手边的又是日本翻本，首叶有印文云知足斋书画记，不知原系何人之物。此书所收共十三种，第一册为《冬心先生画记》五种，最为世所知，历来重刻冬心题记者差不多都于此取材，此外则《冬心斋研铭》与《板桥题画》也是可喜的小品文章，至今翻看还觉得很有趣味。但是我现在想要说的，却是别一种东西，即《西厢记酒令》是也。

本来《唐诗酒筹》亦自不恶，如第一条云玉颜不及寒鸦色，面黑者饮，每见辄令人绝倒。惟唐诗范围太广，稍嫌凌杂，不及《西厢》之同出一书，较为匀称。此令凡百二十条，不著撰人名字，俞敦培编《酒令丛抄》，收入卷四《筹令》中，后又有自著《艺云轩西厢新令》计一百条。《集闲情小录》初集中有《西厢酒筹》一卷，一百六条，汪兆麒撰，若最多者则为东山居士之《西厢酒令》计三百条，嘉庆丙子年刊，远在俞汪之前，但似不多见，故《丛抄》中未说及。酒令本是一种劝酒的方便，最简单的如猜拳拍七之类，迨至用成语作筹，便与灯谜相近，很有文字游戏的意味了。《丛抄》中有四书贯西厢令，其一云，“行乎富贵，金莲蹴损牡丹芽”，这原是一个谜语，不过现在底面颠倒罢了。文字上的雕虫小技，非壮夫所当为，惟汉字性质上有此游戏之可能，学者亦不可忽视，则此类酒令与灯谜诗钟对联等同是很好的资料也。（二月八日）

□1941 年 2 月 24 日刊《北平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①] 《北平晨报》原题《记酒令》。

题影印琵琶记

今春间书客以影印巾箱本《琵琶记》见示，喜而留之。词曲均不懂，何能赏识此书，实只喜其以罗纹纸所印耳。卷首图二十幅，刻绘精密，此当是晚明手工，与本文之刊于明初者距离甚远，盖是藏者或影印者所并入，取合锦之意乎。

平伯过访借去，云欲一校，未几以校记相示，乃知有如许好处，具如别纸。不佞翻看过罗纹纸，便已满足矣，若在平伯，可以有好些用处，乃即以进上。时在端午节之前，姑以此代替枇杷，而既不可以食，亦并不可以弹，殆真所谓秀才人情者欤。秋荔亭今不存矣，平伯拍曲之兴致则尚如故，犹如不佞之涉猎杂书，得以永今日，此事思之殊可幸，亦复可慨也。（民国三十年五月三十一）

□1941 年作，1944 年初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癯鸥戏墨

天津徐沅青著述，余所得者有《医方丛话》八卷，《宋艳》十二卷，近又得其《敬乡笔述》八卷，则民国三十一年新刊，用蓝印者也。卷末徐世章跋有云，有《癯鸥戏墨》，文体骈俪，见公《蝶访居诗集》自注，而传本迄未之见。《戏墨》昔年曾得一册，当时同买得者尚有樊文卿之《津门小令》，因从书堆中检出重阅，则题叶后大书光绪乙酉年春二月津门蝶园雕板，与《宋艳》等相类，惟其时只见署名津门东海癯欧撰，知为天津徐姓，不曾细考也。

书凡二卷，有诗星阁主人骈体序文。卷一为集《桃花扇》及《燕子笺》句酒筹各百五十支，骈体序记书共六篇，卷二为书扇屏二则，集唐人及姜白石句诗共四十九首，《蝶园词曲》十六首，《花间楹联丛话》十三则。徐跋云，又《酒筹谱》一种，张君君寿仅获一见，即已为南省士人购去。案此或亦即是《戏墨》，因为卷上全部差不多是酒筹也。诗星阁主人不知为谁，《笔述》卷八记张笨山著书中有星阁集，高彤皆注云，星阁当作诗星阁，然则此作序者其殆是张氏后人耶。

□1941 年作，1944 年刊“ 新民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迷藏一哂

《迷藏一哂》抄本两册，题签云“祭酒公著，六世孙允灌谨藏”，印白文一字曰灌，不知何姓也。序为《西江月》二首，末署“癸丑立春，时在前岁季冬望后之二日也，春梦生题于与木石居”。案康熙《万年历》，十一年壬子十二月十七日立春，与此所记正合，可知此是康熙十二年癸丑，文中弘字不避讳，盖亦康熙时所抄。

全书共谜诗一百首，最初二首为六言，馀皆七言绝句，每句隐花草名各一，全部凡四百种。下册有数首乃是所谓荤谜素猜者，颇多谐诨，此在市井本亦有之，惟祭酒公而为此，乃别有趣味，想见老辈风趣，在康熙时盖尚有晚明的风气存在也。（八月六日）

□1941 年作，1944 年刊“新民”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小说的回忆

小说我在小时候实在看了不少，虽则经书读得不多。本来看小说或者也不能算多，不过与经书比较起来，便显得要多出几倍，而且我的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经书实在并没有给了什么帮助，所以我对于耽读小说的事正是非感谢不可的。十三经之中，自从叠起书包，作揖出了书房门之后，只有《诗经》，《论语》，《孟子》，《礼记》，《尔雅》，（这还是因了郝懿行的义疏的关系），曾经翻阅过一两遍，别的便都久已束之高阁，至于内容也已全部还给了先生了。小说原是中外古今好坏都有，种类杂乱得很，现在想起来，无论是什么，总带有多少好感，因为这是当初自己要看而看的，有如小孩手头有了几文钱，跑去买了些粽糖炒豆，花生米之属，东西虽粗，却吃得滋滋有味，与大人们揪住耳朵硬灌下去的汤药不同，即使那些药不无一点效用，（这里姑且这么说，）后来也总不会再想去吃的。关于这些小说，头绪太纷繁了，现在只就民国以前的记忆来说，一则事情较为简单，二则可以不包括新文学在内，省得说及时要得罪作者，——他们的著作，我读到的就难免要乱说，不曾读到又似乎有点渺视，都不是办法，现在有这时间的限制，这种困难当然可以免除了。

我学国文，能够看书及略写文字，都是从看小说得来，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前清嘉庆的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有着相似的纪录，其一节云：

> 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仅解数语，阅三四本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解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

我十岁时候正在本家的一个文童那里读《大学》，开始看小说还一直在后，大抵在两三年之后吧，但记得清楚的是十五岁时在看《阅微草堂笔记》。我的经验大概可以这样综结的说，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读本。《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里说的很简单轻便，事实上自然也要自有主宰，能够“得鱼忘筌”，乃能通过小说的阵地，获得些语文以及人事上的知识，而不至长久迷困在里面。现在说是回忆，也并不是追述故事，单只就比较记得的几种小说略为谈谈，也只是一点儿意见和印象，读者若是要看客观的批评的话，那只可请去求之于文学史中了。

首先要说的自然是《三国演义》。这并不是我最先看的也不是最好的小说，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影响之大，而这影响又多是不良的。关于这书我近时说过一节话，可以就抄在这里：“前几时借《三国演义》，重看一遍。从前还是在小时候看过的，现在觉得印象很不相同，真有点奇怪它的好处是在哪里，这些年中意见有些变动，第一对于关羽，不但是伏魔大帝妖异的话，就是汉寿亭侯的忠义，也都怀疑了，觉得他不过是帮会里的一个英雄，其影响及于后代的只是桃园结义这一件事罢了。刘玄德我并不以为他一定应该做

皇帝，无论中山靖王谱系的真伪如何，中国古来的皇帝本来谁都可以做的，并非必须姓刘的才行，以人物论实在也还不及孙曹，只是比曹瞒少杀人，这是他唯一的长处。诸葛孔明我也看不出他好在什么地方，演义里的那一套诡计，才比得《水浒》里的吴学究，若说读书人所称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可惜那《后出师表》是后人假造，我们要成人之美，或者承认他治蜀之遗爱可能多有，不过这些在演义里没有说及。掩卷以后仔细回想，这书里的人物有谁值得佩服，很不容易说出来，末了终于只记起了一个孔融，他的故事在书里是没有什么，但这确是一个杰出的人，从前所见木板《三国演义》的绣像中，孔北海头上好像戴了一顶披肩帽，侧面画着，飘飘的长须吹在一边，这个样子也还不错。他是被曹瞒所杀的一人，我对于曹的这一点正是极不以为然的。”

其次讲到《水浒》，这部书比《三国》要有意思得多了。民国以后，我还看过几遍，其一是日本铜板小本，其二是有胡适之考证的新标点本，其三是刘半农影印的贯华堂评本，看时仍觉有趣味。《水浒》的人物中间，我始终最喜欢鲁智深，他是一个纯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对于女人毫无兴趣，却为了她们一再闹出事来，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算来只有郑屠一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禁不起而打死的。这在《水浒》作者意中，不管他是否施耐庵，大概也是理想的人物之一吧。李逵我却不喜欢，虽然与宋江对比的时候也觉得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如江州救宋江时，不寻官兵厮杀，却只向人多处砍过去，可以说正是一只野猫，只有以兽道论是对的吧。——设计赚朱仝上山的那时，李逵在林子里杀了小衙内，把他梳着双丫角的头劈作两半，这件事我是始终觉得不能饶恕的。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的可怕是煞辣，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已至可憎了。武松杀嫂以及飞云楼的一场，都是为报仇，石秀的逼杨雄杀潘巧云，为的要自己表白，完全是假公济私，这些情形向来都瞒不过看官们的眼，本来可以不必赘说。但是可以注意的是，前头武松杀了亲嫂，后面石秀又杀盟嫂，据金圣叹说来，固然可以说是由于作者故意要显他的手段，写出同而不同的两个场面来，可是事实上根本相同的则是两处都惨杀女人，在这上面作者似乎无意中露出了一点羊脚，即是他的女人憎恶的程度。《水浒》中杀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写杀潘金莲杀潘巧云迎儿处却是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在这里又显出淫虐狂的痕迹来了。十多年前，莫须有先生在报上写过小文章，对于水浒的憎女家态度很加非难，所以上边的意见也可以说是起源于他的。语云，饱暖思淫欲，似应读之曰，淫欲思暴虐。一夫多妻的东方古国，最容易有此变态，在文艺上都会得显示出来，上边所说只是最明显的一例罢了。

《封神传》，《西游记》，《镜花缘》，我把这三部书归在一起，或者有人以为不伦不类，不过我的这样排列法是有理由的。本来《封神传》是《东周列国》之流，大概从《武王伐纣》书转变出来的，原是历史演义，却着重在使役鬼神这一点上敷衍成那么一部怪书，见神见鬼的那么说怪话的书大约是无出其右的了。《西游记》因为是记唐僧取经的事，有人以为隐藏着什么教理，（却又说是道教的，“先生每”又何苦来要借和尚的光呢！）这里我不想讨论，虽然我自己原是不相信的，我只觉得他写孙行者和妖精的变化百出，很是好玩，与《封神》也是一类。《镜花缘》前后实在是两部分，那些考女状元等等的女权说或者也有意义，我所喜欢的乃是那前半，即唐敖多九

公漂洋的故事。这三种小说的性质如何不同且不管他，我只合在一处，在古来缺少童话的中国当作这一类的作品看，亦是慰情胜无的事情。

《封神传》乡下人称为“纣鹿台”，虽然差不多已成为荒唐无稽的代名词，但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的红纸到处点着，他手执杏黄旗骑着四不相的模样也是永久活在人的空想里，因为一切幻术都是童话世界的应有的陈设，缺少了便要感觉贫乏的。它的缺点只是没有个性，近似，单调，不过这也是童话或民话的特征，他每一则大抵都只是用了若干形式凑拼而成的，有如七巧图一般，摆得好的虽然也可以很好。

孙猴子的描写要好得多了，虽则猪八戒或者也不在他之下，其他的精怪则和阐截两教之神道差不多，也正是童话剧中的木头人而已，不过作者有许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示得有意思。儿童与老百姓是颇有幽默感的，所以好的童话和民话都含有滑稽趣味。我的祖父常喜欢讲，孙行者有一回战败逃走无处躲藏，只得摇身一变，变成一座古庙，剩下一根尾巴，苦于无处安顿，只好权作旗杆，放在后面。妖怪赶来一看，庙倒是不错，但是一根旗竿竖在庙背后，这种庙宇世上少有，一定是孙猴变的，于是终被看破了。这件故事看似寻常，却实在是儿童的想头，小孩听了一定要高兴发笑的，这便是价值的所在。几年前写过一篇五言十二韵，上去声通押的“诗”，是说《西游记》的，现在附录于下，作为补充的资料。

儿时读西游，最喜孙行者。此猴有本领，言动近儒雅。
变化无穷尽，童心最歆讶。亦有猪八戒，妙处在粗野。
偷懒说谎话，时被师兄骂。却复近自然，读过亦难舍。
虽是上西天，一路尽作耍。只苦老和尚，落难无假借。
却令小读者，展卷忘昼夜。著书赠后人，于兹见真价。
即使谈玄理，亦应如此写。买椟而还珠，一样致感谢。

《镜花缘》的海外冒险部分，利用《山海经》《神异》《十洲》等的材料，在中国小说家可以说是唯一的尝试，虽然奇怪比不上水手辛八的《航海述奇》，（《天方夜谈》中的一篇有名故事，民国前有单行译本，即用这个名字），但也是在无鸟树林里的蝙蝠，值得称赏，君子国白民国女人国的记事，富于诙谐与讽刺，即使比较英国的《格里佛游记》，不免如见大巫，却也总是个小巫，可以说是具体而微的一种杰作了。这三部书我觉得它都好，虽则已有多年不看，不过我至今还是如此想，这里可以有一个证明。还是在当学生的时代，得到了一本无编译者姓名的英文选本《天方夜谈》，如今事隔多年，又买得了英国理查白顿译文的选本，翻译的信实是天下有名的，从新翻阅一遍，渔人与瓶里的妖神，女人和她的两只黑母狗，阿拉丁的神灯，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和胡麻开门的故事都记了起来，这八百多页的书就耽读完了，把别的书物都暂时搁在一边。我相信假如现在再拿《西游》或《封神》来读，一定也会得将翻看着的唐诗搁下，专心去看那些妖怪神道的。——但是《天方夜谈》在中国，至今只有光绪年间奚若的一种古文译本，好像是专供给我们老辈而不预备给小人们看似的，这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红楼梦》自然也不得不一谈，虽然关于这书谈的人太多了，多谈不但没用，而且也近于无聊，我只一说对于大观园里的女人意见如何。正册的二十四钗中，当然秋菊春兰各有其美，但我细细想过，觉得曹雪芹描写得最成功也最用力的乃是王熙凤，她的缺点和长处是不可分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好些固然像是实在有过的人一样，而凤姐则是最活现的一个，也自然最可

喜。副册中我觉得晴雯很好，而袭人也不错，别人恐怕要说这是老子韩非同传，其实她有可取，不管好坏怎么地不一样。

《红楼梦》的描写与语言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二者运用北京话都很纯熟，因为原来作者都是旗人，《红楼梦》虽是清朝的书，但大观园中犹如桃源似的，时代的空气很是稀薄，起居服色写得极为朦胧，始终似在锦绣的戏台布景中，《儿女英雄传》则相反地表现得很是明确。前清科举考试的情形，世家家庭间的礼节辞令，都有详细的描写，这是一种难得的特色。从前我说过几句批评，现在意见还是如此，可以再应用在这里：

〔编者按〕此处原有一节，与以下《儿女英雄传》一文全同，只略去几句。为免重复，现予删去。

我们顺便地就讲到《儒林外史》。他对于前清的读书社会整个的加以讽刺，不但是高翰林卫举人严贡生等人荒谬可笑，就是此外许多人，即使作者并无嘲弄的意思，而写了出来也是那个无聊社会的一分子，其无聊正是一样的。程鱼门在作者的传中说此书“穷极文士情态”，正是说得极对，而这又差不多以南方为对象的，与作者同时代的高南阜曾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也可以给《儒林外史》中人物作一个总评。这书的缺陷是专讲儒林，如今事隔百馀年，教育制度有些变化了，读者恐要觉得疏远，比较的减少兴味，亦未可知，但是科举虽废，士大夫的传统还是俨存，诚如识者所说，青年人原是老头儿的儿子，读书人现在改称知识阶级，仍旧一代如一代，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在这个时期还是长久有生命的。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部书是唯一的好成绩，不过如喝一口酸辣的酒，里边多含一点苦味，这也实在是难怪的，水土本来有点儿苦，米与水自然也如此，虽有好酿手者奈之何。后来写这类谴责小说的也有人，但没有赶得上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笔记，虽有人恭维，我却未能佩服，吴研人的老新党的思想往往不及前朝的人，（例如吴敬梓），他始终是个成功的上海的报人罢了。

《品花宝鉴》与《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同是前清嘉道时代的作品，虽然是以北京的相公生活为主题，实在也是一部好的社会小说。书中除所写主要的几个人物过于修饰之外，其馀次要的也就近于下流的各色人等，却都写得不错。有人曾说他写的脏，不知那里正是他的特色，那些人与事本来就是那么脏的，要写也就只有那么的不怕脏。这诚如理查白顿关于《香园》一书所说，这不是小孩子的书。中国有些书的确不是小孩子可以看的，但是有教育的成年人却应当一看，正如关于人生的黑暗面与比较的光明面他都该知道一样。有许多坏小说，在这里也不能说没有用处，不过第一要看的人有成人的心眼，也就是有主宰，知道怎么看。但是我老实说不一定有这里所需要的忍耐力，往往成见的好恶先出来了，明知《野叟曝言》里文素臣是内圣外王思想的代表，书中的思想极正统，极谬妄，极荒淫，很值得一读，可是我从前借得学堂同班的半部石印小字本，终于未曾看完而还了他了。这部江阴夏老先生的大作，我竭诚推荐给研究中国文士思想和心理分析的朋友，是上好的资料，虽则我自己还未通读一过。

以上所说以民国以前为标准，所以《醒世因缘传》与《歧路灯》都没有说及。前者据胡博士考证，定为《聊斋》作者蒲留仙之作，我于五四以后才

在北京得到一部，后者为河南人的大部著作，民国十四五年顷始有铅字本，第一册只有原本的四分之一，其馀可惜未曾续出。《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系是短篇，与上边所谈的说部不同，虽然也还有什么可谈之处，却只可从略。《茶花女遗事》以下的翻译小说以及杂览的外国小说等，或因零星散佚，或在时期限制以外，也都不赘及。

但是末了却还有一部书要提一下，虽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弹词。这即是《白蛇传》，通称《义妖传》，还有别的名称，我是看过那部弹词的，但是琐碎的描写都忘记了，所还记得的也只是那老太婆们所知道的水漫金山等等罢了。后来在北平友人家里，看见滦州影戏演这一出戏，又记忆了起来，曾写了一首诗，题曰《白蛇传》，现在转录于此，看似游戏，意思则照例原是很正经的。其诗云：

顷与友人语，谈及白蛇传。缅怀白娘娘，同声发嗟叹。
许仙凡庸姿，艳福却非浅。蛇女虽异类，素衣何轻倩。
相夫教儿子，妇德亦无间。称之曰义妖，存诚亦善善。
何处来妖僧，打散双飞燕。禁闭雷峰塔，千年不复旦。
滦州有影戏，此卷特哀艳。美眷终悲剧，儿女所怀念。
想见合钵时，泪眼不忍看。女为释所憎，复为儒所贱。
礼教与宗教，交织成偏见。弱者不敢言，中心怀怨恨。
幼时翻弹词，文句未能念。绝恶法海像，指爪掐其面。
前后掐者多，面目不可辨。迩来廿年前，塔倒经自现。
白氏已得出，法海应照办。请师入钵中，永埋西湖畔。

□1945 年作，1961 年刊“ 三育 ”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知堂乙酉文编》

聊斋志异

听说苏联现在翻译中国旧文学，有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等人的诗，这也是平常的事，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说小说类中有《聊斋志异》。本来《聊斋志异》是中国旧说部中之佳作，与《阅微草堂笔记》并驾齐驱，代表古小说的两派，正如《阅微草堂》是近代化的志怪书，《聊斋》继承唐代的传奇文，集其大成，二百多年来他们在文坛上占着势力，那是并非偶然的。

英国人佳尔斯很早把《聊斋》译成英文，大概读者多觉得比李白杜甫更有兴味，难道洋人真只懂得稗官野史的么，这当然不是的。大家都说《聊斋》专讲狐鬼，这正上了作者的大当，他写的故事里的狐鬼，除了忽然而至，■然而灭之外，哪里有狐味鬼气？例如《青凤》与《连琐》两篇，可以算作代表，里边所有的还不只是普通痴男怨女，缠绵歌泣的事情么？他也可以当做人事来写，但是那么的讲室女偷情，寡妇夜奔，岂不违反礼教，《西厢记》便是前车，正人君子不及谋害王实甫，只好叫他下地狱，蒲留仙于此能无戒心？他之多替狐鬼讲恋爱，并非他懂得狐鬼的情状，实乃是礼教不准他写人的恋爱之故也，因此在这一点上很有价值。

外国重视《聊斋》，与重视《西厢》相同，取其能言情，非取其言狐鬼。所以有人以为《聊斋》是民俗的材料，这也是不正确的，资料当然不是没有，但在其最好的几个长篇中则除了人物是超自然的以外别无什么特殊的东西。

学《聊斋》最好的要算王韬的《淞隐漫录》，他喜写男女私情，但那时有妓女可作材料，所以他不必再去借助于狐鬼了。

□1950 年 3 月 4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收入《饭后随笔》

聊斋稿本

《聊斋志异》的稿本我见过一册石印本，是袁金铠所印，伪满时有人在东北见到他，据说底本还在他那里，不过现在如何那就不知道了。石印本并非完整的一卷，乃是选择若干则品凑起来的，有的是刊本中所无的，有的似是誊清本，与刊本一样，有的则是底稿，上边经过好些删改，这改本便与刊本相同了。末一类不多几篇，看了也很有意思，不过也可能怀疑是伪造的，因为这很巧之中便有点疑窦，虽然袁氏是绝对相信他的真实的。假如袁氏所信不错，而这底本还存在，那么这改的笔迹当然是蒲留仙的无疑，要查考对联的真假这是最好的标准了。

世间所说的蒲氏稿本有的是鼓词，后来刊行的已有好几种，有的是《志异》的抄本，大概在乾隆中付刊以前传抄本一定不很少，这便不能说是蒲氏稿本，更不会是他的手笔了。我所见石印本中改笔的字仿佛似欧似柳的一体，不过记忆很是模糊，所以也不能确说了。

□1950 年 12 月 1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西 游 记

我有一个长辈是前清翰林，他的学问大概与一般的太史公无甚差别，也没有留下诗文著作，只在上海盛行诗社时，什么“几生修得到客”等人轮流主社征诗，他也做过些《惜花四律》，《水月电灯曲》之类，又编了若干笑话，发表在社刊上，那时代大约是庚子前后吧。他却有一种奇怪的意见，说小孩专读经书八股，容易变成呆子，必须先教他看小说，思想灵活了，有了看书的兴趣，再引他回过去用功，才能前进，至少也可免于淤塞不通。小说中间他说是《西游记》最好，小孩喜欢看，书也做得巧妙，举的例不知道是哪一回，说孙猴打败逃至一处，变成一座庙，只苦于尾巴没法安顿，只好化作一根旗竿竖在那里，可是追的人来到了立即看破，因为世界上没有过在庙后边单竖一根旗竿的。《西游记》虽是说取经的故事，却极少佛教的空气，玄奘成了一个无用的和尚，读者的注意完全集中在妖怪身上，八十一难的故事差不多都是童话的分子，其为儿童所爱好正是当然的事。印度是故事的源泉，自是例外，此外各国恐怕没有这样的长篇童话小说，只有俗称《天方夜谈》的《一千一夜》，或者可以相比。《一千一夜》因为是从市场出来，讲得很是圆熟也紧凑了，《西游》则成书后才讲说，书本显得简单，假如能够找到说《西游》的名人，照他所讲的笔记下来，那一定可以成为一部大著，为八岁至八十岁的人同样所爱读吧。

□1950 年 9 月 11 日刊《亦报》，署名持光
□收入《饭后随笔》

水 浒 传

《水浒传》的批评向来一直颇好，只有少数卫道的绅士加以非难，称之曰诲盗，这班绅士们的操心也不全是空的，因为一般人的喜欢《水浒》便因为这里边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有许多江湖好汉落草避难，表面上仰慕桃园三杰，实际上是学的忠义堂一路，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的力量。中国过去政治不良，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占据全面的社会，人民无法生活，只好铤而走险，不但消极的避难，还可以积极的复仇，一班有心无力的听听也觉得痛快，正如西洋中古时代的罗宾汉故事，其流传与欢迎是无足怪的了。

上梁山泊去的英雄中，因为打不平或受冤曲而去的原也不少，但是主要的人物，有如晁盖宋江吴用，却又是另一路，这仿佛是抄的旧文章了，除学究算是自由职业外，保正与押司原是政府下级员司，他们的行为却不是贪污也是土劣，而终于加入好汉的首班，大成其功者，这是什么缘故？我想，这种事情总是有原因，汉高祖刘邦与鄼侯萧何，可不就是历史上的例子么。这样看来，《水浒传》里不但写了贪污土劣逼人去上梁山，而且也写了他们怎么的去上梁山，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吧。

《水浒传》描写人物事件的确有许多好的，但从思想上来说他很有些缺点，他说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可是他对于人民的态度实不见得好，例如李逵劫法场，只拣人多处杀去，这固然也是形容李逵凶猛蠢笨，但著者亦不无痛快的意思，此是其一。其次是对于女人小儿的态度也很不好。武松杀嫂，或者是不得已，但其写杀时不但表示踌躇满志，而且显示快意，近似变态，至于翠屏山的一场，难道真是如金圣叹所说，故意要犯重复而写得两样以见手段么，我觉得还是喜欢那么写，其居心更是不可问了。只是他不曾玩弄小脚，无论这是施耐庵或是李卓吾金圣叹的意思，总之都是好的。

旧小说中写女人的态度显得大方的，还要推《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这是很难得的，莫非因为著者是旗人的缘故，所以受旧文人的恶习较少么，这我不知道。近代学者平步青博学多识，著《蚬斗蕞乐府本事》，改作近人笔记，简炼可读，却喜言金链，极致倾倒，读之肉麻，良可惜也。

□1949 年 12 月 10 日刊《亦报》，署名申寿

□收入《饭后随笔》

水浒与红楼

旧小说中间，《水浒》与《红楼梦》是两条大台柱，可是一般人的批评也不能没有轻重，大抵比较的要看重《红楼》一点。在《中国小说史料》中虽然二者分量差不多同样的多，但是《水浒》迷如常智和尚，一心想学鲁智深，“与其侪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烧屋”，或怒目大骂你有几颗头的，只有一个人；而如《庸闲斋笔记》所说的杭州贾人女，《三借庐笔谈》苏州金姓，迷恋宝黛而生病发痴的，却所在多有，就是一个例证。不过据我看来，这恐怕只是读书人的看法，若是以老百姓的眼光为标准，或者这要倒转过来也未可知。

《红楼梦》的缠绵斐娓的描写，好是不成问题的，但这里边的那些公子小姐们的性情生活，与老百姓颇有距离，大概不大容易感到兴趣，不及梁山泊的男女可以了解，这证据是《水浒》的戏文相当不少，《红楼梦》便绝无仅有，《黛玉葬花》如演起来，也只有知识分子能赏识，这因落花而感叹身世的情绪在农工大众中间是很难得有的。话虽如此，我看《红楼》可以整部看完，《水浒》只是大半部，到得打祝家庄以后，觉得宋江渐有皇帝派头，或者正是金圣叹所说的假仁假义马脚露出来时，也就觉得随时可以放下了。

□1951 年 4 月 6 日刊《亦报》，署名十山
□收入《饭后随笔》

红 楼 梦

上月里法捷耶夫在北京某处演讲，提到李太白，有人说那么现在李太白也可以讲了，近来听说有大学里开了一班课，是研究《红楼梦》，那么《红楼梦》岂不是也可以读了么。其实无论什么，没有不可以看的，只要看的得法。看法原来可以有几种，其一是站在外边，研究作品的历史、形式与内容，加以批判，这是批评家的态度。其二是简直钻到里边去，认真体味，弄得不好便会发痴，一心想念林妹妹，中了书中自有人如玉的毒了。此外有一种常识的看法，一样的赏识他的文章结构，个性事件描写的巧妙，却又多注意所写的人物与世相，于娱乐之外又增加些知识。这是平凡人的读法，我觉得最为适用，批评家我们干不来，投身太虚幻境又未免太傻了。假如用这种读法去看《红楼梦》，以至任何书，大概总是可以有益无损的。

《红楼梦》所着力的地方是描写那些女人的性格行动，这虽是三百年前的模型，在现代也尽存在，有如那样随意的贾母，能干的凤姐，深心的宝钗，娇性的黛玉，刁恶的袭人与率直的晴雯等，随处可以见到一鳞半爪，这非得有社会上的大变动是不容易改变的。就这一点说来，曹雪芹虽是十八世纪的人，他这著作却是说得上是写实主义，应得法捷耶夫的称赞的。我读《红楼梦》前后大约有两三次，心里留下的印象也还相当清楚，我所觉得佩服的只有王凤姐，喜欢的只有晴雯，这两个人虽然原来是在荣国府大观园里，但是假如换上一个背景，放在城市或乡村的平民社会里，还是一样的可以存在，可以发挥她的特色的。曹雪芹生在那时代，只知道描写贵族社会的生活，但是因为是写实的，他不但写出了荣国府的生活，而且还写了好些女人出来，这是别的小说家所不曾能够做到的了。

□1949 年 12 月 6 日刊《亦报》，署名申寿

□收入《饭后随笔》

红楼梦的改偏问题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大概是不成问题的，现时也仍认定它与《水浒传》同是文学遗产中的重要作品，将来要加以考订，好好的印行的。但是现今如想拿来利用，改编为有教育性质的文娱资料，不论是戏曲弹词，恐怕是不大适宜，至少也是事倍功半的事。

近来讨论《新天河配》《新大名府》的问题，归结到现在言论自由，应当放胆来创作，拿新题材来表现新思想，不必再去依靠古人。有些旧戏剧在民间根柢很深，内容却有害处，那所以非改正不可，这是戏改工作的重要处，至于新编作品我想那尽可自由，无须一定要有出典或根据了。凡是一部著作，或是一种传说故事，在世间历久流传，留下一个印象，一时很不容易变动，若是把这书或故事改得太利害，出到那印象之外，那就成为别的事物，与原来的几乎已无关系了。那么，为什么不索性去另外创作，却要硬拗牛角以致拗死了牛的呢！

红楼二尤以及晴雯的题材的确很好，改编可以成功，但那些本来是突出的事件，别的便很难找，若是在那一群小姐丛中再想找一个出来，就很是为难了。其实这类女性，史传上别处尽有，似乎尽可找得，何必在大观园内，这岂不是已被焦大批评得毫无价值的么。

□1951 年 12 月 23 日刊《亦报》，署名祝由
□未收入自编文集

明清笑话四种引言

笑话在中国经籍上出现得相当的早，这是在东周末期，约当公元前三百五十年，最显著的出在《孟子》上面。我们说最显著，只因它收在《四书》中间，以前有人诵读，所以知道者比较多，虽然在先秦的子书里也有不少。我们先来从它的第二三篇中举出两个例来吧：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

此外在第四篇中，有很有名的一则故事，这便是所谓《齐人》的那一章：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返，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早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璠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日，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这篇叙述得很精细，是上好的一篇笑话，在经书中也很显得突出，所以一向为读书人所注意。关于子书，我想可以举出《韩非子》来作代表，它的主意是在陈说道理，但是与《战国策》等方法有点相同，不少地方利用寓言，可是有些也显然乃是笑话，如《内储说下》中云：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来，士适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无客。问左右，左右言无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

另有一说，说得更是详细，文云：

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答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此处应有季曰二字，）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

本篇内又有一则云：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又《外储说左上》中亦有几篇，今举其一为例：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这些故事在本文里，本来与寓言一样，利用了来证明一种议论，但是一看就可明瞭，在用人事作材料上，在诙谐讽刺的性质上，分辨出来这是笑话的一类。由此可以证明，直至去今二千三四百年以前，已经有这类的笑话流传，而且哲人文士也都不菲薄它，却去拿来使用，作为著书的资料，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所值得注意的。

汉魏以来散文愈益发达，而陈说事理，多趋重正言法语，利用故事的风

气似渐以消歇。但是别一方面，佛经的翻译工作渐盛，经中多用譬喻，这也就输入过来了。鲁迅在《痴华鬘题记》（一九二六年）中云：

>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唯《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具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抄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说法者也。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案：书名原意云为痴人所编的华鬘。古时采集花叶作圈，戴头上或套颈间，用作装饰，或以馈赠，因引伸用以称诗词选集，中世英国人亦尚称为伽阑特（Garland），不失本意。〕

鲁迅向来看重这部《百喻经》，在一九一四年间特地从藏中抄了出来，捐资重刻木板，这回又给作题记，为之介绍。法国汉学者沙畹曾从汉译佛经中选出故事五百篇，法译行世，我们还没有这一种结集，现成的经典中只有这《百喻经》算是最为便利了。这里边有一部分是寓言，好些乃是笑话，有的与中国的很是相像。现在这里来几个例吧。卷上第四〇《宝箧镜喻》云：

> 昔有一人，贫穷困乏，负人债无可偿，即便逃避。至空旷处，值箧满中珍宝，有一明镜，着珍宝上，以盖覆之。贫人见已，心大欢喜，即便发之。见镜中人，便生惊怖，叉手语言，我谓空箧，都无所有，不知有君，在此箧中，莫见瞋也。

这与《笑府选》第九一《看镜》相类似，又同卷五〇《医治脊偻喻》云：

> 譬如有人，猝患脊偻，请医疗治。医以酥涂，上下着板，用力痛压，不觉双目，一时并出。

此与《笑得好选》第四二《医驼背》又正是一样。（六朝前后所译佛经，受骈体文的影响，多用四字为句，今点句多从之，虽然如从意思上看，有时二三句可以联读。）

据上边所说的看来，在中国古籍上笑话颇占有地位，可是不知怎的，后来有点不行了。《隋书经籍志》上载有魏邯郸淳所撰的《笑林》三卷，今已散逸，只在《古小说钩沉》中辑存若干条，唐朝虽曾有侯白的《启颜录》，但那大概与当时的《朝野佥载》相近，不是真正的笑话集了。别一方面，却兴起了种杂记，只是零碎的记录项目，性质上与笑话相近，仿佛是笑话的目录，这便是所谓《杂纂》。最早称唐李义山著，其次有宋王君玉的《杂纂续》，苏东坡的《杂纂二续》，明朝有黄允交的《杂纂三续》，均见于明刻《说郛》中。明末徐树丕在《活埋庵道人识小录》中，收有《风俗粲》一卷，实即是杂纂四续。清韦光黼著有《杂纂新续》，顾禄有《广杂纂》各一卷，收在顾氏所刻《颐素堂丛书》中。

李义山的《杂纂》，《新唐书》上不著录，但《直斋书录解题》中有之，以为系李商隐作，可见在宋朝已有此说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上说道：“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相从，虽止于琐缀，亦颇穿世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由此可知它的长处虽是在于记录风俗人情，但也可以资笑噱，如《杂纂》中不相称，煞风景，恶模样，无所知，愚昧诸项，与《笑倒选》附载的《半庵笑政》中《笑资》所说很是相像，不过它只是列目，不曾演成故事而已。

唐宋以后文风称极盛，但笑话却几乎没有了，至少我们未能见到，这大概只是存在民间口头，不曾有人写了下来。等到明朝，我们才有了笑话集，现在就我们所知道的，收集了四种，连清初在内，来说明一下。本来笑话书此外也还有，但是这四种有一个特色，便是我们知道作者的真姓名，这与后来一般匿名的很有不同，便是可以说这不是不负责任的著作。

这四者之中，第一种值得说的是赵南星的《笑赞》。他又著有散曲一卷，名《芳茹园乐府》，都署名清都散客。一九三四年卢冀野集合重刊，名为《清都散客二种》，有小引云：

> 清都散客者，高邑赵南星之别署。南星字梦白，号鹤侪，万历二年举进士，除汝宁判官，寻迁户部主事，调吏部考功，历文选员外郎，以疏陈四大害，触时忌乞归。万历中再起为考功郎中，主京察，要路私人贬斥殆尽，遂被严旨落职。光宗立，起为太常少卿，继迁左都御史，天启初任吏部尚书，终以进贤嫉恶，忤魏忠贤，削籍戍代州，天启七年卒。南星籍东林，与邹元标顾宪成世称三君。所著有《笑赞》、《芳茹园乐府》。尤侗云，高邑赵鹤侪冢宰一代正人也，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作填歌曲，乃杂取村谣俚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的谓杂取村谣俚谚者，乐府如是，《笑赞》亦如是，此其所以不见重于士夫而转流播于里巷欤，爱合二种，刊以行世。

卢君重刊这两种的意思很好，只可惜所依据的原印本中缺烂太多，几乎每则都有缺字，不可连读，很是气闷。在这以前，北京星云堂也印过一册《笑赞》，系张寿林君所编，断缺正是一样。我侥幸能够见到完本，乃是在一九四三年顷，偶尔借得这两种的比较早印本，虽然字迹也有漫漶处，而大致还可辩认，于是各抄了一本下来。乐府全部中只有两处，尚缺少半个字，《笑赞》则第二六《南风诗》中缺了一行计十三字，但是因为在赞语中，还无甚妨碍。《乐府》抄本，因为解放后卢君到北京来，曾来看过我，我知道他在刻印前人乐府散曲，便送给了他，他也很是喜欢，可惜他南归不久就便去世了，不曾刻得。《笑赞》则留在手头，觉得颇可珍重，这回能够作为《明清笑话集》的压卷，是很可喜的事情。赵君谥称忠毅，的是正人君子，他所编的笑话虽然有些也很尖锐，可是并无什么猥亵的分子，这是很不易得的，所以我们可以全部录存，不必经过什么淘汰。要吹毛求疵的话，那末这只可以说，里边的并不全是纯粹笑话，因为有些有人名如王安石苏东坡的乃是史传上的笑谈，即使有的也出于虚构，但既然说得有名有姓，（这也以知名人为限，平常说张三李四，或如韩非子的李季即李老四，也仍然以虚说的真笑话论，）当然要算是别一种类了。这个情形我们也是知道，但是因为赵梦白的这书少见难得，为了保留它的本相起见，所以舍不得删削，只好办得通融一点罢了。

第二种是冯梦龙的《笑府》。冯梦龙字子猷，别号墨憨斋主人，《笑府》十三卷，就署的是这个名字。他是明末的秀才，用这别号编著小说戏曲甚多，其时代在李卓吾金圣叹之间，地 位则在二者之上，是明季俗文学的一个主帅。他的著述有《墨憨斋传奇》十种，又《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共计古今短篇小说一百四十篇，成为后世有名的所谓《三言》。此外杂著还不少，他编有《古今谈概》一书，集史传笑谈之大成，至清初经人删改，名《古笑史》，有李笠翁的序文。《笑府》则与《谈概》相反，并非实人实事，纯系假作，以嘲笑为目的，乃是真正的笑话。《笑府》后亦经

人改编为《笑林广记》，署名游戏道人，不知姓名，不复可凭，而原本亦遂不传，只知道日本内阁文库及大连前满铁图书馆各有一种，无从得见。今只以日本旧木刻选本二种为依据，其一有二卷，一只一卷，题风来山人删译。风来山人为日本十八世纪的天才作家，译虽未知真伪，但其声名正足与墨憨斋抗衡，故书坊遂借用其名亦未可知。二本内容多不同，今参酌抄录，猥亵类有太甚者，不得已暂从割舍。

第三种是《笑倒》。这本是《山中一夕话》中十种之一，题着咄咄夫的别号，但是我们从他的《半庵笑政》上知道真姓名是陈皋谟，字献可，所以也收入集中了。陈皋谟的事迹无可考，但看《一夕话》的各项序文，可以断定他是明朝的遗老，在清初所写的，因为如顾亭林所说，吴越遗老文多放恣，可以为证，因此，那序上的戊戌也可能就是顺治末年了吧。

第四种是石成金的《笑得好》。石成金天基也是清初人，所著有《传家宝全集》，康熙时刻，一总有二十册以上吧。他的特色是在于编造笑话（自然也有些是用旧有的资料，不过经他改作过了，特别更是尖刻些。）却仍同明朝人一样写上自己的姓名，目的是说劝善惩恶，有些却又讲的特别下作，这是有点儿矛盾的，因此他的原作虽是有初集二集各一卷，我们所选取的可是很不多了。

要了解中国笑话的特质，从中间去看出老百姓的真正的爱憎来，理想的办法是搜集通行的民间故事，把笑话的一部分抽出来，加以整理。不过现在没有这种资料，那末也只好利用既成的书本，虽然这是经文人加工过的，而且中间又是间隔了不少的年代。从这里我们所抄集的三百五十多篇笑话上看来，也可以举出几点来说，但是这有的乃是属于过去的，因为这里反映出来的是过去的社会与生活，——自然有些状况或其影响也可能在现今还存续着。

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笑话里所嘲骂的有许多不通的塾师和庸医。这本来是过去中国社会上的一个大问题，教育与卫生都搞不好，结果误人子弟，害死病人，使得大家痛心疾首，在笑话上便首先表现出来了。这个根源是和以前的科举制度分不开的。自从明朝规定以八股取士，“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家都向着这条路奔去，读通了的及第上进，可以做官，真实本领也只会做文诗罢了。读不通的结果别的事都不会做，只好去教读或行医，骗饭来吃，以极无用的来担任这两项重大任务，为害真真不小。这个情形现在已有改变，而且关于塾师读破句认别字，多系根据经书，对于现代读者也恐有点隔膜了。第二点可说得的是，吝啬的，特别是不请客或吃白食的人，很成为嘲笑的对象，此外则是说大话的，怕老婆的也都在内。第三点是嘲笑愚昧的，这一项里包括着民间故事的《呆女婿》一类，数量应当不小，虽然我们所抄的还不见那么多。第四点是说官府的事，这集里收录得很少，但《笑赞》里附录的《孟黄鼬传》把贪官说的淋漓尽致，《笑府选》第一四九说有长面人被马鞍的失主错认，旁人劝他不如认赔，若是经官定是断给失主，说昏官又真是巧妙得很了。此外有些嘲笑妇女以及残废的，在笑话中当属于下乘，虽是不能免，却是不值得来说了。

这集子里所收笑话的著述者，有赵梦白那么的贤哲，也有石天基那么的庸俗人，他的自称传家宝全集的格言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但统观全部笑话，却都说的不差：我们只看那《笑赞》第五一的“打差别”，与《笑得好选》第八的“割股”，对于强有力的封建道德，特别是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这两项，敢于举起指头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即此可以看出中国笑话里的明朗性与健康性来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编订者记。

□1956 年作，1958 年刊“ 人文 ”初版本，署名周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绿野仙踪[①]

这里还有一部书，我觉得应该提一提，这便是那《绿野仙踪》。什么人所著和什么年代出版我都忘记了，因为我看见这书还在许多年前，大概总有六十多年了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不著录，现今也无法查考。这是一部木板大书，可能有二十册，是我在先母的一个衣柜（普通称作大厨）内发见的，平常乘她往本家妯娌那里谈天去的时候偷看一点，可能没有看完全部，但大体是记得的。书中说冷于冰修仙学道的事，这是书名的所由来，但是又夹杂着温如玉狎娼情形，里边很有些秽亵的描写，其最奇怪的是写冷于冰的女弟子于将得道以前被一个小道士所奸的故事。不过我所不能忘记的不是这些，乃是说冷于冰遇着一个开私塾教书的老头子，有很好的滑稽和讽刺，这老儒给冷于冰看的一篇“馍馍赋”，真是妙绝了，可惜不能记得，但是又给他讲解两句诗，却幸而完全没有忘记，这便是：

媳钗俏矣儿书废，
哥罐闻焉嫂棒伤。

这里有意思的事，乃是讽刺乾隆皇帝的。我们看他题在《知不足斋丛书》前头的“知不足斋何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和在西山碧云寺的御碑上的“香山适才游白社，越岭便以至碧云”比较起来，实在好不了多少。书里的描写可以说是挖苦透了，不晓得那时何以没有卷进文字狱里去的，或者由于告发的不好措施，因为此外没有确实的证据，假如直说这“哥罐”的诗是模拟“圣制”的，恐怕说的人就要先戴上一顶大不敬的帽子吧。

□1969 年 3 月刊香港《明报月刊》39 期，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①] 本文系《旧小说杂谈》中一节，《旧小说杂谈》除多出这一节外，与《小说的回忆》全同，故不编录。